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世界著名演说家

# 演说实录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 前 言

本书是世界上著名演说家的演讲生涯实录。所选列宁、周恩来、苏格拉底、林肯、丘吉尔、罗斯福、甘地等人，在演说史上的地位还有评定。全书从他们的生平出发，结合他们的性格，详尽地描述了他们的重要演说活动、演讲过程，剖析了他们的演讲艺术、技巧和成为伟大演说家的奥秘。

上述演说家的声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场合，都曾深刻地震撼，影响过人类世界。他们的演说艺术今天也已成为人类文化中的宝贵财富，并将继续对人类产生深远的影响。

本书实际上是演说家们的传记。这些大演说家同时也是伟大的政治家。而从演说方面为他们书写传记，应该说是一种全新的尝试。我们的目的当然是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个学习高级演说艺术的机会。因为我们认为，只有从演说家的生平、性格、经历、演说实践之中，才能学到演说艺术的精髓，而这是市面上那些简单的演讲辞选编一类的书所无法做到的。

作为一种尝试，我们对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我们的愿望，不敢抱太高的奢望。不足之处，尚望广大读者不吝指正，以便在再版之时修订补充。

## 世界著名演说实录

## 列 宁

我们的出路只有一条：  
不是胜利，就是灭亡！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是本世纪最典型的职业革命家。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简称苏联）的创始人，是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

他那举世公认钢铁般的意志和清教徒式的生活作风，他那简洁朴实而又极富摧毁力的革命学说，是本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丰厚遗产，曾深刻地影响着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

### 列宁演说的特点：从表情、动作到语言

列宁的亲人和朋友们为我们描述并展现了列宁一生中各大时期的形象：

妹妹乌里扬诺娃在谈到少年和青年列宁时写道：“在体格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极像父亲。他继承了父亲的矮身材，高颧骨脸型，蒙古型的眼角略微向上的眼睛和宽阔的前额。他有父亲的活泼气质和同样诚恳感人的笑。他们有许多相同的品质和脾气——有毅力、有精力、能全心全意献身于工作，有高度的责任感、远大的民主眼光和对别人的体谅。他甚至继续了父亲发 r 时的轻微喉音。”另外，两人都有着淡褐色的胡子，都去世很早：列宁还没有活到 54 岁，父亲只活了 55 岁。一个死于脑硬化，一个死于脑溢血。

而从事秘密革命活动时期的列宁，外表谦逊、纯朴。一位者布尔什维克说道：“他个子不高，戴着普通的便帽，很容易消失在任何一个工厂区而不会惹人注目。一副令人喜爱的黝黑的面孔，略带东方情调——这几乎就是关于他的外貌所能说的一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穿上粗呢外衣，也很容易同伏尔加河流域的任何一群农民融为一体，但是，只要你细瞧一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眼睛，那双不寻常的，深邃的、充满内在力量和坚毅力的深褐色眼睛，你就会立刻感到，在你面前的是一个绝非寻常的人。你从他那朴实外表中得来的最初印象就会马上消失，而为一种你对他那特殊天赋的印象所取代。”

在巴黎期间，一位著名法国雕塑家发现列宁前额的轮廓同古代伟大思想家苏格拉底的雕像极其相似。高尔基也强调过这种相似之处：“他说话时‘P、’发音不清，两手交叉地插在腋下，很洒脱地站着。总之，这个人的一切都太朴实了，在他身上感觉不到有丝毫‘领袖’的气派。但这个秃头的、结实的、强壮的人，一只手摸着他那苏格拉底式的前额，另一只手握着我的手，亲切地闪动着他那一双灵活得惊人的眼睛，立刻就谈到《母亲》这本书的缺点。”

而在西方作家兼记者威尔斯眼中，十月革命胜利后坐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的列宁则生着一张“令人喜爱的微黑面孔，表情变化得很快，呈现着快活的微笑。他在听对方谈话时，眯缝着一只眼睛（这种习惯可能

是由于视力上的某种缺陷造成的)。他的容貌不大像他的照片，因为他是一个面部表情的变化远比面孔本身重要得多的人。在谈话中间，他抬起手来在桌子上堆着的文件上面略微作些手势；他的话讲得很快，津津有味，十分坦率，直截了当，就像一个真正的学者讲话一样。”

去世前夕的列宁容貌上的精神力量风神依旧。一位美国作家这样目击道：“他的面容表明他有力量、机智、具有意志力和过早的衰老。他的小领子经常扣着扣子。我注意到了他的双手，那是一双贵族的手。在他的眼睛里有着一一种X射线般的目光，他的两只眼睛闪耀着讥笑的亮光，闪烁着仇恨的光芒。他是一位伟大的心怀仇恨的人和伟大的活动家。他是当代无产阶级的普加乔夫。他是一位被大量挖苦的话武装起来的人和具有难以置信的行政管理才能的人。他具有知识分子领袖的头脑和伏尔加河畔农夫的身体。”

在讲坛上作为演说家的列宁，他那传奇般的形象使他成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演说家之一。据列宁的战友，苏联职业革命家托玛茨基（他也是一位杰出的演说家）的描述，我们身临其境般地看见了雄辩滔滔的列宁：

“当我故意试图用生人的眼睛和生人的耳朵第一次来观看和聆听讲坛上的列宁时，我看见的是一个强壮、个子不高而内心富有弹性的身躯，我听到的是一种平和、从容、非常急促的声音。P、 两个字订些发音不清，讲起话来几乎是不住气他讲，开始时没有什么特殊语调。起头的几句通常很一般，语气带试探性，整个身体好像还没站稳，姿势不固定，眼神注视着自己，脸色有些阴沉，甚至似乎有点懊丧——他思想里在考虑着怎样抓住听众。”

而当列宁终于站稳脚跟，把题目铺开，这时他“上身前倾，两个大拇指插进背心的肩缝。由于这两个动作，头和手就立刻突出起来。头部本身在其矮小而健壮、各部分都很协调匀称的身躯上就不显得那么大了，但是前额和光秃而凸起的颅骨在头上都显得很大。手臂的动作很多，但不是乱动，也不是神经质。他手掌宽大，手指短粗，平民般的有力。这双手同整个身体一样带着牢靠和男性温厚的特征。”

只要列宁一抓住了题目，他那锐利的目光就从宽大凸出的前额下闪现出来。甚至一个旁观者初次看到这种目光，也会聚精会神地等着静听他下面所要讲的话。在这种时刻，那凸出的颧骨在那极其聪明的宽宏风度的衬托下显得明快而柔和，在这宽宏风度的后面可以使人感觉到他对人、关系、环境局势乃至最深奥不过的内幕情况的真知的见。那长着红灰色胡须的下半部脸就像隐没在黑影里。他的嗓音变得柔和了，运用自如了，有时变得很婉转调皮。

列宁一旦决定向反对者进攻时，“他的手指从西服背心里抽出来，身体微微向后伸直，轻轻退后几步，好像是在为自己空出一段跑道，并且时而讽刺地、时而失望地耸耸肩和摊开双手，富有表情地伸开大拇指。接着逻辑上的进攻便开始了。左手又重新插入背心的肩口，或者更经常是插在裤兜里。右手随着思维的逻辑而有节奏地晃动起来。在需要的时候，左手也出来帮忙。他有时会直截了当地把本来想在当时的场合下予以掩饰的情况暴露出来。‘孟什维克叫嚣他们的报纸被封闭了。不过很遗憾，还不是全部！很快全部都将被封闭（热烈鼓掌）无产阶级专政将

彻底消灭这种贩卖资产阶级鸦片的可耻行为’（热烈鼓掌）。列宁挺直了身躯，两手插在衣袋里，这里一点也没有装腔作势的迹象，声音里也没有那种修辞上的哗众取宠，可是他的整个体形、头的姿式、紧闭的双唇、颧骨和略微沙哑的嗓音却充满着对自己的正义性和正确性的不可动摇的信心。‘如果你们要搏斗，那就请便吧！’”

当他抨击的不是敌人，而是自己的同志时，“无论在他的姿式上，还是在语气上都可以感觉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最激烈的抨击也保持着‘劝服’的特点。有时他的语调突然升高，这是因为他在急速地揭露某一个自己人，为这个人而惭愧。他的声音有时会显得有点假嗓和撕裂，因此一段非常气愤的话也会变得出人意外的温和。”

列宁在演说中所使用的词句结构相当复杂，也极其令人难忘：“他考虑的是思想，而不是叙述，也不是公式，但不包括最简单扼要、鲜明准确的用话和词汇，这些用话和词汇后来像流通中的铮铮硬币一样进入了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句子的结构一般很复杂，一句扣一句，或者相反，句子套句子。这样的句子结构对速记员和后来的编辑都是一种严重的考验。然而，紧张而威严的思想却通过这些复杂的句子为自己开辟了一条坚定、可靠的道路。”

他还是一个幽默大师：“列宁演说时所表现的幽默是那样的平易。任何孤立的诙谐，更不用说是俏皮话，在列宁的演说中都是没有的，而有的只是笑话，这些笑话很形象，为群众所熟悉，是真正意义上的民间笑话。如果政治形势不十分吃紧，如果大多数听众是‘自己人’，那么演讲者并不反对顺便‘开开玩笑’。听众带着感激的心情聆听着那滑稽而朴实的俏皮插话和善良而无情的形容，他们感到这不是说着玩的，不单纯是一句俏皮话，而是有的放矢。”

当列宁讲笑话时，“他的脸的下半部显得更加突出，特别是那张富有感染力的喜欢发笑的嘴。前额和颅骨的线条似乎也缓和了，目光也不再那么逼人了，显得那样的快活，P、的发音更发不清了，紧张的男性思想也松弛下来，显得那么乐观、人道。”

而每当一场列宁演说完结时：“总结作了，结论定了，列宁的样子就像一个工人，累得精疲力尽，但是最终任务还是完成了。他不时用手擦擦渗出汗珠的光秃头顶。发出的声音不那么有力了，就像一堆即将燃完的篝火。可以结束了。但是不必期待那种圆满的、似乎不如此就不能离开讲坛的热烈结局。别人不能够，列宁却可以。他没有演说家式的结束语，他像写文章一样，写完了，就打上句号。‘如果我们明白了，如果我们做了，我们就一定会胜利。’——这就是他常用的结束语。再不然就说：‘这是需要努力奋斗的——不是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而有时更简单：‘这就是我要对你们说的一切。’仅此而已。这样的结尾完全符合列宁演说的特性和列宁本人的特性，丝毫也不会使听众扫兴。相反，恰恰在听了这种‘不动人的’、‘平淡的’结束语后，使人感到它像一团认识的火光腾空而起，重新照亮了列宁在演说中所提到的一切，引起了人们暴风雨般充满感激之情的热烈掌声。”

而这时列宁呢，“他总是草草收起自己的讲稿，迅速离开讲坛，他微微缩着脑袋，下巴低垂着，眼睛被埋在眉毛下边，小胡子几乎像生气的样子在那略微翘起的不满的嘴唇上竖立着。”

这时场上总是爆发成一片欢腾的海洋：“掌声雷动，一浪推一浪。万岁……列宁……领袖伊里奇……在灯光的照耀下，这位举世无双的人的头顶闪闪发光，那不可驯服的浪潮从四面八方滚滚而来，当欢腾的气浪已经达到最狂热的时候，好像突然在狂吼、轰鸣和激浪撞击声中发出一个年青、有力、幸福和炽热的声音，它像一声汽笛透过暴风骤雨在大声地呼喊：伊里奇万岁！接着，人们从充满拥护、爱戴和热忱的万分激动的内心深处，发出了一个共同的飓风般的、惊天动地的吼声：列宁万岁！”

### 十月革命之前的重要演说活动

举世闻名的“列宁”这个名字，是一个笔名。列宁作为一个写作者、编辑、新闻工作者和领袖，在写作署名时常使用“尼·列宁”这个笔名。这里第一个字母“尼”并没有任何意义。列宁从来不用“尼古拉·列宁”来署名。作为苏维埃的领袖，他在署名时总是用自己的真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同时常常在后面加一个“列宁”，并用括弧括起来。

“列宁”这个名字的来源不十分清楚，估计他在1901年12月第一次使用的这个姓是从他认识的一个女中学生“列娜”这个名字引伸出来的。据列宁的亲属讲，列宁是偶然地为自己选用这个笔名的，这个笔名是从西伯利亚的一条大河的河名引伸而来。这条河的名字叫“勒拿河”。在俄语单词中，“列宁”这个笔名的前半部分与这一河名的前半部分相同。

1887年秋天，列宁在辛比尔斯克中学毕业，获金质奖章，进入了父亲的母校——喀山大学。他在这里结识了一批有革命思想的学生。同年12月，他参加学生抗议大会反对大学里的警察制度，因此被捕开除学籍并流放到喀山附近的农村。被捕后押送列宁赴流放地的警官对列宁说：“小伙子，造反有什么好处？你不是向一堵石墙上撞吗？”

列宁回答：“是的，但这是一堵朽墙，一撞就会倒！”

列宁1889年移居萨马拉（现名古比雪夫），因为流放期满，当局不准他回喀山。列宁在萨马拉住了4年，埋头读书，学了几门外语，特别是德语，以便阅读马恩原著，当时马、恩的著作大部分还没译成俄文。他还阅读秘密出版的俄国革命书籍，特别是俄国社会主义天空中的第一颗明星——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在萨马拉，列宁还用母亲资助的钱印制200—250张对伏尔加河流域农民的社会调查表。

1893年8月31日，列宁来到俄国首都圣彼得堡，目的是开始过一种积极的职业革命家的生活。这时他已通过了国立大学的考试，得到文凭，可以注册为律师助手，收入虽然微薄，但他可以独立地生活了。在彼得堡，他同那些卓越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汇集在一起，日夜探讨俄国的现实和前景，十分活跃。列宁是他们之中的佼佼者，他此时只有23岁，却已经研究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他还把马克思主义的“圣经”《共产党宣言》从德文译成俄文，这个译本在年青的同志们中间广为流传，像火种在传播。来彼得堡之前，偏僻的萨马拉没有进行革命工作的机会，那里没有无产阶级，没有大学，而圣彼得堡居住着沙皇和他的警察、宪

兵，大工厂林立，无产阶级密集。圣彼得堡工人的阶级觉悟和文化水平比俄国其他地区的无产者都要高。在他们中间，已经自发地成立了一些秘密的革命工人小组，大小工厂的罢工和骚动经常震惊着社会和列宁这样的青年革命家。

当时俄国工业无产阶级约有 200 万人，大多数都居住在大工业中心：圣彼得堡、莫斯科、巴库、顿巴斯等地。

列宁一到圣彼得堡，就和当地的秘密工作革命小组建立了联系。列宁的博学和革命热情给工人革命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人们回忆道：“一个小个子青年，但是身体结实，面色红润，有一点儿初长的胡髭，一小绺红须和稍带卷曲的红发。他看样子不会超过 23 岁。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大头和白而宽的前额。他略小的眼睛似乎老是眯缝着，他的目光是严肃、沉思、凝视的。一个略带讥讽味道的微笑挂在他薄薄的嘴唇上。”

1893 年到 1894 年冬天，列宁开始以演说为武器进行革命宣传，同时驳斥一些政敌。在莫斯科民粹派聚集的一次集会上，列宁就曾上台以尖锐而充满说服力的演说表达了自己对俄国革命领导阶级工人阶级的信任和赞扬。

民粹派认为俄国没有资本主义，工人占少数，他们不可能成为革命的先锋队，他们崇拜农民，认定广阔的俄国农村将成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摇篮。

而精通俄国历史的列宁从俄国历史上两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及其结局，已经得出了和马克思恩格斯相吻合的论断：农民太保守，不可能进行革命，不仅如此，他们甚至可能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车轮倒转，只有工人阶级才能领导革命。

1667 年，顿河哥萨克斯捷潘·拉辛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农奴中举起了反抗的义旗。这位俄国的绿林好汉领导贫农大军，占领了伏尔加河两岸广大地区，但最后失败了，被活捉并带到莫斯科，凌迟处死。拉辛的起义悲壮动人，他本人成了许多俄国民歌和诗人歌颂的主人公。

1919 年 5 月 1 日，在这十月革命胜利后典型的工人节日里，列宁站在红场上当初拉辛被处死刑的洛布台上，为拉辛的纪念碑举行揭幕典礼。洛布台是莫斯科红场上的一个纪念性建筑，建于 1534 年，是沙皇时代用来发布重要命令、举行宗教仪式和执行死刑的地方。列宁发表了颂扬拉辛，肯定拉辛历史作用的演说：

“同志们，今天我们同渴望推翻资本统治的全世界无产者一起庆祝五一节。这个洛布台使我们想起几百年来劳动群众在压迫者的枷锁下遭受的折磨和苦难。资本的权力离开暴力和凌辱就无法维持，而这种暴力和凌辱即使在过去也引起了起义。这个纪念碑就是纪念一位起义农民的代表人物的。他为了争取自由，就在这个台上献出了头颅。俄国的革命者在反对资本的斗争中付出了很大的牺牲。牺牲的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优秀人物，是争取自由的战士，但他们争取的不是资本所需要的自由，不是经营银行、私人工厂和进行投机的自由。打倒这种自由。我们要的是真正的自由。这种自由只有在社会成员都成为工作者的时候才能实现。要争取这种自由必



须付出很多劳动，很多牺牲。我们要竭尽全力来达到这一伟大的目标，实现社会主义。”

1767年春，即在拉辛开始暴动后整整100年之后，俄国叶卡捷琳娜女王这位法国出生的公主，想看一看俄国的亚洲领土。她由2000名侍从武官陪同，沿伏尔加河顺流而下，到了列宁的家乡辛比尔斯克，从这里经陆路回到首部。她对沿途的见闻印象非常兴奋，从喀山写信给巴黎的伏尔泰说：“我已到达亚洲，我曾想亲眼看到它。”她给另一个俄国外交家写信则描绘了一幅美好俄国风情画：“这里，整个伏尔加河一带的人民都很富裕，他们丰衣足食，虽然各地物价昂贵，但他们都有粮食吃，没有人诉苦和受穷。我们都很健康……叶卡捷琳娜。”

但6年以后，伏尔加河流域和东岸各个地区，燃起了农民暴动的熊熊大火。这些地区世代杂居的鞑靼、巴什基尔、卡尔梅、哥萨克和俄罗斯的农民，统一在一个名叫普加乔夫的起义领袖旗下。和100多年前的拉辛一样，普加乔夫也是一个普通的顿河哥萨克，他31岁，留着长长的胡子，自称是被叶卡捷琳娜推翻的沙皇彼得三世。

普加乔夫装备很差，但流动性强，破坏力很大。他占领帝国的地盘之大远远超过了当年的拉辛，从西伯利亚西部和乌拉尔到伏尔加河下游的察里津，以及到萨马拉，辛比尔斯克和喀山这一广大地区。

帝国震荡，叶卡捷琳娜不得不派出最优秀的将军甚至包括苏沃洛夫去对付普加乔夫。此时伏尔加河流域发生的灾荒也来夹击普加乔夫，他最终失败，在列宁的故乡辛比尔斯克被捕，被装进一个木笼子里运往莫斯科，放在红场上供好奇的城里人取乐。普加乔夫1775年1月10日在红场上被处死，临死前他请求上帝和女王宽恕他的罪过。俄国大诗人普希金的小说《上尉的女儿》对普加乔夫有非常动人的描述。

从小生活在拉辛和普加乔夫曾活动过的地区的列宁，对他们的悲剧深有感触。后来他接受马克思的理论，帮助了列宁强化了自己的观点：普加乔夫暴动是俄国历史上重要的一章；拉辛造反是俄国历史上光辉的一章。但这两次暴动和造反都使俄国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看到，农民只能够烧杀抢掠，但不能够推翻政府和夺取政权。普加乔夫既利用了农奴的忠君思想，所以他冒充沙皇，又利用了他们对贫穷和农奴制的不满。拉辛和普加乔夫的悲剧使列宁毅然转向另一个阶级——工人。

列宁在彼得堡工人中间忘我而冒险地工作着。30年后，当时一位工人革命者回忆列宁的演说给他们的印象：

“列宁1893年在圣彼得堡所作的最初几篇演讲，使我们有一种不能不信服的印象。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懂得怎样把马克思的深刻知识应用于我们大家当时关心的俄国经济问题。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熟悉可用来研究俄国经济情况的原始资料以及地方自治局统计中包含的丰富材料。我们当中也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对斗争中各种力量作出那样深刻和广泛的阶级分析。”

而列宁还通过自己的工作方式影响和培训着更多更熟练的工人革命者。一位杰出的工人革命家后来回忆时，充满感激和赞赏之情：

“这位演讲人什么稿子都不看，随口把这门科学讲给我们听。他常常设法诱导我们发言或引起我们讨论，然后他推动我们前进，使每个人

不得不把他对某一个问题的正确观点讲给别人听。因此，我们的演讲会变得很生动有趣，而我们也开始习惯在大庭广众中讲话了。这一研究方式为学习的人弄清某一个问题的方法。我们大家对这些演讲都非常爱听，我们这位演讲人的理智力量使我们大家始终感到兴奋，我们常常开玩笑说，过度用脑使他的头发都脱落了。同时，这些演讲训练我们去独立工作和搜集材料。这位演讲人常常交给我们一些写着问题的表格，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我们自己对于工厂和作坊中的生活有深刻的认识和观察。”

列宁在彼得堡期间，有时还到瑞士、巴黎和柏林这些资本主义中心旅居，亲自了解国外工人阶级运动的状况，和欧洲中心的工人运动领袖保持密切的联系。

1895年秋冬季，圣彼得堡出现了一个工人阶级运动的高潮。普梯洛夫工厂、桑顿和拉斐尔姆工厂，一个鞋厂都爆发了大罢工。以列宁为首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积极地介入罢工活动，但他和同志们被沙皇的密探和警察一网打尽。

列宁这次是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第一次被捕，他立刻把监狱变成了一个革命活动的特别指挥中心，写作的工作室和学校。在狱中他准备他的巨著《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还写了一本小册子《论罢工》和许多由秘密渠道传送出去在工潮中散发的传单。

列宁在狱中的生活安排体现出职业革命家典型的性格特征：利用一切不利的环境条件为革命工作，有时还很乐观自在。在拘禁之中还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这些后来都成了革命传统的组成部分。

为了避免写的时候被发现，列宁用面包做成小墨水瓶，里面灌上牛奶。当看守刚一开门，列宁立刻就把墨水瓶吃下去。他有一次在信的附白里写道：“今天我吃了6个墨水瓶。”

列宁在监牢里把时间分配得很严格。他用冷水擦身，按时锻炼身体，并按照严格的程序阅读各种书籍。后来，列宁写信给他家里问起他坐监的弟弟时说：

“第一，他是否遵守牢狱里规定的饮食制度？恐怕没有，而我认为这是必须遵守的。第二，他是否做体操？大概也没有。这也是必须做的。至少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每天临睡以前做体操是很愉快和很有益处的。即使是最冷的天气，在整个囚房里寒气袭人的时候，只要活动活动，也会感到暖和，过后睡觉也舒服得多了。”

列宁的妹妹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和他的姐夫马·叶利札罗夫坐牢时，列宁写信告诉他们在“孤独”中保持定时作息的重要性，并告诉他们许多从他自己坐牢经验中得来的若干实际教训。在脑力工作方面，他特别推荐搞翻译：先由外文译成俄文，然后再译成外文。他补充说：“根据我的经验，这是一种最合理的学习外语的方法。”

谈到有系统的工作，列宁写道：“我还劝你按现有的书籍正确地分配学习时间，使学习内容多样化。我很清楚地记得，变换阅读或工作的内容，翻译以后改作阅读，写作以后改作体操，阅读有分量的书以后改

看小说，是非常有益的。”

列宁在彼得堡还结识了后来成为他的妻子的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在这之前，还爱上过另外两位女革命者。克鲁普斯卡娅是一位身材修长，面色白皙，态度严肃的女教师，头发挽在后脑勺上。在一次谢肉节的小型宴会上，彼得堡的马克思主义者一边吃着谢肉节薄饼，一边讨论着俄国的未来。有人提到，识字运动委员会的工作是重要的。列宁听后，发出一种有点冷淡和恼怒的笑声：“怎么，谁想在识字运动委员会里去拯救祖国吗？那就让他去作吧，我们不妨碍他。”列宁的笑声和观点给克鲁普斯卡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理解他的意思：应该用更强有力的方法拯救祖国。列宁一生博览群书，对俄国语言也造诣颇深，但他从来就不是一个书呆子革命家。4年以后，这两位马克思主义者结了婚。

列宁同克鲁普斯卡娅相识之前，曾向雅库波娃求过婚，但没成功。雅库波娃也是一位女教师和女马克思主义者，是克鲁普斯卡娅在工人夜校的女友。

1897年2月，列宁在沙皇监牢过了14个月以后，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东部3年，受警察监视。流放地是努辛斯克县的舒申斯克村。在写给妹妹的信中，列宁对流放地作了这样的描写：

“村子很大，几条街道都非常脏，尘土很多——完全是通常所想象的那样的农村。它在草原上，没有果木，甚至可以说是一片不毛之地，村子四周……堆满了牲口粪；这里的人不把牲口粪运到地里去，就那样堆在村子周围，所以要出村子，总得经过粪堆。村边有一条名叫舒什的小河，现在河水已经变得很浅了。在离村子（确切些说，是离我住的地方，因为村子很长）大约一俄里到一俄里半的地方，舒什河流入叶尼塞河。叶尼塞河在这里形成了许多小岛和小支流，所以没有通往叶尼塞河主流的道路。我常在一条最大的支流里游水，但是这条支流现在也很快地变浅了。村子的另一边（与舒什河相反的方向）大约一俄里半的地方，有一片‘森林’；农民们郑重其事地称它为‘森林’，而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片很不像样的、横遭砍伐的小树林，那里就连一片比较大的树荫也找不到（但是草莓却很多！），这和西伯利亚原始森林毫无共同点。关于西伯利亚原始森林，我目前只是听说，还没有去过（离此地至少有30到40俄里）。谈到山……我描写得非常不确切，因为它们离这里大约有50俄里，只是在没有云雾遮掩的时候才可能望见它们……”

列宁很快和当地居民打成一片，利用自己的法律知识帮助一个被金矿解雇的工人，使他在控告矿主的法庭上胜诉。在列宁那个时代，帝俄沙皇的流放地总能被职业革命家变成休养读书的地方，列宁充分享受这暂时的休整：到舒申斯克村以外很远的地方打猎，打野鸭，在叶尼塞河游泳，同其他流放在西伯利亚的革命者通信，互相拜访讨论。列宁常常收到全国和西伯利亚各地革命者寄来的大批信件，每当这时，他都像过节似的高兴。

1896年8月，克鲁普斯卡娅由于组织罢工被捕，由于女犯人韦特罗娃在彼得堡罗要塞自焚后，她和其他一些女同志被释放，不久克鲁普斯

卡娅流放北方的乌法省，为期3年。她以自己是列宁“未婚妻”的身份，请求政府把她调到列宁的流放地。政府满足了她的要求，列宁也在流放地等候这个未婚妻，克鲁普斯卡娅终于来到舒申斯克列宁的小木屋中。

1899年7月10日，彼得堡的大姑娘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终于嫁给了助理律师弗·伊·乌里扬诺夫。他们婚后的生活是共同翻译《工联主义运动史》，阅读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和撰写《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妻子克鲁普斯卡娅从主妇的角度描述了他们的另一部分生活：“弗·伊里奇用他的流放津贴——8卢布的补助金，就可以租到一间干净的房子，有饭吃，有人洗补衬衣——这还认为钱花多了呢。的确，午饭和晚饭是简单一些——一星期给伊里奇杀一只羊，天天给他吃，直到吃完为止，羊肉吃完之后，就买牛肉，女佣人在院子里在给牲口拌草料的木槽里把牛肉剁碎了给伊里奇作肉饼，牛肉也要吃一个星期。牛奶和奶渣饼，伊里奇和他的狗都可以尽量吃……”

列宁和其他流放者有时旅行50到100俄里彼此探望。住在同一地区的流放者常常借过新年或祝贺婚礼之机，设法从各村前来集会，然后热烈讨论政治问题。在一次这样的集会上，列宁发动大家讨论他写的一封抗议信，许多革命者都在抗议信上签了名。列宁在信中号召“组织一个同无产阶级斗争密切联系的、以争取政治自由为当前任务的独立的工人政党”。

这样的4天集会时间过得很愉快，夏天他们出去远足、举行长途的行猎，并且在河里游泳，冬天则滑雪，下棋，围着炉火讨论各种问题，阅读列宁著作中的某些章节或讨论文学与政治上的各种新趋向。

参加过这种集会的的老革命家后来回忆流放期间的列宁时说道：“列宁并不是一个感觉迟钝、枯燥无味的书呆子，也不是一个孤芳自赏的隐士；他爱人民，爱生活，爱生活的乐趣，而最主要的乐趣却是斗争和努力争取胜利。他是一个结实、健壮、灵活的人，喜欢剧烈的运动，他是一个热心的猎手，优秀的滑冰家，并且是一个精明的棋手。在流放时期，他有时同时下三盘棋，他躺在床上，也不看棋盘，可以打败所有三个对手。”

1900年2月，流放期满，列宁穿过大雪纷飞的西伯利亚，回到俄罗斯。他想侨居国外，避开沙皇那无孔不入的警察和密探，出版报纸，建立无产阶级的政党。

列宁带着作家、新闻工作者、地下组织者以及在西伯利亚流放者之中崇高的声誉来到欧洲。他在德国和瑞士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领袖普列汉诺夫进行商谈，结果在国外出版了一份俄文的定期刊物《火星报》，秘密地运回俄国散发。《火星报》于1900年12月11日问世。创刊号上刊登了列宁论述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文章《中国的战争》，这篇文章从内容和文风上都堪称列宁《火星报》时期著作的代表。对政府的抨击，对东方古国的沉痛关注，体现出列宁作为一个伟大的职业革命家那种国际主义胸怀和对暴政与侵略的尖锐批评：

俄国正在结束对中国的战争：动员了好些军区，耗费了数亿卢布，派遣了几万名士兵到中国去，打了许多次仗，取得了一连串的

胜利，——的确，这些胜利与其说是战胜了敌人的正规军，不如说是战胜了中国的起义者，更不如说是战胜了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淹死和屠杀他们，不惜残杀妇孺，更不用说抢劫皇宫、住宅和商店了。而俄国政府以及奉承它的报纸，却庆祝胜利，欢呼勇敢的军队的新战功，欢呼欧洲文化击败中国野蛮，欢呼俄罗斯“文明使命”在远东的新成功。

在这一片欢呼声中，只是听不到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先进代表——觉悟工人的声音。但是，这次新的胜利征战的重担，完全是由劳动人民承担的，从他们中间抽了许多人到远方去。为了弥补庞大的开支，向他们征收了重税。那末，社会主义者对于这次战争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这次战争对谁有利呢？俄国政府的政策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呢？我们现在试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我国政府首先想使人相信，它甚至不是在同中国打仗，它只是在平定暴乱，镇压叛乱者，帮助合法的中国政府恢复正常的秩序。虽然是不宣而战，但是问题的本质并没有因此而有丝毫改变，因为战争毕竟是在进行。试问，中国人对欧洲人的进攻，这次遭到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和日本人等等疯狂镇压的暴动，究竟是由什么引起的呢？主战派硬说，“这是由黄种人敌视白种人”，“中国人仇视欧洲文化和文明引起的”。是的，中国人的确憎恶欧洲人，然而他们究竟憎恶哪一种欧洲人呢？并且为什么憎恶呢？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6年英法对华的战争）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欧洲各国资产阶级政府早就对中国实行这种掠夺政策了，现在俄国专制政府也加了进去。我们通常把这种掠夺政策叫做殖民政策。凡是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很快的国家，都要急于找寻殖民地，也就是找寻一些工业不很发达，还多少保留着父权制特点的国家，它们可以向这里倾销工业品，从中牟利。为了让一小撮资本家大发横财，各资产阶级政府进行了连年不断的战争，把士兵整团整团地开到有损健康的热带国家去送命，耗费了从人民身上搜刮来的大量钱财，使居民的起义风起云涌，使他们濒于饿死的边缘。我们不妨回忆一下印度上著的抗英起义和印度的饥荒，以及现在英国人对布尔人的战争。

欧洲资本家的贪婪的魔掌现在已经伸向中国了。俄国政府恐怕是最先伸出魔掌的，但是它现在却扬言自己“毫无私心”。它“毫无私心地”占领了中国旅顺口，并且在俄国军队保护下开始在满洲修筑铁路。欧洲各国政府一个接一个拼命掠夺（所谓“租借”）中国领土，瓜分中国的议论并不是无的放矢。如果直言不讳，就应当说：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

列宁在创刊号上的另一段言论，可以看作是对后来的十月革命的一种准确的预言：

“有了坚强的有组织的党，某一次的罢工也能够变成政治示威，变成对政府的一次政治胜利。有了坚强的有组织的党，某一个地区的起义也能够发展成胜利的革命。”

《火星报》是用小号铅字密排和薄葱皮纸印的，为的是便于传递到俄国去。每期只印几千份。列宁和他的同志们不得不亲自去查看组织“输送”，即把报纸送入俄国的工作。这些报纸的发送，有的是分装在信封里，有的是放在手提包夹底里，有的是由人夹带，有的是通过外国船的水手等等。很多份报纸落到警察和宪兵手里，但也有很多份送到工人手里。《火星报》整个代办员网组织起来，在俄国发行报纸。这些代办员都是党的组织者。

1903年夏天，有43名党的代表起初在布鲁塞尔集会，后来引起比利时警察的怀疑而把会议搬到伦敦的一个教堂里开。会议的目的是确定一系列党的原则和讨论组织问题。会上在激烈的讨论中分为两派：以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一派获得了多数票，从此称为“布尔什维克”（俄语“多数人，多数派”的音译）；尤利·马尔托夫一派获得少数票，从此称为“孟什维克”（俄语“少数人、少数派”的音译）。分歧的关键点在于列宁坚持要建立一个紧密团结、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党，这些职业革命家不仅应当像孟什维克所希望的那样，要同情党和忠于党，而且应当完全献身于政治工作，要像军队中的士兵和军官那样，在统一的指挥下发挥作用。

列宁并没有作任何努力来防止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发生决裂，相反，他欢迎这种决裂。在他的巨著《怎么办》（这个书名来自列宁十分喜爱的俄国小说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同名长篇小说）中，他已经预见到了这种分裂。《怎么办》自从1902年问世后，从此成为布尔什维克组织家们的圣经。列宁呼吁：

“我们职业革命家应当而且一定会百倍努力地来从事这样的推动……任何一个革命运动，如果没有一个稳定和能够保证继承性的领导者组织，便不能持久。”

列宁认为这个组织基本上应当由职业革命家组成，因为在实行专制制度的国家内，我们越缩小这种组织，其成员就越难被捕。列宁在总结自己的革命战略时，套用古希腊大物理学家阿基米德的名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够把地球撬翻”的句式：

“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够把俄国翻转过来。”

列宁是一位真正的组织活动家，他认为，目标坚定的人能够影响局势，改变群众的意识和历史。列宁从来不去追求数量上的优势，对这个革命家组织究竟要多少人组成的问题，列宁在一次非正式的回答中说道：大概50—100个职业革命家就足够了。他想要的是一个严格遵守纪律的，能够冲锋陷阵的组织，在他看来，这样的组织比政治纲领还要重要，因为它就是一台隆隆作响，富于行动的政治机器。方法是最重要的，它比政治原则还要重要。实际上，列宁政治原则的核心就是组织和党。

列宁在《火星报》期间的工作状态极佳。克鲁普斯卡娅 1901 年夏天写给列宁母亲的信中说：

“沃洛佳现在工作得非常起劲，我为他感到高兴。当他完全投入某项工作的时候，他总是精神愉快，朝气蓬勃的，这已是他的天性了。他的健康状况非常好，看样子，胃炎一点也没有了，也不再失眠了。他每天都用冷水擦身体，此外，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去游泳。”

1902 年春，列宁移居伦敦，潜心编辑《火星报》和《曙光》，经常在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里工作到晚上，这是欧洲最好的图书馆，马克思曾在这里博览群书，撰写《资本论》。一有空闲，列宁就去了解伦敦，去工人俱乐部参加工人集会。

列宁有个特点，就是他来伦敦以前，就仔细研究过这个城市地图，能够准确地找到他要走的路。老伦敦对这样一点都感到惊奇：“无论要去哪个地方，他都知道最近的路。”

“伊里奇研究了活的伦敦，”克鲁普斯卡娅写道。“他欢喜长时间坐在公共汽车的上层在城内到处跑。他喜欢这个大商业城市的热闹。宁静的广场，一座座房屋，一个个门口，明亮的窗子，周围点缀着的绿叶青枝，只有漆得光亮的马车在这里来来去去，这些在公共汽车上都是看得清清楚楚的，但是挤在附近的伦敦工人居住的陋街小巷，中间横挂着洗晒的衣服，面色苍白的孩子在街沟里玩耍，这些景象在公共汽车的上层却是看不到的。在这样的地区，我们就步行，观察贫富的鲜明对照，伊里奇总是咬紧牙齿用英语嘟哝道：‘两个国家’。”

这年秋天，当另一位职业革命家托洛茨基来到伦敦并加入《火星报》后，列宁带他观光伦敦。在晚年托洛茨基回忆当时情景时，强调了列宁即使在当导游时，也充满着一种鲜明的阶级感：

“在一座桥上，列宁把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和其他一些有名的建筑物一一指给我看。我不记得当时的原话了，但他要表达的意思是：‘这就是他们著名的威斯敏斯特。’‘他们’这个词当然不是指英国人，而是指统治阶级。列宁还谈论到珍贵文物，最新成就，大英博物馆丰富的藏书、欧洲大报的灵通消息，还是后来谈到德国的大炮以及法国的飞机，他总是带有这种含义。虽然他没有丝毫强调这种意思，但它好像发自他内心深处，而主要由他的声调清楚地表达出来。不管他们掌握了什么知识，拥有什么珍宝、创造了什么样的奇迹，他们总归是敌人！在他看来，统治阶级的这种无形的阴影始终窒息着全人类的文明，这个阴影对他来说如同白昼那样实在。”

党代会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分歧越来越大。从第 53 号起，《火星报》变成了孟什维克的机关报，编辑普列汉诺夫和托洛茨基都站在马尔托夫一边，认为列宁是一个“独裁者和恐怖主义者”。

1904 年秋天，由列宁发起，在日内瓦举行了 22 个布尔什维克的会议，到会的有列宁夫妇、卢那察尔斯基等人。会议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告全党书》。大会决定出版一张支持布尔什维克主义立场的新党报。列宁要求这张报纸“必须成为俄国工人运动真正的机关报”。1904 年 12 月 22 日《前进报》创刊号问世，接着在日内瓦定期出版。该报办报经费一部分由马克西姆·高尔基提供，另一部分秘密地来自俄国莫斯科纺织业资本巨头莫罗佐夫。这位资本家也是一个收藏家，常常资助自己的阶级

敌人。

在 1903 年党代会上，列宁的演说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一位参加过这次党代会的布尔什维克如此回忆列宁演说的戏剧性场景：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匆匆地登上讲台，用喉音喊了一声“同志们”。我觉得他不会讲话，但是过了一分钟，我也像所有的人一样，被他的演说给“吞没”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能把极其复杂的政治问题讲得如此简单明了。他并不想编造漂亮的词句，他把每个字眼都明白他说出来，毫不费力地表达出其精确的含义。要描述他所唤起的不寻常的印象，是很困难的。

他的一只手伸向前面，稍微往上抬起，手掌好像是在衡量每一个字眼，驳倒对手的空话，而用一些重要的原理去代替它们，证明工人阶级有权利和义务走自己的道路，而不是落在自由资产阶级后面，甚至也不要跟自由资产阶级并肩同行，——所有这一切都是不同凡响的，而且从列宁口里说出来时就像不是出于他自己，而确实是出于历史的意志。他的演说的和谐、完整、明快和强劲，他站在讲台上的整个形象——简直就像一件古典艺术作品：什么都有，然而没有丝毫多余，没有任何装饰，即使有的话，也看不出来，正如脸上的两只眼睛、手上的五个指头那样天生必不可少似的。

就时间计算，他比在他以前发言的演说家们都讲得少，但就印象来说，却强烈得多；不仅我一个人有此感觉，坐在我背后的人们也兴奋地私语着：

“讲得很充实……”

列宁在选举《火星报》编辑部，针对马尔托夫的抗议给予了驳斥：

“虽然我纠正了马尔托夫所发表的两个‘二人小组’的计划是私人性质的这样一个声明，但是我并不想反对马尔托夫所说的我们不批准旧编辑部是我们所实行的一个有‘政治意义’的步骤的断语。恰巧相反，我无保留地和无条件地同意马尔托夫大同志的意见：这个步骤是有巨大的政治意义的，——不过不是马尔托夫所强加给它的那种政治意义罢了。”

“……由此可以看出，我和马尔托夫同志在政治上的分歧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了。原来我们甚至竟是在用不同的语言讲话，如果我们的全部工作，我们的一切努力的结果仍然是照旧为争取影响而斗争，而不是完全获得和巩固这种影响，那末这些工作、这些努力有什么意思呢？”

确是这样，他的每个论证都是自然而然地发展的，都是凭着它本身所包含的力量发展的。

孟什维克们肆无忌惮地宣称，他们讨厌列宁的演说，尤其讨厌他本人。他论述党必须提高到革命理论的高度，才能全面地检验实践；他说得愈有说服力，他们就愈是凶狠地打断他的演说。

“愤怒、讽刺、憎恨像一阵狂暴的热风，在大厅里激荡，几百只眼睛射出形形色色的光芒集中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身上，简直看不出这些充满敌意的抨击使他激动不安，他讲得热情，却又有力量而镇定。过了



几天我才知道，这种外表的镇定使他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他认为，党只有从理论的高度才能看清党内分歧的原因。但他这个理所当然的见解，却引起了人们对他的敌视；看到这种情况，真令人十分奇怪和难过。我得出这样一个印象，在会议期间，每一天都给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越来越新的力量，使得他更加朝气蓬勃，信心十足，他的演说听起来一天比一天更加坚定，而且代表大会的全体布尔维克也变得更加坚决。”

1904年，迫在眉睫的国内革命以震撼人心的轰响在俄国上空激荡。列宁立刻指出革命即将到来，无产阶级政党要有所准备。

1905年1月1日，日俄战争中日本军队占领沙皇将领们宣称固若金汤的旅顺口，沙皇军队全面溃退。列宁高兴极了，他欢呼道：“旅顺口投降了。”长久以来被认为是欧洲皇权最可靠的堡垒的俄国军事力量沉没在太平洋海底。列宁对此评论道：

“不错，欧洲资产阶级是有值得害怕的东西。无产阶级是有值得高兴的东西。我们最凶恶的敌人的灾难不仅意味着俄国的自由快要到来，它还预告着欧洲无产阶级的新的革命高潮。”

列宁在把日本军队的军事力量看作是一种进步东西时，他是在暗示：日本军队为俄国人民的自由事业服了务。他宣告：“旅顺口的投降是沙皇制度投降的前奏。俄国人民从专制制度的失败中得到了好处。”

这一时期，国内工潮波澜壮阔。1904年12月，巴库发生总罢工。次年1月，圣彼得堡的普梯洛夫工厂发生罢工，很快扩大到首都大小工厂。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的工人甚至投入街垒战，这次革命在1905年1月9日这个“流血的星期日”达到高潮。

这天几千名彼得堡的工人，在东正教牧师加邦的带领下，手里举着圣像和沙皇的像片，嘴里唱着“上帝呵，保佑沙皇”和祈祷文，和平地来到冬宫前的广场上，向沙皇递交请愿书。工人自发的请愿书里，甚至包含有布尔什维克党纲中所载的若干政治和经济要求，这是彼得堡革命工人的心声。

沙皇用哥萨克的皮鞭和枪炮齐射来迎接工人代表。官方透露96人死亡，330人受伤。俄国工人阶级的一次革命努力被泡在血泊之中。

东正教牧师加邦是这次工人和平宗教游行示威的组织者。他是按沙皇政府布置给他的任务而工作的。警察机关要他帮助建立政府的工会以便与真正的工会相对抗。警察制定的这个全国范围的计划被称为“警察社会主义”。但是，流血事件使加邦感到震惊。列宁引证他的话说：“我们再也没有沙皇了。血的河流把沙皇和人民分开了。争取自由的斗争万岁！”

列宁相信关于加邦同警察有联系的说法，但是列宁补充道：“不能排除这样一种想法，加邦牧师可能是一个真正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正是流血星期日把他推上了彻底革命的道路。这一点，只有事实才能解决，而事实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是有利于加邦的。无产阶级冲破了警察社会主义的框子，原来为反对革命而成立的合法的工人协会的全体会员群众，和加邦一起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流血星期日不久，加邦离开了俄国，并声明，他支持列宁他们的党，

他在日内瓦和列宁与普列汉诺夫都谈过几次话。列宁对他的印象是：“他是个极其忠于革命而又富于主动性的聪明人，可惜的是缺乏坚定的革命世界观。”后来加邦回到了俄国，这时一些革命者指责他恢复了以前同沙皇警察的联系，于是社会革命党把他作为叛徒判处了死刑。1906年4月，他被恐怖主义者处以绞刑。

这个事件使全俄群情激奋，列宁从遥远的地方注视着局势的发展并作了一系列指示，在组织和军事上给予引导：

“队伍应当自己武装起来，谁能找到什么就用什么（枪、左轮枪、炸药、刀、铁尺、炸药盒、有刺的铁丝、钉子……）对付骑兵用。革命者可以爬上屋顶，楼房上层等处去，从那里向军队扔石块，泼开水。……当然，任何趋于极端的行为都是不好的。无秩序无准备的小的恐怖行动趋向极端，只会分散和消耗力量。这是千真万确的，当然不应该忘记这一点。”

“但是，另一方面，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忘记下面这一点：现在起义的口号已经发出了，起义已经开始了。在顺利的条件下开始攻击，不仅是每一个革命者的权利，而且是他的直接义务。打死特务、警察、宪兵、炸毁警察局、救出被捕者，夺取政府的钱来供起义的需要，——这样的战斗行动正在一切爆发起义的地方进行着，在波兰和高加索也是这样……。”

列宁号召用革命的恐怖来对付反革命的恐怖。“一月九日”事件最初一传来，列宁立刻领会了它的全部革命意义。他说：“革命开始了”，武装起义的时机成熟了。但孟什维克却把一月九日事件说成工人阶级斗争中一个孤立的事件，并没有历史意义，更谈不上马上需要操起武器。

列宁针锋相对，他断言：

“只有武装的人民才是人民的自由的真正支柱。……革命就是战争。它是历史上所有一场战争中唯一合理的、正当的、正义的，真正伟大的战争。它不象任何其他战争那样，是为了维护一小撮统治者和剥削者的自私利益，它是为了人民群众反对暴君的利益，为了千百万被剥削者和劳动者反对专横和强力的利益而进行的战争。”

他重温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有论述起义的著作，钻研军事书籍。他仔细研究了巷战和游击战的经验，过去起义的经验，特别是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他不但号召准备起义，而且考虑到起义的一切技术细节。

他亲自对巴黎公社克昌泽烈将军论巷战的一本小册子的译文作了细心的校阅。列宁认为这本小册子很有价值，因为它具体讲解了怎样构筑街垒，怎样占领房屋并加以设防，怎样使用炸弹等等。

面对起义，列宁之所以有如此成熟思想和战略上的准备，是因为他从巴黎公社血的教训中看到了前进的方向。1871年从3月18日到5月29日这72天中，公社领导犯了致命的错误，最后迎来的是当时法国总理阿道夫·梯也尔进攻巴黎，镇压公社，使巴黎公社遭受惨重的损失。

1908年3月18日为纪念马克思逝世25周年和公社起义37周年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会议上。列宁在日内瓦大礼堂作了《公社的教训》的著名演说：

“两个错误葬送了光辉的胜利果实。无产阶级在中途停了下来，没有‘剥夺剥夺者’，而一味幻想在国内树立一种最高的公理。没有夺取像银行这样的机构。第二个错误是无产阶级过于宽大。本来应当消灭自己的敌人，但是它却竭力从精神上去感化他们。它贬低了国内战争中纯军事行动的意义，没有向凡尔赛宫坚决进攻，以便在巴黎取得彻底的胜利，而是行动迟缓，使凡尔赛政府有时间纠集黑暗势力来准备五月的流血周。”

列宁总结公社的功绩时说道：

“公社驱散了爱国主义的幻想，破除了对资产阶级的全民族意愿的天真信任。无产阶级获得的教训是永远不会遗忘的。工人阶级将永远吸取这个教训，例如俄国在十二月起义中就已经这样做了。有时候无产阶级的利益要求在公开的战斗中坚决无情地歼灭敌人。公社和1905年的革命遭到了镇压，但是新的起义是一定会爆发的；在新的起义面前，弱者将是无产阶级的敌人。在新的起义中，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一定会获得完全的胜利。”

一位西方研究列宁的学者这样评论列宁和革命关系：“他经常在考虑革命，他不是像历史学家或社会学家那样考虑革命，而是像一个恋人那样考虑革命，他把各种根本的变化和最大的震荡都十分迷恋地考虑到了。他仇恨现实。”

回顾1905年的革命对列宁的影响，对理解列宁和后来的十月革命都有着相当大的启示作用。列宁布尔什维克并不是1905年革命的组织者，它是自发的。俄国社会各种反差巨大的阶层差异：宫廷和国家、贵族和商人、暴发户工业资本家同赤贫的工人，大俄罗斯人同上百个少数民族之间，被愚昧、仇恨和贫困所隔开。一堆干柴正待火星。

日俄战争沙皇被击溃的军队和击沉的装甲舰，使帝国上下震惊，人民本能地感到沙皇不再神圣，俄国处在暴动的状态中。一系列大工业中心工潮迭起，大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导致4所大学被当局关闭。社会革命党刺杀了莫斯科总督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和华沙的警察局长，游行示威者还捣毁了格鲁吉亚的警察局。继高加索爆发铁路工人总罢工后，一个亚美尼亚的民族主义者刺杀了巴库的省长。

最后，帝俄海军“塔夫利达公爵波将金号”装甲舰全体官兵在敖德萨举行了暴动、夺取了军舰。（苏联电影大师爱森斯坦的影片《战舰波将金号》艺术地再现了这次起义。影片中有一团生蛆的肉像征着起义者眼中那腐朽不堪的沙皇制度）。该舰起义后期待俄国进一步发生事变，但久等不来，后被效忠于沙皇的军队围攻，火力猛烈，舰上400名船员被捕。

列宁在日内瓦高度评价“波将金号”的造反以及它从俄国水域开向

国外罗马尼亚的义举。但他引用了一个外国记者关于这一事件的最佳说法：“革命控制着装甲舰，但是不知道如何处理它。”列宁对“波将金号”装甲舰这种义举寄予希望：“真正的争取自由的斗争，你死我活的斗争只是刚刚开始。革命军队万岁！革命政府万岁！”十月革命由职业革命家和党指引的“阿芙乐尔号”炮轰冬宫，还将有一大段历程。

1905年4月，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列宁的努力下在伦敦召开。列宁想通过这次大会把布尔什维克团结起来，这是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的大会。列宁从军事化原则来要求这次大会。

“必须简单（像一个军事会议一样），时间必须短（像一个军事会议一样），人数必须少（像一个军事会议一样）。这是一次组织战争的代表大会。”

代表大会修改了党章，通过了列宁制定的党章第一条条文。在大会上，列宁坚决主张，要吸收更多的工人参加委员会。他提议，各委员会中，每有两个知识分子，就必须有8个工人。

“吸收工人参加委员会不仅是一个教育任务，而且是一个政治任务。工人具有阶级本能，工人只要有一点政治经验，就能相当快地成为坚定的社会民主党人。”

第三次代表大会团结了布尔什维克，选出了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委员会。

列宁在他的关于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的通告里，代表中央委员会，对于工人阶级当前的任务作了这样的演说：

“无产阶级是不会被这些伟大任务吓倒的。它将轻蔑地甩开那些预言无产阶级会因胜利而遭到不幸的人。俄国无产阶级一定能彻底完成自己的义务。它一定能领导人民的武装起义。它不会被参加临时革命政府这个艰巨任务所吓倒，如果这个任务落在它肩上的话。它一定能击退一切反革命的图谋，无情地粉碎自由的一切敌人，挺胸捍卫民主共和国，以革命方法努力实现我党的全部最低纲领。俄国无产阶级不应当害怕这种结局，而应当热烈地希望这种结局到来。在即将来临的民主主义革命中获得胜利后，我们就会因此而向我们的社会主义目标前进一大步。”

整个1905年，列宁像他的知识分子朋友马克西姆·高尔基所歌颂过的一只海燕，在革命风暴骤起的俄国海洋上迎风搏击。一位老布尔什维克回忆在“波将金号”以及黑海舰队以后，列宁指示革命舰只必须采取坚决行动：

“他们必须尽一切力量来掌握舰队的其他舰只。我相信大部分舰只会和‘波将金号’采取一致行动。现在需要的只是勇敢和坚决的行动。过后立即派一艘鱼雷艇来接我。我要到罗马尼亚去。”列宁说道。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你当真认为这一切都是可能的吗？”我无意中问了一句。

“当然，我认为这是绝对可能的。所必需的只是坚决和迅速的行动。”他坚定和自信地重复了一句。

1905年10月20日，莫斯科——喀山铁路发生罢工。到10月25日，

俄罗斯帝国所有的铁路，除芬兰外，都罢工了。

10月26日，圣彼得堡的所有工厂和作坊里举行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当夜举行了苏维埃第一次会议。工人罢工引起了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阶层也开始罢工：律师、公务员、国家机关雇员、药剂师都纷纷搁下了手里的活计。

首都圣彼得堡的电话和电报工作人员罢工，通讯全部中断，国家银行和财政部也发生了罢工，金融运转失常。莫斯科大学被军队团团围住，大学里的学生集会正风起云涌。在南高加索、波罗的海地区和波兰地区都爆发了起义。帝国上下到处都是人民同军队的冲突，城里发生巷战，在乡村，农民起来焚烧地主的庄园。

沙皇政府被迫对人民作出第一次让步，以求不丧失一切。10月30日，沙皇发表了一个宣言，答应召集一个代表人民的国家杜马议会，沙皇答应给人民以“自由”。

列宁对沙皇让步这个问题毫不兴奋，他说道：

“我要争取的不是自由的谎言，不是关于自由的一纸空文，而是真正的自由。我们要争取的不是贬低沙皇政权，不是要它承认人民的权利，而是消灭这个政权，因为沙皇政权是黑帮统治俄国的政权。”

列宁果然目光犀利，沙皇颁布宣言的次日，10月31日，沙皇宪兵司令特列波夫下令“不要吝惜子弹”，在圣彼得堡工艺学院，枪弹密集，成群成群的示威者倒在血泊中。同时与政府合作的黑帮分子在全国各地大肆屠杀。

布尔什维克党从秘密状态中出来了。党的报纸与宣言开始在合法的印刷所里印刷。党的会议几乎是公开地举行。列宁决定回国。1905年11月，列宁回到彼得堡立即召集了中央委员的一次全体会议。列宁说道：

“我们党活动的条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集会，结社，出版自由已经取得了。这些合法的便利必须广泛加以利用，但是要依赖这个被颁布的自由则是愚蠢罪过的。斗争还在我们面前。党的秘密机关必须保存。”

1905年12月在芬兰举行了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党宣称它拥护农民的革命手段，包括没收地主的一切财产。列宁还计划：组织一个全国性的武装起义以战胜沙皇政府。

南高加索的布尔什维克代表斯大林是这样描述列宁关于时事和土地问题演说情景的：

“这是两个使人兴奋的、使代表会议全场欢欣鼓舞的演说。非凡的说服力，简单明了的论据，简短通俗的词句，没有矫揉造作，没有专为加深听众印象的令人头晕的手势和力求效果的词句——这一切都使列宁的演说远胜于通常“议会”演说家演说。可是当时使我佩服的还不是列宁演说的这一方面。当时使我佩服的是列宁演说中那种不可战胜的逻辑力量，这种逻辑力量虽然有些枯燥，但是紧紧地抓住听众，一步一步

地感动听众，然后就把听众俘虏得一个不剩。”

当时孟什维克拒绝武装起义。他们认为不需要为起义作有组织的准备，而只有当起义自发地产生时，他们才同意承认这个起义。孟什维克首领马尔托夫说：“工人必须不是用武器而是用一种想把自己武装起来的热望武装起来。”

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则购买军火，武装工人，准备武装起义，一批最优秀的布尔什维克组织者从事这项工作。一位职业革命家写信给列宁夫妇说：“我总是在想着购买军火的事情。我们可以把去年运输军火的途径打通。但是我们到哪里去弄钱呢？那些孟什维克多么舒服呀！运输‘把自己武装起来的热望’并不使他们花费什么，但是我们的坚强的工人却并不想满足于这个……”

1906年初，沙皇接见各省地方自治区的代表和宫廷各派的代表，准备召开国家杜马。列宁鄙视地将这些代表称之为“带白手套的革命者”。除了革命，任何东西都引不起列宁兴奋。他号召布尔什维克党抵制杜马选举，拒不参加。

莫斯科的工人在1905年的革命中曾同政府军进行了5天的街垒战，最后，沙皇从彼得堡调来屠杀机器谢苗诺夫团，在炮火镇压下，起义归于失败。

列宁号召工人农民继续向沙皇制度进攻。

党继续进行购买与输入军火的工作。李维诺夫、斯托莫尼亚科夫和其他布尔什维克受列宁的嘱托，到各国去购买军火。李维诺夫装作一个厄瓜多尔的军官，购买了来福枪，在保加利亚装上快艇，假称是运给土耳其的阿尔巴尼亚人的。一场暴风雨妨碍了这次装运，但是购买军火的事并没有停止。

列宁是帝俄高等教育制度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出身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但他却没有这个阶层所固有的一些习性。他鄙视空谈和清高，嘲笑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者和沙龙式的革命家，而这样的人在19世纪的俄国就有好几千个。列宁曾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一句话加以改变引证如下：谁害怕弄脏自己的双手，就让他别去从事政治活动。换句话说，不打破鸡蛋壳，就煎不熟鸡蛋，列宁不仅想的是革命，讲的是革命，而且他还准备弄脏自己的双手，依靠工人来组织革命。民粹派崇拜农民，列宁则崇拜工人。列宁在俄国一般知识分子脑门上看到有奥勃洛莫夫习气的烙印，所以他愿意推崇群众，推崇来自土地和车间的人。俄国上层人士在生活和精神上养尊处优十分讲究，而列宁认为质朴比讲究好，体力比脑力好，组织比个人好。

1906年4月，46个布尔什维克和62个孟什维克在彼得堡召开第四次党的统一代表大会。两派在这次大会上交火，十分激烈。列宁认为革命正临近一个新的高潮，中心任务是迎接革命，工人阶级必须领导革命并引导农民跟着自己走。孟什维克则把全部希望放在杜马上，认为革命已经过去，不愿意搞什么武装起义的游击战。大会最终通过了按孟什维克主义精神表述的决议，布尔什维克占下风，但列宁一点也不灰心丧气。

这次大会再次显示出，列宁与老资格的普列汉诺夫之间不仅在革命的一切基本问题上意见不同，两个人的性格也完全不同。

列宁和工人代表们亲切地谈话，耐心地解答他们的疑问。他在大会

休会时的大部分时间就是这样度过的。代表们因此觉得列宁真正是他们自己的人，觉得他在思想上精神上是紧紧地同工人阶级连结着的。

普列汉诺夫是矜持、高傲而不易接近的。他要使他在会场上的出现好像一个主角在舞台上的出现一样。他的举动活像一个“将军”（当时人们就这样说）。他并不讲话，但他的意见就是法律。他对同他谈话的人态度高傲，神气十足，并常常对他们的话表示轻蔑。同工人谈话时他根本抓不出中心。工人代表对他很尊敬，但是他们不信任他。他不是他们自己的人。

作为一个演说家，普列汉诺夫是以才华横溢，词藻华丽而出名的，但是他的辩才却带有做作的热情与戏剧式的姿态，而缺乏内在的热情。他发言时“像一个律师”。

列宁的演说不是为了追求戏剧效果，而是要使他的听众信服，向工人们解释布尔什维克的路线。他并不追求夸张的词句或机智。他把他的演说建筑得像一座坚固的、造得很好的大厦，这座大厦的每一样东西都安放得恰当，每一样东西都很朴实并且用水泥砌得结结实实的。他的听众总为他铁一般的逻辑，他的热情与自信心，他的出色的思想所吸引。他们从开头的几句话就看出，他的演说不打算博得听众的喝采（普列汉诺夫的演说却常常是这样），而是一位战斗的领袖向广大人民群众的宣传，领导他们参加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演说。

1906年春，列宁用卡尔波夫的假名在圣彼得堡民众文化馆的一个盛大的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他的演说抓住了全体听众。工人们看到这才是他们可以放心大胆追随的真正的革命领袖。大会以后，群众高唱着革命歌曲并举着从他们衬衫上撕下来的布条所做的红旗散去。

1906年7月，在斯维阿波尔格发生了海陆军士兵的一次起义；在喀琅施塔得与勒瓦尔爆发了海军士兵的起义；在其他许多城市也都发生了罢工以及同警察的流血冲突。但沙皇终于镇压了起义。

列宁一直是用化名住在圣彼得堡的，隐蔽了一阵后终于不得不转移到芬兰去。1907年到1908年的冬天，沙皇政府开始追捕那些隐藏在芬兰的革命者，列宁被迫迁移到芬兰内地去，后来又流亡到日内瓦，这是他第二次亡命国外的艰难时期。

列宁一到日内瓦就立刻复刊党中央机关报《无产者报》。当时革命的经费来源十分复杂。在艰苦的斗争中，有时金钱起着主要的作用。列宁作为一个组织家，是知道金钱的价值的。金钱使他能够出版报纸杂志，使他能够召开各种会议和进行工作旅行，还能供给党校和党的机构活动经费，还可把自己的人派回俄国或召到国外。

党费的收入是微不足道的。各方渠道的捐助也很有限。1910年夏天，布尔什维克成功地获得了资本家施莱特的财产，用作党的经费，施莱特是俄国纺织业巨头莫罗佐夫的外甥，莫罗佐夫一贯支持布尔什维克，是一个秘密的红色大亨。由于施莱特的家具厂在1905年的莫斯科武装起义中起了作用，他被警察逮捕拷打致死（或自杀）。施莱特临死前留下遗嘱说：“把财产交给布尔什维克。”是交给布尔什维克还是交给党？如果施米特的财产继承人是党，那就应当由党把钱在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和其他派别之间进行分配。但当时领导党的名义上是孟什维克，所以布尔什维克能够得到的钱将会很少，或者一点也得不到。

由于施莱特没有留下正式遗嘱，所以他的两个姐妹就成了合法的继承人，得到了他的全部财产。这时布尔什维克采取一次大胆的冒险行动。一位布尔什维克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同施莱特的姐姐结了婚，通过婚姻获得了施莱特的部分财产。但这位布尔什维克过上富豪生活后竟拒绝向党交出这笔钱财。后来通过对他进行威胁才迫使他把一部分钱财交给了布尔什维克的金库。

施莱特的妹妹伊丽莎白当时尚未成年。布尔什维克的一个成员维克托根据上级的指示成了她的情人。布尔什维克派为自己这样一个小组织弄到了一大笔款项——28万卢布。列宁显然策划了这次行动。

为了再搞到一些钱财，另一位布尔什维克斯大林在格鲁吉亚首府梯比利斯大街上，组织人员对骑警护送的国家银行货币进行武装袭击。钱是搞到了，但其大部分都是500卢布一张的银行券，要将其兑换成现金很困难，因为这些银行券的号码外国各家银行都知道，党内各种专家献计献策，于是一部分银行券终于换成了现金。几年以后，剩下的一些500卢布的银行券都烧掉了。

1910年，一位法国血统的女革命者闯进了列宁的生活，她的名字叫伊涅萨，比列宁小5岁。伊涅萨诞生在塞纳河畔的巴黎，父亲是一位著名的法国歌剧歌唱家，母亲是法国和苏格兰混血儿，也是一位演员。父亲早逝，伊涅萨被作为音乐和法语教师的姑母带到莫斯科，在那里受教育。17岁时，她通过了家庭女教师称号的考试。18岁时她嫁给了莫斯科大工业家阿尔曼得的后裔。阿尔曼得家族和莫罗佐夫家族同属莫斯科工业家的最高阶层。伊涅萨的年轻丈夫从事慈善事业，是莫斯科省地方自治会议的议员。他创办了一所乡村学校，伊涅萨在那里任教。

1910年，伊涅萨进入巴黎的索那大学区读书，列宁在这一年认识了她。当时列宁40岁，伊涅萨35岁。伊涅萨是一位坚强、勇敢、成熟的妇女，一位无法制服的反抗者。当时她的面孔显得有点失望、悲伤和顺从的神情，但同时又流露出热情奔放、充满信心和爱好钻研的劲头，这使她本身就很迷人的样子，更加充满魅力。

列宁感觉到了这种魅力。她常到列宁在巴黎的住所去。后来一位同时代人回忆道：“一想到伊涅萨，就好像现在我看到她从伊里奇夫妇那里走出来似的。我觉得她的气质当时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好像在这个人的身上有着无穷无尽的生命力。她像是一团燃烧着的革命烈火，而她的帽子上的那些红翎毛就好像是这股火焰喷射出的火舌似的。”

伊涅萨成了列宁一家人的朋友。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在《回忆录》中不断提到她。伊涅萨在巴黎附近一所布尔什维克学校讲授政治经济学。1911年11月20日，列宁在巴黎出席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这两位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葬礼。保尔是巴黎公社社员，劳拉是卡尔·马克思的小女儿。拉法格70岁时决定，他不再能为社会带来益处，便同妻子一起自杀了。列宁称赞这一行动，他说：“如果不再能为党工作的话，就应当正视现实，像拉法格夫妇那样死去。”列宁在葬礼上致的演说词，伊涅萨把它翻译成了法语。

克鲁普斯卡娅谈到伊涅萨时充满尊重和欣赏：“伊涅萨在1912年9月被捕，她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度过了监狱生活，这严重地损害了她的健康——她有了肺结核病的症状，但她的精力并未减退。她为人开朗乐



观，热情洋溢，伊涅萨一来。生活就感到更加舒适和愉快了，我们很喜欢伊涅萨，她的谈话洋溢着一种温暖。我和伊里奇及伊涅萨时常出去散步，伊涅萨是个优秀的音乐家，而她自己能很好地演奏贝多芬的作品。伊里奇特别喜欢《悲怆奏鸣曲》，经常请她演奏。”

《列宁全集》第4版第35卷包括列宁从1912年至1915年的书信电报，其中收有列宁致伊涅萨的24封信。除了一封信之外，所有的信都写得很长，很认真，谈的都是政治问题，这样的信一定使女革命者伊涅萨感到愉快，觉得列宁给她的任务重大，列宁同她谈的思想是重要的，总之，感到列宁对她很重视。

1915年元月，伊涅萨把她想写的关于妇女权利的一本小册子初稿寄给列宁，列宁1月17日从瑞士写信给移居南斯拉夫的伊涅萨，无情地批判了她的提纲。从这封列宁给他亲爱的女友的信，也可以看出列宁对妇女的态度：

亲爱的朋友建议你最好把小册子的提纲尽量写得详细些。不然，很多地方意思不明确。

有一个意见现在就应该提出来：

建议把第三节“（妇女）要求恋爱自由”全部删掉。

这的确不是无产阶级的要求，而是资产阶级的要求。实际上，您是怎样理解这个要求的呢？这个要求可以理解成什么呢？

1. 在爱情上摆脱物质（钱财的）要求？
2. 摆脱物质上的操心？
3. 摆脱宗教偏见？
4. 摆脱父母之命？
5. 摆脱“社会”的偏见？
6. 摆脱（农民或者小市民或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小天地？
7. 摆脱法律、法院和警察的束缚？
8. 摆脱爱情上的严肃态度？
9. 摆脱生育子女的义务？
10. 通奸的自由？等等。

我列举了许多（当然不是全部）不同的理解。您所理解的当然不是第8—10点，而是第1—7点，或者类似第1—7点的东西。

但是，如果是指第1—7点，那就应当选择另一种说法，因为恋爱自由这种说法不能确切地表达这个意思。

而您这本小册子的广大读者，必然会把“恋爱自由”理解为类似第8—10点的东西，以致违背您的本意。

正因为现代社会里那些能说会道、爱吵爱闹、“高高在上的”阶级理解的“恋爱自由”是第8—10点，所以这不是无产阶级的要求，而是资产阶级的要求。

对于无产阶级说来，最重要的是第1和第2点，其次是第3—7点；其实这并不是“恋爱自由”。

问题不在于您对这种要求的主观“理解”，而在于爱情上的阶级关系的客观逻辑。

亲切握手！

弗依

1915年1月17日写于伯尔尼

伊涅萨坚持自己的观点，拒绝列宁的批评达一周之久。列宁在伯尔尼又谈到他的观点：“好吧，让我们再来谈谈。”他表述了资产阶级对恋爱自由的三种解释后，接着论述无产阶级的要求：摆脱钱财上的要求，摆脱物质上的操心，摆脱宗教偏见。

伊涅萨回信坚决认为：“甚至片刻的情欲和暧昧关系，都比夫妇间‘没有爱情的接吻’还富有诗意些，还纯洁些。”

列宁回击道：“我同意，但是您用‘片刻的’（为什么是片刻的呢？）‘情欲’（为什么不是爱情呢？）同它对比，结果从逻辑上看来，似乎是把没有爱情（片刻的）接吻同夫妇间没有爱情的接吻对比，真奇怪，把小市民——知识分子——农民的没有爱情的、卑俗的婚姻同无产阶级的有爱情的、公正的婚姻（如果您一定要加的话，还可加上一句。甚至片刻的情欲和暧昧关系，可能是低级的，也可能是高尚的）加以对比，岂不是更好吗？”

这是列宁一生中唯一一次在信中跟一位妇女谈论情欲、接吻这些问题。实际上，列宁认为根本不谈这件事会更好些。他说：“其实我根本不想进行争论。我本不想写这封信，留待以后面谈。”

一些老布尔什维克认为列宁后来未能经受起伊涅萨的死给他的打击。是伊涅萨的死加速了列宁那致命的疾病。1920年初，革命已经胜利后，列宁在克里姆林宫统治着庞大的俄国，但伊涅萨病了，列宁本人也病了。2月他写信给伊涅萨：

“请把您的情况写封短信告诉我。真是糟糕的时刻：斑疹伤寒、流行性感、西班牙流行性感、霍乱。我刚刚痊愈，还不能到室外去……您的体温有多少度？是否需要什么治疗？务请坦率地写给我。您会逐渐恢复健康的！您的列宁。”

一周后，列宁收到回信后又写信责备伊涅萨：

“发着38度（有时甚至达到39度）的高烧而到室外去，这简直是发疯！务请您不要到室外去，并以我的名义告诉您的儿女们，我请她们作到以下两点：（1）只要你的体温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和（2）只要你还没有得到医生的准许，就不得放你出去。”

同年8月，列宁为伊涅萨办理了在北高加索的疗养证。9月份，伊涅萨死在那里，因致命的伤寒。1921年，当她的遗体从高加索运回莫斯科，布尔什维克在为伊涅萨送殡时，同志们简直认不出他们的领袖来了：坚强如钢的列宁闭着眼睛走在灵柩后面，好像眼看就要倒下似的。

伊涅萨1920年9月24日逝世于北高加索，终年40岁。她被埋葬在克里姆林宫城墙内，她的墓距离列宁和苏联的朋友、曾向西方精彩的报道十月革命的美国记者约翰·里德的墓不远，与日丹诺夫、伏龙芝、斯维

德洛夫，捷尔任斯基和斯大林等人的墓比邻。伊涅萨在俄国革命和国际共运中并非重要人物，但在列宁的生活中她非常重要。后来，她的墓覆盖在列宁陵墓的阴影下，似乎列宁永远都在关注着伊涅萨。

母亲去世后，伊涅萨最小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都由列宁照管，他们常到克里姆林宫列宁的家去。1918年，共青团在莫斯科圆柱大厅召开代表会议，大家都想听列宁演说，于是派出伊涅萨的女儿去完成邀请列宁这件非常不容易的工作。列宁叫她：“小伊涅萨。”

小伊涅萨从家里用母亲和列宁的直拨电话打电话给列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们青年代表会议的代表们委托我和同志们请您……。”小伊涅萨的声音很像她母亲。列宁颇感兴趣地问：“您是谁呀？”“我是小伊涅萨。”

列宁愉快地高声说：“小伊涅萨，但又是个狡滑的伊涅萨。”列宁慈祥地同她交谈几分钟后，拒绝了共青团员们的邀请，因为他太忙了。

1910年，在长时间的间歇之后，在圣彼得堡又举行了街头示威，有一万人上街反对沙皇制度。一个新的罢工浪潮正在兴起。1911年夏天，列宁在巴黎郊外的龙寿姆成立了一个党校，培训从俄国来的工人布尔什维克，这个党校是布尔什维克党校和未来的共产主义大学的萌芽。党内其他派别也在意大利喀普里岛等地办了学校。列宁严厉地抨击开办这些学校的人，称他们为“失意的文人，不被承认的哲学家，可笑的造神派”。孟什维克的普列汉诺夫在那里主讲。

列宁的党校的训练方法跟喀普里的学校截然不同。喀普里的学校非常注重艺术史，俄国文学史，俄国的教会与国家，而列宁的巴黎党校则讲授土地问题、劳动法、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特别强调理论训练跟当前的政治事件紧密联系。列宁的目的是把学生培训成党的新一代领袖。列宁上课时严肃认真，休息时他天真愉快，亲自领导了一个歌咏队，教他们唱《国际歌》。巴黎公社的重要遗产之一《国际歌》是列宁最喜欢的革命歌曲，在1913年为纪念词作者、法国工人诗人欧仁·鲍狄埃逝世25周年的献辞中，列宁认为《国际歌》是工人阶级的世界通行证。这个说法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著名论断“工人无祖国”遥相呼应。这篇纪念《国际歌》的献辞（他曾被选入中国的中学语文课本）也可以看作是列宁一生中写过的唯一一篇出色的音乐评论：

欧仁·鲍狄埃

（为纪念他逝世二十五周年而作）

去年，1912年11月，是法国的工人诗人欧仁·鲍狄埃，即著名的无产阶级的“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的作者逝世的二十五周年。

这首歌已经被译成欧洲各种文字，甚至还不止欧洲文字。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

世界各国的工人相继歌唱自己的先进战士、无产者诗人的这首歌，就使得这首歌成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歌。

世界各国的工人现在都在纪念欧仁·鲍狄埃。他的妻子和女儿

还活着，并且都过着贫困的生活，就像“国际歌”的作者一生所过的一样。他在1816年10月4日生于巴黎。他创作的第一首歌的时候才14岁，而这首歌的名字就叫作“自由万岁！”。1848年，他作为一个街垒斗士参加了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伟大战斗。

鲍狄埃出身于贫穷的家庭，在整个一生中他一直是个穷人和无产者，他起先靠包装箱子，后来靠绘制印花图样维持生活。

从1840年起，他就用自己的战斗歌曲来反映法国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巨大事件，唤醒落后的人们的觉悟，号召工人团结一致，鞭笞法国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府。

在伟大的巴黎公社（1871年）时期，鲍狄埃被选为公社的委员。在3600张选票中，有3352票是选他的。他参加了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公社的一切活动。

公社失败后，鲍狄埃被迫逃到了英国和美国。著名的“国际歌”就是他在1871年6月，也可以说，是在5月的流血惨败之后的第二天写成的……

公社被镇压了……但是鲍狄埃的“国际歌”却把它的理想传遍了全世界，在今天这首歌比任何时候都更有活力。

1876年在放逐当中，鲍狄埃写了一首长诗“美国工人致法国工人”。在这首长诗中，他描绘了在资本主义压迫下的工人生活，描绘了他们的贫困，他们的苦役劳动，他们遭受的剥削，以及他们对于自己的事业的未来的胜利所抱的坚强信念。

公社失败以后过9年鲍狄埃才回到法国，回来后立即参加“工人党”。1884年他的第1卷诗集出版了。1887年第2卷出版了，题名为“革命歌集”。

这位工人诗人的其他一些歌，是在他死后才出版的。

1887年11月8日，巴黎的工人把欧仁·鲍狄埃的骨灰送到拉雪兹神父公墓（PereLachaise），在那里埋葬着被枪杀了的公社社员。警察为了撕毁红旗，组织了殴打。无数的人群参加了这次没有宗教仪式的葬礼。四面八方都在高呼：“鲍狄埃万岁！”

鲍狄埃是在贫困中死去的。但是，他在自己的身后留下一个非人工所能建造的真正的纪念碑。他是一位最伟大的用歌作为工具的宣传家。当他创作他的第一首歌的时候，工人中社会主义者的人数最多不过是以十来计算的。而现在知道欧仁·鲍狄埃这首具有历史意义的歌的，却是千百万无产者……

这个时期沙皇的密探马林诺夫斯基打进了巴黎的党校，他是作为一名五金工人和积极的工会工作者被从俄国招来的学员。马林诺夫斯基有一口动听的嗓音，给人一种很开朗有威信的工人的印象。他甚至骗得了列宁的信任，在党的布拉格代表会议上，被选入由7名委员组成的布尔什维克中央，获得了具有很高威望的地位。1912年，布尔什维克把他作为6名代表之一去参加国家杜马。

但他一开始作党的工作时就是沙皇保安局的一个间谍，常把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派中所发生的一切报告给秘密警察。在党内，马林诺夫斯基主张同孟什维克彻底决裂，列宁喜欢这样的思想方式，使他骗取了列宁

好感。几十个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由于马林诺夫斯基的告密而被捕。

沙皇被打倒，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打开沙皇保安机关的档案库，真相大白，马林诺夫斯基确实是警察安插在布尔什维克中央的一个待遇优厚的密探。一次，列宁困惑不解地对高尔基说：“你看，我竟没有能够把马林诺夫斯基这个坏蛋认出来。这件事真是不可理解。”

真相败露后，马林诺夫斯基完全失去常态，张惶失措地在欧洲游荡。奇怪的是，1918年他竟自愿地回到革命后的俄国，向布尔什维克投降自首，企图跪在列宁脚下，以求得到列宁的宽恕。但列宁没有见他。马林诺夫斯基被交付革命法庭审判后，被处决。

马林诺夫斯基回国自投罗网的真实心理，也许是他想到了列宁曾经对1905年“流血星期日”事件中的加邦牧师作过高度评价。加邦起初也是沙皇密探，但流血的现实使他转向革命。马林诺夫斯基也想为自己辩解：革命把他推上了转变的正确道路，他确实也曾利用自己的身份为布尔什维克作过一些成效显著的工作。他认定一向坚信革命具有所向无敌威力的列宁是会理解他宽恕他这个“双重间谍”的。

后来列宁就马林诺夫斯基问题向党内正式说道：

“最糟糕的就是1912年奸细马林诺夫斯基混进了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他断送了几十个几百个极优秀极忠实的同志，把他们送去服苦役，使其中许多人早死。他所以没有能够造成更大的祸害，是因为我们的合法工作和不合法工作配合得正确。为了取得我们的信任，马林诺夫斯基作为党中央委员和杜马代表，曾不得不帮助我们创办合法的日报，这些日报即使在沙皇制度下也能进行反对孟什维克机会主义的斗争，并且能适当地采用隐蔽的方式宣传布尔什维主义的原理。马林诺斯基一只手把几十个几百个优秀的布尔什维克活动家送去服苦役，送去死亡，另一只手又不得不通过合法报刊来帮助培养成千上万的新布尔什维克。”

1912年5月，俄国革命阶段中承先启后的革命家、大公爵赫尔岑诞生100周年，列宁在党校发表了著名的《纪念赫尔岑》，代表工人政党对赫尔岑在俄国革命史上的作用作了高度评价，以唤起广大革命力量继续沿赫尔岑开创的道路走下去，最终推翻沙皇。

“工人的政党应当纪念赫尔岑，当然不是为了讲些庸俗的颂词，而是为了阐明自己的任务，为阐明这位俄国革命的准备时期起了伟大作用的作家的真正历史地位。”

“赫尔岑是属于19世纪前半期贵族地主革命家的那一代的人物。俄国贵族中间产生了比朗和阿拉克切也夫之流，产生了无数‘酗酒的军官，暴徒，赌徒，闹集市的好汉，养猎犬的阔少，打手，刑吏，淫棍’以及想入非非的马尼洛夫之流。‘但是在他们中间’，——赫尔岑写道，——‘也出现了12月14日的人物，出现了像罗穆尔和烈姆那样由兽乳养大的一大群英雄……’这是一些从头到脚用纯钢铸成的英雄，是一些奋勇的战士，他们自觉地赴汤蹈火，力求唤醒年轻的一代走向新的生活，力求洗净在刽子手和奴才中间生长起来的子弟身上的污垢。”

“赫尔岑就是这些子弟中的一个。十二月党人的起义唤醒了他们，并且把他‘洗净’了。他在19世纪40年代农奴制的俄国，竟

能达到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的水平。他领会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他懂得辩证法“革命的代数学”。他超过黑格尔而跟着费尔巴哈走向了唯物主义。1844年写的第一封“自然研究通信”——“经验和唯心主义”，向我们表明，这位思想家甚至在今天也比无数现代经验论的自然科学家和一大群现时的哲学家、唯心主义者和半唯心主义者高出一头。赫尔岑已经走经走到辩证唯物主义者跟前，可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前面停住了。”

“赫尔岑在国外创办了自由的俄文刊物，这是他的伟大功绩。

《北极星》发扬了十二月党人的传统。《钟声》（1857-1867）极力鼓吹农民的解放。奴隶般的沉默被打破了。

但是，赫尔岑是地主贵族中的人。他在1847年离开了俄国，他没有看见革命的人民，也就不能相信革命的人民。由此就产生了他对‘上层’发出的自由主义呼吁。由此就出现了他在《钟声》上写给绞刑手皇帝亚历山大二世的无数甜言蜜语的书信，这些信现在读起来真是令人作呕。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布罗留波夫、谢尔诺·索洛维也维奇是新一代平凡知识分子革命家的代表，他们责备赫尔岑从民主主义向自由主义的这种退却，这是万分正确的。可是，平心而论，赫尔岑虽然在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动摇不定，民主主义毕竟还是在他身上占了上风。”

“当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时，卑鄙的自由主义者卡维林写道：‘逮捕并不使我感到愤慨……革命政党认为可以采取一切手段来推翻政府，政府也就采取一切手段来自卫。’赫尔岑在谈到审判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时候，正好答复了这位立宪民主党人，‘这里有一些可怜的人，草木一样的人，软体动物一样的人，却说不应当咒骂这一伙统治我们的强盗和败类。’”

“当所有俄国的自由派狐群狗党由于赫尔岑为波兰辩护而纷纷离开他时，当整个‘上流社会’弃绝了《钟声》时，赫尔岑并没有张惶失措。他仍然捍卫波兰的自由，痛斥亚历山大二世手下的镇压者、刽子手、绞刑手。赫尔岑挽救了俄国民主派的名誉。他写信给屠格涅夫说，‘我们挽救了俄国人的名誉，因此才遭到占大多数的奴才们的非难。’”

“当有消息说一个农奴打死一个侮辱他的未婚妻的地主时，赫尔岑就在《钟声》杂志上补充说：‘干得好！’听说沙皇政府准备派遣军官去进行‘和平的’‘解放’，赫尔岑写道：‘如果有一个聪明的上校带着他的队伍，不是去绞杀农民，而是去归附农民，那他就会登上罗曼诺夫皇朝的宝座。’当雷帖尔恩上校不愿做刽子手的帮凶而在华沙自杀时（1860年），赫尔岑写道：‘如果真要开枪，邻就应该对准那些命令枪杀手无寸铁的人的将军们开枪。’当别兹得纳村的50个农民被杀死，而他们的首领安东·彼得罗夫也被处以极刑的时候（1861年4月12日），赫尔岑在《钟声》杂志上写道：

‘呵，俄罗斯大地上的劳动者和受苦的人，但愿我的话能够传入你们的耳鼓！……我要教导你们鄙视彼得堡的圣教局和德意志血统的沙皇派来管你们的那些牧师……你们恨地主，恨官吏，怕他们，这完全是对的；但是你们还相信沙皇和主教……不要相信他们吧。’

沙皇是跟他们一道的，他们都是沙皇手下的人。他们现在认识他了，你们是别兹得纳村被杀少年的父兄，你们是平兹城被杀老人的子弟……你们的首领也同你们一样无知，也同你们一样贫穷……为了你们而在喀山城遇害的安东（不是安东主教，而是别兹得纳村的安东）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你们的这些圣徒的尸体不会作出 48 种奇迹，向他们祷告也不会治好牙痛；但是，你们时刻纪念着他们，这就能创造出一种奇迹——获得解放。’ ”

“ 我们纪念赫尔岑时，清楚地看到先后在俄国革命中活动的三代人物、三个阶级。起初是贵族和地主，十二月党人和赫尔岑。这些革命者的圈子是狭小的。他们同人民的距离非常远。但是，他们的事业没有落空。十二月党人唤醒了赫尔岑。赫尔岑展开了革命鼓动。

响应、扩大、巩固和加强了这种革命鼓动的，是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从车尔尼雪夫斯基到‘民意党’的英雄，战士的圈子扩大了，他们同人民的联系密切起来了。赫尔岑称他们是‘未来风暴中的年轻舵手’。但是，这还不是风暴本身。

风暴是群众自身的运动。无产阶级这个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起来领导群众了，并且第一次唤起了千百万农民进行公开的革命斗争。第一次风暴是在 1905 年。第二次风暴正在我们眼前开始增长。

无产阶级纪念赫尔岑时，以他为榜样学习了解革命理论的伟大意义；学习了解对革命的无限忠心和向人民进行的革命宣传，即使在播种与收获相隔几十年的时候也决不会白费；学习判定各阶级在俄国革命和国际革命中的作用。吸取了这些教训的无产阶级，一定会给自己开拓一条与全世界社会主义工人自由联合的道路，打死沙皇帝制这个蠹贼，而赫尔岑就是通过自由的俄罗斯言论向群众号召、举起伟大的斗争旗帜来反对这个蠹贼的第一人。 ”

1913 年 7 月，资产阶级世界在伦敦召开了“反对卖淫第五次国际代表大会。”列宁对这种大会以及各种贵族，政客和资产阶级人物在会上的表演嗤之以鼻。马克思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曾说过“资产阶级不仅以占有工人阶级的妻女为乐事，而且还以互相勾引对方的妻子作为婚姻的补偿，”列宁的愤怒与马克思的讥讽一脉相承：

“ ‘反对卖淫第五次国际代表大会’不久前在伦敦闭幕了。

好一个公爵夫人和小姐、伯爵夫人和小姐、主教、牧师、拉比、警官和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慈善家的阵容！多少次隆重的宴会和豪华的官方招待！多少次斥责卖淫的危害性和卑鄙性的庄严的演说！

大会上温文尔雅的资产阶级代表们要求采取的是什么样的斗争方法呢？主要是两种方法：宗教和警察。据说这是反对卖淫的最正确和最可靠的方法。据莱比锡《人民报》驻伦敦记者报道，有一个英国人代表夸耀说，他在国会里提议对诱淫行为采取肉刑。他是一个多么反对卖淫的‘文明的’当代英雄啊！

一位加拿大来的女士不胜狂喜地赞美了警察制度和用女警察来监视‘堕落’女人的办法；关于提高工资的问题，她指出女工是不

配获得更高工资的。

一位德国牧师攻击了现代的唯物主义，他说唯物主义在人民中间的日益传播促进了自由恋爱的流行。

当奥国代表格尔特涅尔试图提出关于卖淫的社会原因，关于工人家庭的赤贫状况、关于剥削童工、关于不堪忍受的居住条件等问题时，敌意的嘘声迫使发言人停止了发言！

但是一大批代表却讲了许多关于高贵人物的说教式的郑重其事的东西。比如，当德国皇后参观柏林的某所产院时，‘私生子的母亲就被戴上指环，以免未行过婚礼的母亲褻渎了这位高贵人物！，

由此可以判断，这个贵族资产阶级的会议充满多么丑恶的资产阶级的伪善。伪善的慈善家和嘲弄赤贫状况的警察辩护人集合起来‘反对卖淫’，而卖淫的支持者又恰恰是贵族和资产阶级……”

1914年7月28日，奥国向塞尔维亚宣战，8月1日，德国向俄国、以后又向法国宣战。8月4日，英国向德国宣战，一周以后，整个欧洲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列宁在加里西亚一个小镇听到战争的消息后，对于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所该走的道路看得很清楚：对战争与资产阶级政府不要给以任何支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奥地利当局疑心列宁是间谍，把他逮捕并监禁了11天，后经三个国家的朋友大力营救才得以释放。

这时孟什维克的普列汉诺夫像大多数孟什维克一样，已经成为一个护国论者，号召工人们在战争中拥护沙皇政府。不久以后，列宁去听了普列汉诺夫关于战争的演讲，他听完后登台猛烈抨击普列汉诺夫的立场并解释布尔什维克的立场。随后，他又在瑞士几个城市作了关于战争的演讲。中心论点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反对本国的民族主义，反对保卫祖国等口号。

1916年初，列宁开始写作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级》。他断言：“帝国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列宁这本书是判处世界资本主义以死刑的著作。

最重要的是，列宁在该书中的预言，被后来的十月革命所证实。这种预言也成了列宁学说的中心论点之一。他说：

“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起来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掀起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剥削阶级及其国家。”

## 震撼世界的十天

1917年3月，列宁流亡瑞士苏黎世，他在那里的图书馆里听到从俄国传来的第一个消息就是：沙皇被推翻了。

自2月以来，彼得格勒开始了一次大罢工，在前线和外国军队作战的士兵连吃败仗，国内怨声载道。士兵参加了起义工人的队伍，十月革



命两种最重要的基础力量的结合已经产生，还缺少革命的催化剂：列宁和他的布尔什维克职业革命家的组织工作。但沙皇政府被推翻，政权落在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手里。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同时存在的是一个新的然而还很脆弱的工人政府——工人代表苏维埃。沙皇制还没有完全被摧毁，还在试图通过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以君主立宪的形式保存帝制。

双重政权对峙，势均力敌：临时政府没有能力来解散苏维埃，苏维埃也还未强大到可以完全把政权夺过来。

列宁立刻为党报撰写了《告被俘问志书》，从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向200万在一次大战中被关在外国战俘营的俄国士兵解释国内爆发革命的事实。列宁号召他们回国站在工人阶级一边，这将是一股强大的革命力量。列宁这封信也被印成传单广为散发：

“同志们！俄国的革命已经爆发了。

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工人又一次作了伟大的解放运动的先锋。他们宣布举行政治罢工。他们举着红旗走上街头。他们像狮子一般同沙皇警察、宪兵和没有立刻转向人民的少数军队搏斗。仅仅在彼得格勒这个城市就有2000多人死亡。俄国工人用自己的鲜血换得了祖国的自由。

工人的要求是：面包、自由、和平。

工人要求面包，这是因为在俄国，也像在几乎所有参加这场掠夺性战争的国家一样，人民过着忍饥挨饿的日子。

工人要求自由，这是因为沙皇政府利用打仗的机会把整个俄国完全变成一所大监狱。

工人要求和平，这是因为俄国工人也像其他国家的觉悟比较高的工人一样，不愿继续为一小撮富豪的利益卖命，不愿继续进行这场戴王冠或不戴王冠的强盗所挑起的罪恶的战争。

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和莫斯科卫戍部队的大多数士兵都转到起义工人方面来了。穿军装的工人农民亲睦地向不穿军装的工人农民伸出手来。优秀的军官也投入了革命。甘愿与人民为敌的军官则被士兵枪毙了。

革命是工人和士兵完成的。但是政权，正如以往历次革命那样，在初期却被资产阶级夺去了。地主资本家占绝大多数的国家杜马，尽了最大努力同沙皇尼古拉二世谋求妥协。在彼得格勒街头内战正酣的最后关头，国家杜马接连不断地致电沙皇，请求他作一些小小的让步，以便保住王冠，不是国家杜马（地主和富豪的杜马），而是起义的工人和士兵推翻了沙皇。但是新的临时政府却是国家杜马任命的。

这个临时政府由自由派资本家和大地主的代表组成。担任政府要职的有：李沃夫侯爵（大地主和最稳健的自由党人）、亚·古契柯夫（斯托雷平的帮凶，曾经同意用军事法庭对付革命者、捷列申柯（最大的糖厂主，百万富翁）、米留可夫（一向维护这场沙皇尼古拉匪帮迫使我国参加的掠夺性战争）。“民主派”克伦斯基也被邀请参加新政府，这仅仅是为了造成一种“人民的”政府的假象。

新政府要继续进行强盗的战争。它是俄国、英国和法国资本家

的走狗，而这三个国家的资本家同港国资本家一样，都固执地要‘作战到底’，想分到一份理想的赃物。这个政府不想给也不可能给俄国和平。

新政府不愿意为了人民的利益剥夺地主的土地，它不愿意把战争的重担加在富豪的肩上。因此，它不会给人民面包。工人和穷人都得照旧过忍饥挨饿的日子。

新政府是资本家和地主组成的。它不愿意给俄国完全的自由。它曾经在起义的工人和士兵压力下答应召开立宪会议来解决怎样安排俄国的问题。但是它一再拖延立宪会议的选举，企图赢得时间，然后像历史上这类政府多次做过的那样，制造一个对人民的骗局。它不愿在俄国建立民主共和国。它只愿由所谓‘贤明的’沙皇米哈伊尔代替昏庸的沙皇尼古拉二世登上宝座。它希望俄国的政权由新的沙皇和资产阶级共同掌握而不是由人民自己掌握。

新政府的情况就是这样。

但是在彼得格勒，除这个政府外，还逐渐组织起了另一个政府。工人和士兵建立工兵代表苏维埃。每 1000 个工人或士兵选出一个代表。这个苏维埃现在在塔夫利达宫举行会议，出席的全权代表达 1000 多人。工兵代表苏维埃是真正代表人民的机关。

这个苏维埃在成立的初期可能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是它一定会实现它庄严地、坚决地要求的东西，即和平、面包和民主共和国。

工兵代表苏维埃要求迅速召开立宪会议，要求让士兵参加选举，参加解决或战或和的问题。苏维埃要求把沙皇和地主的土地转交给农民。苏维埃要求建立共和国，坚决反对委任一个新的‘仁慈的’沙皇。苏维埃要求男女都能享受普遍的、平等的选举权。苏维埃达到了逮捕沙皇和皇后的目的。苏维埃要设立一个监察委员会，检查新政府的每个措施，并使自己在事实上变成政府。苏维埃要求同一切国家的工人联合起来，齐心协力地打击资本家。大批的革命工人已经出发到前线去，利用自由这一权利，同士兵商量如何一致行动，如何结束战争，如何保障人民的权利，如何巩固在俄国得到的自由。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真理报”已在彼得格勒复刊，它将帮助工人完成上述各项重大的任务。

同志们，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

被俘的同志们，你们也是不可能袖手旁观的。你们应当作好准备，在不久的将来，一项重要的任务可能落到你们的肩上。

俄国的自由的敌人有时候是指望你们的，他们说：现在约有 200 万士兵关在战俘营里，只要他们回国以后能够站在沙皇这一边，我们就有可能使尼古拉或他‘心爱的’御弟重登宝座。历史上常有这样的事情：昨天的敌人同已被推翻的国王言归于好以后，就把战俘还给这个国王，帮助他打本国的人民……

同志们！你们要在一切条件允许的地方讨论我们祖国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你们要严正地声明，你们和一切优秀的俄国士兵一样不要沙皇，你们要求建立自由的共和国，要求把地主的土地无偿地交给农民，要求实行 8 小时工作制，要求迅速召开立宪会议。你们要

声明你们是站在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这一边的，声明你们回到俄国以后，决不保护沙皇，而要反对沙皇，决不保护地主和富豪，而要反对地主和富豪。

你们要在一切条件允许的地方组织起来，宣布上述的声明，并向落后的同志说明在我们的国家里发生了多么伟大的事件。

你们在战前、战时和被俘期间受尽了苦难。现在，我们正在向美好的生活前进。自由的曙光已经出现了。

你们要作为一支革命的军队、人民的军队而不是沙皇的军队回到俄国来。1905年的时候，从日本归国的战俘就成了优秀的自由战士。

你们回国以后将要分散到全国各地去。你们要把自由的消息带到每一个边远的角落去，带到每一个受尽了饥饿、凌辱和苛捐杂税的折磨的俄国农村去。你们要开导农民兄弟，这就是说你们要克服农村的愚昧落后，号召贫苦农民支援城乡工人的光荣斗争。

俄国工人在争取到共和制度以后，一定同各国工人联合起来，勇敢地领导全人类实现社会主义，实现这个不再有贫富之分、不再有少数富豪把千千万万人变成雇佣奴隶的制度。

同志们！一有可能，我们就要赶回俄国，投入我们的工人兄弟和士兵兄弟的斗争。但是我们在那里也不会忘掉你们的。我们一定从自由的俄国寄书报给你们，告诉你们国内的消息。我们要求运给你们足够数量的金钱和面包。我们还要对起义的工人和士兵说：你们是可以依靠我们被俘的兄弟们的。他们是人民的儿子，他们一定会同我们一起投入反对沙皇、争取自由、争取共和的战斗。”

历史的转机再次呼唤着流亡国外的职业革命家和演说家列。

列宁经过一番周折，带着 3000 瑞典克朗活动经费，率克鲁普斯卡娅和伊涅萨以及其他十几个布尔什维克转道瑞典回俄国。

同志们在苏黎世火车站为列宁送行。后来成为苏联教育人民委员的卢那察尔斯基回忆当时他的历史性感觉：“列宁离开时样子显得镇定、高兴，我感到他内心充满这样的想法：‘我为之而生存、我和全党为之而准备的那一事件，终于、终于到来了，没有这一事件、我们的整个生命就只能是一种准备了这一事件、但没有完成这一事件的生命。’”

列宁于 1917 年 4 月 16 日晚上 11 时 10 分回到彼得格勒，他走出芬兰车站。芬兰车站、广场和邻近的街道挤满了千千万万的工人和士兵，聚集着欢迎他们敬爱的领袖。月台上排列着一个仪仗队。工人和士兵向列宁欢呼致敬；许多人流下了眼泪。

工人们把列宁抬在肩上，从月台到站上的大休息室（以前是专供沙皇用的），他在这里第一次向彼得格勒的无产阶级致革命的敬礼。

广场和街道到处飘扬着被成百支火炬和探照灯照耀着的红旗。武装部队和喀琅施塔得海军士兵在路旁列队。铁甲车隆隆驶过。

他们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安置在铁甲车上。他在群众中间立得老高的，没有戴帽子，敞着大衣，探照灯的光对着他。他举起手，作了一个简短的演说，结尾的一句话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万岁！”铁甲车通过工人和士兵们狂热的欢迎行列，前往党中央委员会所在的地方。那

里也聚了很多人欢迎列宁。他在露台上向他们演说。他的话引起狂热的欢呼，列宁又一次处在无产阶级群众当中了。

步行了好几公里来迎接列宁的谢斯特罗列茨克工厂的工人们，谨慎地把他抬起来，一直抬到从前沙皇的候车室。那里有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代表团在等他。

尽管当时的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主要成分有些孟什维克，但他们也不得不来迎接列宁。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派出一个以苏维埃主席孟什维克齐赫泽为首的代表团。齐赫泽本蓄意说服列宁参与他们策划中的妥协联盟，因而就照这个意思组织了他们的“欢迎”辞。

“我们大家都高兴您的到来，”齐赫泽说。“在这期间，革命和工人阶级，由于采取了和平的途径并争取一切社会主义力量的联合，因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预料您不会给我们带来分歧，并将跟我们一起把我们已经安排得很好的事业继续下去。”

列宁显露出极端的厌烦和激怒，并急剧地离开了他的身旁。

他环视一下在场的人，找到了工人较多的地方，向他们笑了笑。

列宁好像不知道有这位孟什维克领导人在场一样，向工人、士兵和水兵们发表了简短的致词。

“俄国革命的气势震动了全世界，继它之后，别处也将发生革命。但二月革命并未能解决俄国无产阶级面前的根本课题。俄罗斯的工人阶级不能半途而止。与士兵群众联合之下，它将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

赤卫队员、工人、士兵和水兵们聚精会神地倾听着，这些话是他们长久以来思索着的，但从来还未曾有人这样直率地跟他们谈过。列宁继续说道：

“已经展开了殊死的斗争。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这场搏斗中，起着最卑鄙的作用的是各种各样的社会民主党叛徒们，即资产阶级的走狗们。工人阶级不能跟他们同路而行！我们决不能跟听命于资本家的政党结成‘统一战线’！”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走到正门的台阶上，又简短地讲了一次话。本想请他坐上汽车，但人们太激动了，车子休想从人群中开过去。大家都想看看列宁，听听他的讲话。于是他站在汽车头上，又发表了简短的演说，结语仍然是“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工人和陆海军士兵的行列密密层层地围住了汽车。大家想跟自己的领袖溶为一体，永不分离。这时，一辆装甲车开到车站的正门口，停在汽车旁边。工人们便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抬起来，送到装甲车上。

列宁大声地、尽力使他的嗓音响彻巨大的广场，使最远的地方也能听到他的话，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演说——进一步展开革命运动的热情的号召。在芬兰车站看到列宁站在装甲车上并听到过他的讲话的人，永远忘记不了他那特有的列宁式的手势——右臂有力地向前一伸，好像他的思想全部都蕴藏在这个手势里了……

工兵部队的探照灯，照亮了无边无际的人头、旗帜、刺刀……装甲车开动了。听见广场上人声鼎沸，更多的人走到街上来。尽管已是午夜一点多钟了，窗台上还是挤满了人。装甲车一开到人群稠密的地方，便停下来，列宁就说几句简短有力的话。

来到克舍辛斯卡娅宫了，这里是布尔什维克的司令部所在地，大家也跟着拥过来。装甲车停下以后，人们把列宁举在手上，抬进屋去。有人给他端来了茶和一些吃的东西。他匆匆地喝了杯茶，说他得去见见等候着他的人民，否则就得把他们都请进来。外面站着好几千人，屋里只容得下几百人。列宁便走上凉台，发表了简短的演说。但工人们还不肯离去，依恋地站在原处不动。于是党中央的其他同志也陆续走到凉台上，他们告诉大家列宁明天还要发表演说，而且今后他将经常跟大家在一起了。最后，直到深夜3点钟左右，工人们才走散了。

列宁立即担负起领导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重任，他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改变布尔什维克党的方针，把临时政府视为敌对。列宁所需要的不是议会制的共和国，而是“苏维埃共和国”，他的口号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即是说“打倒临时政府！”在列宁这次回国的箱子里，放着他的名著《国家与革命》的手稿。在这本书中，他早就使自己坚信：无产阶级不能利用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来完成无产阶级的任务，它必须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应当建立一个专政：就是这样一个不和任何人分享，而是直接建立在群众武装力量上的政权。无产阶级专政将帮助无产阶级去粉碎剥削者的抵抗，并引导人民大众，首先是农民，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列宁需要顽强的努力表现自信并利用其威望来迫使党的上层接受他的加速革命的纲领。而这时许多布尔维克还认为：俄国还没有成熟到可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它应当先经历一个在临时政府领导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但列宁很性急。

列宁在说服党内同志方面刚一取得进展，他立刻转向军队。向伊兹马伊洛夫团发表演说，号召立即缔结和约，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他还到米哈伊洛夫骑术学校举行的装甲营士兵大会演说，到彼得格勒苏维埃士兵代表大会上讲话。

1917年5月4日，列宁代表党的中央委员会、彼得堡委员会和《真理报》编辑部，起草了《告各交战国士兵书》，把布尔什维克的反战观点在大战各交战国士兵中传播，提出了著名的口号：“对宫殿宣战，给茅屋和平！”

“士兵弟兄们！”

我们都被可怕的战争弄得困苦不堪，战争夺去了几百万人的生命，使几百万人成了残废，带来了空前的贫困、破产和饥饿。

愈来愈多的人对自己提出问题：为什么要掀起这次战争？为什么要进行这次战争？

我们这些在战争中遭到最大苦难的工人和农民，日益清楚了解到，战争是各国资本家为了资本家的利益，为了统治世界，为了厂主和银行家的市场，为了掠夺弱小民族而掀起和进行的。他们瓜分殖民地，侵占巴尔干和土耳其的土地，而欧洲各国人民就应当破产，

我们就应当毁灭，应当看到我们的家庭破产、挨饿和灭亡。

各国资产阶级靠包工合同和军事交货，靠在被兼并的国家获得经营权，靠抬高产品价格，获得空前多的、惊人的高额利润。资产阶级使各国人民在长长的几十年内要缴纳贡税，即偿付数十亿军事借款的高额利息。而我们工人和农民，就应当死亡、破产和挨饿，忍受这一切；各国工人就应当自相残杀，彼此仇视，来巩固资本家压迫者的统治。

难道我们还要驯服地戴上枷锁，忍受资产阶级之间的战争吗？难道我们要拖延这场战争，站在本国政府、本国资产阶级、本国资本家一边使世界各国工人的国际团结遭到破坏吗？

不，士兵弟兄们，现在是我们睁开眼睛的时候了，是我们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候了。各国人民反对把他们拖入这场战争的资产阶级的怒潮，正在日益发展、扩大和增长。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战前以自由国家闻名的英国，都有千百个正直的朋友和工人阶级的代表由于说了真话，反对战争，反对资本家，而在监狱中受折磨。俄国革命只是第一次革命的第一步，随之而来的一定会有其他的革命。

推翻了像威廉二世一样的血腥的强盗尼古拉二世的俄国新政府是一个资本家的政府。它同德英等国资本家一样进行着帝国主义掠夺战争。它承认尼古拉二世同英法等国资本家缔结的掠夺性秘密条约，它不把这些条约公布出来让大家知道，正像德国政府不公布它同奥地利、保加利亚等国缔结的掠夺性秘密条约一样。

4月20日俄国临时政府公布了一份照会，再次承认过去沙皇缔结的掠夺性条约，表示决心把战争进行到完全胜利，这使得甚至一向信任并支持政府的人都极为愤慨。

但是俄国革命除建立了资本家的政府以外，还成立了代表绝大多数工农的独立的革命组织，即彼得格勒和大多数俄国城市的工兵代表苏维埃。目前俄国多数的士兵和一部分工人，还同德国的许多工人和士兵一样，对资本家政府，对他们发表的关于不割地的和平、关于防卫战等等骗人的空洞言论，抱着不自觉的轻信态度。

但是工人和贫苦农民跟资本家不同，他们既不愿意兼并，也不愿意保护资本家的利润。因此，资本家政府的所作所为，无论在俄国或在德国，天天都会揭穿资本家的欺骗，表明只要资本家的统治继续存在，就不会有真正民主的非强制的和平，就不会真正放弃一切兼并，使一切殖民地、一切被强迫合并的或没有充分权利的被压迫民族得到解放，战争就一定会日益剧烈和拖延下去。

只有敌对双方（如俄国和德国）的国家政权，完完全全转到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事实上能够破坏资本的一切联系和利益的革命工兵代表苏维埃手中，交战国双方的工人才会彼此信任，并在真正民主的、真正解放世界一切民族的基础上结束战争。

士兵弟兄们！

我们要尽一切力量来加速达到这个目的。不要害怕牺牲，为了工人革命付出的任何牺牲，都比战争的牺牲轻些。革命的每一个胜利将把几十万几百万人从死亡、破产和饥饿中拯救出来。

对宫殿宣战，给茅屋和平！给全世界工人以和平！全世界革命工人的兄弟团结万岁！社会主义万岁！”

列宁善于抓住任何场合发表演说。一次在一个剧院，聚满士兵和工人，一个演说者正在台上大骂布尔什维克：“你们，布尔什维克先生们到这里来进行宣传鼓动！你们自己却不到前线去捍卫俄国的利益，我们祖国的利益！”

士兵们一片掌声。突然从观众席发出一个声音：“那我们到底要为什么去作战呢？是为了夺取达达尼尔海峡吗？还是为了让国内外资产阶级用我们士兵的鲜血去牟取暴利呢？”

所有的人一齐回头望着说话的人。这就是列宁。他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向讲坛，脱下大衣，摘下鸭舌帽，开始演说，没人阻碍他：

“谁需要达达尼尔海峡？——是工人还是资产阶级？土地属于谁——是属于用血汗灌溉它的农民？还是属于榨尽农民脂膏的地主？工厂属于谁？银行和全部国家属于谁？一是属于俄国工人呢？还是属于俄国和国外的资产阶级。”

士兵和工人齐声鼓掌，欢迎列宁。

遵照列宁的指示，布尔什维克每天在工人集会上，在兵营和工人的住区里演说。党的主要活动就在工人阶级的住区里进行。列宁有好几次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

直到今天，列宁格勒工人还记得列宁这些演说所造成的那种极为深刻的印象。

普梯洛夫工厂的一个工人追忆道：

“突然，从人丛中，从4万人的群众中，他登上了讲台……我简直找不出什么字眼可以表达出他那种伟大的气概，他用来抓住听众的那种奇特力量……他讲的话抓住了他们的心，用热情使他们振奋起来。恐惧和倦怠消失了。看起来，好像并不只是伊里奇一个人在演说，而是全场4万工人，坐着的、站着的，都在倾吐他们内心深处的想法。就好像工人所感到的一事一物，伊里奇都正在替他们传达似的。每个人所想到的、体验到的，但没有适当的词句或机会来向他的同志清楚而充分说明的一切——这一切突然都被伊里奇的演说表达出来了。

看起来好像群众都想放开喉咙大声疾呼些什么似的……就在4月21日这天，涅夫斯基区的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就这样大声喊出来了：‘打倒10个资本家的部长！打倒米留可夫，古契柯夫和他们对达达尼尔的要求！’”

在这期间，列宁还在一个海军码头召开的大会上对士兵、水手、工人作过演说。到会的一个人这样写道：“他的发言团结了人民并把道路指给他们，告诉他们每个工人应该做什么，应该怎样去做。”

“当他讲完时，我们许多人的眼睛都含着泪了……3000个未来的战士被列宁在大会上的发言武装起来了。列宁的思想点燃了所有那些工人、水手和士兵们的心……我们每个人都为列宁的热忱所激动而洋溢着想立即投入战斗的情绪。”

6月4日（俄历5月22日），列宁在全俄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

并对《土地问题的决议草案》发表讲话：

“全部土地必须成为全体人民的财产。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主张立即把地主的土地无偿地交给当地农民，但我们决不赞成把这些土地夺过来变成私有财产，决不赞成分这些土地。我们认为，必须根据当地多数农民代表的决定，由当地农民共同耕种土地。”

最后他说：“如果有人认为，人民生活中的这种伟大改革能够一蹴而就，那就大错特错了。不，这要求付出极大的劳动，要求每个农民和工人，在当地，在他所擅长的工作中，在他几十年所从事的生产中，振作起来，下定决心，付出力量。这种事情不能按照什么命令来完成，但它是必须完成的，因为这次掠夺战争已经把全人类带到毁灭的边缘，千百万人已经在这次可怕的战争中牺牲了。要使人不再遭到牺牲，我们必须拿出一切力量，工农代表苏维埃的一切组织必须采取共同的坚决的行动，来实行没有资本家和地主参加的共耕制，只有走这条道路，才能使劳动者真正得到土地。”

对于这个可纪念的夜晚，到会的一位代表曾经作了下面的描述：

“外面正在下雨。伊里奇穿着淋湿了的外套和鞋子从屋外进来，悄悄地在巨大的塔夫利达宫的一个角落里坐下。没有人注意到他进来。当一个讲演者发言结束时，我们宣布道：‘列宁在这里。假如代表们请他讲话，他就会讲的。’我们的敌人企图从中阻挠，但是农民齐声喊道：‘我们要列宁讲话，我们要列宁讲话！’大家就请伊里奇讲话。伊里奇登上讲台开始说话了。他开始清楚而扼要地向农民们解释革命的任务。”

他号召即刻夺取土地。他讲到雇农和贫农成立独立组织的必要。他指出在大地产上建立示范国营农场的必要。

农民代表们不顾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反对，注意倾听布尔什维克领袖的演说。

6月，全俄工人、士兵、农民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举行会议。布尔什维克只占少数。列宁在会议上作了两个报告。他严厉地批评帮助资产阶级的妥协派和护国主义者。他抨击护国主义者（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拖延掠夺战争，给帝国主义者以直接帮助。当孟什维克的部长策烈铁里说到俄国没有一个党准备夺取全部政权的时候，列宁就打断他的话说：“我说有！没有一个政党能拒绝这样做，我们党也不拒绝；它准备在任何时候来夺取全部政权。”布尔什维克为这些话鼓掌。他们的反对者在一旁讥笑。

7月1日，一个机枪营的几个代表来到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的所在地（那时那里正举行一个城市代表会议），通知说他们已经派代表到所有各部队去号召起义。布尔什维克认为起义的时机还没有成熟，表示不赞成。

当天晚上，有两营士兵举着“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标语，到布尔什维克的彼得格勒委员会所在地的克舍辛斯卡娅宫前游行。他们后面跟着工人的代表。



7月16—17日（俄历3—4日），全城举行示威游行，有50多万工人和士兵参加。海军队伍也从喀琅施塔得开来。在涅夫斯基大街和萨多瓦亚街转角的地方，军官的队伍向游行队伍开枪。示威游行蜂拥到塔夫达宫，要求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接管政权。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把持下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拒绝了这要求。

7月19日（俄历6日），临时政府颁布了通缉和审讯列宁和其他布尔什维克的命令。克舍辛斯卡娅宫被特地从前线调回的军队强占了。许多工人被捕。

为了把列宁送到芬兰避难，列宁被安排在一个火车头上扮作一个司炉。列宁卷起袖子，把木头一块又一块地送进火炉。在边境的白岛车站，列车停20分钟，听候严密检查证件。司机雅拉瓦为了避免检查，等车子一停，就把车头从列车甩开，开到旁边的轨道上，装做去加水的样子。检查证件时，车头停在旁道上；直到第三遍铃快要响时，它才开过来，挂上车身，立刻就开走了。几分钟后，列宁已经进入芬兰，克伦斯基政府的警察对他已无可奈何了。

列宁当时在芬兰。他没办法直接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为了不使他被发现，很少有同志去看他。于是他不得不用文章、信札、短筒来传达他的指示。

列宁写给党的中央委员会的信一封比一封紧急，他的全部意思可归纳成一句话：赶快起义，夺取政权。

1917年10月1日，列宁信中断言：“拖延等于犯罪。”

“亲爱的同志们，事变这样明确地规定了我们的任务，拖延简直等于犯罪。

农民运动正在增长。政府正在加紧野蛮的镇压，军队对我们的同情日益增长（莫斯科有99%的士兵投票拥护我们，芬兰的陆军和海军反对政府，杜巴索证明前线总的情况是这样）。

德国的革命显然已经开始了，特别在枪杀水兵以后。莫斯科选举的结果，布尔什维克得到47%的选票，这是一个巨大的胜利。我们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一起在全国显然拥有了多数。

铁路邮电员工已经同政府发生冲突。李伯尔唐恩之流把10月20日的代表大会，改说成某月20日的代表大会，如此等等。

在这样的情况下‘等待’就是犯罪。

布尔什维克没有权利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他们应当立刻夺取政权。只有这样，才能挽救世界革命（因为不这样，各国帝国主义者就有勾结起来的危险，他们在德国大屠杀以后，将会狼狈为奸，联合起来反对我们），才能挽救俄国革命（不然真正无政府状态的浪潮将会比我们更强大），才能挽救战争中几十万人的生命。

“拖延就是犯罪。”

20几天后，10月24日，列宁在信中大声疾呼“拖延等于死亡”：

“同志们！

我写这几行字是在24日晚上，情况已经万分危急。非常清楚，现在拖延起义真的就等于死亡。

我尽力向同志们说明，现在正是千钧一发的关头，目前提上日程的问题决不是会议或代表大会（即使是苏维埃代表大会）所能解决的，而只有人民，只有群众，只有武装起来的群众的斗争才能解决。

科尔尼洛夫分子展开的资产阶级进攻，维尔霍夫斯基的离职，都说明等待是不行了。无论如何必须在今晚逮捕政府人员，解除士官生的武装（如果他们抵抗，就消灭他们），等等。

不能等待了！！等待会丧失一切！！

立刻夺取政权的好处就是：能保护人民（不是代表大会，而是人民，首先是军队和农民）免遭科尔尼洛夫政府，即赶走维尔霍夫斯基、策划第二次科尔尼洛夫叛乱的政府的蹂躏。

谁应当取得政权呢？

目前这并不重要，让军事革命委员会‘或其他机关’取得政权吧，只要它声明，只把政权交给真正代表人民利益、军队利益（立即提出和约）、农民利益（立刻夺取土地、废除私有制）和饥民利益的人。

必须立刻把各区、各团以及其他一切力量动员起来，立即派遣代表团到军事革命委员会，到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去，坚决要求：无论如何不能让克伦斯基及其同党把持政权到 25 日，一定要在今晚解决问题。

历史不会饶恕那些拖延时刻的革命者，他们本来在今天可以获得胜利（而且一定能在今天胜利），却要拖到明天去，冒着丧失许多、丧失一切的危险。

我们今天夺取政权不是要反对苏维埃，而是为了把政权交给苏维埃。

夺取政权是起义的任务，起义的政治目的只有在夺取政权之后才能弄清楚。

等待 10 月 25 日不一定举行的表决，就是拘泥于形式，就是自取灭亡；人民有权利，也有义务不用表决，而用强力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人民有权利，也有义务指导自己的代表，甚至自己最优秀的代表，而不是等待他们。

这是各次革命的历史所证明了的，如果革命者知道挽救革命、提出和约、挽救彼得堡、摆脱饥饿、把土地交给农民·等事业都取决于自己，可是放过了时机，那就是犯了滔天的大罪。

政府正在动摇。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彻底击溃它！

拖延发动就等于死亡。”

在他给党组织的下一封信里，列宁根据马克思论起义的著作，阐明了起义艺术的原则。

列宁把起义的规则应用于俄国的局势。他主张三支主力——工人、海军和陆军——配合起来，首先占领电报局、电话局、火车站和桥梁。那些最坚决的分子（突击队员、青年工人和优秀水兵）也应当分成小部队，去占领最重要的据点。最优秀的队伍必须派遣去占领敌人中枢机关，“宁可全体牺牲，决不放过敌人。”这句话是他们的口号。

列宁这样结束了他的信：“俄国革命和全世界革命的成败，都取决于这两三天的斗争”。

10月23日（俄历10日）那天，在长时期的不得已的缺席之后，列宁回到彼得堡出席了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他的到会引起全场的欢跃，大家都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围着他，欢呼着迎接他。他的胡须还是修光了的，并且还戴着假发，所以很难看出他是列宁。

列宁作了一个关于武装起义的演说，指出目下作技术上的准备是必要的。中央委员会赞成列宁。只有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起义。中央委员会通过决议，指出武装起义已经提上日程，并主张一切组织的实际活动，必须服从这一口号。

11月6日（俄历10月24日）列宁决定迁往斯莫尔尼宫。这里过去是贵族女子学院，现在是彼得格勒工兵苏维埃所在地，革命军事委员会也设在这里。列宁化了装到达斯莫尔尼宫。

这座巍然矗立的拱形大厦的长廊里轰轰烈烈地响着脚步声。到处都是灰色的军大衣、赤卫队员们的黑色上衣和短袄、水兵们挂满手榴弹和子弹带的深色呢子外衣，到处都是携枪带械的人。这就是斯莫尔尼宫当时的景象。

斯莫尔尼宫的入口处，两旁的高柱中间，放着两门速射炮，炮车中间和两翼架着机关枪。

这天晚上，根据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和列宁的指示，由武装的工人和士兵组成的赤卫队早晨2点钟占领了火车站、电报局和发电站。3点钟第一辆满载波罗的海红水兵的军用列车奉革命军事委员会之命风驰电掣驶往彼得格勒；3点30分“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也奉命在尼古拉耶夫桥边抛锚。6点钟，赤卫队占领了国家银行和中央电话局，冬宫和临时政府军区司令部的电话线立即被掐断。

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早晨，列宁写了革命历史的第一篇宣言《告俄国公民书》，以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布。

“俄国公民们：

临时政府已被推翻。国家政权已转到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机关，即领导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和卫戍部队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手中。

立即提出民主的和约，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工人监督生产，成立苏维埃政府，所有这一切人民为之奋斗的事业都已有了保证。

工人、士兵、农民的革命万岁！”

当天下午，列宁在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上发表演说。他受到了暴风雨般的欢呼。那时城里战斗还正在进行。临时政府所在地的冬宫还没有被攻下，但城里的主要战略据点已经在无产阶级手里。列宁在一个简短而激动人心的演说中说：革命已经完成了，这个革命将建立苏维埃政府，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他说，“从此开始了俄国历史的新时代。”

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彼得格勒举行。布尔什维克已经占了大多数。会议产生了列

宁起草的《告工人、士兵、农民书》：

“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了。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有绝大多数的苏维埃的代表，还有很多农民苏维埃的代表。妥协派所把持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权力就此结束了。根据绝大多数工人、士兵和农民的意志，依靠彼得格勒工人和卫戍部队所举行的胜利起义，代表大会已经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临时政府已经被推翻。临时政府的大多数人员已经被逮捕苏维埃政权将保证把地主、皇室和寺院的土地无偿地交给农民委员会处理。苏维埃政权将立即向各国人民提出民主的和约，立即在一切战线上停战。将使军队彻底民主化，以维护士兵的权力；将建立工人监督生产的制度；将保证按时召开立宪会议；将关心城市的粮食和农村的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将保证俄国境内各民族都享有真正的自决权。

代表大会决定：各地全部政权一律转归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各地苏维埃应负责保证真正的革命秩序。

代表大会号召前线士兵提高警惕，坚持到底。苏维埃代表大会深信，在新政府向各国人民直接提出的民主和约尚未缔结以前，革命军队定能捍卫革命，使其不受帝国主义的任何侵犯。新政府将采取一切措施，实行向有产阶级惩罚和课税的果断政策，以保证革命军队的一切必需品，并改善士兵家属的生活。

克伦斯基和卡列金等科尔尼洛夫分子企图调军队到彼得格勒来。有几支被克伦斯基用欺骗手段调动的部队已经站到起义的人民这一边来了。

士兵啊，积极反抗科尔尼洛夫分子克伦斯基！提高警惕！

铁路员工们，使克伦斯基派到彼得格勒来的所有兵车都停下来！

士兵们、工人们、职员们，革命的命运和民主和平的命运完全握在你们手里！

革命万岁

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  
农民苏维埃代表”

这天夜里，炮轰冬宫。

革命的大本营斯莫尔尼宫里，赤卫队员们的高帮皮鞋踏在昔日贵族小姐们轻歌曼舞的镶木地板上，发出咯咯咯的声音。

一楼和二楼拨给了维堡区、彼得格勒区和第二市区的队伍。他们拖来了机关枪。人们抬起装步枪和子弹的大木箱在楼梯上走着。“马克沁”重机枪的铁轮子敲击在梯阶上发出辘辘的声响。

到处都站着很长的行列：这是各厂的工人在领取枪支。掌握在忠实于布尔什维克的装甲营士兵手中的六辆装甲车开进大门，摆开了战斗阵形。

受命保卫革命司令部——斯莫尔尼宫——的赤卫队营走过去了。赤

卫队员、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和立陶宛团的士兵布好了外哨，设好了机枪巢，在房前圆柱中间放好了轻炮之后，便分头进入苏维埃所在的大厦。在这里的还有被调来跟革命军事委员会保持及时联系的各大工厂和各部队的代表。他们的人数也不少，约有 800 人……

从喀琅施塔得和赫尔森福斯调来了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停泊在彼得格勒附近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和“自由曙光”号巡洋舰也进入了战斗准备。一度守卫过冬宫的“阿芙乐尔”号上的水兵分配了特殊的任务，因为他们非常熟悉冬宫的所有出入口。决定让比较有经验的鼓动员乔装成看守员和职员潜入冬宫的地下室，向冬宫的卫队进行策反工作，说服他们放弃毫无意义的抵抗。这些坚定的革命者分成若干小组，通过医务所潜入冬宫里的所谓“1812 年画廊”，另一部分人沿河滨路经儿童入口处潜入冬宫。鼓动员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他们在冬宫的守卫者中间所进行的瓦解工作，大大削弱了冬宫的防卫力量。

午后 3 时，设在彼得堡罗要塞的总指挥部完成了战斗准备。炮口对准了冬宫。炮弹已经准备齐全。现在，冬宫的形势和命运完全决定于我们了。士兵们时刻在等待着决定性的命令，只是由于“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在等待喀琅施塔得的水兵的到来而耽搁了时间。

士兵们急于闯入冬宫，逮捕临时政府人员。由于这种强烈的愿望迟迟不能得到满足，士兵们感到非常懊恼。赤卫队员们的耐心比较大些。他们专注地守着哨岗，沿着封锁线满怀信心、精神抖擞地移动着并非常警觉地执行着巡逻任务。他们的巡逻哨认真仔细地监视着反革命分子的动态。

封锁线愈来愈逼近冬宫广场，队伍也愈来愈密集了。晚 6 时，冬宫已被一层层的士兵锁链缠绕起来了。士兵和水兵们愈来愈逼近冬宫，把预备队留在身后。他们不断地跑步跃进，依次占领了进击冬宫的出击点——海军部沿河街、皇宫沿河街、海岸街、涅瓦大街、骑兵近卫军林荫路的两个街角和掩蔽物。这些被层层包围圈所联系着的进击队伍，像圆周的无数条半径一般，从冬宫花园的铁栅栏、从紧接海岸街出口到冬宫广场的胜利门、从爱尔米塔什博物馆前的排水渠、从亚力山大花园的前门、从海军部大楼和涅瓦大街的拐角处，从四面八方迫近了冬宫。

晚 21 点，炮声响了，“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发出三发信号弹，赤卫队向冬宫扑去，机枪和步枪响成一片。

忽然，头顶上掠过一阵沉浊的隆隆声。这是彼得堡罗要塞向冬宫发射的 6 吋口径的重炮弹。这给冬宫的阵营造成极大的慌乱。射击停止了，机枪和步枪沉默下来了，大炮也不作声了。一种难以置信的寂静来临了。突然，这寂静被撕裂成碎块：整个广场上四面八方响起了雷鸣般的胜利的“乌拉”声。

水兵、赤卫队员和士兵们趁着敌人的慌乱，冲向前去。

这是革命的时刻，它严峻、血腥，但却美丽而难忘。在夜幕的笼罩下，趁着枪炮闪电般的纷乱的火光，赤卫队、水兵和士兵们像可怕的幽灵一样，从邻近冬宫的道路屋角窜跃出来。他们绊倒了又爬起，一秒钟也不中断地、急速地、暴风雨般地扑向冬宫。

武器的铿锵声，“马克沁”重机枪拖在马路上的辘辘声，成千上万沉重的士兵马靴的铁掌踏在地上的达达声，以及装甲车的喘息声，所有

这一切在皇宫广场上混成一片难以言喻的刺耳的嘈音。

机枪和步枪又冷酷无情地达达地响起来了。这枪声同其他一些既不能表达又不易了解的声音交错在一起。但雷鸣般的“乌拉”声却压倒了这片声响向冬宫扫去……刹那间，这胜利的欢呼声已在街垒的那一边响起来了！

午夜两点一刻，战斗结束，革命士兵占领了临时政府的最后堡垒：冬宫。十月革命胜利结束。

“阿芙乐尔”炮声一响，斯莫尔尼宫的“工人伊万洛夫”立刻卸下假发、洗去油彩，又变成了列宁，成为政府首脑。在这革命胜利的第一个夜晚，整整一夜列宁和托洛茨基都是躺在斯莫尔尼宫的地板上。列宁的样子有点疲惫。拿下冬宫后，天色已近早晨，列宁微笑着对托洛茨基说：“从地下状态和动荡不安到掌握政权，这个转变太突然啦，头晕脑胀。”说着他用手在头边作了个旋转动作。

4天以后，1917年11月12日，职业革命家，流亡者和秘密工作者弗拉基米尔·列宁以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身份向全国广播：

“全体公民：

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已组成了新的苏维埃政府。克伦斯基政府已经被推翻，人员已经被逮捕。克伦斯基逃跑了。所有机关已经掌握在苏维埃政府手里。在10月25日提出保证后获释的士官生，在10月29日举行了暴动。暴动当天就被镇压下去了。克伦斯基和萨文柯夫率领士官生和一部分哥萨克用欺骗的方法钻进了皇村。苏维埃政府已经动员一切力量来击溃科尔尼洛夫对彼得格勒的新的进攻。一支以“共和国”号战斗舰为首的舰队已奉命开往首都。克伦斯基的士官生和哥萨克动摇了。被俘的克伦斯基人员对我们肯定地说，哥萨克受骗了，他们要是了解真相，决不会开枪的。苏维埃政府尽量设法防止流血。如果流血无法避免，如果克伦斯基的部队仍旧开枪，苏维埃政府将不惜采取无情的措施来粉碎克伦斯基和科尔尼洛夫的新的进攻。

我们通知你们，苏维埃代表大会已经闭幕，它通过了两项重要的法令：（1）立即把所有地主土地交给农民委员会掌握；（2）提出民主和约。

苏维埃政府主席

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列宁）

## 演说家与女刺客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经历了巩固政权，赢得内战和实行新经济政策的辉煌胜利。在这些过程中，列宁仍然以其简朴有力的演说激励着革命后更为广大的听众：作为国家主体的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和红军士兵们。

列宁1918年8月30日在前米赫里逊工厂群众大会上演说之后，被35岁的右派女社会革命党人范妮·卡普兰枪击，连中两弹，一颗子弹打

伤左肩，另一颗穿过左肺上部，自左往右穿颈而过，陷在右胸锁骨的关节附近。由于大量溢血流往左胸膜腔，致使列宁的心脏向右偏离了很远。

列宁的演说就这样和他的被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一个伟大的演说家和职业革命家一走下对产业工人演说的讲台，就倒在刺杀的血泊之中，但他又挺过来了，这就是不屈的列宁。

凶手卡普兰被全俄肃反委员会判处死刑。列宁说：“处死卡普兰是中央委员会决定的。”他不想多谈这个问题。

直到1923年3月9日，他的脑溢血第三次发作。这时的列宁右边手脚完全瘫痪，得了失语症。终生雄辩滔滔的列宁这时的全部词汇只有几个词：“劳合一乔治（英国首相）”，“代表会议”，“不可能”。

他那为全人类工人阶级勤奋思索的大脑脑血管硬化得极为严重，已经钙化了。他逝世后专家们在解剖时，用金属镊子敲击这些血管就像石头似的。

1924年1月21日晚6点钟，列宁体温急剧升高，全身肌肉剧烈痉挛，失去知觉。6点30分，列宁与世长辞。

列宁逝世后，他所缔造的苏联在他不太信任的斯大林统率下，打赢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直到1991年，一个叫戈尔巴乔夫的总书记宣布苏联解体。

列宁逝世次日，他在流放年代的《火星报》时期和十月革命时期的并肩战友、职业革命家和演说家托洛茨基在斯大林的故乡格鲁吉亚梯弗利斯火车站听到噩耗后对群众发表的悼念演说，道尽了党和人民的哀思：

“列宁不在了。再也没有列宁了。控制血管工作的黑暗法则夺走了他的生命，医学已不再能实现千百万人从内心里对它所寄予的热切希望和要求了。

他们当中该有多少人愿意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最后一滴血，只要能使伟大的领袖列宁——伊里奇这个唯一的不可重复的人的血管重新工作起来！但是这样的奇迹并未能实现，科学表明自己是无能为力的。就这样，列宁不在了。这句话犹如一颗巨大的山岩坠入大海，猛烈地撞击着人们的意识。这可信吗？难道会这样吗？

全世界劳动人民的意识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因为敌人还很强大，道路还很漫长，伟大的事业，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业还没有结束；因为世界工人阶级需要列宁，也许在人类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为人们所需要。

疾病的第二次发作延续了10个多月，比第一次更加严重。据医生们痛苦的说法，血管总是在‘胡闹’。这对于伊里奇的生命是一种可怕的胡闹。也许有希望好转，几乎完全复原，也许随之而来的将是一场惨祸。我们大家都期待着康复，然而迎来的却是渗祸。大脑呼吸中枢不再工作了——天才的思想中枢窒息了。

就这样，伊里奇不在了。党成了孤儿。工人阶级成了孤儿。导师和领袖去世的噩耗首先引起的正是这样的感情。

我们如何前进？我们找得到路吗？不会迷失方向吗？同志们，因为列宁再也不和我们在一起了！

列宁不在了，但列宁主义还在。列宁不朽的业绩——他的学说，他的工作，他的方法，他的榜样——活在我们之中，活在他创建的党内，活在他领导和指引过的第一个工人国家里。

我们心中现在所以充满着无限的悲痛，是因为我们大家由于历史的巨大恩赐而成为列宁的同时代人，我们同他一起工作，接受他的教导。我们的党是行动中的列宁主义，我们的党是劳动人民的集体领袖。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带有列宁的一部分——这是我们每个人身上最优秀的一部分。

我们如何前进？——我们手中有列宁主义明灯。能找到路吗？——靠党的集体思想、集体意志我们会找到的！

即使明天、后天、一星期之后，一个月之后我们还会自问，难道列宁真的不在了吗？因为他的死还将长期地使人感受到大自然的那不可思议的、冷酷可怕的专横。

现在和将来，我们每逢想到列宁不在时，心中都会感到像针扎一样的刺痛，它将提示、警告、号召我们每一个人：你的责任加重了！要无愧于曾经教育过你的领袖。

我们将在悲伤、哀思、痛苦之中把我们的队伍和人心团结起来，为了新的战斗，更紧密地把它们团结起来。

同志们，兄弟们，列宁离开了我们。别了，伊里奇！别了，领袖！……”

1935年，莫斯科广播电台问它的外国听众，在他们看来，谁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全世界成千上万的来信都举出了列宁的名字。

这里是他们的一些答复：

“列宁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因为他为了工人群众的解放而斗争。他从不犹豫退缩而是把他的意见与理论坚持到底，直到他完成了人类过去从未完成过的最伟大的工作。”（从英国来的答复）

“是列宁，因为他实践了马克思的理论。他是共产党的组织者与领袖。他给全世界的工人农民指出了一条从资本主义制度下解放出来的道路。他给全世界无产者一个祖国，而不论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都要保卫这个祖国，这是我们的责任。”（从瑞典来的答复）

“是列宁。他在7年当中比全世界所有的伟大在2000年中做了更多的有益工作。比较一下并作出判断吧。一切光荣归于列宁！”

在百年之内，在地球将没有一个城市或乡村会没有他的一座雄伟的塑像。而无论何处，凡是有荣誉的地方，这地方将属于列宁。”（从比利时来的答复）

“是列宁。因为他在历史上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记。工人阶级将永远把他看作是自己的领袖与解放者而爱戴他。资产阶级则同样程度地憎恨他。”（从西班牙来的答复）

同年，列宁遗孀克鲁普斯卡娅回答了苏联医学科学院脑科研究所对列宁大脑研究调查表的详细提问。她的提问构成了一幅非常细腻的关于列宁的工笔肖像画：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身体并不瘦弱，但也不算上特别强壮。未从事过体力劳动。除非是星期六义务劳动。我还记得当我们住在流放地时，



他曾修理过栅栏。散步时不会一下子就感到劳累。性子是好动的。比较喜欢走动。在家里常常在房间里快步从一个角落走向另一个角落，有时蹑着脚“从一个角落走向另一个角落”。边走边思考问题。为什么蹑着脚走路？我想，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不打扰别人，在侨居国外时也不例外。那时我们常常租一个房间住，蹑着脚走路也是为了不打扰房东。但这只是部分的原因。蹑着脚不出声地快步行走，大概可以使注意力更加集中。

从不喜欢躺着。

动作不拘谨。动作并不柔和，但也不显得生硬、呆板。

步速很快。走路时人不摇晃，两手也不明显地摆动。

举止不笨拙，而是灵活的。

在行动中没有手忙脚乱的现象。

站立时足底平实。

不做体操。会玩击木游戏。会游泳。溜冰溜得很好。喜欢骑自行车。流放时，曾在河上沿着河岸溜冰。他生活过的伏尔加河流域那个地方不产蘑菇。我到流放地他那儿以后，我们常到森林里去采蘑菇。他的眼睛很好，当他迅速地学会寻找蘑菇以后，就兴致勃勃地寻找起蘑菇来。对采摘蘑菇兴致很浓。喜欢带着猎枪去打猎。总的说来十分喜欢到森林里去。

如果不把用“化学方法”写信计算在内，那末他就没有从事过任何一种技艺或手艺。

穿衣服和脱衣服都很快。患病期间他总是努力按程序完成那一套治疗项目，为的是迅速把一切做完。

惯用的手势和习惯动作是把右手向前伸或向右伸。不久前我看到一幅画像，画着伊里奇（演说时）用右手打手势的姿态；前臂向前，但后臂却贴着身体。这是不正确的，他不是这样打手势的。正确的应该是：手向前，伸直或者稍稍弯曲成弧形，而手总是离开身体的。

从来不用拳头敲桌子或伸手指威吓别人。

不装模作样，不做新奇、古怪、戏剧性的和有意卖弄的动作。

表情和手势总是富于感情的，患病期间表现得更为活跃。时常面露笑容，笑得真实动人，不是狡诈的笑，也不是“彬彬有礼”的笑。

嘿，他多么善于爽朗地大笑啊！笑得淌下眼泪。笑得前俯后仰。

微笑也好，出声地笑也好，都不是那种所谓的彬彬有礼的笑，笑得毫不勉强。笑起来总是极为自然的。

嗓音响亮，但不高声大叫，不是胸音。他是男中音。会唱歌。能唱的歌曲有：《我们结婚不在教堂》、《我爱你们，热烈地爱你们》、《我在悲惨的奴隶生活中受折磨》、《华沙革命歌》、《工人们，起来吧，行动起来吧》、《同志们，勇敢地齐步前进》、《五月快活的日子来到了》、《疯狂吧，暴君们》、《你们侵占了亚尔萨斯和洛林》和《十七团的士兵们，向你们致敬》、《国际歌》。

语速很快。速记员往往记不下来。不过，也许不是由于讲得快，或者不只是由于讲得快，而是：（1）那时我们的速记员水平差；（2）他说的句子结构比较难。

在《左翼艺术战线》杂志的文集里载有一篇文章，作者在分析伊里

奇的言语的结构时，得出结论说，他的言语（句子）结构是拉丁语式的。

有一次伊里奇对我说过，某个时候他曾专心学习过拉丁语。

讲话的声音富于表达力，无单调乏味。他在别人发言时所作的简短插话，尤其铿锵有力，至今还萦绕在我的耳际。

言谈朴实，不以奇巧取胜，不装腔作势，没有一点“天生的矫揉造作”，具有法国话的那种“和谐”（比如，就像卢那察尔斯基说话那样），没有英国话的那种枯燥、呆板和单调，而俄国话则处在两个极端之间。伊里奇说的正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典型的俄国话。他说话充满激情，但不装腔作势，不矫揉造作，而自然地充满激情。语调抑扬顿挫，不单调，不千篇一律。

从容不迫，而又流利畅达，能自由地、毫不困难地选择词和句子。诚然，他对演说总是精心地加以准备的，但准备的时候，他考虑的不是句子而是发言提纲，斟酌内容，琢磨意思。

不论发表演说还是说话，总是热情洋溢的。在准备演说的时候，他往往十分激动，不时在房间里踱步；如在准备写文章的时候，就小声把它念出来，散步的时候，他时常默不作声地、聚精会神地走着。这时我也不说话，止他专心思考。然后他就详细地叙述起来，这中间极不愿意别人用问题打断他说话。在争论或辩论后回家的时候，他常常显得忧郁，不受说话，心绪不宁。我从来不去打听，因为过后他总是不用问就会主动讲给我听的。

在散步的时候，常常有这种情形：突然冒出一句话来。这说明，他一边在散步，一边在全神贯注地、紧张地想着、思考着问题。

‘登上风景如画的山顶，可是想的根本不是山，而是孟什维克’

患病初期，这一点也确实使人伤脑筋。那时医生禁止看书和做任何工作。我觉得这是徒然的。伊里奇常对我说：‘他们（我自己也一样）可不能禁止我思考啊。’

他向来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渴望发表意见和了解情况。

想不起单词、句子或短语的情况是从来没有的，也没有在与人交谈时听不懂对方说话内容或意思的情况。恰恰相反，能异常迅速地听懂对方所说的内容和意思。他做笔记时常常只写一个词或一个句子。

在家里时，如果有某个问题使他焦灼不安的话，他总是小声说话。

他是一个生气勃勃、坚韧不拔和富有自制力的人。是个乐观主义者。

在监狱中，他表现得坚强不屈，开朗乐观。在他患病期间，有一次我对他说（当时有一位女护士在场）：你瞧，你的说话能力正在恢复，只是慢一些，要把这场病看作暂时蹲监狱一样。这位女护士说：‘嗨！这怎么是监狱呢，娜捷施达·康斯坦丁夫娜，您在说什么呀？’

伊里奇理解了，听了这番话之后，他明显地更加克制自己了。

喜欢低声唱歌和用口哨吹曲子。

书写速度非常快，时常省略或简写一些词。爱动笔头，写得既多又快。作报告前总要写发言要点和提纲。在报告会上记录报告人和发言人的观点和用语。在这些记录中总是概括了全部主要内容，从不遗漏什么。

如果写的东西（如在写信时）使他特别感兴趣和特别激动，字迹就格外工整。

写的书信逻辑严密，前后连贯。常常省略字母（多数是元音字母）

和音节，以便加快写信速度。

手稿总是写得整齐清楚，涂改的地方极少。

口语与笔语相比，不难分出优劣。据我看，两者的造诣都极深。出口成章，下笔成文。

统计表、数字、摘录都写得非常工整，而且特别用心，堪称“书法楷模”。总是兴趣盎然地作摘录，记数字，标出曲线，绘制图表，但从来不画造型性的图表（如图画）。

广泛使用统计表，总是亲自动手，画得十分精确。

从来没有画过什么图画。

阅读速度很快。爱默读。我读他听或者他读我听这种情况，我们是从来没有的，因为这会大大减慢阅读的速度。

看书时联想到什么问题，有时也小声说话。

远视能力很强，在这方面，他常同妈妈（我的）比赛。

他的目测力良好——射击很准，击木游戏也玩得不错。

对各种颜色和色彩都能很好地、正确地加以辨别。

视觉记忆极好。能清楚地记住各种人的面貌、书的第几页第几行。能牢固而长久地记住看到过的东西及其细节。

热爱大自然。喜欢山、森林和夕阳的余辉。十分赞赏并喜爱配搭得当的色调。对自己的衣着很少注意。我想，对戴什么颜色的领带他是无所谓，甚至还把领带看作一种方便的必需品呢。

两耳的听力都很好。能清晰地听见小声说话的声音。在陌生的地方能正确地辨认方向，也能根据听觉正确地判断距离方向。

能牢牢记住并清楚地回忆听到过的事情。能正确地、流畅地并自信地进行转述。我认为，他的记忆和听觉记忆大致是同样发达的。

在准备演说或平时写作看书时喜欢标出着重点，写批语、作摘录和提要。这些方法是经常大量采用的。这些批语、摘录和提要都写得简短、精采。不过在看书的时候只就书中内容小声说话。有时也小声念自己的文章。一个人听另一个人朗读这种情况，我们是从来没有的。

非常喜欢听别人讲话。听的时候很专心、认真而且饶有兴味。有一批工人在他病后探望了他，并写了一篇回忆文章，他们写道，伊里奇同他们谈了话，实际上他仅仅听着。

非常喜欢听音乐。但听的时候容易感到疲倦。听时表情严肃。非常喜欢瓦格纳的作品。照例在第一个节目演完之后便离场，仿佛得了病似的。

一般地说，不喜欢听到噪音（我说的不是行人众多的街道、人群或大城市的噪音）。我说的是在住宅里不喜欢听到噪音。

有音乐才能。音乐记忆力良好。能牢牢记住，但并不很快就能记住。最喜欢小提琴。喜欢立式钢琴。绝对辨音力？不知道。关于和声也不知道。节律？乐谱？对这些能否识别？不得而知。

拿歌剧与芭蕾相比，对前者更为爱好。

喜欢《悲枪》和《热情》奏鸣曲。

喜欢《斗牛士之歌》。在巴黎时乐意去听音乐会。但在我们的生活中这种机会极少，非常喜欢戏剧——戏剧总是使他留下强烈的印象。

在瑞士时我同他去看《活尸》的演出。

不怕高山峻岭，在山上喜欢‘沿着边缘的地方’行走。喜欢快步行走。

在有人说话的情况下，他不能（也不喜欢）写作，需要极端的安静。

给什么就吃什么，对吃是相当随便的。有一段时间我们每天吃马肉，他和英诺森吃得津津有味。

在青年时期和身陷囹圄的时候得过胃炎和肠炎。后来家里自己开伙，使这个病得到好转，他常常问：‘我可以吃这个吗？’爱吃辣椒和芥末，不能吃草荡（因有特异反应）。

很高兴喝酸牛奶。味觉和嗅觉显得较弱。各种气味自然能辨别，但对一般的气味或某些特殊的气味均无爱好。

讨厌在房间里插上花圃里采来的花。但喜欢在室内放上野外采摘来的花草。十分喜欢春天的各种气息。对花圃的花朵，特别对香味浓郁的花朵是避而远之的。

记得我曾碰上他做过这样一件事：1922年时，他曾把温水灌进插有一束花蕾盛发的枝条的罐子里（事情发生在春天）。

是个乐观主义者。在西伯利亚和在法国的时候，一般说来要急躁得多。患有严重的失眠症。早晨情绪总不大好，因为很晚才入睡，而且睡得很差。在瑞士时，由于生活比较安定，失眠的情况好多了，而在法国时我们的生活则完全相反。谈话常常谈得很迟，争论有时持续到深夜（在西伯利亚和在国外时）。在西伯利亚特别急躁并且容易激动。人也瘦了。

未得过忧郁症，对人也不是冷漠无情的。情绪变化一般都是由明显的原因引起的，而且因果是相符的。国外的无谓纠纷，同普列汉诺夫和前进派的论争与争吵，曾使他极为焦虑不安。

总的说来是非常富于感情的。一切感受都会在感情上表露出来。

最为常见的表情是注意力高度集中。

性格开朗，爱开玩笑。

情绪并不是变化无常的。总之，情绪的变化都是事出有因的。

极能克制自己。

说话时，如果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而不必受到拘束的话，就常常尖锐地提出问题，并加以发挥，‘不顾情面’。

在同由他培养起来的人谈话时，语气是十分委婉的。

易动感情，反应往往十分强烈。

在布鲁塞尔，有一次同普列汉诺夫发生争论之后，尽管一再劝他出去散散步，‘去看看教堂’，但他却立即坐下来，针对普列汉诺夫恶毒的评论写了辛辣的批评意见。

演说时充满激情，即使表面上看来讲得平心静气，也会使人感觉到这种激情。

每次发言前都十分激动：全神贯注，不多说话，避开其他话题，根据脸部表情可以看出，他正在激动地思考问题。事前一定写发言提纲。

力求深入地、以研究的态度对待各种问题，这一点是表现得很突出的。

例如在舒沙，一个农民跟伊里奇谈了两小时话，说他同家里人吵架，因为他们没有请他出席婚礼的宴会。伊里奇认真地询问了情况，以求了解农民的生活与习俗。

一直同生活保持着一定的有机联系。

注意力极为集中。

能作自我批评，严格要求自己。但对那种冥思苦想和极其折磨人的自我反省，他是从心里感到痛恨的。

在非常激动的时候，往往拿起词典（如马卡罗夫词典），一读就是几个小时。

是一个富有战斗精神的人。

曾对阿多拉茨基详细地谈过，社会主义革命将是怎样的一场革命。

打猎时热情奔放——曾向野鸭子匍匐着靠拢。从不为冒险而冒险。往往第一个跳到水中去。不胆怯，不畏缩。

大胆而且勇敢。”

## 周恩来

“我们的决心就是齐心协力向觉悟道上走……”

“他脸容瘦削，颇带憔悴，但神采奕奕，双目炯炯，他的目光既坚毅又安详，既谨慎又满怀信心。他身穿一套剪裁精致的灰色毛式服装，显得简单朴素，却甚为优美。他举止娴雅庄重，他使举座注目的不是魁伟的身躯，而是他那外弛内张的神情、钢铁般的自制力、就像是一根绞紧了弹簧一样……他听英语时，不必等到翻译，脸上神情就显得已明白语意，或立即露出微笑，他警觉性极高，令人一见就感觉得到，显然，半个世纪来烈火般激烈斗争的锻炼，已将那极度重要的沉着品格烙印在他身上……”

这是基辛格第一次来华秘密访问时见到自己令人敬畏的谈判对手时的第一印象。

然而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周恩来是永远使人爱戴和怀念的。他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人民公仆，是日理万机、永不知疲倦的好总理；是幽默机智，风度翩翩的政治家，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谋略家；是感情专一，富有爱心的东方美男子，是慈祥温和、平易近人的父亲。他高尚的品格让人爱戴，他丰富的智慧让人民由衷钦佩。

他的谈吐言词至今仍回荡在爱他的人们的口中，关于他的演说谈吐艺术的轶闻趣事已成为传奇，流传在中国大地的千家万户，大街小巷，在成长的过程中，许多人都聆听过父母讲述的有关“周总理巧答记者”的故事。

有一次，他在京举行记者招待会，介绍我国的经济建设成就及对外方针。一西方记者提问道：“请问，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资金。”此问一则讥笑我国贫穷，二则刁难一下，看看总理是否对此心中有数。周恩来风趣地回答：“中国人民银行的资金嘛，有18元8角8分。”一时间，全场愕然，不解其意。然后他才细细解释：“中国人民银行发行面额为10元、5元、2元、1元、5角、2角、1角、5分、2分、1分的十种主辅币，合计为18元8角8分。”如此机智地回答，激起全场热烈的掌声。

另一次又有一西方记者提问：“请问总理先生，中国可有妓女？”对这一不怀好意的问话，周总理略为思索一下答道：“有。”顿时全场哗然，他紧接着又答：“在中国台湾省。”这一回答滴水不漏，全场响起一阵掌声。

此类故事还有很多，我们大部分都耳熟能详。它们的流传也反映了中国人为自己如此优秀而充满智慧的领导人感到骄傲。

外国人也同样敬佩周恩来。对他们来说周恩来的举止态度、言谈思想仿佛散发出一种特殊的魅力，一种极强的亲和力，使人不由自主地接受他。

斯诺1936年首次见到周恩来，就发现与他所想象的“赤色分子”形象完全不同的情况。“我暗自想，周恩来一定是个狂热分子，因此我想寻找这必有的神色。但是如果说有这种神色的话，我却没有发觉出来。他谈吐缓慢安详，深思熟虑。”

“因此，周恩来给我的印象是，他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他态度温和地说出来的话，同国民党宣传9年来诬蔑共产党

人是什么“无知土匪”，“强盗”和其它爱用的骂人的话，形成了奇特的对照。”

美国《时代》杂志记者白修德于1939年4月在重庆结识了周恩来。他回忆道：“他风度迷人，待人真挚，人们敬仰他，他也信任他们。无可否认，他确实使我五体投地。”

约翰·S·谢伟思是二战中美国驻华官员，曾参加“美国军事观察组”来到延安。他和周恩来有过许多交往。他谈到周恩来的演说才能时曾回忆道：“当然，他试图使我们赞同他对中国和世界的看法。他这样做靠的是冷静的说理、清晰的措词、温和的谈话、广博的历史知识和世界知识以及对事实和细节的惊人的了解。人们会被说服或受到教育，但不会被压眼，也不会因持不同意见而受到责怪。”

尼克松也对周恩来的谈判技巧、口才、风度深有感触。

“基辛格曾经对我说过，周恩来的谈判技巧会使我感到吃惊。他说对了。”

“在我们所有的会谈中，周恩来总是镇定自若，与赫鲁晓夫的滑稽和勃列日涅夫的矫揉造作恰成鲜明的对比。他从来不提高讲话的调门，不敲桌子，也不以中止谈判相威胁来迫使对方让步。”

的确，周恩来的口才、智慧、风度是蜚声海内外的。他具备一个伟大演说家所必须的一切素质、如缜密的逻辑、良好的口才，机敏的应变，严肃中的幽默，极富说服力和感染力的语言，以及非凡的个人风度等。同时，中国传统的浸润，使他的言词不温不火，锋芒内敛，刚中有柔，柔中有刚，避免了很多演说者常易堕入的过分煽动，好走极端的误区。

周恩来的演说天才最集中体现在谈判桌上，在外交舞台上。在谈判中，天生的灵活性，对国际权力斗争原则的熟悉和热切坚定的思想信仰这些品格集于周恩来之一身。此外，他对外国情况也十分了解，具有高瞻远瞩的历史洞察力和极其丰富的经验。所有这些，使他成为当代最卓越的外交家，当然，也是卓越的演说家。

## 书生意气、少年英雄

周恩来1898年3月5日生于江苏省淮安。父母为他起名叫“大鸾”。在我国的民间传说中“鸾”是与“凤凰”齐名的一种神鸟，此名寄托了父母盼他日后出人头地，展翅高飞的希望。“大鸾”后来的学名改为周恩来，字翔宇。其中包含的意义也相同。

周恩来“5岁从母教”。其生母万氏、嗣母陈氏、乳母蒋氏，以不同的身份、修养和性格滋润他健康成长。万氏与陈氏皆名门闺秀，周恩来回忆时曾说：“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他身上承继过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

周恩来6岁入家塾，8岁开始读小说。第一部读的是《西游记》，后来又读了《镜花缘》《水浒传》和《红楼梦》等。

然而没落的封建家庭，生活日益艰难。周恩来10岁就“佐理家务”。生活对思想是有很大影响的，正如周恩来后来自己所说：“我开始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乌托邦的，不过因为我自小吃过苦，懂得生活之艰难，所

以很短时间内即转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了。”

1910年5月，12岁的周恩来来到奉天北部的铁岭县城，寄居伯父家中，并进入银冈书院读书。此后在东北生活了三年。他著名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名句，便是在这段时间说的。当时他在沈阳的东关模范学校上小学。

周恩来生长在一个矛盾的家族中。一方面，这个官宦家族处于败落之中，经济捉襟见肘，生活江河日下，世态炎凉之苦味是颇可领略的；另一方面，这个诗书门第的家族，风雨同舟，相濡以沫，父辈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充满家族的温情。他的童年生活虽然艰辛，但他的家庭给予他的更多的是爱而不是恨。幼小的周恩来与家族众多成员的那种融洽的、充满人情味的人际关系，是他一生中富于人道主义思想感情的开端。而后的东北三年，他目睹山河破碎，国之不国，使他情绪昂扬，思想激越，加强了他思想中的战斗风格。东北三年培养了他风格中刚强反抗的一面。

1913年秋天，周恩来考入天津南开学校。在南开中学的四年，正是中国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的时期。新旧文化的撞击与汇流形成众多的思想旋涡，推动人们去思索，去寻求答案。南开中学当时是一座最开放的资产阶级学校，中西文化可以自由地进入校园。这样的历史背景和生活环境，为周恩来大量吞纳古今中外的知识，探索比较各种思想提供了理想的条件。他熟读《史记》、《饮冰室文集》、《天演论》。此时的周恩来开始出类拔萃，显示出横溢的才华。

1914年，他联络部分同学，创办了一个：“探求真理”的“敬业乐群会”，并起草了章程，规定其宗旨为“以智育为主体，而归宿于道德，联同学之感情，补教科所不及”。团体成立之后，创办了会刊《敬业》，周恩来担任主编。他以“飞飞”为笔名写了许多诗文。《敬业》创刊号上，刊载了周恩来写的创刊诗。“吾辈生于二十世纪竞争之时代，生于积弱不振之中国，生于外侮日逼、自顾不暇之危急时间，安忍坐视而不一救耶！”

此时的周恩来已开始进行大量的社会活动，组织与行动能力令人瞩目。他在校刊《校风》任编辑代表，同时承担各类繁琐的事务工作，并且为其撰稿。1916年在《校风》上发表的《中国现时之危机》一文，已可见少年周恩来强烈的为国为民的责任感、使命感。

周恩来还在“敬业乐群会”中组织同学们走出校门，开展演讲等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据《第十次毕业同学录》介绍“周君恩来，善演说，能文章，工行书。”他的演说天赋初露端倪。1916年，周恩来在全校演说大会上，发表了一篇有名的讲演，表明了他对当时政治现实的见解和国家命运的关怀，痛斥各地军阀武人干政、卖国求荣、教育停顿、经济凋敝，使民众陷于水火。他指出这一切都是由于“政治不良”，提出“新旧不并立，冰炭不同炉”解决的办法是“使帝制罪魁尽诛，全党悉斥，国务院无盘踞之人”。

他的演说激动人心，富于感染力，曾帮助南开学校连续两年夺得天津市中学校际讲演比赛头名。

然而他的才华并不仅限于此。他是南开学校师生合办的新剧团的重要成员。他积极参加编写和演出了不少话剧，如《一念差》、《新少年》、



《醒》等剧。当时南开学校只有男生，没有女生，常常由周恩来反串一些剧中的女主角。这些话剧针对当时的社会问题，或者抨击封建道学，或者揭露社会黑暗，提倡科学与民主，号召人们走向进步与光明。

1917年6月26日，周恩来以极佳的成绩毕业，获国文最佳奖，并代表毕业同学致答词，感谢学校和老师的栽培，决心不负众望，继续努力。

在南开的四年，周恩来培养了自己的组织、演说和文字方面的才能，显示了在这些领域的极高的天资。其演说生涯应该是由此发轫的。

1917年，周恩来留学日本，适逢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传来，紧接着就有段祺瑞北洋政府与日本秘密签定《中日共同防御军事协定》的卖国消息。留日的中国学生义愤填膺，怒不可遏。周恩来积极参加各种示威抗议活动，在大小集会上发表爱国讲演。此后的日本也局势动荡，1918年发生了大规模的“抢米风潮”。周恩来敏锐地观察着这一现象，领悟着群众运动的威力。

看来日本也不是寻找救国真理的地方，周恩来毅然弃学回国。1919年4月30日，《南开校风》123期报道：“毕业同学周恩来君，前由日本回国。”

时势造英雄，命运把周恩来推到历史的前排。当时，正值震动全国的“五·四”运动爆发，各地的抗议、请愿、罢工风起云涌，周恩来出任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他在创刊号上以《革心·革新》为题发表社论，为天津的学生运动提出了纲领性的口号。

当时的天津有两个学生组织“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周恩来组织将其合并，并成立了核心秘密团体“觉悟社”。在成立会议上，周恩来首先演说：

“我们今天到会的人，都是受了二十世纪新思潮的启发，觉悟到中国社会要从根本上解决……为达到这个目的，我们要结成团体，出版刊物，以求改造学生的思想，进而唤起劳动民众的觉悟，来共求社会的改造……我们的决心就是齐心努力向‘觉悟’道上走，同时也盼望社会上所有人都向‘觉悟’道上走。”

演讲慷慨激昂并且主题明确，层次分明，展示了很高的演说技巧。

“觉悟社”很快成为领导天津青年学生运动的核心，也是中国最早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之一。

1920年，北洋政府加紧镇压活动。1月29日，周恩来组织学生请愿活动，作为请愿代表被捕。两个月过去了，既不审讯，又不释放，周恩来和被捕代表宣布绝食。迫于压力，当局在将近半年之后，不得不开庭审讯被押学生。法庭成了周恩来施展演说才能的大好天地。

“学生们出于纯真的爱国之心，抵制日货，维护民族利益，究竟犯了什么罪？”

“学生们到省署请愿，推举我们当代表、求见省长，这又犯了哪一条王法？”

“当局派军警用刀枪棍棒打散请愿学生，造成流血惨案，是哪条法律有此种规定？”

“既不审讯，又不释放，无理拘留各界请愿代表半年之久，又有何法律依据？”

周恩来讲条理清晰、论据有力，逐条驳斥所谓的“罪名”，弄得法官招架不住，而旁听席上传来阵阵掌声。

最后，审判长理屈气虚，含糊其辞地宣布的“判决书”，以羁押期抵刑期，将周恩来和请愿代表释放。

怀着到巴黎公社的故乡法国去寻找真理的梦想，1920年底，周恩来前往法国勤工俭学。在旅欧期间，除了半工半读，他主要靠给国内报刊写稿维持生活，他对欧洲各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形势进行了细致观察，写了大量政论和通讯。此举磨炼了他的政治敏锐性和分析推理能力，为其日后的漫长政治生涯打下了基础。

在法国，他同样以组织示威运动和反抗活动而著称。首先是为反对北洋军阀秘密对法借款而组织的拒款活动。接着又参加了“誓死争回里大”的“入学运动”。当时，为了报复勤工俭学学生的“拒款活动”的胜利，华法教育会在法国里昂为中国留学生办的中法里昂大学突然拒绝中国留学生入学，而由校长吴稚晖从国内招了一批官僚富豪子弟作为里昂大学的学生。此举激起勤工俭学学生的强烈反抗。于是发生了“争回里大”的斗争。但斗争失败，104名勤工俭学学生被强行押解回国。在这两次斗争之中，周恩来都表现了不屈的斗争精神和卓越的组织领导才能。成为一致公认的很重要的人物，他的演说在这两次运动中又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欧洲，通过对十月革命的研究，周恩来确立了共产主义世界观，开始和赵世炎等一起筹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2年，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六月，在巴黎召开大会成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讨论组织章程时，周恩来提议新团员入团应当宣誓。有的代表反对，说这是宗教的色彩。周恩来以惯有的明晰和说服力解释说：“我们宣誓不是宗教信仰，而是带有政治约束力。比如，袁世凯曾经宣誓忠于民国，但他以后做了皇帝，人民就说他叛誓而讨伐他。”

会议决定周恩来任宣传委员，负责内部刊物《少年》。之后“少共”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周恩来担负了领导工作，为党培养了大批干部。

1924年，国内革命形势大变，孙中山组织国民党，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周恩来奉党中央之命回国，开始在中国革命的舞台上大展其才。

1924年11月，周恩来作为共产党的代表，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当时的周恩来才26岁，即当此要职，不能不令人侧目。这项任命是对他宣传，演说，组织才干的充分肯定。政治部作为建立一支新式革命军队的关键举措，其宣传思想教育方面的功能是巨大的。周恩来以其出色的演讲才能胜任了这一工作。他在对军校师生的讲演中指出：要使军队成为被压迫阶级可用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的工具，就必须在进行军事教育的同时，进行政治教育，讲清中国如何受列强军阀压迫，以及解除压迫与痛苦的途径，“使每个军官每个兵士均能了解此理”，明白“军士之打仗是为人民打的”。

周恩来的演讲深入浅出，条理清楚，具有其一贯的逻辑性与质朴近人的特征，深受军校师生和广大官兵的欢迎。凡有他的讲演，报告厅都坐得满满的。

两次东征中，周恩来总结自己政治工作的新经验，组织宣传队发动群众，他自己也不断发表演说，鼓舞军民斗志，其宣传工作相当成功。北伐前，周恩来亲临先锋部队叶挺独立团，号召大家奋勇向前，共同“饮马长江”，其潇洒豪情溢于言表。

青少年时代的周恩来，英姿英发，无所畏惧，充满了共产主义者的昂扬斗志。其演说激昂慷慨，青春的激情和壮志展现得淋漓尽致，在语言的力量和感染力上达到了高峰。理想主义的精神是其主要基调。然而革命的道路是艰难的，现实的巨大考验使周恩来发展了自己才能中灵活、机变、策略的一面。

### 谈判、谈判、我已经谈老了。

1936年，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三支红军到达陕北，胜利会师。但当时的形势也并不乐观。日本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三省之后，正积极准备大举侵华，其亡我之心已是路人皆知。而蒋介石正大打内战，准备将红军困逼在陕北，一举歼灭，实现他“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一面心系抗日，顾虑我中华民族的安危，一面却要对付蒋介石的“围剿”，避免被蒋吃掉，内忧外患，处境不可谓不艰难。

根据正确的形势分析，中共中央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当时从东北退入关内，驻扎西安的张学良，身负国仇家恨，其抗日的态度非常明显，是第一个争取的目标。

1936年4月上旬，周恩来冒着生命危险，前往东北军控制下的延安，与张学良进行秘密会谈。

会谈气氛十分坦率。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讯问张学良对国家前途的看法。张学良认为有共产党的道路和法西斯的道路可走，但国民党已没什么希望。周恩来见张学良如此坦率，也就很直率地讲了自己的看法：中国要抗日，必须实行民主，发动全民抗战，而实行个人独裁的法西斯式统治，是不可能实行抗战的。张学良表示同意周恩来的看法。双方谈到了蒋介石，认为蒋介石有抗日的可能，但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是错误的。最后周恩来表示接受张学良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的主张，但要回去让中央考虑。

双方谈得十分投机，达成了一些协议。后来在周恩来给张学良的信中曾写道：“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可略见当时会谈的气氛。

这次会谈，对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具有决定意义，对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也有极为重要的收获。这次谈判，也可算周恩来漫长谈判历程的开端。1946年，周恩来说：“差不多10年了，我一直为团结商谈奔走渝延之间。谈判耗去了我现在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了。”

政治谈判是周恩来政治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也是一种特殊的演说。在谈判斗争中，周恩来表现出超人的智慧，他那机敏的语言，严密的思维，灵活的策略，坚定的原则，以及善于求同存异的斗争艺术，就

连美国国务卿、五星上将马歇尔也不得不惊叹：“周恩来是我从未遇到过的对手。”

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周恩来是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的主要代表，参加了谈判的全过程。从筹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张学良、杨虎城谈判，到西安事变同蒋介石、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谈判，以后又有1937年2月—8月，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的五次谈判，和抗战开始后在南京、武汉、重庆的多次谈判，抗战胜利后，又有双十协定、政协和停战谈判，建国前夕还有一次同南京政府的和平谈判。周恩来极其丰富的谈判经验由此可见一斑。

周恩来谈判，有其非常独到的特点。对情势的敏锐和精湛的分析，能抓住有利时机，应时而动，此其一也。

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确定的我党方针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民族全中国的一切革命力量去反蒋、反日。但与张学良的谈判中，双方共同认为蒋有抗日的可能，并且蒋掌握着中国大部分资源和人力，应该联蒋抗日或逼蒋抗日。根据与张学良谈判的情况，在1936年的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根据形势的需要，提出放弃抗日须反蒋的口号，得到会议的同意。经过会议讨论，党在苏维埃、红军、土地政策等方面皆有重要变动。这都为以后的国共谈判做了重要准备。

西安事变的发生，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好机会。周恩来洞若观火，首先是反对杀蒋，然后通过谈判说服他停止内战。蒋在“兵谏”之下勉强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周恩来敏锐地认识到，基于蒋的为人和一贯态度，其话不可全信。当张学良亲送蒋回南京，周恩来疾赴机场，可惜没有追上，叹息不已地说：

“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中毒了，他不但摆队送天霸，还要负荆请罪啊。”

张学良一到南京即被软禁。尔后的形势更加复杂，一方面是蒋的背信弃义，一方面是东北军的群情激愤，力求一战，甚至发展成内哄。如此复杂、混乱的局面简直是看起来不可收拾的，然而周恩来以其过人的才能和胆识，力挽狂澜，先是说服东北军的主战派，然后义正辞严地呼吁蒋介石信守诺言，劝诫他不可失信于天下人，从而保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谈判需要知己知彼，周恩来对谈判对手有深刻的了解。他尊重对手，谈判时坦诚相见，不卑不亢。周恩来在国共谈判中的对手有蒋介石、张群、张治中、张冲、宋子文、王士杰等。周恩来对他们的思想、立场、政治主张、行动策略，以至性格作风都有精深的分析。特别对于其主要谈判对手蒋介石，周恩来的分析最为透辟。

周恩来熟悉谈判的问题，除了基本的不可动摇的原则，其它的具体解决方法，可以主动让步，积极寻找共同点。在此同时始终抓住谈判的主动权。特别重要的是，周恩来始终把谈判桌上的斗争同谈判会场外面的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及时将谈判内容向外界公布，让群众自己来判明是非，结果是越谈判朋友越多，拥护共产党政策的人越多。

谈判的同时，周恩来经常利用在国统区的公开合法身份，开展宣传工作、广交朋友、发表演说，鼓励抗日。当时的陕北根据地被国民党封锁，周恩来维持着延安同外界的联络。他和各种各样支持抗日的人打交

道，国民党人士，民主人士，文艺界，爱国华侨，美国政府的官员，各国记者，赢得了大家的好感，为争取共产党八路军的合法地位做了大量工作。驻中国的盟军指挥史迪威将军便从不满意国民党的腐败堕落而同情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

周恩来亲自领导主持《新华日报》，作为党在国统区的宣传喉舌。在武汉会战时，周恩来足迹遍及武汉，对广大群众、文化界、艺术界、妇女界、青年界不知疲倦的发表讲演。在鲁迅逝世两周年的纪念会上，他发表了非常精彩的演说，将鲁迅精神和抗战精神结合起来。

“我只能如古诗所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似的来怀念鲁迅先生。”

“想到去年纪念鲁迅先生，正是上海抗战危急，而今年纪念鲁迅先生，又是武汉危急的时候，所以使我们更易想到劲草忠臣的鲁迅先生。”

“到今天，抗战已经一年有余，更走到一个艰苦困难的阶段，纪念鲁迅先生，更应该学习这种倔强奋斗至死不屈的鲁迅，不退让，不妥协。”

全篇演说，首尾贯通，气势非凡，从文艺到做人的品格到斗争的精神以至必胜的信念，很是鼓舞人心。

周恩来亲切地会见青年学生，面对学生们对自己读书、学习在目前形势下是否对抗日有用的困惑时，周恩来以其特有的语重心长，亲切诚恳劝导他们：

“同学们，学知识，学本领，这是永远都有用的，任何时候都会有用的。”

“一旦赶走侵略者，我们还要重新建设国家。不管文、史、政、法，还是理、工、医、农，所有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是有用的。”

周恩来目光深邃，想得很远。

武汉失守之后，1938年11月12日，发生了著名的长沙大火。在事先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蒋介石突然下令火烧长沙，以实行其“焦土抗战”的政策，烧死烧毁大量的居民和房屋。面对这种倒行逆施，草菅人命的做法，周恩来自然非常愤慨。他发表激烈的长篇讲话，驳斥这次被说成是什么中外战史上常见的“坚壁清野”的长沙大火。

以惯有的逻辑和条理性，周恩来首先澄清了“坚壁清野”的正确含义。应该极端关心群众的生命和利益，尽量使他们少受损失。取得他们的支持，心甘情愿的牺牲个人的利益，成全国家民族的利益。

“现在放火烧长沙，事先不动员，不通知老百姓，深更半夜突然全城放火，烧死多少居民，焚毁多少公私财产，侥幸逃出火海的人，深冬腊月，也将冻死饿死。这种便宜了敌人，难住了自己的做法，绝不是什么‘坚壁清野’的做法。”

最后，周恩来从反面论证，痛斥了这种令亲者痛，仇者快的荒谬做法。

“武汉沦陷前，汪精卫、陈公博之流就散布抗战必败论，说什么：再抗战下去，全国就要变成一片焦土了。火烧长沙，还说是什  
么‘坚壁清野’，岂非正中了汪精卫之流反对抗日、主张投降的毒  
计么？除了汉奸、日寇欢迎，还有谁高兴呢？”

周恩来的充满激情的长篇演说，有理、有利、有节，听者无不为之动容。

蒋介石自知理亏，最后不得不找了个台阶下来，接受周恩来提出的善后办法。周恩来的演说又一次发挥了强大威力。

1938年，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日本攻占武汉广州之后，无力继续发动强大攻势，抗战进入相持阶段。

周恩来负责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坚持党在国统区的联络、宣传、统战工作。

1940年9月30日，周恩来应重庆中华职业学校的邀请，发表关于时事的演说。演说原定在实验剧场举行，因听众过分拥挤，临时改在巴蜀小学广场上进行。参加听讲的各界群众约有3000人，会上周恩来发表了名为《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的著名演说。

先是开门见山地点明演说的主题。

“摆在每一个人面前的国际局势与中国抗战问题，很显然这是每个人都在考虑着的问题。

谈到对预期中的日美冲突，中国应采取什么立场时，他说：

“必须坚持最高统帅的自力更生，抗战到底的主张，对日美冲突不要幻想。同时应利用日美冲突反对日本，不要使抗战变质，甚至成为帝国主义战争的工具。”

“对美国的2500万的借款，我们诚然感奋，但这是3000吨钨矿换来的，同时要求把这笔钱完全用到抗战上去，不要再加存在那存在美国银行的17000万美金上去。”

谈到日本是否会结束侵华战争的问题时，周恩来指出“这是不可能的”。

周恩来谈到日本急于结束中国战事，抽身南进的战略计划，指出“只要我们能够坚持抗战争取时间延长下去，日寇终会迫不及待放手南进的。只要我们撑得下去，日本就拖不下去。”

谈到最后一个“怎样使抗战进步”的问题时，周恩来说：“坚持抗战就是解决进步问题的前提。比方团结问题有人认为进步太慢，但中日战争发展本来就是慢慢的。”

非常精辟的对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分析，展现了一个战略家的眼光和现实主义的务实者的精神。象拨云见日一般，人民踩着伟人的肩膀，看

见了历史前进的航程。

整个抗战期间，周恩来不知疲倦地写作、演说。一支笔、一张嘴胜过千军万马。此时的周恩来正值壮年，思想愈加上睿智，演说的技巧日趋娴熟。热情激昂之中渗透了冷静的洞察，一泻千里奔腾的气势中贯穿了严密的条理和逻辑，其境界可谓更上一层楼。

周恩来在国统区广交各界朋友。他平易近人，不仅是要人权贵，一般的平民百姓他都一视同仁。他幽默的口才赢得众人的倾心。

作为一个大演说家，周恩来在小事上表现出来的幽默和机智以及令人眼光缭乱的口才也是使人叹服的。

八年的漫漫长夜总算过去了。人们痛苦地等待，盼望战争的结束，和平与安宁的生活能够随之到来。然而饱受日本侵略者战火摧残的中国大地，一场大规模的内战又处在地平线上隐隐欲现。

周恩来一如既往的不知疲倦的参加谈判。但是蒋介石并无诚意，吞掉或消灭中国共产党，实现独裁统一中国，是他梦寐以求的目标。既使坚忍、耐性如周恩来者，面对虚情假意的协商，反复地背信弃义和撕毁承诺，出尔反尔地一再挑衅与围攻，也不禁流露出深深的厌倦情绪。他说：“我都谈老了。”毫无意义的谈判，不是白白浪费光阴与生命吗？

1946年11月15日，国民党悍然推翻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单方面召开排斥共产党的国民大会，和谈已无可能了。

11月16日，周恩来在南京梅园新村举行了最后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

当记者问他何时再回南京时，周恩来说：

“南京，我们总是要回来的，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国民党打不下去，再回到政协决议上来，请我们回来；另一种是国民党越打越垮，我们打回南京来。”

历史证明了周恩来的第二种预言。

## 万里风云，我自驰骋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庄严地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周恩来就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从此主持新中国的外交工作长达20多年，赢得了全世界的交口称誉。此时的周恩来，经验丰富，才华过人，学识渊博，魅力无穷，为新中国争取到大量的朋友。他的演说和口才更是登峰造极，在外交工作中发挥了巨大的威力。

1955年1月15日，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代表缅甸、锡兰、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五个发起国致电周恩来，邀请中国参加4月将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

周恩来极其敏锐地看到，这次会议不仅在亚非历史上，而且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上都是划时代的创举，标志着亚非国家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新的历史时代的来临。中国出席这次会议，正是打开新中国外交局面，登上国际政治舞台，广交朋友的一个大好机会，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2月10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复电印尼总理，表示欣然接受邀请。

亚非会议的宗旨触犯了西方国家的利益，过去的殖民者心中的苦涩可想而知。他们曾想阻挠亚非会议的召开。美国《路易斯邮报》毫不掩饰地评道：“美国希望根本就不召开亚非会议。”

面对会议的召开已无可避免的情况，美国又企图用亚非各国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所造成的隔阂大做文章，宣称中国要“夺取亚非世界的领导权”，对远东地区已经“构成了尖锐、迫切的威胁”，以增加与会国家对中国的疑虑和恐惧。到亚非会议召开的前一天，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竟然公开要求会议“将设法谴责以武力实现国家野心”的共产党政权。

为了妥善处置会议可能出现的变化多端的事态，周恩来未雨绸缪，从2月开始即着手研究，制定参加会议的方针和策略。4月5日，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集团讨论批准了周恩来主持制定的会议方案，并授权周恩来视会议情况采取灵活的应变策略和办法。

然而，情势凶险难测，前途并非一帆风顺。

4月11日，当中国代表团包租的印度航空公司星座式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飞离香港启德机场约五小时后，在南中国海上空爆炸坠毁，中国和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以及随团中外记者11位全部遇难。由于周恩来应约出访缅甸，事先改变了出国路线，得以幸免于难。

面对险恶未测的前途，周恩来面无惧色，处之泰然。他在给妻子邓颖超的信中写道：“感谢你的好意和诤言，现将来信捎回，免得失落。有这一次教训，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但是“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

简短朴实的字句，英雄本色、儿女情长已表露无遗。

4月16日，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由仰光直飞雅加达。在飞经新加坡上空时又遇雷雨，无法穿越，被迫暂降与我国尚无正式外交关系，国民党特务活动猖狂的薪加坡。

雅加达机场，人们焦虑不安地等待。下午6时，中国代表团的专机终于徐徐降落在雅加达玛腰兰机场。当周恩来满面笑容地出现在机舱门口时，欢迎的群众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欢呼声。

4月18日上午，亚非会议在气候宜人的“花都”万隆隆重开幕。

开幕式后，各国代表相继发言。会议充满友好与和睦的气氛。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了演说。表示了支持亚非国家的独立自主，争取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反对侵略、战争和干涉别国内政的立场。同时他指出要发展经济，开展与世界各国广泛交流、交往的愿望，并谈到了作为国与国之间关系基础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后，周恩来非常诚恳地呼吁：

“我们的会晤是难得的，尽管我们中间存在着许多不同意见，但是这不应该影响我们所具有共同愿望。我们的会议应该对于我们的共同愿望有所表示，使它成为亚非历史值得珍贵的一页。同时我们在这次会议中建立起来的接触应该继续保持，以便我们对世界和平能够作出更大的贡献。”



周恩来的演说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从下午最后一个发言起到19日，会议出现了分歧和矛盾。有些代表或因偏见，或因受到挑唆，或因不明真相，偏离会议议程。有的攻击共产主义是一种“颠覆性的宗教”；有的提出中国在边境省份设置自治区意味着共产主义对邻国的颠覆，并提出华侨双重国籍等问题，会场气氛突然紧张起来。

会场上，各国代表的目光始终注视着周恩来，有的为此幸灾乐祸，有的同情和焦虑。很多人由此断定会议已经出现不可避免的分裂危机。周恩来当机立断，利用休会的短暂时间另起草一个补充发言稿。

休会后，他赶紧对自己的翻译浦寿昌说：“你字写得快，我口授补充发言，你给我记下来。”不一会儿，一篇2000多字从内容到文字都极其精彩的即席讲话稿就出来了。

当报名发言的各国代表几乎都讲完了的时候，周恩来从容不迫地走上了讲台。他作了简短的说明之后即转入正题，第一句就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顷刻间，会场一片肃静，全场都在屏息倾听周恩来下面的发言：

“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我们之间的共同之处就是，我们都曾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因此，我们“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

这个明确而富理解与友好精神的开场白之后，周恩来逐一解释和驳斥了对中国“没有宗教信仰自由”、“进行颠覆活动”、“共产主义威胁”的指责。

首先，“不同的思想和社会制度”、“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我们亚非会议既然不要排斥任何人，为什么我们自己反倒不能互相了解，不能友好合作呢？”

次之，“中国是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但是我们尊重有宗教信仰的人。我们希望有宗教信仰的人也应该尊重无宗教信仰的人”。不同的信仰“并不妨碍中国内部的团结”、“中国代表团就有虔诚的伊斯兰教的阿訇”。

第三，中国人民“经历了近三十年的艰难困苦”，“最后才选择了这个国家和现在的政府”。“我们反对外来干涉，为什么我们会去干涉别人内政呢”？“华侨双重国籍问题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但是新中国“准备与有关各国政府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至于说“在中国境内有傣族自治区”便是“威胁了别人，这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他们既然存在，我们就必须给他们自治权利。好象缅甸有掸族自治邦一样，……如何能说威胁邻邦呢”？

周恩来宣布：为了不使会议争论，中国决定不在会上提出“解放自己领土台湾和沿海岛屿”以及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地位问题”，尽管中国的要求完全“是正义的”。

最后，他用恳切而朴实的语言说，“我们是容许不明真相的人怀疑的。中国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到中国去参观，你们什么时候去都可以。”

周恩来的话音刚落，会场里立刻就爆发出长时间掌声和欢呼声，整个会议大厦为之沸腾了。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印度总理尼赫鲁、缅甸总理吴努等各国代表纷纷离开座位，去同周恩来握手。与会代表，包括最初对中国持不友好态度的代表都称赞周恩来的“这个演说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现了民主精神”。一位目睹会场情景的美国记者，在其专题报道中评论道：“周恩来的发言是对中国和解的绝好说明，其外交与演说技巧已登峰造极，它是两天公开会议的高潮。”

会议进入实质性讨论后，一只无形的黑手将会议拖向相反的方向。从20日傍晚开始，会议再次掀起波澜。有的代表节外生枝，把共产主义称之为“新式殖民主义”。当有的代表提出提案要求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亚非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时，有的代表则以种种理由表示反对，并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提案。

两种意见争论激烈，会场气氛异常紧张。许多代表目睹这一僵持局面，认为会议再也达不成什么协议了。

23日上午，周恩来又发表了被某些代表称为“亚非会议上最重要的讲话”。他说：“与会各国代表都是一致呼吁和平”的，既然谈到和平与合作，亚非29国就应该首先“撇开不同的思想意识，不同的国家制度”等问题，在亚非地区“进行国际合作、求得集体和平”。中国“不赞成在世界上造成对立的军事集团，增加战争的危机”。

他又说：“我们应该确立一些原则，让我们大家来遵守，不进行扩张，也不去颠覆别的国家。”现在赞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国家“一天天多起来”，但是考虑到“在座的有些代表说和平共处是共产党的名词，那么我们可以换一个名词，而不要在这一点上发生误会”。“在联合国宪章的前言中有‘和平相处’的名词，这是我们应该同意的。”至于“五项原则的写法可以加以修改，数目也可以增减，因为我们寻求的是把我们的共同愿望肯定下来，以利于保障集体和平。”这里，周恩来出色地表现出其原则的坚定不移，而具体行动则可策略变通，以为各方接受。

周恩来的发言吸引了会场每一个人，为会议达成一致协议扫清了道路。最后，会议终于通过了包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全部内容的关于《国与国之间和平相处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有人为此感慨地称许说：周恩来在会议“几乎已经陷入僵局的时刻脱颖而出，成为会议明星，成为排难解纷，平息争端，带来和平的人物”。

周恩来对与会代表会外频频接触，赤诚交往，吸引了几乎所有人的注意力，几乎与所有会议代表团团长“建立了友谊，成了好朋友”。

当年在亚非会议上以滔滔辩论而出名的菲律宾代表团团长罗慕洛，在亚非会议召开30周年前夕接受《人民日报》驻纽约记者采访时，深情地说：亚非会议上，我发表了反对共产主义的长篇演说，可是周恩来不但没和我争论，而且还主动和我在会外进行深入的讨论，使我深深地感动。虽然当时“菲律宾同中国还没有建交，而我和周恩来从那时起就建立了友谊，成了好朋友。”周恩来并不喜欢以其口才而与人为战，相反

喜欢用自己的言语行动来交朋友。这是他固有的宽容与博大的一面。

4月23日，周恩来发表简短声明：“中国人民与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

一席话，语惊四座，获得了亚非各国和世界舆论的欢迎和支持，并导致了中美大使级谈判，为日后的中美建交，打下了一个伏笔。

亚非会议的成功，打破了帝国主义在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新中国的企图。周恩来这个中国革命的领袖人物，出现在众多亚非代表面前。他亲切和蔼、满面春风，演说雄辩而不失节制，立场鲜明而不乏灵活，宽容大度，坦率诚恳。他获得了几乎所有人的好感：“只要他出现在哪里，哪里就有欢呼和掌声”，“人们都为他发疯了。”世界认识了中国这位杰出的外交家、演说家。

### 大厦将倾、独撑半壁河山。

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在周恩来的主持之下，逐步走上正轨，务实是周恩来性格中固有的一部分。在他看来，一个国家当以人民的衣食温饱为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经坎坷，周恩来作为主要的当事人，其间的酸甜苦辣自不待言。身为国家政府总理和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周恩来一直追随着毛泽东。然而党内的“左倾”思想日益明显，先是“反右”，继而“大跃进”，随后就是三年自然灾害。那个时候中国遭受的困难，既有天灾、亦有人祸。

1962年2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福建组会上发表讲话，检讨前几年工作中的失误，批判了浮夸风和说假话的现象，提出“说真话、鼓真劲、办实事、收实效”。他讲道：

“这几年来，党风不纯，产生了浮夸和说假话的现象。我们要提倡说真话。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要大家讲真话，首先要领导上喜欢听真话，反对说假话。”

“我们要发扬民主，恢复和加强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

“我认为要按党章办事，少奇同志在七大做的修改党章报告，小平同志在八大做的修改党章报告，都讲到党内民主生活的问题，但这几年有的同志把它搁到一边去了。当然有些事是中央带的头。”

对于个人崇拜和一个人说了算，周恩来是不赞成的，周恩来反复地讲“党内民主生活”，他的用意与苦心昭然若示。

但是随着毛泽东个人威望和权力的日益提高，他思考和担心的方向明显不同党的其他领导人。由于担心党的腐化变质和“党内走资产阶级路线的当权派”，毛泽东决定发动一场由群众自下而上的净化党的“文化大革命”。

对于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周恩来是不理解的，正如他1966年7月29日在群众大会上所说的，自己也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但不久后，他看到了这是一场灾难。对于这场灾难，

他认为硬顶是不行的。必须“因势利导，否则就会被冲垮”。他说：要做“弄潮儿”，“站在潮头上，做旁观人不行，做对立的把你冲垮”。在一封私人的信里，他流露出一种无可奈何——“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其忍辱负重和不计个人得失的博大胸怀可见一斑。

关于周恩来在文革中所处的困难角色的问题，国外有人这样写道：“只要他在其位，就可以在处理政府的日常工作中，保持某种明智，对受到威胁的干部给一定的保护，可以减轻数百万人的痛苦。此外，他可以阻止野心家篡夺最高权力的企图，防止爆发一场新的悲剧。如果他离职，局势势必更加恶化。如果他公开发表自己的看法，使自己成为英雄，其处境将更加困难，不堪设想。”

“文革”初期，周恩来陷入了一场奇怪的，没有多少道理可讲的辩论之中。对手是激动不已、兴奋万分，革命热情高涨的红卫兵小将。对他们，周恩来也没有多少办法，只有反复地讲一些极其浅显的道理，尽力使他们在行为上有所克制，同时不能打击了他们的革命激情。从1966年8月下旬到12月中这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周恩来参加红卫兵的大型汇报会、座谈会等在40次以上。小型的、个别的约见谈话就更多了。有些会长达四、五小时，有些会通宵达旦。

尼克松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我当时不知道（后来才听说），他在文革中曾被一百万红卫兵包围在人民大会堂前。他陷在与这帮胡搅蛮缠的人的激烈辩论中长达24小时，最后才勉强说通脱身。那些日子，周的智慧 and 口才使他免遭狂乱分子的毒手，正如他的智慧和口才也曾使中国免堕深渊一样。”

有一次，周恩来注意到一个传闻，说“红卫兵”打算包围宋庆龄的住宅，以要求她改变自己的发式。他立即把北京的“红卫兵”头头召集在一起，同他们讲道理：

“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的功绩，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就肯定了。他的功绩也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南京的同学一定要毁孙中山的铜像，我们决不赞成。”

“他的夫人自从与我们合作以后，从来没有向蒋介石低头。大革命失败后她到了外国，营救过我党地下工作的同志，抗日战争时期与我们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也同情我们。她年纪很大了，今年还要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她出面写文章，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到她家里贴大字报不合适。”

“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她一个人是革命的，不能因为她妹妹是蒋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她的房子是国家拨给她的。有人说：‘我敢说敢闯，就要去。’这是不对的。”

苦口婆心，循循劝诫，简单的道理却需要如此费力地讲出来，说服红卫兵的辩论工作其困难程度之大可想而知。

“文革”期间，国际形势不断变化，日趋复杂。周恩来敏锐观察，把握机遇，促成尼克松访华，此举可谓中国外交史上的杰作。

当时中苏交恶，甚至发展到兵戎相见。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

构成对中国安全的主要威胁。美国深陷越战泥潭，急于抽身。为制约苏联，尽早结束越战，也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关系的愿望。然而双方经过 20 年的敌对，相互之间绝少往来，如何牵线搭桥呢？

1971 年 4 月，周恩来请示毛泽东之后，指示有关部门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并亲自会见了美国运动员和随行记者。在座谈会上，发生了非常有趣的一件事。

美国乒乓球队队员格伦·科恩突然征求周恩来对美国青年中流行很广泛的“嬉皮士”运动有什么看法和评论。

周恩来答道：

“第一，我对这个运动不很清楚。第二，如果要问我的话，我只能说一点我的粗浅、表面的观察。可能现在世界青年对现状有点不满，想寻求真理。青年的思想波动时会表现为各种形式。但各种表现形式不一定是成熟的或固定的。因为，寻找真理的途径总要通过各种实践来证明是对还是不对。这在青年时代是许可的，我们年轻时候也是这样，所以我们懂得青年人的心理：特别好奇。”

“我们赞成任何青年都有这种探讨的要求，这是好事。要通过自己的实践去认识。但是有一点，总要找到大多数人的共同性，这就可以使人类的大多数得到发展，得到幸福。”

这席话表现了周恩来惯有的风格——谦虚，以探讨的态度，充满宽容和理解，将自己的真知灼见以能成为对方接受的方式说出，周恩来谈话的风度和技巧真是令人钦佩。

科恩的母亲后来曾专门写信给周恩来，感谢他教育了自己的儿子。这件事也被传为中美人民友好往来的佳话。

“乒乓外交”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大门，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反响。正如周恩来后来生动描述的那样，“小球转动了大球”。

1971 年 7 月，基辛格取道巴基斯坦，秘密访华。当时，尼克松和基辛格两人决定将这次中国之行称为“波罗行动”，以几百年前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华“探险”的壮举做比拟。

基辛格的谈判对手是周恩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当开场白的前言部分快讲完的时候，我想露一露口才，我说：‘已有很多人访问过这个美丽的国土了，对我们来说却是一个神秘的国土。’周恩来举起手来，说道：‘你会发觉，它并不神秘。你熟悉之后，它就不会像过去那样神秘了。’”

“就这样，周恩来和我之间的会谈较之在我担任公职时和其他任何领袖的会谈，时间都更长、更为深入。”

“即使在吃饭的时候，我们之间的谈话也是哲理性的、饶有趣味的、富有启发意义的。”

1972 年 2 月 21 日，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乘坐的“七六年精神号”专机在北京机场降落，开始了他结束访问时所说的“改变世界的一周。”在欢迎尼克松的宴会上，周恩来发表了祝酒词：

“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两国

人民一向是友好的。”

“现在，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友好来往的大门终于打开了。目前，促使两国关系正常化，争取缓和紧张局势，已经成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强烈愿望。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们相信，我们两国人民这种共同愿望，总有一天是要实现的。”

“我们希望，通过双方坦率地交换意见，弄清彼此之间的分歧，努力寻找共同点，使我们两国的关系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

一席话，热情洋溢而很有分寸，着重展望未来而寻求共同之处，表现了周恩来高瞻远瞩的政治家风采。此时的周恩来已身患绝症，但他仍旧精力充沛，不知疲倦的与尼克松进行一轮又一轮的谈判。

尼克松回忆道：

“我们的谈话内容涉及到政治、历史和哲学，所有这些周恩来都很在行。周恩来是一位由学者转变成了造反者的人，但从未失去学者敏锐的头脑和深刻的思想。”

“在我们的谈话中，周恩来不断提到有必要了解和克服他们的不足之处。我们第一次会见时，他就提到出席会议的双方人员平均年龄上的巨大差异，说：‘我们的领导层中，年纪大的人太多了’。就这一点来说，我们应该向你们学习。”

对于握手的问题，双方也有一些有趣的讨论。双方都想起了杜勒斯在日内瓦会议上不与周恩来握手的旧事。

周恩来非常幽默风趣地回忆了起来：“当时，杜勒斯的助手沃尔特·史密斯先生想采取不同的做法，但又不敢打破杜勒斯的戒律。于是，他右手拿着咖啡杯。由于不能用左手握手，所以他只用左手摇摇我的胳膊。”

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相逢一笑恩仇泯，周恩来的心胸和谈话艺术一样高超。

尼克松回忆道：

“我们在北京的宾馆里举行最后一次长时间的会议时，周恩来再次引证诗词来说明他的观点。他说：‘在你楼上的餐厅里有一幅毛主席手书的《题庐山仙人洞照》，最后一句是：无限风光在险峰。你是冒着一定风险来中国的，然而正如诗中所述，在危岩上，正有着无限优美的风光。’周恩来和毛泽东的诗才，在伟大领袖中也是不常见的。最成功的政治，则比优美的散文更富有诗意。”

尼克松访华最重要的成果，是1972年2月28日双方签署的《中美联合公报》。这是国际关系史上一个独特的文件。它是长时间的谈判和各自相让的结果。它不像一般国际协议那样，用一些空话和套话掩饰谈判过程中未能解决的分歧，而是罗列和阐明两国的分歧和一致意见。讲到分歧和争论的问题时，一律以这个公式开头，“美方认为”或“中方认为”。签署公报的双方用这种方式表明哪些问题未能达成协议。

正如周恩来在欢迎词中所说的：“中美关系的大门从此打开了。”周恩来在垂暮之年，病体缠身，内忧外患的处境中，仍以其过人的智慧与口才，为新中国的外交做出了又一丰碑性的贡献。

尾 声

1975年1月，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这次演说，大概是中国人民最难以忘记的了。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曾经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

中国人以前听得如雷贯耳的“实现四化”的宏伟目标，就是出自周恩来之口。这句口号整整激励了一代中国人。

进入1975年之后，周恩来的病情已相当严重。但他仍然抱病坚持工作。住院之后仍不断接见外国客人，共计有50多批。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在前一天晚上十一点，他最后一次微微睁开眼睛，以衰弱低微的声音对围在他身边的医生护士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快去照顾其他的生病同志，他们那里更需要你们……”。

按照周恩来生前的愿望，他的骨灰撒在了中华大地的山川河流、广袤原野之中。

后来的“四·五”运动，人民自发纪念周恩来，人心向背，一望可见。中国人深深敬爱周恩来，首先因为他的爱心。他是真正具有爱心，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的政治家。然后才是为着他的才华，他的智慧，他的精妙的演说与口才。所有这些品质组合起来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格，一个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

## 苏格拉底

“ 忍耐与智慧相结合是美好的、完满的， ”

### 一、以演说为职业的人

苏格拉底（公元前 469 ~ 399 年），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也是当时雅典无人不晓的雄辩家。他出生于平民，曾继承父亲的职业，做一个雕刻匠，但不久致力于哲学研究和社会政治活动。当时的雅典正值伯利克里执政时期，提洛同盟的金库从提洛岛转到雅典，促进了雅典经济的发展；统治者对各种文化又采取了宽容和保护的态度，因此各个学派的学者纷纷来到雅典讲学，为苏格拉底的学习和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他曾追随阿开劳斯学习哲学与天文，拜智者普罗底柯学习语言学和修辞学。在长期的学习中，苏格拉底开始崭露头角。在他 20 岁时，同爱利亚学派的代表人物巴门尼德及其弟子芝诺展开了一场大辩论，说明苏格拉底在青年时期就开始形成一套系统的哲学观念，显示了他的卓越才华。为了宣传他的学说，苏格拉底又经常在各种公众场合与人辩论，很快就饮誉于全希腊了，并在他身边聚集了一批门徒，包括柏拉图、色诺芬等一批著名思想家，成为当时奴隶主贵族思想家的领袖。

苏格拉底相貌奇丑，大嘴厚唇，早早秃顶，扁鼻子，烂眼角，双目暴突如牛眼，走起路来挺着肚子，姿势十分难看。他好像只是把肉体当做一件有用的工具，使它能够去适应各种艰难困苦。他身体结实，能吃苦耐劳，不畏寒热，四季赤足。一年到头披着一件旧斗篷，甚至在冰天雪地的色雷斯作战的时候，也不空穿鞋。他安于清贫，不求名利，饮食简单，平时不大饮酒。每逢节日，同朋友聚会时却酒量过人。一次，他和几个人谈论人生哲理，竟作长夜之饮，别人先后醉倒了，只剩下他和另外两个人。黎明时分，那两人烂醉如泥，他却若无其事地入水洗浴，浴罢走上街头，一如往常。温和的性格，平静的心境，有节制的生活，使他直到晚年都保持着充沛的精力。

苏格拉底生活在古希腊奴隶主民主制开始衰落的时期。当时雅典社会日趋两极分化，越来越多的自由民沦为贫民，公民大会经常成为蛊惑家和野心家们操纵利用的工具，作为民主制基石的雅典公民在道德上也日趋腐化。苏格拉底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从道德上拯救雅典城邦的事业，他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象马虻一样去刺醒这个社会。他激烈反对智者学派的个人主义、感觉主义和相对主义，孜孜不懈地追求普遍的真理和道德，并把它们作为重建民主制的基础。他到处揭露人的无知和愚昧。他的思想和行为既触怒了那些怀有野心的政客，也触怒了不能理解他的雅典一般公民，于是他们便以“慢神”和“蛊惑青年”的罪名处死了苏格拉底。

长期以来，作为人类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演说大师，苏格拉底的演说技巧和论辩风格受到了后世之人的深深景仰。他的论辩事迹，至今仍为人们广为传颂。

### 二、“精神助产术”

#### 苏格拉底的主要论辩技巧



在与泰阿泰德的对话中，苏格拉底详细地阐述了他的论辩技巧。据他的弟子柏拉图回忆，他们的对话如下。

苏格拉底说：刚才你已经指出了正确的道路。那么以你自己对方根的研究作样本，你把各种各样的根归为一类，同样，也就用一个定义来说明许多种类的知识。

泰阿泰德说：我能向你保证，苏格拉底，听到别人说起你所提的那些问题，我经常努力试加解答。但我既不能作出令自己满意的答案，也从未听到他人作出过符合你要求的回答。尽管如此，这些问题却常常绕于我的脑际，挥之不去。

苏格拉底说：你正在经受分娩的痛苦。泰阿泰德，你孕育着某些东西，而非空空如也。

泰阿泰德说：这我不知道，苏格拉底，我只是说了自己的感受。

苏格拉底说：傻瓜，难道你从未听到过，我是高贵、健壮的助产婆芬尼兰托的儿子吗？

泰阿泰德说：听说过。

苏格拉底说：也听到过我习于施行同种技术吗？

泰阿泰德说：没有。

苏格拉底说：我向你肯定这是真的。不过你可别给我泄露出去。大家还不知道我拥有这门技术。由于不知道，也没有就此谈论我，却说我是最古怪的人，常把人们搞得智穷力竭。这你也听说过吗？

泰阿泰德说：听说过。

苏格拉底说：我告诉你原因好吗？

泰阿泰德说：当然好。

苏格拉底说：先考虑一下助产婆的全部事务，你会更加容易明白我的意思。我想你必定知道，仍能怀孕生育的妇女不允许给人接生，只有过了生育期的才行。

泰阿泰德说：是的，确实是这样。

苏格拉底说：据说这是由于阿尔特弥斯（古希腊神话中的处女神）的缘故，分娩是她掌管的事，可她自己却没有孩子。她不允许处女做助产婆，因为人类本性太弱，以至于没有经验便不可能获得处理事情的技术。她只把这个职业指派给那些过了生育年龄的妇女，因为她们跟自己相像而提高其地位。

泰阿泰德说：极有可能。

苏格拉底说：助产婆不是一定能够更清楚地知道谁怀孕、谁没有吗？

泰阿泰德说：确实如此。

苏格拉底说：她们运用药剂和咒语，引起孕妇分娩的阵痛，也可随意缓和它们；她们可使难产的人生产，如果合适，也可流产。

泰阿泰德说：是这样的。

苏格拉底说：你可曾注意到她们也是最精明的媒婆，因她们最清楚什么样的男女结合能生出理想的孩子来？

泰阿泰德说：我不曾注意到。

苏格拉底说：可以肯定她们对此自豪远胜于那割断脐带的技术，你觉得什么土壤适宜于种什么植物或种子的知识与管理 and 收获土地果实的

知识是否属于同一技术？

泰阿泰德说：属于同一技术。

苏格拉底说：那么对于妇女来说，我的朋友，你认为种植是一种技术，收获是另一种技术吗？

泰阿泰德说：不然。

苏格拉底说：确实不是。不过，因为有一种被称为拉皮条的不正当的、不合法的撮合男女的方式，所以助产婆——她们是高尚的、尊贵的妇女——一般不做媒，唯恐有拉皮条之嫌。其实，只有真正的助产婆才是合适的媒人。

泰阿泰德说：显然如此。

苏格拉底说：助产婆就是这样重要。不过，她们的能耐比起我来未免稍逊一筹。因妇女并不像我的患者那样有时生真正的孩子，有时又生很难同真实的孩子相区别的赝品。要是他们的确如此，那助产术中最伟大、最高贵的部分就是辨别真假婴儿。你不觉得是这样吗？

泰阿泰德说：我觉得是这样。

苏格拉底说：我的助产术与她们的助产术大致相似。不同的是，我的实施对象是男人而不是女人；我照料他们分娩的是灵魂，而不是他们的身体。我这种艺术最伟大的地方在于它能够以各种方式考察年轻人的心灵所产生的是幻想错觉还是真知灼见。在下面这一点上我跟产婆相似：她们不生子，我缺少智慧。因此我常常遭到谴责，说我只会问别人，而自己却因没有智慧从不回答任何问题。这种谴责是正确的。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神逼迫我成为助产婆而不允许我生育。所以我自己并不聪明，没有什么发明，好产生于我自己的灵魂的果实，但是，这些跟我交往的人，尽管有一些起初显得十分无知，可一旦我们交往较久，所有这些荷蒙神佑的人就都取得了令人吃惊的进步。不仅他们自己看来是这样，而且在别人看来也是如此。显然，他们能做到这一点不是因为从我这里学到了什么东西，而是因为他们自身中发现了许多美好的东西并把它产生出来，可是他们却常归因于神，归因于我。以下这些可证明这一点。在此以前，许多人看不到这一事实，认为他们的成功完全是由于自己的原因，因此蔑视我，或由自己的意志或受他的劝导，纷纷提前离我而去。离去以后，因为伴侣不良，经常使胎儿流产。因和我交往所生的孩子也因为抚养不当，中途夭折。他们视错觉重于真理，最终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别人都清楚地意识到它们实在愚不可及。吕雪马可斯的儿子阿里斯退特即是其中之一，还有其它许多人。每当这样的人回到我这里，以十分恳切的神情要求再加入我的行列时，我的精灵总是禁止我与他们中的某一些交往，但允许我同另一些交谈，而这些人也就重新开始进步。同我交往的人，在这方面正似即将分娩的妇女，他们终日痛苦，日夜不安，有时比产妇更加厉害。我的艺术可引起这种痛苦，也可使其停止。这是这类人的情况，还有一些人，泰阿泰德啊，我看他们并不处于孕育状态，不需要我的艺术，我就诚心诚意地作联姻者，靠神的恩惠，我总可以成功地狡猾到他们跟谁交往最为有益。我把他们介绍给普罗狄库斯及其他许多有智慧的神圣的人。

我给你们讲这许多的原因，亲爱的朋友，是因为我相信——你自己也相信——你孕育着一些事物，正处于阵痛之中。到我这里来吗，记住

我是一个产婆的儿子，并且我自己也会助产术，尽力回答我问你的问题，就像我问他们一样。如果我要悄悄地摘除并抛弃你的胎儿，那是因为我考察它之后发现它只不过是幻觉而已，是不真实的，请你不要像那些第一个婴儿被拿走的妇女那样大吵大闹。亲爱的朋友，实际上我明白，有许多人因为我去掉了他们的愚蠢观念，总恨不得咬我一口。他们不知道我实际上是出于好意；不知道没有神不对人友好；不知道我也从不出于恶意做这类事情，只是绝不可能允许幻觉毁坏真理。

在这段对话中，苏格拉底把自己的回答法比喻为助产婆的助产术。这种心灵的助产术有如下特点：1. 它能区分真假婴儿即幻想错觉和真知灼见，并通过揭露矛盾的方法把“假胎”摘除掉，又通过使人反省自己，回到内心深处的方法，把自己本来具有的美好的东西即“真胎”顺利地生产出来；2. 助产者本人是不生产的，他没有任何现成的知识教给别人，而只是唤醒别人的自我，唤醒别人内心的“善”和“理性”，助产者是凭着自己的“精灵”或“灵机”来识别真假胎儿的。

苏格拉底的这种方法有积极的一面。的确，一切现成的知识都是值得怀疑，需要加以分辨的，那些对自己拥有的知识持毫不怀疑态度的人，实际上是一些不知道自己无知的人。苏格拉底的智慧则在于自知无知，这是他的过人之处。

### 三、与尤苏戴莫斯的三次论战

根据苏格拉底的另一个弟子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与尤苏戴莫斯曾进行过三次论战，探讨了三个不同的问题，后者是当时诡辩学派的著名人物。苏格拉底与他斗舌斗智，最终让对手心悦诚服。

下面是色诺芬所回忆的他们的论辩经过。

苏格拉底说：尤苏戴莫斯，也许你是希望得到一种治国齐家的本领，既有资格当领导，又能使别人和自己都得到好处。

尤苏戴莫斯说：苏格拉底，我非常希望得到这样的本领。

苏格拉底说：你所希望得到的，的确是最美妙的本领和最伟大的技能，这是属于帝王的，一般人称之为帝王之才。不过，你考虑过没有，一个非正义的人能掌握这种才能吗？

尤苏戴莫斯说：我考虑过了，一个人如果是非正义的，连一个良好的公民也做不了。

苏格拉底说：那么，你是不是已经有了这种才能呢？

尤苏戴莫斯说：苏格拉底，我想我的正义并不亚于任何人。

苏格拉底说：一个正义的人，是不是像工匠一样，会有所作为呢？

尤苏戴莫斯说：当然有。

苏格拉底说：那么，正像一个工匠能够显示他的作为一样，正义的人们也能列举出他们的行为来吗？

尤苏戴莫斯说：难道你以为我不能举出正义的作为来吗？——我当然能够——，而且我也能举出非正义的行为，因为我们每天都看到并听到不少这一类的事情。

苏格拉底说：那么，你愿意。我们把 写在这边，把 a 写在那边，然后再把我们认为正义的作为写在 的下边，把我们认为非正义的作为

写在 a 的下边好吗？

尤苏戴莫斯说：如果你认为需要这些字母，你就这样做好了。

苏格拉底照他的建议写完了以后，问道：

虚伪是人们中间常有的事，是不是？

尤苏戴莫斯说：当然是。

苏格拉底说：那么，我们把它放在两边的哪一边呢？

尤苏戴莫斯说：显然应该放在非正义的一边。

苏格拉底说：人们彼此之间也有欺骗，是不是？

尤苏戴莫斯说：肯定有。

苏格拉底说：是不是也有做坏事的？

尤苏戴莫斯说：也有。

苏格拉底说：那么，奴役人怎么样？

尤苏戴莫斯说：也有。

苏格拉底说：尤苏戴莫斯，这些事都不能放在正义的一边了？

尤苏戴莫斯说：如果把它们放在正义的一边那可就是怪事了。

苏格拉底说：如果一个被推选当将领的人奴役一个非正义的敌国人民，我们是不是也能说他是非正义的呢？

尤苏戴莫斯说：当然不能。

苏格拉底说：那么，我们得说他的行为是正义的了？

尤苏戴莫斯说：当然。

苏格拉底说：如果他在作战期间欺骗敌人，怎么样呢？

尤苏戴莫斯说：这也是正义的。

苏格拉底说：如果他偷窃，抢劫他们的财物，他所做的不也是正义吗？

尤苏戴莫斯说：当然是，不过，一开头我还以为你所问的都是关于我们的朋友哩。

苏格拉底说：那么，所有我们放在非正义一边的事，也都可以放在正义的一边了？

尤苏戴莫斯说：好像是这样。

苏格拉底说：既然我们已经这样做了，我们就应该再给它划个界限：这一类的事做在敌人身上是正义的，但做在朋友身上，却是非正义的，对待朋友必须绝对真诚坦白，你同意吗？

尤苏戴莫斯说：完全同意。

苏格拉底说：如果一个人看到他的军队士气消沉，就欺骗他们说，援军快要来了，因此，就制止了士气的消沉，我们应当把这种欺骗放在两边的哪一边呢？

尤苏戴莫斯说：我看应该放在正义的一边。

苏格拉底说：又如一个儿子需要服药却又不肯服，父亲就骗他，把药当饭给他吃，而由于用了这欺骗的方法竟使儿子恢复了健康，这种欺骗的行为又应该放在哪一边呢？

尤苏戴莫斯说：我看这也应该放在同一边。

苏格拉底说：又如，一个人因为朋友意气沮丧，怕他自杀，把他的剑或其它这一类的东西偷去或拿去，这种行为应该放在哪一边呢？

尤苏戴莫斯说：当然，这也应该放在同一边。

苏格拉底说，你是说，就连对朋友也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坦率行事的？

尤苏戴莫斯说：的确不是，如果你准许的话，我宁愿收回我已经说过的。

苏格拉底说：准许你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因为这比把行为放得不正确要好得多。至于那些为了损害朋友而欺骗他们的人（这一点我们也不应弃置而不予以考虑），你想哪一个是比较地更非正义，是那些有意的呢？还是无意的呢？

尤苏戴莫斯说：苏格拉底，我对于我自己的回答再也没有信心了，因为我先前所说的一切现在看起来都和我当时所想的不一樣了，尽管如此，我还要说，那有意说谎的比起无意说谎的人更非正义些。

苏格拉底说：那么，你是不是认为有一种学习和认识正义的方法，正像有一种学习和认识文字的方法呢？

尤苏戴莫斯说：我想有。

苏格拉底说：你想哪一个更有学问些，是那有意写得不正确并念得不准确的人呢？还是那无意之中写得不正确、念得不准确的人呢？

尤苏戴莫斯说：你认为是那有意的人，因为，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愿意，他就能做得正确。

苏格拉底说：那么，那有意写得不正确的人可能是有学问的人，但那无意写错的人则是没有学问的人。

尤苏戴莫斯说：怎能是别样呢？

苏格拉底说：是那有意说谎骗人的人知道正义呢？还是那无意说谎、骗人的人呢？

尤苏戴莫斯说：显然是那有意这样做的人。

苏格拉底说：那么你是说，那知道正义的人也是比那不知道的更正义些了？

尤苏戴莫斯说：似乎是这样；可是，我好像不知道怎么说才好了。

苏格拉底说：那么，我想你一定知道什么东西是好和什么东西是坏吧？

尤苏戴莫斯说：当然，如果我连这一点都不知道，那我就简直连一个奴隶都不如了。

苏格拉底说：好，那就请你对我讲一讲吧。

尤苏戴莫斯说：这个不难，首先，我认为健康是好事，疾病是坏事。其次，饮食和生活习惯，作为导致这两者的原因，凡能导致健康的就是好事，凡导致疾病的就是坏事。

苏格拉底说：那么，健康和疾病本身，当它们是好事的原因的时候就是好事，而当它们是坏事的原因时就该是坏事了？

尤苏戴莫斯说：但是，什么时候健康会成为坏事的原因，疾病倒会成为好事的原因呢？

苏格拉底说：当一部分人由于身体健康参加了远征，遭到惨败，或参加海战，全军覆灭而丧失生命，但另一部分由于身体衰弱被留下而得保全，以及其他许多诸如此类的事情，都属于这种情况。

尤苏戴莫斯说：你说得不错，但是，你瞧，也有些人由于身体健康而参加了有利的事业，而另一些人由于身体衰弱向隅而位的啊。

苏格拉底说：那么，像这类有时有益，有时有害的事到底是好事呢，还是坏事呢？

尤苏戴莫斯说：的确，单凭空论很难说准它们是好事或是坏事。可是，苏格拉底，无可置辩智慧是一件好事；哪里有什么事，一个智慧的人不能比一个不学无术的人做得更好呢？

苏格拉底说：怎么，你没听过戴达洛斯（古希腊著名发明家）如何由于有智慧被米洛斯囚禁，被迫为奴，远离本土，丧失自由，当他和他的儿子一齐逃跑的时候，不但丧失了儿子，而且连自救也不能，终于被带到野蛮人那里，再度沦为奴隶吗？

尤苏戴莫斯说：的确有这种传说。

苏格拉底说：你没有听说过帕拉梅德斯所受的苦难吗？人们经常传说她如何由于智慧而遭到俄底修斯的嫉恨并被害死。

尤苏戴莫斯说：这种传说也是有的。

苏格拉底说：你知道有多少人由于有智慧而被带到波斯王面前，在那儿过着奴隶的生活吗？

尤苏戴莫斯说：苏格拉底，毫无疑问，幸福要算是桩好事了吧？

苏格拉底说：幸福如果不是由有问题的好事构成的，就可以算是好事了。

尤苏戴莫斯说：构成幸福的事中，哪些又是有问题的好事呢？

苏格拉底说：如果我们不把美貌、膂力、财富、光荣和诸如此类的事包含在幸福之中，那说没有问题的好事了。那么，我们就的确是把许多给人类带来痛苦的事放在幸福之中了。因为有许多人由于美貌而被好些倾心的人败坏了；许多人由于自信体力强大而去尝试力所不逮的工作就遭到了不少的祸患；许多人由于财富而腐化堕落，遭人阴谋暗算而毁灭了；许多人由于他们的荣誉和政治能力而遭到了极大的灾难。

尤苏戴莫斯说，既然我连称赞幸福也做得不对，那我就只好承认我真不知道向神明求什么才好了。

苏格拉底说：也许，你由于过分自信已经知道这些事，所以你并没有对他们作过充分的考虑。但是，你所准备领导的城邦既然是个民主城邦，你总该知道民主是什么吧！

尤苏戴莫斯说：我想，无论如何，这一点总是知道的。

苏格拉底说：你想，不知道什么是民，能够知道什么是民主吗？

尤苏戴莫斯说：当然不能。

苏格拉底说：那么，你以为民是什么呢？

尤苏戴莫斯说：我以为民就是国家里的穷人。

苏格拉底说：那么，你知道谁是穷人吗？

尤苏戴莫斯说：怎能不知道呢？

苏格拉底说：那么，你也知道谁是富人吗？

尤苏戴莫斯说：我知道谁是富人像我知道谁是穷人一样。

苏格拉底说：那么，你称哪一类的人为穷人，哪一类的人是富人呢？

尤苏戴莫斯说：凡所有不足以满足其需要的我认为就是穷人，凡所有不仅足够而且有余的人都是富人。

苏格拉底说：你曾经注意过没有，对于有些人来说，他们所有的虽然很少，却不仅足够，而且还有富余，而对于另一些人，所有的虽然很

多，却仍不够？

尤苏戴莫斯说：的确如此，你提醒得很对，我知道甚至有些僭主，由于匮乏，而不得不像最穷苦的人一样，去做违法乱纪的事。

苏格拉底说：既然如此，我们就应当把僭主放在人民之中，而把那些尽管所有不多，但却善于经营管理的人置于富人之列了。

尤苏戴莫斯说：很明显，由于我自己的无知，我也不得不同意这一点了；我想我最好是静默不语，因为我简直什么都不知道。

于是，尤苏戴莫斯垂头丧气地走了，他很鄙弃自己，认为自己实在是一个奴才。

许多被苏格拉底这样对待的人都不再到他跟前来，他认为这些人都是些不堪造就的蠢材。但尤苏戴莫斯认为，要想做一个值得称道的人，除了尽可能多和苏格拉底交游外，没有别的办法。因此，如果不是万不得已，他总是不离开他。

色诺芬记载的这段苏格拉底与尤苏戴莫斯的对话，是苏格拉底“回答案”或“理智助产术”的一个生动的例子。

第一段讨论什么是正义。开始时，苏格拉底充分显示了反证法的力量即举出一些反例来使对方的定义不能成立。首先，尤苏戴莫斯提出：“凡虚伪、欺骗、奴役等，都是不正义的。”苏格拉底问他：“对敌人实施欺骗、奴役、抢劫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苏格拉底进一步举出反例证明并非对朋友的一切欺骗、说谎以至偷窃行为都是非正义的，迫使尤苏戴莫斯再退一步，收回上述定义，并承认只有那些损害朋友的欺骗等等行为才是非正义的。辩论至此，苏格拉底是严格遵循逻辑的。但进一步的提问无疑走向诡辩了。苏格拉底的问题是：是那有意欺骗以损害朋友的人更不正义还是因无意的欺骗而损害了朋友的人更不正义，尤苏戴莫斯认为是前一种，这本是一个正确的回答，但苏格拉底却通过诡辩手法迫使对方承认前一种人比后一种人更正义。苏格拉底的论证是这样的：正是那有意写得不正确的念得不正确的人比那无意写得不正确的念得不正确的人更有学问一样，那有意说谎骗人比那无意说谎骗人的人更知道正义也更正义。

这一论证显然是错误的。

首先，有意读错和写错的人并不必然比无意读错和写错的人更有学问（因为存在着相反的可能），同样，有意说谎骗人的人并不必然比无意中说谎骗人的人更知道正义。苏格拉底把一个或然推理当成一个必然推理，违反了充足理由律。

其次，即算有意说谎骗人的人比无意说谎骗人的人更知道正义，也不能推出他更有正义或更正义，因为知道正义是属于思想领域的，有正义却是指行为的性质，一个人有正义的意识到自己对什么是正义一无所知，为此他在辩论中不惜违反逻辑规则。这里可以看出苏格拉底助产术的一个方面：为了揭露对方的无知而不惜否认对方的正确（或包含正确）的观点。

第二部分讨论什么是好事，什么是坏事，尤苏戴莫斯列举了三种好事：健康、智慧、幸福，都被苏格拉底运用反证法予以否定了，他的论证如下：

健康虽然有时候给人带来好处，但有时候给人带来祸害，相反，疾

病虽然有时候给人带来痛苦，但有时候又因祸得福，像这类有时有益有时有害的事无法将它们称之为好事或坏事。

同样智慧也经常给人带来灾祸；至于幸福，它是由美貌、膂力、财富、光荣等要素构成的，而这些东西又经常给人带来灾难和痛苦。可见，智慧和幸福也并非好事。

苏格拉底的反驳看起来确实是强有力的。我国古代大哲学家老子也通过“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的故事，指出了“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的深刻道理。确实，在好事与坏事、幸福与灾难、快乐和痛苦等等之间，经常是互相转化以至互相渗透的，不存在绝对的好事、绝对的幸福。如果苏格拉底的意思是这样的话，那就是符合辩证法的，但苏格拉底从好坏、祸福的相互转化和渗透这一事实出发，得出极端的结论即好坏、祸福是没有分别的，或者说是无法加以区别和定义的，这就从辩证法走向了相对主义和诡辩论。辩证法固然承认对立面的同一性、统一性，但又承认对立面的对立性和斗争性，虽然在好与坏、祸与福等等之间没有绝对的对立和不可逾越的鸿沟，但双方之间相对的区别还是有的，“好事”和“坏事”这两个概念还是可以成立的，而且它们之间的互相渗透和转化正好以它们的差别和对立为前提。不管情况多么复杂，总必须承认，健康、智慧、幸福是或者基本上是好事，而疾病、愚昧、灾难等等是或者基本上是坏事。苏格拉底本意并不是要否定这些对立面的区别，他仍然是出于在辩论中取胜的目的，通过反证法来折服对方。但按他这种方法，任何事物的规定性及事物间的差别都可通过列举反例而加以取消，这样一来，对任何事物加以定义都成为不可能的，从而全部认识也都是不可能的了。

第三段辩论的题目是“什么是民？”因为尤苏戴莫斯想当民主政体的领袖，自然应当对“民”或“人民”这个概念有清楚的了解。尤苏戴莫斯认为人民就是穷人，这就引出了苏格拉底关于贫和富、穷人和富人的一段诡辩。本来，尤苏戴莫斯对穷人和富人的定义应该说基本上是正确的：凡所有不足以满足其需要的是穷人，凡所有不仅足够而且有余的是富人。这个定义有些毛病，即“需要”一词稍显模糊性，应该改为“基本需要”更合适一些，不过尤苏戴莫斯的本意就是如此，只不过表达不准确而已。苏格拉底大概是利用了“需要”一词的含糊性，从此出发否认了区分穷和富的客观标准，而引进一条新的标准即心理标准。有些人所有虽然很少，却不仅足够，而且有余，而另一些人所有虽然很多却仍然不够。这句话准确地表达应是：有些人虽然所有很少，但觉得自己不仅足够而且有余（如苦行僧、哲人及清贫而高尚智慧的人士），有些人虽然所有很多，但仍嫌不够（如挥霍无度的暴君、贪婪的商人）。苏格拉底显然是和这条心理的标准偷换了尤苏戴莫斯提出的区别贫富的客观标准，从而由此推出僭主也是人民（穷人），而所有不多出的那种现象（有些穷人很知足，有些富人则欲壑难填），也不能由此就否认贫和富的客观标准（这一标准根据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状况，是可以数量来表示的），因此也绝不能推出僭主是穷人，而只是想通过归谬法否定尤苏戴莫斯的观点，迫使他承认自己无知。尤苏戴莫斯果然垂头丧气地承认自己无知，这实在是上了苏格拉底的当。

苏格拉底的助产术的目的就是要否认人们既有的一些知识。但这些都



知识中显然包含许多正确的因素和成份。那么苏格拉底又怎样使人们获得真知呢？他要求人们回到自己的内心，寻找自己固有的德性和理性。但我们却可以推理，这种脱离和否定人的经验知识的先验知识是完全空洞、抽象和虚幻的东西。

#### 四、运用反证法，论述什么是勇敢

在柏拉图的对话《拉刻斯篇》中，记载了和拉刻斯等几个著名雅典将领关于什么是勇敢的一场争辩，其过程如后。

苏格拉底：尼开阿斯，拉刻斯啊，我们还是按吕雪马科斯和马里雪斯的吩咐做吧！我们刚才研究的问题是：在这类教育上哪些人是我们的老师？我们自己又可以改进哪些人？再向自己问问这些问题是没有坏处的。不过，我认为另一条研究途径也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而且还可能会从更接近于第一原则的地方出发。如果我们知道一件事物和另一件事物相联结，那么我们显然知道这件事情本身，也就可以提出意见如何才能最完美、最省力地获得它。可能你们还没有明白我的意思，但我这样说，你们就会很快理解。如果我们知道视力与眼睛相结合可使拥有它的人眼睛变得更好，并且也能把它给予眼睛，那么我们显然知道视力的性质，就可以设法知道怎样才能最完美、最轻易地获得它。如果我们不先知道什么是视力，什么是听力，那我们便很难证明自己是关于眼睛和耳朵以及什么是获取听力和视力的最好方式的真正的参谋或医生。

拉刻斯：确是如此，苏格拉底。

苏：拉刻斯，现在不是有两个朋友请我们参谋用什么方法可使德性与他们的儿子相结合，从而改善他们的灵魂吗？

拉：是的。

苏：那么我们不是应该先知道什么是德性？因为如若我们对德性到底是什么一无所知，那么怎么能告诉别人以什么最好的方式去获得它？

拉：我想不可能，苏格拉底。

苏：那么我们说，拉刻斯，我们知道德性是什么吗？

拉：当然。

苏：知道的东西也一定能够说出来？

拉：怎么不能？

苏：朋友，我们不要直接研究整个德性，那是我们难以胜任的。让我们先考虑一下，我们是否对其某些部分具有充分的知识。这样可使我们的研究轻松些。

拉：就让我们照你的进行吧，苏格拉底。

苏：我们选择德性的哪个部分？我觉得以披甲而战的技能为对象显然比较合适，它一般被认为是勇敢，不是吗？

拉：确实是这样的。

苏：拉刻斯，先让我们努力说明，什么是勇敢，然后我们研究青年人如何通过追求或学习而获得它。来吧，照我所说的，请先告诉我，什么是勇敢？

拉：苏格拉底，我觉得这根本不难回答，一个能坚守岗位、与敌拼搏而不逃跑的人，你就可以说他是勇敢的。

苏：不错，拉刻斯。不过，我恐怕得受到责备，可能是因为我把问题说得太含糊，就使你答非所问。

拉：什么意思，苏格拉底。

苏：我会解释的。你认为，坚守岗位，与敌拼搏的人是勇敢的。

拉：我是这样说的。

苏：我也同意。但是，这另一个人怎么讲？他跑动着与敌人战斗，而不停留？

拉：怎么跑动？

苏：例如，据说斯库塞人作战，躲闪的次数不少于追逐的次数。再，你知道荷马赞美过阿尼安的马，说它们善于追赶也懂得在惊恐中怎样急速躲闪，他也称赞阿尼安自己具有这种惊恐的知识，称他是“惊恐的参谋”。

拉：非常恰当，苏格拉底。荷马谈的是马车，你谈论的是斯库塞的骑兵。骑兵固然是这样作战的，但重装步兵却是如我所述的那样。

苏：拉刻斯，或许斯巴达人例外。据说在普拉德之战中，当斯巴达人遇到持藤盾的敌人时，他们不是坚守岗位与他们作战，而是撤退了。但当波斯人的列队被打垮后，斯巴达人也像骑兵一样四处奔跑着攻击他们，取得了重大胜利。

拉：你所说的都是事实。

苏：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说我把问题讲得含糊不清应受责备的原因，也是你答得不妥当的缘故。我要你回答的不仅仅是重装步兵中的勇敢的人，也是骑兵及所有战士中勇敢的人；不仅仅是战争中的勇士，也是在海上航行的勇士以及所有的疾病、贫困以及公共事务中的勇敢者；不仅仅是抵御痛苦和恐惧的勇士，而且也是抵挡欲望和快乐的刚勇之士，无论他们是坚守岗位还是进击敌人。——拉刻斯，在所有这些行业中，勇敢的人都是存在的。

拉：是的，非常多。苏格拉底。

苏：所有这些人都是勇士，但他们有些在快乐方面勇敢，有些在痛苦方面勇敢，有的在欲望方面勇敢，有的在恐惧方面勇敢，而其他，我想在这方面怯懦。

拉：肯定如此。

苏：那么一般的勇敢和怯懦是什么呢？这就是我要知道的。所以，请你再作努力。先告诉我，勇敢，即在所有这些行为中都共同的性质，是什么。你们不理解我的意思吗？

拉：没有完全理解。

苏：我的意思是这样，譬如，我问什么是快，它是我们在跑步、弹竖琴、说话、学习以及其它许多活动中都能找到的，也是我们在任何值得一提的，无论是关于手的，脚的，嘴的还是言语的，理智的活动都实际拥有的。你不是也这样使用这个词吗？

拉：是的。

苏：假如有人问我：苏格拉底，在所有这些活动中被你称为快的这个东西究竟是什么？我就回答说：“在很少的时间内能做许多事情的能力就是快，无论是在说话中、竞赛中还是在其它活动中。”

拉：你的回答十分正确。

苏拉刻斯，现在请你以同样的方式告诉我，在快乐、痛苦及刚才我们提到过的一切事物中都存在的被称为勇敢自身的究竟是什么？

拉：如果一定要说在所有这些事物中的本性，那么我觉得勇敢是灵魂的忍耐。

苏：要回答别人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必须如此，不过，我觉得并不是每一类忍耐都可以被你认为是勇敢。根据是这样的：可以肯定，拉刻斯，你是把勇敢放于高贵品质之列的。

拉：你完全可以肯定，它确实是位于高贵的品质之列的。

苏：忍耐与智慧结合是美好的、完满的。

拉：当然如此。

苏：它与愚蠢结合呢？不是反而显得是邪恶的，有害的吗？

拉：是的。

苏：你不能说，这种既邪恶、又有害的东西是高贵的吗？

拉：我的话不恰当，苏格拉底。

苏：那你就不会认为这种忍耐是勇敢，因为它不是高贵的，而勇敢却是一种高贵的品质。

拉：你说得很正确。

苏：这样，根据你的观点，只有智慧的忍耐才是勇敢。

拉：看来是这样。

苏：那么，让我们考虑一下，它在什么事情上智慧。在所有的大小事情上吗？举个例子说，如果一个人在花钱方面能明智地忍耐，因他知道花钱的结果将会使他挣得更多。你会称道他是勇敢的人吗？

拉：不，我不会。

苏：如果一个人是医生，他的儿子或其他人患了肺炎，恳求他允许吃点什么或喝点什么，他却不加理睬，强忍着拒绝了。你说他勇敢吗？

拉：这和上面所说的一样，根本不是勇敢。

苏：如果一个在战斗中忍耐，坚持战斗，因他通过聪明的推断，知道会有人来帮助他，而跟他敌对的力量与跟他同盟的力量相比是弱小的，此外，他还占据着有利的地理位置，你说是具有这种智慧和准备的忍耐者勇敢呢？还是在敌军中一个坚守阵地，与敌作战的忍耐者勇敢？

拉：我要说的是敌军中那个忍耐者勇敢，苏格拉底。

苏：但是他的忍耐远比前一个的忍耐傻。

拉：没错。

苏：那么在骑兵战中一个具有马术知识的忍耐者就不如一个没有这种知识的忍耐者勇敢？

拉：我想是这样。

苏：精干投术、射术或其它技术的忍耐者也同样情况？

拉，肯定。

苏：一个人要下到井中去潜水，他不擅长潜水这类事情，但他却坚持要去从事这种活动，你说他比那些擅长此道的人更勇敢？

拉：人们还能说其它什么呢？苏格拉底。

苏：如果一个人这样想的话，当然不可能再说其它。

拉：但我是这样想的。

苏：拉刻斯啊，这些人的冒险和忍耐比有技术做同样事情的人要蠢

得多。

拉：这很明显。

苏：前面说过，愚蠢的鲁莽和忍耐是低劣的，有害的。

拉：是的。

苏：而勇敢被认为是一种高贵的品质。

拉：没错。

苏：可我们现在却反过来说愚蠢的忍耐这种低劣的东西是勇敢。

拉：我们是这样说的。

苏：我们说得对吗？

拉：我想我们是错了，苏格拉底。（柏拉图《拉刻斯篇》189D—194B，引自上书 215—220 页）。

《拉刻斯篇》是柏拉图的早期对话之一，比较真实地表现了苏格拉底的思想。此篇是苏格拉底与拉刻斯等几个著名的雅典将领的谈话，探讨什么是勇敢。在论辩中，拉刻斯等人自信对勇敢是极为了解的，于是回答苏格拉底说“勇敢是能坚守岗位、与敌拼搏而不逃跑”。苏格拉底举出反例说，斯库塞骑兵习惯于跑动着与敌人作战；于是拉刻斯退一步说，重装步兵的勇敢是他所说的那样，苏格拉底进一步举出反例说，斯巴达步兵象骑兵一样奔跑着四处攻击敌人。辩论至此，苏格拉底点破了拉刻斯回答的毛病：苏格拉底问的是，在所有的行业、行为和性格方面，勇敢是什么，也就是说，勇敢的一般含义是什么？而拉刻斯答非所问，只是列举某一种具体的勇敢行为。应该说，这确实是苏格拉底高明的地方——他不满足于停留在对个别的、具体事物的认识上，而要求从具体上升到抽象、从个别上升到一般，找出同类事物的共同本质。

拉刻斯按照苏格拉底的要求给出了一个一般的定义：勇敢是灵魂的忍耐。苏格拉底对这个回答还是不满意。他举出反例说，愚蠢的忍耐不算勇敢，拉刻斯只好退一步说，只有智慧的忍耐才是勇敢。辩论至此，就应该结束了，可苏格拉底为了达到揭露对方无知的目的，又进一步证明智慧的忍耐也不是勇敢的。他的论证方法是诱导对方承认一些无知的忍耐行为是比有知的忍耐行为更勇敢的，而既然前面已经证明了愚蠢的忍耐不是勇敢，所以以知识为基础的忍耐就更不是勇敢了。但是他举出的那几个例子都是不能成立的：具有某种知识（如知道吃喝对病人不利、知道敌我力量的对比）的人、具有某种技术（如骑术、投术、射术、游泳术）的人绝不比一个不具有这种知识和技术的人怯懦；一个不会潜水的人偏要下井去潜水，根本就不勇敢。

亚里士多德曾经指出：苏格拉底追求普遍性的定义，但还没有使普遍性的定义成为孤立的东西，只是到了柏拉图，才把一般概念当成脱离感性事物而独立的东西即“理念”。实际上，苏格拉底故然还没有创立完整的理念论，但却是理念论的真正奠基人。在他的思想中，客观事物的本质已开始与其现象相分离，正如在人这里，灵魂已开始与肉体相分离。在《拉刻斯篇》中，苏格拉底之所以要千方百计迫使对方承认自己的无知，就是要使对方抛弃一切经验知识，而返回到人的理性自我，而只有这个理性自我，才能把握住对象的绝对本质，但是对象的本质一旦绝对化，就存在着与对象的感性存在相分离的趋势，也就是说，本质趋

向于个体化，成为与事物现象相分离的独立存在。勇敢正是如此：勇敢不仅是许多勇敢行为的共同本质或一般性质，而且又是“勇敢自身。”这个“勇敢自身”，在苏格拉底看来，是用一般的经验归纳方法得不到的，只有理性自我才能得到，这就是为什么苏格拉底要难倒拉刻斯的缘故。

苏格拉底的讲演、论辩故事还有很多，而其特点从上述几个方面，已可以略见一斑。

## 林 肯

“ 所有黑奴从现在起永获自由 ”

美国第 16 任总统阿伯拉罕·林肯，是美国历史上继开国之父华盛顿之后最伟大的总统。这位诞生于肯塔基，在中西部辽阔大草原成长起来的最纯粹美国人，具有独特的精神力量和伟大的人格，他是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传奇人物。

林肯是北美大陆所能够产生出来的真正的美国英雄，他的历史就是他那个时代的美国人民真正的历史，他一步一步地走在美国人民前面，与他们步伐一致，有时稍稍快上那么一点，他是这个大陆的真正代表。

林肯为人类解放了黑奴，使人类历史不再蒙受更多的耻辱。他只是以自己的行动表达了人类最朴素也是最高贵的常识：黑人也是人。他是一切普通劳动者、大地和海洋的亲密朋友。

在林肯的奋斗生涯中，他以他那略带肯塔基乡音的伟大演说不知唤起了多少人勇往直前的信心和激情，使美国的航船沿着他这个船长兼水手的目光胜利前进。林肯的演说是世界演说史上辉煌的篇章。今天，那些堪称典范的演说得以产生的历史背景消逝已久，但演说之中那诚挚的心声，雄峻的气势和独具魅力的人格形象，依然令人如在现场，热血沸腾。

他，阿伯拉罕·林肯，属于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演说家之一。

### 荒野上劈木做栅栏的人

1809 年 2 月的一个星期天早晨，林肯诞生在肯塔基高山深谷怀抱中的诺布河农场。这里的土地贫瘠坚硬，一间用附近森林里砍伐的圆木搭起的小木屋，是林肯最初的家。这栋小房子的地面用泥土夯实，只有一扇用兽皮做铰链的门和一扇小窗。初生的林肯睡在铺着玉米皮和鸡毛的木床上。

林肯从小就是一个体力劳动者，一个能干的蓝领工作者，一个整日从事户外活动的孩子。他提水、搬运劈材、清扫院子，还要在豆子、洋葱和玉米地里锄草，小小的双手磨起了茧子。

林肯 7 岁时，父母带着他和姐姐以及 4 匹马把全家搬迁到俄亥俄州鸽子河边的高地上。这是一个非常艰苦的地方，全家人都投入垦荒种庄稼。吃的是从附近森林里打来的熊、鹿、野火鸡和野鸭；春末到深秋，林肯和姐姐赤脚去森林里采野果回家，他们还得到很远的地方去打泉水，这是一个缺水的地方。

林肯 9 岁那年秋天，34 岁的妈妈病逝，他们把她埋葬在被秋色染红的橡树下。接下来的日子两姐弟更加艰苦地开荒种地，等待出门去找新妈妈的爸爸回家。

不久，爸爸驾着一辆四驾马车，带着新妈妈回来了。新妈妈是爸爸年轻时候爱过的一位女友，后来她嫁给了别人，又守了寡，独自带着 3 个孩子过活。

现在小林肯的家里一下子有了 7 口人了，有时非常热闹。新妈妈面色红润、健壮、高大，她是一位举止端庄、和蔼可亲的妇女，做得一手

好针线活，很会理家。她对上帝有一种朴素的感恩之情，生活很苦，她从未怨言，而只是默默地劳动。继母对林肯的影响很深，他后来承认这个妈妈是他一生中一股强烈的、无声的感染力量。每当他有烦恼时，新妈妈总是比别人更能理解他。

林肯 8 岁时开始上学。但学校条件极差，老师也是临时的，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老师一走，学校也就关门，小林肯全部上学时间加起来还不到一年。

但他是一个书迷，他读遍了凡是能找到的书。他坐在大树底下，坐在炉火前读书，边读边捡起石块和木炭在地上写写划划。他还经常帮邻居居家干体力活，获得的报酬是借阅他们家的书籍，大家都喜欢这个四肢发达，但头脑可不简单的孩子。有一次，他读了《肯塔基教师》这本书，就提出了旁的孩子所提不出的问题：“谁最有权利控诉？是印第安人还是黑人？”没人能够回答，于是他就在玉米地里对这个问题大发议论，这就是这位后来成为大演说家的男孩子最初的演说吧！

林肯 17 岁时，身高已接近 6 英尺 4 英寸，手臂修长，肌肉发达。作为一个全劳力他干着成年男性所有的工作：伐木垦荒，劈栅栏木条，挤牛奶，种庄稼，滚放圆木，杀猪宰牛。整日不离手的工具就是一柄亮闪闪的斧头。

少年林肯非常善于从各种途径学习知识和文化技能，他后来称自己的学问是“随手捡来的”。家里的信和邻居的信都归他写，他总是边写边念，狠狠地要求自己：“这样写是不是最好的？如果不是，那又该怎样写？”由于有这样的基础，林肯后来的演说词都是自己撰写。

他对演说也极有兴趣。他经常徒步 30 英里，去一个法院听律师们的辩护演说，学习他们的辩论技巧，甚至他们那些有趣的手势。有时一些云游路过的福音传教士前来村里布道，林肯也跟着他们，模仿他们挥舞手臂，滔滔不绝的样子。

1830 年夏天，21 岁的林肯已成为有选举权的法定公民，他投奔到伊利诺斯州表兄的农场，立即垦荒盖房，还和表兄一起为两户邻居劈了 3000 根做栅栏的木条。也是在这年夏天，林肯在伊利诺斯州发表了首次政治演说。过去，他作为荒野上的少年曾站在树桩上，对着庄稼和大树作过无数次演说，但没有听众，而且和政治无关。

在一家商店门前，林肯碰见两名众议员候选人在发表竞选演说，林肯兴致勃勃地听了一阵，觉得他们还没有说到点子上，于是分开人群，发表了一篇演说，提出疏通当地一条河流以利航行的主张。林肯对这个问题有相当的发言权，因为 18 岁时，他就是美国文明的大动脉俄亥俄河上，一位自己造船自己驾驶的老水手了。听众们觉得这个高高的小伙子说得实在内行，报以热烈的掌声，两名议员候选人还亲切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1831 年，22 岁的林肯作为一个水手来到国际港口城市新奥尔良，这是年轻的林肯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的一个拥有 4 万人口的大都会。城市极其繁华、喧闹，各国水手在街上走来走去，他们是欢乐自由的人；但林肯同时还看见成群结队的黑人奴隶，他们都带着铁锁链。街上和码头随处可见许多奴隶贩子的广告。这些广告如此普遍，以至于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格式：“愿随时出最高价格购买各类黑人，立付现金；也可代客

销售，收取佣金，特设专供存放黑人的圈栏和牢房。”“出售——7 到 18 岁壮实的女孩数名，24 岁的妇女一名，25 岁能干的妇女一名，外带壮实的小孩三名。”“购买——愿以最高价现金购买 18 到 25 岁的壮实黑人 25 名，男女均可。”

青年林肯看着这些将黑人像农具、牲口和土豆那样买卖的广告，心灵的震撼可想而知，但此刻离他作为美国总统颁布对黑奴的《最后解放宣言》还有漫长的 32 年。

林肯在 25 岁之前一直没有固定职业，社会地位卑微。为了谋生，他在美国大地上漂泊迁移，辗转许多城镇，当过水手、店员、土地测量员、邮局职员，还扛枪当过临时性的民兵，对付印第安人的“黑鹰”部队。他 23 岁时第一次参加州议员竞选，结果失败。

这次竞选他是充满信心的，他极力主张兴办教育、出版、宗教和改进内河航运的事业。他的抱负是想使自己成为一个值得同胞尊敬的人，得到他们真正的尊敬。为此他坦率地向选民们声明：“我出身于并一直生活在最卑微的阶层之中，我没有有钱有势的亲友的支持。”

竞选失败后，林肯的处境十分不妙。多年以后，他这样描述当时的境况：“那时手头拮据，职业也没有着落，尤其是因为无处投奔，所以渴望同那些一向慷慨相待的朋友们呆在一起。究竟该干什么——想学铁匠，又想研究法律，但又觉得在受教育不多的情况下，恐怕不会有成功的希望。”

我们在今天读到这段晦暗的心声，不禁为美国历史大捏一把汗：幸亏林肯没有去学铁匠。依林肯的性格，他一旦决心走上打铁的道路，肯定会成为美国最棒的铁匠，但美国就少了一位伟大的总统。

林肯在这段时期内一边做零活，打短工，帮人劈栅栏木条，在磨坊磨小麦。一边苦苦地攻读更为高层次的书籍。他在少年时代早已把《圣经》、《华盛顿传》背得滚瓜烂熟，这时他研究了沃尔内《帝国之灭亡》，吉朋《罗马帝国衰亡史》，以及美国独立战争的“助产士”、华盛顿的友人托马斯·潘恩的政治理论名著《理性时代》，这些杰出的著作为以后他作为总统统帅一片大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还利用当邮局职员之便，研读各种报刊，观察和掌握全国政治动向。尤其是《国会环球报》上刊载的华盛顿国会议员们的演说全文，常常使他激动不已，也许他感到，只要有会，他，阿伯拉罕·林肯，将演说得更好！

这期间林肯生活在普通百姓之间，他深知他们的一切贫困和不幸，乐于帮助他们。他当店员时，为了退还一位妇女多付的几美分，他步行 6 英里赶上了她。一个寒冬，他看见邻居小伙子用破布裹脚当鞋子，就用自己劈柴挣来的钱给他买了一双鞋。大家都喜欢这个年轻人，称他为“诚实的阿伯”、“善良的阿伯”。

1834 年，林肯竞选州议员成功，这年他 25 岁。这是他有生以来获得的第一个重要的政治职位，也使他获得了有生以来最高的薪金。从此他开始了自己正式的、漫长的政治生涯。

林肯在这届议会期间十分活跃，积极提出各种议案：从建立新的州银行到开凿新运河，非常引人瞩目。几年间，林肯这块自称“漂浮不定的浮木”，终于成为持有开业证的律师，州议会议员和议会中的辉格党领袖。林肯经常发表扣人心弦、卓尔不群的演说，抨击时政。他此时的



反奴隶制立场十分鲜明。有一次州议会表决一项维护奴隶制的议案，全体议员 77 票赞成，只有林肯在内的 5 名议员投反对票。林肯还公开提出书面抗议，提出“奴隶制度是建立在非正义和错误政策上的，合众国会依照宪法有权在哥伦比亚特区废除奴隶制度”等进步观点。

据一个同时代的目击者描述，这时的林肯“瘦骨嶙峋，皱纹满面，不修边幅，简直到了粗鲁的程度。然而他却有某种深得人心的魅力和气派。”

### 崭露头角的竞选演说高手

1838 年，林肯骑马来到斯普林菲尔德，在这里开起了他的律师事务所。针对当时一些暴徒疯狂攻击废奴主义者的风潮，林肯在该县青年学会作了一次题为《永葆我国政治制度的青春》的演说。林肯向满堂年轻的听众说道：

“美国独立战争的前辈们抛头颅、洒热血为我们赢得的权利，现在正在受到侵犯。无论什么时候，如果听任一小撮歹徒聚众闹事……任凭他们焚烧教室，抢劫仓库，把印刷机扔进河里，枪杀编辑，随心所欲吊死或烧死他们所讨厌的人，而又让他们逍遥法外，那么我可以断言，这个政府必定是短命的。”

这篇演说是林肯 29 岁前发表的思想与语言俱佳的杰作。他谈到了美国政治传统中一些极为重要的东西：人身自由，个人义务，自由辩论和对未来的无限向往。

在州辉格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林肯发表了另一篇近两小时的演说，反对当时执政的民主党人范布伦总统的金融计划。林肯在演说中列举了民主党高级官员的名字，指控他们盗窃国家资产。在演说结束时，林肯宣誓：

“面对苍天，面对全世界，我立誓永远忠于这个哺育了我的生命、自由和爱情的祖国的正义事业。”

与此同时，一位体态丰满、性格活泼的小姐闯进了林肯的生活。她叫玛丽·托德，是肯塔基银行行长的女儿，父祖辈都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玛丽既泼辣又有才华，受过良好的淑女教育，会讲法语，追求者很多，但她不顾家族的反对，相中了林肯这个不是“门当户对”的年轻议员。她断言，林肯大有前途，是她最满意的对象。他们于 1842 年结婚，林肯 33 岁，新娘 24 岁。

1843 年 3 月，林肯以辉格党员身份竞选国会众议员，对手是民主党人彼得。此人是一个有名的巡回牧师，一个粗鲁而暴躁的煽动家。他到处散布谣言攻击林肯是一个反宗教的人，说林肯不承认耶稣。林肯立刻予以回击：

“我不属于任何、任何基督教会，这是事实，但我从未否认过

《圣经》的真理，从未有意说过不尊重宗教的话，更没有冒犯过任何基督教派……。”

第二个回合是在一次宗教集会上。彼得布道滔滔不绝，中途，他对全场教徒和听众说：“一切愿意把心献给上帝和天堂的人，请站起来。”结果站起来了一些男人、妇女和孩子，人数稀稀拉拉。彼得见状，只好又说：“一切不愿下地狱去的人请站起来。”顿时全场的人都站起来了，只有林肯仍旧坐在那里。

彼得觉得这是一个绝好的进攻机会，就用最严肃的声调说道：“我看到很多人表示愿意接受第一个劝导，把自己的心奉献给上帝而进入天堂。我又看到除一个人以外你们所有的人都表示不愿意下地狱。这个唯一例外就是林肯先生，他两次都没有作出反应。林肯先生，我可以问问你吗？你要到哪里去呢？”彼得此时觉得自己已胜券在握。这确实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逼问。

只见林肯慢慢地站起来，只回答了一句话：“我要到国会去！”全场人无不为之折服，彼得更是顿受挫折。

竞选结果林肯获胜，成为国会众议员，他的下一个活动天地就将是首都华盛顿。这次竞选最有趣的是，辉格党的朋友们凑了 200 美元给林肯作竞选经费，但选举结束后，林肯还给他们 199 美元 25 美分，他在竞选中只花了 75 美分。

林肯所在的辉格党主张保护关税制。他是如此形象而极有说服力地为这种主张辩护的：

“在世界的原始时期，上帝对我们人类的第一批人说：‘你必须汗流满面，才可得食。’从那时以后，如果我们不首先付出劳动，那么除了地球上的阳光和空气以外，就不会有什么美好的东西供我们享用。既然大多数的好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那么可以得出结论说：享受这一切东西的权利，应该属于那些用自己的劳动生产出这些东西的人们。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有史以来偏偏总是有一些人劳动，而另一些人却不劳动，却享受了大部分劳动果实。这是错误的，这种情况不应该再继续下去。要力求使每个劳动者得到他劳动产品的全部，或尽可能接近全部，这是任何一个贤明的政府最值得为之努力的目标。”

“政府怎样办到这一点呢？有一个补救措施就是：‘尽量消灭无益劳动和游手好闲的现象。’例如，美国有能力大量生产铁和一切铁制品，耗费的劳动也不会超过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因此，把铁和铁制品从国外运到美国的一切劳动都是无益的劳动。至于棉花，为什么不就在产地和消费地把棉花纺成纱织成布，从而省去运输的无益劳动呢？”

林肯在华盛顿国会众议院期间，处理有关请愿、任命、抚恤金、选民证以及有关公路、河流、运河和港口等问题，工作努力，一丝不苟。有时，他觉得这里的议会争论和诡辩与他在当州议员时所体验到的，没什么两样，但他总是抓住机会，根据良心和真理发表演说，反对政府一

切不义之举。1845年，美国吞并了原属墨西哥的得克萨斯。第二年美军越过格兰德河，侵入墨西哥境内，两年之间，夺取了格兰德河以北的墨西哥全部领土，面积超过德法两国版图的总和。

林肯为此在议会要求总统向众议院说明“我们的公民第一次流那么多血的准确地点，”他直接暗示，总统曾经命美国军队开进并未确定是美国国土的地方。总统试图“用说明真相的办法来证实即使他说明全部真相也无法证实的东西”。

接着林肯干脆在众议院发表演说，抨击总统的侵略行为。他的演说带有华盛顿、杰斐逊这些美国伟人和美国独立战争时代的革命气息：

“总统发动对墨西哥的战争是没有必要和违反宪法的。……每当总统认为有必要击退侵略而实际上去侵略邻国时，如果允许他为所欲为，那就等于说，无论何时只要他一说有必要击退侵略，就容许他随心所欲地发动战争。”

“任何地方的任何人民，只要有决心和力量，就有权起来摆脱现政府，组成一个更适合他们的新政府。这是最宝贵、最神圣的权利。……这样的人民中的任何一部分，只要有能力革命，就可以革命，使他们所居住的全部领土成为自己的国家。不仅如此，这样的人民中的任何一部分的大多数也可起来革命，镇压跟他们杂居在一起或居住在他们附近的那些有可能反对他们的革命运动的少数人。不遵循旧的路线或旧的法律；而把旧的路线和法律破掉，建立新的，这是一切革命的特点。”

林肯的演说有时言辞既锋利，又幽默，充满来自民间的那种辛辣的喜剧效果。他在国会攻击民主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卡斯将军时说：

“卡斯的当选肯定会使奴隶制进入我们现有的领土。卡斯将军9年间从政府手中每天领取10份口粮，每年共计730美元。议长先生，我们都听说过那头站在两垛干草之间犹豫不决因而饿死的牲口的故事。而这种事情决不会发生在卡斯身上，即使把两个干草垛放在相距1000英里远的两地，卡斯将军也会一动不动地站在两垛草之间，同时吃掉两堆干草，就连沿途的青草恐怕也不会放过。”

在另一次演说中，林肯还把自由土地党的政纲比喻为北方小贩叫卖的裤子，大得足可给任何大人穿，小得可给任何小孩穿。

林肯在生活中也是一个幽默的人。他早年的一个朋友回忆林肯时说：“他讲起笑话来，简直会使人笑破肚皮。我从来没见过一个真正的滑稽演员，而林肯肯定称得上一个。有时我又见他的神情极为严肃，可以算是美国最严肃的人。”

担任国会议员的林肯开始穿礼服了，白衬衫的洁白领口上打着精致的黑绸领结，鬓角留到齐耳朵的四分之三处，似乎有了一副绅士的形象，但林肯就是林肯，还是有人认为他不修边幅，说他的裤管经常翻起，头发蓬松，背心皱巴巴的，一点都不平顺。

林肯在一届众议员任期满职后，拒绝再度竞选，回到斯普林菲尔德

重操律师旧业。他信奉自己早年赠给友人的一句话：悲伤之时，工作就是良药。他热爱法律，全部精力投在律师事务上，走遍了伊利诺斯州的各个城镇，对老百姓的生活了如指掌。同时他大量阅读一般报纸和《国会环球报》，追踪美国的政治方向。

1856年，林肯由辉格党转入共和党，很快就成为该党核心人物，深得众望。这一年共和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在费城召开，林肯并未出席，即被选为该党副总统候选人。

在随后开展的竞选活动中，林肯在伊利诺斯州作了50多次演讲，声明本党共和党与民主党的分歧在于对奴隶制的态度上。所到之处林肯都积极反对奴隶制，他说：

“我们将为争取自由和为废除奴隶制度而斗争，直到我国宪法保障言论自由，直到整个辽阔的国土上，在阳光和雨露下劳动的都是自由的工人。”

“无论什么地方奴隶制，它最初传入时都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尽管有人炮制了一本又一本的书，力图证明奴隶制是个十全十美的东西，但我们却从未听说有什么人心甘情愿使自己成为奴隶以便从中得到好处。劳动是我们人类共同的负担，而有些人却竭力要把他们分年的负担压到别人肩上，这就是造成人类巨大的、连绵不断的灾祸的根源。”

“我有次曾在法律书中读到，‘一个奴隶是一个人，但在法律上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件物。’现在有人企图破坏自由的保障，如果他们得逞，把所有黑人都变成物，到那时你可以设想，他们开始把贫穷白人也变成物的日子难道还会远吗？”

林肯的演说逻辑十分严密，充满不可辩驳的战斗性：

“你说甲是白人而乙是黑人，白人就可奴役黑人，那么，就是以肤色为依据喽。难道肤色浅的人就有权去奴役肤色深的人吗？那你可要当心。因为按照这个逻辑，你就要成为你所碰到的第一个肤色比你更白的人的奴隶。”

“你说你的意思不完全指肤色吗，那么，你指的是白人在智力上比黑人优异，所以有权去奴役他们吗？这你可又要当心。因为按照这个逻辑，你就要成为你所碰到的第一个智力比你更优异的人的奴隶。”

“你说这是个利益问题，只要你能谋取你的利益，你就有权去奴役他人。那么好吧，如果别人也能谋取他的利益，他也就有权奴役你了。”

联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当时在一件黑奴纠纷案中判决宣布：“黑人奴隶或者其祖先是奴隶的自由黑人，均不能成为美国公民。宪法中的‘公民’一词原意不包括黑人。一个多世纪以来，黑人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劣等种族，无论在社会或政治事务中，他们都根本不配与白种人打交道。黑种人是如此低劣，以致他们不配享有白种人非尊重他人不可的权利，

使他们成为奴隶是正当和合法的，对他们是有好处的。一个奴隶是一份财产，凡是有利可图时，黑人都可以被当作一件普通商品和货物进行买卖和处置。”

针对这种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名的腔调，这种以貌似公正的宪法和历史为基础的政治理论，林肯强压着满腔的沉痛反击道：

“在我看来，我们退化的速度是相当快的，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是从宣布‘一切人生来平等’开始建国的。我们现在却把它读成‘一切人生来平等，但黑人除外’。当一无所知党人掌权时，它就会变成‘一切人生来平等，但黑人以及外国人和天主教徒除外。’如果真的到了这种地步，我宁可移居到某个并不自诩热爱自由的国家去——比如，到俄国去，在那里，专制政权可以赤裸裸地横行肆虐，而无须掺杂卑劣的伪善成分。……如果那些起草和通过宪法的人相信奴隶制是件好事的话，那么为什么他们还要在宪法中写上1808年后禁止奴隶贸易这一条款呢？”

林肯有时的演说变得极其强硬，似乎预言了后来南北战争中他作为联邦总统的坚定立场。针对民主党散布的论调：如果共和党人的总统当选，必将导致联邦解体，林肯激奋地质问：

“谁是分裂主义者，是你们还是我们？我们是多数，我们决不会挖空心思去解散联邦，如果有人打算这样干，那必定是你们这些大叫大嚷地诬蔑我们是分裂主义者的人。可是在任何情况下联邦都不会解散。我们连想都没有想过要解散它。如果你们硬要这样干，我们决不会让你们得逞。我们有金钱和武器，陆海军和国库也在我们手中，受我们指挥，你们是万万办不到的。多数派拥有纪律严明的陆海军部队和充实的国库，而少数派则没有武器，没有纪律，没有组织。如果一个多数派政府在遭受少数派攻击时不能保护自己的话，那么这样的政府未免太软弱无能了。所有关于解散联邦的谈论都是欺人之谈，都是十足的蠢话。我们不会解散联邦，而你们也休想这样做。”

林肯这次竞选虽然未能获胜，但他获得了不少的选票，表明他在全美国已享有一定的声望。此时的林肯，据某时报记者的描述：“身高约6英尺，曲腿，上背微驼，身材瘦削，在他脸上根本找不到清透之处，但作为一个严密的观察家和无法反驳的说理者，很少有人能同他并驾齐驱。他从不攻击旁人的人格和动机，而是采取说理斗争。”

### 与道格拉斯的七场论战轰动了美国

1858年，林肯被共和党一致推举为伊利诺斯州参议员候选人，与民主党人道格拉斯竞选国会参议员。道格拉斯是民主党的著名活动家，州最高法院法官，白种人优越论者，也是律师出身的演说家，身高仅1.52米，以“能言善辩的矮巨人”闻名于世。他承认林肯是一个“能干、忠

厚笃实的人”，是“西部最好的政治演说家”。他非常重视林肯这个竞争对手。

1858年6月16日晚，林肯在州众议院大厅作了《裂开了的房子》的著名演说。为起草这篇演说稿，他花的功夫超过了一生中其他任何一次演说。林肯登上讲坛，全场欢声雷动。许多共和党人都很了解道格拉斯，与他斗了多年，这次推出林肯，打算在这次竞选中收拾他。

“如果我们能首先了解我们的处境和去向，那么我们就能更好地判断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以及怎样去做。自从开始执行一项有着公开宣布的目标和充满信心的诺言的政策以来，迄今已是第5个年头了。这项政策旨在结束由于奴隶制问题而引起的动荡不安，可是在贯彻这项政策的过程中，动荡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据我的看法，不到危机临头和危机过去之后，动荡是不会停止的。‘一幢裂开了的房子是站立不住的。’我相信这个政府不能永远保持半奴隶和半自由的状态。我不期望联邦解散，我不期望房子崩塌，但我的确期望它停止分裂。它或者将完全变成一种东西，或者将完全变成另外一种东西。”

林肯这番演说浅显易懂，他用《圣经·新约全书》中耶稣的话来比喻美国的危机，非常形象，任何农民和铁匠都能理解和领会。最后，林肯展示两种前景供美国选择：

“不是反对奴隶制的人制止奴隶制度的进一步扩展，并使公众相信它正处于最后灭亡的过程中；就是拥护奴隶制的人把它向前推进，直到它在所有的州里——无论是老州还是新州，不论是北部还是南部——都同样成为合法的为止。”

第二天，许多报纸都全文刊登了林肯的演说。全国都对演说开头一段的比喻大感兴趣，影响巨大。

道格拉斯的竞选演说则动用了中央铁路公司的专车、铜管乐队、各色彩旗和五彩缤纷的焰火，以及大批侍从、保镖和礼炮，他在整个竞选中花了5万美元来为自己助威。林肯听见道格拉斯在大街上演说：

“林肯先生明目张胆地鼓吹一次地区之间的战争，一次北部反对南部、自由州反对蓄奴州的战争。这将是一次毁灭性的战争，它将无情地继续下去，直到不是这一方就是那一方被征服，直到所有的州都成了自由州或蓄奴州为止。”

第二天晚上，林肯站在同一个地点对听众说：

“我并不佯言我不喜欢进入国会参议院，我不故作这种伪善的姿态。但我确实要告诉你们，在这一重大的争端当中不论道格拉斯或我自己在今晚以后是否会被别人谈论，这对你们——对全国人民大众——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

林肯和道格拉斯的竞选变成了一场对奴隶制的大辩论，林肯写信向

道格拉斯挑战，要求辩论，道格拉斯应战。两个人将在伊利诺斯的 7 个城市舌战，全美国都拭目以待。报刊记者用新发明的速记法把辩论全文一字不漏发向全国，整列整列的火车载来成千上万的听众，人们在烈日下，在蒙蒙细雨中，在薄雾弥漫的寒风中倾听两人的公开论战。

这次大辩论的规模和影响在美国历史上都是空前的，他们其实是在对全美国演讲，数百万人都读到了辩论内容。后来，这 7 场辩论的演说词结集出版。《林肯——道格拉斯政治辩论集》是一本激情洋溢的书，一本记载着美国的梦想、胜利和失败的年鉴，也是一幅描绘特定年代中的美国人民的精彩画卷。

道格拉斯狂热地宣称要建立一个自由白人共和国，其中劣等种族黑人和印第安人没有公民权：“让每一个州各管各的事而不要干涉它的邻居！”“如果我们都坚持这个原则，那么林肯先生就会发现我们的共和国可以分成自由州和蓄奴州两部分而永远存在下去。坚持这个伟大的原则，我们就可以像现在一样继续前进，使财富积累，人口增加，让一切能使一个国家强大的东西都繁荣兴旺起来，直到全世界都对我们称羨不已，在我们面前战栗不安，直到我们把这整个大陆变成一个以海洋为界的共和国。”

林肯则坚定地捍卫“一切人生来平等”这一原则的绝对含义，坚决反对奴隶制，他质问道：

“你们说奴隶制是错误的，但你们又喋喋不休地争论说这里不是反对它的合适地方。你们说一定不能在自由州里反对，因为那里不存在奴隶制；又说一定不能在蓄奴州里反对，因为它就存在于那里；一定不能在政界反对，因为会引起争吵；又一定不能在布道坛上反对，因为它不是宗教问题。那么究竟在哪里可以反对它呢？那就没有合适的地方来反对它了。”

最高法院曾作出判决维护奴隶制，林肯针对这项判决用辛辣的语言攻击道：

“道格拉斯同他合作的高等法院，已经背离了他的‘人民主权’论，他的论据已经浅薄到像用饿死的鸽子的影子煮的汤一样索然无味。”

道格拉斯说自己并不是残忍的人：“人道主义要求你们，基督教命令你们把一切特权、豁免权和利益给予每一个劣等人和每一个处于从属地位的人，把这些权利赋予他们是符合社会安全利益的。”

林肯则紧追不放，强调奴隶制问题正全方位地从社会生活深处分裂着国家和人民：

“当道格拉斯法官和我自己的可怜的舌头不再动弹时，这个问题在我们的国家里还将继续存在下去。它是两个原则之间的永恒的斗争……”

“一个是人类的普遍权利，另一个是帝王的神圣权利。这和说

‘你流汗受苦，我坐享其成’是一个意思。不论它是用什么形式讲出来的，不论它是出于一个一心想骑在自己国家的人民头上，依赖他们的劳动果实生活的帝王之口，还是出于为其奴役另一种族的丑行辩解的某一种族之口，同样都是残暴的原则。”

7场大辩论的第二场最为精彩，堪称当年“树桩演说之最”。约1.5万人从四面八方赶到边远小镇弗里波特，冒着绵绵秋雨聆听林肯舌战道格拉斯。林肯在这场长达3小时的辩论中，首先冷静地回答了道格拉斯在上次辩论中提出的7个极其敏感的问题，使对手无机可乘，接着，林肯转守为攻，反过来用4个问题向道格拉斯发难，其中尤以第二个问题最为锋芒毕露。朋友们事前曾竭力劝阻林肯提出这个问题，以免过于敏感会因此失去参议员席位。但林肯信心十足地答道：

“先生们，我是在撒大网，捉大鱼；对这个问题，道格拉斯如果回答说是的，他就永远当不了总统，而1860年竞选总统的价值要比现在竞选参议员高100倍。”

林肯的第二个问题是：“联邦某一准州（即未满6万人口的州），在州宪法产生以前，能否用任何合法的手段，不顾合众国任何一个公民的意愿，而把奴隶制从该地区排除出去呢？”

道格拉斯在辩论中，针对林肯咄咄逼人的四大问题，从容作答，游刃有余，始终以自己的观点为主，并且抓住一切机会嘲弄对手，表现出很高的演说和辩论技巧，不失为一大强劲论敌。对于林肯暗伏杀机的第二个问题，他的回答是肯定的，并且强调：“除非得到当地治安条例的支持，否则，奴隶制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存在一天或一小时。”

林肯的问题使道格拉斯进退两难：因为他这次辩论既主张在新的领土是否实行奴隶制问题上实行“人民主权论”，即由该州人民投票决定；他同时又不得不赞成最高法院的一项法令。即认为禁止在准州实行奴隶制为违法。道格拉斯的回答亦在林肯的预料之中，林肯后来评价他的回答时说：“道格拉斯是在用既打击又支持奴隶势力的最为狡黠的方法来赢得人们的支持，这一骗局不会长久。”果然，道格拉斯的这次回答触怒了南方各州极端蓄奴派势力，引起了一场反对他的风暴，许多要求同南方保持联系的北方民主党朋友，也纷纷离开他，终于，他在两年后的总统大选中输给了林肯。

在这场辩论的最后部分，林肯抓住道格拉斯在以前辩论中采用的一件伪证，进行了十分精彩又十分辛辣的驳击：

“在上次辩论中，道格拉斯法官不是把这件事作为他所相信的事实，而是把它作为一件真事提出来的，以期用自己的坦诚来担保这件事的真实性。当全部真相大白以后，当我们考虑到道格拉斯法官是何许人——合众国的一位著名参议员，占有这个职位已达12年之久，其品格与普通参议员不可同日而语，其名声举世皆知——下面这个情况就显得极其异乎寻常了：他竟然把公正待人和谨慎待己的训诫忘得一干二净，以致不顾风险，断定稍作调查就会证明自



己大错特错。（喝彩声）为了解释他的行为，我只能假设，他的鬼才虽然使他终生受益，虽然使他获得了有目共睹，令人吃惊的硕果，例如居然使一大批好人怀疑起美德能否战胜邪恶（喝彩声、笑声）——但是，我只能假设，他的鬼才终于打定主意抛弃他了。（持续喝彩声和笑声。）

“我的时间很快就要用完了，所以有些问题我就不谈了。但是请允许我告诉大家，道格拉斯法官像他在以前几个场合说过的那样，上一次又提到了林肯的粗暴——一个像林肯这样微不足道的人的粗暴——林肯竟然武断地指责大批国会议员，指责最高法院和两位总统，指责他们阴谋把奴隶制推向全国。我要说的是，我根本没有武断地进行过这类指责。我仅仅把能够说明问题的证据摆了出来，让别人也能看懂，我说了我所以为的它们能证明的东西。我也给大家判断这种证明是否成立的方法。我的确这样做了。我根本没有武断地指责过什么人。”

“请再次允许我提醒他，本人的武断也许不能与他的武断相媲美，但或多或少减弱了他对我的提醒所具有的力量，致使我粗暴地对他进行了同样的指责。（热烈喝彩声）

轮到你说了，道格拉斯法官。”

7 场大辩论结束后，林肯在州政府大厦广场上作了最后一次竞选演说，一万听众蜂拥而至，其中有几千套着大车从乡下赶来的农民。人潮一浪一浪往讲台前涌动着，人们都想靠得近点，再近点，以便更好地听见林肯的声音：

“我站在这里，被朋友们团团围住——我深信，其中有些是政界朋友，但全都是私人朋友。在最后这一场演说中，是否允许我讲几句关于我自己的话呢？在这次竞选运动中，我担任了一个吃力的角色，在某些方面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个痛苦的角色。”

林肯用如此亲切的语气开场，全场听众顿时一片安静；当他在结束之前，以誓言般的语调呼吁南方和北方的人民时，全场掌声雷动：

“人们一向说我有野心。上帝知道，我一开始就多么诚恳地祈祷，但愿野心之门不打开才好。我承认我对政治荣誉不是无动于衷的。但是今天，如果密苏里妥协案（该法案规定了在北部若干奴隶制属非法）的限制能够得到恢复，如果由于必要，在坚决反对奴隶制扩展的前提下，整个奴隶制问题在它存在的地方能够重新恢复到‘宽容’的旧基础上来，那么，我考虑在原则上我会欣然同意道格拉斯法官将永不离任，我将永不就任。”

这次竞选结果林肯没有成功。道格拉斯获胜，形势暂时对林肯不利。但林肯预言“另一次爆炸很快会发生。”道格拉斯则会是那次爆炸的牺牲品。林肯对朋友说道：

“虽然我现在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了，而且将被人遗忘，但是我相信，在我本人消失以后很久，我说过的一些话对于公民自由的事业将产生影响。……我就像一个孩子踢着脚趾一样，因痛得太厉害而不能笑，可又因自己已经长大而不能哭。”

最后一句话相当幽默地流露出林肯对这次失败的复杂心情。这次在参议员竞选中击败林肯的道格拉斯，两年后在总统竞选中败于林肯。内战爆发后他支持林肯和联邦。后来在一次号召人民支持联邦的巡回演说中染病身亡。

在接下来的时期内，林肯作为一个演说家和思想家的名声渐渐传播开去。北方一些大实业家和奴隶制反对者认为，为了确保共和党在1860年总统竞选中获胜，需要推出一个出身平民，在个人历史上无懈可击，在反奴隶制问题上具有深得人心的非凡经历的总统候选人。而林肯恰恰符合这些要求。

中西部各州小城镇上的报纸已经开始向人民呼吁：“为什么不选阿伯拉罕·林肯做美国总统？”从堪萨斯到匹兹堡，人们纷纷看好林肯，认为他作为共和党在西部的头号人物，应该跨出一步，站出来！而林肯对这些舆论潮流报之一笑，说道：“只有时势才能造就一个总统。”但深知林肯和当时局势的朋友们断定：时势可能证明别的候选人不是太老朽、太激进，就是太保守，只有林肯才是最合适的人。

这时林肯51岁了。他的名字、作风和他的一些轶事，在西部广为流传，孩子们尤其喜欢听关于这个“老阿伯”的故事。据同时代人描述：“他长得很高，而又瘦骨嶙峋；悠闲自在，可也懒散得出奇；愁容满面，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他是一个‘奇怪的朋友’，又是一个‘友好的怪人’，他活像是从儿童图画书中钻出来的人物。”

所以也只有这个伊索般有趣又充满智慧的林肯才想象得出一个蛇和床的新寓言，来说明让奴隶制进入新地区的危险。林肯说：

“假如有一张床刚为小孩铺好，就有人建议把一窝小蛇和孩子们放在一起，对这个建议我们该如何决定，我想没有任何人会提出疑问的。”

全美国的母亲和孩子们一听这话，顿时毛骨悚然。而对西方政治风潮和议会游戏中经常被玩弄的字眼——民主，林肯则以另一种极其诚朴的声音说道：

“因为我不愿当奴隶，所以我也不愿当奴隶主。这表达了我的民主思想。任何与此不同的想法都不是民主。”

这时的林肯经过政坛风云的几多坎坷，已经成为一名成熟的政治家，他天生是一个诚恳的人，并且把这种诚恳带入到自己的政治生涯之中。他曾经对一个朋友脱口说出一句自己信奉的政治准则，这句带有林肯印记的话既像格言一样单纯，又像诗句一样优美：

“你能在所有的时候欺瞒某些人，也能在某些时候欺瞒所有的人，但你不能在所有的时候欺瞒所有的人。”

对自己的生活与命运，对自己在奋斗道路上的失去和收获，林肯怀着的一颗略带忧伤的心，极其动人。他喜欢对人讲一个印第安纳州的小孩对他脱口说出的一段话，并把这段童心十足的话作为自己的写照：

“阿伯，我想世界上没有哪一个人像我这样喜欢姜饼，而且也没有哪个像我得到的这样少。”

美国当代著名诗人卡尔·桑德堡曾花了30年时间追随林肯的遗踪，他在评价这个时期的林肯时说道：“他在风暴的中心看到历史在形成，他常常是少说多听。在他的眉宇间和气度上含有伟大的诗人、发明家和探险家向未知的领域奋斗的那种高尚的冒险精神。”

在这一年的许多次演说中，虽然林肯一次也没有透露过他第二年可能竞选总统，但他的演说充满简明而果断的语言和无懈可击的逻辑，还穿插着许多引用得当的庄严圣侍，他把道格拉斯和合众国首席法官在奴隶制上的种种借口驳得体无完肤。在谈到由于奴隶制扩展的可能性而使她心情沉痛时，林肯的语调十分忧郁，这使不少听众情不自禁地感到：“这是一个既热血沸腾，又头脑冷静，愿献身于反奴隶制扩张事业的人。这样的人必将成为一个很棒的总统。”

### 通往总统之路上的精彩演讲

1859年一年之中林肯曾旅行4000英里，为共和党作了23次竞选演说，风尘仆仆，精神饱满。他对美国大地的了解超过了其他任何总统候选人，是从底层生活中崛起的政治家：他出生在肯塔基荒野，曾作为一个水手撑着平底船，沿密西西比河顺流而下直抵新奥尔良，并有在首都华盛顿居住和从政的经验。包括边远地区堪萨斯在内的整个中西部，遍及纽约和新英格兰各地，都有人听过他的演说。

林肯的思想言论和他的个人形象在全国各地传播着，形成了一种对他极为有利的气氛。《芝加哥论坛报》一位编辑和林肯长谈一次后，请林肯写了一篇2500字的自传。这位编辑根据这篇自传写了一本32页的小册子《阿伯拉罕·林肯其人》出版，印刷极为精美，发行100万本，每本5美分，全国民众一下子更加熟悉林肯这匹“政坛黑马”了。在这以前，大家对林肯的一些基本情况所知甚少。小册子告诉大家：“他从来没有当过大学或专科学校学生，实际上，在他开业当律师之前，他连大学和专科学校的门槛都没有跨进过。23岁以后，他才开始学习英语语法，……到了40岁，他就整天陷入大量繁重的律师事务中去了。”

千百万拓荒者和拓荒者的后代对这样的叙述更感亲切有趣：“他从劈栅栏木条、拉横锯和长锯、挥直劈斧，耕、耙、种、锄、刈这些活计中懂得了劳动的艰苦；他擅长各种体育运动，在摔跤、跳、跑、掷、投等项目中总是比同年的伙伴领先。”

林肯在竞选中还获得了一个全国闻名的外号：“劈栅栏木条候选人”

或“劈栅栏木条者”。在共和党一次代表大会上，早年和 21 岁的林肯共同劈过栅栏木条的林肯的表兄汉克斯扛着两根扎着旗子和飘带的栅栏木条走进会场，大家都感到惊奇。只见旗子上写着：

“阿伯拉罕·林肯，劈栅栏木条的 1860 年总统候选人：这里是 1830 年汉克斯和阿伯·林肯劈成的 3000 根栅栏木条中的两根。林肯的父亲是梅肯县的第一个拓荒者。”

会场顿时一片欢腾。人们叫道“林肯，林肯，说话呀！”林肯站出来向大家致谢。全场欢声四起：“为诚实的阿伯，为我们的下届总统三呼：林肯！林肯！林肯！”有人说：“辨认一下你干的活儿吧！”林肯走上前抚摸一番后说：“这可能是我劈的木条！不过，朋友们，我要说，我还劈过许多更好看的栅栏木条呢！”

虽然同时有一些报纸反对林肯，说他是“一个三等的乡村律师”，“蠢头蠢脑的乡下人”；“他连语法都不懂，喜欢讲粗俗笨拙的笑话”；“他的老祖宗是一头非洲大猩猩”。还有一些人不断写信逼问他：如果当选，他对奴隶制将采取什么措施，他会干涉吗？

但共和党这个年轻强大的政党已经把林肯塑造成一个美国英雄的形象。几百个竞选演说家，几百家报纸齐声呐喊：“阿伯”、“老阿伯”、“劈栅栏木条候选人”、“边疆林区人”、“诚实的阿伯”、“人民的公仆”。美国人民传统心理上极其喜爱这样的人物：在简陋不堪的拓荒者小木屋里诞生，在荒野上成长，最后他就要搬进白宫。

林肯在大选前夕在纽约市库珀学会的演说极其成功，振奋人心。为了准备这次演说，他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如《国会环球报》、《国会年刊》、《联邦宪法辩论集》和陈年旧报，他花了一个冬季撰写演说稿，因为这次演说的对象听众不是草原农民、蓝领工人，而是大都市那些老于世故、见多识广的市民。虽然大都市芝加哥的报纸《芝加哥新闻与论坛报》完全支持林肯当总统，说他“可以和任何已被提名的候选人媲美。……林肯知识渊博，目光敏锐，他决不会使用阴谋和讨价还价的手段来猎取总统职位。”但林肯从伊利诺斯州出发赴纽约时，伊利诺斯的《纪事报》却嘲笑林肯即将作出的演讲：题目：不详；报酬：200 美元和其他费用；目的：当总统的政治资本；效果：失望。”

当林肯走上讲坛时，用都市人的眼光看上去他显得有点可笑：一个身材瘦高的男人，穿一套好像刚从手提包里取出来的皱巴巴的新黑呢服，而且又不合身，有点长。特别是他一开口，就是一股肯塔基土腔。他开头讲得慢吞吞的，一点不精彩，难道这就是中西部那个最棒的演说家？但当演讲逐渐深入主题时，听众们感到情况为之一变，林肯对时局争端的剖析如此深入浅出，大家明白了：林肯毕竟是林肯！

“当我们的先辈开始组织我们至今还在其治理之下的这个政府时，他们对奴隶制问题的了解跟我们现在一样清楚，甚至比我们现在还清楚得多。”

“这些先辈是谁呢？肯定应该包括第一部宪法的 39 个制定者和制定宪法修正案的 76 个国会议员。……先辈们限制奴隶制的观点同

我们共和党人的观点是不谋而合的。有哪一个先辈曾经说过联邦政府无权控制联邦领土内的奴隶制呢？我敢说，谁也指不出哪个先辈在他一生中说过这样的话。在我们的宪法里既找不到‘奴隶’也找不到‘奴隶制’这样的字眼，甚至找不到‘财产’这个词。……他们称奴隶为‘人’，主人对奴隶的法定权利所用的措词是‘应该享有的服务或劳役’，目的就是要从宪法里排除把人当作一种财产的观念。”

“如果说共和党人是地方性的，那只能说是南部竭力扩展奴隶制的结果。共和党人既不是激进也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是和制定宪法的先辈们一脉相承的。但是，我并不是说我们非要盲目按照我们先辈那样去办不可。这样就会排斥现代经验的成果——拒绝一切进步，拒绝一切改良。”

“有些人说他们不能容忍选举一个共和党人做总统，如果出现这种局面，他们将毁灭联邦。到那时你们会把毁灭联邦的滔天罪行推到我们身上！这未免太厚颜无耻了。这好比一个拦路抢劫的强盗把手枪对准我们的脑袋，咬牙切齿他说：‘站住！留下买路钱，不然我就毙了你，而你就将成为杀人犯！’”

林肯准确的比喻带着一种愤怒，表达了他对联邦的一腔挚爱之情。场内极其安静，只听见烧得白炽的煤气灯发出滋滋的燃烧声，听众们满脸专注的神情，望着讲坛上高高的林肯。只见林肯略略转身，使自己的姿势朝向南方：

“现在，如果他们愿意听的话——我想他们是不愿听的，我愿意对南部人民说几句话。……他们认为奴隶制是正确的，而我们认为它是错误的，这就是全部争论的实质所在。既然他们认为奴隶制是正确的，也就不能责怪他们提出完全承认奴隶制的要求。既然我们认为它是错误的，我们就不能对他们让步，我们就不能放弃自己的观点去投票赞成他们。因为你若想在正确和错误之间寻找中间立场，那就会像寻找一个既不是活着也没有死去的人一样白费力气。”

“让我们坚信正义就是力量。让我们怀着这个信念勇敢地担负起义不容辞的责任并坚持到底。”

林肯最后以对正义、勇敢和责任的召唤结束了演说，话音未落，全场沸腾。他在纽约的首次公开演说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1860年11月6日夜，大选揭晓，林肯获胜。消息传来，州议会大楼和大街小巷一片欢声雷动。林肯跑回家里对他的妻子说道：“玛丽，我们当选了。”此刻，林肯51岁，第一夫人玛丽42岁。

全国总计的票数是：林肯，近200万张，他的劲敌道格拉斯近140万张。有15个州的选举人没有投林肯的票，在南部的十个州里，林肯没得到一张选票。林肯当选总统是美国开国以来最带有地方色彩的一次，但这是共和党的伟大胜利。因为建国72年以来，南部势力左右联邦政权达50年之久。林肯入主白宫，就结束了这种局面。

林肯当选总统后，南北矛盾迅速扩展，他当初担心的事变成了事实：

“美国房子裂开了。”亚特兰大的奴隶主在报上疯狂叫嚣：“不管后果如何——要么血染波托马克河，让血肉模糊的尸体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堆到几十英尺高，要么把最后一丝自由从北美大陆上一扫而光，南部决不会在阿帕拉罕·林肯就职这种侮辱和可耻的事情面前屈服。”

亚拉巴马州一次群众集会上，反对者甚至打出“反抗林肯就是服从上帝”的旗号。

南部各州不断酝酿退出联邦。共有7个植棉州相继从联邦分裂出去，组成了名为“南部联盟”的临时政府。

国会中的南部参议员和众议员也纷纷离去，各地邮政局长、法官、地方检查官、海关税务员向华盛顿递交辞职书。美国正规陆军中的1100个军官中，竟有387人准备辞职。南部分裂出去的各州州长正在调遣军队，占领了合众国许多军事要地，使联邦损失达600万美元。

《纽约先驱报》趁此发表社论，劝林肯在这个关键时刻自动退出南北冲突的舞台，不要就任总统，而让位给某个南北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全国性人物。该报最后危言耸听：“如果林肯坚持目前的立场……他将踉踉跄跄地走进耻辱的坟墓，也许由刺客之手把他赶进去。事后，他将在人们的心目中留下一个比卖国贼更为可鄙的印象。”

林肯当即在《纽约论坛报》上发表一篇声明，针锋相对：

“我不能坐视这个联邦遭到毁灭。我宁死也不同意，也决不会劝告我的朋友们同意作出任何让步或妥协，因人们会认为，我们是用让步或妥协来换取掌管这个国家的特权的，而实际上我们的权力是宪法授予的。”

林肯还说道：“让我们时刻记住所有的美国公民都是一个共同国家的兄弟。”他写信要朋友们坚持立场，决不能容许奴隶制扩展一步：

“在这一点上要像用钢链拉住一样坚定不移。一场恶斗必将来临，与其在今后某个时候出现，不如现在就来临为好。”

林肯接下来是告别伊利诺斯州，赴白宫上任。他清理杂物，自己用绳子捆扎行李箱，然后写好行李标签“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白宫，阿·林肯”。他躲在妹夫家一间无人居住的房间，避开所有的来访者，准备即将于春天在华盛顿发表的总统就职演说。林肯当乡村律师时的同事和挚友拉蒙应邀随他前往华盛顿。拉蒙具有角斗士般的勇气，他带着一把五弦琴和林肯的话“我要你和我在一起，我没有你不成”，随林肯赴任。内战爆发前夕他作为总统私人特使访问南部分裂各州，后来被林肯任命为哥伦比亚特区警察局长。

1861年2月11日，斯普林菲尔德车站笼罩在迷蒙的雨雾之中，林肯在1000多人的送别人群之中，显得有些伤感。成百的老朋友们和他握手道别，大家祝他一路顺风。一位骑马连夜赶来的老农民靠近林肯，用他那几乎看不见什么的眼睛贴近林肯的脸，热泪纵横。他低声感叹：“是他啊，还是老样子，愿上帝保佑你，林肯先生。”

林肯本来不打算讲话，但当他穿过人群，登上专列的台阶，回头望

着这么多的家乡父老朋友时，他取下帽子，沉静地站着，在蒙蒙细雨中慢慢地作了一番告别演说：

“朋友们，只要不处在我的境地，无论谁都不能体会到我离别时的悲伤心情。我的一切都要归功于这个地方和大家的关照。在这里，我住了四分之一世纪，由一个青年变成一个老人。我的孩子都出生在这里，有一个还埋葬在这里。现在我要离开你们。不知何年月再回来，甚至不知是否能再回来。”

“我面临的任务比当年华盛顿肩负的还要重大。上帝曾一直庇护着华盛顿。没有上帝的扶持，我不会成功，有了他的扶持，我就不会失败。我们都信赖能与我同行，也与你们同在并无所不在的上帝，让我们满怀信心地希望，一切都将好起来。愿上帝赐福于你们，愿你们祈求上帝赐福于我。我向你们亲切地告别。”

列车鸣笛东去，林肯惜别家乡。当列车在伊利诺斯州最后一个停靠站停车时，对着拥来车窗前送别的人群，林肯又说道：

“我离开你们是去担当全国的重任，正如你们所知道的那样，它也是十分艰巨的工作。但我们确信，就像某个诗人所说的那样，‘漫天乌云遮不住，太阳依旧逆光辉’，我向你们亲切地告别。”

林肯沿着蜿蜒曲折的铁路线奔赴华盛顿，在途中会晤了 5 个州的州长和一些州议员，还和一些控制着都市政治、金融、供给和运输的要人大亨交谈，发表了 20 几篇演说，同成千上万人握手。谁不想瞧瞧新任的总统呢！在印第安纳州，他谦逊地对同胞们说道：

“我自己只不过是一个伟大事业中的一件纯粹的工具，一件偶然被选中的工具。”

在辛辛那提市，这位当选总统面对俄亥俄河对岸的肯塔基人说道：

“我们尽可能地像华盛顿、杰斐逊那样对待你们。……忘掉一切党派，无视一切党派，我们又将成为同胞兄弟。”

在匹兹堡弗里敦镇，一位个子高高的挑煤工人在欢迎人群中大喊：“阿怕，大家都说你是美国最高的人，但是我相信你一点也不比我高。”林肯欣然答道：“你过来，让我们比比看。”于是这个穿着工装、煤灰满身的工人穿过人群，和合众国总统背靠背站在一起，他们正好一样高，全场欢呼，两个高个子咧嘴大笑，紧紧握手拥抱。

在纽约州，林肯在议会大厅再次强调自己的出身和任务：

“不是我故作谦虚，的确，我是所有被推举到总统职位的人中出身最微贱的一个。可是我所要完成的任务却比他们中任何一个都艰巨得多。”

在市政厅，他首先对并不是大多数都赞同他的人们所给予的接待表示感谢。然后借此对全美国说道：

“除非联邦不中用了，除非为了保住旅客和货物而只得抛弃联邦这条航船，否则，决不能丢弃联邦。”

在哈里斯堡，林肯由荷枪实弹的士兵簇拥着对欢迎人群致答谢词：

“在伟大职责的重担下，我怀有一颗正直的心，但是我却不敢向你们夸口我带着一个足以胜任职务的头脑。我将依靠人民。如果我自己的力量不足的话，至少我将求助于人民群众，我认为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失败。”

林肯到达费城时，就已获悉一个阴谋集团要暗杀他的信息，他们叫嚣：“这个受人雇佣的林肯将永远、永远也当不了总统。我愿意以我的生命来换取他的生命。我准备为南部的权利，为消灭废奴主义者而不惜一死。”

林肯虽然无所畏惧，但还是在有关人员和拉蒙的护送下，乘夜间列车秘密地抵达华盛顿。林肯对此极不情愿。他说：“合众国总统在夜里像个贼似的偷偷摸进首都，全国会怎么想呢？”但护送的州长和有关人员坚决认为：这不是一个由林肯决定的问题。拉蒙随身带着两支普通手枪，两支大口短筒小手枪和两把长刀，林肯手无寸铁，拉蒙相信从那时起一直到华盛顿的那些年月，林肯无时无刻不处在被人暗杀的危险之中，而国家正在分裂之中。

一位极端反对奴隶制的共和党参议员在此时感叹道：“幸运的是，阿伯拉罕·林肯具有为带领我们渡过这一难关所需要的那些品质。他冷静、沉着、明智，同时也很勇敢。只要他把自己奉献给人权，联邦一定会保持下去并且变得更加珍贵。”

1861年3月4日，华盛顿，寒气袭人。宾夕法尼亚大道两旁人山人海，全副武装的士兵埋伏在大道两旁高层建筑的屋顶上，另一些士兵在国会大厦两侧窗口警视着即将举行总统就职典礼的讲坛。

前总统布坎南和新总统林肯手挽手在警察开道下，沿宾夕法尼亚大道向国会走去。接着一些人又组成一个新行列簇拥着林肯，把他一直送到国会的东廊和露天讲台，那里等候已久的一万多观众发出稀落的欢呼声。

林肯发表就职演说后，把左手按在《圣经》上，举起右手，随着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复诵了宪法规定的誓词：

“我庄严宣誓，我将忠实地履行合众国总统的职责，我将尽我最大的努力保持、维护和捍卫合众国宪法。”

国会上斜坡上所有的大炮齐声轰鸣，向美国第16任总统致敬。但就职典礼上最重要、最吸引人的节目还是林肯的就职演说，它成



了当时全国瞩目的中心。因为它是新政府的一个正式文件，也是林肯执政后的第一次发言。林肯在斯普林菲尔德写了草稿，后来又作了重大修改。原稿的结尾两句话极其强硬，火药味太浓：“你们能容忍对政府的攻击，我却不能从保卫它的立场后退。‘和平还是战争’这一严肃的问题要由你们而不是由我来回答。”林肯后来删去了这两段话。

就职演说发表后，美国顿时家喻户晓，人们从报纸上全文阅读、研究、讨论，对它的关注超过了任何一个总统的演说。林肯过去起草演说稿也从来没有像这篇演说那样慎重。这次演说由理智与情感交织而成——林肯以一个杰出政治家的博大胸怀表达了他对联邦的挚爱之情，同时也以极其潜在的强硬姿态表明：如果战争不可避免，他不借以战争来保卫联邦的完整和尊严。林肯的声音从容不迫：

“美国的同胞们：

遵循与政府一样古老的习俗，我出现在你们面前，向你们发表简短的讲话，并按照美国宪法规定，在总统‘履行职责’之前在你们面前进行宣誓。……

南部诸州的人民当中似乎存在着一种恐惧心理，以为共和党执政将危及他们的财产、和平和人身安全。这种恐惧从来都是毫无根据的。……我只引用我讲过的一段话来说明我对此的态度。当时我宣布——我无意直接或间接干涉存在于蓄奴州的奴隶制度，我认为我没有干涉的合法权利，也没有干涉的意图。……根据国家宪法首任总统就职以来，72年过去了。在这段时间里，已有15位不同而极为杰出的公民相继掌管了政府的行政部门。他们担当了许多风险，履行了职责，而且一般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我现在却带着前辈的全部意愿，在罕见的极端困难中，在宪法规定的短暂4年里，担负起这一同样的职责。分裂联邦，以前这还只是一种威胁，现在却已变成令人深为惶恐不安的行为。”

林肯首先以保守的姿态澄清一种谣传，稳住南部各州的人心，然后把自己放入美国历届总统的行列中，强调自己使命的严峻和危难。接下来林肯从宪法和法律的角度论证联邦的永恒性。从理论上说，联邦一旦成立，它就永远不可解散：

“考虑到一般法律和我们的宪法，我认为这些州所组成的联邦是永久性的。在所有国家政府的基本大法中，对于永久性一事即使没有明文规定，也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没有一个正式的政府曾经在其建制法中，设立有关该法终止效力的条款。只要我们继续执行国家宪法中所有明文规定，这个联邦就会永远存在——除非采取这部大法本身所没有规定的某种行动，我们是不可能摧毁联邦的。

再说，即使合众国不是一个正式政府，而仅是各州之间一种契约性的组合，那么，作为一份契约，难道它就可以由少于全体订约人的一些人，平平静静地予以废除吗？契约的某个参加者可以违反它，或者说是破坏它；但若要废除它，难道不需要通过全体订约

人才能合法地做到这一点吗？

从这些普通原理往下推，我们发现，就法律观点而言，联邦是永久性的，这一论断已由联邦本身的历史予以证实了。联邦比宪法要早得多。事实上它是根据 1774 年的联合条款组成的。1776 年的独立宣言使它臻于成熟，并得以继续存在下去。1778 年的联邦条款使它进一步成熟，那时所有 13 个州均宣誓明志，保证联邦的永远存在。最后，在 1787 年，宣布制定宪法之目的，其一便是‘组成一个更为完美的联邦’。

如果只要一州或一部分的州就可合法地把联邦毁掉，那么，这一联邦反而不如制宪以前完善了，国因为它丧失了永久性这一要素。

从这些观点出发，任何州均不得仅由自己决议，即可合法脱离联邦；具有这种效果的决议和法令，在法律上是无效的；对于任何一州或数州境内反抗美国政府的暴动，应依具体情况来确定其为叛乱还是革命。

因为，从宪法与法律观点来看，我认为联邦是不可分裂的；我将尽我所能，务使联邦法律在各州得到忠实贯彻，这是宪法本身所明确责成于我的。我认为这样做仅是我本身的一种责任；而且我将在可行的范围内履行这项责任，除非我的合法主人，即美国人民，制止使用这些必要的手段，或者通过某种权威性方式，作出相反的指示。我相信这不会被视作一种要挟，它只是联邦所明确宣布的目标，即它要依照宪法保卫和维护自身。”

林肯紧紧抓住宪法和法律为武器，向分裂分子开战。接着他话锋一转，又回到联邦的现实局势上：

“联邦各地，除拒绝装备邮政系统的地方，都将继续装备邮政系统。各地的人民将最大程度地获得完全的安全感，这对平静的黑奴是最为有利的。这里所说的事业将会得以追寻，除非目前的事态和经验有适宜改进变化的迹象。在任何情形和危险关头，我都会根据切实存在的情况，以和平解决国家的纷扰和恢复兄弟般同情和爱戴的观点和希望，去实施我最周密的考虑。

据说在这个或那个地区里，有一些人千方百计地企图摧毁联邦，甚至不惜利用一切借口非达此目的不可。对此，我不加以肯定也并不否认。但若事情果真如此，对这帮人我是不屑置词的。可是，对于那些真正热爱联邦的人们，我难道能够缄默不言吗？

这会毁灭我国的国家组织，连同它的一切利益、全部历史和所有希望；在触及如此严重的问题之前，让我们把我们这样做的真实意图弄清楚，这难道不是明智的吗？如果你们要逃避的灾难可能实际上并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你们难道还要艇而走险吗？如果你们即将涉足的灾难，比之你们亲身经受而想尽力逃避的一切灾难更为深重，难道你们还甘冒风险沿着错误的道路走下去直到不堪设想的地步吗？”

林肯演说至此，可谓是既咄咄逼人又苦口婆心。他紧接着指出分裂

主义的实质和最终的结果。认为政府的存在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而少数派的前途是走不通的：

“……如果有一个少数派放弃支持政府而执意脱离联邦，那么他们便开创了先例，这必然也将导致他们内部的分裂并葬送他们；因为每当他们内部的多数派拒受少数派的控制时，少数派就会脱离他们。举例来说，正如目前联邦中的一些州宣布脱离联邦一样，一两年后南部新联邦中的一部分难道就不会蛮横地再行脱离吗？一切醉心于分裂的人们目前所接受的正是这种思想。

这些州组织新的联邦，在它们之间难道真的具有完全一致的利益，足以使彼此和睦共处并避免重新分裂吗？

显然，脱离联邦一事的核心观念正是无政府状态的实质所在。一个多数派，被宪法的强制力和规范所约束，并能随着公共舆论和舆情的审慎变化而顺变，才是自由人民唯一真正的治理者。谁否认它谁就必然走向无政府或专制。一致同意是不可能的；少数人的统治，作为一项永久性的措施，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因此，如果否认多数原则，剩下来的仅有某种形式的无政府状态或专制而已。”

林肯之所以强调多数人和少数人的区别，是因为北方联盟有 23 个州，而南方联盟只有 11 个州。他犀利地剖析任何分裂只会无穷地分裂下去，可谓一针见血。

“我国有一部分人相信奴隶制是对的，应该予以延续，而另外一部分人则相信它是错的，不应予以延续。这是唯一的实质性争执。宪法中关于逃亡奴隶的条款和取缔国外奴隶贸易的法律，在一个人民的道德意识并不完全支持其法律的社会里，恐怕已经不像任何法律一样贯彻实施了。大多数人民对于这两次法律所施加的枯燥无味的法律义务是遵守的，少数人则对它们加以破坏。这个，我承认是无法完全纠正的；而在南北分裂后，这两种情况将比以前更趋极端。现在没有彻底取缔的国外奴隶贸易，最终会在一方区域内不受限制地复活起来；而在另一方，对于逃亡奴隶，现在不过支出一部分，而将来会完全不支出。”

接下来林肯从常识方面谈到南北分裂的荒谬性：

“从地理环境上说，我们是无法分裂的。我们不能把南北两区从彼此的位置上挪开，也不能在它们中间建起无法逾越的城墙。夫妻可以离婚，以后彼此不相见，亦无法找到；但是我国的不同区域不能这样做。它们不得不面面相觑，而彼此的来往，不管是友好或敌对的，一定会继续下去。那么，这种来往在他分裂后有可能比以前更加有利或更令人满意吗？外人签约会比朋友执法容易吗？外人间的条约能比朋友间的法律更加切实地得到执行吗？假如你开战，你不会老打个不停；在双方都受到重大损失而无一方获利时，你就停战，这时，关于来往条件的同样老问题就会再一次压在你头上。”

然后林肯把避免分裂的希望寄托给全美国人民，只有他们，而不是总统才能作出合乎真理的选择：

“总统的一切权利来自人民，他们并没有向他提及制定分裂各州的条件。如果人民亦作出选择，他们自己就可以这么做，但是最高行政长官本身对此无关。他们的职责是管理现在的政府——当政府掌握在他手中时——并毫无被他削弱地转交给他的继承人。

为什么不能坚定相信人民最终的裁决？在这个世界上，难道还有更好的或能与此相匹的希望吗？在我们目前的分歧中，难道双方都没有信心认为自己是站在正确的一边？如果代表永恒真理和正义的全能上帝站在你们北方一边或者站在你们南方一边，那么经过美国人民这个大法庭的裁决，真理和正义定将普照天下。

通过我们生存其下的政府机构，刚才提到的人民已明智地提供了公务员，但少有危害的权利，他们也同样明智地为那点权利在很短时间内回复到他们自己的手中作准备。当人民保留了他们的美德和警惕性，任何行政部门都无法用极端的刻毒或愚行在短短的时间里严重地损害政府。

我的同胞们，全都冷静地好好想想这整个论题，有价值的东西不会随时间流逝。如果有一目标在急促地推使你们迈出你们不愿迈出的审慎的一步，那么这一目标就会随时间而一无所及；但是好的目标不会随之落空。你们中现在不满的人仍然拥有未受削弱的古老的宪法，从敏感的观点上说，还有你们根据宪法自己制定的法律；而新的政府即使愿意，也无权改变其中任何一项。如果承认，你们中不满的人在争执中掌握了正确的一面，那仍没有鲁莽行为的正当理由。智力、爱国主义、基督教，以及坚定地依靠从未抛弃过这一天赋土地的上帝，这些仍足以在最良好的方式中克服我们目前所有的困难。”

最后，林肯再次强调内战的爆发与否完全取决于人民。他用召唤的语言唤起美国人民对这片辽阔国土的热爱之情：

“各位心怀不满的同胞，内战这一重大问题，不系于我的手里，而系于你们的手里。政府不会攻击你们，只要你们自己不做侵略者，冲突必可避免。你们没有向上帝发过誓要摧毁政府，而我却将作出最庄严誓言，要保持、维护和捍卫这个政府。

我恨不能永远说下去。我们不是敌人，而是朋友。我们一定不要成为仇敌。我们友情的纽带，或会因情绪激动而绷紧，但决不可断裂。那种不可思议的回忆之弦，从每个战场和爱国志士的坟墓，伸展到这片辽阔的土地上每一颗充满活力的心房和家庭。它一旦被我们天性中更善良的性灵所触动，必将高奏出响彻云霄的联邦大合唱。”

林肯就职演说的话音刚落，全美国各个方面就传来异常强烈的回响，林肯的声音震荡着这片一场空前内战前夕的辽阔国土：

一个远在依阿华州种玉米的农民写信给林肯，要他决不退让。因为“你今天给他们一个小手指头，明天他们就会要你整只手。”

一向支持林肯的《纽约论坛报》评论道：“对 2000 万人民来说，林肯就职演说带来的是一个喜讯还是一个噩耗，这将视各人的立场而异。这个信息就是美国的联邦政府依然存在，而且还有一个伟人在当它的首脑。”

波士顿一家报纸则对就职演说的语言感兴趣：“它没有哗众取宠的言辞。所用的语言是和人民群众的愿望一致的，这是惯常同‘老乡’和‘街坊，交谈的人的浅显易懂、朴实无华的语言，是适于表达他的思想和他讲的事实。”

《巴尔的摩太阳报》和《里士满消息报》则代表了来自反面的评价：“它独揽了暴君的权力，并露骨地表示，不管战争和流血达到什么程度，它都打算行使这种权力。如果演说中的话真的算数，那么它就是联邦的丧钟和挽歌，是希望的破灭。”“从林肯就职演说中我们听见的是狂人冷酷无情、精心炮制的语言，分裂战争只等一声信号枪响了。对于‘弗吉尼亚州向何处去’的问题，林肯先生已作了回答：它必须走向战争。”

林肯进入白宫后，最初每天不得不在任命联邦官员和对付申请职位的人上面花费大量时间。各种各样的人物涌向华盛顿，都想在新政府里谋得一官半职。有一次林肯乘出租马车上街，竟被人截住，塞给他官职推荐书，林肯不禁十分气愤，大叫：“不行，不行，我不能在大街上开店铺。”事后，他对此感慨道：

“如果我们的美国社会和联邦政府有一天完全腐败并彻底垮台，其主要根源必然是过好逸恶劳的寄生生活的欲望。而这些欲望我自己也不是一点没有沾染上。”

### 时代的最强音——南北战争和 《解放黑奴的宣言》

1861 年 4 月 12 日凌晨，南部同盟的军队向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港口的萨姆特堡垒发射了第一炮，该堡垒是联邦的财产和象征。内战爆发。叛军的迫击炮、榴弹炮炮击持续了 33 个小时，联邦军队的一名少校率 100 士兵苦战之后，终于放弃了这个堡垒。他们降下国旗，鸣枪致敬，眼睁睁看着南部同盟的新国旗飘扬在昔日联邦的堡垒上空。

一天以后，4 月 14 日，林肯发布宣言，表明原来试图对南方进行安抚的战略已经无济于事：

“鉴于卡罗来纳州、佐治亚州，亚拉巴马州，佛罗里达州、密西西比州、路易斯安那州和德克萨斯州南部 7 州正进行政府用常规办法无法镇压下去的十分强有力的纠合，因此，我，合众国总统阿伯拉罕·林肯，现在根据宪法及法律授予我的权力，认为应当征召，特此征召合众国各州民兵，总数 7.5 万人，以镇压上述纠合，并使法律得到彻底执行。”

林肯已预言但于心不忍的内战终于开始了。美国各地数以千计的城镇乡村，联邦的公民们群情激愤，风起云涌，纷纷走上大街、广场，集会演说，人们高唱后来成为美国国歌的《星光灿烂的旗帜》、《亚美利加》和攸立战争时期军队流行歌曲《北方佬之歌》。妇女和姑娘们纷纷送郎参军，义无反顾，热气腾腾。

南北战争于 1861 年 4 月 15 日即“林肯首次招募军队日”正式开始。此时南北双方的力量对比上，北方具有压倒优势。北方联邦有 23 个州，人口 2300 万，集中了几乎全美国的重工业、军火工业和轻工业；南部联盟只有 11 个州，人口 900 万，其中 400 万是黑人奴隶。南方只有农业，仅有一些小型兵工厂。但南方军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而且是有备而战。

联邦军队的情况极其令人担忧。联邦军队总共 1108 名军官中，有 387 名辞职到南部联盟去了。他们之中有 288 人在西点军校受过训，有些是具有实战经验的将才。在北部军队的西点毕业生中，有 162 名出生在蓄奴州；在南部军队中的西点校友中，有 19 名是北部人。林肯在致国会的一次演说中，高度赞颂了北部普通士兵在内战分裂之际的绝佳表现：

“值得注意的是，在政府目前这个困难时刻，虽然陆海军中那些受到信任和提拔的军官们大批大批地辞职，对他们的提携者背信弃义，但是没听说过一个普通陆军士兵、一个普通水兵叛逃。伟大的荣誉属于那些保持忠诚的军官。然而，在所有这一切当中，最大的荣誉和最重要的事实是全体普通陆军士兵和水兵的一致坚定性。就我所知，他们人人都成功地抵制了其司令官的叛国企图。这是平凡的人民的爱国本能。”

这番话可以被看作是在内战之初，林肯献给联邦普通战士的士兵颂歌，他们后来的表现果然与此相称，可歌可泣。

林肯还在致国会的演说中强调萨姆特堡垒国旗降落的严重意义：

“在一切共和国中，难道会有这种先天性的致命弱点吗？难道一个政府要么就必须强大到限制自己人民的权利，要么就必须弱小到不能维持自己的生存吗？现在我们除了使政府全力作战之外别无出路。为了使这场战争速战速决，你们应提供法律手段，至少批准招募 40 万人和拨款 4 亿美元。”

雷鸣般的掌声响彻国会大厅，议员们十分赞赏林肯这位战时总统的雄心和勇气。林肯接着对南部的分裂现象追根溯源：

“南部的运动究竟应当称作‘脱离’，还是应当称作‘叛乱’？对此那个运动煽动者们是心中有数。他们知道，如果他们直接对抗南部人民那些强烈而高尚的感情，便会寸步难行。因此，他们一开始就阴险地蛊惑公众的心灵。他们杜撰了一种巧妙的诡辩，声称联邦的任何州都可以按照国家宪法的规定，合法地并和平地退出联邦，不需要联邦或其他任何州的同意。他们还说，这种脱离的权利

只是为了正义的事业才行使的，而这种事业是否正义只有他们才能判定，这种脆弱的遁词未免太不高明了，简直不值一驳。

30多年来，他们就一直这样把叛乱裹上糖衣，拿来毒害他们那一地区的公众心灵；结果在他们某一天纠集了一群人上演了一场使本州脱离联邦的荒诞无稽的闹剧之后，才使得许多善良的人也情愿拿起武器来反对政府，而在这一天之前这些善良的人本来是不会跟着干这种事情的。……一旦他们看出这样做是勾销债务或达到其他自私或非正义目标的最简易的办法，那么按照他们的一贯做法，他们也一定会闹分裂的。”

林肯以异常清晰的语言剖析了南部那些“他们”分裂的实质。整个北部把这番演说看成是林肯为宣战所作的辩护词：他不是对“脱离”行为宣战，而是对“叛乱”宣战。这也是一封致美国人民的公开信，北方舆论对此表示出空前的赞赏，甚至超过了林肯的就职演说。

战争开始，林肯自任陆海军最高统帅，联邦志愿兵已有 164 个团，每团 900 人，加上正规军 1200 人，在华盛顿周围集结待命，北部各地招兵总计 22.5 万人，这是世界军事史上最庞大的军队之一。林肯对此十分自豪：

“现在政府手里已经有如此庞大的一支军队，这是前所未有的，这支军队中没有一个是士兵不是自愿地站到自己的岗位上来的。”

但战争初期的战况对林肯来说是极其令人沮丧的，联邦军队屡屡惨败。内战第一役布恩河会战，1861 年 7 月 21 日恰好是一个星期天，仓促上阵缺乏训练的联邦军队 3 万人在麦克道尔将军指挥下，仅仅一个白天，即被南部军队击溃，一败涂地，首都华盛顿险些失守，林肯坐立不安。

接着林肯又错误地任命麦克累伦为陆军总司令。此人虽然重兵在握，但由于他是民主党主和派分子、奴隶制的拥护者，所以在战争中常常按兵不动，贻误战机，对林肯的命令置之不理。

1862 年 6 月，谢南多亚河谷会战。南部军队名将罗伯特·李指挥 1.7 万名士兵横扫河谷地区。把 1.25 万名北方军队打得全军覆没，生俘 3000 人，夺取 9000 只步枪，其余物资不计其数，华盛顿再度告急。

6 月至 7 月在里士满以东半岛地区进行了几次战斗，史称“七日之战”。7 天之中，联邦军队企图第二次夺取里士满，但又以失败告终，只得撤回华盛顿地区。新奥尔良也得而复失。

整个 1862 年血火交织的夏季 20 万联邦军队在弗吉尼亚被只及自己半数的南军击败，林肯和华盛顿均处于暴风骤雨般的震撼之中。

原因很多，首先是林肯总统还没有找到他最优秀的将领，格兰特将军和薛尔曼将军这两柄林肯的利剑，此时尚未闪闪出鞘，还只是上校。其次军队的结构和组织十分松懈。林肯在全国救援战场伤病员会议上对此十分低调他说道：

“我没有鼓舞人心的话可说。事实是人们还不承认我们同南部正处于战争状态。他们还没有横下一条心将这场战争进行到底；他

们脑子里盘算的是我们如何靠战略来摆脱困境！就是这个词儿——战略！麦克累伦将军想用战略去打败叛乱分子；军队也有这种想法。”

林肯说到“战略”这个词时，语调充满一种轻蔑和无可奈何之态。全场的妇女代表有人谈起开战以来公民们奋起参军的事，还谈到几场联邦军队胜利的战役。林肯耐心地进一步强调：

“我承认这些是事实，但我要告诉你们，人们还不承认我们正处于战争状态！他们认为有一条通往和平体面而堂皇的大道，以为麦克累伦将军会找到这条大道。军队还没有坚定不移地相信我们正处于一场你死我活的可怕战争之中。没有！军官们也没有！整团整团的部队缺员达三分之一——有许多人开小差，有许多是经连队军官准假的，后面这种情况几乎是同样糟糕的。开小差的和休假的人数超过了应征的新兵人数。要填补军队的缺额就像用铁锹铲跳蚤。你铲起一锹还没来得及放到哪里，跳蚤就都跳光了。这又像一匹倔强的马，你哄它，吆喝它，用马刺踢它，用鞭子抽它，但它寸步不移，原地不动！”

林肯这些生动而幽默的比喻，没有像他往常的演说那样引起满场笑声，因为大家的心情都十分沉重。一位护士代表天真地问道：“难道开小差不判处死刑吗？应该处死几个开小差的士兵。”林肯悲伤地连连摇头：

“啊，不，不！我要是成批成批地枪毙开小差的人，我就会听见空前的大吵大闹，而且这将是自作自受。你不可能下令把成批成批的人枪毙掉。人民将不会容忍这样做，他们也不应当容忍。不，我们必须用别的办法来改变现状。”

最重要的原因则是林肯作为总统，为了使南北政治平衡而作出的一系列妥协和动摇。林肯坚信自己的出发点是完全按照宪法进行战争，这就大大削弱了联邦政府的力量，无形之中以自己的软弱鼓励了北部的主和派势力，而放过了敌人最容易受攻击之点——即罪恶的奴隶制度本身。

林肯此时的许多举措带有极其妥协而又背景复杂的印记：

1861年8月，内战爆发后4月，联邦军队西线军区司令弗里芝特宣布惩罚在密苏里州无恶不作的奴隶主叛乱分子，并解放他们的奴隶。这是第一个采取解放奴隶行动的北军将领。但林肯屈服于政府中右翼主和势力的压力，下令撤销了弗里芝特的职务。

1862年5月，内战已经一年，联邦军队南方军区司令戴维·亨特少将宣布解放该军区辖区内3个蓄奴州的奴隶，武装他们，建立了第一个黑人军团。边界蓄奴州奴隶主一片恐慌。林肯为了平衡，当月下令取消亨特的命令。

半年以后，林肯又正式宣布，任何脱离联邦的叛逆州，只要其居民



中宣布效忠联邦的人数达到 1860 年具有选民资格人数的 10% ,并承认国会所制定的法令,就可重新加入联邦。

当时美国反奴隶制协会在其年度报告中用极其尖刻的语言分析了林肯的两难处境及其矛盾心理:

“他认为奴隶制是错误的,但又反对立即废除它;他确认国会有权在哥伦比亚特区废除奴隶制,但在行使这种权力时又要去征询奴隶主的同意;他认为追捕奴隶是一件令人讨厌的事,但又主张通过国会制定一些条例来实施这项法律,而不管有没有宪法根据;他既断言白人和黑人在自然权利方面是平等的,但又不赞成黑人有公民权。”

一向支持林肯的《纽约论坛报》主编格里利甚至撰文《两千万人民的祈祷》,抱怨林肯:

“作为共和国第一公仆,我们感到你在履行紧急公务上却是奇怪地、灾难性地疏忽怠慢。你很不恰当地被来自边界蓄奴州某些顽固不化的政客们的劝告、抗议和威胁所左右。大部分正规军军官和许多志愿兵关切的是维护奴隶制而不是镇压叛乱,对此,我们是有怨言的。”

林肯针对这些舆论,在一封广为翻印的公开演说中为自己申辩:

“我要拯救联邦。我要本着宪法,通过最短的途径去拯救它。国家权力恢复得越快,联邦就越接近于‘原来的联邦’。如果有人认为除非能同时拯救奴隶制,否则他们不愿去拯救联邦,那我是不愿去赞同他们的。如果有人认为除非能同时摧毁奴隶制,否则他们便不愿去拯救联邦,那我同样也不会赞同他们。”

我在这场斗争中的最高目标是拯救联邦,而不是拯救或摧毁奴隶制。如果我能拯救联邦而不解放任何一个奴隶,我愿意这样做。如果为了拯救联邦需要解放所有的奴隶,我愿意这样做;如果为了拯救联邦,需要解放一部分奴隶而保留另一部分,我也愿意这样做。我在奴隶制和黑人问题上所做工作是因为我相信那将有助于拯救联邦;我所以克制不做某些事情是因为我认为那将无助于拯救联邦。每当我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将有害于这个事业时,我就尽量少做;每当我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有助于这个事业时,我就尽量多做。我一旦发现错误,就努力克服;一旦发现某些新的观点或是正确的,就立即采纳。

在这里我只是根据我对所担任的政府职务的理解来陈述我的意图,对于我经常讲到的所有地方的一切人都应获得自由这个个人愿望,我是决不会改变的。”

林肯在这里十分清晰地解释了自己的政治动机:拯救联邦。这是总统林肯的天职所在,但另一个林肯即信奉人人平等自由的林肯有时却与此构成矛盾。在云谲波诡的内战冲突中,林肯的角色常常需要在各种力量的对比中取得极其微妙的平衡,这对一切优秀政治家来说都确非易事。在拯救联邦和解放黑奴这一对问题之间,林肯自有其程序和节奏。一次,朋友们敦促林肯尽快颁发一个解放奴隶的宣言,林肯的回答意味深长:

“一个人在前面走得太快而使全国跟不上，是没有好处的。你们知道一句古老的拉丁格言吗？‘慢慢加快。’”

所以当一名奴隶船长因贩卖 900 名非州黑奴被拿获，旋即被法官判处死刑，这时许多著名人士纷纷要求总统赦免，结果林肯力排众议，批准了对这名船长判处死刑，缓刑两周。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个根据宪法和联邦法律进行审讯、被判决和绞死的奴隶贩子。

随着内战的发展，在局势的推动下，林肯和联邦政府逐步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1862 年 8 月 4 日，林肯第二次发布命令征集 30 万军队，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实行义务兵役制，以前征兵是在志愿的基础上进行的，北部军力得到加强。在这之前的 5 月 20 号，林肯已签署了宅地法案，有效地阻止了南方奴隶主势力向西部的扩张，极大地调动了北部的生产力和战斗力。法令规定：凡是美国公民或已请求入境的移民，只需交 10 美元登记费就可获得西部地区 1600 英亩土地。在这块土地上连续居住 5 年，即可获得这块土地的所有权。

战争的第二阶段战况依然不利，林肯感到联邦的作战计划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差不多快输光最后一张王牌。现在必须改变策略，决定采取解放政策。林肯此举正好应合了他在以前一次演讲中表达的信念：这场内战的最高目标是拯救联邦，现在局势到了只有解放黑奴才能实现这个目标，那他就加快了自己的步伐。

1862 年 9 月 22 日，林肯在内阁会议上宣读了《初步解放宣言》，两天以后公开发表。《宣言》预告 100 天以后即从 1863 年 1 月 1 日这一天起，反叛州或地区内所有奴隶永远获得自由，联邦政府承认并维护这些人的自由。

林肯在白宫阳台上向人们发表演说：

“我没有犯错误，现在是全国和全世界对宣言作出判断，也许是对它采取行动的时候了。我正处于重重困难的包围中，我真诚地希望大家了解这一点。但这些困难决不会超过战场上那些人的艰难困苦，他们正竭尽全力，用鲜血和生命来换取这个国家未来的幸福和昌盛。”

全国和全世界的反应迅速传来。许多地区人们评论《解放宣言》是伟大的，林肯将流芳百世。美国以外的任何政府现在想承认南部的里士满政府都是不可能的了。也有反面意见，抱怨林肯此举把一场为联邦进行的战争变成一场废奴战争。南部处于一片狂怒之中。《里士满消息报》大骂：“我们该叫他什么呢？叫懦夫、凶手、野兽、杀害妇女和儿童的刽子手吗？或者这些统称为魔鬼，就叫他‘魔鬼林肯’。”

林肯接着利用年底的国情咨文，向国会发表演说，为即将在第二年 1 月 1 日发表《最后解放宣言》铺平道路：

“美国人民在地球上占有和居住的这片土地，只适合作为一个民族家庭的家园，而不能作为两个或更多的民族大家庭的家园。随着蒸汽机、电讯等现代发明的到来，一个统一的民族会有更大的优

越性。

我们这场冲突关系到我们本身——也关系到未来的世世代代，随着这一代人的逝去，这个冲突将会在没有剧烈震动的情况下永远平息下去。没有奴隶制度就绝不会发生叛乱；没有奴隶制度，叛乱就不可能继续下去。

……有人坚持说，黑人将会损害和排挤白人劳动者。难道黑人获得了自由真的会比他们继续当奴隶排挤更多的白人劳动者吗？如果解放了的黑人仍旧在原来的地方，他们就不会排挤白人劳动者；如果他们离开原来的位置，他们就会把位置让给白人劳动者。从逻辑上讲，他们所占的位置既不会多一个也不会少一个。黑人解放后，即使不向国外移植，白人劳动者的工资也可能提高，而决不会降低。

过去太平洋时代的信条已不适用于疾风暴雨的今天。眼前时局困难重重，我们必须随机应变。由于我们面临的情况是新的，因此我们必须以一种新的方式去思考和行动，我们必须使自己解脱羁绊。

我们给奴隶以自由，就是使自由人的自由得到保证——我们给别人自由和维护自身自由，两者同样是崇高的事业。”

1863年1月1日来临，这是举国乃至全世界十分关注的《最后解放宣言》发布日。国内反奴隶制的激进派说林肯不敢发表《解放宣言》，南方奴隶主说他还没有敢于没收价值10亿美元财产（据当时估算，南方黑奴价值10亿美元）的胆量。军方人士害怕这样的宣言将会使大批士兵丢下武器，而来自英国的预言则是，宣言发布后，必将引起黑人奴隶的总暴动：南部将不可收拾。

林肯对此也万分慎重，他对一位参议员谈到他复杂的心态：

“这件事我已酝酿成熟。我已经下定决心，这件事非做不可。我是迫不得已才这样做的。此外没有别的可以解脱我们困境的办法。我的职责是明确的、但在某些方面却是很伤脑筋的，我深信人民会理解，我这样做并不是出于一时冲动，而是期望获得更大的利益。”

1862年最后一天下午和1863年第一天上午，林肯重新写了宣言全文。他一字一句写得很慢，这个宣言的分量和价值感动着他，它不愧是人类解放史上的经典。林肯对此自豪地对朋友说：“我十分清楚地知道，与这个文件相联系的名字永远不会被人们遗忘。”

林肯把草稿交国务院誉清后，然后庄严地在上边签字。签名时他显得心细如发，他对大家说道：

“在我一生中，我从来没有像在这个文件上签名这样更加确信自己是做得正确的。但是我从上午9点起就一直在接见客人，同人们握手，弄得我手臂僵硬麻木。现在这个签字将被人们仔细察看，如果他们发现我的手颤抖了，他们会说，‘他有点懊悔了’，但无论如何，这个字总是要签的。”

留传下来的宣言文本上，林肯的签名笔力雄健，字迹清晰，恰如其分地体现出他发布宣言时的信心和勇气。宣言全文即刻传遍世界：

####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宣言”

合众国总统曾在公元 1862 年 9 月 22 日发表过一项宣言，其部分内容如下：

从 1863 年 1 月 1 日起，凡在当地居民那时尚在反叛合众国的任何一州之内或一州的指明地区之内作为奴隶被占有的人，都应在那时及以后永远获得自由；合众国政府行政部门，包括陆海军当局，将承认并维护这些人的自由，当这些人或他们中的任何人可能为自己的实际自由而作任何努力时，不采取任何压制他们的行动。

‘行政首脑将于上述的 1 月 1 日，以公告指明哪些州或哪些州的哪些地区的居民那时尚在反叛合众国（如果有的话）；在那一天任何一州或该州居民在合众国国会中有大多数合法选民参加的选举所选出的国会议员忠实地代表他们，这种事实如无强有力的反证，则将被视为该州及其居民没有反叛合众国的确实证据。’

因此，我，合众国总统阿伯拉罕·林肯，现在依据实际发生对合众国的权力与政府的武装叛乱时期作为合众国陆海军总司令被授予的权力，作为镇压上述叛乱的一个适当的、必需的战争措施，特于本日——1863 年 1 月 1 日，按照我在上面第一次提到的日期公开宣布至今已足足有 100 天的、要这样做的意图，命令指明这一天当地居民处于反叛合众国状态者有下列诸州及下列一些州的部分地区：

阿肯色州，德克萨斯州，路易斯安那州除圣伯纳德、普莱克明斯、杰弗逊、圣约翰斯、圣查尔斯、圣詹姆斯、阿森松、阿森普欣、特尔波恩、拉伐什、圣玛丽、圣马丁与奥尔良等教区及新奥尔良等教区及新奥尔良市以外的其他地区，密西西比州，亚拉巴马州，佛罗里达州，佐治亚州，南卡罗来纳州，北卡罗来纳州和弗吉尼亚除西弗吉尼亚的 48 个县与伯克利、阿康玛克、诺桑普敦、伊丽莎白城、约克、安公主、诺福克等县及诺福克和朴次茅斯两市以外的其他地区。

上述除外地区目前仍严格维持本宣言颁布之前的原有状况。

为着上述目的，我依据职权，正式命令并宣布凡在上面指明的诸州及一些州的部分地区之内作为奴隶被占有的人，从现在起永远获得自由；合众国政府行政部门，包括陆海军当局，将承认并维持上述人的自由。

我特此责成这些被宣布获得自由的人，除非出于必要的自卫，不得有任何暴力行为；我劝告他们，在一切允许的情况下，他们应当忠实地为合理的工资而劳动。

我进一步宣布和声明，条件合适的那一部分人将被允许参加合众国武装部队，守卫堡垒、阵地、兵站和其他地方，以及在上述武装部队的各种舰只上服役。

我真诚地相信这一措施是正义的措施，它合乎宪法的规定，出

于军事需要。我祈求人类对之作出慎重判断和全能上帝对之赐子恩典。”

对林肯的这篇呕心沥血之作，全世界的反响犹如一场政治大地震。美国北部许多大城市里，人们彻夜狂欢、祈祷，黑人同胞更有云开雾散见太阳之感。

与林肯同时代的美国大诗人朗费罗当天即断言：“这是一个伟大的日子，总统解放叛乱州奴隶的宣言生效了。这个充满灿烂阳光的美丽日子，在月光如水的宁谧的夜幕中结束。愿它成为一个象征吉祥的日子。”

美国驻伦敦的外交官声称：“《解放宣言》在这里为我们所起的作用要比我们先前所取得的全部胜利和我们全部外交活动所起的作用更大。它正在英国各地引起有利于我们的、几乎是震撼性的剧烈反响。”

宣言所产生的经济效应也极其巨大。整个南部奴隶主的财产按税册估算价值 30 亿美元，其中包括 390 多万被列入牛、马、骡一类的黑人奴隶，按税册估算价值 15 亿美元以上，占总价额的一半。按《解放宣言》的原则和联邦军队所到之处即没收叛乱奴隶主一切财产的趋势，联邦财产激增。

因此，《里士满观察家报》再次表达了南部的愤怒。它攻击宣言是：“美国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政治罪行和最愚蠢的政治错误，其目的在于激起奴隶暴动，使南部人民现在只能在胜利与死亡之间作出抉择。”

联邦的旗帜又重新飘扬在南部一些州和地区的上空。林肯对黑人武装力量寄予了空前的希望，他断言：“只要 5 万名武装起来并经过训练的黑人士兵一出现在密西西比河畔，就会使这场叛乱立即平息。”

事实证明林肯的预言还过于保守。参加北方陆军杀向南方的 18.6 万多黑奴中，有 13.1 万多人来自南方各州。这些被解放了的黑人战斗力很强，整个内战期间他们参加了 450 多次大小战役，约有 7 万黑人士兵为联邦和林肯英勇献身。由于黑奴参战，北方战局迅速好转，从混乱不堪十分被动的防御状态中挣脱而出，走向反攻的趋势。

黑人开赴战场和白人厮杀，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第一次。诗人朗费罗是这样描述他的观感的：“我看到了第一个黑人团队走过波士顿街头，真是一个令人神往的镜头，有几分浪漫，又有几分神奇，像梦境一般。北部终于同意让黑人为自由而战了。”

林肯启用的新将领格兰特和薛尔曼，是联邦军队杰出的军事领袖，由他们三人构成的三驾马车，驮着联邦和军队在胜利的大道上迅跑。

格兰特是西点军校毕业生，内战开始时，他在伊利诺斯州被任命为上校指挥一个团。在一次战斗中，被格兰特包围的南军将领派信使求见格兰特，询问投降条件。格兰特回答：“除了立即无条件投降，任何条件都不能接受”，全国公民因此称呼他是“限令无条件投降的格兰特”。格兰特有在战场上痛饮美酒的习惯，一些反对他的人要林肯撤换他。林肯这样地问道：“你们告诉我格兰特将军的酒是从那儿弄来的？我好去大量采购，把它分发给那些至今尚未打过一次胜仗的将军”。林肯随即把格兰特提升为少将。

薛尔曼战前是路易斯安那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后来曾任圣路易斯有轨公共车公司经理。战争开始，他来到白宫，带着一份上校委任状奔赴

前线。他拒绝了林肯的准将委任状，说他宁愿从上校干起。林肯放声大笑，感到自己获得了一员不凡之将。

战争期间，薛尔曼对南北分裂的沉思和强硬对策，也许可以作为当时整个北部精神的代表。他在密西西比州的大黑河写信给林肯强调：

“南部必须由我们来统治，不然南部就要统治我们。我们必须征服他们，不然我们就要被他们征服。他们除了要征服我们之外别无他求，而妥协之谈全是胡说八道。我们知道，任何妥协尝试都只能遭到他们的嘲笑。所以我不愿去哄他们的，更不愿用让步去迎合他们，只有让他们饱尝战争的苦头，使今后几代再也不敢诉诸战争。我国人民在目前的危机中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吸取了经验教训，在战后的岁月里将会成为更好的公民。现在就要让他们懂得，清楚地懂得：好公民不但必须发号施令，而且还必须服从。我们应派军官、警察、法庭深入到南部的各个角落。我们一定要清除和摧毁一切障碍，有必要的話，就杀死每一个人，夺走每一寸土地，没收每一件财物，一句话，破坏我们应该破坏的一切东西。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这就是南北战争时期一位最著名、也许是最优秀的北部军人的心声。

1863年7月格兰特和薛尔曼率领北部军队在西线战场的维克斯堡，将3万敌军围困数月之后，敌军弹尽粮绝，全部投降，宣誓后全部被释放。黑人军团在这场战役中第一次投入战斗，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精神无与伦比，1000名黑人士兵打退了2000名白人的进攻。黑人和白人的尸体并排躺在地上，拼刺刀同归于尽。拿下维克斯堡后，整条密西西比河就落入了联邦手中。

这时在首都华盛顿，林肯却陷于重重阴影之中。首先是一些反对派攻击林肯政府是专制政权，试图在北方建立军事独裁，滥用逮捕和监禁压制反对分子。他们掀起舆论浪潮鼓吹“下次国会开会时将要对总统进行弹劾。总统所犯的罪行已使人们有足够理由对他进行弹劾。每个真正的爱国者在听到总统将受惩罚时一定会感到欢欣鼓舞。”林肯公开为自己的战时专断手段辩护，它包括逮捕、特别法庭和死刑。他说：

“在和平时期，逮捕只是用以对付通常不断发生的犯罪活动中的一小部分罪行；而在战争时期，逮捕则是用来对付突然爆发的大规模反政府暴乱的必要手段。……

历史雄辩地证明：在战争时期，普通治安法庭是完全无能为力的。普通治安只能在太平年月里审判个别的人。甚至在和平时期，也经常出现一些庞大的盗贼或强盗集团，他们人数众多，势力强大，致使普通法庭也无力对付。但不管这种集团的人数多大，如果把它同忠于联邦的各个州（姑且不说叛乱州）内的同情叛乱分子的人数相比，那又算得了什么呢？再者，如果由陪审团来审理，这样的情况还是会经常发生的，即陪审员中至少会有个把人，他心中想的是绞死所有的陪审员而不是卖国贼。更有甚者，假如有一人劝阻另一个人不要去报名参军，或者唆使一个已参军的士兵开小差，那么，这个人对联邦事业所起的破坏作用就相当于他在战场上杀死一名联邦士兵。如果用普通法庭来审判这种功诱或教唆活动可能就算不上

什么罪行了。

至于死刑，难道我应当枪决一个头脑单纯的逃兵，而对引诱他开小差的老奸巨滑的教唆犯连一根毫毛都不能触动吗？在公众集会上煽动人们的情绪，诱使一个做父亲的人，做哥哥的人或做朋友的人写信给当兵的亲友，说他是在为非正义的事业打仗，是在为一个可鄙的邪恶政府打仗，这个政府如此软弱无能，即使开小差它也无力逮捕和惩处他。这种煽动的危害比起开小差来有过之而无不及。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制止这个教唆犯的活动以拯救这个士兵不仅是合乎宪法的，而且是一种伟大的仁慈。”

接下来华盛顿盛行一种传说，暗示白宫里暗藏着一名南部女间谍。国会参议院不得不专门举行一次秘密会议，审议有关林肯夫人是否不忠于联邦一事。如果情况属实，那么林肯总统一家就会戴上叛国罪的罪名，后果不堪设想。一位出席者描述了当时极富戏剧性的情况，林肯以自己的真诚和一句话的演说感动了大家，为妻子洗雪了罪名。

“我们刚刚开会，就看见担任警卫的军官神色紧张地走进门来，他尚未开口，我们就已明白他为什么这么紧张，我们自己顿时也感到惊惶失措了。就在会议桌那头，一个个子高高的人孤零零地站着，手里拿着帽子，他正是阿伯拉罕·林肯。他像变魔术似的，突然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他的眼神像死人一般悲惨，明显地流露出一种无法形容的完全孤立之感。没有人说话，因为谁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后，林肯控制住自己的感情，以十分凄枪的声调慢慢他说了两句话。说完这一句证词之后，他就像进来时那样一声不响、孤孤单单地出去了。我们面面相觑，片刻之后，彼此心照不宣，一句话也没说就同意不再讨论有关总统夫人出卖联邦的谣传了。我们都大为感动，决定立刻休会。”

林肯当时说的那句话是：

“我，阿伯拉罕·林肯，合众国总统，完全自愿地到参议员这个委员会面前声明：

就我所知：关于我的家庭成员有叛国通敌行为的消息是不真实的。”

林肯这时期时常流露出几丝旁人不易觉察的忧伤。《汤姆叔叔的小屋》作者斯托夫人到白宫拜会林肯，总统欢迎她说：“哦，你就是那个写了一本书挑起这场大战的小妇人。”他们在壁炉前交谈。林肯谈到故乡和家里的炉火，以及眼下的战争。他说：“不管战争如何结束，我感到战争结束后，我是活不了多久的。”斯托夫人感到：“他默默忍受着一种枯燥、厌倦的痛苦，而许多人却误认为他缺乏感情。”

但林肯依然保持和普通劳动者接触的作风，和这些合众国的普通男女握手交谈，他感到由衷的愉快。

一次，林肯搭乘一艘轮船前往战线视察。他在雨中同所有船员握手。最后轮到一位司炉工，他脸上手上全是煤烟灰。他说：“总统先生，我的手太脏了，不便与你握手，但我是船上最敬爱你的人。”林肯紧紧握住他的手并大声说道：“这有什么！你的手是为联邦加煤弄黑的，”另

一次在开往俄亥俄的列车上，一位列车员问林肯为什么老是喜欢同油腻腻的、脏兮兮的司炉工和火车司机握手？林肯回答道：“这些通通可以洗掉。但我总想认识和了解在我前面开路的人。”

### 葛底斯堡：一场大战和一篇演说

葛底斯堡是宾夕法尼亚州一座小镇，1863年7月1日在这里爆发的南北大会战，是美国内战的转折点，从此南军走向衰退，北部联邦军队开始转入反攻。

战役在北军将领米德指挥的波托马克军团和南军名将罗伯特·李统帅的10万南部军队之间展开。

罗伯特·李战前担任第一骑兵团上校，参加过墨西哥战争，曾率领海军陆战队平息过约翰·布朗起义。他也是西点军校的优秀毕业生。内战爆发后，当他得知弗吉尼亚脱离联邦时，就向陆军部长辞职并说道：“除了保卫我的故乡弗吉尼亚州外，我绝不想再拔我的剑了。”他抛弃了他在阿林顿山庄的俯视华盛顿的富丽堂皇私宅，回到故乡任弗吉尼亚叛军司令，后任南方叛军总司令。北方一些政客认为他是一名价值可抵5万人的军事指挥官。

在葛底斯堡战役前，北军波托马克军团曾在7个月内两次被罗伯特·李击溃。所以李将军的部队虽然在人数上大大处于劣势，但士气高昂骄横。罗伯特·李认为自己的士兵是前所未有的勇敢，只要指挥得当，就能无坚不摧，战无不胜。部队中普遍存在着一种轻敌的情绪。

战役爆发前，米德的北军和罗伯特·李的南军互相都不知对方的准确位置。米德接到林肯的命令：“寻敌作战”，但他心里也拿不准是否能追上或截住南军；而罗伯特·李的目标是攻占哈里斯堡，补足给养和军需品，然后再寻机迎击米德。

1863年7月1日罗伯特·李策马接近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叫葛底斯堡的无名小镇。此处风景秀丽如画，山路蜿蜒曲折，他的部队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地散布在山路上。突然，先头部队行进之处硝烟弥漫，枪炮震天。南军的前锋师团在行进之中不知不觉已经和米德的前锋干起来了。

一场美国内战史上空前惨烈、双方并未下达战斗命令，也未作过任何部署的战役，就在宾夕法尼亚风光如画的田野上骤然打响了。这场战役以葛底斯堡为中心战场。北军的指挥官米德新近走马上任，没有指挥大部队正面作战的经验。整个波托马克军团基本上全是民兵和新兵；南军的不利之处在于远离故乡弗吉尼亚，弹药和供给捉襟见肘时，罗伯特·李不得不命令炮兵放慢射击频度。

第一天罗伯特·李猛攻北军的左翼，第二天又猛攻北军的右翼，但均被为保卫家园、妻女和田地而战的北军击退。第三天，南军孤注一掷，向北军的中央猛扑过来。

1863年7月3日，在一片倾斜的开阔地上，南军蓝色的弗吉尼亚军旗在前面开路，1.5万名士兵像古罗马军团一样排成几大方阵，潮涌一般稳步向前推进，阵势极为壮观。

但北军密集的炮火和子弹迎头盖脑向他们倾泻。白昼阳光下开阔地中的南军士兵，都成了隐蔽在石头和工事后面的北军的活靶子。



南军方阵拼死前进，经过致命的开阔地逼近北军最后一道防线时，南军差不多只剩下一半的士兵。接下来双方军队胶着混战在一起，白刃战开始，彼此用军刀狠狠砍击，南部和北部的鲜血交融在一起，浸透了宾夕法尼亚的大地。7月4日夜间，一场滂沱大雨倾泻而下，清洗着尸横遍野的战场，罗伯特·李带着败兵冒雨向波托马克河溃退。米德飞马赶到前线，这时他心里才一颗大石头落地。他整整三天三夜没合眼，忙于向各军军长发出一道道事后被证明是正确无误的命令。

葛底斯堡战役，是内战史上流血最多的战斗。北军死伤和失踪 2.3 万人，南军 2.8 万人。火线上—棵红杉树中了 250 颗子弹，另一棵紫杉中了 110 颗。在一户农家并不宽敞的牛栏里，30 匹良种战马倒毙在里面。山野间死伤者横七竖八，层层迭迭。漫山遍野所有正当时令开放的白雏菊，被步兵粗暴的皮靴和骑兵的马蹄践踏成一片烂泥。

葛底斯堡战役为时 3 天，是美国内战中最大的一次会战，从此南军一蹶不振，再也无力大举进犯北方。也是林肯政府在战争第二阶段收获的—个辉煌战果，预示了北方在内战中的最终胜利。

葛底斯堡战役和维克斯堡战役这两线几乎同时结束，遥相呼应的大胜利，使林肯和首都沉浸在欢乐中。人们涌向白宫庆贺，林肯向欢乐的人群发表演说：

“先生们，对于这样—件大喜事，我应该说几句话，可是我找不到能配得上这—光荣时刻的言辞。我赞扬那些在东线和西线卓绝奋战的将士，不过我最好还是不提任何—个军官的名字，因怕挂—漏万，反而不美。”

紧接着，北部最大城市纽约却发生了三天反对林肯的暴乱。暴徒们聚集起 7 万之众，反对征兵制和战争。他们烧毁征兵大楼、邮政局、工厂和黑人孤儿院，殴打警察和宪兵司令，每天吊死 3 个黑人。他们高叫“让征兵和战争见鬼去吧！”“把老阿怕叫到纽约来！”

林肯没有去。而是从刚刚打赢葛底斯堡战役的波托马克军团调去了步兵、骑兵和炮兵。暴乱逐渐平息，风平浪静。林肯的声音响彻在群众集会上，他赞扬为保卫联邦而浴血苦战的黑人，猛烈抨击那些闹分裂和暴乱的白人：

“有那么—些人对我表示不满。对这些人，我只好说：你们渴望和平，因为大家没有得到和平而责怪我。对此，我正尽力而为。你们赞成吗？如果赞成，那么在这—点上我们就取得—致了。如果你们不赞成，那么，另—个办法就是放弃联邦。这个办法我是反对的。你们赞成这个办法吗？如果赞成，那你们就直截了当他说吧。如果你们既不赞成使用武力，又不同意联邦解散，那么就只有可想而知的妥协了。

看来，和平的前景比过去更临近了，我希望它很快来临，并永远保持下去。到那时，将有一些黑人会记得：他们曾默默无语，咬紧牙关，端起刺刀，凝视前方，为人类获得这个伟大的成就作出了贡献；相反地，我倒担心有些白人将无法忘记：他们曾心怀恶意，

口出谎言，千方百计地阻挠人类获得这个伟大的成就。”

林肯的声音引起热烈的反响。暴乱发生城市纽约最大的报纸《纽约时报》评论道：“即使最高明的修辞学家也未曾使用过比这更切题的语言，其中每一个字都能为最朴实的庄稼汉看懂。……阿伯拉罕·林肯今天成了共和国国内最受欢迎的人。”

一个最杰出的逃亡奴隶弗·道格拉斯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他的声音代表了当时黑人同胞对林肯的诚挚之情，对林肯曾经在某些问题上行动迟缓的谅解，最后，他激动人心的演说是被解放了的黑人奴隶对林肯的颂歌。

道格拉斯（与曾经和林肯七场大辩论的那个法官同姓）是一个混血黑人，母亲是黑奴，父亲是白人，也许这双重的血统赋予了他对世界有一种更为宽广的眼光。他从小在种植场当奴隶，干过各种苦工，体格特别强壮，声若洪钟。他靠自学学会了读书识字，独自从南部潜逃到北部，自己解放了自己。反奴隶制的人们发现了他那天才的演说才华，就派他到各大都市巡回演说，现身说法，痛斥奴隶制的罪恶。在美国政治生活中，他越来越有影响力。他曾奔赴白宫拜见林肯，两人长时间地讨论黑人问题。

道格拉斯被人们推上讲台，他一开口，一种生命力极其火热的声音即刻传遍全场：

“我不愿听到任何诬蔑黑人卑贱和无知的说法。如果一个黑人懂得拿起武器来保卫这个政府，挺起胸膛去抵挡叛军的猛烈炮火，那么他就懂得投票，他就应该获得选举权。[热烈鼓掌]

在前几年，我还不能安全地进入马里兰州和首都。现在，我能够去那里了，我已经到那里见过总统。你们当时没在场，也许你们会乐于了解合众国总统是怎样在白宫接见一个黑人的。

我愿意告诉你们他是怎样接见我的——正像你们见过的一个有身份的人会见另一个有身份的人一样。[热烈鼓掌]我告诉你们，我感到自己在那里是太神气了！现在，你们想要知道他留给我什么样的印象，我也正要告诉你们这一点。他留给我的印象正如你们每个人习惯的那样，是一个诚实的人。[掌声]他的真挚、他对祖国的忠诚，以及他为把祖国从千难万险中拯救出来的决心，在刚见面时就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这是我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掌声]

他告诉我（我认为他给予我的荣誉超过了我应该得到的），他看到了我在纽约某处发表的一篇简短的演说已登载在报纸上。我在这篇演说中讲到，如果要我谈谈在目前政治和军事形势中最令人悲伤和失望的是什么，我认为，这不是陆海军在战场上所经受的种种灾难，而是合众国总统执行的迟缓、犹豫和动摇政策。总统对我说：‘道格拉斯先生，人们指责我迟缓等等……但是，一旦我采取了立场，就永远不会从这一立场后退。’[掌声]

在我看来，这是我们会见中他所谈的最重要的一点。我告诉他，他在宣布黑人士兵和俘虏应同白人士兵和俘虏得到同样保护的问题上有点迟缓。他说，需要大声疾呼使全国同意这一点。当他感到全国还没有为这样做好准备时，他在这个问题上犹豫的。

他说，需要做准备工作，现在，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了。……我认为，他说得很有道理。我得出一个结论：尽管阿伯拉罕·林肯集伟大、明智和能言善辩于一身，他还是不会以‘伟大的阿伯拉罕’、‘明智的阿伯拉罕’，或‘能言善辩的阿伯拉罕’这类称号流传后世，如果这个国家得救的话，他将以‘诚实的阿伯拉罕’流传后世。[掌声]他将把这个称号传下去，将和华盛顿的名字并列地写在我们这个广阔世界的每一个地方而不至于贬低后者。[掌声再起]

但是，在目前这样的时刻，能拯救我们的不是船长，而是全体船员；不是阿伯拉罕·林肯，而是总统宝座后面的力量，这个力量比总统宝座本身更伟大。你们和我，我们大家已经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了。[掌声雷动]

1863年11月19日，葛底斯堡战役刚过去4个月，国家烈士公墓即在葛底斯堡建成并在这一天举行落成典礼。预定在此日发表演说的是埃弗雷特，他是当时的国务卿和哈佛大学校长。美国各州州长又联名写信，邀请林肯参加典礼：“大家希望在推定的发言人之后，你，作为国家元首能讲上几句话，把这片土地正式奉献给死难烈士，作为他们的安息之所。”

林肯接受了邀请，并准备了演说稿。演说稿的一部分是在华盛顿写的，由于他太忙，没有仔细推敲一番，自己也不甚满意。

林肯在草拟葛底斯堡演说稿时，采纳了一些朋友和同志们的建议，所以他是“为全世界争取民主而战斗的人”这种世界发言人的姿态出现在演讲台上，而不仅仅是合众国总统。

林肯深知：要想战争尽快结束，只有更深入地唤起南北部人民认清内战的实质并不是北部人打南部人，而是一场人民反对专制集团的战争。当拿破仑·波拿巴在共和国时期与欧洲暴君作战时，他不仅使用他的刺刀和大炮，而且还尽量使用各种演说和文告。林肯也感到，应利用今后一切机会用演说教导和启发广大的人民群众。

赴葛底斯堡之前，林肯的心情可谓是悲喜交织：他颁布了一个简短的文告，说他已在奥马哈市内划定了联合太平洋铁路的起点站，铁路工程已正式开始。内战尚未结束，大规模的建设工作已经展开，这特别令人欣慰，因为它预示了战后更为广阔的建设前景，在战争的废墟上重建南部，重建合众国；与此同时，林肯最心爱的大儿子塔德正病倒在床，病因不明。而全家人还尚未从第三个儿子威廉夭折的悲痛之中走出来。

林肯的专列在落日的余晖中缓缓驶入葛底斯堡，这个平素十分寂静，只有3500居民的小镇又充满如同战时的喧嚷，不过没有枪炮声和死伤者的嘶喊，只有来自全国各地欢乐的人们，军乐队彻夜高奏着迎宾曲。

第二天，1863年11月19日上午，5万来宾从葛底斯堡出发，去参加在镇外公墓岭举行的典礼。人们有的步行，有的骑马，宁静的山道上再度充满犹如战时的滚滚人流。林肯穿着黑色衣服，戴着黑丝绒礼帽和洁白的手套，10点钟，跨马从葛底斯堡出发。

主席台上坐满各州州长，将军、外国公使和国会议员，他们都是林肯亲密的朋友，战友或同事。主席台下人山人海，公墓岭坐落于无边无际的麦田、牧场、果园和坡地之间，风光如此多娇。

埃弗雷特首先演说，他也是一位一流演说家，声调沉静，措词华美，

充满抒情诗般感染力。他望着眼前合众国的大好河山，就从这片大地说起：

“从这片经过人们终年耕耘而现在已安静憩息的广阔田野放眼望去，那雄伟的阿勒格尼山脉隐约地高耸在我们面前，弟兄们的坟墓就在我们脚下。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用我这微不足道的声音来打破上帝和大自然所安排下的这意味无穷的寂静。……当我的目光环顾这片不久前被忠勇的烈士们用鲜血浸染的田野时，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切地感到，一句古老的谚语说得多么好啊：为国捐躯，死得其所。”

埃弗雷特接着总结了葛底斯堡 3 天血战的主要特点，并痛斥了分裂和叛乱，还引用了古希腊“苍茫大地，英烈之墓”的名言赞颂烈士。他滔滔不绝地讲了 1 小时 57 分钟。最后，他说：“自从我国有历史记载以来，在我们共同的国家的光荣史册中，没有哪一页比葛底斯堡战役更加光辉灿烂。”

这篇演说是埃弗雷特一生中的杰作，其演说技艺堪称炉火纯青。他在演说中所抒发的情感和意愿，代表了大多数人们的心情。

来自巴尔的摩的一支合唱队演唱了一首大颂歌后，林肯的密友、华盛顿警察局长拉蒙站起来宣布：“现在请合众国总统讲话。”

林肯站起来开始演说，一只手拿着两页稿纸，偶尔向稿纸瞟一眼。在这之前，林肯已经抽空从衣袋里掏出稿纸粗略地看了一遍。林肯的语速相当缓慢，带着一种来自大地而又凌空振翼的启示感：

“87 年以前，我们的先辈们在这个大陆上创立了一个新国家，它孕育于自由之中，奉行一切人生而平等的原则。

现在我们正从事一场伟大的内战，以考验这个国家，或者说以考验任何一个孕育于自由之中，奉行上述原则的国家是否能够长久存在下去。

我们在这场战争中的一个伟大战场上集会。烈士们为使这个国家能够生存下去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在此集会是为了把这个战场的一部分奉献给他们作为最后安息之所。

我们这样做是完全应该而且非常恰当的。但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这块土地我们不能奉纸，我们不能圣化，我们不能神化。曹在这里战斗过的勇士们，活着的和去世的，已经把这块土地神圣化了，这远不是我们微薄力量所能增减的。

全世界将很少注意到，也不会长期地记起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说的话，但全世界永远不会忘记勇士们在这里所做过的事。

无宁说，倒是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应该在这里把自己奉献于勇士们已经如此崇高地向前推进但尚未完成的事业。倒是我们应该在这里把自己奉献于仍然留在我们面前的伟大任务，以便使我们从这些光荣的死者身上汲取更多的献身精神，来完成那种他们已经完全彻底为之献身的事业；以便使我们在这里下定最大的决心，不让这些死者白白牺牲；以便使国家在上帝福佑下得到自由的新生，并且使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世长存。”

《波士顿广告报》记者黑尔手拿铅笔和笔记本，记下了林肯的全篇

演说词。但另一家报纸的摄影记者却运气不好。由于演说很简短，不到3分钟。等他手忙脚乱摆弄好他那笨重的摄影机，准备摄下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林肯的演说已经到了最后一句“民有、民治、民享”，这位记者已来不及拍照了，使他后悔不迭。

林肯在一阵经久不息的掌声中退下讲坛，他演说生涯中最辉煌的一次演说就此结束。与在他之前登台演说的埃弗雷特那篇演说相比，埃弗雷特称得上是优秀，或进一步说，堪称杰出；而林肯这篇演说则带有伟大演说的全部特点：一位伟大历史人物为纪念一个伟大历史事件在一个伟大的地点所发表的完美献辞。

各种反响纷纭而至。葛底斯堡附近一家报纸攻击道：“总统这一次得逞了，因为他既不理智、又无节制地乱讲一通。他这样做与其说是为了国家的光荣和对死者的尊敬，不如说是为了党派的利益。我们不愿读总统的那些蠢话，为了国家的荣誉，我们希望这些话将被完全遗忘，永远不再被人们诵读或想起。”

南部联盟大本营里士满一家报纸反问道：“林肯在演说中大谈为一种思想、一种宗旨、一种观念献身。那么我们是为什么而战呢？难道只是为了一种抽象的观念。”

另外几家报纸则截然相反。《芝加哥论坛报》的一名记者从葛底斯堡发回报社的电文只有一句话：“林肯总统的献词将永垂青史。”他似乎是在与林肯比赛简洁风格，因为林肯的这篇演说只有10个句子。

《辛辛那提新闻报》评价道：“这是在合适地点说了恰到好处的话，无论从哪方面看，它都完美无疵，它是一篇誉满全球的演说词。”

林肯故乡斯普林菲尔德一家报纸因为过于推崇这篇演说，而苛刻地抱怨林肯以前的演说“总统这篇短小精悍的演说是无价之宝，感情深厚，思想集中，措辞精炼，字字句句都很朴实、优雅，行文完美无疵，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我们久已听惯了他那平淡无奇、语病百出的讲话，因而总认为他的演说跳出老框框。然而这次的演说证明了他完全能够讲得很出色，正像他能够干得很出色一样。反复阅读这篇讲话吧，你会得益匪浅，因为它是一篇可以作为典范的演说。”

第二天，埃弗雷特向林肯表示敬意：“如果我在两小时内所讲的东西能稍微触及你在两分钟内所讲的中心思想，那我就感到十分欣慰了。”林肯马上谦逊地答道：“昨天，就我们各自所处的地位来讲，你没有理由作一篇短小的演说，而我则没有理由发表长篇大论。你居然认为我那简短的讲话还不是全盘失败，我为此感到十分高兴。”

林肯《葛底斯堡演说》的手稿共有六份。他在华盛顿写的初稿和在葛底斯堡演说时的二稿，最后都赠给了国会图书馆保藏至今。他还抄了一份供平版印刷用，作为真迹收在《美国作家手稿集》中。他还应邀为他在葛底斯堡的房东抄了一份。另外两份则是为纽约和巴尔的摩的士兵福利募捐拍卖会抄写的。

## 第二次就职演说

在美国历史上被称为“史诗般的1863年”接近尾声时，林肯于12月8日向国会发布年度国情咨文，总结这一年的国情，回顾已经三年的

战争。他首先为美国人民又获得了一个“欣欣向荣、五谷丰登”之年而“再次向上帝感谢宏恩”。总统向人民致敬：“我们的人民是无与伦比的，他们心甘情愿地承受着一场伟大的战争所带来的重担。”

林肯引证宪法授予总统的赦免权，为重建分裂的联邦发表《大赦和重建的宣言》。对那些希望获得赦免的人，联邦政府将给予赦免，既往不咎。但南部同盟的高级文武官员、从联邦政府叛逃到南部同盟去的人，虐待黑人士兵俘虏的人不在大赦之列。获得完全赦免的，财产将归还，但昔日的财产奴隶除外。凡是想获得完全赦免的人必须作如下宣誓：

“我在全能的上帝面前宣誓，今后，我愿忠诚地支持、保护和捍卫合众国宪法，以及根据宪法所建立的联邦，同时，我将以同样的态度遵守和忠实地支持国会的一切法令，遵守和忠实地支持总统在曾在叛乱期间所发布的有关奴隶问题的一切宣言。谨此宣誓，上帝为证。”

最后，针对总统可能撤销《最后解放宣言》的种种谣言，林肯发誓般说道：

“只要我仍然担任我目前的职务，我决不收回或修改宣言，我也决不使那些根据这一宣言的条款或根据国会的任何法令而获得自由的任何人重新沦为奴隶。”

林肯话音刚落，雷鸣般的掌声响彻整个国会大厅。《北美评论》一位专栏作家评论道：

“也许从华盛顿以来，我国还没有一个总统能够像他那样，在暴风雨中执政三年，得到人民如此坚定不移的信赖。起初他行动那么迟缓，以致使一些人感到不耐烦，他们主张拼命加大马力，甚至引起爆炸也在所不惜，否则就不承认火车有前进的迹象。后来他行动又那么迅速，从而使那些认为只要锅炉底下还有火星就不安全的人大吃一惊。林肯先生，总是等待着，直到适当的时刻才把他留着的一手施展出来。”

1864年3月，林肯授予他最优秀的战士格兰特一枚勋章，并将他提升为陆军中将，任陆军总司令。在内战前美国只有两人获得中将军衔，其中一位是独立战争时期的总司令华盛顿。

格兰特从前线回到华盛顿，他受到成千上万人热烈的欢迎，人们欢迎这位美国英雄从前线凯旋。格兰特身材短小，壮实，体型像一颗子弹，穿着一套缀有两颗星的少将衔褪色军装，蓄着粗硬的浅褐色络腮胡子。

林肯从未见过格兰特，在授予他陆军最高指挥权的典礼上，林肯紧紧握着他的手，发表了四句话的授职演说：

“格兰特将军，在当前这场伟大的战争中，国家对于你所建树的功勋表示嘉奖，对于你能完成今后的任务表示信任，因此，观特授予你合众国陆军中将军衔。给予你这一崇高荣誉的同时也意味着把相应的重任交托给你。国家既然信任你，那么，它也将支持你。我无须再说明，我在这里代表国家所说的话和我自己的心意是完全一致的。”

格兰特则谦逊地把光荣归于他的士兵。他对林肯答谢道：

“总统先生，我接受这项任命，衷心感谢授予我这么崇高的荣誉。我们的军队已为祖国身经百战，在这样一支卓越军队的支持下，我将竭尽全力以不辜负你的期望。我深切感到现在托付给我的责任重大，同时我也懂得，只有依靠我们卓越的军队，特别是依赖指引着各国和人类前进的上帝的保佑，我才能完成赋予我的重任。”

林肯和格兰特会面的消息以及他们互相的致辞，迅速通过电讯传遍全国。陆军总司令格兰特向林肯勾画出接下来内战发展的伟大战略：格兰特、米德在东线，薛尔曼在西线，将形成一把大铁钳，当东西两线军队最终会师时，南部将被夹击得土崩瓦解。这与林肯原来的主意不谋而合，总统相当高兴。

与此同时，北部和边界州涌现出大批战争财或国难财的暴发户。薛尔曼将军大骂那些只要能赚钱而不惜和敌人做生意的商人。假冒伪劣商品到处泛滥。暴发阶层穷奢极欲，而阵亡士兵的寡妇在贫民窟里活活饿死。驻华盛顿的一位英国记者评论道：“一场大战中滋生出来的恶棍总是比杀死的恶棍要多。”

华盛顿一些高级政府官员利用职权玩弄漂亮的贫穷妇女。财政部的一个局竟成了诱奸和卖淫的场所，国会议员把他们的姘妇雇为办公室职员。一位道貌岸然的参议员在大街上和被他奸污过的一个妇女厮打，被愤怒的妇女打翻在地。华盛顿到处都是醉鬼，政府在与战争物资承包商签订合同时屡屡受骗上当。一位专栏作家痛心疾首的评论道：“华盛顿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荒淫无耻。”

林肯对此义愤填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遏止这些腐败现象。光明和希望仍然存在，有 500 万美元的私人筹款交给了军方，人民捐献的价值 1500 万美元的实物也完全运到了前线。

在华盛顿一次为士兵举行的义卖会上，林肯发表演说赞颂了美国两种人对国家的贡献：

“在各阶层中，承担战争最大重担的是士兵。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并经常献出自己生命的士兵建立了最高的功勋。其次就是美国妇女。在为减轻士兵及其家庭的痛苦而组织的义卖活动中，她们起着主要的作用。

我从来没有研究过赞美女性的艺术；但是我必须说，如果把演说家和诗人自古以来赞美女性的话都用在美国妇女的身上，都不足以对她们在这场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作出公正的评价。”

这时全国的工人运动正发展起来，已初具规模。纽约工人协会把林肯选为名誉会员，林肯向工人代表演说，号召他们团结起来，不要彼此为敌，工人永远是工人的朋友，也是联邦的基础：

“我以感激的心情接受你们协会授予我名誉会员的荣誉。正如你们的致词所表明的，你们了解到目前叛乱的意图不仅仅是要永保非洲黑人奴隶制，实际上也是对全体劳动人民权利的宣战。

任何人对于镇压这场叛乱都没有劳动人民那样深切关心。要使他们警惕不要在他们之间产生偏见、破坏性的分裂和敌意。你们市

去年夏天发生的骚动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一些工人被另一些工人绞死，这类事情永远也不应发生。除了家庭的关系以外，人类之间的同情心这条最坚强的纽带应该把一切民族、一切话音和一切血统的全体劳动人民联合起来。当然这不应导致对财产的宣战，也不应导致对业主的宣战。财产是劳动的果实——财产是可贵的，是世界上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美好的东西。”

工人代表们从这位曾经是普通劳动者的总统演说中，体会到了体力劳动者之间那种天然的亲和感。

1864年4月，一件大屠杀的新闻从前线传来。在密西西比河畔的皮洛堡垒，6000南军围困600北军，一举攻克堡垒。南军将领福雷斯特将一半以上的北军俘虏处死，有的惨遭活埋。其中大部分是黑人士兵。福雷斯特声称：“我像看待缴获的其他财物一样看待俘虏的黑人。我并不把他们看作是俘虏的士兵。”

6天以后，林肯在巴尔的摩群众集会上演说，他用生动的寓言打比方，深刻地抨击南部军队的暴行，他们对自由的践踏：

“我们都声明拥护自由，但是在使用同一个词时，并非都指的同一回事。对有些人来说，自由这个词可能意味着每个人都有权随心所欲地支配自己和自己的劳动成果；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这同一个词可能意味着某些人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他人的劳动成果。

牧羊人把狼赶走，从狼的爪子下救出了羊，羊为此感谢牧羊人，称他为解放者；而狼则谴责牧羊人，说他是自由的扼杀者，特别是因为这只羊是一只黑羊。很明显，羊和狼对自由这个词下的定义是不一致的；而今天在我们人类当中，也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分歧，甚至在北部也是如此，虽然大家都自称热爱自由。

我们已经听到叛军在皮洛堡垒对300来个黑人士兵和白人军官进行大屠杀的令人痛恨的传闻，我担心这恐怕是真的。我们目前正在对皮洛堡垒事件进行彻底调查，如果那里屠杀了300人，或者哪怕只是杀了300的1/10，事情总会最后得到证实的，一旦得到了证实，那么毫无疑问要进行报复。我们将严肃考虑究竟采取何种方式进行报复；只要情况属实，肯定是要报复的！”

林肯的声音被群情激愤的呼喊声淹没。前线的格兰特和薛尔曼很快对南军发起一场炮火连天的血战。格兰特和薛尔曼的刺刀、大炮和军队，是林肯一切演说的坚强后盾。

格兰特是坚定的主张战争，拥护联邦分子，因此在大选前夕的1864年初，《纽约先驱报》不断地为格兰特竞选总统摇旗呐喊：“格兰特，人民的候选人。”一些坚决不同意林肯连任总统的人也齐声应和。

格兰特对此公开声明：“我只渴望得到一个政治职务。这场战争结束后，我打算竞选我的家乡加利纳市的市长。如果我当选，我准备在我的住宅到车站之间修建一条人行道。”

林肯的一些朋友担心格兰特攻下南部大本营里士满后，将功高震主，要林肯提防这个唯一可与他抗衡的人物。林肯对这些顾虑通常报之



一笑：

“如果格兰特能拿下里士满，就让他当总统好啦！如果格兰特将军当总统能更有利于镇压叛乱，我赞成他来当。他完全保证忠于我们解放黑人奴隶和使用黑人新兵的政策；如果这项政策得到贯彻，谁当总统都一样。”

1864年6月21日，林肯带着病体初愈的长子塔德，乘一艘白色轮船沿波托马克河顺流而下，去观察格兰特的军队。

林肯骑着战马，戴着黑色丝绒大礼帽，身穿礼服抵达格兰特营地。据当时一名随军记者的报道：“林肯到达部队时，已是尘土满身，一身黑衣服变成像同盟军制服那样的灰颜色了。他的裤子被揉得缩到踝骨以上。乍看起来，他简直就像一个穿着节日盛装骑马进城的乡村农民。但是，那些部队敬佩这个人的感情是如此的深厚，以致对他这副滑稽可笑的样子并不感到惊讶。列队的士兵们迅速挨个传话，说‘阿伯大叔来了，阿伯大叔来了’，顿时，整个军营一片欢腾，四面八方响起了热烈的高呼和亲切的招呼声。”

特别是当林肯走到一个黑人兵团，黑人士兵如波涛汹涌围住总统，围住他们的解放者。他们热泪滚滚，欢呼震天。他们争相握住林肯的手，亲吻这双签署过《最后解放宣言》的美国英雄的手，抚摸着林肯的战马和马鞍。一部分黑人还唱起了催人泪下的黑人灵歌。林肯脱掉帽子骑在马上，面对这片欢腾动人的黑色波涛，声音哽咽，热泪夺眶而出。

全国大选正进入候选人提名阶段。戏剧性的是，尽管在参众两院中林肯的本党议员几乎一致不赞同他被重新提名，但另一个新成立的支持林肯政府的全国联邦党却公推林肯为下届总统候选人。在该党巴尔的摩代表大会上，主持人问道：“对于阿伯拉罕·林肯将成为总统候选人，谁还有疑问吗？”话音未落，暴风骤雨般的掌声响彻全场。

林肯对此的态度怎样呢？在向全国联邦党代表团致词时，这位对马匹十分熟悉地总统说道：

“我既不掩饰我的满心喜悦，也不抑制我的感激心情。先生们，我不会得出结论说我是全国最优秀的人，但是我联想到一个荷兰老农的故事，他曾对他的同伴说过：‘过河中途莫换马。’”

在向民众解释他稳扎稳打，绝不冒进的战略时，这位早年曾经是一位水手的总统，就从祖国的河流谈起：

“在我国西部河流上，舵手们总是像他们所说的，从一点到一点地领着航船前进——就是不要把每次的航线定得太长，以免超过他们的视野。对于我们面临的这许多重大问题，我也打算这样做。”

另一次，林肯指着白宫窗外一棵梧桐，对人们表示他坚守岗位的决心：

“我要告诉你们人民的要求是什么。他们要求的而且必须得到的是胜利。但不管胜利是否到来，我都要留在这个岗位上履行我的职责。我决心呆在这里。他们可以把我吊死在那棵树上，但是，上帝保佑，我将永远不会放弃我的岗位。”

前线捷报频传。1864年9月3日，薛尔曼将军致电林肯：“亚特兰大已在我掌握中，我军大获全胜。”薛尔曼这句电文成了所有报纸的头条新闻。北军攻克亚特兰大，这个南部同盟的交通枢纽和植棉州的仓库就完了。罗伯特·李和他的军队孤军被围困在格兰特的防线之内，全歼指日可待。

华盛顿一片欢腾。林肯下令所有的教堂在下一个礼拜日全部举行感恩祈祷，他对全国宣告：

“总统在此向威廉·提·薛尔曼少将及其统率的攻占亚特兰大的英勇官兵致以全国人民的谢意。他们的进军、战斗和围攻，他们的胜利，必将永垂战史。”

这时薛尔曼将军在被攻克的亚特兰大，写给格兰特将军，相约下一步的进军。他素来热爱和敬佩格兰特，语气亲如家人，犹如两个牛仔在谈家常：

“如果你能击败罗伯特·李，而我能挺进到大西洋海岸的话，我想，阿伯大叔会给我们20天假期去探望儿女们的。”

紧接着，10月19日晚，北军身材矮小的名将谢里登及其骑兵再传捷报。他们在谢南多亚河谷重创南军。谢里登33岁时任波托马克军团骑兵司令，骁勇善战，当年即在一次突袭战中切断罗伯特·李的交通线，击毙了31岁的南军骑兵司令斯图尔特，此人勇猛异常，是罗伯特·李的心腹爱将，号称“李军的眼珠”。谢里登后来继薛尔曼任美国陆军总司令。林肯迅速致电谢里登，感谢大选前夕这位年轻的骑兵给他和北部送来的绝佳厚礼：

“我怀着极为愉快的心情，向你和你部勇敢的官兵们表达全国人民的谢意，以及我本人的钦佩和感激之情，感谢你们本月在谢南多亚河谷的英勇奋战，特别要感谢1864年10月19日取得的辉煌战果。”

华盛顿的大选激烈程度与前线不相上下。一家周刊列举了反对派报刊送给林肯的称号：“无尾猿、大猩猩、大傻瓜、下流的说书人、暴君、撒谎家、吹牛大王、小偷、小丑、篡权者、怪物、乌龟、笨蛋、老无赖、伪证人、三流律师、强盗、骗子、恶霸、魔鬼、刽子手、土地掠夺者。”

而支持林肯的人士则断言：“总统的品格犹如一块巨大的岩石，反对派在这块岩石前碰得头破血流。反对派以起哄和诽谤向他和他的政府

发起猛攻，但总是败下阵来。公众坚信总统对他的事业忠贞不渝，动机纯正。”

一位奴隶出身的黑人妇女从遥远的密执安湖畔来到白宫拜见林肯。她握着林肯的手说：“总统先生，当你第一次就职时，我担心你会像给扔进狮子窝那样，被撕得粉碎。如果狮子没把你撕成碎块，我想，那是上帝救了你。我说过，如果上帝还让我活着，我将在你四年任期届满前来看你。上帝让我活下来了，因而我现在就来亲眼看看你。”

林肯向她鞠躬并感谢她，还在她的纪念册上题写了下面的话

索琼纳·特鲁思大婶留念

阿·林肯 1864年10月29日

1864年11月8日，大选揭晓，林肯再度当选为合众国总统。他赢得了士兵们压倒多数的选票。（这与邱吉尔战后连任首相竞选中失掉绝大部分军人的选票，构成奇妙的对照。）

格兰特将军即刻从前线发来贺电：“对国家来说，这次胜利比战场上取得的一次胜利更有价值。”

第三天晚上，白宫前面的草坪上挤满庆贺的人群。当人们看见当选总统的身影出现在北面的门廊时，他那高高身材简直就是胜利的象征。林肯等欢腾的人群安静下来后，掏出已经准备好的演说稿，在闪闪的烛火和满天星光之下发表了他新当选之后的第一篇演说：

“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如果一个政府对保障人民的权利拿不出十分强大的力量来，那么它在危急的关头是否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来维护其自身的存在呢？在这一点上，当前这场叛乱使我们的共和国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

这次选举是必要的。不进行选举我们就不可能有自由的政府。如果这场叛乱能迫使我们提前或推迟全国大选的话，那完全可以断言，它已经征服和打垮我们了。……人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当今后经历任何重大的民族考验时，那时的人们与经受这次考验的人们相比，他们中同样会有软弱的人和坚强的人；有愚蠢的人和聪明的人；有坏人和好人。……黄金诚然是宝贵的，但是，生气蓬勃，勇敢的爱国者却比黄金更为宝贵。

现在，在结束我的讲话时，请允许我请求你们，向我们英勇的陆海军士兵以及他们勇敢的、富有经验的指挥官们，由衷地欢呼一声吧！”

整座白宫在林肯和联邦的支持者们的欢呼声中微微颤动。4个月后，林肯此夜演说中的某些强硬调子，在第二次总统就职演说中得到发展。

林肯的事业也是全世界的事。国外评论纷纷高度评价林肯的连任。伦敦一家报纸说：“虽然北部的土地上布满医院，城市里挤满破产者，虽然家家户户都在为自己的儿子哭泣，物质文明倒退了几个世纪，但北部宁愿以豪迈的勇气继续战斗下去，而不愿承认自由只不过是一种空想。林肯先生这个怀有崇高目标和具有顽强精神的精干的农民，表达

了人民的决心。尽管他受到指责，有时他确实遭到失败；尽管他粗鲁笨拙，有时缺乏当机立断的才能，但他仍不失为这个正在为自己的生死存亡进行斗争的国家的最好代言人。”

美国驻巴黎领事认为：“林肯当选比美国革命以来所发生的任何事件都更值得全国感谢。”

最深刻的赞美来自德国的卡尔·马克思。他代表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写信给林肯：

“阁下，我们为您以大多数票再度当选向美国人民表示祝贺。如果说您在第一次当选时的适中心号是反抗奴隶主的权势，那么您在第二次当选时的胜利的战斗号召则是：消灭奴隶制！自从巨大的搏斗在美国一展开，欧洲的工人就本能地感觉到他们阶级的命运是同星条旗连在一起的。”

在前线，薛尔曼的 5.5 万名精兵开始从亚特兰大千里远征，最后的目标是在弗吉尼亚马格兰特胜利大会师。薛尔曼打算带着军队深入敌后横扫南部。

1864 年 11 月 15 日薛尔曼军队从攻克的亚特兰大开拔时，整座亚特兰大在他们身后熊熊燃烧，浓烟滚滚。薛尔曼本着自己“彻底摧毁南部”的原则，命令工兵部队破坏了亚特兰大市内和市外的全部铁路。他们把铁轨烧得通红，然后把它绕在电线杆或大树上，称之为“薛尔曼别针”。所有的工厂、机器和军火库被炸毁。1800 幢建筑物全部起火。

薛尔曼的远征军由 218 个团组成，弹药和供给充沛。部队士气高昂，大多是身经百战的老兵。他们在行军路上情绪高昂，高唱《约翰·布朗之歌》，以四路纵队前进，横扫 20 到 40 多英里宽的地带，全军在南部的土地上乘胜前进。

在首都和南部，有人指责薛尔曼是“残暴的匈奴王”、“虐待狂和魔鬼”。对此薛尔曼毫无良心上的责备。他说：“叛乱分子强迫我们进行战争，现在他们总算尝到了战火的滋味，他们是自作自受，而且还应受到更多的惩罚。”

一个月以后，圣诞节前夕，薛尔曼攻克南部重镇萨凡那市。他电告林肯：“请允许我把萨凡那市以及 150 门大炮、大量弹药和约 2.5 万包棉花作为圣诞节的礼物献给你。”

林肯在圣诞节后写信答谢薛尔曼。他诚挚地说：

“当你离开亚特兰大，向大西洋海岸进军时，我的心情即使不是害怕，也是忧虑的。但由于我意识到你的判断比我高明，想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我就没有进行干预。现在，进军已获成功，一切荣誉都属于你，因为我相信，我们这些人所做的只不过是默许而已。请向你部官兵转达我的衷心感谢。”

南部这时一片风雨飘摇，兵源枯竭，士气消沉以至于绝望。消费品和生活必需品奇缺。在南部同盟大本营里士满，人们说：“你用菜篮子装一篮钱去市场，能买回来的东西只能装满一个钱包。”而北部在这些方面一派兴旺。

战争已接近尾声，林肯已在考虑重建南部的计划。他对国家前景充

满信心。林肯强调：“国家资源中最重要的一项资源是活生生的人。我们现在的人口同战争开始时相比是更多了。我们的人力资源并没有枯竭，也谈不上正在枯竭。我们的力量正在增强，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无限期地打下去。”

与此同时，林肯感到废除奴隶制度在联邦宪法中尚无依据，担心根据他颁布的《解放宣言》而获得自由的黑奴，在他退位以后会再次沦为奴隶。实际上从颁布宣言以来，一直有谣传说林肯最终会收回或修改宣言。

所以林肯极力主张修改宪法，永远从法律上解决奴隶制问题。1865年1月，国会通过了宪法第13条修正案。从此以后，在合众国全境之内，奴隶制从法律上得以被废除。这也是林肯在解放黑奴问题上的终极贡献。虽然他在最初的时候，处理这个问题也许显得过于迟缓，但他一旦干起来，就干得如此彻底，干净利落。

2月1日，薛尔曼大军从萨凡那出发，向南部腹地发起最后的进攻。这次秘密进行的6万大军以骑兵为前锋，分两路纵队，冒着连绵的冬雨，在最先叛乱脱离联邦的南卡罗来纳州的土地上推进。薛尔曼感到，这次进军比从亚特兰大出发的那次进军艰难十倍，也是最重要的进军。薛尔曼用骑兵马靴踩着南卡罗来纳这最先燃起叛乱之火的土地，通令全军：“反叛从这里开始，它也将在这里完结。”薛尔曼迄今为止发布正式军令总是禁止滥用暴力和破坏的，但在南卡罗来纳，军令中没有任何这样的字眼。后来他继格兰特任陆军总司令后对此说道：“我当时的目的是要严惩叛军。压倒他们的嚣张气焰，穷追猛打，直到他们走投无路，闻风丧胆。”

此时格兰特正在东线率领大军紧紧围住罗伯特·李。战势良好，林肯在白宫用猎人的语言形象地描述战争的态势：“格兰特揪住了老熊的后腿，而薛尔曼则在剥熊皮。”

在这联邦军队乘胜进军的大背景下，林肯如期再次登上国会的露天讲坛，发表总统就职演说并宣誓就任。

1865年3月4日午前，华盛顿笼罩在蒙蒙细雨和寒风之中。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聆听林肯声音的人们，踏着泥泞的街道向国会大厦行进。此次典礼不同于以前历次总统就职典礼的一道特别而新颖的风景是：一支穿着联邦蓝色军服的黑人军团担任警戒。他们都是清一色健壮勇猛的小伙子，为保卫联邦和“老阿伯”不惜生命。

国会大钟敲响正午12点后，林肯从主席台的前排正中站起来，对参议员和最高法院的法官们发表即席演说：

“尽管我很微贱，尽管也许人们认为我是一个平民，请允许我在明智的与会者面前阐述这一个真理：法官、阁员、总统以及他的顾问们的权力和崇高地位都来源于人民。

此时蒙蒙细雨已经停止，汹涌澎湃的人海发出经久不息的欢呼声，人们叫着林肯的名字，掌声雷动，

林肯在海潮般的掌声中登上讲坛，他一开口，刚才还是喧腾的场面顿时肃穆无声。人们期待了好久，想听听带领美国熬过4年的林肯会说

些什么。人们想听他在这个合众国的最高讲坛谈谈美国的命运和梦想，谈谈已打了4年的内战，谈谈合众国未来的航向。林肯没有让他们失望：

各位同胞：

在这第二次宣誓就任总统的时候，我没有必要讲得比第一次那样长。在那个时候，对于当时所要进行的事业多少作一详细的说明，似乎是适当的。现在四年任期已满，在这段战争期间的每个重大时刻和阶段中——这个战争至今仍为全国所关怀，并且占用了国家的大部分力量——都经常发布文告，所以现在很少有什么新的发展可以奉告。我们的军事进展，是一切其他问题的关键所在，各界人士对此情形是跟我一样熟悉的，而我相信进展的情况，可以使我们全体人民有理由感到满意和鼓舞。既然可以对将来寄予极大的希望，那么我们也就不用不着在这一方面作什么预言了。”

林肯以一个比较低调的开头，引起了全场听众的各种复杂的观感。有的从这个开头感到了合众国在内战之中的那种疲惫不堪，这种疲惫甚至也感染了它的总统。有的借此印证了自己原来的印象：林肯是一个老练的政治家和演说家，他在开头是平淡而清晰地作一点技术性的说明，是为了推出下面的高潮。

果然，林肯马上用一种既客观又清晰的语言，谈到了4年前的内战。他说：

“4年前，在这同一场合里，所有的人都忧心忡忡注视着一场迫在眉睫的内战，人人都害怕这场内战，人人都设法避免这场内战。当时我正在这里作就职演说，竭尽全力想不用战争方法而能保存联邦，然而本城反叛分子的代理人却没法不用战争而破坏联邦——他们力图瓦解联邦，并以谈判的方法来分割联邦。双方都声称反对战争。但其中的一方宁肯开战也不愿让国家生存下去；而另一方所则宁可应战也不肯让国家毁灭。于是战争就爆发了。”

在林肯所摆出的这两组对比中，他并没有声色俱厉地抨击分裂和挑起战争者。但对比之后双方谁优谁劣，谁站在了真理和历史潮流一边，自然可见分晓。林肯紧接着谈到了内战的根源所在：

“我们全国人口的1/8是黑人奴隶，但他们并不是遍布整个联邦，而是集中在它的南部。这些奴隶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和重大的利益，大家都知道，这一利益，由于某种原因，成了这次战争的根源。反叛者的目的是要加强，永保和扩大这一利益，为此他们不惜以战争割裂联邦；而政府则只要求有权制止其地域的扩大。双方都没有预料到战争竟会发生而且会达到目前这样大的规模，持续这么长的时间。双方也都没有预期，冲突的根源会随着冲突的停止而消除，甚至在冲突本身停止之前就会消除。双方都在寻求一个较轻易的胜利，都没有期望获致带根本性的和惊人的结果。双方都念诵同一本《圣经》，祈祷同一个上帝，甚至于每一方都求助于同一上帝的援

助以反对另一方，人们竟敢求助于上帝来夺取他人以血汗得来的面包，这看来是很奇怪的。”

林肯这里站在一个奇特的高度，精彩地对比联邦政府和分裂者双方的种种偶合之处，使听众们感到，这一场内战真像是一场大戏。当听众正沉浸在这种精彩而富于戏剧性的对比之中林肯急转直下，引用《圣经》的箴言，任凭上苍的意愿来处理分裂的罪恶：

“可是我们不要判断人家，免得别人判断我们。我们双方的祈祷都不能够如愿，而且从没全部如愿以偿。上苍自有他自己的目标。‘由于罪恶世界受苦难，因为罪恶总是要来的；然而那个作恶的人，要受苦难。’假如我们以为美国的奴隶制度是这种罪恶之一，而这些罪恶按上帝的意志在所难免，但既经持续了他所指定的一段时间，他现在便要消除这些罪恶；假使我们认为上帝把这场惨烈的战争加在南北双方的头上，作为对那些招致罪恶的人的责罚，难道我们可以认为这件事情有悖于虔奉上帝的信徒后所归诸上帝的那些圣法吗？”

从小熟诵《圣经》的林肯，面对满场从小熟诵《圣经》的人群，抓住基督教民族的文化心理，含而不露地使大家领会到：内战既然不可避免，我们向奴隶制和南方宣战，就是和上帝站在一起替天行道。林肯接着顺势推出这次演说中最为激动人心的部分——祈祷和鲜血：

“我们天真地希望着，我们热忱地祈祷着，希望这战争的重罚可以很快过去。可是假如上帝要让战争再继续下去，直到 250 年来奴隶无偿劳动积聚的财富化为乌有，并像 3000 年前所说的那样，等到鞭笞所流的每一滴血，被刀剑之下所流的每一滴血所抵消，那么我们仍然只能说，‘主的裁判是完全正确而且公道的。’”

在这一段中，我们听到来自《圣经·新约》那种温柔感人的声音与来自《圣经·旧约启示录》那种血与火的声音交织在一起。一部分听众对前一种声音感到欣慰，热泪满面，因为这种祝福和祈祷是对饱经战火的大地的抚慰；另一部分听众则十分敏感于后一种声音，感到“刀剑之血”对“鞭笞之血”的平衡和抵销，是对叛乱者和奴役者的最好惩罚，是复仇的怒吼。最后，林肯召唤道：

“我们对任何人都不怀恶意，我们对任何人都抱好感，上帝让我们看到正确的事，我们就坚信那正确的事，让我们继续奋斗，以完成我们正在进行的工作，去治疗国家的创伤，去照顾艰苦作战的战士和他的孤儿遗孀，尽力实现并维护在我们自己之间和我国与各国之间的公正而持久的和平。”

林肯的职务是总统，他的总统年薪是 2.5 万美元，一年要扣除的所得税是 1279 美元 13 分。4 年期间，他用工资买了 7.5 万美元国家公债券。

林肯的儿子成长到可以上战场的年龄时，总统写信给格兰特将军：“我儿子今年 22 岁，刚从哈佛大学毕业，他希望在战争结束前增长一些关于战争的见识。”林肯坚持要求把儿子当成一名士兵，不希望他当军官。但格兰特非常高兴地欢迎总统之子“加入我军的大家庭”，并按规定任命罗伯特为陆军上尉。罗伯特表现很好，吃苦在前，从不搞特殊。

总统夫人对林肯诉说她的担心。林肯对此感慨到：“玛丽，多少可怜的母亲都已忍痛作出了这种牺牲，送走了她们的每一个儿子，而且永远地失去了他们。”

一位名叫比克斯比夫人的寡妇，曾先后送 5 个儿子参加联邦军队，全部牺牲。在 1864 年感恩节这天，总统的一名特使带着一份节日佳肴和一笔募集的礼款，以及一封林肯的亲笔信，亲手交给了这位夫人。林肯在信中写道：

“亲爱的夫人：

我感到，对于您遭到如此巨大的损失而引起的深切悲痛来说，我的任何安慰话都只会是多么的软弱无力和毫无用处。但是，我们禁不住要向你表示安慰，这是你可以从共和国对你的感谢中感受到的。你的儿子就是为拯救合众国而捐躯的。

我祈求我们的上帝减轻你失去爱子的痛苦，而留给你的只是对于他们的缅怀和神圣的自豪感。由于你在自由的祭坛上付出了如此昂贵的牺牲，因此，这种自豪感必定是属于你的。

你的最诚挚的阿·林肯”

南北内战是一场年轻人的战争。军队中 21 岁以下的青年占 30%，30 岁以上的人只占 10%。格兰特的部队就是由如此年轻的士兵组成。他在前线向林肯发誓：“如果我们牺牲 3 个人，他们就得死 5 个；如果我们损失 3 匹马，他们就得损失 5 匹。”

林肯 1865 年 3 月 23 日带全家乘“女神号”轮船和军列视察格兰特部队。总统所到之处，联邦军队士气猛涨。在格兰特司令部的营火堆旁，格兰特问道：“总统先生，对于我们事业的最后胜利，你曾怀疑过没有？”林肯注视着温暖的篝火，右手在空中一挥：“从来没有！”

林肯第二天又接见了前来与格兰特胜利会师的骑兵名将谢里登。总统和矮个子谢里登长时间握手后，以高个子林肯式的断然说道：“谢里登将军，在这场无与伦比的战争刚爆发时，我以为，当一名骑兵身高至少要 6 英尺 4 英寸。但是我现在改变了这种看法——在紧要关头，5 英尺 4 英寸就行了。”

3 月 28 日上午薛尔曼乘汽艇赶来与林肯和格兰特会面，总统和他的左右战将在“女神号”上会谈，探讨战后的和平问题，在他们分手之时，林肯非常直率地问薛尔曼：“薛尔曼将军，你知道我为什么看中了你和格兰特？”薛尔曼回答说不知道。林肯信任地说：“告诉你，因为你们从不对我挑剔。”其实林肯对这两位将军也从不挑剔。

3 月 29 日，林肯站在格兰特部队的军列前目送格兰特开往新的前线。火车启动，汽笛长鸣，总统脱帽向士兵们致意，士兵们也挥帽向林肯欢呼。格兰特的部队出发去打内战的最后一仗。这时，南北战争打响



第一炮的萨姆特堡垒早已被北军攻克收回，正在修复中，准备在4月14日南北战争4周年纪念日那天，举行隆重的升旗仪式，合众国国旗将重新迎风飘扬。

格兰特一开上前线，在10天之内就俘虏了1.9万南军士兵。南军军无斗志，弹尽粮绝。

4月8日晚，格兰特主动给罗伯特·李写了一封信：“虽然我无权处理和平问题，但我还是愿意这样声明：我和你一样渴望和平，而且整个北部也怀有同样的心情。我们之间的种种难题，全都可以在不再死一个人的情况下得到解决。”

罗伯特·李此时正被北军先锋、葛底斯堡战役的胜利者波托马克军团紧紧咬住后卫。正焦头烂额之际，接到格兰特的信，他领会到这是一份邀请他谈判投降条件的请帖。

1865年4月9日，弗吉尼亚州阿波马托克斯村，当地居民麦克一幢白色的乡村别墅式的房子前，南军和北军两位统帅历史性地会见。

两人的形象和风度构成奇妙的对比。罗伯特·李58岁，满头银发如霜似雪，带着一种贵族和长者的尊严之气。格兰特42岁，一头黑发和丰茂的连鬓胡子，像一个质朴的蓝领工友；罗伯特·李穿着一套干净而华丽的南军军服，一尘不染，军服上的丝质穗带十分漂亮。而格兰特的军服粗糙、又旧又脏，近乎邋遢，只有肩章上的三颗星表示他的将军军衔。格兰特看着罗伯特·李的军装，道歉说自己直接从战场上来，所以来不及换军装。

两人坐下来谈判。罗伯特·李问：“将军，我想知道根据什么样的条件你才会接受我军的投降。”格兰特说：“很简单。官兵放下武器，投降宣誓后才予以释放。”罗伯特·李说：“哦，和我所预料的差不多。”

格兰特马上把这些条件用铅笔写在一张顺手抓来的纸上。写完以后，就走到罗伯特·李跟前亲手交给他。罗伯特·李接过这份用铅笔写成的文件，掏出眼镜，跷起腿，慢悠悠仔仔细细阅读这份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文件之一。最后，他抬起头来，第一次带着热情的语调对格兰特说：“这将对我军产生非常良好的影响。”

最后，格兰特问罗伯特·李还有什么建议。罗伯特·李抽出腰间一柄华丽的佩剑，要作为投降的纪念物赠给格兰特。格兰特谢绝了。

罗伯特·李又说，在他的军队里，骑兵和炮兵的马匹都是私人的，希望能允许士兵们保留他们的马匹，回家之后能及时从事春耕。

格兰特欣然应允。他说：“那就让他们带着马匹回家种地吧！现在正当春耕季节。”

格兰特还下令给南军送去2.5万份口粮。

第二天，春雨潇潇。罗伯特·李带领南军2.8231万人宣誓后被释放。

格兰特和罗伯特·李骑着马在队列中相互道别，各奔南北。

内战结束。

格兰特避免了一场最后的流血大战，这也是林肯的意愿。从那时至今，美国各个学派的历史学家虽然对南北战争众说纷纭，但对南北两位最著名的军人在阿波马托克斯村的表现，却众口一词，大加赞美。在这场历史性的投降和受降仪式中，南军不失降者的尊严，北军富有胜者的风度。但最令我们感动的是，两位将军对马匹的处理。战争尚未结束，

饱经忧患的国土还在燃烧，罗伯特·李就已想到了战后的春耕；而格兰特呢，他把大手一挥，春耕就开始了。

当天下午4点半，格兰特从阿波马托克斯急电林肯：“罗伯特·李将军于今日下午按照我本人提出的条件交出了他的北弗吉尼亚军团。”

华盛顿立刻沉入一场欢乐的地震。

宫前的草坪上人山人海，阵阵礼炮响彻蓝天。林肯的宝贝儿子塔德出现在总统通常发表演说的阳台上，挥舞着一面缴获来的南部同盟的军旗，人群沸腾了，欢声震天。林肯出现在阳台上，他发表了简短的贺词。最后，他说：

“我提议让乐队演奏一支特别的曲子来庆祝我们的胜利。我马上就说出这支曲子的名字。但在这样做之前，我想提及关于这支曲子的一个小小的情况。我总认为，《迪克西》是我所听过的最好的曲子之一，我们的敌人总想占有它，但我坚决地认为，昨天我们已公正地夺得了它。我向司法部长提出了这个问题，他用他的法律观点说，这是我们的合法的奖赏。现在，我请求乐队赐我此曲。”

《迪克西》顿时在北部重新响起。

“迪克西”是对美国南部各州的统称。《迪克西》是内战期间南部军队流行的军歌。1861年南部同盟“总统”戴维斯举行就职典礼时，选定《迪克西》为“国歌”，后来南军作战时，又把《迪克西》当作军歌。

林肯胜利地夺回南部后，又顺手夺回了一支小小的曲子《迪克西》。

重建南部的使命降临到林肯身上，他感到极其艰难而又十分兴奋。整个内战，南部和北部有300万人走上战场，生产和建设统统让位于战争。在战争中阵亡和伤病死亡全国共62万人，其中北部36万，南部26万。有些南部城市化为一片废墟焦土。

1865年4月11日夜，战后第二天，白宫阳台，林肯在烛光之下向全国演说，宣布重建美国：

“我们今晚不是在悲哀里，而是在衷心的喜悦中集会。我们一直在准备确定一个全国感恩日，日期将在合适的时候公布。……一切归功于格兰特将军，归功于他的英勇善战的官兵们。

恢复国家权力——重建南部，这是我们从一开始就着重考虑的问题，由于最近获得的这些胜利，这个问题比过去更加迫切得多地需要我们给予注意。

重建南部，困难重重。这场战争同独立国家之间的战争不一样，对方不存在我们可以与它打交道的被授予权力的机构。没有一个人能有权代表任何其他他人放弃叛乱。我们必须从那些没有组织的、意见不一致的分子入手，把他们捏在一起。”

政府高级官员大部分坚持严惩南部同盟首脑，但林肯认为应在尽量保全那些反政府叛乱参加者面子的前提下，迅速着手重建工作。军方首脑格兰特和薛尔曼与林肯保持一致。特别是薛尔曼，这位联邦将军在战

时比任何人都更坚持对南部实行彻底摧毁战略，但现在他也对南部露出了笑意。

怎样处置南部同盟“总统”杰弗逊·戴维斯，是一大难题。这时林肯这位老伊索又讲开了一段亲身经历的寓言：

“当我在印第安纳还是小孩子时，有一天早晨我到一邻居家去，发现一个个子和我差不多高的男孩用绳子牵着一头浣熊。我问他干什么，他说，‘爸爸昨晚捉到6头浣熊，除了这个可怜的小家伙，其余5头都被他杀了。爸爸叫我把这头小熊守到他回来，我担心地将把这一头也杀掉。唉，阿伯，我多么希望它跑掉！’我就问他，为什么不把它放走呢！‘那可不行，爸爸会把我揍死的。但是，如果它自己跑掉，那就什么事也没有了。’现在如果杰弗逊·戴维斯之流自己跑掉的话，那就什么事也没有了。但是，如果我们逮住了他们，而我又把他们放走，那么‘爸爸会把我揍死的。’”

戴维斯此时正在北卡罗来纳州举行南部同盟最后一次会议。他执笔写了一封代南部军队向薛尔曼请求投降的询问信，然后南部同盟内阁解散，他向更南的方向逃窜。戴维斯是民主党人，大奴隶种植场奴隶主，曾参加过墨西哥战争。担任过联邦政府陆军部长，是南部叛乱的主要策划者。林肯被刺后，他被捕入狱，后来被约翰逊政府释放，没受任何惩罚，1881年他写成《同盟政府兴衰史》一书，为南部叛乱辩护。

在林肯任职期间，曾先后两次被刺客子弹打穿礼帽。林肯办公室抽屉里有一个大信封，里面装满的恐吓信达80封，林肯幽默地在大信封上写了“暗杀”两字。

谁也预料不到，这两个字会在1865年4月14日成为严酷的现实。日历上标明，这一天是耶稣殉难日。从林肯被刺前5天拍摄的他一生中最后一张照片看去：他脸上布满沟壑般的皱纹，眼睛深陷，面容极其疲惫，但神态之中充满一种宁静安详的善意。

1865年4月14日晚（整整4年以前，1861年4月15日，林肯发令平定南方叛乱，内战开始）林肯偕夫人到华盛顿福特剧院看英国喜剧《我们的美闰表亲》。演出达到高潮时，内战中同情南方的著名演员约翰·布思潜入林肯的包厢，用一把铜制单发大口径袖珍手枪刺杀了林肯。

子弹从林肯头部左侧耳旁射入后脑，斜穿大脑朝右眼方向，最后停留在右眼框后几英寸处。

林肯倒下，昏迷不醒。1865年4月15日星期六上午7点22分10秒，林肯与世长辞。这位来自荒野、解放黑奴、打赢内战的伟大演说家，再也不能站起来对美国、对全世界发出他那雄辩滔滔的声音了。

华盛顿的丧钟全部敲响，美国所有的大都市和村镇普降半旗。

当噩耗传到前线薛尔曼的部队：“林肯总统于昨晚10时左右被暗杀。”全军士兵一片悲痛，准备把北卡罗来纳州首府化为灰烬。后被军纪制止。因为这不合林肯的意愿。

虽然林肯生前反对追捕南部同盟头目戴维斯，但此时怒不可遏的警方开始奉命追击。

刺客约翰·布思写给姐姐的一封信被查获，暴露了他刺杀林肯的

全部动机：

我是对还是错，上帝自会作出裁判，凡人无权裁判；不管我的动机是好是坏，但我确信这一点：北部将遭到人们世世代代的谴责。

我始终认为南部是正义的。4年前，林肯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这件事清楚他说明将要爆发战争——反对南部的权利和制度的战争。林肯的当选证实了这一点。

这个国家是为白人，而不是为黑人建立的。

我过去就是像现在这样认为，只有那些废奴主义者才是这个国家的卖国贼，整个共和党都应遭到像卑贱的老约翰·布朗一样的下场。

我曾竭力探索过，既然我们的国名——合众国和《独立宣言》都规定可以脱离，那么究竟还有什么理由可以否定一个州脱离的权利。但现在没有时间多谈了。

我只热爱南部，我认为设法使此人成为南部的囚犯并不是一种耻辱，他是使南部遭受无穷灾难的罪魁祸首。

一个同盟成员责无旁贷地在自愿尽职。

约·威尔克斯·布思

布思一夜之间臭名远扬。陆军部到处张贴他的照片，全国通缉，悬赏5万美元，生死不论。4月26日上午，布思在弗吉尼亚州被一颗不知从何处飞来的子弹打穿颈骨，终止了他的逃窜和罪恶。

林肯的灵柩停放在白宫之中。一座银碑上刻着如下铭文：

合众国第十六任总统阿伯拉罕·林肯

生于1809年2月12日

卒于1865年4月15日

当林肯的灵柩移出白宫前往火车站送回故乡时，华盛顿有10万群众为他送殡，全市所有教堂钟声激荡，陆军4个炮兵连的礼炮轰轰隆隆，悲壮低沉。

载着灵柩的专列行驶1700英里，经过4年零2个月前林肯赴华盛顿就职所经过的各个城市。上千万美国人民站在铁路沿线，护送他们的阿伯拉罕·林肯回到故乡。合众国沉浸在悲痛之中。

公元1865年5月4日，林肯下葬在故乡斯普林菲尔德橡树岭公墓。他遗容安详地躺在黑胡桃木棺椁里，永远和青山绿水、冬青树和满山的紫丁香在一起。

北美洲的大诗人惠特曼（或者可以把他称作“诗人中的林肯”）当时献给林肯的挽歌是最杰出的挽歌。

“当紫丁香最近在庭院中开放的时候，  
那颗硕大的星星在西方的夜空陨落了，  
我哀悼着；并将随着一年一度的春光永远哀悼。”

“这就是那个人的遗骸，

那个温和、平易、正直、果敢的人的遗骸，他小心谨慎的手臂从历史上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从未有过最可耻的罪恶中，拯救了由这些州组成的联邦。”

“啊，船长，我的船长，起来听听这钟声，  
起来吧，战旗为你招展，号角为你长鸣，  
为你，人们准备了无数的花束和花环，  
为你，人们挤满了海岸，  
为你，这波浪般的人群在呼唤，  
转动着他们殷切的脸。  
在这里，船长，亲爱的父亲哟！  
让你的头枕着我的手臂吧！  
在甲板上，这似乎是梦幻一般——  
你已浑身冰凉，合上了双眼。”

南美洲当代的大诗人聂鲁达，在他《劈栅栏木的人醒来吧》长诗中，  
表达了我们对于林肯深深的怀念：

科罗拉多河之西  
有一处地方，我爱它。  
我以搏动着流过我的一切，  
以过去的一切，现在的一切，  
保持的一切，倾心于它。  
那里有巍巍的红色岩石，  
千百只手的粗野的风，  
把它形成了建筑的结构。  
炫目的艳红从深渊升起，  
照在它上面变成了铜、火和力量。  
亚美利加铺展着，好似野牛皮  
劈栅栏木的人醒来吧  
让阿伯拉罕来，让他古老的酵母  
使伊利诺斯碧绿金黄的土地  
发酵膨胀……

## 温斯顿·邱吉尔

“我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

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展现在 20 世纪政治舞台上的形象极富绅士派头：标准的黑色燕尾服，高筒大礼帽，总是不离手的粗大的雪茄和手杖。他喜欢优裕的生活，喜欢热水浴和 1870 年的美酒，喜欢任用漂亮的女秘书助他听写回忆录。他喜欢画纯英国式的水彩画和驯养赛马，另外，他还喜欢午睡和看电影。

同时他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和《英语民族史》等畅销书的作者。美国《生活》周刊为了买断《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的首先连载权，花了将近 200 万美元。对此丘吉尔说道：“我不是写书的，而是积累财富。”最后，他用这本杰出的著作和他一系列著名的战时演说，获 1953 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以表彰他对英语散文的特殊贡献。

他也许是自古罗马大演说家西塞罗以来西方最激动人心的演说家，在纳粹势力征服欧洲的沉沉黑夜中，是丘吉尔在英国下议院以自己那低沉坚毅的男中音唤起了英国人战斗的信心；在日常生活中他也是一位语言优雅，富于英国式幽默的绅士：他曾把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比喻为“我认识的唯一一头闯进瓷器店的牛”。数年以后在日内瓦会议上，正是这个杜勒斯，像一头莽牛一样拒绝了 中国总理周恩来伸出的彬彬有礼的手。

丘吉尔是纳粹德国的坚定反对者，但同时他又十分仇视苏联，他认为苏联“具备同纳粹制度一样的最坏的特点”。他认为俄国共产主义对他的政治理想和英语国家所构成的威胁比纳粹还厉害。所以在二战结束，当成千上万德国士兵放下武器投降时，他就致电西欧英军总司令蒙哥马利，吩咐他集中收藏好德军武器，一旦苏联红军的攻势继续下去，英国便可以很容易地将武器重新分发给愿意同德国合作的英国士兵。而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就曾断言：“丘吉尔是我们最大的敌人”。

在他从战时首相下野后赴美国访问中，他发表了关于“铁幕”的著名演说，揭开了东西方长达几十年的“冷战”序幕，直到 90 年代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这场冷战才告结束。

丘吉尔跟隔海相望的法国戴高乐一样，都是在祖国最危急的时刻被历史和命运推上世界舞台的，在那决定人类命运的瞬间，他们的表现辉煌灿烂，其实为了这瞬间的辉煌，他们花费了半个世纪的岁月准备和等待。丘吉尔早年作为骑兵中尉参加开拓殖民地的布尔战争，晚年作为首相指挥英国参加了以纳粹德国惨败为结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他在战争中非凡和奇迹般的领导才能使他成为现代英国至今尚无人匹敌的大政治家。他创造了本世纪那著名的象征胜利的手势 V，他总是和胜利在一起。

一位传记作家对丘吉尔的评价堪称经典，他认为，这位英国绅士是

---

“一位超凡出众的人，构成这个人的要素既比常人伟大，又比常人简单；他是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具有超人的胆识、力量和想象力，他是他的国家所造就的两位最伟大的实干家之一；是一位感人至深的演说家；是他的国家的救星；既是现实中的英雄，又是具有神秘色彩的传奇英雄。”

抨击《慕尼黑协定》：“欧洲的平衡被打乱了。”

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在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中表现出了其独到的远见。1928年，丘吉尔在他所著的《战后》一书中，已经感到人类未来的浩劫：

“直到基督纪元20世纪初，战争才开始进入到它可以毁灭人类的时代。人类已组织成为大的国家和大的帝国，各民族的兴起充满了集体意识，使屠杀事业可以按以前意想不到的规模和坚毅来加以设计和实行。个人的卓越的长处，都被集中来发展大规模屠杀的能力。雄厚的财力、进行世界贸易和信贷的资源以及巨额资本的积累，得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把各国人民的精力用于蹂躏破坏的事业。民主政治的制度使亿万人民的意志力得以表现。教育不但把战争这一课，灌输到每一个人的脑中，而且使每一个人对当前目标都能够发挥最大的作用。报纸成为一种促进彼此团结和互相激厨的工具。至于宗教，在基本论点上，虽然很高明地避谈斗争，但用种种方式，对所有的战斗人员一视同仁地给予鼓励和慰劳。最后，科学打开了它的宝藏和秘密去满足人们不顾死活的要求，把那些可以说是能起决定作用的器械和装置放在他们的手中。其结果，许多新奇的特点出现了。非但设防的城市遭受饥荒，整个整个的民族都被有计划地置于或将被置于因饥馑而衰弱的过程中。全部人口以这种或那种身份参加战争，同样都是袭击的对象。天空中开了一条道路，可以把死亡和恐怖带到远离战线的后方，带给老、病、妇、孺这些在以前的战争中不得加以侵犯的人。铁路、轮船和汽车等运输工具神奇地被组织起来，使千百万人可以不断地进行战斗。医疗和外科手术精益求精的进步，把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送回屠杀场。凡是可以用于这种大规模浪费事业的东西，都不会被浪费掉。士兵的垂死挣扎也可以使之产生军事上的效果。”

丘吉尔在论述了人类迄今为止全部文化科学成就似乎都是为了用于战争后，简洁地回顾了第一次大战的历程。他极其令人振奋地指出：一次大战结束得太快了，在大战头4年所发生的一切，似乎只是准备进行第5年的大战，但大战却于1919年结束了。接着他描绘出一次大战后非常不真实的“和平”状况：

“战争突然地和全面地停止，就像开战时的情形一样。世界抬起了它的头，看一看劫后的废墟，胜利者和战败者都松了一口气。在成百的实验室里，在成千的兵工厂、制造厂和各种办事机构里，人们一下子站了起来，离开他们多少年来专心致志的工作。他们的计划还没有完成，没有实行，被丢在一边了。但是他们的知识还保存着；他们的资料、数据和发明，都是由各国的军事机关匆匆忙忙地捆扎起来，并注上“供将来参考”。1919年的战役没有打成，但它的各种观念还在向前发展。在每一个国家的军队中，在和平的外

表的掩盖下，都在把这些观念拿来研究、推敲和提炼。假使世界再发生战争，那就不是使用准备在 1919 年作战用的那些武器和器械了，而是那些武器的发展和扩充，那将是无可比拟地更加可怕和更加致命的了。

我们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被称为“和平”的这个筋疲力竭的时期。不管怎样，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对全面局势进行考虑的机会。某些令人担忧的、但确实无疑的事实已逐渐出现，好像山峰从飘浮的云雾中逐渐显露出来似的。可以确定，从此以后，一旦打起仗来，全部人口都将加入战斗，每个人都将竭尽全力，都难免遭到敌方的猛烈攻击。可以确定，感到其生存处在危险中的国家，将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来确保其生存，很可能——不，可以肯定——在下次战争中，他们所使用的手段，其中必有一些是大规模的、无限制的毁灭性武器和方法，也许一旦发射就无法控制。”

最后，丘吉尔表示出他对人类品德和理智极大的不信任，他对未来的“死神”的肆虐忧心忡忡：

“在过去，人类从来不曾处在这样的境况：品德上没有取得值得重视的进步，理智上也缺乏正确的指引，却第一次握有肯定足以毁灭其自身的工具。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人们所有的光荣和劳动把人类引导到这样的一个顶点。人们最好还是停一停，好好地想一想自己所负的新责任。死神在立正、遵命、听候号令，准备执行任务；准备把全人类大批大批地砍杀；准备一经召唤，就把人类文明所留下的一切一概压成奇粉，永远没有修复的希望。他只是等候一声令下。他等候一个神志虚弱的、手足无措的人来下这个命令，这个人本来是他的牺牲品，而现在——仅仅是这一刹那却成为他的主人。”

丘吉尔作为敏锐的政治战略家，对欧洲各国军力的均衡极为重视，他密切关注着德国的一切军事动向，并在议会讲坛上大力抨击。针对战后欧洲各国在军备上的暗中较劲，丘吉尔对当时英国政府提出的“麦克唐纳计划”损害法国军事力量并使法德两国搞平衡的企图深为不满。1933年3月，他在议会针对该计划抨击德国：

“我怀疑现时强迫法国接受这个计划是否明智。我不认为法国会表示同意。他们对于德国所发生的事情以及对于他们一些邻国的态度，一定会感到极大的关切。几年以来，我一直在说：“感谢上帝，幸亏有法国陆军”，在这个令人焦虑的月份，我相信大概有许多人也这么说了。当我们看到德国的情形，当我们以惊讶和悲痛的心情看到凶狠和黩武精神的喧闹动乱，残忍地虐待少数派，废除文明社会所具有的正常保障，仅仅以种族为理由迫害大批人——当我们看到所有这些事情发生在世界上最有天赋、最有学识、科学最发达的强大国家时，我们不得不引以为幸的是，在德国尽情发泄的这种凶恶的情绪，除了向他们自己发泄之外，还没有向别的地方发泄。



在我看来，在目前这个时候，要求法国把军队减去一半，而德国则增加一倍，要求法国把空军减少一半，而德国空军则保持现状，这一提议，至少在目前，法国政府很可能认为有点不合时宜。计划中关于陆军和飞机的实力所规定的数字，保证法国所能有的飞机数额，同意意大利所能有的飞机数额相等，而对于德国所能有的空军力量，却未给予规定。”

当时欧洲政界流行一种舆论：德国作为一个大国，其在政治军事上有野心也是在所难免的。但丘吉尔不是这样看的，他说：

“德国要求武器平等，陆军与海军的组织平等，我们听有人说，‘你不能使这样一个大国长久处于卑下的地位。别人有的东西，他们也得有。’对于这种说法，我始终是不同意的，这是最危险的要求。生命中没有永恒的东西。然而，只要德国在它的怨恨和不满还未消除，还抱着我们不幸看到过的那种情绪时，就真的获得与其邻国完全相等的军事力量，那么，可以肯定，我们自己也将面临计日可待的欧洲大战的重新爆发。

……大战后我们听到一种说法，说是德国会成为一个议会民主制的民主国家，从而使我们享有安全保障。所有这些，现在都荡然无存了。现在有的是最严酷的独裁；有的是军国主义和唤起各种战斗精神的方式，如从各高等院校重新提倡决斗直到教育部指示各小学可以充分使用鞭子等情况；有的是这些好勇斗狠的现象，还有许多议员都谈过的对犹太人的迫害……”

在表达了对德国的完全失望之后，丘吉尔把希望投向法国。他哪里料得到，几年以后，正是法国，在德国军队攻击下一触即溃：

“我现在先放下德国，来谈谈法国吧。法国不仅是在欧洲唯一尚存的伟大的民主国家，而且我很高兴地说，它还是一个在军事上最强大的国家。法国是几个国家和民族联成的体系的领袖。它是从比利时绕弯到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这整个新月形地带中各个小国的保证人和保护者。它们全都指望着法国。如果英国或其他大国采取任何足以削弱法国外交上或军事上的安全的步骤，那么，所有这些小国就一定会大为震惊和愤怒。它们害怕这个在中部的保护力量会被削弱，如果这样，它们就只好俯首听命于那个条顿人大国了。”

丘吉尔这个时期在议会中利用他那超人的口才抨击德国，呼吁大家警惕，指出越来越迫在眉睫的又一次世界大战的威胁。他的声音显得超前而孤独，在被后来的战争事实证实了之后，今天听起来又是那样富于雄辩和敏感。

他一针见血指出当时欧洲“裁军”政治游戏的虚假之处：

“裁军会议已成历史陈迹，这使我十分高兴。把裁军与和平混为一谈，那是极大的错误。有了和平，才能有裁军。可是，最近几

年以来，一些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断恶化，恶意日益滋长，而且，尽管这些年来，人们继续不断地发表演说，下结论，好心多情，还经常举行各种宴会，但军备却在不断扩张，实际上是迅速扩张。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

他对德国和它正在崛起的独裁者的分析可谓入木三分：

“在我们这一生中，我们不会只看到这一德国。但我们必须考虑到，在目前，三两个可以说是不顾死活的人掌握着那个强大的国家，掌握着那个有高度科学知识、有智慧、驯良而勇敢的民族，人口达 7000 万；那里不同于君主制度，因为君主制度经常要考虑到它的长远利益，有许多顾虑，因而在决定政策时就比较稳重；在那里，根本没有公众舆论，有的只是无线电广播和受严格控制的报纸，这些可怕的新机器所制造出来的东西。德国的政治和我们这里完全不同。在那里，你不能辞职去当反对派。你不能离开政府席位去找个普通议员席位来坐。你很可能忽然接到通知，要在一刻钟之内离开你的高级职位，把你送到警察局去，接着你可能很快就受到比撤职还要严厉得多的判决。

在我看来，处在那种地位的人，很容易受到某种诱惑，做出军事独裁还不至于做的事情。因为军事独裁固然有许多缺点，但毕竟是对客观实际的精确研究为基础的。而那种独裁则比军事独裁危险得多，因为那些人，为了摆脱国内的严重危机，可能轻易对外进行冒险，使整个世界蒙受惨绝人寰的灾祸。”

作为下议会的后座议员，他对当时英国政府的软弱国策深感忧虑，指出英国的软弱对欧洲安全的危害：

“请看政府所提出的辩解吧！它所提出的提案，其措词之温和，恐怕没有别的人能够做到的。自从这个题目第一次提出讨论以来，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有着谦逊的特色。他们说，我们自己就可以看出这个提案的要求是多么小。他们向我们保证：只要日内瓦裁军会议有成效，这个提案就可能随时停止。我们还得到这样的保证：我们正在采取的步骤，虽然在一些浅见的人看来，只与国防的观念相联系，但实际上它只与集体安全的伟大原则相联系。

但是，所有这些辩解与缓和的做法，反对党总是以极其轻率的态度给顶回去。他们对这些抚慰他们的努力的唯一答复，就是今晚就要表决的不信任议案。在我看来，在这个题目上，值得同某些舆论进行调和的时期已快结束了。我们面前出现一种建立舆论专政的企图，如果这种专政能够持久，就会严重损害国家的稳定和安全。我们是富裕的，又是容易被掠夺的，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那么易受攻击，也没有一个国家像我国那么善于回敬掠夺者……在我们的宏伟首都，世界最大的攻击目标，就像捆缚着一头肥大而珍贵的母牛来引诱猛兽。我们现在所处的境地，是过去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也是现在其他国家没有遇到的。

让我们牢记这一点：我们的软弱不仅害了我们自己，也连累欧洲的稳定。”

这位富有远见的政治家在战前就真实地代表他的祖国对未来的风云变幻感到“怕”。他说：

“我深恐有一天，威胁到不列颠帝国心脏的手段会落入德国目前的当权者的手中。我们将会落到一种可悲的境地，使每一个珍惜行动自由和独立的人感到十分难过，同时也使从事日常工作、爱好和平的广大群众遭受极大的危险。我深怕有那么的一天，而且也许为期不远了。也许只有一年，或者也许 18 个月。现在至少还没有到来，但愿没有到来，我希望和祈求如此；但事实上已为期不远了。现在我们还来得及采取必要的措施，而这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需要取得空中均势的措施。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它在世界上起着我们所起的和我们希望要起的作用，就不应该处在任由别国讹诈的地位……”

胜利者和战败者之间的怨恨，一点也没有消除。富于侵略性的国家主义精神，不论在欧洲和在全世界，从来没有今天那么猖獗。洛迦诺会议的日子早已消逝，那时我们对欧洲大家庭的和解曾抱着热烈的希望……”

1938 年 9 月《慕尼黑协定》签订后，欧洲一片欢腾，只有丘吉尔忧心忡忡。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捷克斯洛伐克曾经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一战结束宣告奥匈帝国解体，1919 年各战胜国英、法、美、日、意和战败国德国在巴黎凡尔赛宫签订了《凡尔赛和约》，规定建立独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捷克共和国位于欧洲中心，西邻德国，东近苏联，资源丰富，森林矿藏极多，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希特勒企图攫取这块宝地，便以保护捷克境内苏台德区内的日尔曼人为名，要捷克割让领土。英法等国为了不得罪强大的德国，鼓励德国西向反苏，保全自身的利益，决定纵容德国的非分要求，联手出卖了捷克斯洛伐克。捷克政府迫于德国军事力量和英法等国的压力，被迫接受了英国首相张伯伦、法国总理达拉第同希特勒、墨索里尼在德国慕尼黑签订的协定：割让苏台德区；捷克其余领土，英法德意保证其不再受侵犯。

英国首相张伯伦是在前首相鲍尔温因年迈体弱辞职后才继任的。鲍尔温在任上曾较为稳妥地处理过英国现代史上或世界现代史上非常棘手的一次宪政危机：那就是轰动全球的英王爱德华八世与美国公民辛普森夫人结婚——“不要江山要美人”的爱情故事。

丘吉尔在这个著名的爱情故事中也扮演了非常动人的角色。1936 年 12 月 3 日，丘吉尔正联合许多反对党议员在艾伯特会堂集会，要求政府采取实际行动来维护英国的安全和自由，他们所提出的方案是迅速地、大规模地把英国重新武装起来。正当他们的观点开始受人重视，已经开始取得优势时，英王爱德华八世要跟他所钟爱的女人结婚，这件事把别的一切事情都推到后面去了，立即发生了逊位危机。

当丘吉尔站起来正在为他们的表决受到欢迎而致答词时，有人高呼“国王万岁”，接着激发起长时间的欢呼。他当即发表即席演说，表明他对此事件的个人立场：

“今天晚上有另一件重大事件笼罩在我们心头。几分钟后我们就要歌唱‘上帝保佑国王’。我将以我一生中唱这首歌时最衷心的热情来歌唱。我希望和祈求不至于匆促作出不可挽回的决定，而让时间和舆论来表示他们的意志，使人们所珍爱的独一无二的人格不至于和他所深爱的人民永远隔开。我希望议会对这些重大的宪法问题能够发挥它的作用。我深信我们的国王一定会接受英国和英帝国现在第一次表示出来的意见，英国人民也不至于对王位占有者不给予宽容的考虑。”

在爱德华八世童年时丘吉尔就认识他，他觉得有义务对他效以最高的个人忠诚。在那年夏天，他虽然对将要发生的事情心中有数，但却从未干预过国王，也没有和他通信。爱德华八世在苦恼之中请首相鲍尔温同丘吉尔商量，丘吉尔一接到通知就进宫谒见国王，他尽力请求国王和公众保持忍耐和不作匆促决定。他对此绝无后悔的心情。他事后认为，除此之外，他也别无办法了。

一个君王逊位，另一个君王登基，直到1937年5月底，在国内以及在英帝国，人们心中充满的事就是到处举行盛大而庄严的对新君王的效忠仪式和圣奠。国防的忧患已失去了对公众心理的吸引力，英伦三岛好像离欧洲万里之遥。1937年5月18日，即新君王登基的次日，丘吉尔接到新王陛下一封亲笔信：

亲爱的丘吉尔先生：

你给我一封很亲切的信，我在此表示感谢。我知道你向来是，直到现在仍然是忠于我亲爱的哥哥的。你对他在12月离开我们以来所出现的种种困难问题表示了同情和谅解，我受感动之深，绝非笔墨所能形容。我充分认识到我作为君王所负的重大责任和所分担的操劳。我收到你的祝福信，这对我是极大的鼓舞。你是我国的伟大政治家之一，是一个忠心耿耿为国家服务的人。但愿国内和帝国现有的善意和希望将成为世界各国的好榜样。

请相信我，  
你的真诚的  
乔治（国王皇帝）  
1937年5月18日  
于伯克郡温莎大花园皇宫

1938年3月12日，希特勒向维也纳进军，德国的战争机器轰然作响。希特勒宣布解散奥地利共和国，全部领土并入德国。

侵略奥地利的暴行和征服美丽的维也纳连同它的声誉、文化及其对欧洲历史的贡献，使丘吉尔受到很大的打击。在发生这些事件的次日，

即3月14日，他在下院说：

“3月12日事件的严重性，不会是言过其实的。欧洲现在遭遇到一个侵略的计划，这是经过精心策划，在时间上作了巧妙安排而逐步展开的。现在不只是对我们来说，而且也对其它国家来说，都只剩下一个选择：或者像奥地利那样屈服，或者趁我们还来得及采取有力措施把危险消除；如果不能消除，就想办法对付……如果我们坐待事态的演变，那我们对目前可供保卫我们安全与和平之用的资源还要放弃多少呢？多少个朋友将因此而离开我们呢？我们还要眼巴巴地看着多少个可能的盟国先后被推进那可怕的深渊呢？虚张声势的恐吓还要得逞多少次，使恐吓的背后不断积聚力量，变为真正的实力呢？……比如说，两年以后，那时德国陆军肯定将比法国强大得多，所有的小国将纷纷从日内瓦溜走，转而向日益壮大的纳粹制度致敬，尽可能为自己取得较好的条件，那时，我们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接着丘吉尔从战略地理上谈到奥地利的重要性：

“维也纳是组成旧日奥匈帝国各国的交通中心，也是西南欧各国的交通中心。多瑙河的一大段现在已落入德国的掌握。纳粹德国在控制了维也纳之后就可以在公路、航运、铁路各方面对整个西南欧的交通进行军事上经济上的控制。这对于欧洲的结构会发生什么影响呢？对于所谓国际均势，对于所谓小协约国又会有什么影响呢？对于所谓小协约国这个国家集团，我必须说明一下，把小协约国的三个国家分别来看，可以说是三个二等的国家，但它们是很有力量和精力充沛的国家，如果联合起来，它们就成为一个大强国。它们过去和现在都一直根据最密切的军事协定联合在一起。它们联合起来就构成一个大国，成为一个大国的军事力量。罗马尼亚有汽油，南斯拉夫有矿藏和原料。两国都有庞大的军队；而它们的军火主要是捷克斯洛伐克供应的。在英国人耳朵里听来，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名称似有些怪异。它无疑只是一个小小的民主国家。它的陆军无疑只比我们大两三倍。它无疑只有比意大利大三倍的军火供应。但它仍然不失为一个生气勃勃的民族。他们有他们的权利；有根据条约规定的权利；他们有一条要塞防线；而且他们有着表现强烈的生存意志，有着要求过自由生活的意志。”

丘吉尔此时十分看好的捷克斯洛伐克，一年后也将落入德国纳粹之手。丘吉尔最后表达了对捷克斯洛伐克岌岌可危的战略地位的忧虑：

“捷克斯洛伐克此刻不论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都处在孤立状态之中。根据和约，汉堡虽然是它的对外贸易的通道，但随时都有可能被封锁。现在它通往南欧以及经南欧而到西南欧的铁路与水路的交通随时可能被切断。它的贸易可能被迫缴纳毁灭性的过境税，就是说，一种完全可以制其对外贸易于死命的过境税。这个国家是以前

的奥匈帝国境内的最大工业区。除非在势必举行的谈判中对捷克斯洛伐克交通的安全保证达成协议，否则它同外界的交通就要被切断，或者马上就要被切断。从南斯拉夫来的原料供应以及它在那里建立的自然市场的联系也许会立即被切断。上星期五晚上的暴行，结果也许会使这个小国的经济生活大大受到窒息。在所谓小协约国的中心，已经打进一个楔子了。这几个小国，在欧洲有过不受侵扰的生活的权利，正如我们任何人在我们乡土上有不受侵扰地生活的权利一样。”

5个月后，局势日益恶化。8月27日，丘吉尔向他的选区的选民演说，向这些大英帝国的臣民诉说战争的阴影，预言捷克斯洛伐克的沦陷将是又一次世界大战的开始：

“我们在这个赛顿·布瓦的古森林里，光是这个名字就使我们回想起诺曼时代——在此地，以和平守法的英国人的心，实在很难理解在欧洲盛行的凶暴情绪。在这个令人焦虑的月份里，你们一定在报纸上看到各种报道，一个星期好，一个星期坏，一个星期好一些，一个星期坏一些。但我必须告诉你们，欧洲和世界的整个局势，正在不断地走向一个绝不会再拖延下去的顶点。

战争当然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从德国家庭中征召入伍的庞大军队还没有解散之前，和平的威胁就无法解除。一个并不受别国威胁也不害怕别国的国家，却将150万士兵实行战时编制，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步骤……在我看来，我也必须坦白告诉你们，把这一大批力量实行战时编制，就是存心想在极短的时间之内达到某种结果……

政府已派了朗西曼勋爵赴布拉格，我们表示完全赞同。我们希望——真的，我们为他祷告，希望他的调解使命获得成功。现在看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也在竭尽全力来调整他们的国内情况，对于任何要求，只要不致使他们的国家陷于分裂，都准备加以接受……可是，更大的和更狂暴的野心却可能妨碍达成协议。如果是这样的话，欧洲和文明世界就势必面对纳粹德国的要求，或者要遇到德国纳粹党方面某种突然的狂暴行为，对一个小国发动进攻并加以征服。这样一种事件，恐怕就不仅是进攻捷克斯洛伐克，而且是破坏全世界的文明和自由的暴行……

不论发生什么事情，世界各国都应该知道——我们的政府也应该让他们知道——英国和英帝国，必定能够发挥他们的作用和尽他们的责任，就像他们在历史还没有忘记的那些重大事件中所做的一样。”

1938年9月28日，英国首相张伯伦第三次飞往德国，去谋求欧洲的和平。9月30日早晨，他和德国总理希特勒在其慕尼黑的寓所会晤，除了译员之外，没有任何人参加。张伯伦提出了他事先预备好的一项声明，全文如下：

“我们，德国元首兼总理和英国首相今天继续会晤，双方一致认为英德关系问题是两国和整个欧洲的最重要的问题。

我们认为，昨夜签订的协定以及英德海军协定是我们两个国家希望彼此之间不再发生战争的一个象征。

我们决心以协商的办法来处理有关两国之间的任何其他问题。我们决定继续作出努力，来消除可能引起分歧的根源，从而为确保欧洲和平作出贡献。”

希特勒在读完这个声明后就毫不犹豫地签了字。张伯伦飞回英国，下飞机时挥动着有着希特勒签名的这个联合声明，向前来欢迎的显要人物宣读。在唐宁街首相官邸窗前，他挥动这张纸片对欢呼的人群说：“在我国历史上这是第二次把光荣从德国带回到唐宁街来，我相信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

踌躇满志而又书生气十足的张伯伦，宣称他为欧洲为英国人民赢得了“整整一代人的和平”，英伦三岛一片欢腾，善良的、被蒙蔽的人们把张伯伦看作是民族的“英雄”。

只有少数以丘吉尔为突出代表的政治家洞悉《慕尼黑协定》不过是一纸空文，希特勒纳粹德国的侵略野心与日俱增。丘吉尔非常形象地描绘了希特勒贪得无厌的性格：“他把枪口对准你，要你给他 1 英镑。给了他 1 英镑后仍把枪口对准你，要你给他 2 英镑。”

丘吉尔还在众议院正式发表演说预示《慕尼黑协定》后英法因抛掉捷克斯洛伐克、抛掉强硬的外交路线而唇亡齿寒的不祥后果。这是一次长时间的辩论，很可以说明当时情绪之激动和问题之严重。当丘吉尔力排众议，断言：“我们已经遭到一次完全、彻底的失败”时，引起了暴风骤雨般的抗议声，使他不得不稍作片刻停歇，才能继续发言。丘吉尔这次孤独而富于远见的演说，可以看作是慕尼黑协定时代欧洲清醒的声音。他说：

“在这一次长时间的辩论中，我们实在不必浪费时间去研究在贝希特斯加登、在戈德斯贝格以及在慕尼黑所达成的局面之间的差别。如果本院允许我把一个比喻变动一下的话，那我就可以简明扼要予以说明。他先用手枪对着你，要你给他一英镑。等到如数照给之后，他又用枪口对着你，要求给两镑。最后，那个独裁者答应先收 1 镑 17 先令 6 便士，剩余的部分要你保证随后付清。

从来没有人比首相更坚决和更不妥协地追求和平的了。这是人人都知道的。这么强烈地、不屈不挠地维护和保障和平的决心真是亘古未有。虽然如此，我却不怎么明白，如果英国和法国确实向来都准备牺牲捷克斯洛伐克的话，那么英法两国在这一次又怎么会有卷入对德战争的很大危险呢？关于首相带回来的条件，我相信在夏季某个时候可以通过一般外交途径很容易地达成协议的。我要说的是，我相信，如果让捷克人自己去对付，而且向他们表明，他们不可能从西方国家取得援助，那么，他们或者早就能够取得比经过这番波折所得的较好的条件，他们总不会有比现在更坏的条件。

一切都过去了。缄默的、悲哀的、被抛弃的、支离破碎的捷克斯洛伐克，已在，黑暗之中。长期以来，它追随法国的领导和政策，和法国站在一起，结果使它在各个方面都吃大亏……

如果我国被纳粹德国控制，落入它的势力范围，受它的指使，或者我们的生存变得非仰赖它的善心和恩典不可，那我就无法忍受了。为了防止这种情形，我曾尽力敦促政府做好各方面的防务——第一，要及时建立一支其实力要比任何其攻击力量可达本国海岸的国家更强的空军；第二，要把许多国家的集体力量集合起来；第三，在国联盟约的范围内，结成联盟和订立军事条约，以便把力量集合起来，无论如何至少可以遏制这个国家的向前发展。然而一切努力都枉费心机。每一个主张都被那些似是而非、煞有介事的借口所破坏和抛弃了。

我们的忠诚勇敢的人民，他们准备不惜任何代价来尽他们的职责，在上星期的紧张状态之下，他们从不畏缩。对于他们当知道暂时无须再受艰苦的磨炼时而自发表现出兴高采烈如释重负的心情，我并不埋怨他们；但他们应该知道事情的真相。他们应该知道，我们的防务有严重的疏忽和缺点；他们应该知道，我们未经战争就遭到了一次失败，其后果将对我们有深远的影响；他们应该知道，我们已经过我们历史上的一个可怕的里程碑——欧洲的平衡被打乱了；西方民主国家这时已听到这种可怕的话：“你们已在天平上称过了，发现份量不足。”不要认为这件事会从此结束。这不过是算帐的第一步。这不过是以后每年还要递给我们的苦酒杯的第一口，第一次尝尝味道罢了。除非我们振作精神，恢复我们的战斗活力，我们才能像往日一样重新站起来，为保卫自由而战。”

丘吉尔话音未落，离慕尼黑协定签订日不过两周，希特勒即在德国发表演说，以强硬的态度攻击丘吉尔和英帝国，宣称如果丘吉尔在英国当政，丘吉尔将发动新的世界大战，并火药味十足地向英国挑战：“我们不能再忍受英国女管家的管教了！”

慕尼黑协定所造成的泡沫和平迅速烟消云散，至今在欧洲语言中，仍把为了自私目的而牺牲其他国家或他人利益，纵容侵略的行为叫做“慕尼黑”。

在该协定签订前，丘吉尔曾约请一些英国著名政治家在伦敦一家饭店共进午餐。他劝说并提议大家联名致电已飞抵慕尼黑的英相张伯伦，要求他放弃软弱姑息的绥靖政策，不要牺牲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与安全。但在座的几位著名政治家无人附议。

丘吉尔自1929年赋闲在家以后，就静心研究世界局势。《凡尔赛和约》之后德国法西斯的甚嚣尘上，丘吉尔早已开始警觉并提前思索德国在下一步的扩张和威胁问题。

他为了撰写本家族先祖马尔巴罗公爵的传记，曾实地考察了这位他一生最崇拜的偶像当年在欧洲大陆作战的古战场。这更使他亲身感受到德国的最新动态。“当我经过这些美丽的地区，经过一个又一个古代名城的时候，我自然而然地了解了希特勒的动向，我感受到法西斯主义的气氛，发现这是每一个德国人心中最主要的事情。”



同时他曾静心研读过“德国法西斯的圣经”——《我的奋斗》，非常熟悉希特勒在此书中展示的纳粹战略目标和思维方式。他坚信，希特勒那“古代条顿骑士的剑”在为日尔曼人争夺“生存空间”的过程中，决不会放过欧洲，放过大英帝国。所以丘吉尔一直呼吁英国重整军备，他很早就看到了技术装备在下次战争中的作用。与戴高乐在战前就非常重视机械化的坦克战略异曲同工，丘吉尔在战前针对英国岛国独特的地理位置，强烈呼吁改装英国空军，要重视德国空军的发展。

他预言：“过去，海军是英国‘可靠的后盾’，但现在我们不能这样说了。可恶的空战方法的发明和改进，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地位。”

丘吉尔对空军改革的鼓吹为英国皇家空军在二次大战中能够战胜德国空军优势，并成功地从英伦三岛起飞轰炸法国及德国本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对英国海军的战略部署和情报系统的结构，他也从最高原则上提出抨击。1938年4月，《慕尼黑协定》签订前8个月，他在下议院苦口婆心地呼唤英国要看到自己正处于险境边缘，应在欧洲局势中作出与她那古老历史相称的崇高榜样：

“外国已研究起英国人过周末的习惯和英国人对适逢教会节日的假期的重视。耶稣受难日，正好是在解散议会后的第一天。听说在那一天里，英国舰队仍按照惯常旧例执行早经宣布的计划。因此，舰队就会散开于四方各处……我很相信，如果那时我们的舰队已经集中起来，在爱奥尼亚海的南部各处巡戈，则意大利就不会冒险进犯阿尔巴尼亚了……”

经历25年的和平与战争的经验，我相信英国的情报工作在世界上是第一流的，然而在波希米亚的被征服和阿尔巴尼亚的被侵犯这两件事情中，听说英帝国各部大臣对于将发生的事好像毫无所知，或者至少是知道的不十分确切。我不相信这是英国秘密情报工作的过失。

在德国进行侵犯波希米亚暴行的前夕，为什么英国各部的大臣们还沉湎于所谓‘温暖的会谈’，还预言‘黄金时代即将到来’呢？当显然即将发生一件性质异乎寻常的、后果难以预测的事件时，为什么上星期假日的旧规定竟还照常实行呢？……我以为，如果各部大臣把情报部门所收集并及时提供给他们的情报，就其影响和重要性方面任意加以挑选、粉饰和缩小，如果他们先入为主，只是重视与他们认为世界和平应该继续维持的真诚而可敬的愿望相符合的情报，那他们就是在冒最可怕的危险。

所有的事情都是同一的时刻发动的。年复一年，月复一月，这些事情一直在一齐向前发展。等到我们想到某种形势时，事实上，人家已经在实际上达到某种形势了。现在危机已在逼近，欧洲大部分国家已进行大规模动员。千千万万人正在准备战争。各国边界都以重兵防守，各处都感到新的攻击逼在眼前。万一真的打起仗来，我们将卷入漩涡，这还有什么疑问的呢？我们现在所过的，已经不是两三个月以前那样的日子了。我们在各方面，已承担了义务。我看，在看到了所发生的一切之后，这样做也是理所当然的。现在没

有必要逐一列举我们曾直接和间接给予保证或正在给予保证的国家。在一年以前，我们在各方面还是力量强大的，我们在那时连做梦也想不到要做的事情，甚至在一个月以前也想不到要做的事情，现在我们都正在进行了。当然，如果我们很想把整个欧洲从危险的深渊的边缘拉回来，引导到法治与和平的高原上，我们就必须作出最崇高的榜样。我们不能有任何退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够继续在家里过着舒服安闲的生活，甚至连“强制”一词也不愿意说出口，甚至不愿意义取必要的措施来补充和装备我们所答应的军队呢？乌黑的苦水到处迅速泛滥。我们又怎么能够继续——让我特别坦率和真诚他说吧——还不把全国国民兵力编入军队编制呢？”

战前的丘吉尔只是下议院的一名后座议员，但他时刻以天下为己任，自《慕尼黑协定》签订以前就对当时欧洲的纳粹动向日夜警惕，所以当1940年5月德国军队大举进攻西欧，《慕尼黑协定》被弃如手纸，张伯伦内阁的绥靖政策彻底破产，英伦三岛也立即处于纳粹的攻击之中时能够应运出任首相，受命于危难之际并能够“带领大英帝国赢得战争的人”，只能是此年已届六十六高龄的约克郡绅士温斯顿·丘吉尔。这位彻底的反纳粹主义者曾对此以他那典型的英国式幽默说道：“我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消灭希特勒，这个目标使我的生活更加单纯了。如果希特勒入侵地狱，我至少也要在下院发表一篇同情魔王的声明。”

虽然英国前首相张伯伦在世界史上是把自己的名字与屈辱可笑的《慕尼黑协定》联系在一起，丘吉尔从欧洲和平的角度无情地抨击张伯伦的绥靖妥协政策，但他对张伯伦为了维护和平的动机和他那高度的勇气以及不屈不挠的努力相当尊重。他任首相后在组阁时，仍把张伯伦留在政府内。

1940年11月9日，张伯伦在他的故乡汉普夏郡逝世。丘吉尔曾得到英王的许可，把内阁的文件送到他家里去。张伯伦在临死的前几天，一直是不顾重病，非常关心国事。他临终时显得十分安详。丘吉尔后来回忆道：“他死时必然感到心中非常宽慰，知道他的国家至少已摆脱了困境。”

11月12日，当议会刚一召开时，丘吉尔就致辞称赞他的为人和事迹。这也是一篇独特的感人肺腑的悼词：

“我们在临终之际，都要对我们自己的言行反复省察。上天没有赋予人类在很大的程度上预见或预言事态演变的能力，这对人类来说是幸事，不然，生活就难以忍受。在一个时期，人们似乎作得对，在另一个时期，似乎又作错了。然后，过了几年，经过较长时间的深刻观察，以往一切，又事过境迁，显得迥然不同。事物有新的准绳，有另外的价值尺度。历史，带着一盏闪烁的灯，沿着过往的陈迹踉跄前进，试图重现它的情景，再响起它的回声，用黯淡的光激发昔日的感情。这一切有什么价值呢？一个人的唯一的向导就是他的良心；他追忆往事时，唯一的盾牌是他的行为正直和诚实。踏上人生的旅程而不举起这面盾牌，那是非常孟浪的，因为我们时常由于希望破灭和计划落空而受到嘲弄，但是，只要我们举起这面

盾牌，就不管命运怎样捉弄我们，我们都可永远在光荣的行列中前进。

不管历史对这些惊心动魄的岁月可能说些什么或不说什么，但是，我们确信，内维尔·张伯伦曾经十分诚实地按照他的智慧，最大限度地运用他那巨大的能力和权力，竭力从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涂炭生灵的可怕的战争中把世界拯救出来。……希特勒先生大言不惭，故作姿态，胡说他只希望和平。这些狂言呓语，在内维尔·张伯伦肃穆的墓前值得一提吗？漫长艰苦而又凶险莫测的岁月摆在我们的面前，但我们至少是团结起来，怀着纯洁的心向前走去了。……

他同他已故的父亲和哥哥奥斯汀一样，都是下院知名的议员；我们，各政党的成员，今晨一个不缺地聚集在这里，追悼一位配得上狄斯累利所称的‘英国的财富’的人，我们都觉得，这对我们自己 and 我们的国家都是一种光荣。”

**战时内阁：“如果我们不能打赢这场战争……”**

1939年9月1日清晨，德国军队闪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大陆的第一场战斗打响，二次大战爆发。

丘吉尔战后评论这场袭击时说：“我们已经看见了闪电战的一个完整的标本；看见了陆军与空军在战场上的密切配合；看见了对于一切交通线及任何可以成为目标的城镇所进行的猛烈轰炸；看见了活跃的第五纵队的身手；看见了伞兵部队和间谍的任意使用。最重要的是，看见了大批装甲部队势不可挡地向前冲锋陷阵。然而，波兰人却不是忍受这种苦难的最后一个民族。”

丘吉尔在1939年10月1日曾发表广播演说，痛惜波兰，攻击德国和苏联：

“波兰再一次遭到了两个大国的侵略。这两个大国曾经同其他大国一起奴役波兰达150年之久，但却不能摧毁波兰民族的精神。华沙的英勇抵抗，表明波兰的灵魂是不可毁灭的，表明它正和一块岩石一样，暂时间固然可以被浪潮淹没，但终究会显露出来，仍旧是一块岩石。

俄国实行一个冷酷的利己政策。我们本来可以希望俄国军队以波兰的友邦和盟国的地位，而不是以侵略者的身份，驻守他们现在的阵线，但俄国军队所以要驻守在这个阵线上，显然是为了本国安全的需要，以防御纳粹的威胁。无论如何，这里有了一道防线，而且纳粹德国不敢进攻的一个东部防线已经建立起来了……

我不能向你们预言俄国的行动。这是一个非常神秘的谜中谜。但是也许有一个可以揭开谜底的秘诀，这个秘诀，就是俄国的国家利益。德国要想在黑海沿岸树立自己的势力，或蹂躏巴尔干国家并征服东南欧的斯拉夫民族，这些都是与俄国的利益和安全不相容的。如果这样做，则将违背俄国历史性的生存利益。”

张伯伦首相对他这个海军大臣的这番言论，表示完全同意。他在写

给他的妹妹的一封信中说：“我们刚才正在听温斯顿发表一篇非常出色的广播演说。我的见解和他完全相同。我相信俄国永远会按照它自认为是本身利益的需要而采取行动。决不能相信，它会认为德国的胜利以及接踵而至的德国对欧洲的统治，是对它有利的。”

1940年5月，德军大举进攻法国、比利时和荷兰，西欧沦陷，英国若不是有英吉利海峡的天然堑壕，也命运难料。

1940年5月10日下午6点，张伯伦首相被迫辞职，半小时后，英国国王乔治六世紧急召见丘吉尔入宫觐见，乔治六世以探询的眼光打量丘吉尔之后，然后说道：“我想你还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召见你吧？”丘吉尔以相同的神情回答：“陛下，我真不知道为什么。”国王笑着说：“我要请你组织政府。”丘吉尔当即欣然受命。

这一时刻丘吉尔已期待了30年。受命于危难之中，使这位性格强硬的老资格政治家非常激动。从1908年起丘吉尔几乎担任过政府所有的重要大臣职务：贸易、内政、海军、陆军、空军，殖民和财政大臣等职，但一直与首相宝座无缘。

5月11日凌晨，丘吉尔紧张工作10小时完成组阁的初期步骤后，才上床休息。后来他回忆这一生中“最好的时刻”时写道：“在这场政治危机的最后的多事之秋，我的脉搏始终平稳。我在大约3点钟上床时，强烈地感到自己如释重负。我终于获得指挥全局的大权了。我觉得我是幸运的人，我以往的全部生活不过是为了这一时刻，为了承担这种考验而进行的一种准备罢了。”“我对全局了如指掌，深信自己不会失败。因此，虽然我迫切地盼望天明，但我却睡得很熟，而且不必在梦中去追求安慰，因为现实比梦想更加美妙。”

这个“美妙”的现实是指在德军强大攻势下，西欧的英法前线崩溃，英国面临民族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这种严酷的政治局势是对一个政治家政治能力和理想的有力挑战，必将激起他领导全民族奋起战斗，超常规地击败纳粹，从而在世界史上完成自己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

丘吉尔在组建战时内阁时充分体现出杰出政治家的宽广胸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物去赢得战争。战时内阁的8位成员有两位工党领导人，而以工会为基础的工党历来就是丘吉尔所在的保守党的政治死敌，战前丘吉尔常常以在下院辩论中攻击工党为拿手好戏，但此时丘吉尔以国家命运为重，抛弃前嫌，联合政敌一致对外。

对保守党内的政敌，丘吉尔也加以团结。保守党前任张伯伦政府曾铸成大错，但丘吉尔对其十分宽厚，他坚持将张伯伦挽留在新政府里，继续参加所有的会议。他没有公开批评张伯伦，而是与人为善地谈起张伯伦的本意如何崇高。

1940年5月11日组成的8人战时内阁担负沉重的历史使命。丘吉尔对这一点认识最深。他说：“如果我们不能打赢这场战争，应当被送到伦敦塔山斩首的，就只能这8个人。”伦敦塔山是中世纪英国监禁处决囚犯的地方。

战时内阁在丘吉尔支持下，驾驶着大英帝国这条古老的大船，在人类最现代化的一场世界大战中乘风破浪。

丘吉尔身处大国政治纷争的漩涡之中，以全球战略的眼光非常艺术地处理好了自己以及英国与美国、法国、苏联等国的关系，在二次大战

空前绝后的政治舞台上一展雄风。

在争取美国加入反法西斯联盟方面，丘吉尔更是竭尽全力，几乎使尽浑身解数。当欧洲已在二战的炮火成为一片焦土时，唯独美国在大西洋彼岸隔岸观火，尚未被卷入战争，但丘吉尔此时最需要的是巨大的美援。

丘吉尔频频向美国总统罗斯福致电，每次电报中都使用坦率的词句，竭力向美国说明，如果英国一旦崩溃，希特勒称霸欧洲，那么美国将处于极端危险的境地。而当时孤立主义的美国军政首脑们公开反对美国向英国提供军事援助。

他与罗斯福总统的关系变得极其密切，以致美英两国之间的重大事项实际上是通过他们两人之间的私人函电往来处理的。二人高度配合，无论从国家角度还是私人角度而言，形成了一种非同寻常的友情。丘吉尔每遇大事即把电报送交美国驻伦敦大使馆，通过特别密码直接发往白宫，获得答复和解决问题的办法的速度是以小时计算。常常是丘吉尔在傍晚甚至是清晨两点拟就的电文，罗斯福在就寝以前就能接到手中，当丘吉尔次日早晨醒来时，回电已发往伦敦唐宁街。二战期间丘吉尔共发给罗斯福 950 份电报，收到的回电约有 800 份。战后丘吉尔对此说道，“我觉得，我是在同一个非常伟大的人保持联系，这个人同时是一个热心的朋友，一个在我们共同努力的崇高事业中站在最前列的战士。”

组阁后不久，内阁赞成丘吉尔向美国政府要驱逐舰。丘吉尔便在组阁后第三天起草了担任首相以来第一次致罗斯福的电报。为了保持他们之间的通信的非正式性质，他在署名时全部自称“前海军人员”，整个二战期间对罗斯福一直保持着这个自称。第一封电文奠定了英美两国在二战期间的战友关系，美国从此成为英国孤岛的强大后方。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1940年5月15日。

我虽然变换了职务，但我相信你不愿意我中断我们之间的密切的私人通信。正如你必然知道的那样，局势已经迅速地恶化了。敌人在空中显然占了优势，他们的新技术正在战场发挥作用。第一，我们正在大量建造驱逐舰，以弥补我们现有舰只和我们从战争开始时就着手建造的大批新舰艇之间的差缺。明年的这个时候我们就有足够的舰只了。但是，如果在这段差缺期间意大利又用 100 艘潜水艇来向我们进攻，我们就可能濒于崩溃。第二，我们需要数百架最新式的飞机；这些飞机，你们正陆续得到交货。我们可以用正在美国为我们制造的飞机来偿还。第三，防空设备和弹药，如果我们能支持下去的话，我们的防空设备和弹药明年也将是很充足的。第四，由于我们的矿石供应是来自瑞典、北非或许还来自西班牙北部，所以，我们就必需在美国购买钢材。其他原料也是这样。只要我们还能支付美元，就继续用美元购买，但是我有理由深深相信：即使我们付不出钱，你也会照样把物资供给我们的。第五，我们得到许多报告，说德国伞兵部队或空运部队可能入侵爱尔兰。如果美国派一支分遣舰队访问爱尔兰的港口（最好是延长访问期），那将起到巨大的作用。第六，我愿国人的心中产生深刻的印象。我本人认为，地面战争才刚刚开始，我很想看到群众都参加战争。直到目前为止，

希特勒还是在用特种坦克部队和空军作战。那些小国简直像火柴杆一样，一个一个地粉碎了。虽然还没有肯定，但我们必须预料到，墨索里尼也将急急忙忙地插手进来参加劫掠文明国家。我们预料，不久的将来，我们这里会受到空中袭击以及伞兵和空运部队的袭击，我们对此已有所准备。如果必要的话，我们将继续单独作战，我们是不怕单独作战的。

但是，总统先生，我相信你会认识到，美国的呼声和力量如果压抑得太久，也许就起不到什么作用了。你将看到一个完全被征服的纳粹化的欧洲很快就会出现眼前，这个压力也许是我们承受不了的。我现在所要求的是：你宣布非交战状态，这就是说，你们除了不实际派遣武装部队参战外，将尽一切力量帮助我们。目前我们迫切需要的是：第一，借用你们四五十艘较旧的驱逐舰，望你们能够使日本人在太平洋不要有所行动、第二你们学觉得怎样利用新加坡好，就可以怎样利用。我们手中的详细材料，另行送上。

致良好的祝愿和敬意。”

丘吉尔在这封电文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小兄弟向老大哥坦诚心迹的姿态，相当动人。

两天以后，5月18日，罗斯福回电，对保持两人间的私人通信表示欢迎。借用驱逐舰一事尚需国会批准，最新式的飞机、弹药和钢材将大力供给。至于派舰队访问爱尔兰一事，罗斯福表示将仔细考虑。关于日本人，总统仅仅表示美国舰队已在珍珠港集结。

1940年6月，罗斯福说服国会呼应丘吉尔的请求。以租借英国海军基地为交换，向英国提供驱逐舰。罗斯福致电英国政府：

“据悉，大不列颠首相曾于1940年6月4日正式向议会宣称，在这场由大不列颠和大英帝国殖民地参加的战争中，如果英国战舰不能守住英伦三岛周围的水域，英国舰队决不投降或自行凿沉，而将开往海外，保卫帝国的其他地方。

美国政府郑重询问，上述声明是否代表英国政府的既定方针。

丘吉尔迅速回电：

“总统先生，你询问，我在1940年6月4日向议会发表的关于英国舰队决不投降或自行凿沉的声明是否“代表英王陛下政府的既定方针”。当然是的。不过，我认为这种假设的意外事情，似乎更可能落到德国舰队或其残余舰只的头上，而不会落到我们舰队的头上。”

这样，一切问题便令人愉快地迎刃而解了，1940年9月5日，丘吉尔用谨慎的措辞在下院演说，并且获得了他们的默认——实际上是全体同意：

“当我上次在议会讲时，即已料到英美两国之间将进行一桩重大的事情，现在此事已经完成。在我看来，这件事情的完成，使英、美两国的人民都普遍感到满意，也使我们全世界的朋友感到鼓舞。

试图深入玩味来往的官方照会，以致超过文件字面上的含意，那是错误的。我们进行的这种交换纯粹是两个友好国家之间本着信任、同情和好意的精神互相支援的措施。这些措施结合而成为一个正式的协议。必须完全按照这些措施所体现的这种意义来理解。只有非常愚昧无知的人才会认为，美国把驱逐舰交给英国，起码是违反了国际法，或者起码是影响了美国的非交战状态。

我相信，希特勒先生不会喜欢这次驱逐舰的让与，而且我也相信，他一旦抓住机会，就会向美国发泄怨气。所以我很高兴看到美国的海、陆、空军前线已经沿一条宽阔的弧线伸展到大西洋，使他们可以在远离其本上几百英里以外的地方扼制危险。海军部也曾对我们表示，他们切盼获得这 50 艘驱逐舰，使他们可以极其顺利地渡过这舰只缺少的时期。我过去曾在本院讲过，在我们的战时计划中的大批新造舰只可供使用之前，是不可避免地有这么一段舰只缺少的时期的。

我想议会已认识到，我们明年在海上的力量将比现在强大得多，即使是现在，我们也有足够的力量应付目前的任务。应当毫不延迟地把美国的驱逐舰编入现役舰队；实际上，英国水兵已经在各移交港口等待。你们可以称之为有准备的巧合。目前，我对整个这件事情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要说的了。现在不是玩弄辞令的时候。但是，请允许我郑重向本议会进一忠言：当你得到你所需要的东西时，就最好听其自然，不再究问。”

丘吉尔就这样得到了 50 艘美国驱逐舰。英国把在西印度群岛和纽芬兰划定的海、空军基地租借给美国，为期 99 年。

1940 年 12 月 30 日，罗斯福通过广播发表了“炉边谈话”，劝告他的国人拥护他的政策。“危险就在眼前，我们必须防患未然。但是我们深知，我们不能爬上床去，以用被蒙头的办法逃避危险，……如果大不列颠一旦崩溃，所有我们整个美洲的人即将生活在枪口之下，枪膛里装满一触即发的子弹，经济的和军事的子弹都有。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就我们所能支配的人力和物力，生产武器和舰只。……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国家的大兵工厂。”

丘吉尔立刻致电罗斯福：

“前海军人员致电罗斯福总统 1940 年 12 月 31 日

我们对你昨天发表的谈话非常感激。我们特别欢迎你所讲的关于支援我们的计划的梗概，没有这种支援就不可能在欧洲和亚洲根除希特勒主义。我们当然可以猜出，你为什么没有能够详细说明如何实现你的提案。同时，有些事情也使我焦虑不安。”

接着丘吉尔和罗斯福讨论了用黄金支付美援、索要原料和汽油等问题，最后，他向平静如昔的美国描绘了伦敦的一片惨景：

“昨晚，敌人烧毁了大半个伦敦市，伦敦以及各郡城市横遭破

坏的景象，令人怵目惊心；但是，当我今天去看那些仍在燃烧的废墟的时候，伦敦居民的斗志昂扬，就像4个月前敌人于9月开始不分青红皂白地轰炸的那些日子一样。

我感谢你对全世界的声明：支持并有效地武装我们这种不屈不挠的斗志，是和美利坚合众国将来的安全和繁荣密切相关的。

在暴风雨即将向我们袭来的新年里，我衷心祝你一切顺利。”

有时候，哈佛大学的毕业生罗斯福在致丘吉尔的亲笔信中，引用美国19世纪大诗人朗费罗的诗句，赠给这位战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绅士。罗斯福说：

“我想，这一首诗适用于你的人民，正如它适用于我们一样：

‘邦国之舟，扬帆前进吧！  
扬帆前进，强大的联邦！  
忧患中的人类，  
正全神贯注地将他们的一切希望，  
寄托在你们的命运之上。’

富兰克林·罗斯福”

丘吉尔则回电说：

“你所引用的朗费罗的诗句使我深受感动。我要把它镶在镜框里，作为这些惊涛骇浪的岁月的一个纪念物，并作为我们友谊关系的一个标志；我们的友谊是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由于电讯相通和精神相通而建立起来的。”

4个月后，1941年5月，丘吉尔在一次晚间广播演说中，还提到罗斯福和朗费罗，以此激励英国人民继续战斗下去：

“我们在纵观欧洲和非洲正在发生的事件和在亚洲可能发生的事件时，难免是忧心忡忡，焦灼不安；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却千万不可失去判断的能力，以致悲观失望或惊慌失措。当我们以冷静沉着的眼光注视着摆在我们面前的种种困难时，如果回忆我们已经克服了的那些困难的话，新的信心便会油然而生。现在发生的事，就其严重性来说，没有一件比得上我们去年所经历的那些危险。将来可能发生于东方的问题，没有一件可以和正在西方发生的问题相比。

当我上次对你们讲话的时候，我曾引用朗费罗的诗句，这是罗斯福总统亲笔写给我的。我还想起另外几行诗来，虽然没有那儿行著称，但是，在今天晚上，用以说明我们的命运，似乎是贴切中肯的。而且我相信凡是说英语的地方，凡是飘扬着自由旗帜的地方，人们的想法都是这样。

‘当那疲乏无力的浪花向岸边空自冲击，  
仿佛是寸步难进的时候，



远远地，通过小河水湾的流灌，  
已静静地汇成一片汪洋。  
当晨光初照人间，  
那光芒岂止透过东窗；  
太阳在前面缓缓地上升，多么缓慢啊！  
但是请看西边，大地已是一片辉煌。’ ”

1941年7月，罗斯福总统的特使，最善于沟通英美关系的哈里·霍普金斯飞赴唐宁街，说总统很愿意在一个偏僻的港湾之类的地点同丘吉尔会晤。地点选为纽芬兰的普拉森夏湾。

8月9号，丘吉尔乘英国最新的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出发抵达，罗斯福已乘“奥古斯塔号”军舰等候在那里，英美领导人直接亲密无间地握手拥抱在一起。

这次会晤双方都愿意拟订一项联合宣言，规定一些广泛的原则，以便共同前进。丘吉尔初步草拟宣言原稿，经罗斯福增订后，8月12号，宣言定稿，这就是二战史上有名的英美《大西洋宪章》！

#### 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的联合宣言

1941年8月12日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和代表联合王国国王陛下政府的首相丘吉尔先生曾举行会谈，认为应当公布某些有关两国国策的共同原则，他们希望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改善世界的前途。

第一，他们的国家不寻求领土和其他方面的扩张。

第二，两国反对不符合有关民族自由表达的愿望的领土变更。

第三，两国尊重各国人民选择他们在其管辖下生活的政府形式的权利；两国主张凡是被强制剥夺主权和自治权的民族恢复这些权利。

第四，两国在适当照顾到它们现有的义务的条件下，力图使一切国家，不论大国或小国，战胜国或战败国，在平等条件下进行贸易并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为其经济繁荣必需的原料。

第五，两国愿意在经济领域内促成一切国家之间的最充分的合作，目的在于使所有国家改善劳动标准，发展经济，享有社会安全。

第六，在最终摧毁纳粹暴政以后，两国希望见到建立这样一种和平，以使一切民族得以在自己的疆界内安居乐业，保证一切地方的所有民族都可以过无所恐惧，不虞匮乏的生活。

第七，这样的一种和平应当使所有的人能够在公共海洋上不受阻碍地航行。

第八，两国相信，世界上一切国家，基于实际的和精神上的原因，必须放弃使用武力。如果在自己的国界以外进行侵略威胁或可能进行侵略威胁的国家继续使用陆海空军备就不能保持未来的和平。两国相信，必须在建立更广泛和更持久的普遍安全体系以前解除这些国家的武装。两国也将赞助和提倡一切其他实际可行的办法，以减轻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在军备方面的沉重负担。”

这项联合宣言的影响是重要而深远的。美国在名义上仍属中立国，但却同一个交战国发表如此宣言，仅就这一事实而论，即是超常规和惊人的了。宣言中“最终摧毁纳粹暴政”等词句，火药味相当浓烈，在平时，这样的言辞意味着战争行动。最后一节富于远见，宣告战后美英将联合维持世界秩序。

整个二次大战期间，丘吉尔在物质上乃至精神上对美国的依存关系是极其深刻的，也许后者更甚。

1941年12月7日，日本不宣而战，以海空军夹袭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主要海空军基地珍珠港。击毁击伤美国主要舰只十余艘、飞机188架，美国太平洋舰队覆灭殆尽。当晚，丘吉尔思绪联翩。战后他回忆当时的心情时说道：

“有些人说，美国是软弱的，有些人说，他们永远是不团结的；他们将在远处闲逛；他们将永远不会与人揪做一团；他们永远经不起流血牺牲；他们的民主政治和定期选举制度，将使他们的战争努力瘫痪。他们在敌友的眼中，都将不过是地平线上的一个模糊的斑点。现在，我们应当可以看出这个人数众多，但是遥远的、富足而健谈的民族弱点来了。可是我曾经研究过战到最后一寸土地的美国南北战争。美国人的热血曾经在我的血管中流动。我想起曾任英国外交大臣和英驻美大使爱德华·格雷在30多年前对我讲过的一句话——美国好像是‘一只巨大的锅炉。一经在它下面生起火来，它就能够产生无穷的力量。’当我去睡觉的时候心中充满了并且洋溢着感情与感想，所以睡了一个得到拯救而心怀感激的人所睡的觉。”

珍珠港事件后两天，1941年12月10日，日本海军击沉英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却敌”号，丘吉尔闻讯后，受到了在全部二战过程中最直接的一次震惊。形势非常可怕：从此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中，除了急速返回加利福尼亚的美国珍珠港残存的主力舰外，没有英美的任何主力舰了，日本海军独霸这广袤的海域。丘吉尔当天中午在下院发表演说：

“我给下院带来坏消息，我想这是我应该及早传达给你们的。

新加坡方面已经发来报告，英国军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却敌’号已经在对进攻马来亚的日本人作战时被击沉。除日本官方公报所载以外，还没有获悉详细情形，那项公报声称两艘船都是在空袭中被击沉的。

我可以附带说，在下院下次开会时，我将乘机就战争的全面局势作一简短说明，这个局势从有利的和不利的许多观点来看，在过去几天内已经有了重要的变化。”

丘吉尔坚信，世界人口的五分之四正站在他们这边作战，最后的胜利是可以获得的。但次日他在下院仍以最冷静的语言演说，避免作出早期成功的一切诺言：

“自然，我不应当准备来讨论远东和太平洋上所产生的局势，或者为了恢复局势而必须采取的措施。很可能我们将不得不要受到巨大的惩罚，但是我们将同美国和荷兰密切合作下尽最大的力量来保卫自己。大不列颠和合众国的海军力量曾经大大优于——而且现在仍然大大优于——三个轴心国联合在一起的舰队。但是我们必不可低估在马来亚和夏威夷所受到的损失的严重性，或者低估已经袭击了我们的这个新敌人的力量，或者低估为了要在远东产生、整顿和调派取得绝对胜利所必需的那支庞大军队而需要的时限。

我们要经过一个十分艰苦的时期，这就需要人人很快作出一次新的奋斗。如我曾经说过的那样，我们必须在供应方面对俄国信守诺言，而同时我们又必须预料到至少在以后几个月内抵达不列颠的美国供应物资的数量和美国海军所给援助的程度将减少。这个缺额必须加以补足，而且只有我们自己努力才可以把它补足。但我现在深信不疑，美国的1亿3000万人民已经决心打这场战争，并且他们一经定下心来专心致志地做这件事——他们一定会——当作他们在生活中的主要目的去进行，那么，军火产量和各种援助将要大大超过一直保持到现在的平时基础上所可能期望的标准。现在，不但英帝国，而且美国也在为生存而战斗；俄国在为生存而战斗，中国在为生存而战斗。欧洲的降服于敌人残暴统治下的所有被征服国家的一切精神和希望都寄托在这4个伟大的作战团体的身上。我以前曾说过，人类的五分之四站在我们这一边。这可能是说少了。曾经能够给人类带来这些可怕祸害的，只不过是这些结帮成伙的恶人和他们的军事或党派组织而已。假如我们不能给他们一个在1000年的史册上不致被遗忘的教训。这会给一个时代带来耻辱。”

1941年12月22日，丘吉尔应邀出访美国。当他的专机在华盛顿着陆时，罗斯福正坐在汽车里等候他。在白宫，丘吉尔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他和总统愉快地相处，有时，他把坐在轮椅上的罗斯福从客厅推到电梯上，以表示他的尊敬，这也使他想到英国古代的沃尔特爵士，他是女王伊丽莎白的宠臣，一次经过一条沼路时，他把身上华丽的外衣脱下铺在地上，让女王走过。

丘吉尔赴美的重要使命是在圣诞节以后对美国国会演说，还要在加拿大议会演说，他极其慎重地准备着演讲稿。

1941年圣诞节，丘吉尔在白宫度过。白宫的花园里摆上传统的圣诞树，丘吉尔和罗斯福在阳台上对聚集起来的许多群众作了圣诞演说。丘吉尔的圣诞演说尤其动人：

“我在远离我的本国，远离我的家庭的地方，然而我实在不能说我我觉得远离了家乡，度过这个纪念节日，不管是由于我的母亲方面的血缘关系，还是由于我经过多年的活动频繁的生活而在这里发展的友谊关系，还是由于说同一种语言，跪在同一个圣坛之前，以及在很大程度内追求同一个理想的伟大民族的共同事业中所存在着的崇高感情关系，我在这里——合众国的中心和最高地点感觉不到自己是一个异乡人。我感觉到团结一致和兄弟般的联合，加上你

们欢迎我的盛意，这使我相信我是有权利来坐在你们的炉边而分享你们的圣诞节的欢乐的。

这是一个奇异的圣诞节前夕。差不多全世界都陷入生死搏斗中，而国与国之间却用科学所能发明出来的最可怕的武器互相进攻。假若我们不能确信把我们引向战场的并不是对于任何别国人民的土地或财富的贪欲，并不是卑俗的野心，也不是损人利己的不健康的欲望，那么，我们这个圣诞节假期，对我们来说将是不幸的。这里，在席卷了所有的陆地和海洋并越来越逼近我们的家园的战争的狂风暴雨当中；这里，在一切纷乱当中，我们今天晚上在每一座茅屋小舍之内，在每一个人豁达的心中都得到精神上的安宁。因此，我们至少可以在今天晚上把围困着我们的那些忧虑和危险丢开，而为儿童们在一个暴风雨的世界里求得快乐的一晚。所以这里只有一个晚上，整个英语世界的每一个家庭都应该是一个光明灿烂的、快乐与和平的岛屿。

让孩子们享受他们嬉游笑乐的一晚吧。让圣诞老人的礼物使他们游玩得更高兴吧。让我们这些成年人在再次回到我们的严肃任务和我们前面的那些非同等闲的年代以前尽情地和他们一起享受无限的快乐吧。我们决心要凭我们的牺牲和勇敢而使得这些孩子们不致被别人夺去了他们的遗产，或者被否认有生活在一个自由和美好的世界上的权利。

托上帝的慈意，愿大家度过一个快乐的圣诞节。

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在圣诞节日同赴教堂，丘吉尔在简单的仪式中获得了安宁，并欣赏地歌唱著名的赞美诗，其中有一首“啊，小市镇伯利恒”是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

丘吉尔是在心情激动的情况下去履行对美国国会演说的邀约的。对于他所确信的英语民族的战无不胜的联盟来说，这个场合是重要的。在以前他从来没有对一个外国议会演说过。但是就他而言，因为可以把他的母亲方面的男性世系上溯五代是一位在乔治·华盛顿的军队里服役的尉官，所以就有可能感觉到有血统上的权利对他们的共同事业中的这个伟大共和国的代表们发表演说。

他花费圣诞日的大部分时光来准备他的演说。12月26日，当他在参众两院的领袖们陪同下从白宫向国会议事厅出发时，总统祝他幸运。广阔的道路似乎聚着大批群众，但是为了安全而采取的预防措施（这在美国是远超出英国的习惯做法的）却把他们隔开很远，有两三辆满载着武装便衣警察的汽车在他们周围护卫。他下车后，出于一种强烈的兄弟情感，想走到欢呼的群众面前去，但人们不允许他这样做。议事厅里面的情景是动人而又非同等闲的，那个半圆形大厅已经挤满了人。

丘吉尔觉得十分自在，并感到比有时在英国下院还更加自信。人们以最大的善意和注意力来听取他所说的话。在他的演说中，人们正好在他所期望的地方发出笑声和掌声。声响最大的反应是在他说到日本的暴行时问道，“他们把我们当作什么一类人看待？”的时候。从这个庄严的集会中，他不断地意识到美国国家的能力和意志力。谁还怀疑一切将会好起来呢？

丘吉尔结束演说时这样说：

“参议院议员们和众议院议员们，我再费片刻时间从目前的纷争和动乱转而谈到未来的更广泛的基础。我们正在这里共同抵御一群要毁灭我们的强大敌人；我们正在这里共同保卫自由人所珍视的一切。在仅仅一个世代之中，世界大战的灾难已经有两次临到我们头上；在我们一生之中，命运之神的长臂已经有两次伸过大洋来把美国拉入战争的最前线。如果我们在上次战争以后就团结在一起，如果我们为了本身安全而采取了共同措施，这次祸患的再次发生是我们决不会遭遇到的。

难道我们对我们自己，对我们的子女，对遭受苦难的人类，不负有确保这些灾难不致第三次吞没我们的义务吗？恶性疫病可以在旧世界爆发而把破坏性的灾害带到新世界来，一旦开始蔓延，新世界就无法逃避，这已经得到证明了。我们为职责和谨慎所驱使，必须：第一，经常地和警觉地把憎恨和复仇的病源中心地区加以检查与及时处理；第二，成立一种适当组织，以确保这种疫病可以在它开始发生的最早的时期，在它还没有蔓延和猖獗于全球的时候，就受到控制。

五六年前，美国和英国可以不流一滴血而很容易地坚持要德国履行在世界大战后它所签订的条约中关于裁军的条款；并且也有机会去保证德国获得我们在《大西洋宪章》中所宣布过的不应不让任何国家（无论战胜国或战败国）享有的那些原料。那个时机已经过去了，一去不复返了。再把我们联合在一起曾经需要花费大力，或者，如果你们容许我用别的语言，我就说，这人一定是心灵受到蒙蔽，如果他看不出在这个世界上有某种伟大的目标和计划正在完成，而我们荣幸地就是它的忠诚服务者。我们并未得到能窥测未来奥秘的禀赋。但是我仍然要声明我的坚定和不可侵犯的希望与信念，即在未来岁月中，英美两国人民为了本身的安全和大家的利益，将要庄严、正直与和平地并肩前进。”

丘吉尔于 30 日对加拿大议会演说。在永不休止的行政工作进行中，要准备两篇越过大西洋去讲述而又传遍全世界的演说词，是一种极其辛苦的费力的工作。对于一位顽强的政界人物来说，讲演并不是一种重大的负担，但是在这样一种带电的大气中，要选择什么是要说的，什么是不该说的话，却令人担心和为难。丘吉尔尽了自己的力量来准备。在加拿大讲述的演说中最成功之处就在说到维希政府的地方，加拿大仍然与这个政府保持着关系。

〔在 1940 年〕到北非去，这是他们的职责，也是他们的利益所在，他们在那里本来会居于法兰西帝国的领导地位。在非洲，在我们的援助下，他们会拥有压倒优势的制海权。他们会得到美国的承认，并且可以利用他们储存在海外的所有的黄金。假如他们这样做，意大利可能已经在 1940 年年终以前被迫退出战争，法国将会在同盟国的会议中，以及在战胜国的会议桌上，维持住它的国家地位。可

是他们的将军们把他们引入了歧途。当我警告他们说，不管他们怎样做，不列颠将单独继续作战的时候，他们的将军们对他们的总理和他的分裂的内阁说，“三个星期之后，英国将要像一只小鸡那样扭断自己的脖子。”嘿！什么小鸡，什么脖子，这是多么恶意的话呀！

演说相当生动。为了引起回忆，丘吉尔引述了哈里·劳德爵士的关于上次大战的歌曲，这首歌曲的开头一句是：

如果我们大家回顾过去的历史  
我们就能够正确他说出我们现在的地位。

他在讲稿中写的是“那位伟大的老喜剧作家”。但在快讲到这儿时想到了“吟游诗人”这个字眼。“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改进！我欢欣地知道他那时正在倾听，并且由于被引述到而感到高兴。我觉得非常高兴的是，我为一个凭着他的激动人心的歌曲和勇敢的生平而对苏格兰民族和英帝国有过不可估量的功劳的人找到一个正确的字眼了。”这位伟大的修辞专家事后极为欣赏这个灵机一动。

在演说结束时，丘吉尔大胆地试图对战争前途予以预测：

“我们可以观察到当前战争的三个主要时期或阶段。首先是巩固、联合和进行最后准备的时期。在这个必然以有着很多剧烈的战事为特征的时期中，我们将仍然在聚集我们的力量，抵抗敌人的进攻，并取得必要的压倒一切的空中优势与船舶吨位，以使我们的陆军不论所需要的人数是多少都能够渡过把我们和敌人隔开来的海洋（俄国的情况除外）。只有当美国已经取得那么大的进展时，而你们正在予以有力援助的那个巨大的造船计划的进行达到高潮时，我们才能够把我们的全体男丁和现代科学装备的力量对准敌人。这一个时期将持续多久，要看投入所有我们的军事工业和造船厂中的生产努力的热情如何而定。

然后开始的第二阶段可以称做解放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我们必须以收复已经失去或者还要失去的领土为目的，我们也必须指望被征服的民族从拯救和解放他们的军队与空军大批出现于他们的国境时起举行起义。为了这个目的，被敌人攻占的国家或地区，被征服的政府或政权，不应当松懈为了那个得到救援的日子而作出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努力和准备。侵略者（不论是德国人还是日本人）在各地都必须被当做应当尽可能避开和隔离的患传染病的人。在不可能进行积极抵抗的情况下，必须维持消极抵抗。必须使侵略者和暴君们感觉到他们的昙花一现的胜利将要遭到可怕的清算，他们就是被追缉的人，他们的事业是注定要失败的。对于充当敌人的工具的那些卖国贼和叛徒们，将予以特别的惩罚。将把他们移交给他们的同胞们去审判。

第三阶段也得加以筹划，这就是对欧亚两洲的犯罪国家的城堡和本土进攻。

这样，我企图用几句话来阐明未来的暗淡和不可测度的奥秘。但是在对我们应当力图遵循前进的道路加以预测时，我们决不可忘记的是敌人的力量和敌人的行动可以在每一个阶段影响到我们的命运。而且你们当注意到我没有企图给各个阶段以任何时限上的规定。这些时限，要看我们的努力、我们的成就和战争的危險而变化无常的进程而定。”

丘吉尔在华盛顿和渥太华发表的这两篇演说都很成功，尤其是此时正值日本肆虐之时，美国被拖入战争，前景既光明，但还要经过许多黑暗。所以当丘吉尔除夕乘火车返回华盛顿，被邀请坐到美国记者车厢里时，他对全美国重要报刊的新闻记者祝贺道：“1942年即将来临。这将是辛苦的一年——奋斗和危难的一年，并且是走向胜利的一大步。祝我们大家都安全而光荣地度过这一年！”

1943年1月，英美首脑在北非名城卡萨布兰卡会晤，讨论和磋商怎样迎接胜利的问题，在英美首脑力这次会晤起草的声明中，有一条宣称：美国与大英帝国决心将战争毫不留情地进行到底，直至德日两国“无条件投降”为止。

罗斯福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布了“无条件投降”这个措词，旋即引起了很大的争论，这场争议甚至延至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当时英美都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这句话拖长了战争，正中独裁者们要迫使德日两国人民和军队决一死战的下怀。

“无条件投降”是美国内战史上北军名将格兰特的专利，在南北战争中，这位北军总司令动辄要求敌军“无条件投降”，因此他获得了“无条件投降将军”的雅号。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罗斯福在一次晚餐中谈到对法西斯军队的处置时想到这个典故，随口就说：“他们必须无条件投降”。当时丘吉尔想了一下，皱皱眉头，然后满脸微笑说：“这句话好极了！”当晚喝最后一杯酒时丘吉尔的祝词也是“无条件投降”。

虽然有来自各方面的意见对当时大受欢迎的“无条件投降”一词进行责难，说这是英美战时政策的严重失误，拖延了战争，并使战后的重建恢复更为困难。但丘吉尔一直利用各种机会或场合以其雄辩的演说为此辩护。1943年6月30日。他在伦敦市政厅发表演说，从“无条件投降”谈起：

“我们这些同盟国，要求纳粹法西斯以及日本的专制政权无条件投降。所谓无条件投降，就是说必须彻底粉碎它们的抵抗意志，它们必须完全听任我们的处理。这还意味着我们必须采取一切必要的具有远见的措施，以保证不使世界因为它们的那些处心积虑的阴谋和凶暴的侵略，而再度陷于动荡，再度遭到破坏和再度被战火所烧毁。这并不意味着，也绝不可能意味着，我们将由于不人道的行为或仅是出于复仇狂而使我们的战无不胜的武器沾上了污点，或是我们不打算安排一个这样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各国人民都可以享受美国独立宣言把它们美好地称为‘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罗斯福总统在1941年12月24日也说过：‘同盟国无意奴役德

国人民。我们希望他们能获得正常的机会，作为一名有用的、受尊敬的欧洲大家庭的成员在和平中发展。但是我用坚决强调‘受尊敬’一词，因为我们意欲彻底肃清他们身上的纳粹主义、普鲁士军国主义，还有他们是‘优秀种族’这一可能引起一场大难的狂妄的想法。’”

1944年1月，丘吉尔鉴于英美苏德黑兰会议之后的现实，分析了“无条件投降”的实质内容。他对内阁说道：

“所谓‘无条件投降’，是意味着德国人绝对没有权利享受任何特殊待遇。例如，《大西洋宪章》就不能作为权利问题应用在德国人身上。反之，战胜国是否遵守人道与文明上的义务，则由它们自己决定。

问题在于，我们在目前是否应当提得更具体一点，我认为，恐怕应当先看一看德国实际将遭到什么样的命运，然后再断定公布更具体的投降条件是否会促使他们投降。

第一，他们将彻底被解除武装并全部剥夺重新武装的能力。

第二，他们将被禁止使用各类航空工具，无论是民用的还是军用的，还将被禁止学习飞行技术。

第三，大批被断定犯有暴行的人将被送交他们在那里犯过罪行的国家受审。斯大林总理在德黑兰曾经说过，他深信至少需要400万德国人为他工作好多年，才能重建被德国人所破坏的家园。我深信俄国人将坚持要求大量的德国机械设备，以便绰绰有余地补偿被德国人所破坏的全部机械设备。很可能别的战胜国也会提出同样的要求。鉴于大量的法、意、俄籍战俘和被拘留者所受到的严酷的待遇，这种要求似乎并不是不公正的。

第四，据我所知，英、美、苏三国政府已一致同意，德国将被断然分割成几个独立的国家。东普鲁士和奥德河以东的德国领土将被永远割让，当地的居民将被迁走。普鲁士本身将被分割与缩小。必须将鲁尔和其他重要产煤产钢中心置于普鲁士控制之外。

第五，作为德国军队核心的总参谋部必须彻底解散，恐怕俄国人会要求将德军总参谋部的大量人员判处死刑和长期徒刑。我本人原希望公布一张名单，上列50名到100多名罪大恶极的坏蛋的名字，以便将大多数人民与将被盟国判处极刑的人区分开，并避免发生任何像大屠杀之类的事情。这势必会使普通的德国人感到放心。但是这些建议在德黑兰被认为是过于宽大而被轻蔑地加以拒绝了，可是我并不知道斯大林元帅的这一部分谈话究竟是否认真说的。”

2月22日，他在下院对议员们从德国人的角度谈到“无条件投降”的意义：

“‘无条件投降’一词，并不意味着德国人民将受到奴役或灭亡。但是它却意味着盟国在受降时不受任何条约或义务的约束，例如，并不存在《大西洋宪章》理所当然适用于德国的问题，也不存在敌国领土不得转让或调整的问题。我们决不承认像德国人在第一



次世界大战以后所说的那一套论证，说什么他们投降是因为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无条件投降意味着胜利者可自由行动，它并不意味着他们有权可以横行霸道，也并不意味着他们想把德国从欧洲的国家中抹掉。如果说我们是受着什么义务约束的话，我们只凭着自己的良心对文明承担义务。我们并不因订立契约的结果而对德国人负有义务。这就是‘无条件投降’的意义。”

奇怪的是，在二战末期，在德国和日本对“无条件投降”却没有任何误解，敌人完全领会和接受了这个词和它所传递的要求。这证明了罗斯福的创意以及丘吉尔的雄辩都是无可置疑的。

回顾丘吉尔在战时与美国的合作艺术，非常精彩。战争开始，丘吉尔吃准美国自身对本国的海岸和空中防御力量的忧虑心理后，加紧与罗斯福总统磋商，最后商定，英国以 99 年的租借期向美国出租西印度群岛的军事基地，作为交换条件，获得 50 艘美国海军旧驱逐舰。一方面，英国皇家海军的实力大大加强，更重要的是，丘吉尔此举在相当程度上打破了美国不参战的姿态，他评价道：“此事在欧洲的影响甚为深远。”

接着丘吉尔乘势争取更大规模的美援。美国此时全国也已掀起了一个同情和钦佩英国的巨大浪潮，罗斯福在连任总统的第三天就公开宣布美国的军火产品将分配一半给英国和加拿大。美国决定卖给英国 11000 架飞机之后，再额外提供 12000 架飞机。但英国此时已无现金支付的能力。丘吉尔于是致电罗斯福总统陈述英国的困境，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电报全文长达万字，是丘吉尔在二次大战期间最重要的电文。

罗斯福被这个常常自称为他的“第一中尉”的英国绅士打动，1940 年 12 月 29 日在广播中向美国人民发表了著名的“炉边谈话”，声明他将实施对英国的“租借法案”。《租借法案》最先使英国，然后使中国、苏联等盟国通过信贷方式从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兵工厂获得了大批战争物资，此举堪称既现实又伟大。

丘吉尔与隔海峡相望的法兰西的合作，也堪称传奇。这个与英国有着唇亡齿寒关系的国家一开战就一败涂地。

丘吉尔对戴高乐的慧眼相识，也使英法联盟产生了强大的力量。某些西方二战史家甚至认为，是丘吉尔塑造了戴高乐，要不是有丘吉尔，戴高乐在战争初期就被人抛弃了。法国 1940 年夏初沦陷时，丘吉尔发现法国军政首脑统统充满了失败情绪和沮丧心情，而只有刚刚从坦克旅长提升为国防部副部长的戴高乐却充满了抵抗精神。在丘吉尔飞临法国图尔视察法军败况时，他对戴高乐非常注意，临别时他口里喃喃自语：“这是个掌握命运的人”。

所以一当戴高乐脱离沦陷了的法国飞赴伦敦，并受到相当多刚从敦刻尔克大撤退退英国的法国士兵的漠视时，丘吉尔将英国广播公司的电台向戴高乐开放，帮助他在空中开始建立抵抗德国的“自由法国”。在二战即将结束之前，也是在丘吉尔一再说服下，罗斯福同意正式承认戴高乐政府。

战争初期，法军一触即溃，法兰西沦陷，丘吉尔根据内阁意见，拍给法国政府一封正式电报，鼓励法国不要失去勇气，并第一次提到英法之间的永久联盟，电文是以丘吉尔首相名义致法国当时总理雷诺的：

“当英法两国的生死存亡系于一发的时刻，为了两国决意捍卫的自由民主事业，英王陛下政府特向法兰西共和国政府致敬，赞扬法国军队在以寡敌众的战斗中表现的英雄气概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法国军队的努力无愧于法国最光荣的传统，使敌军遭受惨重而持久的创伤。大不列颠将竭尽所能继续给予最大的援助。我们愿借此机会声明我们两国人民和两个帝国之间的团结是牢不可破的。我们不能估计最近要落在两国人民头上的各种苦难有多大。但我们确信，这次战火的考验只能把我们两国融化在一起，成为一个不可战胜的整体。我们再次向法兰西共和国提出我们的保证和决心，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继续战斗，在法国，在我们这个岛上，在海洋上，在天空中，战争蔓延到哪里就打到哪里，我们要把我们的人力、物力利用到最大的限度，要分担医治创伤的重担。我们绝不放弃战斗，我们要战斗到法国安如磐石、恢复过去的光荣，战斗到受迫害、受奴役的国家和人民得到解放，战斗到把文明从纳粹统治的恐怖中解救出来。我们比以前更加确信这一天的到来。这一天可能比我们现在预期的还来得早。”

1940年6月16日战争刚刚爆发后才被提升为法国国防部次长的戴高乐将军飞往伦敦，提议为了给雷诺政府以必要的支持，使其能够继续作战，就应采取某些引人注目的行动。他认为，就英法两国人民永久的联盟发表正式的联盟宣言便可达到这一目的。这番话打动了丘吉尔的心。最后，战时内阁批准了宣言草稿。

### 联盟宣言

在当今世界历史这一最紧要关头，联合王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谨发表宣言，宣布两国结成永久的联盟，在共同保障正义和自由的事业中有毫不退缩的决心，反对把人类陷入机械生活和奴隶状态的制度。

两国政府宣布，法国和英国今后不再是两个国家而是一个法英联盟。

联盟的宪法将规定执行国防、外交、财政和经济政策的机构。

每一个法国公民将立即享有大不列颠公民的身份；每一个英国臣民也将成为法国的公民。

无论两国领土的任何地方遭受战争的破坏，恢复的责任将由两国分担，两国的资源将同等地并像一个国家似的用于这一目的。

在战争期间，只设一个单独的战时内阁，所有英国和法国的武装力量，不论是陆军、海军或空军，都将置于该战时内阁的指挥之下。最宜于从什么地方指挥，就从什么地方指挥。两国议会将正式合并。不列颠帝国所有的国家已在组织新军。法国将在陆地、海洋和空中继续维持其现有的兵力。联盟将向美国呼吁，大力补充盟国的经济资源，并为共同的事业提供大量的物质援助。

无论战斗发生在什么地方，联盟将集中全力打击敌人。

这样，我们必将战胜敌人。

但如此诚恳的宣言也没能使雷诺内阁挺住内阁中以贝当元帅为首的失败主义者强烈反对宣言，称它是“一个把法国沦为保护国或殖民地的计划”。雷诺心力交瘁之下辞去总理职务，贝当即刻着手组建法国政府，考虑和德国签订停战协定，投降主义占了上风。

这时丘吉尔唯一看好的是戴高乐将军，战后他回忆道：“从他冷静沉着的举止中，我感到，他具有一种惊人的忍受痛苦的力量。在同这位身材高大、性情冷静的人的接触中，我始终保持着这个印象：这才是法国的元帅！”

1940年6月17日上午，丘吉尔安排戴高乐离开法国。下午，戴高乐佯装送朋友斯皮尔斯将军去机场，当飞机起飞时，他登上飞机，砰地关上机舱的门，飞机腾空而去，法国的警察和官员们手足无措，目瞪口呆。战后丘吉尔高度评价这次出逃：“戴高乐在这架小小的飞机里载着法国的光荣离去了。”

当晚，戴高乐在伦敦向法国人民广播：

“法国并不孤立。在它的后面有一个庞大的帝国。它可以和不列颠帝国联合起来，不列颠帝国控制着海洋并继续作战。法国可以像英国那样，充分利用美国巨大的工业资源。”

根据内阁的愿望，丘吉尔也在当晚作了广播声明，表示了英国政府决战的信心和勇气：

“从法国传来的消息很坏，我对陷入重大灾难的英勇的法国人民深感悲痛。任何力量也不能使我们变更对法国人民的感情或者使我们失去法兰西精神终将重振的信念。法国发生的一切并不影响我们的行动和目的。我们现已成为以武力保卫世界正义的唯一的战士。我们要全力以赴，才不辜负这一崇高的荣誉。我们一定要保卫我们本岛，只要有英帝国，我们就要不屈不挠地战斗下去，直到把希特勒给人类造成的灾祸扫除干净。我们确信，我们终将达到一切目的。”

1940年10月21日，丘吉尔通过无线电广播向英国发表演说。为了准备这篇精彩的演说，他曾煞费苦心，因为必须用法语讲。最初他不满意用直译法从英文译出的稿子，认为它漏掉了许多只有用英语才能表达出的精神。后来，戴高乐“自由法国”在伦敦的一位语言专家译出一个更好译本，丘吉尔练习了好几次，最后在一次空袭的爆炸声中，从“新楼”的地下室播送出去：

法国人！

30多年来，我一直同你们在和平和战争中并肩前进，现在我仍然循着这条道路在向前走。今晚，不论你们在什么地方，不论你们的遭遇如何，我就像在你们家中一样同你们谈话。我一再诵读刻在金路易周围的那句祈祷文：“愿上帝保佑法兰西”。我们在英国国

内，虽处于德国鬼子的炮火之下，也没有忘记把我们同法国团结在一起的千丝万缕的关系，现在，我们正不屈不挠、精神百倍地为了欧洲的自由以及公平对待各国普通人民的事业而努力，正是为了这一目的，我们曾同你们一起，拿起武器，并肩作战。当善良的人们受到卑鄙邪恶之辈的袭击，惨遭蹂躏，陷入苦难的时候，他们应当非常小心，切不可彼此不和。我们共同的敌人时时刻刻在设法制造这种局面，当然，我们之间不幸也发生过许多事情，上了敌人的圈套。如果再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必须尽量转祸为福，把它们变为好事。

希特勒先生说，他要把伦敦化为灰烬，他的飞机现在正在进行轰炸，然而伦敦的居民却等闲视之，毫不畏惧。我们的空军除保卫自己还有余。我们正在等待敌人宣传已久的入侵，连海里的鱼也在等待。但是，对我们来说，这当然只是一个开始。现在是 1940 年，虽然我们也曾时而遭受损失，但是，我们仍然同以往一样，掌握了制海权。到 1941 年，我们将掌握制空权。请你们记住这意味着什么。希特勒先生利用他的坦克和其他机械化武器，以及第五纵队与卖国贼的阴谋勾结，暂时征服了欧洲大多数最优秀的民族，而他那个小小的意大利帮凶，则紧紧地跟在他的身边，馋涎欲滴地希望得点东西，可是却弄得精疲力竭，疲惫不堪，而且也很胆小。他们两人都想分割法国和法兰西帝国，把法国当作一只鸡：这个分一条腿，那个分一只翅膀或者一块胸脯。不但法兰西帝国将被这两个卑鄙的恶棍吞噬，就是阿尔萨斯—洛林也要再次遭受德国的奴役，尼斯、萨瓦和科西嘉——拿破仑的科西嘉——就会从法兰西的大好版图中被人攫去。但是，希特勒先生不仅是想盗窃他国人民的领土，或者把一块一块的领土纳入他的小小联邦。我要告诉你们实情，你们必须相信：这个恶徒，这个因怨恨和失败而形成的穷凶极恶的怪物，已决心要彻底消灭法兰西民族，要断送他们的生存和未来。他用种种狡猾和野蛮的手段，企图永远消灭为法国所特有的文化的源泉，阻碍法兰西精神在全世界的传播。如果他的企图得逞，全欧洲将通通变为德国鬼子的领土，受纳粹匪帮的剥削、掠夺和欺凌。请你们原谅我说得这样坦率，因为现在不是转弯抹角地说话的时候。将来，法国之所以要受德国人的压迫，并不是因为法国打了败仗，而是因为它所有的一切都全遭毁灭，荡然无存。陆军、海军、空军、宗教、法律、语言、文化、制度、文学、历史和传统，这一切都要在战胜国的军队的暴力和警察无所不用其极的卑劣手段下消灭殆尽。

法国人，事不宜迟，赶快重振精神。应记住拿破仑在有一次战役之前说过的话：“这些普鲁士人今天是如此地吹嘘，可是他们以前在耶拿是三对一，在蒙米赖是六对一。”我决不相信法兰西的灵魂已经死亡！我也决不相信它列居世界最大国之一的地位已永远消逝！希特勒先生的这些阴谋和罪行，将为他和他的每一个党羽带来报应，我们当中有许多人都能够活下来亲眼看到他们受此报应。事情尚未了结，但为期当不在远。我们正在跟踪追击，我们在大西洋对岸的朋友和你们在大西洋对岸的朋友也在跟踪追击。如果他不能毁灭我们，我们就一定要毁灭他和他的匪帮，消灭他们所干的一切

事情。因此，要有信心和希望，因为一切都会好转的。

在目前这个艰难痛苦的时刻里，我们英国人对你们有什么要求呢？我们现在正在从事战争，以便赢得我们将同你们共享的胜利，因此，我们要求你们：如果你们不能在战争中帮助我们，你们至少要作到不与我们为难。不久，你们就能够给这只为你们打击敌人的铁拳增加力量，你们是应该这样做的。但是，即使在目前，我们也相信，法国人无论在什么地方，一听到我们在空中或海上，或不久——肯定不久——在陆地上打了胜仗，他们的心便感到温暖，他们便热血沸腾，感到骄傲。

请你们记住，我们将永不停止，永不疲倦，永不让步，我全国人民已立誓要负起这一任务：在欧洲扫清纳粹的毒害，把世界从新的黑暗时代中拯救出来。不要以为我们英国人会像德国控制的无线电台所说的那样，想攫取你们的船只和殖民地。我们想夺取的是希特勒和希特勒主义的生命和灵魂。仅此而已，别无其他，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我们不觊觎任何国家的任何东西，我们希望的，只是对我们的尊重。在法国殖民地和在所谓的法国非占领区的法国人，随时都有机会进行有用的活动。这一点我就不详细讲了。敌人正在收听。对于那些处于德国蛮子的严刑峻法、压迫和监视之下的许多人，英国人的心完全是同他们在一起的，我愿对这些居住在沦陷区的法国人说，当他们考虑未来的时候，要想到伟大的法国人甘必大在1870年以后谈到法国的未来和归趋时所说的话：“要常常想到这件事，但口里不要说出来。”

晚安！为明早养精蓄锐而安歇吧！曙光即将来临。晨曦将灿烂地照耀着英勇、忠实的人，温暖地沐浴着为正义而受苦难的人，壮丽地抚慰着长眠的英灵。黎明就会发出这样的光辉。法兰西万岁！世界各国的普通人民向着他们公正和真实的传统，向着更广阔、充实的时代的前进步伐万岁。

丘吉尔这次演说深深打动了千百万法国男女的心，直到战后，法国各阶层的人们还向他提到这次演说。他们通过丘吉尔的声音，重新看到法兰西那古老的光荣，感到大英帝国那坚如磐石的力量和气运。

对法国投降议和的维希政府，丘吉尔的态度十分强硬，1940年11月他在对内阁的演说中以一种精深的分析谈到他们：

“虽然在政治上不能说要复仇，虽然我们应当永远向前看而不能向后看，但是，如果以为仅仅用和解及宽恕的政策就可以解决我们同维希之间的困难问题，那也是错误的。维希政府正处于德国的重大压力之下，能使他们引以为慰的，莫过于使他们感到在他们的另外一边是一个和蔼可亲、对人宽宏的英国。这就可以使他们以我们为牺牲去博得德国人的一点欢心，尽量徘徊观望战争的演变。恰恰相反，在涉及到我们的利益时，我们应当毫不迟疑地以严厉和粗暴的手段对待他们。让他们感觉到，希特勒固然不是善人，我们也不是好惹的。

应该记住，这些人曾犯了卑鄙无耻的罪行，使他们千秋万代受

世人的唾骂，而且，他们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丝毫没有得到法国人民的同意。赖伐尔的确对英国怀有刻骨的仇恨，据说，他曾说过，他要见到我们化为‘齏粉’，也就是说要把我们压成粉碎，最后只剩下一块油迹。毫无疑问，如果他当权的话，他会利用英国出人意料的抗战做一笔交易，帮助德国摧毁我们，从而向他的德国主子讨取更好的价钱。达尔朗因为我们损害了他的舰队而对我们仇深似海。贝当一向是一个反英的失败主义者，现在已经是一个昏庸老朽的人了。以为这些人足资倚靠，那简直是幻想。不过，他们也可能由于法国日渐抬头的舆论和德国咄咄逼人态度而被迫采取有利于我们的政策。的确，我们应当同他们保持接触。但是，为了发展这种有利的趋势，我们要有充分的把握，使维希那班人在德国和英国这上下两层磨石之间受尽折磨。这样，才能使他们在濒临灭亡的这一短暂期间内对我们表示比较驯顺的态度。”

1942年12月10日，英美联军北非登陆一个月以后，丘吉尔在下院的演说中仍然没放过这一部分法国人，他入木三分地剖析了他们的投降心理：

“我现在要详细地谈一谈法国人的一种特殊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其实是国破家亡的大多数法国人所共有的。我决不是在替法国人的这种心理状态作辩护，更不是在赞扬它。但是如果不了解别人心里所想的是什么，或是不想了解使他们所以作出反应的秘密动机，那将是极为愚蠢的。大智大慧的全能的上帝认为，决不能把法国人捏成和英国人一个模样。在法国这个经历过许多巨大变迁——君主制、国民议会制、督政制、执政制，帝国制、君主制、帝国制，最后是共和制——的国家里，已经产生了一种以法治为基础的原则，许多法国军官和官员在革命和变革时期所采取的行动，无疑都是遵循着这项原则的。它是一种极端守法的思想习惯，它是从民族自卫，以免陷于绝对无政府状态的危险这样一种潜在的意识产生出来的。例如，任何军官，只要他是服从他的合法上司或他认为他的合法上司的命令而行事的，他以后就绝不会因此而受到处分。因此，在法国军官们的思想里，问题主要是看是否有一个直接的、不间断的合法的指挥体系，有许多法国人把这看得比道义、国家或国际关系等方面需要考虑的问题还要重要。因此，有许多法国人虽然钦佩戴高乐将军并且羡慕他目前的地位，但依然认为他是对法兰西国家政权进行反叛的人；而这些战败的人们却认为，代表这个国家的就是他们的那位凡尔登的英雄和法兰西唯一的希望，那位英名远扬、年高德重的贝当元帅——一个老朽的失败主义者。”

英美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在战后的回忆录中对此问题的看法，也证实了丘吉尔的精辟分析。艾森豪威尔说：

“法国陆军的军官们为什么不喜欢戴高乐，这原是可以理解的。当法国在1940年投降时，法国陆军的在职军官接受了法国政府

的意见和命令，放下了武器。在他们看来，倘若戴高乐所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那么所有服从法国政府命令的军官就都是贪生怕死之徒了。倘若戴高乐算是一个忠贞的法国人的话，那他们就必然得自认为懦夫。这些军官们自然不愿意自认是懦夫；与此相反，他们自认为是执行一个文官政府所发出命令的忠贞的法国人，因此他们必然要公开和私下里把戴高乐看成是一个逃兵。”

戴高乐对丘吉尔来说，也是一位关系比较微妙的盟友。1943年1月卡萨布兰卡会议，戴高乐列席参加。丘吉尔把他引见给罗斯福，自己十分欣慰，因为他发现两人都出乎意料地相处得很好。罗斯福被戴高乐那聪慧明亮的眼神吸引住了。但丘吉尔还是感到简直无法使两人意见一致。战后丘吉尔评价戴高乐时说道：

“我的确不断和他发生过争吵，有时很激烈，虽然如此，我们还是竭尽全力来提高他的威望，扩大他的权力，增加他的力量。从他的处境来说，当然憎恨我们同维希之间的任何联系，认为我们独一无二地只应忠实于他一人。他也觉得，他要在法国人民的心目中有一个地位，就应当十分注意这一点，即：他虽然是一个寄人篱下、依靠我们保护的流亡者，但必须对‘不忠实的老大英国’保持高傲的态度。他不得不对英国人作出粗鲁的样子，以便向法国人表明他不是英国的傀儡。他确曾坚定不移地贯彻这项方针。他甚至有一天还向我解释了一下这种伎俩，我也充分了解他的极端困难的处境。我始终对他莫大的魄力不胜钦佩。

“我知道，他对英国并无好感。但是，在他身上，我却一直看到贯串在史册中的‘法兰西’一词所常表达出来的精神和信念。他那种傲慢不逊的态度虽然使我感到不快，但是这种态度却是我可以理解，并且感到钦佩的。他是一个逃亡者，一个在本国被判处死刑的而亡命国外的人。他之得有今日，完全仰仗着英国政府——现在还加上美国政府——的好意。德国人征服了他的祖国。他实际上已无处可以立足了。尽管如此，他却毫不在乎，傲视一切。甚至在他表现得最为傲慢的时候，在他身上似乎也体现了法兰西——一个有着高度自豪感、权能和雄心壮志的伟大的民族的性格。有人嘲笑他说，他自命为当代的圣女贞德，因为据说他祖上曾有一位是圣女贞德的忠实的追随者。在我看来，这并不怎么可笑。据说他还自比克雷孟梭，虽说克雷孟梭是一个比他更明智而且更有经验的政治家。但是，这两人却都给人以法国人不可征服的印象。”

丘吉尔在战时和意大利的关系也经历过几个阶段。1940年5月16日，丘吉尔出任首相后第6天，根据内阁的愿望，给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写过一封呼吁信，试图在法国战事惨败之际，使意大利置身于战争之外。丘吉尔在信中说：

“现在我已出任首相兼任国防部长，回顾我们在罗马的会晤，我甚愿越过这似乎在迅速扩大的鸿沟，对你这位意大利民族的领袖

中述我的友好之意。制止在英意两国人民之间造成血流成河的局面，是否为时已晚呢？我们两国之间的不和，无疑将使我们互相残杀，两败俱伤，并使地中海上密布乌云。如果你硬要这么作，其结果必然如此；但是我声明，我从来不是伟大的意大利的敌人，心里从来没有想过要和意大利的立法者作对。目前在欧洲激烈进行的大战，其趋势如何尚难预言，但是我深信，无论大陆上发生什么事情，英国一定要像过去那样坚持到底，即便是单独作战，也要坚持，我有几分把握，相信我们将获得美国、甚至美洲所有各国日益增加的援助。

请你相信，我所以发出这种庄严的呼吁，并不是因为我们力量软弱或心里恐惧，这一点将会载诸史册的。凌驾于若干世纪以来所有其他种种要求之上的，是这样一种呼声：拉丁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共同继承者切莫陷入你死我活的斗争中。请倾听这一点，在可怕的信号发出之前，我以一切荣誉和尊敬恳求你。我们绝不要发出这样的信号。”

墨索尼里的回信既冷淡又坦率，第三天，1940年5月18日，他致信丘吉尔说道：

“我之所以回答你的信，是为了告诉你，你一定知道使我们两国处于敌对阵营的历史的和偶然的重大原因。不必追溯得太远，我愿提醒你，贵国政府1935年在日内瓦率先提出要对意大利进行制裁，当时意大利不过是为了要在非洲的阳光下获得一小块空间，它丝毫未损害贵国或其他国家的利益和领土。我也愿提醒你看看意大利在它自己的领海里受人奴役的真实情况。如果贵国政府对德宣战是为了给你的签字增添荣誉，那么，你就应当明白，无论发生任何事情，我们对意德条约的同样的荣誉感和尊严感也将指导意大利今天的和明天的政策。”

实际上此时墨索尼里已决定参战，他对齐亚诺说，最迟在一个月内向英法宣战！后在希特勒要求下，宣战日延至6月10日。

1940年12月23日，丘吉尔通过广播向意大利人民演说。他向他们提醒英意之间的长期友谊，而现在却处于战争状态。这是为什么呢？丘吉尔说道：

“意大利人，我要把实情告诉你们。这都是因为一个人。一个人，就是那一个人把意大利人民投入了对大英帝国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并且使意大利失去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同情和友谊。我不否认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但是，他毫无约束地执掌大权18年之后，把你们的国家带到了可怕的毁灭的边缘，这却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也就是这一个人，违背意大利国王和皇室的意旨，违背教皇以及梵蒂冈教廷和天主教会的宗旨，违背根本就不想打这次战争的意大利人民的意愿，使古罗马的继承人和后裔与凶恶残暴的异教徒为伍。”



丘吉尔宣读了出任首相时致墨索里尼的信和他于 1940 年 5 月 18 日写给自己的回信，接着，他又说：

“这位领袖，在执掌独裁政权 18 年之后，把信赖他的人代领到什么地方去了呢？现在他人可以选择的出路是多么不妙，要么，准备在海上、空中和非洲遭受整个大英帝国的炮击，遭受希腊民族的猛烈反攻；要么，换一个办法，从勃伦纳山口请阿提拉率领贪婪的军队和秘密警察来占领、镇压和保护意大利人民，而他和他的纳粹党徒对意大利人民是直言不讳地极端蔑视的，种族与种族之间像他们对你们这样蔑视的情形还从未见过。

一个人，而且只有那个人使你们遭遇的结果就是如此。

我将等到意大利民族能再次创造自己的命运那一天——这一天必定到来——再详谈这正在逐步展现的故事。”

1942 年，盟军空袭意大利北部各城市后，这些城市相继爆发罢工和骚乱。全国粮食供应也因铁路停顿而一片混乱。盟军正准备向西西里岛登陆，英美决定向意大利人民发出呼吁时机已水到渠成。丘吉尔认为最佳时机是在西西里岛登陆获得初步胜利以后。

1942 年 7 月 17 日，盟国的飞机在罗马和意大利其他城市上空，散发的英美联合致意大利人民书，像雪片似的飞舞在意大利的空中。

“这是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和英国首相给意大利人民的文告：

在目前这个时刻，美国和英国的联合武装部队，在艾森豪威尔将军和他的副总司令亚历山大将军的指挥下，正把战争深深地推进到你们的国土。这是墨索里尼及其法西斯政权，迫使你们接受的那种可耻的领导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墨索里尼引导你们作为一个残杀各国人民并摧毁人们自由的野蛮国家的仆从，参加了这场战争。墨索里尼把你们投入了他认为希特勒已经稳操胜券的战争。尽管意大利容易遭受来自空中和海上的袭击，你们的法西斯领袖却仍然把你们的子弟、你们的舰只、你们的空军派往遥远的战场，帮助德国去实现它想要征服英国、俄国和全世界的企图。这种与纳粹德国的阴谋勾结，同意大利在自由与文化方面的悠久传统，也就是，同英美两国人民与之有极其深厚的渊源关系的那些传统，是极不相称的。你们的士兵，不是为了意大利的利益，而是为了纳粹德国作战。他们进行了英勇的战斗，但是他们在俄国前线以及在从阿拉曼到邦角的非洲各个战场上，都被德国人出卖和遗弃了。

今天，德国企图征服世界的希望，在各个战场上都已经被粉碎了。意大利的天空是在美国和英国庞大的空中机队的控制下。意大利的海岸受到了英国和盟国集中在地中海的前所未有的最大海军力量的威胁。现在，你们所对抗的力量誓死要摧毁纳粹德国的势力，这种势力曾经被无情地用来使一切拒绝承认德国人是统治种族的人们，遭到了奴役、毁灭和死亡。

为意大利谋取生存的唯一希望，在于对盟国的武装部队的不可抗拒的威力实行体面的投降。如果你们继续容忍为纳粹党的邪恶势力服务的法西斯政权，你们势必要承受你们自己的选择所带来的痛苦后果。我们并不乐于攻入意大利的领土，使意大利人民经受战争毁灭的悲剧；但是，

我们坚决要摧毁那些虚伪的领袖和他们的那种使意大利沦落到如此处境的主义。你们抵抗盟国的联合部队的每一分钟——你们流的每一滴血——只能达到这样一个目的：给法西斯与纳粹领袖更多一点时间，让他们逃脱他们自己的罪行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后果。你们的一切利益，你们的一切传统，都被德国和你们自己的虚伪而又腐化的领袖们背弃了；只有推翻上述两者以后，一个重新建立的意大利，才能在欧洲国家的大家庭中得到受人尊敬的地位。

现在，由你们意大利人民考虑你们自己的自尊，你们自己的利益，以及你们自己要求恢复国家的尊严、安全与和平的愿望的时刻已经来到了。现在这个时刻要求你们决定：意大利人究竟是要为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卖命，还是为意大利和文明求生。

罗斯福  
丘吉尔

丘吉尔和意大利的关系中，最戏剧性的莫过于齐亚诺临死前写给他的亲笔信。齐亚诺是意大利法西斯首脑之一，外交部长，墨索里尼的女婿。1925年起进入外交界，曾在巴西、阿根廷，中国等使馆工作。1935年至1936年，他积极参加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的战争。1943年意军崩溃，他在法西斯最高会议上力主向英美投降。1944年在德国控制的北意大利，被德意法西斯军事当局逮捕处死。

齐亚诺这封绝笔信充满极度的孤独，对丘吉尔的无比敬仰和对岳父墨索里尼的仇恨：

丘吉尔先生： 维罗纳 1943年12月23日

你也许不会感到惊奇：当我死期临近时，竟要向你略道衷曲，因为我对你景仰备至，把你看作是一次十字军的战士，虽然你有一个时期对我说过不公正的话。

在违背祖国和违反人道的罪行中，在与德国人共同作战中，我从来不是墨索里尼的帮凶。事实恰恰相反，如果说我去年8月在罗马失踪，那是因为德国人使我相信我的孩子们已处于危险之中。他们满口答应把我送到西班牙去，但是却违反我的意志将我和我的家属放逐到巴伐利亚。现在，我在维罗纳的狱中已将近3个月了，备受党卫军的野蛮虐待。我的末日已经临近。有人告诉我说，数日之内我的死期即将决定，然而在我看来，这正好使我免受这每天的苦难折磨，我宁愿死也不愿意看到意大利在德国兵的统治下蒙受耻辱和不可补偿的损害。

我现在要赎我的罪：我曾亲眼目睹而且深深痛恨希特勒和德国人为发动这次战争所作的冷酷的和残忍无情的准备。在密室中看到这些万恶的匪帮准备将世界投入一场血战的外国人，只有我一个。按照匪徒的规矩，他们现在计划要镇压一个危险的证人。但是他们估计错了，因为我在很早以前就把我的日记和各种文件存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了，它们比我本人更能证明这些人所犯的罪行，证明后来那既可悲又卑鄙的傀儡墨索里尼为了他的虚荣和无视道德的价值而加入他们那一伙的情形。

我已作了安排，在我死后，这些文件（佩西·洛恩爵士出使罗马时就知道有这些文件的），就尽快由盟国的报纸发表。

也许我今天向你贡献的只是很少一点，但是我只有这一点以及我的生命能贡献于自由和正义的事业，我深深相信这种事业是要得到胜利的。

应当把我的这一证词发表出去，让世人知道，让世人痛快和记住，并且让那些对未来下判断人不致忽略这一事实：意大利之所以遭到不幸，不是他的人民的过失，而是由于一个人的可耻行为。

你的诚实的格·齐亚诺

齐亚诺被关押的地方维罗纳，历史上是罗密欧与朱利叶的故乡。他就在这里被岳父墨索里尼下令处决，丘吉尔把齐亚诺的死看作是意大利悲剧的缩影。

1943年8月29日丘吉尔重访美国和加拿大，他在加拿大的雪湖中钓鱼之后，又出席了加拿大内阁会议。31日他在此对加拿大人民和整个盟国方面发表了广播演说，称颂了美洲大陆国家尤其是加拿大对战争的贡献。

“加拿大在这样重要的时刻对英联邦和英帝国的共同努力所作出的贡献，深深地感动了它的母国以及我们分布很广的、包括许多国家与民族的大家庭的其他一切成员。

从最黑暗的日子以来，一年比一年强大的加拿大陆军，在保卫我们英国本土不受敌人侵犯方面，已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现在它又正在更广阔的和不断扩大的战场上，非常出色地进行战斗。已经获得辉煌成绩的帝国空军训练机构，就设在加拿大。它的宽广的飞机场迎接了来自大不列颠、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最优秀的青年，他们已同加拿大自己的英雄子弟结成了并肩作战的战友。

在这次战争期间，加拿大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航海国家。它建造了数十艘军舰和商船（其中有些是在离海数千英里的地方建成的），而且配备了勇敢耐劳的加拿大海员，然后将这些舰船送去保卫大西洋的商船队，以及我们横跨海洋的重要生命线。加拿大的军火工业，在我们的战时经济中已经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就是加拿大解除了大不列颠军火供应的负担，否则它为这些军火本来会欠下不少子 20 亿美元的债务。

所有这一切，当然不是由于任何法律的规定。它也不是由于任何条约或任何正式的义务。它十分自然地导源于感情和传统，以及准备为人类的未来献身的一种宏伟豁达的决心。我很高兴地代表大不列颠人民，对于伟大的自治领土表示我的敬意，而且是在加拿大的领土上来表示我的敬意。我真诚地希望，压在我身上的其他艰巨的任务使我有机会作更遥远的旅行，以便当面告诉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和南非人，我们对于他们所作的一切，以及他们决心要作的一切，抱有什么样的感受。……”

接着，他回顾了两年来的战况：

“在过去两年中，我们听到了许多关于在法国北部开辟一个所谓第二战场来对抗德国的议论。任何人都能看到，这种规模庞大的作战行动是多么符合我们的愿望。在他们的前线上承受德军主要压力的俄国人，很自然地会不断地催促我们着手执行这一任务，同时他们也毫不掩饰地抱怨，甚至责难我们以前没有采取这种行动。对于他们所说的这些话，我毫不见怪。他们打仗打得非常漂亮。他们已经使德国的军事力量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因此，对于他们坦率地批评我们的战略，或我们在战争中直到如今所能发挥的作用，我们是不介意的，而且，这些批评也不会减少我们对于他们自己在作战中的英勇行为和成就所抱的钦佩心情。我们在法国曾经有过一条很好的战线，但是这条战线被希特勒以集中的兵力击得粉碎了；拆毁一条战线，比重建一条战线要容易些。我预料有朝一日，英美的解放军队将大规模地渡过海峡，同入侵法国的德军进行肉搏战。……就我个人来说，第二战场和第三战场一样，都在我的经常考虑之中。我始终认为，西方民主国家应该像一个拳击家，用双手而不是一只手打人。”

随即丘吉尔谈到北非登陆的辉煌胜利和意大利的局面：

“我相信，在罗斯福总统和以我为主要执行者的英王陛下政府的授权下，以大规模的迂回战术攻入北非的行动，将在后世被认为是在当时的种种情况下所采取的一个上策。这个行动确实已经收到了丰硕的和显著的成果。非洲已被肃清了。所有在非洲的德、意军队都已经消灭了，被我们俘获的战俘至少有 50 万名。在一次持续 38 天的辉煌战役中，由 40 多万轴心国的军队所防守的西西里岛，被我们攻陷了。墨索里尼已被推翻。意大利的战争动力已遭到了摧毁，而这个不幸的国家，由于听任虚伪的和罪恶的向导将它引入歧途而正在自食其恶果。同坏家伙结成伙伴是多么容易，而想要摆脱他们，却又是多么困难啊！大量的德军最近已经从法国抽调出来，以便用来镇压意大利人民，并把意大利变成一个战场，同时使战争在尽可能长的时期内，在距离德国领土尽可能远的地方进行。德国空军的绝大部分，已经从俄国前线调回来，而英、美、加三国的空军正在日以继夜地和他们作战，并且愈来愈猛烈地削弱他们的力量。然而，比所有这些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不论在大西洋或地中海，都已经掌握了战略上的主动权并拥有潜在的力量，对于这些力量，敌人既不能估计它们分量的轻重，也无法预料运用的时间。”

“而苏俄战场也捷报频传：根据俄国战场传来的最近消息判断，斯大林元帅确实没有浪费他的时间。整个英帝国对于他的这次辉煌的夏季战役，以及在奥勒尔、哈尔科夫和塔甘罗格三地所获得的胜利表示敬意。由于这些胜利，俄国收复了大片领土，并且歼灭了数十万的侵略者。”

最后，丘吉尔非常突出地强调了盟军对东南亚战场统帅的任命：

“东南亚战场的最高统帅已经选定了，他的名字已经获得英、美、中三国舆论的赞扬。他将在与蒋介石大元帅经常保持联系的情况下采取行动。不错，路易斯·蒙巴顿勋爵只有43岁。在现代的条件下和在常规的军事专业中，一个人在这样年轻的时候，就获得了这样高的职位，这是不常见的。但是，如果一个立志终生献身于军事艺术的军人，到了43岁仍然不懂得战争，则他在以后的岁月中，似乎也不可能再有多少进益。路易斯勋爵在担任联合作战部队司令官时，已表现出罕见的组织能力和智谋。我大胆地将他称作——且不论迂腐学究们会怎样说——一个“全才的三栖作战军事家”——这就是说，他是一个同样地精通土地、空气和水这三种要素的人物，并且对火，也是很熟悉的。我们大家一致祝愿这个新司令部及其统帅，在他们新的、各种各样的、确实也是极其艰巨的任务中，获得最大的成功。”

丘吉尔乘火车离开魁北克于9月1日抵达白宫，在华盛顿的日子里，他参加了几次美国内阁会议，并同美国领袖人物保持密切联系。罗斯福总统渴望丘吉尔接受哈佛大学的名誉学位，丘吉尔利用这个展示英美联盟形象的好机会，9月6日在哈佛对美国青年演说，号召英语世界的青年人努力捍卫人类自由和尊严：

“对美国青年正如对英国青年一样，我要说，‘你们不能停止不前。’在这个时刻，没有驻足的地方。我们在征途中，现在已经到了不能停步的阶段。我们必须继续前进。前途不是一个混乱的世界，就是一个有秩序的世界。你们通过所有这些作为我们的时代特征的严格考验和斗争，将会发现英联邦和英帝国是你们理想的战友，而你们和他们的联合，除了由于国家的政策和共同的需要以外，还有其他的渊源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它们是血缘关系和历史关系。作为新旧两个世界的后裔，我当然意识到这些关系。

法律、语言和文学——这些都是重要的因素。大西洋两岸的英语民族具有共同观念，这就是：对于是非的共同观念，特别重视公道，尤其是对待弱者与贫者的公道，对于公正无私的司法制度的严肃感，特别是对个人自由的热爱，或者如吉卜林所说的，‘不是由于任何人的许可，而是在法律之下，无拘无束地生活。’我们和你们同样牢牢地坚持着这些观念。

从根本上来说，我们不和具有这些观念的民族作战。暴政是我们的敌人。不论它佩戴什么装饰或采取什么伪装，不论它使用什么言词，而且也不论它是对外或是对内，我们必须永远戒备着，经常动员着，时时警惕着，而且应该常备不懈，以便随时置暴政于死地。我们在所有这些方面携手前进。我们不仅在目前这个时候，在战场上的或空中的敌人的炮火下，并肩前进和共同奋斗，而且要在捍卫那些珍视人类的权利与尊严的思想方面，也作出同样的努力。”

丘吉尔对南斯拉夫的反法西斯游击战也给予了应有的积极关注。1941年4月希特勒占领南斯拉夫后，精力旺盛的南斯拉夫幼王，带着曾

经公然反抗德国进攻的保罗亲王的大臣们以及其他政府成员，来英国避难。在南斯拉夫山区，再度爆发了激烈的游击战，这种游击战也是塞尔维亚人几个世纪来抗击外侮的传统方式。一个名叫米海洛维奇的将军是游击战首领，集合在他周围的是南斯拉夫幸存的社会名流，在德军残酷地枪毙人质的高压手段下，米海洛维奇将军的抵抗逐渐妥协名存实亡。这时，在苏联受过训练的共产主义者铁托站了起来，成了游击队卓越的领袖人物。铁托的力量不畏强暴，迅速扩大队伍，给德军以重大的损害，并且控制了广大的地区。但铁托的武装力量与米海洛维奇的队伍已构成极大的冲突。战后丘吉尔评论道：“这种冲突是悲剧中的悲剧”。

1943年5月底，丘吉尔派曾任牛津大学特别研究员并在战前曾帮助他著述达8年之久的迪金上尉，空投跳伞到南斯拉夫，与铁托联系，考察游击队的性质和矛盾的真相。

迪金的情报源源发回伦敦。米海洛维奇的游击队与占领军有不可救药的妥协关系，在一些地区发生的战争中，打垮占领军的是铁托的有良好组织的游击队。

丘吉尔立即写信给铁托。感谢铁托对他健康的祝贺，并表示将全力支持铁托，决心使英国政府停止给米海洛维奇的任何军事援助而只给铁托援助。丘吉尔随即向国会发表演说，说明了南斯拉夫抵抗力量的真相：

“游击队是按照游击战的原则组织起来的。他们在极其巧妙的指挥下，既能来去无踪，又能致敌于死命。他们忽南忽北，遍处皆有。德军曾对他们进行大规模的扫荡，但游击队即使四面被围，每一次都能在重创并困执敌人后安然遁去。不久，游击队的人数便超过了米海洛维奇将军的部队。投奔铁托元帅的，不仅有克罗地亚族和斯洛文尼亚族，而且还有大批塞尔维亚族人，目前铁托拥有25万人以及从敌人或意大利军队方面夺来的大批武器，这些人现已组成许多个师和军。”

“整个运动已经形成并且组织起来，但它仍保留了游击队的特色；倘若没有这种特色，运动是不可能成功的。以这些英勇的部队作为中心和基础，一个民族的、产生统一作用的运动发展起来了。共产党分子荣幸地成为创始者，但当运动在实力和数量方面增强后，便产生了一种调整和统一的过程，并且增加了民族观念。游击队认为铁托元帅是一个杰出的领袖，而他在争取自由的战斗中获得了显赫的声誉。不幸的是，而且也许不可避免的是，这些新部队同米海洛维奇将军所指挥的部队发生了冲突。米海洛维奇的士兵的活动打乱了他部下的指挥官们同敌人的妥协。他企图镇压他们，于是在同种、同国的人们中间，引起了许多悲惨的斗争和深仇大恨；而他们之所以不幸，则完全是因为有了共同的敌人。”

“过去一个长时期内，我特别注意铁托元帅的运动，并且曾经努力和正在努力采取一切可能措施给他援助。我的一个年轻朋友、牛津大学特别研究员迪金上尉，即现已获有勋功勋章的迪金中校，约在一年以前已经跳伞进入南斯拉夫国境，在铁托元帅的总部工作了8个月。某次，他们两人为同一枚炸弹所炸伤，于是成了朋友。当然，这是人民之间的一种友谊关系，但我相信，这种友谊关系在

我们自己的私人交往中是建立不起来的。迪金中校的报告使我们对整个斗争及其人物，获得一幅生动的图画。”

丘吉尔在二战历史舞台上，与美国、法国、意大利、苏联、南斯拉夫和德国巧妙相处，政治艺术炉火纯青。

辉煌的演说家说：“我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

整个二战期间，丘吉尔除了领导英国军民掘尽潜力，同时竭力争取其他西方盟国的联合外，他还有一件极其有力的武器，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丘吉尔战时演说。在当时，丘吉尔的演说是盟国的民主精神，是古老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气质，是反法西斯秘密武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欧洲人民至今记得丘吉尔那坚毅优雅的男中音总是恰到好处地在二战史上的重要关头回响在英国下院那古旧沧桑的殿堂，回响在敦刻尔克和诺曼底海滩……。

丘吉尔在战前作为保守党的下院后座议员，常常在议会上以其雄辩无碍的演说与政敌周旋，在当时就已奠定了自己演说家的声望，到战时，他的演说艺术由于作为与世界历史进程休戚相关而更显得登峰造极。

他在青年时代步入政坛时，演说术平平。当时他语言上有障碍，他总是发不好字母“C”的音，而且常常在议会辩论演说时突然忘掉下文，只好灰溜溜地回到后排自己的座位上，他亲自撰写并反复背诵演讲稿，这个习惯坚持到他的晚年。

二次大战史和人类演说史像铭刻林肯、罗斯福等其他伟大演说家那样，铭刻着丘吉尔及其首相就职演说以来的一系列辉煌的战时演说。

1940年1月29日，丘吉尔担任首相前夕，他在下院发表演说，清算了纳粹战争机器开动5个月以来的侵略暴行，揭露了纳粹的骗局和谎言，号召欧洲人民振奋起来投入反德战争。拯救人类的自由和尊严。

在进行了5个月的战争之后，有一件事情越来越清楚，这就是德国企图确立一种亘古未有的对世界的统治。

纳粹所要确立的统治并不限于打破权力均势，强制推行一国的霸权，而是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彻底摧毁那些被希特勒征服的国家。纳粹不把这些国家放在眼里，希特勒是在消灭这些国家。他使这些国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整个地不存在了，甚至还想抹掉它们的历史和文化。他希望把它们仅仅看作有生命的空间和一片空旷的领土，他在这片领土上主宰一切。

这些国家的生灵对他来说不过是一群牲口而已。他下令对他们进行屠杀或者予以迁徙，让他们为征服者腾出地方。他甚至懒得向他们勒索战争赔款，干脆将他们的财富一掠而光。为了防止任何反抗，他把他们的领袖统统消灭。并千方百计地使那些被他剥夺了独立的人在肉体上和精神上堕落下去。

在这样的统治下，目前欧洲成千上万的乡村和城镇里有千百万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是他们几个月前做梦也没想到的。奥地利、波希尼亚、斯洛伐克和波兰简直是活地狱。他们全体人民都被剥夺了精神和物质享乐的手段。在背叛不忠和残酷暴力的威胁下，他们除了为他们的刽子手干活以外别无办法，那些刽子手给予他们

的东西少得可怜，只够他们苟延残喘。

目前正在出现一个按照德国本身形象塑造的奴隶主和奴隶的世界。因为当德国在镇压和摧残处在他们暴政下的不同种族和语言的人民的时候，它本身也在它自己的奴役和统治狂热下呻吟。德国的工农是他们纳粹主人的奴隶，而波希尼亚和波兰的工农又依次成为这些奴隶的奴隶。面对这样一个疯狂的梦想第一次即将成为现实，整个世界都会不寒而栗。

纳粹的宣传完全建立在利用人类心灵的弱点上，纳粹宣传并不针对强者和勇者。它告诉富人，他们就要失去金钱。它告诉工人，这是一场富人的战争。它告诉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他所珍视的一切正在被战争摧毁。它告诉热爱美好事物的人，不久他就会失去一切。它对基督教徒说：“你们怎么能够容忍这种大屠杀呢？”它告诉冒险家：“一个像你这样的人可以发点国难财嘛。”

正是讲这种话的人毁灭了或没收了他们所能掠取的一切财富，他们使本国工人沦为奴隶，他们破坏了一切精神自由，他们把可怕的贫困强加在千百万男男女女身上，他们使谋杀合法化。既然他们能够削弱那些想遏制他们主宰世界野心的人抵抗，那么自相矛盾对他们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们不光要赢得战争，我们更多的事要做。我们必将赢得战争，但我们还必须赢得一场比军事胜利更加伟大的胜利。当柏林执政的那些狂人力图建立一个划分为主人和奴隶的世界时，我们还必须拯救自由和人类尊严。

1940年5月15日，丘吉尔临危受命发表首相就职演说。下院全体议员热烈欢迎这位当年的后座议员。丘吉尔坐在政府成员前排座席上，他的两侧是以绥靖政策貽笑天下的前首相张伯伦和在战后首次大选中击败丘吉尔的第一届首相艾德礼。丘吉尔身负天下大任，缓缓道来：

“上星期五晚上，我接受了英王陛下的委托，组织新政府。这次组阁，应包括所有的政党，既有支持上届政府的政党，也有上届政府的反对党，显而易见，这是议会和国家的希望与意愿。我已完成了此项任务中最重要的部分。战时内阁业已成立，由五位阁员组成，其中包括反对党的自由主义者，代表了举国一致的团结。三党领袖已经同意加入战时内阁，或者担任国家高级行政职务。三军指挥机构已加以充实。由于事态发展的极端紧迫感和严重性，仅仅用一天时间完成此项任务，是完全必要的。其他许多重要职位已在昨天任命。我将在今天晚上向英王陛下呈递补充名单，并希望于明日一天完成对政府主要大臣的任命。其他一些大臣的任命，虽然通常需要更多一点的时间，但是，我相信议会再次开会时，我的这项任务将告完成。而且本届政府在各方面都将是完整无缺的。

我认为，向下院建议在今天开会符合公众利益的。议长先生同意这个建议。并根据下院决议所授予他的权力，采取了必要的步骤。今天议程结束时，建议下院体会到5月21日星期二。当然，还要附加规定。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提前复会。下周会议所要考虑的



议题，将尽早通知全体议员。现在，我请求下院，根据以我的名义提出决议案，批准已采取的各项步骤，将它记录在案，并宣布对新政府的信任。

组成一届具有这种规模和复杂性的政府，本身就是一项严肃的任务，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正处在历史上一次最伟大的战争的初期阶段，我们正在挪威和荷兰的许多地方进行战斗，我们必须在地中海地区做好准备，空战仍在继续，众多的战备工作必须在国内完成。在这危急存亡之际，如果我今天没有向下院做长篇演说，我希望能够得到你们的宽恕。我还希望，因为这次政府改组而受到影响的任何朋友和同事，或者以前的同事，会对礼节上的不周之处予以充分谅解，这种礼节上的欠缺，到目前为止是在所难免的。正如我曾对参加现届政府的成员所说的那样，我要向下院说：‘我没有什么可以奉献，有的只是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场极为痛苦的严峻的考验，在我们面前，有许多许多漫长的斗争和苦难的岁月。你们问：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我要说，我们的政策就是用我们全部能力，用上帝所给予我们的全部力量，在海上、陆地和空中进行战争，同一个在人类黑暗悲惨的罪恶史上所未有过的穷凶极恶的暴政进行战争。这就是我们的政策。你们问：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来回答：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赢得胜利；无论多么可怕，也要赢得胜利。无论道路多么遥远和艰难，也要赢得胜利。因为没有胜利，就不能生存。大家必须认识到这一点：没有胜利，就没有英帝国的存在，就没有英帝国所代表的一切，就没有促使人类朝着自己目标奋勇前进这一世代相因的强烈欲望和动力。但是当我挑起这个担子的时候，我是心情愉快、满怀希望的。我深信，人们不会听任我们的事业遭受失败。此时此刻，我觉得我有权利要求大家的支持，我要说：‘来吧，让我们同心协力，一道前进。’”

这种声音回响在四周战火纷飞而孤独危急的英伦三岛上空，因前首相张伯伦的错误政策而忧心忡忡的英国人民为之一振。

20天以后，1940年6月4日，为期9天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完成，30余万英国远征军和部分法军抛掉大量武器和军用物资，在敦刻尔克渡过英吉利海峡，在英国的怀抱中喘息。丘吉尔彻夜不眠精心指挥了这一世界军事史上的撤退杰作，挽救了英国军队。英国一时沉浸在兴奋和庆幸之中，但丘吉尔非常冷静地警告：“我们必须非常慎重，不要把这次援救说成是胜利——战争不是靠撤退打赢的。”

当晚丘吉尔在下院报告敦刻尔克撤退情况时，最后说出了那段激动人心的名言：

“德军突然大举进攻，好像一把锋利的镰刀，紧紧围逼住北部联军的右翼和后方。德军的八九个装甲师，每师约有各种装甲车400辆，这些车辆分组成一个个精心搭配、相互呼应的独立作战单位，插入了我军，切断了我军和法军主力的一切联系。德军切断了我军的粮食弹药供应。德军沿岸直抵布洛理和加莱，逼近敦刻尔克。

在这支装甲机械部队突击之后，是用军车运载的许多个德军师团，再后面紧跟着的就是大批行动缓慢、阴险残酷的德国侵略者。这些人素来是甘心情愿地被人牵着鼻子闯进别人的自由与安适生活的。这种自由与安适生活，他们在自己的国土地上从未享受过。

与此同时，皇家空军早已参战，在航程所及范围内从国内基地出动打击敌人，此外，一部分城市空防战斗机也起飞袭击德国轰炸机群及其用作掩护的大批战斗机。

战斗的时间持续很长，也十分激烈。后来的战场的形势突然明朗起来，仅仅到现在，隆隆的枪炮声才暂时渐渐止息。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靠着完善的工作、机智、技能和耿耿忠心争取得来的奇迹般的解救。

我们的海军动员了各种舰艇近千艘，援救了 33.5 万余名英法军兵士使之脱离虎口，免遭凌辱，安返本国，立即投入新的斗争。

但是我们必须十分慎重，切不可将这次援救说成是胜利。战争不是靠撤退赢得的。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这次援救却孕育着胜利。

归来的许许多多士兵未曾见到我们空军的行动，他们看到的只是逃脱我们空军掩护性攻击的敌人轰炸机。他们低估了我们空军的成就。就此我曾听到许多议论。这就是我现在要离题来谈这件事的理由，我一定要把这件事告诉你们。

这是英国和德国空军实力的一次重大较量。德国空军的目的是要使我们难以从海滩撤退，并且要击沉所有结集在那里数以千计的船只。除此之外，你们能想象出他们还有更大的目的吗？除此之外，从整个战争的目的来说，还有什么更大的军事重要性和军事意义呢？

他们曾全力以赴，但他们终于被击退了。他们在执行任务过程中遭受了挫折。我们把陆军撤回来了。他们付出的代价 4 倍于他们给我们造成的损失。

已经证明，我们各种类型的飞机和我们所有的飞行员比现在我们面对的敌人要强得多。我对于这些年轻飞行员们表示敬意。强大的法国陆军当时在几千辆装甲车的冲击下大部分溃退了。

法国军队被削弱，比利时军队全军覆没，曾经赖以确保安全的防线大部分被破坏，许多宝贵的矿区和工厂已归敌人所有，海峡港口全部落入敌手，后果严重，我们还必须准备承受对我们或对法国接踵而来的第二次打击。

我们听说，希特勒计划入侵英伦三岛。这事我们早就预料到。当拿破仑率领他的平底军舰和大军在布洛涅驻扎了一年之久后，有人告诉他：‘英国到处有荆棘蒺藜。’的确，英国远征军归来后，英国的荆棘蒺藜就更多了。我们目前在英国本土拥有的兵力比我们在这次大战中或上次大战中任何时候的兵力不知要强大多少倍，这当然对用于抵抗入侵的本土防御很有利，但不能这样继续下去。我们不能满足于能打防御战。我们对我们的盟国负有义务。我们必须英勇的总司令戈特勋爵指挥下重建英国远征军。这一切都在进行中。但是在这段期间，我们应该使我们本土防御达到这样一种高水平，即只需要极少数的人便可有效地保障本土安全，同时又可最大

潜力地发起攻势。我们现在正在进行这方面的部署。

如果所有的人都能忠于职守，如果我们的工作不出差错，事事都像现在这样安排周密，那么我充满信心。我们将又一次证明我们能够抵御战争的风暴，抗击强暴的威胁，保卫自己的岛国。如果必要，我们就进行持久战，如果必要，就孤军奋战。

无论如何，这就是我们准备做的。这就是英王政府以及政府中每个人的决心。这就是国会和全国国民的意愿，由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需要联系起来的英帝国和法兰西共和国，将誓死保卫自己的国土，将亲如同胞，尽一切力量彼此支援，即使是欧洲的大片土地和许多文明古国已经或即将沦于盖世太保及一切可憎的纳粹机构之手，我们也不会气馁，也不会屈服，我们要坚持到底，我们要在法国国土上作战，要在各个海洋上作战。我们的空军将越战越强，越战越有信心，我们将不惜一切牺牲捍卫我国本土，我们要在滩头作战，在登陆地作战，在田野、在山上，在街头作战，我们在任何时候决不投降，即使整个英伦岛或大部分土地被占，我们饥寒交迫，我们所有由英国舰队武装和保护的海外帝国也将继续战斗。直到上帝认为适当的时候到了，新大陆将挺身而出，以其全部力量支援旧世界，解放旧世界！”

这篇演说传遍全世界。对纳粹德国来说，它所蕴含的精神力量，无异于 10 个古老而现代化的盟国军团。丘吉尔随后在众议院宣读了那篇曾经内阁批准，战时针对英国政府高级官员的训令：

无论敌人谋划的入侵或者为保卫我们本土的战斗在哪一天来到，首相愿提醒所有在政府中——在军队或民事部门中——身居负责地位的人履行职责，保持戒备的精神和自信的力量。既然在时间和物质容许的范围以内采取了一切戒备措施，我们就毫无理由认为，在我国登陆的德国军队，不论是空投的还是从海上登陆的，其人数会多于我们目前强大的武装力量所能够消灭或俘获的。皇家空军情况良好，拥有前所未有的最大力量。德国海军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虚弱，而不列颠的陆军则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坚强。

首相展望英王陛下的所有身居要职的臣仆要作出沉着、坚决的榜样。他们应当制止并驳斥他们当中的或来自他们下属的种种模糊的和歪曲的言论。如果发现有任何人、任何军官或官员故意散布影响，扰乱人心、使人消沉，或者发表制造恐慌和低落情绪的言论，便应当毫不迟疑地检举，或者在必要时撤消他们的职务。只有那些在空中、在海洋和陆地上曾经和敌人交锋，并在军人的素质上毫不示弱的人才配称得上成为战士。

丘吉尔读完这篇训令，议院全场肃静，但随即却出现了他一生之中只经历过那么一次的场面，周围的人们全体起立一起欢呼，欢呼声经久不息。所有不同背景和派别的议员都以热烈的欢呼声表示敬守这个训令，为战争，为英国。

1940 年 8 月至 9 月是著名的不列颠空战时期。希特勒听信空军元帅

戈林的话，认为对伦敦大规模空袭有决定性意义，纳粹轰炸机群在伦敦上空狂轰滥炸，英国皇家空军起飞拦截激战，双方消耗很大，伦敦依然如故。9月11日，丘吉尔在广播演说中总结这场空战，并预感到了未来局势的严重和伟大。

“每当天气适宜的时候，一批一批的德国轰炸机在战斗机的掩护下，往往一次就三四百架，向我们这个岛，特别是肯特海角蜂拥而来，企图在白天袭击军事目标及其他目标。但是，它们遭到了我们战斗机中队的迎击，几乎来一次就被击溃一次：他们的损失与我方的损失相比，平均飞机是三比一，飞行员是六比一。

德国人为了取得英格兰上空的白天制空权所作的这种努力，当然是决定整个战争的关键。到目前为止，这种努力显然是失败了。他们付出了很高的代价，而我们却感到比以前强大了，而且的确比这次激烈战斗开始的7月强大多了。无可怀疑的是，希特勒先生正在很快地消耗他的战斗舰队，如果他再这样继续几个星期，就会把他这部分重要的空军力量消耗殆尽，完全毁灭。这对我们就大为有利了。

另一方面，对他来说，在没有掌握制空权的情况下企图进犯我国，那将是一种非常冒险的举动。虽然如此，他那大规模入侵的准备工作还是在不断地进行。几百艘装有自动推进器的驳船正沿欧洲海岸南下，从德国和荷兰的港口驶向法国北部的港口，从敦刻尔克到布雷斯特，越过布雷斯特到比斯开湾的法国港口。

除此以外，由每10艘或10多艘商船组成的船队正通过多佛尔海峡进入英吉利海峡，在德军在法国海岸新建的炮台的掩护下，躲躲闪闪地从—个港口开到另一个港口。在德国、荷兰、比利时以及法国的港口，从汉堡一直到布雷斯特，现在也集结了为数可观的船舶。最后，他们还准备了一些船只，打算从挪威的港口运送一支入侵部队。

在这些密集的舰只与驳船后面，大量的德军正在待命登船，准备开始一次非常危险和毫无把握的渡海航行。我们无法知道他们打算在什么时候来，我们不能肯定他们是否真正打算试一试；但是，任何人都不应当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德国人正以他们一贯具有的周密性和条理性进行准备，要向我们这个岛屿发动大规模入侵，而且现在就可能对英格兰、对苏格兰、对爱尔兰，或同时对这三个岛发动进攻。

如果真的试图入侵的话，看来不会拖延很久。天气随时可能变坏。此外，敌人很难让那些集结的船只无限期地在那里等待，因为它们每天夜里都要遭受我方轰炸机的轰炸，而且时常受到我方在港口外面监视的战舰的炮击。

因此，我们必须把下星期或下星期前后看作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它可以和当年西班牙无敌舰队逼近英吉利海，德雷克快要打完一场木球的时候相比，也和纳尔逊在布洛涅为我们抵

挡拿破仑大军的时候不相上下。所有这些，我们在历史上是读过了；但是，当前正在发生的事情，就它的规模和对全人类的生活和未来以及对世界文明的影响来说，都远远不是过去那些勇敢的日子所能比拟的。”

1941年4月12日，丘吉尔以布里斯托尔大学名誉校长身份授予美国大使怀南特先生及澳大利亚总理孟席斯先生和哈佛大学校长科特博士以名誉法学博士学位，他们驱车前往该大学时，刚好该城经历了一夜的剧烈空袭。丘吉尔立即去巡视炸得最惨的地方。有许多老年妇女，她们的家已被炸毁，惊魂未定，看见首相来了，她们擦去眼泪，为国王和英国欢呼。市民的意志是不可战胜的！在授学位仪式上，丘吉尔看着大学旁边一座还在燃烧的巨大建筑物，感动地发表了演说，赞扬普通人民在轰炸之下工作热情和责任心。他说：

“今天到场的人中，有许多位通宵坚守岗位。我们大家都一直处于与敌人猛烈、持久的轰炸的威胁之下，你们在这样环境中聚首一堂，是坚忍与冷静、英勇无畏与超脱俗务的标志，这和我们所知道的、相信的关于古代罗马和现代希腊的一切品质相比，是毫不逊色的。

我常常到全国各地，只要我能够摆脱总部的事务凡小时或者一天，我便到各地去巡视。我见到了敌人的空袭所造成的创伤；但是我也在劫后废墟中见到了沉着、自信、明快而含有笑意的眼光，这眼光表明他们意识到自己已与一个远比任何人类的或个人的问题高超得多、广阔得多的事业联结在一起。我见到了一个在自由中孕育出来，在数百年来遗留给我们的传统中培养起来的精神，这种精神在目前的时刻，在世界历史的这一转折点，一定能使我们负起自己的责任，这样，我们的后世子孙将没有任何理由去指责他们的祖先。”

在整个战争期间，丘吉尔和英王乔治的关系相处极为融洽，甚至可以说，在国王与他的首相间已形成了一种诚挚优雅的私人感情。国王常在一些关键时刻，写给丘吉尔一些措辞诚挚，关怀备至的手谕，丘吉尔非常感动。

1941年初，丘吉尔收到英王慰勉有加的手谕：

我亲爱的首相

我衷心祝你新年快乐，并愿我们在来年见到，这场战争将接近结束。我在此逗留期间，觉得体力日渐恢复；这对我大有裨益；环境的变换和户外运动无异于良好的补剂。但是，当每一个人都坚守

---

在霍华德勋爵统率下迎击。据传说，当时他正在同霍华德勋爵作木球戏，霍华德听到消息后立刻要出发，他阻止道，“我们有充裕的时间，先打完这场球，再去打西班牙人。”

拿破仑在布洛涅集结大军准备进攻英国，由于纳尔逊率舰队扼守英吉利海峡而被阻。后来演变为1805年10月21日的特拉法加战役，法、西联合舰队被英国舰队击败。

岗位的时候，我认为我不应离开我的职责所在的地方。然而，我应当把这次旅行当作医疗，希望归去时身体强健，精神焕发，重新以充沛的精力与敌人战斗。

我衷心希望并确信你在圣诞节能百忙之中抽暇稍事休息，我对你在过去 7 个月中作为我的首相的一切经营筹划备致赞佩，我对我们每周一同进餐时的谈话，甚有兴味。我希望在我归来后我们仍继续每周同进一次午餐，我切盼与你一起谈话。

我希望于下星期一到谢菲尔德巡视。我可以在这一天从这里直接前往。……

再次为你祝福。

你的诚挚的  
国王乔治  
1941 年 1 月 5 日

丘吉尔表示衷心的感谢，他立即回信道：

陛下：

奉到陛下慰勉有加的手谕，极感荣幸。自从我出任海军大臣，尤其是担任首相以来，陛下和王后对于我的恩眷，是我为生存而进行激烈斗争的坎坷历程中获取力量和鼓舞的泉源。作为君王的一个大臣，我在陛下的父亲和祖父治下供职多年，我的父亲和祖父也曾在维多利亚女王治下供职，但是，陛下待我的亲切仁厚，已超过所能想象的程度。

陛下，我们度过的这些日子，不亚于英吉利君主国历史中所曾有过的最艰难、严峻的日子，就是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仍然是一条艰苦漫长的道路。我们每周在那座惨遭轰炸的古老的白金汉宫共进午餐，使我受到莫大的鼓舞，对陛下和王后不惧危险不怕劳累的旺盛精神深有感受。这场战争使君王和人民的关系空前密切，陛下和王后比过去任何一个君王都更受各个阶层和各种社会地位的人的爱戴。在英国历史上的这个重要关头，我荣膺重任，担任首相，得侍立于陛下的左右，内心窃幸，感到自豪；值兹“巴迪亚日”，英勇的澳大利亚军又俘获意军两万——我于此日上书——足证我们的前途美好，对未来充满希望和信心。

陛下的忠实臣仆  
温斯顿·斯·丘吉尔

丘吉尔战前虽然是百分之百的反苏政治家，但在战时的国际关系中，他却积极地主张联苏抗德。1941 年 6 月 22 日，德国军队实施“巴巴罗沙计划”，全面进攻苏联，西方各国政府包括希特勒本人都十分关注丘吉尔这个“反共老手”对苏联所持的立场。当晚 9 时整，丘吉尔发表广播演说，声明英国站在苏联一边，将给予苏联任何经济和技术上的援助。丘吉尔的态度使妄图利用英苏矛盾的希特勒极其失望。丘吉尔说道：

我今夜趁此机会向你们讲话，因为我们已到达战争的转折点之

一。在这些紧张的转折点中，一是一年前法国陷落，匍伏于德国的铁锤之下，而我们不得不独自面对这场风暴。二是在我们仍处于装备不良和缺乏装备的状态时，皇家空军在光天化日之下，将入侵的德国鬼子击溃，因而抵挡了纳粹对我国诸岛的侵略。三是合众国总统及国会通过了租借法，将几乎 20 亿英镑的美国财富专用于帮助我们保卫我们的以及他们的自由。

这就是三大转折点。第四个正在降临。今天凌晨 4 时，希特勒进攻并入侵了俄国。他背信弃义的一切惯常仪式都是以一丝不苟的技巧执行的。

不侵犯条约曾庄严地签署过，并在两国间有效。德国并未对该条约的履行不当提出过申诉。在条约的虚假信任的伪装之下，德国陆军在从白海延伸到黑海的一线上聚集了庞大的兵力，他们的大机群及装甲师徐徐而按部就班地进入了驻地。

然后突然地，未经宣战，甚至没有最后通牒，德国炸弹从天而降，轰炸俄国城市。

德国军队侵犯了俄国边境。一小时后，那位直到前一天夜里还在对俄国人大肆宣扬其友谊或似乎是联盟的种种保证的德国大使，拜访了俄国大使，通知他：德国与俄国进入战争状态。

然后，又在更加巨大的规模上重复了同样的暴行，违反了一切形式的誓约及国际信义。这种暴行是我们早已在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目睹过的，也是希特勒的帮凶及其走狗墨索里尼不折不扣地在希腊效仿过的。

这一切并不令我感多心惊讶。事实上我已多次明白无误地对将要发生的事态警告过斯大林。我警告他也正如我先前警告其他人一样，我只能企望这些警告不至于落空。

目前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就是俄国人民正在保卫他们的国土，他们的领导人号召他们全力以赴进行抵抗。

希特勒是个十恶不赦、嗜血成性、劫掠无厌的魔鬼。由于不满足于全欧洲拜服以至凄惨地屈从于他的脚下，他现在执意要在俄国和亚洲的广大群众之中进行屠杀和制造废墟。我们以及文明世界的其他人如此愚蠢、如此苟安、如此迟钝地允许纳粹匪帮年复一年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的可怕的军事机器——这架机器不可能闲置，否则便会生锈或崩溃——肯定要不断运转，碾碎人类的生命，践踏亿万人民的家园和他们的权利，而且不仅必须以血肉，还要以石油来供养它。

于是这个嗜血的穷途末路的狂人将他的机械化军队发动起来，开到新开辟的领域内进行屠杀、抢劫和蹂躏。他要从他们——可怜的俄国农民、工人和士兵——那里盗取他们的口粮，吞噬他们的收成，并劫掠他们的衣机赖以开动的石油，因而制造史无前例的饥馑。

但是，他那将给俄国人民带来屠杀和废墟的胜利，也仅仅是一个中转站。他企图将中国的 4 亿或 5 亿人民以及居住在印度的 3 亿 5 千万人民，投入那用残暴的 卍 字党徽为自己招摇的、使人类卑贱化的深渊之中。

在这个夏日的夜晚，在这里说，还有 10 亿人类正遭受兽性的纳

粹暴力的威胁，并不过分。

历史，它的罪恶、它的荒诞以及它的悲剧，都一闪而过。我看到俄国士兵伫立于自己乡土的边界，守卫着自古以来父辈所耕耘的土地；我看到他们守卫着母亲和妻子在祈祷的家园——啊，是的，因为有时所有的人都为他们所热爱的人们的安全，为养家活口的人、凯旋者、保护者的归来而祈祷；我看到数以万计的俄国村庄，在那里，人们如此艰难地向土地索取生存的资料，但却依然有着原始的人类的欢乐；在那里，姑娘们欢笑，孩童们嬉戏。

我看到纳粹战争机器以骇人听闻的猛攻态势向这一切进军，随之而来的是它的铿锵的刀剑声，咔咔作响的立正声，花花公子般的普鲁士军官，是它的刚刚以威逼压服了一打之多的国家的诡计多端而又老奸巨滑的代理人。

我还看到呆头呆脑、经过训练而温顺驯服的大批德国鬼子兵，像一大团爬行的蝗虫，沉重缓慢地前进。

我看到天空中的德国轰炸机和战斗机，尽管仍然由于受到英国的痛打而感到苦恼，却兴高采烈地找到了他们自以为是易于战胜的捕食对象。

而在这一切炫耀招摇的背后，在这一切狂风暴雨的背后，我看到那一小撮卑鄙可耻的人，他们计划、组织并发动了这场施加在人类头上的恐怖灾难。

但是，现在我必须宣布皇帝陛下政府的决定，我可以肯定这是一个英帝国自治领地将一致赞同的决定。我们必须刻不容缓地清楚和响亮地讲话。我要发表一次宣言。

我们只有一个目标以及一个单一的不可改变的目的。我们决心消灭希特勒及其匪帮，永远不会同他们谈和妥协，我们将在陆地上、海洋上、天空中与他战斗，上帝帮助，直到我们将把阴云笼罩于大地的一切人消灭为止，直到我们将那些民族从他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为止。

任何为反对纳粹主义而战斗的人或国家都将得到我们的支援。任何与希特勒为伍的人或国家都是我们的敌人。这不仅运用于主权国家，而且适用于那一群卑鄙的傀儡政府头目的代表，这些头目把自己变为反对其同胞和背叛其祖国的纳粹政权的工具和代理人。这些傀儡头目，像纳粹头目一样，不是由他们的同胞干掉——这将省事得多——就是由我们在胜利之日将他们引渡到盟国的特别法庭去接受审判。

这就是我们的政策，这就是我们的宣言。因而，我们将尽一切力量帮助俄国和俄国人民。我们愿向世界各地的一切友人和盟国呼吁采取这同一方针，并像我们一样忠实而坚定地执行到底。

我们已向苏维埃俄国提供了我们力所能及的可能有利于他们的各种技术的或经济的援助。我们将以不断增加的措施日日夜夜地轰炸德国，月复一月地投掷愈来愈巨大的炸弹，使德国人月复一月地品尝并吞咽下比他们浇遍人类的苦水更为辛辣的药汁。

值得提出的是，就在昨天，就在他们侵略的、玷污的、声称其已占领的法国领土上空，皇家空军战斗在法国内陆，以很少的伤亡



击落 28 架德国鬼子飞机。然而这仅仅是开始。从现在起，我们的空军将加速扩展。再过 6 个月，我们从合众国得到的各种军事物资——尤其是重型轰炸机——的威力将开始显示出来。

这不是阶级的战争。这是整个英帝国和英联邦不分种族、信仰或政党都投入的一场战争。我不必谈论美利坚合众国的行动，但这一点我得说：如果希特勒想象他进攻苏维埃俄国便会导致决心消灭他的伟大的民主国家在目标上发生分歧或使他们的努力产生松弛，他将铸成大错。相反，我们为把人类从他的专制下拯救出来的一切努力将得到加强并从而受到鼓舞。我们的决心，我们的对策，将增强而不是减弱。

几分钟前，在我谈到逼迫或诱使希特勒到俄国冒险的那种血腥欲望以及可憎的贪婪时，我说过，在他的暴行的背后，还有一个更为深远的动机。

他希望毁灭俄国的力量，因为他指望如果成功便可以从东方将他的陆军及空军的主力调回而猛烈袭击我们的国土，他知道他必须征服我们，否则就遭受我们对他的罪行的惩罚。

希特勒入侵俄国只不过是企图入侵英国诸岛的前奏，毫无疑问，他指望在冬季到来之前完成这一切，指望在合众国的舰队和空军介入之前压倒英国。

他指望再一次以更大的规模来重复把他的敌人逐个毁灭的过程，然后为他的最后行动——将西半球置于他的意志与体系的统治之下——扫清道路，不然，便前功尽弃。

因此，俄国的危险就是我们的危险，也是合众国的危险，正如同为自己的家园而战斗的俄国人的事业就是地球上每一角落的自由的人民和民族的事业一样。

让我们汲取如此残暴的经历所赋予我们的教训吧。在生命及力量依然存在之时，让我们加倍努力，一致对敌。

就当时的国际军事关系而言，正如一位西方史学家指出的：“希特勒进攻俄国是上帝赐予丘吉尔的礼物，是丘吉尔长期以来所能得到的最好消息。”

传统的老牌反苏主义者丘吉尔从现实原则和国际政治的高度抛弃前嫌，当即在下院发表的这篇愤怒谴责德国、热情声援苏联的著名演说。各国反法西斯力量在如此热情，具有高度世界主义气质的演说中凝成一体，士气俱增。

### 战后：大选失败，“铁幕”演说。

1945 年 2 月，欧洲战场胜利在望。2 月 4 日丘吉尔出席了同英、美、苏三国首脑参加的雅尔塔会议。丘吉尔与罗斯福和斯大林三巨头联手决定并安排战后欧洲的格局和秩序。

4 月下旬，苏联红军元帅朱可夫率军攻克柏林，希特勒自杀；意大利反法西斯游击队在瑞士边境逮捕并枪决了墨索里尼。5 月 9 日零点，德军

投降，英国人民和他们的首相终于赢得了胜利。

5月7日，丘吉尔乘一辆敞篷汽车穿过伦敦欢腾的人们，第二天，他正式向全国宣布战争结束，下院在圣玛洛烈教堂举行的感恩礼拜的钟声响彻蓝天：上帝保佑了英王，上帝保佑了英国、她的首相及其人民。

战争结束，英国人民举国希望休养生息，在民主的基础上改善生活，继续保持同强大的苏联的联盟的友好关系。但此刻丘吉尔作为典型的西方职业政治家认为同纳粹的战争虽然结束，但同时与苏联的战争却已开始：他念念不忘乃至耿耿于怀的是雅尔塔会议将战后欧洲这块大蛋糕分给苏联的那一块太大了。战前他极端的反苏理想因战争结束又重新抬头。以他和他的保守党用极权主义的威胁来暗示英国人民：“当盖世太保刚刚从惊魂未定的德国人民心中消失不久，难道你们赞成用其他名称伪装的盖世太保闯进你们家中吗？”

1945年5月23日，丘吉尔宣布战时联合内阁解散。他热泪盈眶对战时内阁的各位大臣说：“历史的光辉必将照亮你们所有的钢盔。”两月以后英国开展了战后首次大选。丘吉尔作为保守党领袖与工党领袖艾德礼共争首相职位。丘吉尔在英国到处进行竞选旅行。当他的车队所到之处，前面开路的往往是当地保守党的广播宣传车：“注意第三辆汽车，温斯顿来到我们这里。这是地球最伟大的人，世界上最杰出的国务活动家，此人赢得了战争，此人必将完成其事业。”

这种带着贵族和英雄风格的竞选方法与战后人民的情绪格格不入。对全国老百姓而言，战争及其伟人已成过去，他们关心的是战后和平的生活和将来。丘吉尔夫人克莱门蒂娜当时就如此评论过丈夫：“温斯顿经常是带着有色眼镜看世界，他一点不了解普通百姓的生活。他从没有坐过公共汽车，只坐过一次地铁。”

而竞选对手工党领袖艾德礼则是和妻子坐着一辆旧汽车作竞选旅行。他来自工会阶层，有一种英国人民感到很亲切朴素的平民气质，他的战后演说也与丘吉尔气势非凡的演说构成对比：战后的人民更喜欢前者。

结果在下院工党以393席比保守党197席的压倒性多数获胜。丘吉尔在当了5年多战时首相之后提出辞呈，失败下台。丘吉尔永远不能理解也不能原谅英国人民在1945年的战后大选中对他的抛弃。特别令他刻骨铭心的是，全国士兵投票反对保守党，反对他这个战争年代他们公认的军事领袖。丘吉尔晚年在战争回忆录中还引用古代希腊传记家普鲁塔克的话，表达了他对英国人民此举的复杂心态：“对自己的伟大人物不怀感恩之情，是强大民族的一个特点。”

一位西方史学家的分析比较准确精彩：“英国需要丘吉尔去领导反对德国的战争。但是，英国人民对他所有的赞美和感激，仅仅是因为他领导了反德战争，而不是希望他去策动反苏战争。”

也许战时英雄一般都被命运固定在自己“那辉煌的历史瞬间”而难以自遣。还是在战后最初的日子里，丘吉尔就对朋友说过：“没有战争，我感觉很孤独！”许多朋友就劝他去编写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战后世界，丘吉尔也只有回忆录的写作中才能重返战争，并且再次赢得战争。结果他又打赢了，该书是西方历史上自《伯罗奔尼撒战史》和《高卢战记》以来最优秀的军事史著作之一，极为畅销。

丘吉尔退下来后以平民身份到国外旅游，撰写回忆录。在这个期间他在西方政治生活中仍然举足轻重。1946年3月5日，他在美国总统杜鲁门陪同下应邀前往美国密苏里州富尔敦市一所学院发表“铁幕”演说，丘吉尔攻击苏联的演说引起举世一片骚动。

“铁幕”一词后来成了西方政坛生活中最流行的语言之一，整个共产主义阵营的国家被西方称为“铁幕”国家，战后不久北约、华约的“冷战”开始，丘吉尔的“铁幕”演说影响达30年之久。

1951年10月26日，丘吉尔大选成功，第一次担任战后首相职务。1953年6月，27岁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授予79岁的首相丘吉尔嘉德勋章，这是英国的最高勋章，以表彰他在战时对大英帝国的不朽功勋。同年12月10日，瑞典皇家科学院“由于他精通历史和传记的叙述，同时也由于他那捍卫崇高的人的价值的辉煌演说”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世界文学界最高的殊荣。

1955年4月5日，他辞去首相职务。在此之前他对朋友说：“我感觉自己像一架正要结束飞行的飞机。天色已是薄暮，汽油也将耗尽，可我还正在寻找安全降落的地点。”

他离开唐宁街10号首相府时，全体人员唱起：“他是个好伙伴”的英国国歌。丘吉尔口含雪茄，伸出两个手指作出象征胜利的V字状，告别大家，他其实也是在向他胜利的政治生涯告别。

1965年1月24日早晨，丘吉尔因脑溢血与世长辞，终年91岁。

英国王室，各大政党，皇家三军及全国人民为他举行了空前隆重的国葬。

## 富兰克林·罗斯福

“我们唯一值得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

罗斯福是美国第 32 届总统，是美国历史上继开国总统华盛顿和南北战争的胜利总统林肯之后最伟大的政治家。林肯作为一个伟大的演说家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迹，罗斯福在当代，更是以他那被无线电通讯工具广为传播的诚恳演说，把美国人民带出了大萧条的泥潭，并引导世界反法西斯力量打赢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罗斯福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也许是唯一的一位连任 4 届总统的政治家。

“他推翻的先例比任何人都多。他打碎的古老结构比任何人都多他对美国整个面貌的改变比任何人都要迅速而激烈”。美国一位著名记者这样评价罗斯福。

而美国历史学家内森·米勒回忆自己在罗斯福总统 1945 年 4 月与世长辞、告别美国时的感觉更表达了罗斯福时代一般美国人的心声：

“他那种刀枪不入，永生不灭的气派使人难以想象他会死亡，因此，他的死特别令人震惊。对于我这一代美国人来说（我当时还不到 18 岁），罗斯福的去世就像家中一个亲人的亡故。除了他，我们不记得别的总统了。在他之后，没有一个政治家像他那样支配我们的生活。”

这位高个子，宽肩膀，一副贵族气派的美国总统出身于纽约名门，受业于哈佛，是文学士和律师。他自幼喜欢集邮，喜欢大海和船，喜欢高傲的蓝眼睛女人。他驾驶一辆专为他设计的手动汽车时开得很猛。他为所有的亲朋好友都起一个怪里怪气而又十分准确的绰号。小狗“法拉”是罗斯福唯一的宠物，他带它走遍美洲和欧洲，带它参加雅尔塔会议。有一次，罗斯福被反对党指责：总统不惜耗费纳税人的 15000 美元，派遣一艘驱逐舰去阿留申群岛，把他开会后遗忘在那里的“法拉”接回白宫。

罗斯福自幼除英语外还通晓法语和德语，这使他担任总统后的国际政治生涯受益匪浅，他能当场听懂他直到最后一刻才承认的戴高乐将军对美国的抱怨；更能直接从广播中收听到希特勒和他的宣传部长戈培尔隔着大西洋对他的咆哮咒骂。

这位 39 岁那年突然身患脊髓灰白质炎（小儿麻痹症）而终生行动困难的男子，是一个纵横万里，大刀阔斧的男子汉；二战期间他动辄远涉重洋与盟国首脑会晤，解决或规划世界格局。战后多年，这仍成为西方国家首脑相沿成习的会谈方式。

风格强硬坚毅的罗斯福留给历史的遗产除了战后成为世界超级大国的美国，还有他善于向美国行政、立法、司法均衡制格局挑战的总统集权制。对此西方史家的评价纷坛复杂：

“林肯在整个战争期间，行使了比其后除罗斯福而外任何一位总统都更大的权力，其权限比克伦威尔和邱吉尔之间任何一个说英语的统治者范围更广。如果说林肯是柏拉图所梦想的那种理想的专制统治者，那么从美国的宪法和惯例来看，他也不失为一个独裁者。”由此推论，罗斯福显然也是林肯级别的“理想的专制者”。也许人类历史进程有时需要如此的“专制”。

罗斯福首次总统就职演说即号召风雨飘摇的美国人民从经济大萧条的恐惧中振奋起来。他说：“我们唯一值得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罗斯福当即在国会发表了那与丘吉尔战时演说交相辉映的演说，宣布这是“一个遗臭万年的日子！”

1943年美英卡萨布兰卡会议决策宣布希特勒必须“无条件投降”。这个世界军事史上空前强硬的通牒语汇，也是罗斯福的创举。

一位对罗斯福家族史深有研究的美国学者认为：“美国人很少有比罗斯福更受到赞誉和憎恨的了；直到今天，一提到他的名字，有人是充满怀念之情，有的人则是骂不绝口。”最后他说：“没有一个美国总统能那样有效地集政客、政治家、鼓动者和导师的品质于一身，这些品质是成为伟大的人物所需要的。”

### 临危受命：

“我们唯一值得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

罗斯福，1882年1月30日生于纽约一个荷兰移民家庭。父亲经营铁路、航运和煤炭，地产众多；母亲是一位富商的女儿，继承的遗产在当时即高达100万美元。

成年后，罗斯福就读于哈佛大学。毕业后相继担任律师，纽约州议员，海军助理部长。1921年8月他在一次游泳时突然患小儿麻痹症。1928年10月竞选纽约州州长并获胜，这是他瘫痪后第一次担任重要公职。

罗斯福担任纽约州州长后就产生了进一步问鼎白宫的雄心，他深知，传统上纽约州州长最容易成为美国总统。1932年，罗斯福被民主党推为总统候选人，迎战在任总统，共和党候选人胡佛。

此时胡佛统治下的美国正处于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境地：1700多万美国人失业，上万家银行倒闭，在纽约市的血汗工厂里，女孩子们为每天挣20美分而拼命工作。当时是中西部一个失业青年，后来成为美国第40届总统的罗纳德·里根回忆说：“找到一种工作，任何一种工作，似乎是最大的成功。”

胡佛曾经是一位杰出的工程师、救灾专家、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他也是“美国生活方式”一词的创造者，但他此时已成为美国历史上最遭受老百姓憎恶嘲讽的总统：无家可归者在城市边缘搭起的破烂板屋被称为“胡佛村”；没有汽油由骡子拉的汽车叫“胡佛车”；流浪汉身上盖的报纸叫“胡佛毯”；空无一物的衣袋飘起来叫“胡佛旗”。全国流行上百个挖苦胡佛的刻薄笑话。最有名的是：一次胡佛总统主持一个纪念仪式，礼炮鸣21响。一个老头抱怨“天哪，怎么一炮都没有打中他！”

前总统柯立芝临死前几天说：“现在我环视四周，我看不到任何有希望的东西，看不到任何有希望的人！”胡佛本人也承认：“我们是山穷水尽无法可想了！”

罗斯福被本党提名后，按传统作法，被提名的总统候选人要等几周，听候党的委员会给他送来得到提名的正式通知书；但罗斯福等不及了，他决心大刀阔斧，砍掉这些“愚蠢传统的蜘蛛网”。他采取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戏剧性行动，马上出击，而不是静候家中。他从奥尔巴尼飞往芝加哥到党代表大会会场去发表他的提名演说。一到芝加哥，他就直接登

上大会讲台，像往常一样，双手支着放讲稿的小台架站着，注视着人头攒动，狂热欢呼的群众，同时也遥望着全国正簇拥在收音机旁大约万的听众：

“诸位经受了6天折腾仍愿意留下，我对此深表感谢。我深知，诸位和我都曾夜不能寐。我来迟了，我很懊悔，但我无法呼风唤雨，我只能庆幸自己曾在海军中受过训练。

一个竞争总统提名的人在党的全国大会上露面，并被正式告知他已获得提名，这一举动不但史无前例，而且异乎寻常。但目前正是史无前例和异乎寻常的时刻。因此，我以打破陋习来投身我所面临的任務。这个陋习就是，候选人应当假装对事态进展一无所知，直到过了很多个星期，接到正式通知为止。

朋友们，但愿此举表达了我的一个心愿：我要以诚待人，决不虚情假意，决不愚蠢地对这次竞选运动的真相闭目塞听。我知道诸位已提名我为总统候选人，我来到这里，就是为了感谢大家给了我这份殊荣。

但愿这也象征着打破了传统。但愿从今以后，打破传统能成为本党的任务。我们要打破愚蠢的传统，而让共和党领导人打破自己的诺言，他们在这方面有着高超的技艺。

让我们在此时此地下定决心，要恢复我国的中断的征程，使我国重新沿着真正的进步、公正、平等之路，沿着对所有公民无论其伟大或渺小都一律平等之路前进。在那次中断的征程上，一位不屈不挠的领袖已离开人世，但今天他的精神仍然活着。感谢上帝！他的许多助手仍然同我们在一起，仍然在给我们提出明智的建议。让我们相信，无论我们做什么，伍德罗·威尔逊总司令（美国民主党人，第28任总统，曾领导美国参加一次世界大战）的伟大的，不屈不挠的，一往无前的，不断革新的精神仍然同我们在一起。

在这次竞选活动中，我有很多问题要尽早澄清自己的立场。对于那份倍受赞赏的文献，即大家已通过的，观点鲜明的政纲，我百分之百予以赞同。

我可以向大家保证，在这次竞选中，我对任何重大问题都将毫不含糊地阐明自己的立场。

在投入新的战斗之际，让我们大家永远牢记党的理想：无论从传统来说，还是从历史发展的逻辑来说，民主党在过去和现在都既是自由主义和进步的旗手，同时又是维护我国制度安全的保证。如果我党失去了这种号召力，朋友们请记住，由于共和党领导人失败而引起的怨恨就会变成丧失理智的激进主义。

我们终于睁大了眼睛。美国人民终于准备承认共和党领导人错了，而民主党是对的。

我的纲领——我只能谈及上述要点——建立在一个简单的道德原则之上。这就是：国家的福利和健全首先应以人民大众的意愿和需要为转移，要看人民大众的意愿和需要是否得到了满足。

美国人民最需要什麼？我认为他们最需要两件东西：一是工作和随之而来的所有的道德和精神价值；二是合情合理的安全感——

使自己和妻子儿女获得安全感。这两件东西比任何言词更重要，比任何事实更重要。它们是精神价值的体现，它们应该是我国重新建设的方向。实现这些价值是我的纲领和目标；我们在现职领导人的领导下未能实现这些价值。

共和党领导人告诫我们：经济规律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不可逆转的；经济规律引起了无法预防的恐慌。不过，当他们滔滔不绝地侈谈经济规律时，人民却在忍饥挨饿。我们必须坚持一个事实：经济规律不是天生的，而是人类造就出来的。

的确，当——不是假如——我们得到机会，联邦政府就会勇敢地掌握领导权，开始救济工作。几年来，华盛顿一会儿把头埋入沙堆，说什么缺衣少食的贫民并不多，一会儿又说如果存在贫民，各州政府就应该关心。他们早在两年半以前就应该做现在想做的事，但他们一拖再拖，日复一日，周复一周，月复一月，直到有良心的美国人要求采取行动为止。

我认为，地方政府虽应一如既往地救济负起主要责任，但对于广大人民的福利，联邦政府过去一直负有，现在仍然负有责任。

现在，我想简单谈谈未来4个月的计划。我来到这里，而不是等候正式通知，这一举动已清楚表明，我们将废除开支昂贵的仪式。朋友们，我们将立即开动、今晚就开动所有必要的机器，向全国各地的选举团充分阐述各种问题。

作为一个伟大的州长，我本人还有重要的职责，在目前时刻，这些职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光荣和艰巨。然而我相信，我将能够对我国若干地方作几次短访，首要目的是与各党派、各行业的人们开展对话，直接研究全国各地的实际状况和需要。

我再说一句：人类每经历一次危机、忧伤和灾难，都会共同获得更丰富的知识，更高尚的礼仪，更纯洁的目的。我们必将能度过一个思想涣散、道德败落的时期，必将能度过一个在人际和国际关系方面自私自利的时代。我们不要只责备政府；我们同样也要责备自己。让我们坦率承认，许多人对金钱顶礼膜拜，而投机获利、好逸恶劳的思想已使我们误入歧途。为了重新确立高尚的标准，我们必须抛弃错误的预言家，寻找符合自己愿望的新领袖。

在我国现代史上，两大政党的根本区别从未像今天这样突出。共和党领导人不仅在物质方面失败了，而且在提出目标方面也失败了，因为他们在灾难时期不能展示希望，不能为人民指出一条可以返回安全场所的道路。

在过去年代被政府遗忘的、全国各地的男男女女正看着这里，看着我们，期待着我们能提供指导，提供更公平的机会来共享国家的财富。

在农场，在大都会，在小城市，在村庄，千百万公民满怀希望，希望传统的生活标准和思想准则并没有一去不复返。他们的希望不能，也决不会落空。

我向你们保证，也向自己保证，我要为美国人民实施新政。让所有聚集在这儿的人都献出自己的能力和勇气，做新秩序的倡导者。这不仅是一场政治运动；这是战斗的号令。帮助我吧！不仅为

了赢得选票，而且为了赢得这场使美国回到人民手中的改革运动。”

欢呼声在芝加哥体育场响彻云霄。罗斯福随即开始了他的竞选旅行。他发表了 16 次长篇演说和 67 次较短的演说。他乘坐列车走遍全国，沿途看到的经济危机后的萧条景象使他大为震惊：到处都是失业的人群，到处都是等待救济的灾民。他说：“我观察过千千万万个美国人的脸孔。他们露出了迷路儿童似的惊惶之色。”这更加激起了他对现政府的不满。他有四句话概括了他对胡佛政府的批评：

第一，它通过错误的经济政策鼓励了投机活动和过剩生产；

第二，它企图尽量缩小大崩溃的含义，使人民认识不到其严重性；

第三，它把大崩溃的根源错误地归罪于世界上其他国家。

最后，它拒绝承认和改正自己给国内带来的不幸，它迟迟不进行救济；它忘记了进行改革。

罗斯福发誓要对现政府领导的“四骑士”——破坏、延误、欺骗、失望进行一场战斗。

两个月后，9月23日，罗斯福在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刻来到东部重镇旧金山，发表了被誉为这次竞选中“最伟大的一次演说”——《一个更伟大的社会契约》。他在这篇演说中，从历史角度和哲学高度阐述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宣判了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终结和胡佛式个人主义哲学的破产。

罗斯福之所以选择旧金山联邦俱乐部来发表这次演说，是因为这个俱乐部的成员都是金融家和产业家，他们最不喜欢罗斯福那一套自由主义观点，而罗斯福则认为，这里是发表演说的最佳场所，他就要在他们的大本营里对他们说：你们过时了！

于是纽约州州长罗斯福在联邦俱乐部发表了这次重要的竞选演说，他从美国的历史和政治传统谈起，以此激发美国人民的信心：

“朋友们！有时候，特别是在这样的年月里，我们会感到气馁。似乎事情都是老一套，一成不变，无所作为；整个世界已经衰败疲惫，秩序荡然。这就是消沉的情绪，令人感到压抑和厌倦的消沉情绪。

但是，我们再在美国环顾自己，一切事物会证明我们是不该有那样一种情绪的。美国还是崭新的。它还处于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之中。它还具有青年的伟大潜力，而伟大的西部、西海岸和加利福尼亚州尤其是这样。

诸位不要误解，我决不是把这一带看作是什么新开发的地区。我到过世界上许多地方，但我从来没有像在这里那样感觉到引人沉思的变化和发展；在这里，似乎古老、神秘的东方就在近旁；在这里，我们可以迎接全世界一切生活、思想和贸易的新潮。仅仅这一个因素，就可以使得立足于这个地区的人警觉到事物的更深一层的意义。”

在回顾了杰斐逊 1776 年夏天草拟《独立宣言》的历程后，罗斯福谈到两党的分裂：



“ 堵位都熟悉随之而发生的伟大政争；汉密尔顿和他的同党企图建立操纵一切的中央权力机构，最后怎样在 1800 年的大选中为杰斐逊先生的政党所击败。在政争中产生了两党，就是我们今天都知道的共和党和民主党。

“ 从此，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开始了新的时代，个人和体制对立的时代，个人主义成为美国生活中的伟大口号的时代。最有利的经济条件使这一时代长久而昌盛。在西部边疆，土地实质上是无代价的。只要不是逃避谋生的职责，谁也不会毫无谋生之路。萧条可能发生，也确实发生过；然而萧条改变不了一个根本性的事实：大多数人民的生活，一部分依靠出卖劳动，一部分依靠土地供养，因而饥饿和无家可归是实际上不可能的。在最坏的情况下，总还有可能爬上一架带篷马车，向西部迁徙，在东部无法立足的人总可以在西部未开垦的大草原上找到安栖之地。我们的自然资源丰富，不但可以救济本国人民，还可以和全世界苦难的人共享；我们可以邀请欧洲的移民，伸开双手给予欢迎。根据传统，发生一次萧条，就在西部开发一片新的土地；甚至暂时的不幸也服务于我们的光明前途。

“ 在 19 世纪中叶，一股新的力量解放出来，一片新的梦境也展现出来。那股力量就是人们所谓的工业革命，蒸汽机和机械的发明，现代工业工厂前身的出现。梦境，就是梦想有一套经济结构，足以提高大家的生活水平；使最卑微的人对豪侈也不是可望而不可及；先是用蒸汽动力，随后用电力，消灭了距离，把一切人从最沉重的体力劳动的苦难中解放出来。可以预期，这一切必然要影响到政府。在此之前，人们对政府只要求它创造条件，使人民可以幸福地生活，和平地劳动，安定地休息。现在，人们要求政府帮助实现这新的梦境。然而，梦境上空也有阴霾。实现它需要具有惊人意志和惊人抱负的人的才智，否则，财力物力的使用 and 新的建设发展是得不到完善的解决的。 ”

接下来他分析了当时具体的经济形势和中央政府的弊病，然后强调人民的权力：

“ 我不需要作更多的说明。我说的很简单，很不完全，但诸位都可以联系自己的企业或行业加以阐述，而不会有什么困难。我以为，凡是实际卷入经济斗争的人——也就是说，凡不是生来就拥有安全的财富的人——都能从切身经验和个人生活中体会到，我们现在必须把以前有关美国政府的概念用之于今天的情势。

“ 《独立宣言》是以一种契约语汇来论述政府问题的。如果我们依照它所产生的思路去考察，政府不得不是一种妥协的关系，一种契约。根据这种契约，统治者被授予权力，而人民从自己被授予某些权利的考虑也同意那种权力。政治家的任务从来就是根据社会秩序的变化和发展去重新规范这些权利。新的条件向政府和管理政府的人提出新的要求。

“ 比如，我身为纽约州的州长，在旨在撤销纽约州警察厅长职务的公诉程序中，曾经坚持认为，在现代的条件下，公职人员仅只避免违法犯罪是不够的。他还有一项积极的责任，我讲的实质含义是，如果他取得大量金钱，如经控告，就有必要讲清楚这笔财富的来源。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笔财富就带有为公众所关心的性质。我当时说过，在财务上，大众公仆比普通公民更要求具有刚正不阿的正派作风。 ”

罗斯福接着谈到《独立宣言》从社会契约的观点出发讨论政府问题，这个契约现在仍然适用。他还推出了最能说明他的工作方法的名言 “ 一个政治家最伟大的责任就在于教育 ” ：

“ 这一崇高契约的最后一条是关于自由和追求幸福。在过去一个世纪里，我们在这两方面都已学到了很多。我们知道，除非利己而又不损人，个人自由和幸福便毫无意义。我们知道，阅读、思考、言论、选择生活方式等古老的 ‘ 使个人具备法定资格的权利 ’ ，无论如何都必须受到尊重。我们还知道，为所欲为，剥夺他人的这些基本权利，不受任何契约的保护。政府在这方面就要起到平衡作用，使人人都有一席之地，只要他愿意占有；人人都可以得到安全，只要他愿意得到；人人都可以获得力所能及的权利，只要他承担随之而来的义务。

这是一个长期的不能一蹴而就的任务。一提出什么目标，就要求立即拿出能保证产生良好结果的、了不起的计划，这种人的简单无知是再明显不过的了。人类的事业并不如此简单。政府管理艺术包括制定政策，运用政治技巧尽可能实施此项政策，并同时获得普遍拥护；要不断地规劝、引导、有所牺牲，始终诲人不倦，因为政治家最伟大的责任就在于教育。不过，就我刚才所谈及的事情而言，我们正在一所严格的学校里学习，而且学得很快。这样学到的教诲不应忘记，即使投机市场好转以致精神麻木时也不应忘记。我们要争取到达不可能再发生萧条的年代；如果这意味着牺牲掉从通货膨胀性繁荣中得来的少量利润，那就牺牲它吧；谢天谢地！。

最后，罗斯福再次强调他心中对美国的信心：

对美国的信心，对我们的个人负责传统的信心，对我们制度的信心，都要求我们认识这古老社会契约的新目的。我们将要达到这些新的目的，正像我们对于杰斐逊 1776 年为我们设想的，杰斐逊、西奥多·罗斯福和威尔逊努力争取实现的那个明显的乌托邦尽到了我们的责任一样。我们必须做到这一点，不然的话，我们大家都会被共同失败所引起的悲惨浪潮吞没。但是，失败并不是美国的习惯；让我们在伟大的希望的激励下肩负起我们共同的重担吧。 ”

大选的结果显而易见，罗斯福以 8 1 的比率获胜。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时临危受命，入主白宫。成为美国第 32 届总统。

罗斯福的总统就职典礼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广播电台广泛传播的总统就职典礼，极度痛苦的美国人民倾听着这位向他们许诺：“为美国人民实行新政”的新总统就职演说。这篇演说本身也成为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文献。

冒着 1933 年 3 月 4 日华盛顿特区的濛濛细雨，罗斯福以他那充满活力的哈佛式高贵语调向全国人民谈了起来：

“值此我就职之际，同胞们肯定期望我以我国当前形势所要求的坦率和果断来发表演说。现在确实尤其有必要坦白果敢地谈一谈真情实况，全部的真情实况。我们没有必要去躲闪，不去老老实实地面对我国今天的情况。我们的国家过去经得起考验，今后还会经得起考验，复兴起来，繁荣下去。因此，首先，允许我申明我的坚定信念：我们唯一值得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会使我们由后退转而前进所需的努力陷于瘫痪的那种无名的、没有道理的、毫无根据的害怕。在我们国家生活中每一个黑暗的时刻，直言不讳，坚强有力的领导都曾经得到人民的谅解和支持，从而保证了胜利。我坚信，在当前的危机时期，你们也会再一次对领导表示支持。

我和你们都要以这样一种精神来面对共同的困难。感谢上帝，这些困难都只是物质方面的。价值贬缩已达难以想像的程度；赋税增加了，我们纳税的能力则已降低；各级政府都遇到严重的收入减少；交换手段难逃贸易长期停滞，看工业企业尽成枯枝残叶；农场主的产品找不到市场；千万个家庭的多年积蓄毁于一旦。

更重要的是，大批的失业公民面临严峻的生存问题，而艰苦劳动却所得甚微的也不在少数。只有愚蠢的乐天派才能否认眼前的黯淡现实。

但是，我们的困难并不是由于实质上的失败。我们没有遭到什么蝗虫之害。我们的祖先笃信上帝，无所畏惧，因而所向披靡，比起他们的艰险，我们还该说是万幸。大自然的施惠不减，而人的努力更是使其倍增。我们手头并不匮乏，然而丰足却激发不起来慷慨的用途。这首先是因为掌握人类物品交换的统治者们的顽固和无能，他们承认失败而自动退位。贪得无餍的钱商们在舆论的法庭上被宣告有罪，是为人类思想感情上所厌弃的。

他们也的确作了努力，但是他们的努力脱不开过时传统的窠臼。面对着信用的失败，他们的建议却仅是借贷更多的钱。他们失去了利润的吸引力，无法再使人民遵从他们的虚伪领导，于是他们就不惜进行敲诈，痛哭流涕地要求恢复对他们的信任。他们没在预见，而缺乏预见就要使人民遭殃。

钱商们从我们文化庙堂的高位逃走了。我们现在可以使那庙堂恢复传统的信念。能够恢复到什么程度，则看我们对于比金钱利润更高贵的价值观念予以运用的情况。

幸福并不建筑在仅仅拥有金钱上；它建筑在有所成就引起的欢乐，创造性工作所激发出的快感。一定不要在疯狂地追求瞬息即逝的利润中再去忘记劳动给我们带来的欢乐和精神上的鼓舞。我们在这些黯淡的日子里所付的代价将是完全值得的，如果我们从中汲取

教训，认识到我们不应该听天由命，应该让命运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同胞服务。

认识到把物质财富当作成功的标准是错误的，也就不会再相信担任公职和很高的政治地位之所以可贵仅仅在于官高禄厚；同时也必须终止金融业和商业中的一种作法，它常常使得神圣的委托浑似无情和自私的恶行。难怪信心在减退，因为只有诚实、荣誉感、神圣的责任心、忠贞的维护和无私的作为才能鼓舞信心；没有这一切，信心也就不能存在。

然而复兴并不仅仅要求改变道德观念。祖国要求行动起来，现在就行动起来。

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给人民工作。我们只要明智而勇敢地承担起来，这项任务并不是不能解决的。部分地可以由政府直接招雇，像战时紧急状况那样，同时通过雇用这些人员来完成急需的工程，从而促进和改组我们自然资源的利用。

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工业中心已经人口过剩，因此应尽力把土地提供给最善于耕种的人，一方面使土地得到更好的利用，一方面在全国范围重新分配人口，为了促成此项工作，要采取具体措施提高农产品价值，从而提高对我们城市产品的购买力。要从实际出发制止对小房产和农场取消偿还抵押所造成的悲剧和日益严重的损失。要坚持由联邦和各州以及各地方政府立即采取行动支持大量削减抵押的要求。要把救济工作统一掌管起来以避免目前的分散、浪费和不均的现象。要把一切形式的交通运输和其他明确属于公用事业的设施置于国家计划和监督之下。总之，可以促成此项工作的方法是很多的，唯有空谈无用。我们必须行动起来，迅速行动起来。

最后，在恢复阶段中，我们需要避免旧秩序弊端重新出现的两项保证：必须严格监督一切银行储蓄、信贷和投资，以制止利用他人存款进行投机的活动；必须提供充分而有偿付能力的货币。

这就是我们的行动路线。我即将向新的国会的特别会议提出实施这些路线的具体措施，我还将要求各州立即提供支援。

通过此项行动纲领，我们将致力于整顿财政，平衡收支。我们的国际贸易关系虽然十分重要，但在时间性和必要性上必须从属于健全全民经济的任务。我主张采取切合实际的政策，分清轻重缓急。我一定竭尽全力通过国际经济调整来恢复同世界各地的贸易，但是国内的紧急状况是等待不得贸易上的成就的。

国家复兴的这些具体方法，其基本指导思想并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我们首先考虑的是：坚持合众国国内的各种因素和合众国各个部分之间的互相依靠——承认美国拓荒精神的传统的和永远重要的体现。这是复兴的道路。这是直接的道路。这是复兴得以持久的最有力的保证。

在对外政策方面，我认为我国应该奉行睦邻政策——决心尊重自己，从而也尊重邻国的权利——珍视自己的义务，也珍视与所有邻国和全世界各国协议中所规定的神圣义务。

如果我对我国人民的情绪体会得正确，尽管我们过去在不能互

相依靠时并不理解，我们现在则已经理解到：我们不能只要有所得，也要有所贡献；我们要前进，我们就必须像一支有训练而忠诚的军队那样，为了共同的纪律而乐意有所牺牲，因为没有这样的纪律就不可能前进，就不可能实现有效的领导。我相信我们愿意并且准备为这样的纪律献出我们的生命和财产，因为，只有实现这样的纪律，才能实现为了更高利益而奋斗的领导。我愿意提供这样的领导，保证使这些更高的目标将作为一种神圣义务对我们大家都有所约束，从而产生只有战时才出现过的共同责任感。

作了这项保证之后，我将无所顾忌地领导起我国人民组成的大军，纪律井然地逐一解决我们的共同问题。

我们有从先辈那里继承下来的政府形式，纪律井然地解决共同问题的行动是完全可能的。我们的宪法是简明扼要的，总是可以根据特殊的需要而在重点和安排上有所改变，而无需动摇其基本形式。正是因为如此，我们的宪政才不愧为现代世界所产生的最稳定持久的政治结构。它经受了领土的极度扩张、辛酸的内战、对外战争和国际关系的考验。

但愿正常的行政和立法分权完全足以应付我们所面对的史无前例的重任。然而，史无前例的要求和迅即行动的需要也可能使我们有必要暂时背离正常分权的公开程序。

我准备根据宪法赋予我们的职责提出灾难深重的我国在当前灾难深重的世界中所需要采取的措施。这些措施，以及国会根据其本身经验和明智所决定的措施，我都将竭尽宪法所赋予我的权力迅即予以采纳。

然而，万一国会竟不能接受两类中之任一方式，万一全国紧急状况仍然严重，我也将决不回避职责明确向我提出的抉择。我会要求国会准许我使用应付危机的唯一剩余的手段——向非常状况开战的广泛行政权力，就像在实际遭受外部敌人入侵时所应授予我的大权。

对于给予我的信任，我愿意拿出时代所要求于我的勇气和坚贞。我决不会有负众望。

我们瞻望前途的艰苦时日，深感国家统一所给予我们的温暖和勇气，明确必须遵循传统的宝贵道德观念，坚信不分老幼尽其责必须取得圆满成功。我们务使国民生计获得全面和长久的保证。

我们对基本民主的未来并未失去信念，合众国的人民并未气馁。在困难中，他们作为选民提出的要求是直接而有力的行动。他们要求的是有领导的纪律的方向。他们已经选择我来作为实现他们愿望的工具。我也是以这样的精神来担当的。

值此全国奉献之际，我们恳请上帝赐福。祝愿上帝保佑我们全体和每一个人。祝愿上帝指引我前进。”

这位新总统作出了实行大胆领导的保证，他的决心和乐观态度，特别是他作出的要以战争时期的方式战胜大萧条的决心，在美国人民之中引起了最热烈的反响，这个阴冷的周末下午也变得热呼呼的，美国人民在前总统使他们最绝望之时，又在新总统身上看到了希望。

## 美国“国王”“为美国人民实行新政”

罗斯福上任之初所面对的是胡佛留下的一个烂摊子，其中最危急的是美国已濒于崩溃的金融体系。惊恐万状的储户包围着各家银行，徒劳地试图在银行关闭或破产前提取自己一生的储蓄。但银行仍然一家一家倒闭，银行家一个一个跳楼。21个州宣布银行部分或全部休假，其余银行也摇摇欲坠。联邦储备局报告，在胡佛当政的最后一周内，由于外国人都把存款换成黄金带走，黄金外流已接近25000万美元，黄金储备已低于支持通货所需的数量。财政部已发不出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从法律上讲，美国已经破产。在罗斯福就任前一天，美国所有的州长都宣布银行休假，以防止老百姓把存款提光。美国的金融心脏停止了跳动，罗斯福本人衣袋里的现金只有8美元。

罗斯福的对策是宣布实行《银行紧急状态法》，整顿全国金融秩序，恢复美国人民的信心。《银行紧急状态法》的中心内容是禁止输出黄金。违者最高可罚款1万美元和判10年徒刑。总统拥有犹如战时那样的管制信贷、通货、黄金、白银和外汇交易的紧急权力。再就是用银行的全部黄金储备作保证金发行货币，恢复人们对银行的信心。国会半小时即通过了《银行紧急状态法》，这也是罗斯福在白宫签署的第一个法令。

罗斯福随即发表了第一次“炉边谈话”。6000万美国人坐在收音机旁聆听总统给他们吩家常。“炉边谈话”是罗斯福的一大创举，是一种非正式的广播讲话，他用和邻居乡里唠家常的语态向美国人民解释一些很正式的政治难题和举措。每次他都用了拉长了的亲切称呼“我的朋友们”开始。“炉边谈话”深入人心，很受欢迎，即使在酷热的夏季，这种广播讲话也被称为“炉边谈话”。快听，总统又在发表“炉边谈话”了，这已成为美国公民的一大爱好。

“我的朋友们，我想花几分钟时间和美国人民谈谈银行业问题，既同懂得银行专门业务的相对少数人谈，尤其是要同把银行用来存款和提款的压倒多数人谈谈。我要告诉你们过去几天里干了些什么，为什么这么干，下几步怎么走。我认识到，从各州首府以及从华盛顿发布的许多通告、有关的立法、财政部的规定等等，在大多数情况下使用了银行和法律术语，这应该对普通公民解释清楚。我有责任这样做，特别是因为大家在接受银行休假所产生的不便和困难上所表现的耐心和冷静。我知道，当你们了解到我们在华盛顿的人在干些什么时，我就会像过去一个星期里，完全得到你们的同情和帮助那样，继续取得你们的合作。

首先，让我先说一件简单的事实，你们把钱存在银行里，银行并不是把这笔钱放在保险库里。银行是把你们的钱作为许多不同形式的信贷予以投资——债券、商业证券、抵押，以及许多其他种类的借贷。换句话说，银行把你们的钱用来使工农业的轮子保持运转。你们存在银行里的相对较小的那一部分钱，是以通货的形式留在银行里的——在正常情况下，这笔钱是完全足够普通公民对现款的需要。换句话说，全国通货的总量只不过是全体银行总存款的一小

部分。

那么，在 2 月末和 3 月初那几天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由于人民大众失去了信心，我们人口中有很一部分参加了挤兑，要求把银行存款变成通货或者黄金——挤兑的规模很大，以致最有支付能力的银行也得不到足够的通货来应付需求。理由是，把完全可靠的银行资产即时出售而变成现金，如果不肯接受远远低于实际价值的恐慌价格，当然是不可能的。

到了 3 月 3 日下午，全国几乎没有一家银行开门营业。几乎全国各州的州长都发布通告暂时全部或局部地关闭了银行。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发布通告，规定全国性银行休假，而这就是政府重整财经结构的第一步。

第二步是国会出于爱国心迅速通过的立法，对我的通告加以认可，并且扩大了我的权力，于是才有可能根据时间的需要去延长银行休假和逐步解除休假的禁令。这项法律还授权制订一项计划来整顿我们的银行设施。我要告诉全国各地的公民：我们的国会——不论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都一样——通过这一行动，表现出对于公众福利的忠诚，以及对历史上少有的紧急情况 and 必须迅速采取行动的认识。

第三阶段是那一系列的规定，准许银行继续运转，以解决粮食和其他家庭必需品的销售和工资的支付。

这次银行休假，虽然在许多情况下造成了极大的不便，却使我们有机会提供应付形势所必须的通货。有偿付能力的银行，同星期一关门时比较，都没有损失一个美元。那些可能证明马上开不了门的银行也是一样。这项新法律准许 12 家联邦储备银行根据有效的资产增发货币，于是重开业的银行将能够满足一切正当的要求。这种新的通货正由造币局大批运赴全国各地。这种通货是有支付能力的，因为它有实际有效的资产作为后盾。

你们会问：为什么所有的银行不都同时重新开业呢？回答很简单。你们的政府不打算让过去几年的历史重演。我们不要，也不会再有，另一次银行倒闭的风潮。

这样，从明天——星期一开始，我们将使 12 个有联邦储备银行的城市的银行开业——这些银行，经过财政部初步清查，发现是健全的。接着在星期二，我们将让没有被认可的票据交换所的城市里，证明有支付能力的银行恢复全部业务。这类城市在合众国大约有 250 个。

星期三和其后的几天，全国较小的地方的银行也将恢复营业，当然这要看政府实际有无可能完成其调查。重开银行有这么一个过程是必要的，以便使银行来得及申请必要的贷款、取得满足他们要求所需的通货，并使政府得以进行实事求是的检查。

请让我讲清楚，如果你们的银行第一天不开业，人们绝对没有理由相信它就不会开业了。在以后任何一天开业的银行，同明天开业的银行，是具有完全相同的地位的。

我知道，许多人在担心不是联邦储备系统成员的州立银行。这些银行能够而且将会得到成员银行和复兴投资公司的帮助。这些州

立银行将要按照和全国性银行一样的手续，只是由各州的当局发给恢复营业的执照，而财政部长已经要求各州的当局准许有信用的银行按照全国性银行的时间表恢复营业。我确信各州银行管理局在执行重开银行的方针上会同联邦政府一样的谨慎，并将遵循同样的宽大政策。

确实有这样的可能：在银行恢复营业时，有少数心存余悸的人可能又开始提取存款。我可以明确他说，银行将会满足一切需求——而且我相信，过去这一个星期里纷纷转向私自蓄存的作法，已经变成极其不时髦的玩意儿。不是预言家也能够预言：当人民发现他们能够取到钱——在为了合理的目的需要钱的时候就可以取得到——恐惧的魔影就会消失。人们又会愿意把钱放在可以得到安全保管、又能在任何时候都很方便地提用的地方。我可以向大家保证，把钱存在重新开业的银行里要比放在褥子底下更安全。

我们这个伟大的全国性计划能不能完全得到成功，当然要靠大众的合作——要靠大众对这项可靠的制度给予明智的支持和妥善的利用。

要记住，这项新立法的主要成就在于，它使银行能够比过去要便于把它们的资产转化成现金。对于银行以这些资产为保证向储备银行借款的规定放宽了，以这些可靠的资产作为担保来发行货币的规定也放宽了。这种货币不是无法兑换的货币。只有有充分的担保才能发行这种货币，而一切有信用的银行都有大量的充分担保。

在结束讲话之前，我再提一点。有一些银行不经过整顿当然就不能恢复营业。新的法律准许政府去帮助迅速而有效地实现这种整顿，甚至准许政府提供至少一部分可能需要的新的资本。

我希望大家从关于你们的政府在做些什么这个基本说明里，可以看到这种作法并没有什么复杂或者极端的東西。

我们面对一个银行信用不良的情势。我们有一些银行家在掌管人民的钱财上表现出无能或者不诚实。他们把委托给他的钱用来进行投机和胡乱借贷。这一点当然并不适用于我们银行界的绝大多数，但确有不少是这样干的，因此一时使人民产生不安全感，并使人民在头脑中分辨不清，似乎以为相对少数银行的行为已经玷污了全体银行。政府的任务就是要清理这种状况，而且清理得越快越好。而政府也正是这样做的。

我并不能向大家保证所有的银行都将恢复营业，也不能保证谁都不会遭受损失，但是，凡是可能避免的损失都会得到避免；而如果我们继续放任自流，本来是会发生更多更大的损失的。我甚至还可以向大家保证去挽救至少一部分陷入极端困境的银行。我们不仅将致力于使有信用的银行重新开业，而且将致力于通过整顿而促使别的银行取得信用。

从全国各地听到有信心的口气，使我感到非常高兴。对于人民给予的忠诚支持，我是感激不尽的；他们虽然对于我们的全部作法可能并不清楚，但仍然支持我们对于行动方向的判断。

归根结底，在我们调整金融体制上，有一个因素要比货币更重要，比黄金更重要，这就是人民的信心。执行我们的计划，其成功



的要素就是信心和勇气。你们大家一定要有信念；你们一定不要听信谣言和妄加猜测而惊慌失措。我们要团结起来消除恐惧。我们已经准备好重建金融体制的手段；现在要靠你们大家给予支持，促其实现。

这个问题，既是我的，也是你们大家的。同心协力，我们就一定成功。

罗斯福再次打动了美国。他的话音刚落，美国人民纷纷从罗斯福的“炉边”拥向罗斯福的银行，将家中的现金重新存入银行，仅在纽约，第一天的存款数就超过取款数的1000万美元。全国18000家银行中约75%重新开业。罗斯福的助理国务卿，曾帮助他起草就职演说稿的莫利兴奋地宣称：“总统在8天之内拯救了资本主义！”

罗斯福趁美国人那被大萧条折磨得阴沉忧郁的面孔刚刚开始一丝笑意之际，趁热打铁全面推出他那巨型魔术般的“百日新政”。罗斯福在控制了金融危机的基础上，从1933年3月9日到6月16日推行的“百日新政”首先体现为一系列新法案的诞生。还是在竞选总统期间组成的智囊团的专家们成了新政设计师：这是一批在工农业经济、关税、铁路、政府债务和私人贷款问题方面造诣颇深的大学教授，年轻而富有想像力，大多来自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

新政时期罗斯福的设计师们在华盛顿的工作室可能是美国最忙乱的房间。专家们熬更守夜，彻夜不眠地起草各种法案、条例和备忘录，他们的所有设计都体现“新政”的三大宗旨：复兴，救济和改革，

百日之间向国会提交了15篇咨文，15项重要法案在国会通行无阻，全获通过。其中有关金融的立法占1/3。《农业调整法》和《全国工业复兴法》是罗斯福整个“新政”的左右两翼。“新政”立法过程从通过《农业调整法》开始进入高潮，直到《全国工业复兴法》通过并实施时达到最辉煌的顶点。

《农业调整法》旨在解决从一次大战后，经柯立芝和胡佛两届总统都没能解决的农产品过剩，农业价格偏低的问题。胡佛曾用3亿6000万美元收购小麦和棉花，但仍然稳定不了农产品价格。罗斯福通过大规模减耕和毁耕，同时由国库负责向农场主赔偿的方法，实现了目标。但在减耕毁耕运动中大量毁灭粮食和杀掉小猪和母猪的做法，引起了最广泛的批评。

以一只展翅“蓝鹰”和“蓝鹰”脚下一句：“我们一定尽本分”口号为标志的《全国工业复兴法》，是政府干预经济的最重要的一项法律。罗斯福自己评价道：“这项法律是为了使美国人重新找到工作。《全国工业复兴法》大概将作为美国国会制定的最重要的，影响最深远的法律载入史册。”

罗斯福虽然遭到国内不少政敌及其报业托拉斯的抨击，但他在白宫同大多数前来采访的记者却十分融洽。在美国参加二次大战以前，这些记者每周两次来白宫围坐在他的办公桌前，罗斯福就坐在靠椅上，叼着烟嘴，机智风趣地回答记者的各种问题。在他就任总统的12年中，共会见新闻界998次。罗斯福在竞选总统的演说中就曾说过：“一个政治家最伟大的职责就在于教育。”他对人民的教育包括三大部分：答记者问，

与美国人民的“炉边谈话”，较为正式的演说。

1933年8月，他在白宫举行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罗斯福就打破陈规，宣布要改变过去订下的只能书面提问的老套。但是，未经他特别许可，不能直接引用他的话。

总统：很高兴见到各位。希望这里的记者招待会会成为过去4年我在纽约州首府奥尔巴尼当州长时举行的那种快乐的家庭会议。只是规模大一些而已。有人对我说，我所要做的将是不可能做到的，然而我还是要试试看。我们不再搞什么书面提问了；当然，我不可能一次回答75个或100个问题，因为我确实没有时间，但是，我完全可以像最近在奥尔巴尼和过去在这里海军部那样，同各位女士和先生们非正式地谈一谈。我高兴地看到，各位中间有相当不少是我过去在华盛顿供职时就认识的。所以，我想我们可以停止必须在会前提交书面问题才能得到回答的作法。当然会有许多问题是不准备回答的，或者因为它们属于“如果”一类的问题——这是我从来不回答的——斯蒂芬森老弟可以对各位说明一下什么叫“如果”问题

斯蒂芬森先生（记者）：我一天问40个这类问题。

总统：另一类是由于不同的原因我不想谈，或者还不适宜谈，或者我毫无了解。还会有许多问题是我了解不够无法回答的。至于新闻发布，史蒂夫（总统秘书助理）和我都觉得由这里得到的纯粹新闻最好都不直接引用原话。换句话说，我不希望引用我的原话，除非是由史蒂夫用书面提供我的原话。这一点完全明确吧？

我们还想谈两件事：第一是“背景情况”，指的是你们各位自己作主、自己负责加以使用，而不提来自白宫的材料，因为我不愿意不得已再去恢复“谎言俱乐部”。（笑声）

第二件事是“不供发表”的情况，指的是只供出席招待会的人参考的机密情况。现在我要声明一点，希望大家都能同意。我请各位既不要把“不供发表”的机密情况转告各位的总编辑，也不要转告没有出席的同事；因为，总有这样的危险，各位自己不违背规则，有人却可能忘记提到：“这是不供发表的和机密的”。于是别人就可能写进文章。也就是说，这种情况既不能发表，也不能转告给恰好没有来参加招待会的人。换句话说，只供出席的人参考。

至于新闻，我想今天一点也没有。（笑声）

罗斯福在对付新闻界方面与前总统胡佛也形成了对比。当经济危机越来越严重时，胡佛惧怕批评，因而对新闻界封锁消息，记者们感到非常头疼，一点都不喜欢他。罗斯福却容易接近，有问必答，对记者的问题和心态非常了解，他带着一种幽默和轻松来与新闻界相处，很快赢得了新闻界的尊敬和钦佩。他很快和经常采访白宫的记者们以教名相称，喜欢跟他们混在一起聊天，有时打打嘴仗。

经过罗斯福的劝导和宣传，采访白宫的新闻记者团中大部分记者都成了“新政”的同情者和支持者。在记者招待会上，罗斯福时而兴高采烈，时而慷慨激昂，忽而表示惊恐，忽而引得哄堂大笑，他是招待会的

主宰者。他那极大的魅力和说服力，甚至俘虏了反对党的记者。

记者团在对总统身体的瘫痪问题上，与白宫保持着一种很优雅默契：从来没有记者提到他的瘫痪，所以很少有美国人意识到总统是坐在轮椅上统治美国的。当罗斯福被人抬着上下台阶时，从来没人为此拍照而出总统的洋相。罗斯福有时也非常刻薄。有时他不想回答记者的问题，就一口断言：“这是一个未经确定的问题。”或说：“请不要盘问我！”对一些提问超出他容忍范围的人，他会说：“戴上你的笨蛋纸帽，靠边站！”

1933年7月24日，罗斯福发表第三次“炉边谈话”，宣传他的复兴计划的单纯目的和坚实基础，也是回顾“新政”100天以来的进程。

他在演说的开端谈到由于金融危机的被克服，良好的联邦金融信用坚如磐石，它是整个复兴计划的基础，接着他剖析了阻碍美国更持久繁荣的两大障碍：一是农产品价格过低，二是失业造成的慢性瘫痪，这两大因素使全国购买力减去了一半。对此他强调了“新政”的“农协法”对前者的改革作用。而针对失业问题，他则形象地用军人的语调说道：

我们在这次对失业展开的伟大的夏季攻势中，将只使用舆论和良知这两项手段。然而，我们将把它们使用到极限的程度，借以保护乐意合作的人，反对拖沓者，并使计划获得成功。

在战争中，在夜战的朦胧中，战士们都在肩头上带着明亮的标志，以避免同志们自相射击。根据同一原则，在这项计划中合作的人，也必须随时都能互相识别。因此，我们也已为此目的提供了一种荣誉标志，设计很简单，上面写明‘我们不拆伙’。我要求所有同我站在一起的人，都突出地显示这一标志。这对实现我们的宗旨是至关重要的。

所有大的、基本的工业部门，都已自愿地提出了拟议的法规，并且在法规中都接受会导致大规模重新就业的一些原则。

然而，这一令人高兴的表现固然重要，而产生最丰硕成果的领域还在于小雇主们，他们的贡献将是为一至十人提供新的就业机会。这些小雇主们实际是国家骨干中极重要的部分，而我们计划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

电报和函件已经在像雪片似地飞进白宫——传来了雇主们要求把自己的名字列上光荣榜的信息。他们代表着大公司和社团，合伙的和单干的。我现在要求还没有表态的我国雇主们——大家伙和小家伙——都马上往白宫给我个人写信或打电报表明支持这项计划的意图，不必等待我们散发的协议中规定的截止日期。而我也打算在每个城镇的邮局张贴光荣榜，随时把同我站在一起的人榜上提名。

我要借此机会对现在旧金山开会的24位州长说明：迄今为止，有助于加强这一伟大运动的莫过于他们在会议一开始就通过一些决议，这些决议对这个计划表示即时和一致的赞许，还保证在他们各自的州里予以支持。

对由于实际失业或担心失业而惶惶不可终日的男女同胞们，我可以说句定心的话，因为已经批准，或者即将通过的法规和协议证明，这项计划确实可以提高工资，确实可以使人们重新就业。大家

可以把接受这项计划的一切雇主都看作尽了一份力量的人，他们对于一切为生活而劳动的人是有功的。你们都会清楚，正好像我很清楚一样，那些逃避责任的雇主虽然可能通过贱买贱卖而战胜竞争者，但他们是靠牺牲国家利益来谋利的。

我们在从事这项伟大的共同事业时，不应该出现不协调和争执。这不是无端互相指责的时候，也不应该对于这种普遍接受的协议有所怀疑。现在要的是耐心、谅解和合作。在这项法律的规定下，我国的工人有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任何人都不许予以削减，但是，另一方面，为了获取这些权利，工人们也不需要采取进攻的行动。全国都会团结起来为你们争取这些权利。适用于雇主的原则也适用于工人，我现在要求你们也以同样的精神予以合作。

安德鲁·杰克逊——“老核桃”——去世的时候，有人问道：“他上得了天堂么？”回答是，“他要是愿意，就上得了。”如果有人问我美国人民渡得过这次萧条么？我的回答就是：“他们要是愿意，就渡得过。”

1933年10月22日，罗斯福自述第4次“炉边谈话”，向美国人民表明“我们在前进，我们前进的方向是正确的。”此时罗斯福“新政”措施之一的遍及全国的民众资源保护队已经为30万青年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并将在接下来的整个冬季里继续为他们提供就业，但情况仍然是严峻的，按早春时的统计，三月份有1300万人失业：

“从前次同我国人民交谈全国性问题以来，已经3个月了。这段期间又发生了许多事情，我可以高兴他说，这些事大部分都非常有助于增进我国普通公民的福利。

在我国政府所采取的第一项步骤中，我们考虑的都是你们普通的人——用句老话说，就是：‘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因此，作为明白事理的人，我们不能期望对每一个人、每一个行业或企业、或工业、或农业都带来具体的利益。同样，明白事理的人也不能期望，在如此短暂的时间之内（新的机构不但要能运转，而且首先得先建立起来），我国48个州的每一个地方都能在好转的趋向中同时平均地受益。

然而，从全局看——从东海岸到西海岸之间，整个的领土平均来看——整个12000万人口平均来看——凡是愿意观察的人，都可以看到你们和我值得自豪的事实和行动。”

“朋友们，这并不是说我是满意的，或者说你们是满意的，我们的工作已经完成。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然而我们是在前进中。

我们是怎样地在建设这座复兴的大厦，健全经济生活的宅第？（建成后的这座庙堂将不再是钱商和乞丐的庙堂，而是为了美国能够有更大的社会正义、更大的幸福而奠基，而维护的庙堂。）我们正在一块一块石头地垒砌着将要支撑这座宅第的圆柱。圆柱的数目很多，而且一根圆柱的进展可能一时干扰旁边一根栋梁的进展，但整个建设工程则必须毫不放松、不受阻挠地坚持下去。”

罗斯福接着谈了对失业，失去农场和家宅人的救济，以及农产品价格提高等问题。最使他自豪的是：“新政”的国家复兴局已经废除了童工制，它取消了血汗工厂，已经制止了在某些工厂中每周付给 60 美分工资和在某些旷山中每周付给 80 美分工资的做法。最后，罗斯福表示美国的方向已扶正，他将尽力而为：

“我今天晚上同大家谈了为了达到我们共同复兴所做的稳妥而得当的工作。我在 3 月 4 日以前和 3 月 4 日以来，向大家许下的诺言中，曾经明确过两点：第一，我并不保证出现奇迹；第二，我会尽力而为。

感谢大家的耐心和信任。我们的困难不会在明天结束，但是我们在前进，我们的前进方向是正确的。”

1934 年 6 月 8 日，罗斯福对国会演说，回顾他的政府自他就任总统以来的目标以及成就。此时新政已施行一年多，美国正在复苏，罗斯福进一步把自己的目标定为三大点：确保美国人民的家宅安全，生活保障和社会保险。在演说的开头，罗斯福不无自豪地强调“各位正在充满活力的光辉见证。完成于 1933 年 3 月（即他就任总统）开始的一项工作，它在长期内将被看作是代议制政府，然后他向国会议员致意，感谢他们与总统在新政计划的立法项目上的有效合作。接着他针对当时流行的“应先复兴后建设”的说法谈起：

“先复兴后建设的说法是幼稚的。在复兴过程的本身性质中，我们就必须避免过去那些破坏性的影响。我们已经向全世界证明：民主制度本身就具有自我解救的必要因素。

新近才尝试民主方式的国家，不那么有信心，可能会倒退到过去的专制政体。对于政府为了消除过去的弊病和争取较多的人的更大幸福所采取的措施，可以信赖美国人民是能够作出明智的判断的。

我们的建设任务并不需要创造新的陌生的价值观念。毋宁说它倒是恢复曾为大家所知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忘却了的理想和价值观念。如果说，在某些方面，方法和细节是新的，其它标准则是和人类性格一样地固定不变。

在我们的目标当中，我把我国男女老少的安全保障放在第一位。

对于个人以及家庭的安全保障，从基本上说，涉及三个因素。人们都要求有过得去的家宅；都要求家宅所在地点适宜于从事生产性劳动；他们还要求某种保证，去应付在我们人世间尚不能完全避免的不幸事件。

在朴素和原始的文化中，谁都可以搭盖自己的家宅。在一块新的土地上，靠着大自然的恩赐，人们可以得到简陋但还充分的吃住条件。当这块土地没有收获时，我们的祖先就移居到更好的地方。当时总有可能把边疆向前推进，然而现在边疆已经消失。我们当前

的任务就是要在我们已经拥有的土地上改善生活。

在早先的日子里，安全保障也是通过家庭成员之间的互相依靠和小居民点内各个家庭之间的互相依靠而取得的。大规模社会和有组织行业的复杂情况，使得这种简单的安全保障方法不再适用。因此，我们被迫通过政府来运用整个民族的积极关心来增进每个个人的安全保障。”

最后，罗斯福既把三大任务当作他向美国人民作出的最低承诺，也把它看成是人类一直为之奋斗的崇高而古老的权利。在这里，一个既有现实手段，又有非凡政治哲学理想的政治家完全展现在国会和美国人民面前。在罗斯福以后的所有努力中，在他所有的演说中，甚至包括二战爆发后他对战争的抨击，对和平的呼吁，都贯穿着这三大承诺：

“这三大任务——家宅安全、生活保障、社会保险——在我看来，乃是我们能够向美国人民提出的最低限度的承诺。这三件事构成了一切愿意劳动的个人和家庭的一种权利。它们也是已经采取的救济、复兴和建设措施的基本的归宿。

寻求更大程度的福利和愉快，并不表明价值观念的改变。相反，这乃是恢复我们在经济发展和扩张中所丧失了的的价值观念。

对于私人主动性的发挥，仍然留有充分的余地。实际上，在复兴的过程中，我深切希望，打算解除政府相当一部分负担的私人投资和私人主动性，这些一再作出的承诺将会实现。我们并没有对企业妄加不必要的限制。我们并不反对合理合法的私人利润的刺激。相反，我们寻求的是使企业的某些方面重新得到大众的信任。我们寻求的是在金融业和工业里提出公平竞赛的规则。

是的，我们中间有少数的人还是会走回头路的。这些少数人对于既得的利益提不出任何取代的方法，也对于今后增进人类幸福提不出任何希望。他们大喊大叫说个人自由受到了政府的约束，然而问他们究竟丧失了什么个人自由时，他们又回答不出来。

我们必须重新献身子恢复那些人类为之不断奋斗的古老而神圣的所有权——家宅、生计和个人保障。通向这些价值观念的道路，就是进步的道路。不在这条道路上继续前进，各位不会满意，我也是不会满意的。”

1934年6月28日，罗斯福又一次坐到“炉边”，开始了他在这一年的第一次“炉边谈话”。全美国各阶层的人民，都听见总统像一个亲切的邻居或老朋友那样问自己：“你比去年生活得好一些了吗？”此时“新政”从救济到复兴的步子走得十分稳妥，国家公职制度的完善，吸收了全国有能力有胆略的男女人才。但罗斯福面临的阻力还相当大。反对派舆论甚嚣尘上，有的把“新政”骂为“法西斯主义”，有的说它是“共产主义”，有的把新政说成是“强制一体”的“社会主义”。针对这些把实际上很简单、很现实的事情说得很复杂化很理论化的逆潮，罗斯福干脆单刀直入对每个普通美国人发问：

“然而，对你们每一个人来讲，判断复兴的最简单的方法在于你们自己个人情况中的明显现实。你比去年生活的好一些吗？你的负债减轻了吗？你的银行存款更安全了吗？你的工作条件改善了吗？你对自己个人的未来的信念是不是有更坚实的基础了？”

还有，让我再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你作为一个个人是不是对这些收获付出了过高的代价？花言巧语的利己主义者和理论上的顽固派会告诉你们丧失了个人自由。还是用你们自己生活的现实去回答这个问题吧！你们是不是丧失了任何权利，或者自由，或者宪法规定的行动和选择的自由？回过头再读一读宪法的权利法案吧！我曾宣誓加以信守，而你们的自由也是靠它保障的。把权利法案的每一条款都读一读，问一问你自己是不是个人在这伟大的保证上遭受了一丝一毫的损害？你的回答是什么，在我的思想上是毫无疑问的。成绩单是用你们本人生活的经验写出来的。”

接着，罗斯福进一步把他在 20 天前对国会演说时提出的三大目标概括为保证美国人民的安全感这一终极目标：

“除了我们眼前的任务外，我们还必须看到更广阔的未来。我已经向国会指出，我们正在寻求恢复众所周知、早经确立、但在某种程度上被遗忘了的理想和价值观念的道路，我们要保证我国男女老少的安全感。”

紧接着罗斯福话锋一转，顺手拈来白宫整修扩建这个建筑艺术上的事例，形象化他说明“新政”的新措施新政策，其实是和古老的美国理想一脉相承的，两者之间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和冲突：

“我是相信符合现实的说法和符合现实的政策。我认为，我们今天所做的就是美国人一直在做的事情和必然归宿——古老的和经过考验的美国理想的归宿。”

他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今年夏天我离开华盛顿时，白宫办公大楼早已需要的整修和扩建将会开始。建筑师们已经计划在目前实在过于狭小的单层建筑上再增建几间新屋。在这次扩建和这次整修中，我们打算包括进去现代化的电线线路、现代化的水暖设备以及在炎热的华盛顿夏季里保持办公室凉爽的现代化手段。但是，旧有的行政大楼多数的结构形状仍然不变。白宫建筑的艺术轮廓是我们共和国早期的建筑大师们的创作。原来的朴素而坚固的结构保持下来，经受住一切现代化的考验。然而，在这庄严的外形内边，现代政府工作的需要则要求不断的改建和装修。

如果我要听信当前某些灾难预言家的说法，我就会在这些改建上迟疑不决。我就会担心，在我离开的几个星期里，建筑师们可能建造某种奇特的新的哥德式塔楼，或是一座工厂厂房，或是模仿克

里姆林宫或者波茨坦宫的某种建筑。然而，我并不担心这些。建筑师们和建筑工人是有常识的人，是有美国艺术鉴赏力的人。他们懂得，和谐的原则以及必要性本身都要求新的建筑结构需得同原有的基本线条溶于一体。正是这种新旧结合才标志着有秩序的、和平的前进，不仅建设房屋是这样，建设政府本身也是这样。

我们的新的结构是旧结构的组成部分和最终归宿。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使美国人民的历史传统得到实现。其他国家可能牺牲民主来追求古老并被抛弃的独裁制度的一时的刺激作用。而我們是在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情况下恢复信心和幸福。像约翰·马歇尔在一个世纪以前说过的那样，‘我们仍然是在绝对和真正意义上的人民的政府。’我们的政府‘在形式上和实质上……都是发源于人民的。它的权力是人民授予的，并且应该直接对人民和为人民的利益而行使。’”

最后，罗斯福愉快地谈到总统的工作旅行，这其实将是一次对“新政”景观的巡游和视察。罗斯福以轻松潇洒的语调谈到旅行途中美国大地上各种美丽的地名，让一个酷爱旅行的民族分享了他的乐观情怀：

“在结束之前，我要对大家谈一谈我希望在几天之内开始的旅行，以及我在展望这次旅行中所感到的兴趣和愉快心情。

凡有可能，大家至少一年一度地换换环境，这是件好事。我不想陷入那样的境地，由于树木丛密而看不见森林。

我希望去访问波多黎各、维尔京群岛、运河区和夏威夷等地的美国同胞。顺道我将有机会同我们的姊妹共和国海地、哥伦比亚和巴拿马的总统们互相友好致意。

在船上度过4个星期之后，我计划在我国西北部太平洋岸边的一港口登岸，之后，开始整个旅行的最理想的部分，因为我希望视察哥伦比亚、密苏里和密西西比三条河流上若干个新的全国性大工程，看看几个国家公园，顺道还要在横跨大陆返回华盛顿途中了解许多实际情况。

大战中我在法国时，我们一些战士曾经把合众国称作‘上帝的国土’。让我们使它成为并保持为‘上帝的国土’吧！”

虽然一年前1933年5月27日最高法院以“权力过度集中，个人的独裁作风”为由判定《全国工业复兴法》违宪，但该法令要求资本家遵守“公平竞争”规则，制定工人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在政府监督下拟定行业价格的核心内容，消解了劳资双方由来已久的矛盾，极大地刺激了企业的活力，美国工会运动的某些斗争成果在这项法令中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反映：如废除童工和血汗工厂等。

在罗斯福的“百日新政”中，还有下列法案以平均一周的周期被国会通过：民间自然资源保护法，联邦紧急救济法，农场押款法，“证券真实”法，田纳西水利法，房主贷款法和紧急农场抵押法，紧急铁路运输法，还有长期禁止出口黄金、放弃金本位制，实行受节制的通货膨胀等。



这些全部获得国会通过的法案绝大部分是有争议的，某些法律是否符合宪法也还值得商榷，但罗斯福认定西方世界前不久那场持续 4 年之久的经济危机只能“大病用烈药”，采取了一系列被某些传统主义者惊呼为“西方文明完蛋了”的离经叛道的做法。

“新政”的效果是明显的：美国经济开始全面复苏，最重要的是美国人对大萧条的恐惧已经消除，又开始了他们的“美国梦”。“新政”作为罗斯福在战前最重要的政治遗产：首先是在一个传统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可以用国家干预的方式解脱经济危机，同时又避免了法西斯式的集权。其次是为一个美国式的“福利国家”奠定了基础。最后，“新政”极大地扩大了联邦和总统的权力，罗斯福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大胆运用美国宪法为自己权威服务的总统。

罗斯福在竭力推行“新政”的同时，也没忘记将其“新政”在经济上的全部努力，提高到民主的高度或哲理上来宣传。1935 年 10 月 1 日，他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发表演说。强调“民主不是静止的东西，它是永无止境的进军。”这篇演说既赞美了加利福尼亚州在民主进程方面在全国的领先地位，又谈到总统的任务是协调和团结。其中，罗斯福还提到那令他十分感动的美国普通人民的表情。

肖市长、洛杉矶市的朋友们：

对这次盛大美好的接待，我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

回到加利福尼亚州来，真是令人愉快。加州的开明精神对于我们全国的计划和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同加州相比，在使政府大力支援比较不幸的社会成员的伟大任务中，没有一个州作出了更大的成绩。没有一个州为改善每个公民的处境，作出了更真诚的努力。没有一个州为促进社会正义的理想中，表现出了更热烈的愿望。

只要我们当中还有极少数的人在挨饿，得不到照顾，找不到工作，我们的各级政府——地方政府、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就有责任寻求合理而且进步的方法来帮助这些不幸的人，开明人士的信仰在于不仅相信男女个人的能力，而且也相信人们相互帮助的作用。加利福尼亚州有许多突出的事例说明，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是有效的。

大家知道，我今天不是到这里来向你们作正式讲话，更不是来同你们谈全国政府的问题。但是，我可以如实地告诉你们，在横跨我们大陆时，使我最受鼓舞的是人们脸上的表情。在过去这几年来，我曾努力了解我国那么多人所承受的考验和困难，设身处地想像那些困扰我们数百万个家庭生活的不安宁因素。

不错，不仅数字表明，而且全国各地美国人民大众的良好精神状态也表明，我们已经渡过了风暴，迎来了晴天。我们长期的忍耐取得了应有的报答。我们的信念是有根据的，我们的希望正在实现。

诚然，我们这些政府负责人为了这一目标作出了努力，但是，取得上述进展的最大因素乃是美国人民自己的勇气。没有你们的帮助，我们的努力远远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

为了保护家庭和个人免受生活中常见的各种困难，我们采取了许多措施；在给予失业者和老年人以更多的安全保障方面，我们取

得了进展。我们谋求达到目的的方法，是稳妥可靠的。

多年前，威尔逊总统给我讲过一个故事。他说，一个进步的民主国家的首脑所面对的最大难题，不是反动派的批评，也不是那些想要建立某种其他政体的人的抨击，而是协调和团结进步的开明人士们自己。绝大多数的开明人士都不是鼠目寸光的人，他们往往要求通过各自不同的道路来达到目的。那些在促进文明方面不愿前进的人，完全安于现状，他们在要求无所作为上，是很容易团结一致的。因此，开明人士为了使其努力获得成功，就必须找出共同的立场和共同的道路，每个人都要在形式上和方法上作出某些让步，以便大家都能得到共同要求的实质。

今天这里的大会，对我是一个鼓励，我将永记不忘。它使我清楚地回想起 1932 年我有幸在这个会场所目睹的盛大庆典。我今天只有一点遗憾。在那次集会上，介绍我同大家见面的，是我的一位老朋友，是美国的每个男人、女人和孩子的朋友，一位慈祥的哲学家——要不是他在阿拉斯加不幸早逝，他今天也会同我们在一起。

维尔·罗杰斯的善意的幽默注重事实，嘲弄幻想。同他一样，我们大多数人都承认这个平凡的事实：凡是进步的道路，是从现有的基础上出发，从往日的经验教训中汲取智慧和勇气来适应今天的任务。民主不是静止的东西；它是永无止境的进军。当我们的孩子们长大以后，他们也有困难要克服。然而，我们应该勇敢地承担责任，为他们作好准备，以便将来在他们必须克服困难的时候，那些困难对他们所造成的压力会减轻一些。

我坚信，我国人民既已作出努力，今后必将为自己的子女缔造出更加美好的未来。

在第一个新政期间，罗斯福为了医治经济危机，采取了一系列调节经济的措施，《工业复兴法》对企业界是一种及时的抚慰，但到了 1935 年，渡过危机的大企业家纷纷过河拆桥，反对“新政”，罗斯福也对赢得企业界的支持丧失了信心，因而从劳工的角度制定了一系列旨在惩罚企业界的议案：如社会保险法案，全国劳工关系法案等，这是第二个新政时期立法方面的标志。简言之：第一个新政的特点是告诉企业界必须做什么，第二个新政的特点是告诉企业界决不能做什么。

罗斯福的宗旨相当单纯：一个政府如果对老者和病人不能照顾，不能为壮者提供工作，不能把年轻人注入工业体系中，听任无保障的阴影笼罩每个家庭，那就不是一个能够存在下去，或是应该存在下去的政府。社会保险应该负责一个人“从摇篮到墓地”的整个一生，这才能给美国人带来真正的安全感。

所以 1935 年 11 月 29 日，当罗斯福来到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发表感恩节演说时，他特别强调了“新政”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成绩。他宣称：进步不仅意味着稳定的工商企业和农业，而且意味着美国生活的稳步改善。

“朋友们、乡亲们：

我很高兴来到佐治亚州。我为佐治亚州感到自豪。我今天特别

高兴，因为我的朋友们，国会中佐治亚州的全体参议员和众议员为我举行了这个令人感动的招待会，与会各位又都是如此热情洋溢和殷勤好客。我感到高兴，因为我又会见了许多老朋友和乡亲。我感到自豪，因为我从各方面看到，佐治亚州绝大多数的人民同全国其他千百万人携手共进，都相信进步，愿意为进步作出努力，也一定会取得进步。我感到自豪，因为我清楚地看到在城市和乡村中恢复了物质上的繁荣，特别是我感觉到了一种日益增长的精神上的繁荣，这将给我们人类带来更大的帮助和幸福。

11年前，我第一次寄寓于温泉区。那时正处于伟大的所谓的“繁荣时期”。但是我不愿意回到1924年的那种境况，而且我相信你们也是不愿意回到那种境况的。”

“对于那灾难深重、触景伤情的4年，你我都用不着再去老调重弹。我们都知道这一确凿事实：在那4年结束时，我们国家及时采取了行动，美国扭回头来，经过极大的、几乎是举国一致的努力，又开始走上上升的道路。

你们和我都有理由记住已经飞速流逝的过去这两年半时间，有理由记住普通美国人的高尚精神，它使我的重任大为减轻。人们常常是健忘的，但是，你们都会记得1933年春天和夏天在华盛顿各地区的农场主代表们举行的那些重大会议，那时他们绝大多数人都一致认为，除非而且直到美国政府采取行动帮助他们，使威胁着我和整个世界的惊人大量库存和过剩物资有所减少，否则就无法把低得不公道的农产品价格提高到并保持在合理的水平。

你们和我都清楚地记得那种希望政府拯救全国拥有家宅和农场的人的强烈要求，那时，这些人由于物价高涨，利率猛增而濒临无家可归的地步。

你们和我都还记得，当时迫切需要而且成功地实行了的一项储蓄政策，它不仅使倒闭了的银行恢复了营业，而且使全国储蓄户的存款有了保障。

你们和我都没有忘记，在人民的热情支持之下，成功地结束了在各种工厂雇用童工的做法，为工资微薄难以糊口的人争得了较合理的工资，使工人有了希望可以获得同雇主集体谈判的权利。我很高兴他说，这些成就，今天在很大程度上仍在保持着。

你们和我都不会忘记我们曾经经历过的那场长期的斗争，终于制止了滥发“隔夜贬值的”证券，以及为证券交易所以及州际公用事业公司制订出公平合理的规章。

你们和我——全国的每一个个人和每一个家庭——很快就会看到本届国会的那项伟大成就，社会保险法案的颁行。这项法案在今后的日子里将使老年人摆脱穷困，为失业者建立全国性的保险制度，以及为病残儿童提供应有的照顾。

你们和我今天都加入了一个全国性的伟大的改革运动：同大自然合作，而不是同她作对。同她合作来制止毁灭性的水灾，防止尘暴，防止宝贵土壤的流失；植树造林，给千万个农业家庭活下去的机会，设法为全国城市居民提供更多更好的食品。”

以上的演说中，罗斯福以诚意的“你们和我都没有忘记”的句式，唤起美国人民对“新政”成就的回顾，每一个听众都感到自己是“新政”的见证人。接着罗斯福谈了国债问题和对失业者采取以工代赈的措施。最后，他借感恩节这个美国人民的传统节庆之机向他们肯定：

“进步”比“复兴”更重要，因为“进步”意味着创造和生活的稳步改善：

“对于上述事实，我们大家都有理由深感满意，今天值此全国欢度感恩节的时候，我们聚会在这里的人尤其怀有这样的心情。但是经济复兴不只限于国家有盈余。你们和我都不想简单地回到过去的情况。我们想要相信，今后的人类将会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的生活条件下，享受人生更丰富的美好事物。在过去的这两年半时间里，美国人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如果说在这方面我要起什么作用的话，那就是我将尽力使之在今后得到进一步的改善。‘进步’这个词要比‘复兴’更好，因为进步不仅从物质的观点来看，意味着稳定的工商企业和稳定的农业，而且同样重要的是，意味着通过全国人民和政府坚持不懈的努力，美国人的生活可以得到稳步的改善。朋友们，我肯定这就是你们的奋斗目标。我向你们保证这也是我的奋斗目标。这就是我继续信任和信赖并且永远信赖美国人民的道理。”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美国是儿童的天堂，青年的战场，老人的坟场。不管此说是否有偏颇之处，但美国民族那种精力极其旺盛的青春族的特点，是不言而喻的。青年人是美国社会生活相当重要的构成部分，他们既是巨大的消费群体，又是社会生活时尚主要代表，也是美国精英阶层源源不断的后备力量。罗斯福深知美国青年的巨大潜力和在国内政治经济生活中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他 1936 年 4 月 13 日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青年民主党人俱乐部的演说，《社会领域里的拓荒时代才刚刚开始》可以被看作是一篇热情洋溢的对美国青年的颂歌。由于演说的听众是美国千百万青年的优秀代表，演说者本人也被现场的青春氛围所感染，总统的语调激动人心：

“今晚聚集在这个后备军人训练所的，是 1929 年以后成长起来的千百万青年的代表。你们是居住在联邦各州，代表着各党，属于各个所谓社会阶层的男女青年的象征。

你们千百万青年在其中成长起来的这个世界，已经不是你们父辈的那个固有的旧世界了。一些昨天被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受到怀疑。为什么一些已不复存在？为什么许多受到了怀疑？因为当代人类文明的现实和需要比上一个世纪发生了更大的变化。

关于这一点，我不用多说。你们正在根据亲身体会来衡量世界的现状。你们曾备尝经济萧条的折磨，你们曾流落街头，寻找那找不到的工作。由此造成肉体上的困苦自不待言，更严重的是幻想破灭造成心灵上的创伤。

我们青年人的性格已经变得更加烦躁不安、更加不满现实、更

加多疑好问。火热的青年成了火热的问题。年轻人来找我们，他们想知道，对于一个使这么多青年受到创伤的社会，我们打算做些什么。

青年们这种穷根究底的态度是无可厚非的。你们有权提出这些问题——实际的问题。对这些问题躲闪规避的人，是不值得你们信任的。

许多年纪大一些的人，似乎仅仅因为是成年人就妄自尊大。当青年们满怀热情和理想投奔他们时，他们脸上装出一付屈尊俯就的笑容，拍拍这些男女青年的肩膀，用老于世故的方式把他们打发出去，口口声声表示他们所谓的祝愿。然而——正如每个青年所知——那不是什么祝愿；那是浇头的一盆冷水。他们真正对你们说的是：‘你还年轻，沉溺于你们的热情和理想吧，等你们长大进入社会以后，就会懂得了。’可悲的是，许多青年正是走的这条路：他们的确长大了，而在长大的过程中，他们的情感和理想也就消失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所踏进的社会好转得如此缓慢的一个原因。

我设想，你们追求的目标，从最广义上讲就是：获得一个正当谋生的机会；年纪大一些时，有改善生活条件的机会；年老时，有不受贫困的实际保障；同时，有权分享生活中一切较美好的东西——健康的身体，正当的娱乐以及在艺术、科学与宗教方面得到满足。

面对这个目标，显然许多老一套的答案都无济于事。任何答案，不管是新的还是旧的，除非它符合你们面临的环境和愿望，除非它对你们的问题提出了某种肯定的、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否则都是不符合你们的思路的。”

那么，面对这个目标，究竟还存在着哪些迫切的问题呢？罗斯福非常坦率地列举了随着利润增长的同时，失业人数也可以同时增长的现实，因为效率的提高和新机器的使用，都会造成这种现象。但政府又不能立法限制提高效率，更不能立法限制使用新的生产工具。还有如何处理上次经济萧条中的受害者？1929年以来在美国，这次受害者达成百万之多。怎样使他们肉体上不受饥饿之苦，思想上不丧失美国人的精神，这是相当迫切的问题！罗斯福对此表明了他的态度：

“关于所有这些问题，关于每个出现的问题，近来都有人在出谋划策。有人说：“什么也不要干”；另一些人则说：“什么都要干”。常情告诉我们，要避免这两个极端。我的看法是：‘要干一些的’；而且当你干了一些之后，如果行之有效，就再多干一些；如果行之无效，就换些别的来干。

不错，你们青年人要求行动。你们和我一样，都相信有些需要干的，是能够干的。有这种信念正是美国人的特点。

我国历史的动力，主要来自这样一个事实：作为一个年青的国家，我们无所畏惧，勇往直前，干出了前人所没有干过的事业。我们征服了人们认为永远无法征服的荒野。我们创立了别人坚持认为不能持久的文明制度。在1776年到1789年之间，我们建立了一个共和国，一个在民主程度上是史无前例的政府——一个亲英派宣称

是无法持久的政府。

我们以巨大的热情干了这些事业。这种气概本身就是振奋人心的。我们当时还年青；我们在于一番事业——有价值的事业。正是这种美国精神使我们相信目前，就在我们这个时代，同样能干出一番事业。这种美国气概现在又在振奋着人心。

我本人决不认为拓荒时代已经结束；我只认为拓荒的领域有所改变。地理方面的拓荒时代已经基本完成。但是，朋友们，社会领域里的拓荒时代现在刚刚开始。大家必须明白：英雄主义，虔诚信念，远见卓识这些征服大自然时所需具备的品质，如今比以往更为需要，因为如今是要把现代社会的各种力量置于适当的控制之下。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就其意义之重要和规模之宏伟来说，都需要你我全力以赴。

我们需要有人来考虑美国的前途，这样的人越多越好。在体力、智力和精神方面，我国是得天独厚的，但是我们还需要很多东西。但是，我敢肯定，当前最需要的一件东西就是解放和动员青春的精神。”

最后，罗斯福利用演说是发表在复活节次日这种颇为特别的时辰，从年青的基督谈起，又追述了美国独立战争的群雄们那辉煌的青春，号召美国青年把“青年的品质”当成美国的理想来坚持。罗斯福演说至此，对青春赞美达到了最强音，全场青年无不感动，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显示出演说者和全场听众都是真正的美国青年。

“切不可低估这种精神的重要意义。昨天基督教世界庆祝了复活节——我主基督复活的纪念日。他 30 岁开始传道，死难时才不过 33 岁。基督教始于青春，而在过去的 2000 年中，这种青春精神使它一再恢复了生机。

我们的独立战争就是年轻人的革命运动。老年人追随亲英派，而亲英派是维护旧秩序的。革命爆发时，乔治·华盛顿是 43 岁，帕特里克·亨利是 38 岁，托马斯·杰斐逊（我们今天正在纪念他诞辰）是 32 岁，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才 18 岁。

同样，我们的宪法是年轻人的创作。参加起草宪法的人，平均年龄大约 44 岁。青年的这些品质，在 1936 年并不见得比在 1776 年更加受到那些自鸣得意的人们的欢迎。

我用了‘青年的品质’这几个字，请各位年轻的朋友明智的、忍让地记住，成百万年纪较大的人也同样保持着或者打算保持这种青年品质。不管你们年纪多大，如果你们的青春精神使你们有理想和远见——相信美国必将有更加伟大和更加美好的理想和远见；如果你们的青春精神使你们确信：贫困可以大大减少；被迫失业的羞辱可以消灭；阶级仇恨可以根除；国内外的和平可以维护；有朝一日这个国家属于一代新人，他们享有一切现在我们还不知道的东西，享有那些使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更丰富的一切东西；如果你们是这样的，你们今晚就应该感谢上帝。如果这就是你们时新的理想，那么我要说：‘坚持你们的理想吧，美国需要它。’”

罗斯福这篇著名的演说与列宁在莫斯科对共青团代表的著名演说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针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美国青年；后者则是针对社会主义世界的苏维埃一代青年。两篇演说都赞美了青春，唤起世界整整几代青年为生活和事业奋力开拓。

熟悉美国国家体制的人都知道，美利坚合众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50个州作为基本的行政区划构成联邦的基础，各州在行政司法经济等方面相对独立，同时又忠于美国精神和象征：星条旗和《独立宣言》。自18世纪美国政治理论推出“州权论”以来，州这种行政单位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特色日趋完善，任何美国总统都不可能“州”有所忽视。实际上，进入现代世界以后，不少美国总统都是由州长之位入主白宫的，你只有经历了治理一个州的政治实践后，才有可能成功地治理由50个州组成的美国。所以1936年6月12日，罗斯福总统（不要忘记他是由纽约州州长之位入主白宫的）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发表的演说，深刻地表现了他对“州”的理解和掌握。这篇在德克萨斯州一百周年纪念展览上的演说，也可以说是一篇对“州”的颂歌：

“奥尔雷德州长、得克萨斯州的朋友们：

在你们州一百周年纪念之际，我今天代表全国来向你们祝贺，你们州正好是青春百岁！

我认为，不时地访问联邦中的每个州，是合众国总统的一项职责和特权。这也是我来到这的一个原因。

多年以前，当1913年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任命我作海军部助理部长时，记得我只到过20个州，但在以后的几年里，我有幸走遍了所有其他各州。

亲身看一看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的确，过去多年中，由于我有幸同合众国各地区保持亲身的接触，我得以认真地努力更具体地弄清我国各地区的问题同其他地区的问题之间的关系，以及各地区的问题同统一的整体之间的关系。

这个盛大的一百周年纪念展览会，决不单是为得克萨斯一个州举办的；它也是为所有其他47个州的人民所举办的。我希望并且相信他们将会善加利用而得到教益。

近3年来，随着信心的恢复和大为增进的繁荣，力求熟悉合众国的优良传统又出现了。我们看到了人们乘火车、飞机、轮船和汽车到处旅游的热潮。我们美国人的确在亲身看一看。但愿这种习惯得到发扬。”

“你们居住在联邦中最大的州里。但在这个世界上，判断大小不仅仅取决于土地的面积；而是取决于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的特质。得克萨斯州的人民百年历经烈火的锻炼，你们挺过来了。你们进行了争取独立的战争。你们曾经显然失败过；但是后来胜利了。你们经受了州与州之间混战的艰苦日子以及重建家园的考验。你们曾经不得不同内部的压迫者，以及外来的压迫者进行斗争。

一个世纪以前，你们州的农场主曾经属于第一批起来反对剥削的人。在那些年代里是受铁路的剥削。在那个垄断、联合、高估资

本的时代，在对小行商们歧视、运费高昂而服务低劣的时代，是你们得克萨斯州的人对公用事业作出了规定，为使公用事业便利用户树立了榜样。

后来，当得克萨斯州的工业有所发展时，同别的州在你们以前和以后所遇到的情况一样，你们也遇到了无法控制的大公司的问题。这时，你们又发扬了得克萨斯州传统的个人自由的精神，制订了反垄断法。在你们之前，只有一个州这样做过。”

接下罗斯福分析了垄断这种在美国经济中最容易产生的形式，其实跟美国的民主政治理想格格不入：

“得克萨斯州的人民为什么在一代人的时间之前就做到了这一点？他们相信政治民主，然而他们发现，除非同时存在机会均等，政治民主就不能存在。

你们看到了某些垄断形式——公用事业和其他企业的大联合，追求着自身的目标——这些垄断形式是不民主的，因为它们在冲击着较小的竞争者，冲击着它们所服务的人民。正是由于这一点，它们把机会夺走了。

今天我们已经恢复了政治民主。

我们正处于恢复机会均等的过程中。

在我们国家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中，自由政体的本质要求商人、工厂主、农场主有一条自己的防线。我指的不是那些巨头们，而是一些小人物，一般的商人、工厂主和农场主——他们拥有企业的所有权和责任心，从而保持生活稳定。任何经济方面或政治方面的基本政策，如果倾向于消灭这些民主制度的可靠保卫者，把控制权集中在少数强大的小集团手里，那么，这样的政策就是同政治上的稳定和民主政体本身背道而驰的。”

“垄断的最后结果，经济和财政控制在少数人手里的最后结果，不管在过去或现在，大都意味着把劳动力当做商品来占有。如果在合从国劳动力成了商品，最终就意味着我们会变成一个寄宿制的国家，而不是一个由家园组成的国家。如果我们的人民甘愿屈从，他们就是向传统的自由“告别”。人们不会为寄宿制去战斗，人们现在和将来都会为家园去战斗。

我在前面提到，全国都要关心这个盛大的展览会。我这样说指的是每个地方都应该关心其他各州的一切地方。得克萨斯州的农场和牧场的产品、矿山产品、油田产品以及工业产品之所以能给它带来繁荣，主要是由于我国其他地方具有购买力和消费力，可以使用你们所生产的东西。另一方面，我国北部、东部以及其他地方成千上万个工厂、农场，也是由于你们得克萨斯人的繁荣，才使他们能更大量、更广泛地销售产品。我不是一次，而是十多次地提到各州相互依赖的必要性。这个教益无论怎样反复强调，无论怎样反复宣讲，也是不会过分的。”

最后，罗斯福以整个美洲为胸怀，将洲际友谊放大，使它成为整个



美洲和平的基础。至此，这篇以“我们正处于恢复机会均等的民主过程”为主题的演说，既献给德克萨斯这个盛产石油和牛仔的美国最大内陆州，又献给了整个美洲：

“近3年来，各处的地方主义明显减少，我对此感到十分高兴。我们越来越从全国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这本身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们必须同时更深刻地认识到，这种国内的睦邻政策还要扩展到我国界以外的邻邦去，否则，这就不成其为好事了。你们得克萨斯这个大州，同我们的兄弟邻邦墨西哥共和国有几百英里长的边界线，你们能够很好地理解睦邻政策对整个美洲的意义。我们——全体美洲人，不论是北美人，中美人还是南美美人——要在本半球消灭战争；我们要推广亲善与友好的政策，这是和平的基础。

朋友们，我再一次祝愿你们获得世界上的一切幸福和万事亨通。向大德克萨斯州致敬。”

1936年初，就在国内对“新政”的赞誉和攻击相夹杂的声中，罗斯福迎来了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他认为“新政”的效力才刚刚开始，他绝对应该获得连任的机会，所以从1月3日开始，他利用在任总统的权力，以对国会发表国情咨文的形式开始了竞选连任的活动。他对国会宣布进入战争状态，但不是为了对付外敌，而是要对付国内“势力雄厚的一小撮人”和“声誉扫地的特殊利益集团”。他宣布：我们已经引起斗争，我们已经招致盘根错节的贪婪势力的憎恨。”

罗斯福希望共和党推出前总统胡佛作他的竞选对手，这样他有明显的优势。共和党人最初也有这个打算，但后来考虑到这位仁兄的大名和美国的灾难萧条联系太紧，结果推出堪萨斯州州长兰登为总统候选人。兰登作为中西部人，共和党希望他对农民具有感召力，调动保守势力反罗斯福，所以，就连兰登那平淡无奇的举止和呆板乏味的演说，都被共和党看成是对付始终笑容可掬，魅力十足的罗斯福的特别武器。

民主党在费城召开代表大会，全体代表口头表决再次提名罗斯福为总统候选人。1936年6月27日，罗斯福冒雨在费城富兰克林体育场发表了接受再次提名竞选总统的演说。罗斯福在儿子吉米的搀扶下，拖着僵直的腿，艰难地穿过人群。他从人群中认出了老诗人马卡姆，他伸出手臂，正想与诗人握手，但被人群一挤，右腿的支架突然松了，总统身体一晃，讲稿撒落一地。儿子赶紧扶住父亲，特工人员重新装好支架。罗斯福脸色发白，急促地喊道：“快把演说稿捡起来，把我身上掸干净！”周围恢复正常后，他又向前同老诗人握了握手，老诗人热泪盈眶，也许他那善良的眼睛看见了总统那艰辛而奋进的全部历程。

罗斯福在10万群众雷鸣般的欢呼声中，开始了这篇相当漂亮的演说。

“在我国前途攸关的重要时刻，我们和全国各地一样，在这里举行集会。我愿借此机会对各种问题坦率表明态度，对这些问题所作的决断，将会对美国产生深远影响。

我来出席大会，不仅是作为一个政党的领袖，作为总统候选人，

而且也是由于我在许多关键环节上肩负过并且仍旧肩负着重大的责任。

在我的工作中，美国人民给了我同情、帮助和信任，我谨向他们表示感谢。我们伟大的党在联邦各地的党员，不论是否参加政治生活，都对我衷心拥护，我谨向他们致敬。对其他各党党员，特别是国会中的各党成员多次抛开党派成见，给予合作，我更应向他们表示敬意。我对各州的州长，各州立法机关，州政府以及地方政府的官员表示感谢，他们不分党派无私地参与了恢复经济和消除各种弊端的工作。我应该特别感谢千百万人民，他们勇敢地承受了灾难，在风暴中始终满怀信心。

美国不会忘记最近几年是怎样过来的，不会忘记拯救国家不仅是一个政党的任务，而是关系我们全体的大事。我们全体共同奋起，集中力量，运用实事求是的传统法则，一起度过了难关。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担心的是恐惧心理，因此我们同恐惧心理进行了搏斗。朋友们，今天我们已经战胜了最危险的敌人，我们征服了恐惧心理。

但是，对各位坦率地说，世界上并没有就此太平无事。许多地方还笼罩着互相猜疑的阴云，存在着居心叵测、互不相容的恶浪。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我们确实过着比大多数国家更为美满的生活，但是，现代文明的急速发展本身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困难。华盛顿和杰斐逊所规划和为之奋斗的政治和经济自由，要在合众国得到维护，我们必须解决这些新的问题。

费城是一个适宜于书写美国历史的城市，让我们在这个合适的地方重申先辈们的信念；保证为人民恢复更广泛的自由；像我国的缔造者们献给 1776 年一样，我们也向 1936 年奉献一种美国的生活方式。

自由这个词，其本身的含义必然意味着从某种束缚之下获得自由。1776 年，我们是从专制政治的暴虐之下——从拥有王室赐予特权的 18 世纪亲英分子手中争取自由。为了维护特权，他们的统治是未经被统治的人的认可；他们不承认集会自由和言论自由；他们限制崇奉上帝的自由；他们把普通百姓的生命财产交给皇室雇佣军任意摆布；他们对人民进行严密的组织管理。

正是为了从专制政治暴虐之下获得自由，才进行了美国革命。革命的胜利使得普通百姓当家作主，使得他们和他们的同胞一起，有权通过自己的政府来安排和掌握自己的命运。1776 年 7 月 4 日在费城废除了政治上的专制统治。

然而，经过那次斗争以后，人们的创造才能在我们的国土上激发了新的力量，重新安排了我国人民的生活。机器时代，铁路时代；蒸汽和电气时代；有线电报和无线电；大规模生产，大规模分配——所有这一切带来了新的文明，也为那些要求保持自由的人带来了新的问题。

在现代文明中，经济上的保皇派建立了新的家庭割据，他们通过对物质财富的集中控制，建立起了新的王国。通过股份公司、银行和证券的新的作用，通过新的工、农业结构，劳资结构——这一切都是前辈们所梦想不到的——现代生活的整个结构都被迫服务于

这个新特权阶层。

成千上万想充分利用美国制度，发挥主动，获得好处的小业主、小商人，在这个特权阶层中，是没有地位的。他们并不比工人农民更自由。即使一些为人诚实、思想进步的有钱人，他们对时代所赋予的责任有所了解，也不知道如何适应这个特权阶层的结构。

毫不奇怪，也许可以说是人之常情，这些新经济王朝的贵胄们，由于贪图权势，要伸手来控制政府。他们披着合法的外衣，建立了一种新专制制度。他们手下的新雇佣军力图对人民，连同他们的劳动和财产，进行严密的组织管理。于是，普通百姓又一次面临着当年独立战争时期美国民众所面对的问题。

男女工人們的工时，他们领取的工资，他们的劳动条件——这一切都不能由他们自己作主，而是由新的工业独裁所强加的。普通家庭的积蓄，小业主的资本，留供养老而进行的小额投资——都是别人的钱——都成了新的经济王族巩固自己地位的工具。

耕种土地的人不再有权享受自己的劳动所得。他们的微薄收入要由远在城市里的人来摆布。

在整个国家，垄断限制了各种机会，个人的主动精神被一部庞大的机器的齿轮所轧碎。自由经营的领域日益受到限制。私有企业确实变得过分私有，它们已经变成了特权企业，不再是什么自由企业。

一位英国的老法官曾说：‘贫穷的人不是自由的人。’自由要求有谋生的机会——谋取一种当时标准是像样的生活，一种不仅过得下去而且有所指望的生活。

对我们许多人来说，由于经济上的不平等，一度赢得的政治上的平等已经失去意义。少数人的手里已经几乎全面掌握着别人的财产，别人的金钱，别人的劳动——别人的生命。对我们许多人来说，生活已不再是自由的；自由已不再是现实的；人们已不再能够追求幸福。

面对着这样一种经济专制，美国的公民只能求助于有组织的政府权力。1929年的崩溃揭露了专制主义的本质。1932年的选举乃是人民要求结束这种统治的授权。根据人民的授权，我们正在结束这种统治。

经济秩序上的保皇派承认政治自由是政府的事，但是他们坚持经济奴役谁也无权过问。他们承认政府可以保护公民的选举权，但是在公民的工作和生活权利方面，他们否认政府可以设法保护。

今天我们有责任维护这一前提：自由不是可以有无参半的东西。如果一个普通公民在投票场所享有平等机会，那么，在销售市场上他也必须享有平等的机会。

这些经济保皇派埋怨我们，说我们要推翻美国的制度。他们真正的不满是要我们剥夺他们的权力。我们忠于美国制度，就必须推翻这种权力。他们想利用我国的国旗和宪法来保护自己乃是徒劳的。他们利令智昏，忘记了国旗和宪法所代表的是什么。现在和任何时候一样，它们代表民主，而不代表暴政；代表自由，而不代表屈从；他们既反对暴民专政，也反对特权阶层专政。

对这次大会所通过的果敢而明确的政纲，我衷心拥护。这个政纲规定，在现代文明社会中，政府对公民负有某些义不容辞的责任，其中包括保护家庭和家宅，建立一种机会均等的体制，以及对不幸的人提供援助。

但是，我们国内的那些顽敌随时都准备使我们这些话落空，除非我们以更大的勇气来为之斗争。

我们已经为此奋斗了 3 年多时间。这次大会上的一言一行都表明了我们决心继续奋斗下去。

这些年的成功和失败，使我们全体人民对我们的政府和我们自己有了新的认识。

自从当年新英格兰城镇会议以来，没有哪一次对政府工作作过如此广泛的讨论，作过如此明确的评价。我们都从中认识到，在这个最为世俗的尘世上，道义是保障安全的唯一有效指南，也是最伟大的指南。

我们并不把信仰、希望和博爱看成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而把它们用作文明时代一个国家为自由奋斗的坚强支柱。

信仰——在专制国家包围之中，对民主坚信不移。

希望——由于我们清楚地看到已经取得的进步，从而重新燃起了希望。

博爱——坚持这个古老词语的真正含义。博爱一词的原意就是爱，相互体谅的爱，这种爱不单纯有福共享，而是以真正的同情和智慧去帮助人们自助。

我们不想把政府只当成一个机械性的工具，而是要赋予充满活力的个性，体现出人类博爱的精神。

失业者都非常恐惧成为世间所不需要的人，如果不能在美国生活的角落消除这种恐惧，我们这个国家也就太不争气了。在记录人类坚定精神的帐册上，我们一定不能长期保留赤字。

我们将力求建立起信仰、希望和博爱的庙堂，去取代特权的宫殿。

朋友们，为这一伟大事业而奋斗，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我们在日常工作中要记住，这个事业不是属于我们在座的人，而是属于全体人民。并不是你们各位和我本人，而是整个美国。我们每天都力求从经验中吸取教益，以便随着工作的进展，学习把事情办得更好。

政府可能出错，总统犯错误也不足为奇。但是，不朽的但丁说过，神灵在裁决坏人和好人的罪恶时，泾渭分明。

一个政府具有博爱精神，但是偶有过失，总比对人民冷冷冰冰，漠不关心，一贯地无所作为的政府要好。

人世间有一种神秘莫测的循环。某几代人得天独厚，对另外几代人则要求很高。这一代美国人的命运如何，还待自己去掌握。

在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中，有些人过去曾经为自由而生活和战斗，现在似乎已经疲惫不堪，无法坚持。他们为了活下去的幻想，卖掉了自由的传统，他们放弃了民主。

我真诚地认为，只有我们做出成绩才能重新燃起他们往日的希望。他们开始认识到我们正在美国进行一场伟大而成功的战斗。它

不单纯是一场反对贫困的战斗，它是一场挽救民主的战斗。我们正为自己和全世界拯救一种伟大而珍贵的政治体制而战斗。

我接受你们给予我的重任。我加入你们的行列。我决心在这场战斗中服役到底。”

这篇堪称杰作的演说先是胸怀坦荡地向各党派的政治家和全美国人民亲切地致以谢意和敬意，然后自豪地宣布“我们征服了恐惧心理”。只要回想一下3年前罗斯福在总统就职演说中的名言：“我们唯一值得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那他此刻能够说出这句话，是多么不容易！罗斯福接着抓住演说地点费城并回溯其当初作为《独立宣言》签署地的光荣历史，引申出3年来他的“新政”措施的实质，就是对自由的追求，而这也就是一种美国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的基础是保护家庭的宅，建立一种机会均等的体制，对失业者和不幸者提供救助，而它的理想目标，则是捍卫“信仰、希望、博爱”这些古老词语所代表的东西。

任何人听了罗斯福这篇像镶嵌珍珠般、镶嵌着但丁名言的提名演说，都不会怀疑罗斯福的连任是势在必行！

竞选期间，罗斯福在美国大地上受到普遍的欢迎。在芝加哥，15万群众自发地欢迎他，把他从火车站一直送到演说地点运动场。在波士顿，当罗斯福在市议会大厅演说时，连附近的大街小巷都是人山人海，在他曾担任过州长的纽约，人们更是群情激动欢迎他归来。甚至在他的竞选对手兰登的老家堪萨斯州，所到之处人民对总统的到来无不兴高采烈。似乎上苍也在暗示罗斯福的运气，当他来到田地旱裂的中西部地区时，天降喜雨，在罗斯福走过的地方，这位最善于观察美国人民日常表情的总统总是发自内心地对他的人民说道：“你们看上去比4年前愉快啦！”听了总统的话，美国人民笑得更愉快了。

每到一处，罗斯福总要把1936年的情况同1932年他上任前的情况相比。总的说来：成千上万的农场和住宅获得拯救，没有被取消抵押品赎回权，实现了罗斯福保障人民家宅安全的目标，就业机会增多，经济回升，失业人数比经济大萧条最严重时期减少了600万人。汽车厂商预言，1936年将是自1929年以来最景气的一年。公司利润是1929年股票价格猛跌以来最高的，道——琼斯工业股票指数比1932年增长80%。但虽然如此，仍然有大量吹毛求疵，患得患失的舆论在攻击罗斯福政府。对此罗斯福以形象的比喻予以辛辣的反击：

“1933年夏天，有位头戴丝绸帽子的老绅士在防波堤边上失足落水，他不会游泳。一位朋友跳下防波堤，跳进水里，把他救上来，但丝绸帽子被浪冲走了。老绅士苏醒过来后，千恩万谢，夸奖他的朋友救了他的命。但是，3年后的今天，老绅士却因丢了帽子而斥责他的朋友。”

10月31日晚，罗斯福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发表了竞选活动的最后一篇演说。在听众一次又一次的欢呼声中，罗斯福对他的敌人发起了最后一击：

“全国因前政府充耳不闻，视而不见，无所事事而吃了12年的苦头。全国人民看着政府，可政府转过脸去。9年受金钱愚弄，3年遭遇祸患！9年发疯般地厮守在行情自动显示器旁，3年在领取救济的队伍中苦挨日月！9年愚蠢地想入非非，3年灰心绝望！今天某些强大势力，企图恢复那样的政府以及它的对一切都漠不关心的政府是好的政府的理论。

在大约4年的时间里，我们的政府不是游手好闲，终日无所事事，而是卷起袖子大干，我们将继续大干下去。”

但一些罗斯福政府的“宿敌”拼命阻碍他们卷起袖子大干。“宿敌”有企业界和金融界垄断集团，投机倒把的奸商，鲁莽的银行老板，地方主义派以及靠战争牟取暴力的投机商。这些势力一直把美国政府看成是自己的势力范围，现在碰上一位对他们说“不”的总统，就立刻纠结起来，形成强大的反对面。但罗斯福无所畏惧：

“我想说，在我领导的首届政府执政期间，这些自私自利，权欲熏心的势力遇到了势均力敌的对手。我还想说——”

总统的声音被海潮般的欢呼淹没。罗斯福高喊：

“请静一静，我还想说：到我领导第二届政府的时候，这些势力将会遇到强手。”

1936年的大选，罗斯福获胜。全国各州除缅因和佛蒙特两州外，他获得了其余各州的全部选举人票。直接选票也比他的竞选对手兰登多900余万张。

罗斯福取得了辉煌的胜利，顺利地连任下一届总统。但就在此时此际，他的眼光仍然注视着美国生活中急待解决的问题。他看见1/3的国民住不好，穿不好，吃不好。

1937年1月20日，罗斯福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宣誓就任下届总统，他以普通国民的吃穿住问题为中心发表了总统就职演说。

演说前半部分罗斯福提到4年前美国那“忧心如焚的现实”，并将他的政府为解救这种现实的美国人民而作的所有努力看成是追求自由的新篇章。在后半部分的开始，他诚恳地向美国人民发问，然后用证人般的语态“我看到”列举出美国生活中急需改革的现实情况，从而为自己的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们还想问一问：我们已经达到了1933年3月4日我们理想的目的么？我们找到了我们的幸福境地么？

我看到一个伟大的国家，地处广阔的大陆，天赐丰富的资源。它的13000万人民和平相处，与世无争。我看到一个合众国，它可以作出示范，在民主的政府之下，把国家财富转化为越来越多的人的空前美好的生活条件，把最低的生活水平也提高到远远超出仅仅糊口的程度。

然而，我们的民主制度也面临着挑战：在我们的国家里，我看到几千万公民——全体人口的相当大的一部分——他们现在还不得不按今天的最低水平也应该叫做生活必需品的大部分东西。

我看到数百万个家庭收入微薄，勉强度日，无日不处在家破人亡的威胁之下。

我看到数百万城乡居民，他们的日常生活状况，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被所谓上流社会看作粗鄙不堪了。

我看到数百万人得不到教育、娱乐以及改善他们自己和他们子女的境遇的机会。

我看到数百万人缺乏买衣工产品的物质手段，而他们的穷困使其他千百万人无法贡献自己的劳动和生产能力。

我看到三分之一的国民住不好，穿不好，吃不好。

我对大家描绘这个情景并不是由于灰心丧气。我描绘这个情景是抱着希望的——因为，全国看到了并且认识到这是非正义的，就会提出要把它涂抹掉。我们下定决心要使所有的美国公民都成为国家注意和关心的对象；我们永远也不会把我们边界内的任何忠诚守法的集团看作是多余的。我们进步的检验标准，不是看我们是否锦上添花，而是看我们是否雪里送炭。

如果我对于我国的精神和意志还有所了解的话，我们是不会去听信贪图安逸的人、机会主义者和胆怯的人的。我们会继续前进的。

我们主张共和的人，绝大多数都是有善良之心的男人和女人；他们和她们不仅有一颗颗愿意献身的火热的心；他们和她们还有付之实现的冷静的头脑和勤劳的双手。他们和她们将坚持人民政府的一切机构都必须运用有效的工具去实现他们和她们的意志。

政府的成员都要作为受全体人民的委托那样去工作，那么政府就会得力。它要是随时了解一切情况，它就可以不断前进；人民了解政府一切作为的真实情况，政府就可以得到应有的支持和恰当的批评。

如果我对于我国人民的意志还有所了解的话，他们会要求创造并维持使政府有效的上述条件。他们将要求我国不为非正义的弊端所腐蚀，从而在主张和平上成为国际上的坚强楷模。

今天，我们是在突然变化了的文明中再一次致力于在美国实现珍视已久的理想。在一切土地上都总是存在着使人们分离的力量和使人们聚合的力量。在我们的个人抱负上，我们是个人主义者。但是，在我们作为一个国家致力于经济和政治进步上，我们则是一体的，不能一起上升，就会一起下沉。

使民主行之有效，这要求巨大的耐心才能应付方法上的分歧，要求巨大的谦让精神。然而，在众说纷纭中，可以理会出大众需要的主流。于是，政治领导人就可以说出共同的目标，并且帮助实现这些目标。

在重新宣誓就任合众国总统之际，我接受领导美国人民沿着他们已经选择的前进道路走向前去的庄严职责。

这个责任既已托付给我，我将竭尽全力代表美国人民讲话，执行他们的意志，祈求上天指引来帮助我们大家，启发昏愤，走向和

平。

就在罗斯福任第二届总统之际，德意日法西斯所掀起的战争风云越来越浓，大有越过太平洋和大西洋刮向美国之势，从此以后具有全球战略眼光的罗斯福将不得不关注美国的国际安全问题了。在他的演说中，和平与战争的主题也跃居到很显著的位置。

1941年12月7日：“一个遗臭万年的日子”

1941年12月7日，星期日。日本人偷袭珍珠港。这是世界战争史上偷袭战的一大杰作。在短短两小时零四分钟的袭击中。处于假日状态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19艘大型舰只包括8艘战斗舰被击沉击毁，150架飞机被炸毁在地面，美国官兵死2409人，伤1178人，平民死68人。而日本的参战飞机381架，只损失29架，日本联合舰队只损失袖珍潜艇5艘。

日本驻美使馆在珍珠港一片火海之后才向美国递交了宣战书。这时在日本广岛湾的旗舰长门号上的日本帝国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既为他指挥的这一杰作兴奋，又感到日本此役虽然在战术上成功了，但在国际战略上却前景堪忧：美国由此必将打破中立国的立场，向日本宣战。

珍珠港事件也成了日本送给丘吉尔的最好礼物。丘吉尔自战争开始就一直苦口婆心试图把美国拖入战争，以美国辽阔的大陆作为英伦小小三岛的强大后方，但迫于美国全国的孤立主义势力，罗斯福难以下此决心。丘吉尔从伦敦打电话给罗斯福，明知故问：“总统先生，日本人是怎么回事？”罗斯福说：“他们在珍珠港揍了我们。现在我们是风雨同舟了，这条船是不会也不可能沉没的。”丘吉尔当即乐颠颠地猛吸哈瓦那雪茄，迫不及待地示意英国议会抢在美国国会前几小时和日本宣战。

次日晚8点40分，罗斯福向国会发表了6分钟的演说，表情严峻，声调愤慨的罗斯福此刻犹如一尊凛然不可侵犯的战神：

“副总统先生、议长先生、参众两院各位议员：

昨天，1941年12月7日——一个遗臭万年的日子——美利坚合众国遭到了日本帝国海空军部队突然和蓄谋的进攻。

合众国当时同该国处于和平状态，而且，根据日本的请求，当时仍在同该国政府和该国天皇进行着对话，对于维持太平洋的和平有所期待。实际上，在日本空军中队已经开始轰炸美国瓦胡岛之后一小时，日本驻合众国大使及其同事还向我们国务卿提交了对美国最近致日方的信函的正式答复。虽然复函声言继续现行外交谈判似已无用，它并未包含有关战争或武装进攻的威胁或暗示。

应该记录在案的是：由于夏威夷同日本的距离，这次进攻显然是许多天乃至若干星期以前就已蓄意进行了策划的。在策划的过程中，日本政府通过虚伪的声明和表示希望维系和平而蓄意对合众国进行了欺骗。

昨天对夏威夷群岛的进攻，给美国海陆军部队造成了严重的损



害。我遗憾地告诉各位，很多美国人丧失了生命。此外，据报，美国船只在旧金山和火奴鲁鲁之间的公海上也遭到了鱼雷袭击。

昨天，日本政府已发动了对马来亚的进攻。

昨夜，日本军队进攻了香港。

昨夜，日本军队进攻了关岛。

昨夜，日本军队进攻了菲律宾群岛。

昨夜，日本军队进攻了威克岛。

昨夜，日本队进攻了中途岛。

因此，日本在整个太平洋区域采取了突然的攻势，昨天和今天的事实不言自明。合众国的人民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见解，并且十分清楚这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安全和生存的本身，作为陆海军总司令，我已指示了，为了我们防务采取一切措施。

不论要用多长的时间才能战胜这次预谋的入侵，美国人民以自己的正义力量一定要赢得绝对的胜利。

我现在断言，我们不仅要作出最大的努力来保卫自己，我们还将确保这种形式的背信弃义永远不会再危及我们。我这样说，相信是表达了国会和人民的意志。

信赖我们的武装部队——依靠我国人民的坚定决心——我们将取得必然的胜利——上帝助我！

我要求国会宣布：自 1941 年 12 月 7 日——星期日日本进行无缘无故和卑鄙怯懦的进攻时起，合众国和日本帝国之间已处于战争状态。”

罗斯福这篇要求国会宣布合众国和日本之间处于战争状态的演说，义正辞严，气势极其豪迈，表达了美国对战争的愤怒和毫不畏惧的勇气。罗斯福也感到，从此以后，大洋此岸的美国再也不会隔岸观火了，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新政将退居二线，战争的主题脱颖而出。

参众两院群情激愤，几乎全票通过罗斯福的宣战要求，唯一的一张反对票来自一位女议员，一位毕生反对一切战争的和平主义者。

罗斯福走到这一步历尽波折。1933 年 3 月 4 日他首次就任总统发表就职演说时，只有一段是讲述外交政策的，当时鉴于国内形势，只是模糊地提出“睦邻政策”，对国际关系没作过多涉及。但那时战争的根源已经显现出来了。一个月前的 1 月 30 日，写过《我的奋斗》的第一次大战时的下士希特勒在大洋彼岸就任德国总理。

在这之前的历史时期内，战争的幽灵一直缠绕着罗斯福，使他在全国各地为“新政”的演说之中也不得不时有涉及。

1928 年，日本军人在中国沈阳皇姑屯车站制造了炸死“东北王”张作霖的流血事件，妄图以此为契机一举吞并东北。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关东军炸毁中国沈阳南满铁路，反诬中国军队，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此后 4 月内，日军侵占辽、吉、黑三省，东北沦陷。1933 年元月，日本又占领了东北与华北之间的咽喉要地山海关，开始进犯中原。

与日本相呼应，希特勒上台后的第 28 天，就精心策划了举世哗然的

国会纵火案，嫁祸于德国共产党，取消了德共在议会中的全部席位。随后希特勒加强军备，战争机器疯狂运转，1934年8月，希特勒秘密下令将陆军限额从10万扩充到30万人，而此时美国的陆军人数则11.8万人。

所以1935年10月2日罗斯福在加利福尼亚圣地亚哥博览会上的演说，不得不涉及到战争的阴云。他宣称“我们能集中智慧对付国内仇怨和国外战争这两朵最可怕的阴云。”他是这样谈到“第二朵阴云的”。

“第二朵阴云——‘国外战争’——是更为现实的——在此刻是对今后人类文明更为具体的危险。毫不奇怪，我们许多公民深感不安，唯恐某些国家重犯20年前的错误，而竟使人类文明达到无法在世界范围内重新恢复的地步。

面对这种忧虑，美国人民所关心的只有一件事——美国人民只能表达出一种舆论：不管其他大陆发生什么事情，美利坚合众国一定而且必须保持我们的国父许久以前所祈求它能保持的——置身事外，不受牵连。

我国不想征服别人，我们没有帝国野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愈来愈完善地确立着同邻邦的和平相处。我们特别为美洲所有共和国的繁荣、稳定和独立而感到高兴。我们不仅热爱和平，而且决心要避免有碍我们同别国和平相处的各种危害。

我们置身于国外战争和纠纷之外的决心，不能妨碍我们在我们珍视的理想和原则受到挑战时，表示出深切的关注。每个人享有根据自己良心支配而实行自己宗教信仰的自由，在合众国，我们认为是不言而喻的。一个半世纪以来，我们的国旗象征着信仰自由、宗教自由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些原则；而且这些原则已经成为我们根深蒂固的民族性格。

诚然，其他国家可能推行与上述原则相反思想和行为规范，他们有的已经这样做了。诚然，别的国家可以奉行与我们完全不同的政策，我们管不着。但在我们每个人的思想里却决不能漠不关心，我们要坚持自己有完全的自由去接受、信奉和遵循长期以来以我们国旗为其崇高象征的那些原则。一个多世纪以前，詹姆斯·麦迪逊说得好：‘信仰什么和如何实现这种信仰，只能由理智和信念来指导，而不能使用强权或暴力，这是一条根本的、不能放弃的真理。’

作为合众国总统，我再次最诚挚地向你们声明：美国人民及其政府打算而且期望同世界各国保持和平。我任职两年半以来，我国政府始终如一地执行了我们自己所选定的这项政策。在国内，我们宣传了，而且将继续宣传睦邻的原则。我衷心地希望，随着时间推移，每个大陆，每块土地将有一个又一个国家用行动而不止是用言语来证明，它们坚决支持南北美洲的理想——我是一个友好的邻邦。”

在这篇罗斯福就任总统后第一次较深刻地谈到战争问题的演说中，他表达的看法还只是典型的传统的美国对外政策：置身事外，不受牵连。随着世界局势的日益恶化，这种保守的孤立主义立场受到严峻的挑战。

孤立主义在美国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政治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1793

年英法战争爆发时，美国总统华盛顿对此发布的《中立宣言》，宣布美国对交战双方采取友好和不偏不倚的政策，严禁任何美国人以任何形式参与或帮助交战双方。

3年后，华盛顿辞去总统职务时发表了著名的《告别演说》，告诫美国人“尽可能少与国外发生政治关系”，以避免“把美国的命运与欧洲任何一部分的命运纠缠在一起，以致使我们的和平与繁荣卷入欧洲的野心争夺、利益、情绪或反复无常的罗网中去，他主张美国应避免与国外世界的任何一部分永久结盟。”

罗斯福的对外政策也必然被客观趋势定位于这种中立传统之上。在他的12年总统任期的头9年，他几乎一直都在与孤立主义周旋，斗争。

最后，我想和大家说一些个人的想法。

我从来不要忘记，我住在为全体美国人民所有的一幢房子里，我受到了他们的委托。

我总努力记住，他们最切身的问题都是人所共有的。我经常与之谈话的人有：来讲讲他们的观点的；有掌管我国大工业和金融机构的；有代表农场主和工人的；也常有并不身居高位但来到这幢房子找我的普通公民。我经常试图看得比白宫的大门远一些，比首都的官场远一些，看到普通家庭男男女女的希望和恐惧。我多次遍游全国。我的朋友，我的敌人，我每天接到的邮件，给我带来关于你们在想些什么和希望什么的报告。我希望做到，不论我职务上牵涉到的斗争和职务所加给我的担子都永远不会一时使我想不到我了解得很清楚的美国人民愿意生活的方式和他们把我安排在这里的明确目的。

在考虑到政府的重大问题时，我努力铭记，归根结底，真正作数的是使一切愿意劳动的男男女女都能有个体面的工作，足以照管自己和自己的家宅和自己的子女；是使农场主、产业工人、小店主、加油站管理人、制造商、大的和小的批发商、银行家都能对自己所作的社会贡献感到自豪；这一切人都能保证得到合理利润和保证自己勤劳所得可以安全地储蓄起来——不只是今天，也不仅是明天，而是他们所能看到的遥远前途。

我可以听到你们无声的惊叹，纳闷在这个多事的世界里我们究竟朝何处走。我不能期望所有的人都理解所有的人的问题；但是了解这些问题乃是我的职责所在。

我总试图记住，调解分歧不可能使一切都满意。因为我并不期望过多，我也就不感失望。然而我知道我必须永远不放弃——我必须永远不放松全体人民的较重大的利益，即使这样做可能一时最便于自己摆脱麻烦。

我认为我们所规划的航线是正确的。我们的目的是建设一个更伟大、更稳定、更有谅解精神的美国。如果现在予以放弃就会错过潮流，甚至错过港口。我提议继续向前航行。我确信你们对我抱有希望，愿意帮助我。因为，要达到港口，我们就必须航行——航行，不是抛锚——航行，不是漂游。

1938年9月29日英国首相张伯伦、法国总理达拉第以及墨索里尼在慕尼黑开会，牺牲捷克斯洛伐克的慕尼黑协定签字生效，希特勒又进了一大步。在这之前，罗斯福担心战争爆发，呼吁欧洲各国友好谈判。他说：“要是爆发战争，每一个交战国肯定都会有数百万男女老幼在无法形容的恐怖情况下丧生。”他还以个人名义给希特勒发了一份急电，强调战争“既不正当，也毫无必要”。

此时欧洲战争已呈一触即发之势。所有的国家都在暗中动员。德国空军司令戈林叫嚣：“每小时可以派1000架轰炸机飞到伦敦上空。”这时后来成为英国首相的丘吉尔还隐居在他的乡间别墅里。被罗斯福纷纷召回的驻欧大使们带回了更多的坏消息：慕尼黑协定纯属骗局，法国领袖腐败无能，法国空军早已过时，陆军也华而不实，法国人民依然歌舞升平，麻木不仁。而德国空军似乎能够扫荡全世界的天空。当时德国的梅塞施米特战斗机创造了时速460英里以上的世界记录，而还没有一架美国战斗机达到过时速325英里。

1938年10月26日，罗斯福发表广播演说，重申美国的信念，反对战祸，他发出一种在大战前夕显得极为脆弱而又珍贵的声音：“越来越明显的是：靠恐惧维系和平并不比靠刀剑维系和平更崇高和更能持久。”

“亲身经历上个月那严重时刻的任何人，都不可能怀疑世界各民族的大多数对于持久和平的渴望。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借助这种和平愿望来建立作为长远和平唯一基础的原则。

越来越明显的是：靠恐惧维系和平并不比靠刀剑维系和平更崇高和更能持久。

不能坚持法治而经常屈服于纯粹武力，就不可能有和平。

蓄意把战争威胁当作国家政策的手段，就不可能有和平。

蓄意把千百万受迫害而毫无办法的人驱赶到世界各地，任其流浪乃至无立锥之地，蓄意把这个当作国家政策的手段，就不可能有和平。

卑贱的人不能自由思想，不能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不能自由崇奉上帝，就不可能有和平。

应该用于社会和经济建设的经济资源被转而用于加剧军备竞赛，只会增加疑虑和恐惧，威胁每一个国家的经济繁荣，因之也就不可能有和平。

在现代历史上，各国政府所担负的责任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明显和这样深远。

我是代表对战争毫无兴趣的合众国讲话。除了同我们的邻邦友好相处，我们别无他求；而且我们认识到全世界今天都是我们的邻邦。

然而，在睦邻的原则里包含着某些基本的相互义务。大家都必须考虑到并且认识到，由于各方面需要的变化而要求作出政治上的变化必须通过和平的手段。

这意味着应当尊重条约的神圣不可侵犯。这意味着必须审慎地避免会制造恐惧和忧虑的政策。这还意味着自我克制，防止咄咄逼人的野心，否则就肯定会滋生不安全感和难以互相忍让，从而削弱

世界如此痛切需要的经济和精神复兴的前景。

你不可能以军国主义为核心建立文明社会，同时又期望人类的命运能为理性所支配。

合众国坚定地致力于裁军已经不只二十一年。

然而我们也曾一贯地指出，我们或任何国家都不会在邻国武装到牙齿的情况下接受裁军。如果没有普遍的裁军，我们自己也必须继续武装。这不是我们喜欢，也不是我们希望采取的步骤。但是，除非普遍放弃可以用于侵略的武器，居安思危的普遍法则和一般常识都要求我们有备而无患。

我们仍然坚持认为，国家之间的军备竞赛是荒谬的，除非有人觊觎新的领土或新的支配权。我认为我们有权要求比口头表示更为重大的保证，比如实际探讨从而导致实际裁军所能提供的那种证明。否则我们就不能解脱掉增加我们陆军和海军常备力量的需要。因为，我们一方面拒绝把武力观念作为长远的需要予以接受，而且抵制把它作为生活的理想，另一方面又必须准备成功地对付施加到我们身上的武力。

我们合众国的人并不谋求把我们生活方式或国内政府形式强加给任何人。但是我们决心为了我们自己而维护并保卫这种生活方式和政府形式。我们还决心克尽一切努力使得西半球可以根据自己相互关联的背景设法在互相联系中求得自救。

我们还要申明我们的信念：不论一个民族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这种选择决不允许以战祸威胁全世界。战祸的影响是限制不住的。战祸会冲开邪念恶毒的闸门而危及文明生活。这个声明不仅适用于西半球，也适用于欧洲、亚洲、非洲和海洋中的岛屿。

让我们为了更进一步团结起来争取世界各国之间的和平而致力于克制、谈判和合作。让我们为了在我国国内相互关系上致力于这些同样的理想，以便一旦考验临头我们可以有统一的意志，它是民主能够战胜敌人的唯一武器。”

1939年3月15日，希特勒撕毁《慕尼黑协定》，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希特勒在漫天大雪中登上雄伟的捷克古堡，俯视着美丽的布拉格。他宣告：“捷克斯洛伐克已不复存在了，它从地图上消失了！”一个月以后，墨索里尼横渡亚德里亚海，占领了山鹰之国阿尔巴尼亚。佛朗哥攻占马德里，国际纵队悲壮地撤退。在东方战场，日军侵占华中华南大都市后，南下占领了南沙群岛，凭此向菲律宾、香港和新加坡进攻。

罗斯福仍然顽强地向欧洲呼唤和平。1939年4月15日，他采取了著名的“星期六突然行动”。他在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急电中列举了31个独立国家的名字，建议这两大独裁者至少在10年里不对其中任何一个国家发动进攻。

墨索里尼收到电报，认为这是“小儿麻痹症的结果”，而戈林的印象是“罗斯福害了初期神经病”。罗斯福的电报直率地提出了使希特勒十分狼狈的问题：

“你们是否愿意作出保证，声明你们的武装部队不会进攻或者侵入下列独立国家的领土？”下面开列了包括波兰、波罗的海沿岸诸国、苏

联、丹麦、荷兰、比利时、法国和英国。罗斯福提醒希特勒“你曾一再声明，你和德国人民并不想再战争。如果这是真的话，世界上就不需要战争了。”

1939年4月28日，希特勒在德国国会发表演说，雄辩滔滔地回答罗斯福极其“天真”的提问。这篇著名演说尖酸刻薄，虚伪狡诈，伴随着德国国会议员们那种歇斯底里的笑声，他们全在嘲笑罗斯福所提的“小儿科”式的问题。演说在全德国电台，在全世界几百家电台上广播。美国各大广播公司也向美洲大陆转播了演说全文。

希特勒先把罗斯福电报中的论点一一列举出来，然后一脸奸笑地予以讥讽和诡辩：“罗斯福先生怎么知道哪一个国家认为自己受到德国政策的威胁，而哪一个国家又认为自己没有受到这种威胁呢？”

“同样，罗斯福先生也没注意到下面的事实：巴勒斯坦目前并不是在德国军队占领下，而是在英国军队占领下，这个国家的自由受到了最残暴的武力手段的压制。”

最后，希特勒拉长声音念罗斯福开具的31个国家名字，保证不侵略时，他故意用一种极其滑稽的拉长语调念诵，引起满堂哄笑。在这种笑声中，他故意漏掉“波兰”的名字。

在希特勒的听众中最著名最重要的莫过于大洋彼岸的罗斯福了。罗斯福自幼曾习德语，他不用翻译就能直接听懂希特勒这个战争狂人对他的嘲笑、讥讽和侮辱。但这也是罗斯福预料之中的结果。他这样做也是为了让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充分表演其丑态，以唤醒美国人民看见迫在家门的战争幽灵。

4个月后，战争的幽灵降临世界。1939年9月1日拂晓4点45分，德国军队突袭波兰。希特勒的“白色方案”命令德军分北、南、西三路进攻华沙。同时德军空军遮满天际的轰炸机群扑向波兰那毫不设防的领空和大地。波兰沦陷。世界军事史或世界屠杀史上增添了由纳粹创造的新词汇“闪电战”。

罗斯福在睡梦中被叫醒，白宫顿时进入战争状态，直到这次大战结束。它彻夜不灭的灯光，象征着罗斯福反对战争的良心和勇气。他马上向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和波兰发出照会：

“对平民的残忍空袭……极大地震惊了人类的良心。

“为此，我紧急呼吁：凡是有可能参与敌对行动的各国政府公开表明他们的决心，在任何情况下决不让自己的武装部队空袭和平居民……我请求立即作出答复。

美国总统  
富兰克林·罗斯福  
1939年9月1日

这时整个欧洲一片混乱。德军突袭波兰第三天，英国首相张伯伦，这个在“慕尼黑协定”中丧失自己政治生命和历史形象，也使欧洲丧失尊严的软弱政治家，向下院发表了沉痛而后悔莫及的演说，宣布英国与德国处于战争状态：“今天是我们大家最感到痛心的日子，但是没有一个人会比我更为痛心。在我担任公职的一生中，我所信仰的一切，我所

为之工作的一切，都已毁于一旦。现在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鞠躬尽瘁，使我们必须付出重大代价的事业取得胜利……我相信，我会活着看到希特勒主义归于毁灭和欧洲重新获得解放的一天。”但这位心地善良的欧洲知识分子注定不能看到这一天，一年多以后，他怀着绝望的心情与世长辞。而此时，纳粹的轰炸机已飞临伦敦上空狂轰滥炸。

9月3日，英法被迫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爆发了。大洋彼岸沉睡的美国人民也被惊醒，众说纷坛。盖洛普民意测验结果82%的人希望英法等盟国胜利，还有2%的人赞同纳粹德国。美国大众仍然存在着唯恐被卷进欧洲战火的心理。此时很少有美国人意识到这将是一场世界大战，他们只是按传统思路感到：这是大洋那边的一场欧洲战争，美国可管可不管。

1939年9月3日，罗斯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发表了关于欧洲战争的“炉边谈话”。他信心十足地向美国人民断言：“只要我力所能及，美国的和平就不会湮灭。”这是罗斯福在二次大战爆发后发表的第一篇关于战争的演说，一开始他表达了对战争终于爆发的极其沮丧的心情，然后坦诚地让美国人民自己根据事实和良知来作出决断：世界和平的平衡格局已被打破，任何地方任何人都不能幸免于外。最后他依旧审慎地强调了美国的中立主义立场。但又非常委婉地补充道：“我不能要求每一个美国人都在思想上也保持中立，甚至中立的人也有权顾及事实，甚至中立的人也不能被要求封闭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良心。”善于倾听总统声音的人，完全可以感到罗斯福那本着“事实和良心”的身姿，正越来越显著、越来越有力地对中立的传统作最后的一击。

“美国同胞们、朋友们：

今天晚上我唯一的任务就是对全体美国人讲话。

一直到今天早晨4点钟，我还抱着一线希望，或许某种奇迹会防止一次破坏性的欧洲战争和结束德国对波兰的入侵。

足足有4年之久，接二连三的实际战争和经常危机震撼着全世界，件件都威胁着要引发今天已经不幸成为事实的巨大冲突。

我理应提醒你们回忆你们的政府在这些危机中为了和平事业而施加合众国全部影响的一贯而有时也有效的努力。尽管战争在蔓延，我认为我们仍有一些权利和一切理由把基本的道德规范，宗教的教义以及恢复和平的持续努力当作国家政策来维护——因为，总有一天，虽然可能是遥远的一天，我们可能对于受到创伤的人类提供甚或更大的帮助。

我还理应指出，最后这些年来的不幸事件都是毫无疑问地基于武力和武力威胁的。甚至在这场大战的爆发伊始，在我看来就很明确，美国的力量应该始终运用在为人类争取到一个会尽可能消除在国家间继续使用武力的最后和平。

当然，预测未来是不可能的。我从全世界的美国代表和其他来源获得川流不息的情报。你们，我国的人民，每个小时都从无线电和报纸得到消息。

我相信你们是此时此刻全世界最有见识和消息最灵通的人。你们受不到新闻检查，而且我还要补充说，你们的政府没有也从没有

想到对你们隐瞒任何情况。

同时，正像我星期五在记者招待会上讲的，报纸和广播极其谨慎地对于实际经过证实的事实和纯粹谣言加以区别是至关重要的。

我还可以补充说，我希望我国人民也将极其慎重地区别新闻和谣言。你们没有必要相信你们听到或读到的一切东西。要先核对一下。

你们必须从一开始就掌握现代国家之间外交关系中的一项简单而不可变更的事实。任何地方和平遭到破坏，一切地方所有国家的和平也就处于危险之中。

你们和我都可以轻易地耸耸肩并且说，发生在距离美国大陆几千英里远，实在也是距离整个美洲半球几千英里远的冲突，并不严重地影响到南北美洲——而合众国可以做的也无非是不加理会，自己干自己的事。尽管感情上我可以向往超然的态度，我们还是不得不认识到，空中传来的每一句话，大洋中航行的每一条船，互相争夺的每一个战役都是会影响到美国的未来的。

我们的男女公民都不要不加思索或言不由衷地谈论美国派兵去欧洲战场。我们此刻正在准备一篇美国中立的宣言。即使我们法典里没有中立法令，我们也会这样去做的，因为这样的宣言是符合国际法和符合美国政策的。

然后，根据现行的中立法案，我们将发布这一宣言。而且我相信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们的中立可以成为真正的中立。

至关重要的是，我国人民，既然在世界上消息最灵通，就应该对事情彻底地想一想。美国和平最危险的敌人莫过于那些对过去、现在和未来整个概况并不全面了解，却装作权威去讲话，该起来尽是光辉的原则，对全国作出对现在和未来都没有多大价值的保证或预言。

我自己不能也不会去预言海外事态的发展——其理由是，由于我必然对于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有个全面了解，我才不敢妄加预言。另外一个原因是，我认为我对于美国人民诚实才算得上是个诚实的人。

我不能预言这场新的战争对我国的直接经济影响，但是，我要说的是，任何美国人在道义上都无权牟取暴利而损害自己的同胞，或者损害在欧洲战争中生死难卜的男人、女人和儿童。

有一些事情是我们确实知道的。我们全国人民的大多数都相信精神的价值。我们大多数不分教派都相信《新约圣经》的精神——它是以反对使用暴力、武力、进军和炸弹为宗旨的伟大教义。我国绝大多数人民群众是要和平的——国内的和平，以及不会危害我国国内和平的那种其他国家的和平。

我们对于国家安全有一定的看法和一定的理想，我们必须行动起来在今天保卫这种安全，并在未来保卫我们孩子们的安全。

我国的安全现在和将来都是同西半球及其邻近海域的安全联系在一起。我们努力不使战争扩大到南北美洲，从而使战争不致蔓延到我们自己的炉边。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援引的历史先例追溯到乔治·华盛顿总统政权的时代，生活在被其他大陆上战争搅得四分



五裂的世界，这对联邦各州里每一个美国家庭已经是够严重和可悲的了。其他大陆上的战争今天影响到每一个美国家庭。尽一切努力使战争不扩大到南北美洲乃是我们民族的责任。

在这个时刻，请允许我提出直率的要求：暂时停止派性和自私；把国家统一的念头作为一切其他想法的基础。

我国将永远是一个中立国，但是我不能要求每一个美国人都在思想上也保持中立。甚至中立的人也有权顾及事实。甚至中立的人也不能被要求封闭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良心。

我说过不只一次而是许多次：我见过战争，我痛恨战争。

我还要一而再地说下去。

我希望合众国将置身于这次战争之外。我相信合众国会置身于这次战争之外。我向你们保证和重新保证：你们政府的一切努力都将以此为其目的。

只要我力所能及，美国的和平就不会湮灭。”

1939年冬天，经过怪诞虚假的“西线无战事”时期后，希特勒进攻北欧，罗斯福更加忧虑美国的安全问题。1940年1月4日，他在对国会的演说中强调了回避现实是多么大的一种危险：

“不介入战争，与佯称战争与己无关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我们必须看到，如果世界上所有小国都丧失独立，这会给我们自己的前途带来什么影响。……我希望，在我们当中，美国鸵鸟会少些；鸵鸟把头埋在沙里是危险的！”

在给支持者的信中，罗斯福更为坦率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审慎的态度：

“这些日子，事情以可怕的速度在发展，我们必须从更广泛的范围来考虑问题。我们要警告美国人民，应该想到欧洲和远东可能出现的最后结局，但又不能吓坏他们，以为他们正在被拖入战争。”

3个月以后，1940年4月9日，德军攻占童话般的小国丹麦，继续进攻挪威。4周后，两线也突起战事，德军轰炸机和坦克上下配合，横穿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马其诺防线形同虚设。法国陆军快速后备部队和英国远征军在比利时和德军一交锋，立刻节节败退，一直退至法国敦刻尔克海滩。德国现代军火工业生产线制造出来的重型坦克、机动火炮、大型运兵卡车和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所组成的猛烈攻势，空前毁灭性的火力，使欧洲和美国目瞪口呆，美国公众虽然尚未直接经受炮火之灾，但他们已感到即使广阔的大西洋也不能保障自己的安全了。祖国已处于危急之中。这时他们才转向在这之前不知多少次向他们苦苦劝告的总统。

1940年5月16日，罗斯福水到渠成地登上国会讲坛，给美国人民讲解了现代国防的新概念。他宣称：“为了维护我们美国的自由，我们不仅随时准备在防务上花费千百万的钱，而且随时准备服兵役，甚至献出

自己的生命。”

至此可以看出，传统的美国中立主义立场已被越来越严峻的国际局势和罗斯福那以全球战略为己任的雄心所摒弃。美国正以其强大的后备力量慢慢逼近二次大战。

“副总统先生、议长先生、参众两院的议员们：

在当前灾难随时可能临头的日子里，瞬息万变而令人震惊的事态发展正迫使一切中立国家根据新的因素去研究自己的防务。现代进攻性战争的蛮力已经释放开来，到处扩散着恐怖。具有难以置信的速度和杀伤性的新的破坏力量已经产生；而掌握这种力量的又是一些凶残鲁莽的人。任何旧式的防御都不是坚强到无需进一步加强，任何进攻都不是未必或不可能发生而可以置之不顾的。

我们应该毫不自欺欺人地检讨一下我们面对着的危险。我们应该毫不自欺欺人地衡量一下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的防务。

美国人民必须完全改变保卫国家的概念，这已是明摆着的现实。

摩托化陆军现在可以每天 200 英里的速度横扫敌区。伞兵可以用飞机大量空降到敌后。军队可以空运到旷野、宽阔的公路和当地的民用机场。

我们已经见到背信弃义地使用‘第五纵队’，名为和平的游客，实是敌人占领军的一部分。

作为现代战争的一种新技术，闪电攻击可以破坏后方几百英里的飞机工厂和军火工厂。”

“请允许我分析一下。在帆船可以以每小时 5 英里的速度运行时，大西洋和太平洋曾经是相当可靠的防御屏障。甚至在那个时代，敌手也曾在实际上有可能通过突然袭击焚烧过我们的国会大厦。后来，蒸汽发动的舰队和护航船队在大洋中每小时航行 15 或 20 英里时，两大洋也还曾有助于我们的防务。

但是，航空这一新的因素使得可能进攻的速度提高到每小时 200 乃至 300 英里。

此外，航空带来了一种新的可能，可以使用较近的基地对美洲大陆发动攻击。从格陵兰的峡湾飞行 4 个小时就可以到达纽芬兰；5 个小时就可以到达新斯科舍、新不伦瑞克和魁北克省；到新英格兰也只要 6 个小时。

亚速尔群岛距离我们东边海岸的一些地方只有 2000 英里，而如果百慕大陷入敌手，现代轰炸机到达我国海岸就用不了 3 个小时。

从西印度群岛外缘的一个基地，到达佛罗里达沿海只需要 200 分钟。

非洲西海岸的外岛距离巴西只有 1500 英里。从佛得角群岛起飞的现代飞机可以在 7 小时内飞临巴西。”

“现在我要求国会立即为了 4 个基本目的拨出巨额款项：

第一，为了使更为强大和完全满足的陆军采购各种必要的装备；

第二，为了以最新式武器装备替换和更新一切旧有的海陆军装

备；

第三，为了扩大陆海军保卫国防所需一切相关的生产设施。因为，很明显，我们需要迅速提供更多物资的能力；

第四，为了把现有的一切陆海军订货合同和一切新订的合同都加速到 24 小时连续生产的基础上。

我要求立即拨款 8.96 亿美元。还请允许我表示定将得到迅速拨款的希望。”

“我也祈祷和平——祈祷从地球上除却侵略和用武力的方式——然而，我决心实事求是地面对现实：认识到我国还需要精神和体力上的强健。我坚信，在这些素质上，美国人民是并不低下的。

我们的任务是明白的。我们必须走的道路是清楚规定了的。我们的防务必须是无懈可击的，我们的安全必须是万无一失的。然而，像昨天那样，或者甚至像今天这样的防务，并不能够在今后可能的事态发展和危险中保障安全。”

“自由的人民，忠于自己建立的制度，愿意保卫大家都珍视的生活方式，崇奉上帝的人民，就应该具有这些特征。”

在这次演说中，罗斯福还要求造 5 万架飞机，并提出了一个年产 5 万架飞机的计划。这个庞大的数字甚至超过了纳粹空军司令戈林最吹牛时夸下的海口。人们顿时震惊，旋即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共和党和民主党人都共同为总统的豪气和伟大远见所打动，心悦诚服。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马丁议员爽快地说：“我们拥护这个方案。”

在随后几个月里，国会超出罗斯福的要求共拨出 17 亿美元来加强国防力量。欧洲局势越发糟糕，坏消息频传：德国人虽没有直接进攻巴黎，但纳粹将军隆美尔的装甲师迂回包抄，法国最精锐的几个师和英国远征军全部落入陷阱。英国只剩下一个旅的装备是好的，大炮已荡然无存。如果德军能渡过英吉利海峡，只需一个装甲师就可扫平英国。只有英国人创造的敦刻尔克大撤退还稍稍使人感到一丝欣慰：90% 的英国远征军和部分法军撤回了英国本土，虽然武器和装备丢弃殆尽。罗斯福想运送武器给英法，但国内的阻力仍很大。法国已一败涂地，英国危在旦夕。

而这时罗斯福第二届总统任期将满，他是否继续竞选，对美国人民来说是一个迫切的问题。他本人极感疲倦，想从 8 年的总统生涯中退出来，去过安逸舒适的乡绅生活，撰写回忆录，担任《科里尔》杂志特约撰稿人，年酬金 7.5 万美元，相当于总统年薪。

但为了巩固新政的成就，为了继续关心占全国 1/3 人口的那些“住得差，穿得差，吃得差的”人，特别是为了抵抗希特勒这个疯狂侵略的战争贩子，他决定打破传统，争取三连任。自华盛顿以来，总统不得连任三届已成了不成文的法规。

罗斯福向本党主席法利解释为什么他撤消以前表示的不争取第三个任期的打算。“要是那样做，我就不能在我国设法应付在欧洲蔓延严重灾情的时刻，有效地领导全国人民。”罗斯福最后在本党以压倒多数获得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他的提名应该说非常富于说服力，他正式向本党代表解释了他为什么认为有必要违背不准连任三届总统的悠久传统：

“在许多不眠之夜，我曾经反问过自己，作为海陆军总司令，我是否有权号召男男女女为国效劳，或者接受训练准备为国效劳，而同时我却不肯以自己个人的地位为国效劳，如果我国人民请求我这样做的话。

如今，由于一种压倒一切的国际危险，所有的私人计划，所有的私人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都已经被置之度外。在国家面临危险的情况下，所有能够为共和国效劳的人都没有别的抉择，只能为国尽力而为。

我为自己作过计划，为私人生活作过计划，但是我的良心不允许我拒绝要我为国效劳的请求。”

罗斯福的竞选对手是共和党提出的总统候选人威尔基。威尔基势力雄厚，能言善辩，来自印第安纳州，是一个巨大的公用事业公司的巨头，在华尔街深受尊敬。威尔基竞选速度惊人，率先在全国各地巡回演说，旅行了3万英里。根据美国人怕打仗的心理，攻击罗斯福的对外政策。

但罗斯福采取的竞选策略是后发制人。他利用在任总统的位置，有条不紊地行使权力和职责，使竞争对手的空谈空喊黯然失色。这时即将爆发的不列颠战役吸引了罗斯福的大部分精力。英国本土正饱受德机轰炸，德国潜艇包围了三岛，而丘吉尔的弹药武器库空空如也。早在5月15日，丘吉尔就致电总统要求借用美国的旧驱逐舰50艘，但那时美国国内孤立主义势力正旺，罗斯福没有应允。7月份，丘吉尔又提建议，用英国的8个空军基地和海军基地的99年使用权来租借美国的50艘驱逐舰。条件变得似乎可以使美国公众接受了。9月2日，罗斯福以非凡的勇气下令实施这项租借方案，丘吉尔笑逐颜开。罗斯福反驳国会的反对派说：“哪怕再推迟一天，都可能意味着文明的毁灭。援助古老的英国就是保卫年轻的美国。”使罗斯福感到十分欣慰的是，此举甚至得到陆军部长史汀生和海军部长诺克斯这两位反对党元老的支持。

临近大选，罗斯福才开始巡回旅行演说，此时美国舆论已发生很大变化，他的调子也逐步提高。1940年10月12日的一次演说中，他宣称：

“我们的方针是明确的，我们的决心已经下定。我们将继续增强我们的防务和军备。我们将继续援助那些抵抗侵略的人们，继续援助现在离我们海岸很远的地方抑制侵略的人们。”

罗斯福竞选旅行走遍了所有的工业州。他的演说主要讲了三大问题：第一，1940年对美国男女劳动人民假装慈悲的共和党人，在1932年却愿意让他们忍饥挨饿。第二，现政府在重新武装美国方面正在取得进展，同共和党人的说法相反。第三，共和党人在这国际局势烽烟四起的年代却反对加强美国防务的一切努力，同时任凭欧洲人民遭受法西斯蹂躏，见死不救。

罗斯福这次竞选中最激动人心的演说，则是1940年11月2日在俄亥俄州东北部港口城市克利夫兰发表的《美国的未来》。克利夫兰也是罗斯福这次竞选旅行的最西端城市。这篇被誉为罗斯福一生中“最雄辩、最动人”的演说，面对二次大战越燃越烈的烽火和国内还在负隅顽抗的

孤立主义势力，他冷静地阐述了美国的外交政策，描绘了“新政”的成就，展望了美国的未来，并恰如其分，委婉有效地向普通美国人民表达了自己争取三连任的愿望。这篇演说使人们感到，罗斯福仍然是美国气势磅礴，当之无愧的精神领袖。只有这样的人才能领导美国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实现美国辉煌的未来。

“主席先生、女士们、先生们：

今晚，我很高兴能在克利夫兰通过这么多听众和老朋友，向美国人民传递一个信息。

在过去7年里，我有幸担任了美国人民的领袖——这是一份崇高的荣誉，也是一种庄严的职责。7年来，美国人民已经走出萧条和失望的荒原，踏上了前进的坦途。

他们阔步前进，一直来到了未来的门槛——我们的希望将要成真，真正的自由、繁荣与和平将要实现。

我想把这一前进势头再保持4年。为此，我请大家投我的信任票。

我们这一代美国人生逢历史重要时刻。

由于国际风云的激荡，我们中间有少数人提出了一个疑问：这是否是所说的故事的结尾？现在是否该合上这本叫作民主的书，把它放到时间老人积满灰尘的书架上？

我的回答是：我们所知道的民主的一切优点——它的自由、它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所带来的效率、它为满足普通人的愿望所具备的能力——所有这一切，只是为一个更伟大、更辉煌的未来写下了序篇。

我们这些当代美国人——全体美国人——都是这本生气勃勃的民主巨著中的人物。

然而我们也是这本书的作者。现在，未来的篇章究竟讲述倒退，还是讲述继续前进，就要看我们说什么了。

我相信美国人民会说：‘向前进！’我们看看今天的欧洲旧大陆。那是一片丑恶的大陆，仇恨、贪婪和恐惧已毒害了那片大陆。我们可以看到，战争这剂毒药已经如何造成了无可挽回的后果。

我们看看自己居住的国家。这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一代又一代热爱和平的、待人友好的男男女女建设了她。他们心中怀着一个信念：凡努力工作者，就一定能过上美好的生活。

我们知道，我们决心保卫自己的国家，并决心与邻邦一起保卫本半球。我们的国防无比坚强。我们的国力与日俱增。

我们的外交方针是要在对外交往中表达我国政府的决心和我国人民的意志。在过去几年，对外交往已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困难、更加复杂。

我们的外交方针没有任何秘密可言——对美国人民不是秘密，对世界各国政府也不是秘密。过去，我已多次不但用语言，而且用行动说明了这个方针。今天，让我这样来重申：我国外交方针的首要目标是把我国置于战争之外。与此同时，我们力求把外国政府的概念拒于国门之外。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自强，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召集全国的后备队。

第二，我们的目标是尽可能使战争远离整个西半球海岸。我国的方针是要增进与拉丁美洲各共和国与加拿大的友好关系，使欧洲和亚洲列强知道。它们不可能在我们这个半球挑拨离间。如果大家从北到南走一走，就会知道这一方针已取得实际成功。

最后，我国的方针是尽可能从物质上援助大西洋彼岸和太平洋彼岸仍在抵抗侵略的国家。

让我毫不含糊地声明，我们不想犯绥靖主义的致命错误。

因为美国人民决心要为自己维护言论自由的权利，宗教自由的权利，集会自由的权利，以及构成所有这些权利基础的、通过自由选举来选择政府官员的权利。

我们要维护自由——通过反击外部进犯和打击内部腐败来捍卫自由。我们将反对各种独裁势力，不管它们披上什么伪装和画皮。

但是，我们已经懂得，单有自由是不够的。

言论自由对一个无话可说的人毫无用处。

信仰自由对一个失去信仰的人毫无用处。

民主必须能为公民提供自由，又能为公民提供机会，这样的民主才是有活力的。

我们这一代人在过去几年里已经看到，这种能动的民主制在美国获得了新生。

美国人民已经勇敢地面对我国近代以来最严峻的问题。

新政是你们——美国人民的创造。

你们为我国找不到工作的自由人提供了工作。

闲散人员获得了机会，或修筑公路，或建设民宅，或治理河流，或为农场、家庭和工业提供劳动力。

你们运用政府的力量，使我国的土地不再荒芜，农作物价格不再下降，使众多家庭和农场保住了抵押品赎回权。

你们使工人的集体谈判权成为法律，并建立了执行那种权利的机构。

你们注意到了青少年和老年问题。你们从工厂和商店带回了孩子，宣布任何人无权剥削童工的劳动；你们给了这些孩子机会，让他们从身体和思想上作好准备，迎接更完善、更光辉的未来。你们为这片国土上的青年人提供了工作和受教育的机会。你们为老年人提供了安全和休闲。

在我国民主向前迈进的那些年里，本政府同你们一起工作，为你们而工作。政府有时会遇到障碍。但是，在全体人民的支持和提议下，我们一如既往地重新向前迈进。

现在，有些人要求我们在跑道上停下脚步，要求我们向后转，回到我们走过的荒原。

我们当然不会倒退。我们之所以不后退，因为我们是开拓、探索、实验和冒险传统的继承人。我们不会被怀疑民主的人吓倒，我们不会后撤。

我们当然继续加强我国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生气勃勃的改革，

并且使民主与发展现代工业生产并驾齐驱。

我们当然将继续利用科学技术天才们创造出来的良好条件——不是给少数人享受，而是为了全体美国人的福利。

因为通向坚强的民主制之路就在这里。

我们当然要保护并改善国土，包括土壤、森林、河流，以及上帝赐予合众国人民的一切资源。

我们当然要通过民主教育和实施健康计划，继续增进我国人民的体质和精神素质。

因为通向坚强的民主制之路就在这里。

我们当然要继续努力保护企业和财产的私有制，使其免遭金融垄断的破坏。

我们当然将继续努力，防止经济专制和政治专制。

我们当然要继续加强我国的道德建设——不是要盲从某些领袖，而是要对美国及其民主赖以诞生的、根深蒂固的道德原则充满信心。

因为通向坚强的民主制之路就在这里。

我国的进步和防务都要求团结一致。我们需要每一个美国人给予合作，包括工人、工厂的伟大的组织者和技师、农民、专业人员，包括所有的母亲、父亲和青年，总之，包括所有热爱美国稍微胜过热爱自己的人。

如果得到所有这些人的帮助，我们就可以保证：这样一个计划能够使我国蒸蒸日上，自由而坚强，能够使我国成为世界的明灯和各国人民的慰藉。

一切邪恶势力都不能压倒我们。

我们这一代美国人肩负着使命，那就是向全世界指出一条通向未来之路。我们祈望所有热爱自由的人——这个世界上所有受苦受难、我们寻求为之照亮道路的普通人——都能加入我们的行列。

我看到这样一个美国，那里的工人不会在风华正茂时被一脚踢开，那里的人们不会世代受穷，那里的穷苦农民不会变成无家可归的流浪汉，那里的青年不会在垄断的淫威下乞讨工作。

我看到这样一个美国，她的江河、盆地和湖泊，她的山脉、溪流和平原，她的高山和地下自然资源，都作为全体人民的合法财产而受到保护。

我看到这样一个美国，那里的小企业真正有机会发展壮大。

我看到这样一个美国，那里的全体人民有极好的文化教育机会。

我看到这样一个美国，那里的农业收入将受到重视和保护，政府决心保证农民在国民收入中享有公平的份额；贸易和私营企业将继续运转，为国家生产货物；任何企业都不因受制于严厉的垄断而停止发展；全国每一个企业主，不论大小，都可经营合法企业而得到公平的回报，获得合理的利润。

我看到这样一个美国，那里的劳工界太平无恙。工人真正获得了自由，并且——通过不受外力控制或内部独裁者控制的强大工会——能与企业主和经理一起，在会议桌旁占有合适的一席之地。由

于自身的力量 and 法律的保障，他们的尊严和安全得到了保证。进入暮年之人能够安度余生，养老金和保险金将理所当然地颁发给这些为国为家忙碌了一生的人。

我看到这样一个美国，她为自由事业而献身，她因宽容和宗教信仰而团结一致，她的人民愿为和平作出奉献，他们因身心都已获得安全和无所畏惧，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信心。

在这些年里，当我们的民主在很多战场上向前推进之时，我有此殊荣担任你们的总统。人生最大的愿望莫过于此。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一项需要日夜操劳的任务。

完成任务之余，有两个最重要的想法一直在我的脑海中翻腾：一是在我们的国土上维持和平，二是为我国普通人的利益让民主力量发挥作用。

目前，一场特大风暴正在来临，它将使世界事务变得更加艰难。那场风暴虽然不是起源于我们这片土地，却是我想继续与人民休戚与共，直到我们抵达前方明确而稳固的立足之地的真正原因。

我们会成功的——在下一个 4 年任期结束前会成功的。

我们会成功的；我们希望世界也会成功的。

到那个任期结束时，将会产生另外一位总统，以后还会有很多位总统。我想，在将来，“总统”将成为一个鼓舞世界各地普通人的词。

我国的未来属于我们美国人。

未来要由我们设计，要由我们建设。

我们在建设那个未来时将证明，我们曾以无比坚强的信念，战胜过历史上最令人恐惧的风暴。

我们在未来的岁月里将创造历史——为未来勾画新的轮廓。我们将确保这个未来是自由的未来。

我国的心愿将永远是普通人的心愿——他们从未放弃对民主的信仰，从未放弃对家庭、家乡和祖国的热爱。

普通人的精神就是和平的精神和良好的心愿。这是上帝的精神。而相信上帝，就是全美国的力量所在。”

罗斯福这篇演说洋溢着美国大地所固有的那种宽广雄伟的诗情，使人联想到它仿佛是美国 19 世纪大诗人惠特曼献给美国大地和美国人的一篇诗。

竞选结果：罗斯福获胜。他在 30 个州获胜，获选举团票 449 张。威尔基在 10 个州获胜，获选举团票 82 张。在选民直接投票中，罗斯福领先 500 余万张。在胜利之夜，罗斯福在海德公园老家对朋友们说：“我们似乎防止了一场暴动。”这种暴动就是传统的孤立主义和使欧洲陷入战争的绥靖主义的暴动。

罗斯福 1940 年大选胜利，打破了美国开国 100 多年的政治传统，成了二次大战期间一次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进程。许多历史学家不能想象，如果罗斯福这次落选，二次大战的结果将会是怎样。如果说罗斯福在这之前的政绩是通过“新政”挽救了美国的资本主义，那么在这之后，“新政”将退居二线，挽救世界和平这项更为重大的使命历史地落在了罗斯



福的轮椅上。

1940年12月17日，罗斯福利用白宫的记者招待会，向美国人民用浇花园的水管做比喻，形象地说明“租借法案”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新闻，除了可能有一件事我觉得值得我来谈一谈。当然，在当前的世界情势下，绝大多数美国人在思想上都绝对不怀疑，合众国眼前最有效的防御就是大不列颠成功地保卫它自己；因此，除开对于整个世界的民主的存在我们从来都很关切，当前仍然关切以外，同样重要的是，从美国防御的自私观点，我们也应该尽力帮助大英帝国保卫它自己。”

接着罗斯福列举了几种可能帮助英国的方式：或接受英国的订单，或借钱给英国，或者奉送给英国飞机大炮。他对这些办法的评价是“多少有点陈腐。”在此基础上，他推出了他的“租借法”，核心是不涉及美元的交割：

“我可以这么说，合众国有可能接过来英国的订货，然后，因为它们在本质上就是我们自己使用的同一类军火，我们就把它们转化成美国的订货。我们有足够的钱这么做。以后，如果军事活动决定其中某一部分运到那边是应该的和适当的，我们就把这些物资借给或卖给——可以要求抵押——那边的人民。当然这仍然需要符合那条基本的原理，就是说，对保卫大不列颠最有利的也就是对保卫合众国最有利的，因而在大不列颠使用这些物资比把它们封存在这里要更有利于保卫合众国。

我现在的打算是取消这个美元招牌。我想，在这间房子里几乎所有的人思想里，这都是件崭新的事物——取消那个无聊的、愚蠢的美元旧招牌。

好，我来给大家打个比方：假设我的邻人的家宅着了火，而在四五百英尺以外我有一截浇园用的水管子。如果他能够把我的浇园水管接到他的自来水龙头上，我就可能帮助他灭掉火。那么，我怎么做呢？我不会先对他说，‘邻居，我的浇园水管是15美元买的；你得付给我15美元来买它。’这个事情怎么处理？我不想要15美元——我想在灭火后要回浇园水管。好！如果经过灭火的过程，这段水管完好如初，毫未损伤，邻人就把它还给我，对我十分感谢。但是，假设它给搞坏了——搞了些窟窿；我们也无需走许多形式，而我就对他说，‘我很高兴借给你这个水管子；现在它不能再使用了，它给搞坏了。’他说，‘一共多少英尺？’我告诉他，‘有150英尺。’他说，‘好，我来照赔。’现在，如果我拿回的是一根可用的浇园水管，我就不吃亏。

换句话说，如果你借出一定数量的军火，在战后得到归还，如果这军火是完好如初的——没有损坏——你就不吃亏；如果它们损坏了，或者陈旧了，或者完全丢掉了，而如果你借给的人照样赔上，在我看来，你就没有吃亏。

我不能谈细节；提出怎样去做的法律问题也没有用，因为这恰

恰是正在研究的问题；然而现在的想法是，对于将来的英国订货，我们并不去全接过来，而只是其中相当大的数量；在它们生产出来以后，不管是飞机还是枪炮还是其他什么东西，我们就作出某种安排，根据这样做会最有利于美国防御的理由，让英国人去使用，同时取得谅解，同意在这出戏演完以后，我们有朝一日将得到实物的偿还，从而可以省去一笔美元欠款形式上的美元招牌，代之以实物偿还的绅士义务。我想大家是都听懂了的。”

罗斯福的这个创意对正在浴血奋战中的英国无异于雪中送炭。后经国会通过并拨款 70 亿美元供其实施的《租借法案》，有力地保障了战时的英、法等盟国的军火和物资供给。1941 年 6 月 22 日德国进攻苏联，一天以后，罗斯福即宣布援苏，根据该法案批准给苏联 10 亿美元贷款。到二战结束时，美国根据《租借法案》向盟国提供了价值大约 500 亿美元的货物和劳务。

其实自 9 月份以来，德国人就开始了伦敦的大规模空袭，白昼的轰炸遭英国皇家空军奋力抵抗后，德军转为夜间空袭，平民的死亡数目激增。这样的空袭在军事上往往是进攻本上的序幕。罗斯福日益为英伦三岛的存亡绞尽脑汁。作为美国著名海军将领、海权论大师马汉的学生，罗斯福深知一旦英国沦陷，美国本土几千英里海岸线即面临敌对性的海洋，唇亡齿寒。他认为，英国这一欧洲最后的民主堡垒如果抵挡不住纳粹的无情进攻，那么欧洲和全世界的自由将痛告地毁灭沦亡。

1940 年 12 月 29 日罗斯福在白宫“炉边”向全国发表演说，更进一步地号召美国人民“不能姑息残忍的行为，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制度的伟大兵工厂”。比起一年前总统还在为废除武器禁运条款而苦战，此时提出如此鲜明的口号，这是相当不容易的进展。总统首先唤起美国人的历史感，眼前的战争对美国的子孙后代都命运攸关：

“朋友们：

这不是一次关于战争的‘炉边谈话’。这是关于国家安全的讲话；因为你们总统整个目标的核心，就是现在使你们，以后使你们的儿女，再后使你们的孙辈，不卷入为了保存美国独立以及美国独立对你们、对我、对我们家属所具有的一切涵义而进行的一场最后战争。”

接着罗斯福回顾了 8 年前那场美国的经济危机，并将眼前的新危机与之对比：

“今天晚上，在美国面临这一新的危机时，我还是要对广大的美国人民群众说明这次危机对于他们的日常生活意味着什么。

对于 1933 年的问题，我们应付得很有勇气，很为现实。

面对这次新的危机——对于我国安全这一新的威胁——我们也要有勇气，也要从现实出发。”

罗斯福随后列举了纳粹对美国的敌视态度，以及世界上正在苦苦与

纳粹奋战的民族：

“仅仅在三个星期以前，他们的领袖才刚说过：‘现在有两个互相敌对的世界。’接着，他又对同他对抗的方面挑战地说：‘别的人说得对：同这个世界，我们是永远也不能调和的。……我可以打败世界上任何其他强国。’这就是纳粹领袖说的。

换句话说，轴心国不光是承认，而且宣称，在他们的政治哲学和我们的政治哲学之间，不可能有最后的和平。

由于这一无可否认的威胁的性质，我们可以有理由明确断言：合众国没有权利，也没有理由，鼓励谈论和平，除非有一天侵略国一方清楚地表明打算放弃支配或征服世界的一切想法。

此刻，联合起来反对一切自由民族的那些国家的军队仍然被阻于我国海疆之外。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在被英国人、以及希腊人和能够逃离被征服国家的成千上万的陆海军官兵，阻挡在大西洋的彼岸。在亚洲，中华民族进行的另一场伟大防御战争则在拖住日本人。在太平洋有我们的舰队。”

罗斯福接着谈到英国如果沦陷后的恶果以及现代轰炸机那毁灭性的速度，要求美国正视现实，不能逃避：

“如果英国倒下去，轴心国家就会控制欧、亚、非和澳大利亚等各大洲以及各大洋——他们也就处于可以使用巨大陆海军力量进攻本半球的地位。到那时候，在整个美洲，我们所有的人就将生活在枪口的威胁下——装有军事上以及经济上爆炸性子弹的枪口威胁下——这并不是什么危言耸听。

我们就会走进一个新的可怕的时期，整个世界，包括我们这个半球，都将屈从于野蛮武力的威胁之下。要在那样一个世界上求生存，我们就将不得不把自己永远转化成建筑在战争经济基础上的军国主义国家。

我们有些人乐意相信，即使大不列颠陷落，我们仍会是安全的，因为我们有辽阔的大西洋和太平洋。

但是，这些大洋已经不像快速帆船的时代那样宽广。在非洲和巴西之间，有一处距离比从华盛顿到科罗拉多州的丹佛还近——最新式轰炸机只需 5 小时的飞行。而在太平洋的北端，美洲和亚洲几乎是相互接近的。

就是在今天，我们也有从英伦三岛飞来新英格兰再飞回而不需要加油的飞机。而且，要记住，现代轰炸机的飞行距离还在不断增加。”

“坦白而肯定地说，前途是存在危险的——我们必须加以防范的危险。然而，我们知道得很清楚，爬到床底下用被单蒙上头，并不能使我们逃避开危险或对危险的恐惧。

欧洲有些国家同德国缔结了庄严的互不侵犯协定。另外的国家被德国保证永远不必担心入侵。不管有没有互不侵犯协定，事实仍然是它们遭受了进攻和蹂躏，陷入了现代形式的奴役，事先一个小

时才得到警告，乃至毫无警告。前几天这一类国家的一位流亡领导人对我说：“这种警告不如没有。德国军队在 100 处涌进我国以后的两个小时，我的政府才接到警告。

这些国家的命运告诉我们，生活在纳粹的枪口下意味着什么。”

“过去两年的经验已经无可怀疑地证明，任何国家都不能够姑息纳粹。任何人都不能靠抚摸来把老虎驯服成小猫。不能姑息残忍的行为。对于燃烧弹是不能讲道理的。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只有以彻底投降为代价才能同纳粹有和平。”

接下来罗斯福开始推出“兵工厂”这个主题。这时他还向美国人民许诺将不会派军队去远征欧洲：

“正在捍卫自己的欧洲人民并不是要求我们代替他们作战。他们要求于我们的是战争工具，飞机、坦克、枪炮、运输舰，使他们能够为了自己的自由和我们的安全而战斗。强调地说，我们必须尽快把足够数量的这些武器给他们送去，才能使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们避免别人不得不忍受的战争悲痛和苦难。

不要让失败主义者对我们讲已经太晚了。永远也不会更早了。明天就会比今天更晚。

某些事实是不言自明的。

从军事意义上讲，大不列颠和大英帝国今天是抵抗对世界征服的先锋。他们进行的战斗将在人类英勇事迹的史话中永远流传。

并没有人要求我们美国派遣远征军出国。美国政府里也没有人打算派遣这样一支军队。因此，你们可以把关于派军队去欧洲的任何说法都作为蓄意的造谣而予以揭穿。

我们的国家政策并不是致力于战争的。我们国家政策的唯一目的是使我们国家和人民免于战争。

民主制度反对征服世界的斗争正在很大程度上得助于，而且必须在更大的程度上得助于合众国的重新装备以及我们把尽可能转让的每一英两、每一吨的军火和物资运去帮助前线的抵抗战士。瑞典、俄国和其他靠近德国的国家，每天都在把钢材、矿石、汽车和其他战争物资运进德国，我们这样做也并不是更不守中立。

我们正以最大的紧迫感计划着我们的防御；而在我们自己防御的巨大规模里，我们必须把英国和其他抵抗侵略的自由国家的战争需要包括进去。”

随后，罗斯福赞扬了美国现代工业生产能力，呼吁美国人——工厂老板、经理、工人们为战争全力生产：

“美国工业的创造能力，在解决生产问题是举世无比的，已经应邀把自己的资源和才干付诸行动。制造钟表、农具、活字印刷机、现金结算法、汽车、缝纫机、割草机和机车的制造厂，现在在制造雷管、炸弹装运板条箱、望远镜架、炮弹、手枪和坦克。

然而，我们当前的一切努力都还不够。我们必须有更多的舰艇、

更多的枪炮、更多的飞机——更多的一切东西。要做到这一点，只有我们放弃‘照常营业’的概念。光靠着在现有生产设施上添加额外的国防需要，这个任务是完不成的。”

“我呼吁工厂的老板——经理——工人们——我们自己政府的职员们——都急速地、毫不吝惜地把每一分力量投入生产这些军火上。在呼吁的同时，我向大家保证，作为你们政府官员的我们全体都将像你们一样全心全意地献身于未来的这项伟大任务。”

最后，罗斯福推出了他的号召，并且坚信盟国必胜：

“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制度的伟大兵工厂。对我们来讲，这是同战争本身一样严重的紧急情况。我们必须以同样的决心、同样的紧迫感、同样的爱国主义和牺牲精神来致力于我们的任务，就好像我们处在战争中会表现的那样。

我们已经向英国人提供了巨大的支援，将来还将提供远为更多的物质支援。

在我们援助大不列颠的决心上是不会出现任何‘狭路’的。任何独裁者，任何一些独裁者联合起来，要用他们怎样看待这种决心来威胁，都不会减弱这种决心。

英国人已经从英勇的希腊陆军和一切流亡政府的部队得到了宝贵的军事支援。他们的力量正在壮大。这是把自由看得比生命更宝贵的男人和女人的力量。

我相信轴心国家打不赢这场战争。我是根据最新和最可靠的情报才有这种信心的。

我们对于失败主义找不出任何辩护的理由。我们却有一切有力的理由抱有希望——对和平的希望，对保卫我们文明和将来建设更美好的文明的希望。

我深信美国人民现在有决心为了应付对我们民主信仰的威胁，会比做出更加了不起的努力来增产一切防务工具。

作为合众国的总统，我号召做出这种全国性的努力。我以我们热爱和引以为荣、为之服务而感到光荣自豪的国家的名义发出这个号召。我带着对我们共同事业必将大胜的绝对信心向我们的人民发出这个号召。”

此时美国的整个国内生产态势也确实开始向“兵工厂”过渡。随着大量军火生产按空前的规模进行着，“新政”的许多老难题，比如工厂开工不足、就业机会不理想等都迎刃而解。罗斯福的工作重点也转移到国际事务上去了。

罗斯福不愧是西方政治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对全国人民谈过他要使美国成为“民主制度伟大的兵工厂”后，1941年1月6日又高屋建瓴地对国会发表演说，以行动纲领的高度描绘了美国民主政治或美国理想的蓝图，这种理想以人类的四大基本自由为基础：

“参议院议长、众议院议长、第77届国会的各位议员：

我向第77届国会各位议员提出这个咨文是在联邦历史上空前未有过的一个时刻。我使用‘空前未有’这个词，因为在以前任何时候美国的安全也没有像今天这样严重地受到外来的威胁。”

“每一个现实主义者都知道，民主的生活方式此刻正在全世界各地遭受直接的攻击——或者为武装所攻击，或者由那些企图在仍然处于和平的国家里破坏团结和制造分裂的人秘密散布恶毒宣传所攻击。

在16个月的漫长时间里，这种攻击已经在多得令人吃惊的大小小独立国家里消灭掉整个民主生活的格局。这些攻击者还在进军，威胁着其他的大小国家。

因此，作为各位的总统，执行着‘向国会通报国情’的宪法义务，我觉得虽不愉快但有必要向各位说明，我们国家和我们民主制度的未来和安全现在是同远在我们边界之外的事态无法避免地纠缠在一起的。

保卫民主生活的武装斗争正在四大洲英勇地进行着。如果这场保卫战遭受失败，欧、亚、非和澳大利亚的全部居民和一切资源就将为外来征服者所控制。我们不要忘记，这四大洲的居民和资源大大超过整个西半球的居民和资源的总量——超过许多倍。

在这样的时代，任何人吹嘘什么毫无准备的美国，一只手绑在背后，单用一只手也能够抵挡全世界，这是幼稚——附带说来，也是不真实的。

任何现实主义的美国人都不能期望，按照独裁者意旨所取得的和平会导致国际间慷慨地相互对待，或者真正恢复独立，或者世界裁军、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乃至有好生意可做。

这样的和平不会给我们或别人带来安宁。‘放弃基本自由来换取一点暂时平安的人，既不配享受自由，也不配享受平安。’

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可以由于我们心慈手软而感到骄傲；但是我们却不能任人摆布。

对于大吹大擂地宣讲‘绥靖主义’的人，我们一定要经常保持警惕。

对于肯于剪短美国雄鹰的双翼来铺垫自己安乐窝的一小撮自私的人，我们尤其一定要提防。

我最近曾经指出，现代战争的节奏很快就可以使我们本土遭到有形的进攻，而如果独裁国家打赢这场战争，这种进攻是迟早一定会发生的。”

“当然，在这个时候，我们任何人都不能停止考虑作为今日世界一个至高要素——社会革命的——根本原因的那些社会和经济问题。

因为，一个健全和强大民主国家的基础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我们人民要求于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基本东西是简单明了的。它们就是：

青年人和其他人的机会均等。

能工作的人要有工作。

需要安宁的人得到安宁。

结束少数人的特权。

保卫大家的公民自由权。

在更普遍的、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中享受科学进步的果实。”

“在我们力图保持安宁的今后的日子里，我们盼望有一个建立在四项人类基本自由的世界。

第一是言论和发表意见的自由——遍及世界各地。

第二是每个人以自己的方式崇奉上帝的自由——遍及世界各地。

第三是不虞匮乏的自由——从全世界角度来谈，这就意味着可以使每个国家保证其居民过上健康的和平时期生活的经济谅解——遍及世界各地。

第四是不虞恐惧的自由——从全世界角度来谈，这就意味着世界范围的裁军，并使之如此全面和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任何国家都不会处于能对别国采取有形侵略行为的地位——遍及世界各地。

这并不是对于遥远的大同世界的幻想。这是在我们自己一代人的时代就能实现的一个世界的具体基础。这一个世界恰恰是专制主义的所谓新秩序的对立面，独裁者们正在企图在炸弹爆炸声中创造那个新秩序。

针对那个新秩序，我们提出了一个更宏伟的概念——精神秩序。好的社会是能够面对统治世界的阴谋和外来的革命而全都无所畏惧的。

自从我们美国有史以来，我们一直在从事变革——不断的和平革命——默默地适应变化着的条件。稳步前进的革命——不需要集中营或者沟里的生石灰。我们寻求的世界秩序是自由国家的合作，在友好文明的社会中合作。

我国把自己命运交托给自己千百万男女自由人的双手里、头脑里和心灵里；把自己信念寄托在上帝指引下的自由上。

对于这个崇高思想，其结果只能是胜利。”

两天以后，1941年9月4日上午，美国驱逐舰“格里尔号”在白昼驶往冰岛途中被一艘德国潜艇攻击。“格里尔号”悬挂着美国国旗，运送着美国邮件，当时正行驶在美国已经宣布为自卫水域区内。几个月以前一艘悬挂着美国国旗的商船“罗宾·穆尔号”，被纳粹潜艇击沉在南大西洋中部。五天以前，美国商船“钢铁海员号”在苏伊士运河以南的红海中被一架德国飞机击沉。这些被击伤击沉的船只都悬挂着明显可辨的美国国旗。

1941年9月11日罗斯福针对这些事态发表了著名的“响尾蛇”炉边谈话。在列举了上述事件后，总统再次强调美国在公海上航行自由的普遍原则：

“美国世代都曾为公海上航行自由的普遍原则而战斗。而这是一项很简单的原则——但又是一项起码的、根本性的原则。它意味着：任何国家都无权使得远离陆地战争实际战区的全世界辽阔的海洋都不能被其他国家安全地利用来进行贸易。

在我们的全部历史上这已是我们一再经受过考验的原则。

我们的这一原则从共和国最初的日子起就是始终适用的——现在还在运用——不仅适用于大西洋，也适用于太平洋以及所有的其他海洋。

1941年没有节制的潜艇战争对于传统的美国政策构成了挑衅——构成了侵略行为。

现在很明显，希特勒已经通过残暴的武力，通过消灭掉国际法的一切踪迹、人道主义的一切踪迹，开始了他控制海洋的战役。

他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意图。美国人民不能再有什么幻想了。”

“我设想，德国的领导人今天晚上或在任何其他时候都并不深切关心我们美国人和美国政府关于他们说些什么或者发表些什么。我们不可能靠着使用远距离的谩骂推翻纳粹主义。

但是，在响尾蛇摆开架势要咬你的时候，你不会等它咬了你才把它踩死。

这些纳粹潜艇和快船就是大西洋中的响尾蛇。它们是对公海上自由通道的威胁。它们是对我们主权的挑战。它们攻击悬挂美国旗帜——我们独立，我们自由，我们生活本身的象征——的船只时，就是在敲打着我们最宝贵的权利。”

“我作为总统的义务是历史性的；它是明确的。它是不能逃避的。

我们决定保卫对美国防务关系重大的公海，这并不是出自我方的战争行动。侵略的不是我们。我们是纯粹的防御。

但是，让我们明确说明这一警告。从现在起，如果德国或意大利军舰进入美国防务所必须保卫的水域，它们就要自己承担风险。

我作为合众国陆军和海军总司令所下达的命令是——立即——执行这项政策。

现在责任全在德国。除非德国继续寻衅，就不会发生交火。

这是这次危机之中我的明显职责。这是我们主权国家的明确权利。如果我们要想加固我们保证要在西半球周围维护的防御壁垒，这是唯一可以采取的步骤。

我对这一步骤的严重性并不存在幻想。我采取这一步骤并不是出于慌张，也没有掉以轻心。这是多少个月不断思考、焦虑和祈祷的结果。为了保卫你我的祖国，这是回避不了的。”

这篇强硬的演说将纳粹比喻为“响尾蛇”，表达了罗斯福即将开打的信心和勇气。这是罗斯福在珍珠港事件前发表的最后一篇关于战争的重要演说。不到两个月后，日军偷袭珍珠港，罗斯福终于等到了打“响尾蛇”的最佳时机，从此以后，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他实现自己直接向纳粹开战的愿望，美国一旦卷入战争，二次世界大战的格局和进程就立刻为之一新。

“珍珠港事件”消息传来，美国全国大哗，亿万美国人民晕头转向，这是骄傲的美国人从未经受过的打击。全国最悲痛的人莫过于“老海军”罗斯福总统本人了。他镇静地坐镇白宫，沉思着这个惊人的历史事变，他发布了许多条准确到位的命令，开始撰写准备到国会去要求宣战的演



说稿。他从办公室的窗口望着暮色中的万家灯火，感叹道：

“当年林肯曾从这同一窗口遥望闪烁在波托·马克河彼岸的南部联邦军的营火”。

第二天，1941年12月8日，罗斯福身披深蓝色海军斗篷抵达国会大厦，作了要求国会对日本宣战的演说。此后，美国人民已团结在总统的身后，随他同步前进。美国正式参加了二次世界大战。世界各反法西斯同盟国也纷纷对日宣战：12月8日，英国对日本宣战；9日，中国重庆政府在中日战争打了四年之后才正式对日本宣战，10日又对德国宣战；接着相继对日宣战的还有流亡伦敦的戴高乐“自由法国”和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20多个国家。

珍珠港事变两天后的晚上，罗斯福向全国人民发表对日宣战后的“炉边谈话”使对突然正式宣战还缺乏思想准备的美国人理解宣战的背景和原因，揭露日本和纳粹势力的战略战术特征：突然袭击，不宣而战。

“日本人在太平洋进行罪恶的突然攻击，标志着十年来国际间道德沦丧的高潮。

力量强大的多谋善变的盟徒们已经结成一帮，对整个人类开了战。现在，他们又向美利坚合众国提出了挑战。日本人背信弃义地违犯了他们和我们之间长期存在的和平。在敌人的行动中，许多美国战士和水兵遭到杀害。美国的舰艇被炸沉；美国的飞机被炸毁。

合众国的国会和人民已经接受了这一挑战。”

“日本过去十年中在亚洲所走的道路，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欧洲和非洲所走的道路是相似的。今天，它已远不是什么相似的问题了。它已成为经过仔细谋划的实际合作，而轴心国家的战略家现在已把世界上各个大陆和各个海洋都看成一个完整的巨大战场。

十年前，在1931年，日本入侵满洲——未加警告。

在1935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未加警告。

在1938年，希特勒占领奥地利——未加警告。

在1939年，希特勒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未加警告。

同样，在1939年，希特勒入侵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未加警告。

在1940年，意大利先后进攻法国、希腊——未加警告。

而今年，1941年，轴心国家进攻南斯拉夫和希腊，控制了巴尔干——未加警告。

还是1941年，希特勒入侵苏联——未加警告。

而现在日本进攻了马来亚和泰国——以及合众国——未加警告。

完全是一个模式。

我们现在处于这场战争之中。我们都处于这场战争之中——全面的战争。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儿童都是我们美国有史以来这场最艰巨的事业中的伙伴。我们必须一道分享坏的消息和好的消息，失败和胜利——战争中随时变化着的运气。”

“我们现在处于一场战争之中，不是为了征服，不是为了报仇，而是为了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国家和我们国家所

象征的一切都将对我们孩子是安全的。我们期望能消除日本的威胁，但是，如果我们做到了这或，即发现世界其他部分则由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去支配，那就对我们没有什么好处。

我们将打赢这场战争，我们将赢得战后的和平。

在今天的困难时刻——在可能会到的黑暗的日子里——我们将知道人类的绝大多数是站在我们这一边。他们许多人在同我们一起战斗。他们所有的人都在为我们祈祷。因为，象征着我们的事业，我们也就象征着他们的事业，象征着他们和我们在上帝指引下享受自由的希望。”

但坏消息从前线频频传来：东条英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又签订了新协定：德、意、日三国在对美、英联合作战取得胜利以前，绝不放下武器，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单独讲和，同时三国还规定了战后瓜分世界的范围。

而珍珠港事变后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士气一片低落。尼米兹将军接替姆尔金指挥该舰队，他一上任就发现舰队充斥着一种悲观失望的“恐日”情绪。盟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溃退。日军席卷马来亚和菲律宾。日本伞兵在荷属东印度降落，夺取关岛、威克岛和香港，并进军马尼拉。二战之中后来成为名将并总督战后日本的麦克阿瑟，被围困在巴丹半岛南端一筹莫展。

为此，罗斯福在 1942 年 1 月 6 日致国会的演说中预言“被激怒而聚集起来的全人类将结束这场战争”。他呼吁提高美国的飞机、坦克、防空火炮和商船的生产速度。他提出彻底的进攻战略，“把这场战争打到敌人自己的老家去”。他赞扬了美国、苏联、英国和中国以及其他盟国军民的超人勇气和意志，最后，他指出了反法西斯战争深刻而神圣的本质：维护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公理。而这只有靠彻底的胜利才能完成。

“我们不能以一种防守的态度来进行这场战争。随着我们的力量和资源全部动员起来，我们就要转而进攻敌人——不论在何时何地，只要抓得住敌人，我们就要对他们打击，再打击。

我们必须把敌人远远地拒之于我们海岸之外，因为我们打算把这场战斗打到敌人自己的老家去。

凡是看来适合同敌军作战的地方，不论在世界何处，我们都必须使用美国的武装部队。在某些情况下，这种作战行动将会是防御性的，以便保卫关键的阵地。在其他情况下，这种作战行动则将是进攻性的，以便打击共同的敌人，逐步把他们全包围并最后彻底打败。

美国武装部队将在远东的许多地点作战。

美国武装部队将分布在各个海洋上——帮助守卫对盟国关系重大的主要交通线。

美国陆、空、海军将要驻扎在英伦三岛——它们已成为这场伟大世界斗争的主要堡垒。

美国武装部队将要帮助保卫这个半球——也要帮助保卫本半球以外但可能用来攻击南北美洲的基地。

如果任何敌人，不论来自欧洲或亚洲，企图用轰炸机‘敢死’中队进行远程进袭，他们只不过是希望恫吓我们的人民，破坏我们的士气。我们的人民不怕这个。我们知道，为了自由，我们可能不能不得不付出沉重的代价。我们将积极热情地付出这个代价。不论代价如何，它都是一千倍地值得的。不论敌人在走投无路时可能企图对我们做些什么——我们都要说，正如伦敦的人民说过的，‘我们经受得住。’不仅如此，我们也能还手——我们要还手——愈加于我有利地还手。

当敌人向我们国家挑战的时候，他们是向我们每一个人和所有的人挑战。而我们每一个人和所有的人——代表自己，也代表国家，都已接受了这个挑战。

在威克岛上英雄史诗般的保卫战中，仅仅 400 来个合众国海军陆战队战士就使敌人蒙受那么大的损失。其中一些陆战队的战士阵亡；其他的现在成了战俘。当这些在伟大战斗中幸存的人得到解放并返回家园时，他们将会获悉，我们的 13000 万同胞曾经受到鼓舞而充分分担了自己的贡献和牺牲。

我们很可以说，我们在前线作战的战士们已经证明，今天的美国人同我们在 7 月 4 日庆祝其业绩的那些英雄中任何一个是完全一样粗壮，完全一样坚强。

许多人问道：‘这场战争什么时候结束？’对此只有一个回答。我们一旦使它结束，它就结束了，靠我们联合起来的努力，联合起来的力量，联合起来的决心打到底，干到底——打到德、意、日军国主义的末日。否则，我们不会罢休，这是最最肯定的了。

英国首相访华盛顿期间，我们就是以这种精神进行讨论的。丘吉尔先生和我是互相了解，互相了解对方的动机和意图。在过去的两个星期里，我们一道勇敢地正视了这场世界最大战争的主要军事和经济问题。我们国家所有的人都对丘吉尔先生来访感到高兴。我们大家都由他带给我们的伟大信息而感到激动。我们欢迎他来到我们中间，我们大家一同祝愿他回国途中一路平安。

我们在同英国人民并肩作战，英国人民在若干漫长恐怖的月份里孤军奋战，坚定、顽强而又巧妙地顶住了敌人。我们在同苏联人民并肩作战，苏联人民眼见成群的纳粹蜂拥到莫斯科的大门，却以几乎超人的意志和勇气迫使侵略军向后撤退。我们在同英勇的中国人民并肩作战——千百万的中国人民在漫长的 4 年半里顶住了轰炸和饥荒，在日本武器和装备占优势的情况下仍然一次又一次地打击了侵略军。

是的，我们也在同不可屈服的荷兰人并肩作战。

我们在同所有其他流亡政府并肩作战，希特勒以及他的全部陆军和他的全部盖世太保都没有能够征服他们。

然而，我们盟国作出这一切人力和人命上的牺牲并不是为了回到上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那一种世界。

我们今天进行斗争是为了安全，为了进步，为了和平，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为了全人类，不仅是为了一代，而是为了世代的人。我们进行斗争是为了清除世界上的积弊和痼疾。

我们敌人的指导思想是野蛮的犬儒主义和对人类的极端蔑视。我们则是出于一种信仰，它可以追溯到《创世纪》的第一章：‘上帝按照自己的形像创造了人。’

我们是努力遵循这一神圣传统的。我们进行斗争，正如我们父辈进行的斗争一样，都是为了维护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学说。他们那一边则是努力破坏这一深刻的信念，并按照他们自己的形象创造一个世界——专制、残暴和奴役的世界。

这就是眼前日夜都在深入影响我们生活的一场斗争。这场斗争不可能以任何妥协而结束。善恶之间从来没有过，也永远不可能有成功的妥协。只有彻底胜利才是为宽客、情理、自由和信仰而战斗的人所应得的酬报。”

罗斯福在向国会宣读军火生产的计划时，其开列的数字极其振奋人心：1942年生产飞机6万架、坦克4.5万辆、建造沿船800万吨；1943年将生产12.5万架飞机（其中包括10万架作战飞机）；生产7.5万辆坦克、生产3.5万门防空火炮和1100万吨位的商船。他说：

“这些数字，以及大批其他战争工具的类似数字，将会使日本人和纳粹分子多少明白一点他们进攻珍珠港究竟得到了什么。

而我倒很希望，我列举的这些数字在德国和日本将家喻户晓。”

国会报之以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罗斯福这一鼓舞人心的演说，在珍珠港事变后人心动荡恐惧的历史时刻，重新唤起了美国人民积极参战的信心。

1941年12月盟军马来亚战役败北。1942年4月9日，7.6万名美军和菲律宾军在吕宋战役中作了日本俘虏。爪哇岛和缅甸首都仰光也相继沦陷，日本切断了滇缅公路大动脉。日本太阳旗在南洋各地升起，不到半年侵占了38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超过日本本土10多倍，人口达1.5亿多。1942年元月上旬，德国对美国本土发起潜艇攻势，有的潜艇竟在距离东海岸几百码的地方击沉美国船只。两月之内盟国在西大西洋被击沉132艘船。德国潜艇1942年在美国大西洋沿岸肆虐的恶果，有如全美6个战备工厂遭到摧毁后所引起的灾难。更令人生气的是，华盛顿一天晚上竟响起两次空袭警报，但是并无敌机进犯。

局势简直糟透了，罗斯福的困境是以前历任总统所未经历过的，整个全球战略迫使他勇挑重担，针对全国普遍存在的害怕战争和失败悲观主义低潮，1942年2月23日，罗斯福利用华盛顿的诞辰对全国作了一次重要的广播演说，以开国英雄的精神和业绩来教育人民振奋他们的心灵。

“美国同胞们：

我们互相谈一谈今天的情况怎么样以及我们知道将来的情况又会怎么样，华盛顿的诞辰是个极为适合的时机。

乔治·华盛顿和他的大陆军在8年中持续地面对难以克服的不利条件和一再出现的失败。物资和装备是缺乏的，在一定的意义上，

每个冬天都是一次熔炉谷。第五纵队遍布 13 州——还有自私的人、忌妒的人、担心的人，他们都宣称华盛顿的事业是无望的，他广该要求谈和。

华盛顿在当时困难条件下的表现成为后来所有美国人的楷模——精神耐力的楷模。他坚持自己的道路，因为那是由《独立宣言》所规定的了。他以及同他一起从军的勇士们懂得，没有自由和自由的制度，任何人的生命或财产都是没有保障的。

当前这场伟大的斗争日益明确地教导我们，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身自由和财产安全都取决于在全世界一切地方对自由和正义的权利与义务的保障。

这场战争是一场新型的战争。它不同于过去一切其他的战争，不仅在方法和武器上，而且还在地理上。它是一场遍及一切大陆、一切岛屿、一切海洋和一切空中航道的战争。”

“我们十分肯定地遭受了损失——从大西洋的希特勒潜艇以及从太平洋的日本人——而且在潮流转向以前，我们还会遭受更多的损失。但是，让我代表美利坚合众国对全世界的人民再说一遍：我们美国人被迫放弃了土地，但是我们一定要收复。我们和其他盟国承担了消灭日本和德国军国主义的义务。我们在每天增强我们的实力。不久，我们，而不是敌人，将采取攻势；我们，而不是敌人，将打胜最后的几个战役；我们，而不是敌人，将赢得最后的和平。”

“每一个美国人都应该遵奉这样三条崇高的宗旨：

一、我们一天也不停止工作。如果发生任何纠纷，我们要继续工作，同时通过调停、和解或仲裁去解决纠纷——直到打赢战争。

二、我们不为任何集团或行业要特殊的利益、特权或便宜。

三、我们将放弃一些生活设备和改变我们生活的常规。如果祖国要求我们这样做，我们将高高兴兴地这样做，因为我们不会忘记，我们的共同敌人正是要破坏我们全国各地的一切家庭和一切自由”

“自从我国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以来——自从通过租借法案以来——轴心国家的宣传一直贯穿着一个主题。

这个主题就是：美国人果然富足，美国人确有巨大的工业力量——然而美国人是软弱的、腐朽的，不可能也不会团结起来工作和斗争。

我们一直被柏林、罗马和东京描绘成一个意志薄弱的民族——一群花花公子——雇佣英国兵，或俄国兵，或中国兵来替我们打仗。

让他们现在再这么说吧！

让他们对麦克阿瑟将军和他的战士们这样说吧！

让他们对今天在远方太平洋水域狠狠打击他们的水兵这样说吧！

让他们对‘空中堡垒’里的小伙子这样说吧！

让他们对海军陆战队员们这样说吧！”

“我们盟国关于我们争取和平已经在某些广泛的原则上取得一致。《大西洋宪章》不仅适用于大西洋沿岸地区，也适用于整个世界；解除侵略者的武装、各个国家和民族的自决权，以及四大自由——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

英国和苏联人民已经体验到纳粹猛烈进攻的厉害。伦敦和莫斯科的命运曾经数次出现过严重的疑问。然而从来没有出现过英国人或者苏联人会投降的任何疑问。今天，在苏联陆军庆祝建军第 24 周年时，所有的联合国都向卓越的俄国陆军致敬。

虽然国土已经被占，荷兰人仍然在海外顽强有力地作战。

伟大的中国人民遭受了巨大的损失；重庆已经几乎被炸平——然而它仍然是打不垮的中国的首都这就是在这次战争中盟国普遍呈现的奋战取胜的精神。

我们美国人现在面临的任务是对我们最大的考验。我们从来没有被要求作出这样非常的努力。我们从来没有要在这么少的时间里做这么多的事。

‘这是考验人们的灵魂的时代’。托姆·潘恩曾经在营火的光亮下在战鼓上写下这句话。那时，华盛顿将军的人数不多，服装褴褛的军队正在通过新泽西撤退，至此还从来没有尝到过一次胜仗的滋味。

而华盛顿将军命令把托姆·潘恩的这句豪言壮语向大陆联军各团的战士宣读，并且对美国的这第一支武装部队作出以下的保证：

‘在这个危机中，只能打胜仗的军人和只能共欢乐的爱国者，才会在为国服役上退缩；但是，现在坚持下来的人是值得人们的爱戴和感激的。专制制度像地狱一样是不容易战胜的；然而，值得自慰的是：牺牲越难忍受，胜利就越是光荣。’

这就是美国人在 1776 年说的话。

这也是美国人今天说的话！”

战争期间，罗斯福仍喜欢马不停蹄地在美国各地巡视，亲眼看看这个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大后方。1942 年 10 月，他视察了一些营房训练基地和军工厂，感到美国人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团结一致，决心去干一件事并且把它干好。

这个有 1 亿 3000 万自由的男人、女人和儿童的大国，正在成为一支伟大的战斗力量。一些人在后方生产飞机，一些人在欧洲大陆或太平洋岛屿上空 5 英里的飞机里作战——另一些人则在宾夕法尼亚或蒙大拿地下深处的矿井里作战。总统对自己这种没有大肆宣扬、没有群众夹道、没有新闻记者和摄影师成群结队的视察非常满意，他看到了普通美国男女为战争工作的真实感人的情景。

这次旅行相当匆忙，先到中西部，转往西北部，又从西南部和南部折回。生产队伍中女工占有很大的比例，总统对此很难忘。她们工作专心致志，以致罗斯福感到传统的者说法女人好奇心更强似乎并不准确。因为每当他们未经事先宣布就在一些工厂的车间穿过时，首先从自己干的活中抬头来看的人是男工，而不是女工。主要是男工在争辩着那戴着草帽的家伙是否真的就是总统。

人力缺乏的问题，人民正在尽力克服。在一个居民区，中学停课 3 天让全校师生出动去抢收一种易损坏的作物；在另外一个果树种植区，通常的日本劳工用不上了，在水果成熟的时候，银行老板、肉店主人、律师、汽车司机、杂货店主、地方报纸编辑、镇上一切身强力壮的男人

和妇女都离开自己的本行工作，一起出动把果子摘回来并且送去上市。

选征兵役制度成功地运用着，广大美国公民对它表示支持。登记范围包括从 18 岁到 65 岁的男子。从 20 岁到 44 岁的男子有义务服兵役，超过最高年限的男子则有义务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务。新的兵役法还规定：正在武装部队服役的男子须在战争期间服役，另外还要延长 6 个月。新的兵役法实施后，将近 1000 万人被征召入伍。到 1945 年，陆军有 820 万人，其中 2/3 在海外服役。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约有 390 万人，海岸警卫队约有 25 万人。在二次大战期间，首次在陆海空军中广泛使用的妇女，尽量使男子摆脱非战斗任务。仅 1942 年全国就有数十万妇女从军，担负了从医疗救护、文书打字和通讯联络等方面的工作，贡献巨大。

1943 年 4 月 19 日盟军乘胜集中优势兵力发起总攻。英国第八集团军自南向北实施突击，远征军自西向东发起进攻，18 天激战，于 5 月 7 日攻占突尼斯城和比塞大港。25 万德意军队背水无路，于 5 月 13 日宣告投降。到此盟军在北非将纳粹军队一扫而光，地中海战局被扭转，通向西西里的道路展现在面前。

北非大捷使盟国军民欢欣鼓舞。在白宫运筹帷幄的罗斯福大为高兴，对北非大本营的总司令艾森豪威尔赞不绝口。艾森豪威尔是他的一员爱将，也是总统亲手提拔起来的风云人物。二战前，艾森豪威尔只是麦克阿瑟手下的一名中校军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调任总参谋部任作战处长，主要研究与太平洋战争有关的战役。从美国参战开始，艾森豪威尔也迎来了自己的起飞时期，他沉着果断，每天工作 18 小时，他领导的作战处被誉为全美军的“主要神经中枢”，总统为了表彰他，授予艾森豪威尔少将军衔，立即获得参议院批准。艾森豪威尔参加过一次大战，但从未指挥过一次重大战役。这次北非登陆罗斯福委以重任，他果然不负众望，身手非凡。二战以后，他历任美国陆军参谋长，北约武装部队最高司令。1953 年至 1961 年担任美国总统。

罗斯福在白宫对记者谈到这位西点军校的高材生——“亲爱的艾克”时说：“艾森豪威尔将军已经完成了一件多么漂亮，多么艰巨的工作，他现在是多么细心多么巧妙地在指挥他手下的士兵。我今晚要对你们说——也对他说——我们完全信任他的领导。对他作为一名军人的品格高度奖赏，就是英国政府通过丘吉尔先生在卡萨布兰卡首先倡议，由他出任即将来临的伟大的盟军作战行动的最高统帅。”这位欧洲盟军最高统帅的下一个杰作将是 1944 年的诺曼底登陆。

法属北非刚一被盟军扫清，罗斯福就宣布了太平洋战区的前景方向。

“在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岁月中，就已建立了那种指导我们民主制度的根本原则。我们整个民主大厦的基石就是政府的权威来自人民和只能来自人民的原则。”

“我们作战的目的之一，正如《大西洋宪章》所阐明的，是今天被征服的各国人民将重新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无论在哪里都毋庸置疑：盟国的坚定不渝的宗旨，就是要恢复各个被征服的民族的神圣权利。”

“我们不指望浪费时间，慢慢地，一个岛一个岛地越过广阔的

太平洋前进，直到最后打败日本。直接通向东京道路比比皆是。我们对所有这些道路都会加以考虑。”

1943年1月14日至23日，罗斯福乘崭新的C—54专机飞抵北非名城、刚在北非大捷中由美国名将巴顿攻克的卡萨布兰卡，与丘吉尔举行了为期8天的会谈。会谈使英美更加联成一体，确定了盟军当前的首要任务：第一，攻克地中海的非洲沿岸，在这一带建立海军和空军基地，开辟一条军事交通走廊。第二，利用在非洲沿岸的基地，在最短时间内以有生力量去打击轴心国的小腹部。

卡萨布兰卡会议最主要的决策之一是宣布轴心国必须“无条件投降”，这是罗斯福的创意，赢得了丘吉尔的倾心支持，“无条件投降”意味着今后几代人内，世界和平将有真正可靠的保证，意味着彻底摧毁一切法西斯势力，不容半点妥协忍让和绥靖。

罗斯福和丘吉尔这一对亲密战友在会议期间相处融洽。总统总是怀着敬意聆听着丘吉尔那华丽的英语，同为演说家，罗斯福很欣赏这位在文采辞章上略胜他一筹的英国绅士；同样，丘吉尔十分赞叹这位老伙伴在政治战略上的老谋深算，远见卓识，他那锋利的辞令，也常常使他着迷。丘吉尔说：“他是我最高尚的朋友，是我所认识的最有远见，最伟大的人物。”

1943年2月2日历时180天的斯大林格勒大会战以苏军胜利宣告结束。这是二战中苏军对德军的一次决定性会战，德军从1942年7月17日起开始猛攻斯大林格勒，先后投入150万以上的兵力，企图占领该城，切断伏尔加河控制高加索地区，然后乘胜北攻莫斯科。苏军先后投入三个方面军在顽强的防御中消灭了大量的敌人。11月19日转入反攻，23日包围德军33万人。1943年2月2日，德国第六军团残存的9万人，包括军团总司令保罗斯元帅和24名将军都当了俘虏。斯大林格勒大捷是整个二战进程的一大转折点，从此盟军进入反攻阶段。

一天以后，罗斯福致信斯大林元帅，热情洋溢地赞扬了红军和苏联人民：

“您统帅下的军队在斯大林格勒取得了辉煌胜利，作为美利坚合众国武装部队的统帅，我谨向您致贺。为保卫这座不朽的城市而进行的162天史诗般的战役，使全体美国人都在庆祝这决定性的胜利。在这场各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纳粹及其同伙的战争中，它将永远最光辉篇章之一。

你们在前线作战部队的指挥官和战士，以及在工厂和田野支援他们的男男女女，通过共同努力，不仅增添了自己祖国部队的荣誉，而且以自己的榜样激发了一切盟国重新下定决心：竭尽全力彻底打败共同敌人，迫使他们无条件投降。”

1943年2月12日，林肯诞辰，罗斯福在白宫记者联谊会上发表长篇演说，谈到他刚刚从前线亲临其境所获得的印象和感想，他感动地谈到那些普通的士兵，他还颂扬了那些中流砥柱般的三军指挥官。卡萨布兰卡会议的决策，罗斯福也在这篇演说中加以强调。最后，他以崇敬的语



气谈到林肯，以此激励自己，激励美国。这篇演说开头有一句神秘优雅的话“有些人飞渡了重洋”，既指罗斯福本人往返卡萨布兰卡之行，也可看成是指无数空军战士。

“自从我参加白宫记者联谊会上次午宴以来，已经将近两年，时光如流水飞逝。

有些人飞渡了重洋。

两年以前——珍珠港事件之前若干个月——我曾经同你们谈过当时我们所考虑的突出问题——美国决心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那时，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已决心全力帮助从野蛮人手中拯救文明。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处在具有历史意义生产任务之中——美国人民一直在热情、娴熟地从事这项任务，而且卓有成效。

今晚，在我向各位谈话时，我们已处在战争之中，我们在考虑着另一个突出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决心把这场战争进行到底——直到盟国的军队胜利地行进在柏林、罗马和东京大街上那一天。”

“我现在刚从海外前线回来，在那里，美国工厂的产品和美国兵营里的训练正在用于对敌作战的实践。我看望了我们的野战部队。我视察了他们的优良装备。我同他们一起谈笑，就餐。

我在特立尼达，在巴西的贝伦和纳塔尔，在利比里亚和冈比亚看到了我们的战士——我们国家的战士。我们必须记住，在这些地方并没有实际的战斗，但是在那里同样有艰苦的、危险的、重要的工作，我们的部队在精神和体力上处于十分紧张状态。他们的表现是极为良好的。我要他们知道我们没有忘记他们。

我在北非看到了我们的战士——还有一些我们美国的女战士。那里在打仗。这些战士知道，在战争结束之前，他们当中许多人将会为国捐躯。但是，他们也知道他们是在为消灭我国敌人的力量而战斗，他们是在为真正的持久和平，为今后更美好的世界而战斗。

我们的野战部队对我们所寄予的愿望和信赖是当之无愧的。我们的海军战士也同样当之无愧。没有他们，美国远征军是不可能在外国的海岸安全登陆的。我们运送军火和补给品的商船队也同样当之无愧。没有他们，无论是合众国还是我们的盟军都无法继续进行战斗。

看到这些人员，这些海陆军战士，没有一个美国人不感到巨大的激情，不感到十分骄傲——不激发浓厚的责任感。

由于我旅行时必要的保密措施，所到之处，我军官兵都感到非常突然，从他们的表情完全可以看出这一点。”

“在每一个步兵营，在每一艘舰船上，你们会看到各种各样的美国公民。他们代表着不同的职业、阶层、种族、宗教和政治观点。如果问他们为什么而战，他们都会说：我为我的祖国而战。如果你要问他们，这究竟是指什么，那么，你所得到的回答从表面看来似乎是多种多样的。

有人会说，他为的是——喜欢说什么就说什么，爱读什么就读什么，爱听什么就听什么的权利。

有的人会说，他之所以参加战斗是因为他永远也不愿看见纳粹

的字旗飘扬在埃尔姆大街的第一浸礼教堂上。

还有人会说，他是为有权工作，有权为自己和家人挣得一天扎实的三餐而战。

也有人会说，他之所以参加这次世界大战是为了他的子子孙孙永远不会再到欧洲、非洲、亚洲或是所罗门群岛来干这种讨厌的职业。

但是，所有这些说法实质上讲的是同一件事：每个美国人都是为自由而战。每个美国人及其家属的自由是同他在其他大陆上邻居的自由休戚相关的。今天如此，以后更将如此。”

“敌人在突尼斯战役中的目的，是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北非的最后一个桥头堡，以阻止我们进入通向纳粹控制下欧洲的海峡。

而我们在这次突尼斯战役中的主要目的则是：把敌人赶下海。

由安德森将军指挥参战的英国第一军中，有许多人是参加过佛兰德战役和敦刻尔克战役的老兵。这些人同纳粹分子有老帐要算，他们会把老帐算清的。

由蒙哥马利将军指挥的英国第八军，在给隆美尔元帅的兵团以粉碎性打击，对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纳粹法西斯军队进行有历史意义的1500英里追击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从南面向突尼斯之敌发动进攻的，将是这优秀的第八军，以及戴高乐将军的部下勒·克莱克将军指挥下卓越地完成横跨撒哈拉沙漠进军的法国部队。从西面向敌人发动进攻的将是英美联军以及吉罗将军指挥下的法国部队。

我想今晚大家相当满意的是，所有这些部队都是由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挥的。我在卡萨布兰卡同这位年青的将军——堪萨斯拓荒者的后裔——一起度过了不少时间。我知道他多么出色地完成了艰巨的任务，并且多么谨慎而巧妙地领导着他属下的官兵。我今晚要向你们——也向他——说，我们对他的领导是有充分信心的。丘吉尔先生代表英国政府在卡萨布兰卡率先提议，由他统一指挥在北非即将开始的一切重大盟军作战活动，这是对他的素质所作的高度赞扬。

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副手是英国最伟大的军人之一亚历山大将军。他指挥着英国在中东的全部军队，其中包括在阿拉曼战役中取得决定性胜利的第八军。他和蒙哥马利将军部署了那次战役以及随后的惊人挺进。此刻——当我今晚在向各位谈话时——亚历山大将军正站在艾森豪威尔将军右侧，共同部署新的战斗。

这些重要的事实说明，在盟国之间不仅存在一般的合作而且存在积极的配合。我们的敌人应该相应地注意到这些事实。

我们在突尼斯的部队训练有素、装备精良，但是，他们是第一次同强敌进行实战。我们有绝对的把握，他们会像在潘兴将军指挥下，把德国精锐部队赶出阿尔贡森林，赶过默兹河的美国青年人一样勇敢善战。”

“在卡萨布兰卡作出的决策，以及实际计划都并不局限于任何一个战区，任何一个大陆或任何一个海洋。我想在年内，卡萨布兰卡会议将会以实际行动而不是语言向全世界表明，它确实产生了许

多消息；而对德国人、意大利人以及日本人来说，都是些不好的消息。”

“我们同任何轴心国政府或任何轴心派别打交道的唯一条件只能是在卡萨布兰卡所宣布的‘无条件投降’。我们知道，我们敌国的老百姓迟早也会知道，我们的不妥协政策不是为了给轴心国的老百姓造成损害。但是，对于他们那些有罪的野蛮领导人，我们则是定要严惩不贷的。”

“另一方面，为了使纳粹和日本人不再怀疑我们在把战争进行到彻底胜利为止这一点上完全一致，丘吉尔首相在卡萨布兰卡提出表示希望达成如下正式协议：如果战败德国先于日本，大英帝国的全部资源和人力当然都会用来同中国和我们一起来对日本发动全面的总攻。我告诉丘吉尔先生说，就这方面发表正式协议的声明是毫无必要的，美国人民相信一位伟大英国绅士的话，而且，同在欧洲和非洲一样，决心在亚洲消灭野蛮势力，我们是完全一致的，这是不言而喻的。换句话说，我们对日本敌人的政策同我们对纳粹敌人的政策是完全相同的。这个政策就是，在各条战线上努力作战，并在敌人无条件投降的不妥协原则下尽快结束战争。”

“今天是一位伟大、纯朴的美国人的诞辰。我们全体人民，不论身居何地，都在怀念亚伯拉罕·林肯；在整个英联邦、苏联、中国、所有美洲姐妹共和国的男女老少，以及凡是热爱自由并愿为自由而献身的世界各地的人，也都在怀念他。

1862年，林肯总统说过：同胞们，我们不能逃避历史。我们这些在国会和政府里的人，不论是否愿意，都不会被人忘记。个人的重要与否都不能使我们任何人得以摆脱。我们所经历的火热的考验将使我们……不流芳百世，就遗臭万年。

今天，林肯发表了上述讲话80年之后，战火在全世界到处燃烧——从哈尔科夫到昆明，从地中海到珊瑚海，从柏林到东京。

同样，我们也不能逃避历史。我们有无比信心，靠上帝的帮助，芳名将会永传。我们相信，子孙后代将会知道：此刻，在20世纪中叶，具有善良愿望的人们曾经找到一条团结、生产和为消灭无知、狭隘、奴役和战争而斗争的道路。”

1943年夏季，战局陡转，全世界反法西斯武装向前奋勇挺进——在苏联前线，在广阔的太平洋地区，在欧洲——以四面八方逼向最后的目标：柏林和东京。

轴心国已经出现了第一条裂缝，美国第七军在意大利西西里岛南部的开阔海滩强行登陆后，神速地穿过该岛首府巴勒莫。对不少美国部队来说，这是第一次，但他们的表现就像久经沙场的老兵。盟军占领西西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法西斯政权正在土崩瓦解，希特勒拒不输送充分的援助来挽救墨索里尼。实际上，在西西里的希特勒军队抢夺了意大利的摩托化装备，使受困的意军除了投降外别无出路。正如他们在苏联前线和从埃及途经利比亚的黎波里直到突尼斯最后投降的长途溃退中所一再作过的那样，德国人又一次出卖了他们的意大利盟友。墨索里尼不得不发出“一切都完了”的哀叹，他已经看到了法网难逃。

1943年7月28日，罗斯福又坐在“炉边”对美国人民汇报战争进展情况，在谈到战局的节节胜利时，他也提到了战争对物资的巨大消耗：

“我们计划发动北非战役，已经1年多。我们计划发动西西里战役，也已经有6个月了。我承认我是一个性急的人，但我认为我理解，大多数人也理解，准备任何重大的陆战或海战所需要的时间。我们不能拿起电话就命令在下星期发动一次新的战役。

比如，在北非的登陆部队和北非出击的登陆部队的后方，就有成千上万的舰艇和飞机保护着漫长而危险的海上通道，向进攻地点运送兵员，运送装备和补给。而在所有这一切的后面，又有在国内把兵员和军火运往出海港口的铁路和公路——有在国内生产各种物资的工厂、矿山和农场——有在国内的训练营地，使战士们学会如何在海滩、沙漠和山地执行生疏、困难和危险的任务。

所有这些都不得不反复进行。首先是在北非，其后是在对西西里的进攻中。在西西里，增加了空袭这个因素——因为我们可以利用北非为基地对西西里的登陆地点和敌军防线以及意大利的供应线进行打击，以削弱抵抗。

每架从北非基地起飞去轰炸那不勒斯港口设施的“空中堡垒”，执行一次任务需要1100加仑的汽油，这大约相当于375张“甲种”配给券——足够你开车横跨我国大陆5次所需的汽油。认识到这一点对我们是很有意义的，如果把现在正在海外执勤的上万架飞机和以10万计的吉普车、卡车和坦克所需的汽油同这个数字相乘，就能更好地理解各位在这次战争中的作用，以及汽油配给的涵义。

进攻西西里的首批部队包括运载16万人——美国人、英国人、加拿大人和法国人——的3000艘舰艇，1.4万辆各种车辆，600辆坦克和1800门大炮。这支先头部队的后面，每日每夜还紧随着成千上万的后续部队。各位了解到这一事实，我想，在合众国国内每个人的方便，每个家庭的方便，相形之下就不是显得那么重要了。”

盟军将士在合作程度上所表现出来的感人事实，使罗斯福十分赞赏。各国军人显然都没辜负“盟军”这个光荣的称号：

在战场上不同兵种的配合和整个战役的筹划，都应该归功于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巧妙领导，在处理海上、陆地和空中的各种复杂的细节中，坎宁安海军上将，亚历山大将军和特德空军中将都起了柱石的作用。

各位听到有些人说过，英国人和美国人从来难以相处——各位还听到有些人说陆军、海军和空军从来难以共事——他们之间不可能有真正的合作。突尼斯和西西里的战役一举戳穿这些狭隘偏见的虚伪。

温斯顿·丘吉尔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言论和行动显示了英国人民在这场战争中大无畏的战斗精神——全世界都知道美国人民对丘吉尔的感情。

在我们前面，还有更大得多的战斗。我们和我们的盟友将像我

们投入西西里战役一样，一道投入这些战斗，并将一道坚持下去。

总统再次指出战后美国军人的生活问题。他向战士们作出保证：祖国在战后决不会对不起他们：

“在集中力量争取军事胜利的同时，我们并没有忽视规划未来，全世界要过上更美好、更公道的生活，我们知道，就得依靠那几大自由。

我们今天所从事的许多工作之一，就是为我国武装部队中的英勇的男女战士回到平民生活拟订计划，我们决不能让他们复员之后遇到的是通货膨胀和失业，决不能让他们去排队领救济粮，或者到街头去卖苹果。这一次，我们必须事先作好安排——不要拖到最后才仓促、笨拙而被动地应付。

我已经向我们武装部队的战士作了保证：战争打赢了之后，美国人民是不会有负于他们的。

我希望国会帮助实现这项保证，因为单靠政府的行政部门显然是做不到的。但愿国会在这方面尽到它的责任。对正在为我们赢得这场战争的男女军人，美国负有义务，美国人民一定会坚持履行这种义务的。”

罗斯福甚至已经事先替他们设想了他们完全应该获得的权益：

“武装部队的成员比起我们其他人来，做出了更大的经济上的牺牲和其他各种牺牲。因此，他们有权要求采取具体行动，帮助解决他们的特殊问题。

据我看来，他们有权要求的，至少有以下几点：

第一，武装部队和商船队的每个成员，在他或她荣誉退役时发给退伍金；退伍金额必须足以维持从退伍到找到新工作的一段合理的时间。

第二，在经过努力未能找到工作的情况下，如本人向美国职业介绍所登记，应发给失业保险金。

第三，向武装部队的成员提供由政府出资接受进一步教育或职业训练的机会。

第四，按照失业补助和联邦老年与鳏寡保险的规定，向武装部队全体人员发放服役期间的贷款，他们的待遇应同在私营企业中继续供职一样。

第五，改善并放宽对武装部队与商船队残废人员住院、休养和医疗等方面的规定。

最后，对残废军人发放充分的抚恤金。”

1943年11月，罗斯福乘坐配有9门16英寸口径大炮的4.5万吨大型新战舰“衣阿华”号穿过大西洋，舰上高射武器林立，空中跟随着庞大的护舰机群。罗斯福带着自己的主要干将哈里·霍普金斯和马歇尔等人以及一批年青的海军军官前往开罗，与丘吉尔、蒋介石会晤。

这次美英中苏四国首脑会议分两阶段举行。先定在开罗召开美英中会议，然后在德黑兰召开美英苏会议，因为斯大林此时对太平洋战争持“中立”态度，不想参加讨论对日作战的国际会议。两次会议的前提都是盟国的胜利已成定局，四国协商怎样迎接胜利。

开罗会议前夕，罗斯福曾在白宫对儿子透露他对国际局势以及四国关系的看法。

“美国将不得不出面领导。领导并运用我们的斡旋进行调解。帮助解决其他国家之间必将产生的分歧：苏联和英国在欧洲，英国与中国、中国与苏联在远东。我们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们是大国，是强国，而且我们不妄求。英国在走下坡路，中国仍在18世纪状态中，苏联猜疑我们，而且使得我们也猜疑它。美国是能在世界局势中缔造和平的唯一大国。这是一项巨大的职责，我们实现它的唯一办法是面对面地与这样的人会谈。”

开罗会议上罗斯福试图说服蒋介石改组他那极其腐败的政府，结果无效，他只能继续援助这位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中国独裁者。因为要中国继续作战来牵制日本部队是至关重要的。开罗会议的主要成果是美英中三国联合发表的《开罗宣言》：

“我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国决不为自己谋求利益也无意于扩张领土。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

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的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此外，日本亦将被逐出于其以暴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我三大盟国轶念朝鲜人民所受之奴役待遇，决定在相当期间使朝鲜自由独立。”

“我三大盟国抱定上述之各项目标并与其他对日作战之联合国目标一致，将坚持进行为获得日本无条件投降所必要之重大的长期作战。”

开罗会议一结束，罗斯福即带领70来人的班子乘“圣牛”号飞机前往德黑兰，航程约6个小时，要越过巴勒斯坦全境。罗斯福命令飞机低飞，使他能从空中俯览圣地的每处名胜古迹。于是罗斯福自幼年起就熟知的这些《圣经》中记载的神圣地点，一一从机翼下掠过：伯利恒耶稣诞生地的小教堂，耶路撒冷，大卫墓，天国之门，耶稣拱顶，耶稣受难地，哭墙，橄榄山，耶稣升天教堂，死海，约旦河，加利利海。罗斯福一一辨认着这些神圣的建筑和地理，激动地向坐在身边的国务卿报出它们的名称。

德黑兰会议关于军事问题的一个重大决策是终于确定于1944年5月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德黑兰会议标志着苏联和西方合作的高峰。在开会之前，丘吉尔把从伦敦带来的一把宝剑“斯大林格勒之剑”赠给了斯大林。罗斯福称赞此剑：“真是登峰造极的杰作”。会间丘吉尔称罗斯福

是一个“把毕生贡献给弱者和无援者事业的人，坚定地引导着他的国家在激烈的民主自由气氛中，顺着国内政治和党派倾轧的惊涛骇浪前进。”在向斯大林祝酒时，丘吉尔说他堪与俄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彼得大帝并驾齐驱，堪称“斯大林大帝”。

三巨头最后签发了《德黑兰宣言》：

“我们完全承认我们以及所有盟国负有至上的责任，要创造一种和平，这和平将博得全世界各民族绝大多数人民大众的好感，而在今后许多世代中排除战争的灾难和恐怖……”

“我们将力求所有大小国家的合作和积极参加，那些国家的人民就和我们本国的人民一样，都是全心全意抱着消除暴政和奴役、迫害和压制的真诚。我们将欢迎他们，听他们抉择，到一个全世界民主国家的大家庭里来。”

“我们怀着希望和决心来到这里。离开这里时，我们作为事实上的朋友和志同道合的朋友而在这里分手。”

1944年6月6日，盟军实施诺曼底登陆的“霸王”计划。盟军共投入45个师，德国防守诺曼底地区约有15个师。在6月4日，盟军攻克罗马，罗斯福在次日晚上发表炉边谈话，宣告第一个轴心国的首都的陷落：“一个攻下了，另外两个也快了！”他对胜利的部队表示感谢，并为6月6日的军事行动祈祷。

6月5日广播演说后，罗斯福一直坐到深夜，听取登陆的首批报告。在等候的时候，他写了一篇祈祷辞。到次日中午，这时在诺曼底已是晚间，消息表明在这场特大赌博中掷出的第一颗骰子赢了。奇袭得到了成功。大股部队已涌上滩头，只是在奥马哈滩，碰巧有德军一个师在演习，因此遭到了重大伤亡。

6月6日晚上，罗斯福再次向美国人民发表演说，向他们念了一篇倾吐他内心感情的祈祷文：

“万能的主啊：今天，我们的孩子们——我们民族的骄傲——正在开展一场伟大的斗争，一场为捍卫我们的共和国，我们的宗教和我们的文明，为解放受苦受难的人类的斗争。”

“祈求您引导他们勇往直前，永不迷失方向，赐力量于他们的双臂，给勇毅于他们的心灵，赋坚贞于他们的信念。”

“他们渴望您的保佑。他们任重而道远……有些人将一去不返。主啊，祈求您伸出双手，将您的英勇仆从接纳进天国。……”

哦，主啊，祈求您给我们信念……使我们精神永葆锋芒……”

“在您的保佑下，我们将力克敌人的邪恶势力。愿主帮助我们去征服贪婪和民族压迫的门徒；带领我们去拯救祖国，同各姐妹国家一起进入缔造稳固和平的一统世界。这种和平将不为任何无耻之徒的阴谋诡计所破坏，这种和平将使人类永享自由，获得自己忠诚劳动的正义果实。”

“万能的主啊，您的意志必将实现。”

1944年秋天，四年一度的大选又来临，罗斯福被民主党全国代表大

会推举为总统候选人。在海军基地的一节火车车厢里，他发表了接受提名的广播演说，提出了自己的竞选主题：

“1944年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第一，赢得战争，迅速赢得战争，以压倒优势赢得战争。第二，成立世界性的国际组织。第三，为我们即将回国的战士和为所有的美国人建立一种经济体系——它将提供就业机会，带来像样的生活水平。”

为此，罗斯福在着手制定的一项新经济法案中提出了这样的蓝图：

人们有权从事有益的有报酬的职业……

人们有权挣得足够的收入，以便提供充分的衣食以及娱乐；

每个农民都有权种植和出售农作物，其收益足以使他和他的家庭过着像样的生活；

各个商人，不论大小，都有权在不受国内外不公平的竞争和垄断者控制的气氛中进行贸易；

每个家庭都有权拥有像样的住宅；

人们有权享受适当的医疗……

人们有权得到适当的保护，在经济上不必担心年老、疾病、事故和失业；

人们有权接受良好的教育；

所有这些权利意味着安全。战争胜利后，我们必须准备落实这些权利，去实现使人民过幸福美满生活的新目标。

9月23日，罗斯福在卡车司机国际兄弟会发表了一次竞选演说，其气势之磅礴，情绪之激昂，丝毫不亚于他过去的几次竞选。总统顾问舍伍德说，它大可以作为政治策略和战术的一篇杰作来研究。在开场白中，罗斯福说：

“好啦，这里我们又在一起了，这是4年之后，这4年是什么样年头啊！我的确老了4岁，这似乎使某些人感到恼火。

其实，自从1933年我们开始清除堆在我们身上的烂摊子的那个时候算起，我们千百万人都老了11岁。”

对这三句话，听众报之以哄堂大笑和大声欢呼。在这三句话里，罗斯福打发了对他是个老头子而且“是个累坏了的和虚弱的老头子”的谴责。他把注意力带回到“胡佛不景气”和新政的基本成就上面来，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对那些喜欢他的人作出保证说，同样的罗斯福仍然同他们在一起，并非漂浮在人们望不到的，只是由一些“像丘吉尔和斯大林那样神秘的、天神般的人物所占据的最高层的某处”。罗斯福进一步说：

“在共和党中有着开明的、心胸宽大的分子，他们为使该党现代化和跟上美国前进的步伐，一直很努力而又体面地战斗着。不过



共和党中，这些开明分子却不能把老保守派共和党人从他们所盘踞的地盘上赶走……在我们绝不动摇地建立牢固的和平基础的决心中……全国千百万共和党人是同我们站在一起的。他们同样讨厌由这样的人作出的这种竞选演讲，这些人只是在短短几个月前才第一次认识到国际生活的事实——当时他们才开始研究民意测验的记录。”

大选结果，罗斯福击败竞选对手杜威，连任总统，这创造了美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奇迹——连任四届总统。

此时国际战事也是捷报频传：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节节推进，节节胜利。1944年8月15日，英法联军在法国南部登陆，从宽阔的公路乘装甲坦克直捣巴黎。8月19日，盟军占领塞纳河西岸，8月25日，法国第二装甲师进入首都。巴黎解放！

苏德战场更是辉煌：10月初，苏联红军越过波兰，进入匈牙利和南斯拉夫，一路战斗一路解放。

在太平洋战场，盟军攻占了马里亚纳群岛，日本海军一败涂地，从此日本本土唇亡齿寒，美军远程轰炸机B—29可以以此为基地直接空袭日本本土。

1945年2月4日，美英苏三国领袖偕同他们的外长和参谋长，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了为期8天的“雅尔塔”会议，商讨战后世界的秩序和格局以及对轴心国最后解决的问题。

在这之前，1945年1月20日，罗斯福冒着寒流在白宫南门走廊宣誓就职。他的13个孙子孙女都来华盛顿参加了这场美国历史上最短最阴沉的总统就职仪式。罗斯福期望立即与丘吉尔和斯大林会晤。他说：

“我们认识到，我们是不能单独生活在和平环境中的；我们的幸福取决于别国——遥远的国家——的幸福。我们认识到爱迪生所说的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理：‘只有当朋友，才能交朋友。’”

两天以后，罗斯福带着一个人数庞大的参谋班子乘“昆西”号巡洋舰和“圣牛”号运输机前往克里米亚。

雅尔塔会谈的结果是三国首脑联合签署了《克里米亚会议公报》。这个公报燃起了全世界的希望，这是自《大西洋宪章》以来其他任何文件所不及的。它开头几节叙述了对付德国的军事协议，这几节斩钉截铁地表明了：“纳粹德国注定要灭亡。”

但是，最振奋人心的还是在建立一个普遍的国际组织方面所取得意见一致的程度：

“我们相信：通过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密切和持续的合作，以防止侵略和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社会上消除战争的原因，都是必要的。

“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奠定了……基础。”

接着就是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三国政府在宣言中同意进行合

作，“援助从纳粹德国统治下获得解放的各国人民，用民主方式解决他们迫切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

“在本宣言中，我们重申我们对大西洋宪章原则的信念……”

接着是关于波兰和南斯拉夫的具体决议。在这些协议中，斯大林对美国的民主观念作出了许多让步，他并且答应协助这些国家成立一个法西斯政党除外的各党各派都有代表参加的临时政府。

最后一节用响亮的词句宣称：

“我们在克里米亚的这次会晤，重申我们的共同决心，即在未来的和平时期中，一定要保持并加强在这次战争中使盟国的胜利成为可能和确定的、在目的上和行动上团结一致……”

“只有我们三国之间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各国之间继续增进合作与了解，才能够实现人类最崇高的愿望——一种安全和持久的和平，用《大西洋宪章》的话来说，就是确保在一切土地上的所有人，都可以在不受恐惧、不虞匮乏和自由中度过一生。”

“这次战争的胜利以及拟议中的国际组织的建立，将为今后年代中创造这种和平的重要条件提供有史以来最大的机会。”

这就是公报核心部分，是雅尔塔会晤取得的首要成就。

罗斯福从雅尔塔归国后，身体一直感到极度疲惫不堪。但他还是精心准备了3月1日对国会的演说，报告雅尔塔会议的情况：

“希望大家原谅我竟采取坐着来讲的这种不寻常的姿态，但是我知道大家都会理解，这对于我要比不得不在我两条腿的下部带上差不多10磅钢铁要方便得多；这还因为我刚从一次行程14000英里的旅途归来。

首先，我要说回到家里真好。

这是一次长途的旅行。希望大家也会同意，迄今为止，这也是一次有成效的旅行。”

“我从这次旅行——遥远的旅行——归来，感到精神振作，灵感丛生。整个过程，我身体很健康。一秒钟也没有感到不舒服，一直到我回到华盛顿，在这里我听到了我不在国内时出现的一切谣传。罗斯福这一家人，大家可能猜想得对，并不十分讨厌旅行。我们似乎越跑越壮！”

“我们在雅尔塔会晤时，除了为对德国取得完全彻底军事胜利制订了我们的战略和战术计划以外，还有一些其他问题其政治后果也是关系重大的。

比如，第一，战后德国的占领和管制和各种问题——完全消灭它的军事力量，并且保证不论纳粹的或普鲁士的军国主义都不能再次复活威胁世界和平和文明。又比如：第二，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以后，关于国际安全组织，我们之间还存在少数分歧需要解决。诸位记得，当时我说过，我们同意了90%。嗯，这个百分比并不小。我想那另外的10%也在雅尔塔得到了解决。

第三，从纳粹桎梏下已经或将被解放的一切地区，都共同存在

着一些普遍性政治和经济问题。这是一个十分特殊的问题。我们这边的人感到难以理解许多这类问题在异乡外域所造成的派生后果，但是我们正在努力去理解。

第四，还有像波兰和南斯拉夫这样少数事例所产生的特殊问题。

我们花了许多天来讨论这些关系重大的问题，隔着桌子自由而坦率地进行了争辩。但是，最后，在每一点上，我们都达成一致的协议。而且，比言谈上的协议甚至更重要的是，我可以说我们取得了思想上的一致并找到了融洽相处的办法。

德国军人以及德国人民一定认识到，他们越早单独或成批地放弃抵抗而投降，他们当前的苦恼就会越早结束。他们一定认识到，只有彻底投降，他们才能开始重新作为体面的邻居而可能为世界所接受。

我们在雅尔塔又一次阐明，现在我重复一遍，无条件投降并不意味着消灭或奴役德国人民。纳粹领袖们有意地把雅尔塔宣言的这一部分扣压在不在德国报刊和广播上发表。他们企图说服德国人民，使他们以为雅尔塔宣言的确意味着德国人民的奴役和灭亡——他们日日夜夜地这样干，因为纳粹分子希望从而得以安然逃脱，并欺骗人民去继续毫无用处的抵抗。

然而，我们在会议上确实已经阐明：无条件投降对于德国实际上意味着什么。

它意味着由大不列颠、俄国、法国和合众国对德国的暂时管制。这些国家将分别占领和管制德国的一个地区——而对四个地区的行政管理则由四国代表组成的管制委员会在柏林予以协调。

无条件投降还意味着另外一些事。它意味着纳粹主义的终结。它意味着纳粹党以及其一切野蛮法律和制度的终结。

它意味着在德国公众、私人和文化生活中一切军国主义影响的终结。

它意味着对于纳粹战争罪犯的迅速和公正——并且严厉的——惩罚。

它意味着德国完全解除武装；消灭其军国主义及其军事装备；停止其军械生产；解散其全部武装部队；以及如此经常破坏世界和平的德国总参谋部的永久解体。

它意味着德国必须为其侵略给无辜受害者所造成的损害进行实物赔偿。

通过强制的实物赔偿——用工厂、机器、铁路车辆以及原料来赔偿——我们将可以避免我们和其他国家在上一次大战后所犯的错误，即要求货币形式的赔偿，而德国却永远无法支付。

我们并不想要德国人民挨饿，或者成为世界其余部分的负担。

我们对德国处理的目标是简单明了的——为世界的其余部分现在和将来保持和平。如果德国被允许保留任何发动侵略战争的能力，这个目标就不可能实现；在这方面的教训实在太多了。

这样的目标不会伤害德国人民。相反，这样的目标将会保护他们，使他不致重新遭受总参谋部和凯撒主义曾经强加、现在希特勒

主义又更甚百倍地正强加在他们头上的命运。它将等于从德意志国家机体上割除一个毒瘤，这个毒瘤在几代人的时间里给整个世界带来的只是悲伤只是痛苦。”

“到东京，还有漫长崎岖的道路。不论从哪种意义上讲，到东京的道路比到柏林更远。德国战败并不意味着对日作战结束。相反，我们一定要准备在太平洋进行一场长时间，高代价的斗争。

然而，日本的无条件投降同德国战败是一样重要的。我是有意这样说的，而且还想到，如果要使我们关于世界和平的计划得到成功，这话就尤其不错。因为，日本军国主义必须像德国军国主义一样被彻底铲除。”

“在海上的航程中，我得便看到了陆、海、空军的实践。

我想，所有的美国人都会同我一样为我们的武装部队感到骄傲，如果他们也都看到和听到我所看到和听到的。

现在是一个机会，我们应该保证这些英雄战士的儿子们和孙子们无需在不多的一些年以后又重新再干一回。

克里米亚的会议——我希望——是我们历史，因而也是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不久以后就将向合众国参议院和向美国人民提出一个将会在今后若干代人的时期内决定合众国——乃至整个世界——命运的重大决议案。”

“我深信国会和美国人民将会接受克里米亚会议的成果，把它们当作一个永久性和平结构的开始，并以它们为起点开始在上帝指引下缔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我们的儿女和孙儿女——你们的和我的，以及全世界所有的人的儿女和孙儿女——都必须生活也能够生活下去的更美好的世界。

这个，我的朋友们，就是我现在能够向诸位提供的主要信息。然而，我对此是感受甚深的，而我知道各位今天也是感受甚深，今后还会感受甚深的。”

演说结束，人们先是以片刻的静默向总统表示敬意，接着整个国会大厦便沉浸在欢呼声中，掌声如潮。人们对这位纵横万里的伟大的和平主义者感到由衷的崇敬。

罗斯福随后去到佐治亚乡下休养，他太累了。前线的胜利消息使他振奋：美英军队已渡过莱茵河，苏军攻克柏林；太平洋上，美军已攻占距日本本土只有 350 英里的冲绳岛。

1945 年 4 月上旬，罗斯福在温泉疗养地平静地工作着，上午处理文件，下午乘心爱的大型帕卡德敞篷汽车出去兜风，晚上起草他预定 4 月 13 日为杰斐逊纪念日对全国发表的广播演说。罗斯福这篇一生中最后的演讲由于他的逝世而未能实施，但它对民主的歌颂，尤其是在大战未歇，暴政肆虐的时代通过怀念杰斐逊来歌颂民主，堪称他一生演说史上的“天鹅之歌”：

“美国人今天晚上在全国各个居民点集会纪念永远活在人们心里的托马斯·杰斐逊——所有民主人士中间最伟大的一个。

我真希望，仅只在今天晚上，我能有一种神力，使我能够分身

参加所有这些集会。

在有历史意义的今天，我们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应该回顾一下托马斯·杰斐逊作为一个美国的世界公民的品格。

首先作驻法公使，继而作为我们第一任国务卿和作为我们第三任总统，杰斐逊定有助于使合众国成为国际事务中一个极端重要的因素的。

他是第一个把我们海军派往远方水域去保卫我们权利的人。而门罗宣言的颁布则是杰斐逊眼光远大外交政策的逻辑发展。

今天，杰斐逊在其缔造中起过如此伟大作用的我国，正在全世界为人的权利进行的斗争中起着惊人的巨大作用。

今天，我们是庞大的盟军的组成部分，这支有血有肉，由钢铁和意志组成的兵力，正在欧洲和亚洲消灭着制造战争和煽动仇恨的人。

在杰斐逊的时代，我们的海军仅只包括以英雄的‘宪法号’——‘老铁壳’——为首的数量不多的快速帆船——但是，那支小小的海军教训了大西洋彼岸的国家，使它们认识到在地中海上的海盗行为——反对和平通商的侵略行为和变船员为奴隶——乃是人世间绝对不容许干的一种事。

今天，我们已经从战争的极度痛苦中懂得，强大的力量要承担重大的责任。今天，我们不能逃避德国和日本侵略的后果，正如一个半世纪以前我们未能避开北非海盗船攻击的后果一样。

我们作为美国人并不打算拒绝接受自己的责任。

我们也不打算放弃要使人类子孙两代人时间不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决心。

我们要和平——持久的和平。我们要的不仅是结束战争，而且是结束一切战争的前奏——是的，结束政府之间解决分歧的这种野蛮、不人道而且完全行不通的办法。

曾经一度强大的纳粹邪恶国家正在崩溃。日本军阀们正在自己的本土上得到他们进攻珍珠港时自找的报应。

但是，单单战胜我们的敌人是不够的。

我们必须继续前进，竭尽我们的全力去战胜使得这种恐怖成为可能的怀疑和恐惧，无知和贪婪。

托马斯·杰斐逊本人就是杰出的科学家，有一次谈到‘科学的友爱精神，它把分散在地球上四面八方的一切不同程度的信徒都团结成一个家庭。’今天，科学已经使得地球四面八方如此靠近，以致无法使各地互相隔离。

今天，我们面对着这样一个突出的现实：要让文明存在下去，我们就必须培植人类关系的科学——各种各样的一切民族在同一个世界上和平地一起生活和一起工作。

让我向大家保证，由于知道大家——你们千百万人——同我一致决心使这项事业能够持久，我的手也就更加不颤，我的步子更加坚定了。

这项事业，朋友们，就是和平。不仅是结束这一场战争——而是结束一切战争的前奏。是的，永远结束靠大规模屠杀整个民族来

解决政府间分歧的这种不现实，行不通的办法。

今天，在我们反对可怕的战争灾难——在我们进而作出人类的任何一代在世界上所能做出的最大贡献——对持久和平做出贡献时，我要求大家保持自己的信念。现时能够做出多么坚实牢靠的成就，我以为，将决定于大家有多大的信心和决心，对于同我们一起献身于缔造持久和平的各位，对于所有的美国人，我要说：

唯一会限制我们明天成就的因素就是我们今天的迟疑。我们要怀着坚强和积极的信念前进。”

### 罗斯福：“狮子和狐狸，”总统和导师

罗斯福在 20 世纪政治史上的遗产包括两大部分。首先是他在战前的经济战争中以“新政”赢得了相当程度的胜利，也为后期的二战打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然后是在战时率领同盟国赢得了反法西斯军事战争的胜利。他虽然不象丘吉尔那样动不动伸出两根指头象征“胜利”，但他胜利的一生在经济和战争，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全方位成就，使他成为本世纪美国最伟大的政治家，世界最重要的政治强人之一。

400 多年前在意大利云谲波诡的黑暗政治生活中，政治学家马基雅维里为人类政治史贡献了一部《君主论》。他提出一个著名的公式：“一个君主要兼有狐狸与狮子的特点。”因为狮子虽然勇武，但常常落进陷阱之中而难以自拔；狐狸虽然多谋，但又无力使自己免受狼群之攻击。因此一个理想的君主必须既是狐狸善于识别陷阱，又是雄狮足以驯服狼群。

美国历史学家伯恩斯认为马基雅维里这个比喻简直是为 400 年后的罗斯福度身订做的。他在《罗斯福：狮子和狐狸》的评传中写道：

“罗斯福喜欢而且要求权力。他的目的是如此堂堂正正，以至于他不怕用马基雅维里式的手段来达到目的。对于一再向他提出告诫的理想主义者，罗斯福一次又一次地答复是取得权力——赢得选举胜利。这是他首要的任务。他愿意用狐狸的计谋为狮子的目的服务。”

纵观罗斯福的政治生涯，伯恩斯的观点确实言之有理。1933 年他任总统后，在迈阿密海滩的一次演说中遭一名失业者枪击，他身边的迈阿密市长倒在血泊中。幸免于难的罗斯福毫不惊慌，不顾特工人员的劝阻，命令把市长抱上汽车送往医院，一派处变不惊，关心他人安危的大家风度。

珍珠港事件当晚，整个首都华盛顿的政府机构，特别是罗斯福最初步入政坛的海军部一片惊慌失措。但白宫却如台风眼那样宁静。罗斯福镇静自若地下达一道道准确的命令同时抽空准备次日对国会的演说稿。时机已到：他心爱的美国海军遭受重创，但同时又带来了他最容易打动国会宣布参战的时机。

莱歧宣称：战后西方史学家和日本史学家认为，罗斯福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其实早已通过情报系统获悉这一消息，但他默不作声，决定在全球战略的格局上丢卒出车，牺牲一颗美国的珍珠以获得更大的世界平衡。

罗斯福虽然在 1938 年就已断定美国参战势在必行，但 1940 年在第

三次连任美国总统的竞选中，他对美国人宣称：“说一遍，说两遍，说三遍：你们的孩子是不会送去参加任何国外的战争的。”这句话深深地打动了美国选民。但他对亲密顾问解释这句话时却说：“如果有人攻击我们，那就不是什么国外战争了。难道人们要求我保证我们只能在发生第二次南北战争的情况下才派军队参加战斗吗？”

罗斯福既是深居白宫轮椅上的总统，同时又是美国人民亲切的导师。他创造的“炉边谈话”方式，沟通了总统与公民的关系。犹如和栅栏那边草坪上的邻居交谈家常一样。总统把自己的大政方针，战略措施以最通俗化的语言和比喻说给全国人民听，这时的总统其实与千千万万个奔走在美国州际公路上的推销员无异，推销自己的政策。

他也许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善于利用记者招待会的总统，通过记者所控制的舆论工具影响美国大众，他强调记者招待会必须在“自由与公开的基础上”进行，他在任内一共举行过 998 次记者招待会，极为敏感地注意民意的动向。

这使他非常善于处理一些来自基层的棘手问题。在前任总统胡佛任上，曾爆发过两万多退伍军人向首都的“补偿金进军”，要求提前领取补偿金。结果胡佛总统动用了后来在罗斯福任上成为二战英雄的陆军参谋长麦克阿瑟及其副官艾森豪威尔，以强硬的军事行动才得以解围。一年以后华盛顿又出现退伍军人请愿骚乱事件。新总统罗斯福只是派出助手同第一夫人前去退伍军临时营地。第一夫人埃利诺单独下车同退伍军人人们交谈，唱怀旧歌曲，倾听他们的痛苦，他们热情地欢迎总统夫人。事后退伍军人中流传这样一句话“胡佛派来军队，罗斯福派来妻子。”

罗斯福在战时与中国的关系，华盛顿与中国战时首都重庆的关系，是中国人对二战史最温馨的回忆。虽然战后罗斯福的儿子评价父亲战时的对华政策是对蒋介石的政府“押错了宝”，但当时罗斯福的对华援助政策对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战略总格局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他说：“在亚洲，中华民族进行的另一场伟大防御战争则在拖住日本人。……中国军队对遭受野蛮侵略所进行的英勇抵抗已经赢得美国 and 一切热爱自由民族的最高赞誉。中国人民，武装起来的和没有武装起来的都一样，在十分不利的情况下，对于在装备上占极大优势的敌人进行了差不多 5 年坚决抗击所表现出的顽强，乃是对其他联合国军队和全体人民的最大鼓舞。”他对中国在战后世界的大国地位满怀希望：“中国人民在这次战争中是首先站起来同侵略者战斗的，在将来，一个仍然不可战胜的中国将不仅在东亚，而且在全世界，起到维护和平繁荣的适当作用，中国对未来的世界将有重要意义。”

所以罗斯福派出美国陆军最优秀的军人兼“中国通”史迪威中将赴华任缅印战区司令官和中国战区参谋长。派出副总统华莱士访问中国。1942 年 2 月 7 日，罗斯福电告中国政府向中国提供的财政援助达 5 亿美元之巨。

其实罗斯福贡献给人类最重要的遗产也许是他 1941 年在著名的《大西洋宪章》中提出的四项基本人类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这是他自身作为伟大政治家的中心信仰，也是对人类基本愿望最完美的表达。

1945 年 4 月 12 日，下午 3 时 35 分，罗斯福在佐治亚乡下温泉休养

地因脑溢血逝世。

美国人民自发地从各个方向拥向白宫周围为敬爱的总统默哀。当悲伤无法抑止之时他们唱起总统喜爱的基督教赞美诗：“永恒的上帝万能的救星。”

在伦敦，温斯顿·丘吉尔跪在圣保罗大教堂里痛哭。1946年10月11日，丘吉尔怀念总统时这样说道：

“关于罗斯福总统，我们可以说：如果他当时没有采取他实际上采取的行动；如果他心中没有感受到自由的汹涌波涛；如果在我们亲身经历的极端危难的时刻，他没有下决心援助英国和欧洲；那么人类就会陷于可怕的境地，在若干世纪之内人类的整个前途就将沉沦于屈辱和灾难之中。”

华盛顿的堂恩主教主持了罗斯福那感人的葬礼。在祈祷结束，即将举行祝福前，主教对悲伤的人们说道：“在总统的第一次就职演说中，他为自己的深刻信念作证说：‘首先让我们表明自己的坚定信念：唯一值得恐惧的东西就是恐惧本身——那种不可名状，未经思考，毫无根据的恐惧，使得转退为进所需的努力陷于瘫痪的恐惧’。”

“这是总统最初对我们讲的话，我确信他还希望把这作为他的最后遗言；当我们继续朝着他生前带领我们去实现的目标前进时，在我们的征途中将没有恐惧，没有对未来的恐惧，没有对我们的同盟者和朋友的恐惧，也没有对我们自己的匮乏的恐惧。”



## 甘地

“我是和平之子，我信仰和平。”

1869年10月12日，莫汉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生于印度西海岸的波尔班达。他的少年和青年时代都毫无出众之处，甚或显得平庸，他的身材瘦小、外表质朴、学业不佳，而性格又显得胆小羞怯、文静和腼腆，很难让人把他和日后那个震惊世界的印度领袖联系起来。

甘地的天才正在于他的坚韧不拔和英勇无畏、孜孜不倦，以及遵循永无休止的道德欲望而殚心竭智的奋斗精神，这种精神支撑着他发现了自己的命运——为印度从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统治下解脱出来而斗争，为印度的团结、和睦、繁荣强盛而斗争！

在漫长的斗争过程中，甘地克服了天性羞怯的弱点，成为一个敢于面对千百万听众阐述自己的观点、主张，鼓动印度人民为自身命运进行“非暴力抵抗”的伟大演说家和领袖。时至今日，他的声音仍旧回荡在印度次大陆的上空：

“我是和平之子，我信仰和平。但我不需要以任何代价换来的和平；不需要你们在碑石上找到的和平；不需要你们在坟墓中寻求的和平……”。

“我更为关切的是制止人性的冷酷和无情，而不是阻止我的人民受苦受难……如果我们是同一上帝之子，共同分享天赐的精华，我们就必须分担每一个人的罪孽，无论这些人是否属于我们的种族……”。

“我不想声称我曹创立过任何新的原则和教义，我仅仅只是以自己的方式去进行尝试，将永恒的真理应用于我的日常生活和问题之中……我并无任何新鲜东西可告诫世人。真理与非暴力自古由来已久。我所做的一切就是在这两方面尽自己的可能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尝试……”。

“非暴力”，这正是甘地思想的核心。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长久以来，甘地赤裸上身、腰缠棉布、率领数十万印度人前进在独立和非暴力之路上的形象传遍了全世界，成为人民争取独立、统一的精神象征。因为争取独立，甘地曾数度入狱、被伤害，但他始终不改初衷，而是以绝食为武器，同印度独立道路上的“障碍”进行斗争，最终牺牲在他毕生理想的实现之时。

演说是甘地唤醒民众、传播思想、获取国际社会支持的重要工具。他那质朴无华的演讲正如他的外表一样，谆谆不倦、动人心弦。印度诗圣泰戈尔曾长期与甘地并肩战斗，他的诗句道出了甘地的演说特征：

大师啊！您的言辞朴实无华。

可有人谈起你来，却大加赞颂。

的确，甘地的演说在世界演说史上独树一帜。人们认为，他的演说是思想与行动合而为一的典范。

1946年2月19日，甘地终身为之奋斗的民族独立运动初现曙光。英国首相宣称将“与印度公认的领袖们协力，以促成印度自治的早日实

现。”1947年8月15日，政权被正式移交，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印度人民终于实现了他们的独立梦想。但是，他们公认的“圣雄”甘地，却倒在了黎明的晨光之中。

1948年1月30日，年近80的甘地去出席一个祈祷会，草坪上坐满了信徒。当他登上台阶时，他停了下来，从侄孙女的肩膀上抽回双手，然后双手合十，回敬信徒们的敬意。

这时，一个年轻人从人群中挤过来，推开甘地身旁的人，跪在他前面，似乎表示敬意。突然，他抽出手枪，用枪口顶着甘地赤裸的胸膛，一连开了三枪。两颗子弹穿透了圣雄的身体，第三颗子弹进入了他的肺。

圣雄徐徐倒地，从他口中发出了一声微弱的呼唤：

“罗摩……”

这是他称呼上帝的最喜欢用的名字。

一个伟大的声音就这样终止了。

### 积极的非暴力运动开始的一天

甘在出生于印度教第三大种姓吠舍的一支——班尼亚的家庭，从小就受父母笃信宗教和仗义疏财、扶危救难的影响，极端厌恶杀生，连虫蚁也不愿去杀害。

青年时代，甘地选定了以律师作为自己日后谋生之业，只身来到了大英帝国的核心——伦敦。然而，此时的甘地并未显示出作一名律师所需的逻辑和辩论的天赋，相反的他一头扎进了托尔斯泰的著作、《圣经》、《可兰经》和其它宗教经典之中。各种宗教之中包含的爱与宽恕的精神让年轻的甘地深深着迷。

“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让他打”。这类提倡容忍与耐心的圣经格言开始给他的思想和行动以深刻的影响。

三年的求学生涯转瞬即逝，1891年，甘地学成回国，如愿以偿的成为一名律师。可是一开始的律师事业并不顺利。天性的羞怯、腼腆束缚甘地潜在才能的发挥。第一次法庭辩论非常令人尴尬，甘地面对伶牙俐齿的对方律师，竟张口结舌，头脑里想得好好地话——一句也说不出来。结果当然是甘地的当事人败诉了，羞惭万分的甘地歉意地将律师费退回给了自己的委托人。

第一次惨败没能使性格坚韧，从不气馁的甘地退缩，他在律师行业坚持了下来并很快站稳了脚跟。机会总会倾心刻苦勤奋，耐心等候的人。两年后，甘地受一家印度公司的委托去南非办理一桩债务诉讼案，第一次踏上了那块日后深刻地改变他的命运的大陆——非洲。正如他后来描述的“那块被上帝抛弃的大陆，在那儿，我找到了我自己的上帝。”

此时的甘地正当年轻有为，事业一帆风顺之际，律师职业的收入丰厚，受人尊重是颇令人羡慕的。况且甘地还干得相当不错，很受委托人的器重。然而在时间的长河中，甘地开始领悟了生活中痛苦的一面。

到达南非的第二天，当他的主人带他去拜访德班法院时，他第一次受到了污辱。“法官双眼盯着我。最后，他要我摘去头巾，我予以拒绝并离开了法院。”甘地将此事投书报界斥责此种污辱自己民族头饰的行为，换来的却是被报界称为“不受欢迎的新来者”。白人的报界并不愿

为一个印度人主持公道。

各种事件接踵而至，似乎命运不愿久等，敦促他立即投入战斗。

大约一星期后，为在诉讼案中出庭，这位神情腼腆的青年律师登上了去比勒陀利亚火车的头等车厢。当火车于晚上 9 时左右到达马里兹堡时，一位上车的白人拒绝与一个“有色人种”共乘一节车厢。于是车长奉命而来，命令甘地搬到“行李车厢”。这一要求遭到甘地的拒绝，乘警将他推下火车，铁路当局拿走了他的行李。

当时正值冬季，天寒地冷。甘地独立坐在漆黑的候车室里，冻得浑身发抖，心里一直在考虑：“我是应该站起来为我的权力而斗争呢，还是回印度去？”有谁在生活正显得充满希望，而自己正雄心勃勃时，遭到如此接连的污辱，他一定能体验到这种感觉的刻骨铭心。当朝阳在马里兹堡车站撒下一片金色光芒时，甘地作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用非暴力主义反对种族歧视。当甘地回忆起那凄惨的情景时，补充道：“那就是有创造力的经历。我为我的生命担忧。我问自己：什么是我的职责？我应回印度去呢，还是在上帝的帮助下一直向前，去应付将来的任何遭遇？我决定留下来，忍受这一切。我的积极的非暴力运动的想法就是从那一天开始产生的。”

甘地亲眼觉察到他的同胞在这块黑暗的大陆上的困境。所以，在到达比勒陀利亚与当事人的代理人进行了必要的磋商后，他的第一个行动便是召集一次印度侨民团体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甘地作了自己一生中第一次公开演讲。这一次他成功了，既未显得胆怯也未因害羞而中途坐下。屈辱的遭遇树立了为自己做人的尊严而斗争的勇气。勇气的泉源一经开掘，从此便源源不断，喷薄而出。

甘地的社会生活和演说生涯便是从这一次会议开始的。甘地后来经常说，他喜欢当老师，而演说正是他喜爱的方式。他的演说是一种通用艺术，同时集教导、说教、讲道、宣传、鼓动和训导于一体。在比勒陀利亚对同胞的演讲是大师天才的第一次公开表演，而后则精于此道。他以其特有的方式结束自己的演讲，劝告听众们组成一个协会，定期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并讲述各自团体的冤情苦况。他愿意无偿为他们服务并帮助那些想学习英语的人们。

几乎一夜之间，这个害羞而胆怯的青年变成了热衷为公众服务的人们的首领。时至今日，人们仍无法完全理解这种朝夕间的脱胎换骨，仿佛一股神秘的力量突然被唤醒并且找到涌流的方向。

积极的社会生活从此开始。当时，印度人在南非的生活相当悲惨，南非当局制定了各种种族歧视法规：限止印度人旅行，只承认基督教婚礼仪式的合法性，禁止印度人罢工等等。在南非工作一年的契约满了，仁爱之心驱使甘地继续留下来，与 15 万印度侨民一起承受痛苦，并领导他们以非暴力行动反对种族歧视。

在朋友们的资助下，甘地创办了《印度评论》，并使刊物成为宣传自己非暴力抵抗思想的重要阵地。几年之后，甘地又一次来到伦敦。这一次，他身负重要的政治使命，希望通过自己的呼吁和活动，使英国政府注意到南非印度人悲惨的现状，从而对南非殖民当局施加压力。

在伦敦，甘地结识了受过教育的年轻印度人，并目睹了他们非常得

意地以爱国主义和宗教信仰的名义去从事的恐怖活动。这使他深感不安，忧心忡忡地写道：

“ 我应该说，这些相信并主张这种谋杀行为可能对印度有好处的人确实愚昧无知，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对一个民族来说，决无半点好处。倘若英国人离开，谋杀者将代替他们进行统治，那时谁会幸福？……不管这些谋杀者是黑种人还是白种人，由他们来进行统治，印度都不可能得到任何利益。 ”

甘地的伦敦之行毫无成效。英国政府以不能“ 反对南非自治殖民地的政策 ” 为借口，貌似公允地表示无能为力。然而在伦敦的所见所闻使他更为自己国家的命运而深深焦虑。他的同胞们生活在农村，没有接触到西方文明，何种形式的自治或自由才能给广大同胞带来真正的幸福呢？

还有对争取自由的长路上出现暴力和杀戮的焦虑。正当而纯洁的手段才能带来最终的福祉，否则只是历史的恶性循环而已。回德班的途中，甘地用一种苏格拉底对话的方式记述了自己的信念。对话一方是甘地自己，另一方是他曾在伦敦结识的典型的印度爱国青年。

在这篇《海上对话》中，甘地力图矫正那种认为要使印度获得自由，就必须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将英国人赶出国土的思想。

“ 那样可能只会成为没有英国人的英国统治 ”，也可以说是“ 换汤不换药 ”。

“ 我认为爱国主义指的是所有人民的幸福，真正的爱国主义不在于将政府的统治控制在手，而在于创建一个千万人获得自由的社会。 ”

“ 只要一个人能意识到服从不公正的法律是一种怯懦行为，任何暴政都无法征服他。这是自治或地方自治的关键所在。 ”

甘地从容而令人信服地展开自己的观点。他的思想日趋成熟，辩论和演说的艺术也日臻完善。他只按照自己的方式行动，因为已受真理的启示，甘地凭直觉产生决心，然后再理智地去为自己的推断进行辩护。他的声音和言辞也越来越多地为广大人民听见并接受。

然而甘地的演讲生涯从来不是仅靠声音和言辞，身体力行更是他沉默无声的宣言。

1904 年的一次偶然机会，甘地获得了一本英国哲人罗斯金的《献给后来者》一书。他通宵达旦地阅读，立刻接受了书中宣扬的禁欲主义思想。甘地马上把禁欲主义与非暴力主义巧妙地结合起来，并立刻付诸实践。

几天之后，甘地抛弃了 5000 英镑的年薪的优厚待遇。带领全家和一批朋友来到德班港附近凤凰村一块 50 公顷的荒地上，创立了凤凰村集体农场，在这里他和同伴们一起集体劳动，过低标准的集体生活。苦心试验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形式。之后，他又创办了托尔斯泰农场。这两个农场成为了他宣传和推行自己思想的基地。

## 深深打动敌人的心灵

命运继续制造更大的机遇，甘地可以实践更大规模的非暴力抵抗行动的威力了。

1906年秋天，南非德兰士瓦州政府提出一项法律草案，规定只有居住8年以上的印度“苦力”才能在德兰士瓦定居，并必须在警察局登记，才领取盖有个人手纹的特制身份证。这项驱赶印度侨民的政策引起了强烈抗议。

同年9月11日晚上，甘地在约翰内斯堡帝国影院对一群愤怒的印度人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他先是大声疾呼：如果接受这项法律，就“意味着我们同意毁灭印度侨民团体”。接着他理智地阐述了非暴力抵抗的原则，把它叫做“格提亚萨格勒”，意即“坚持真理”。“坚持真理”是爱和真理的统一：一方面，不向不公正屈服；同时，宁愿自己受侮辱和暴力，也不加暴力于敌人。最后，他富于鼓动性地号召同胞们“反抗到底，直到牺牲，而决不能屈服于这种歧视。”

演说收到极大的效果。印度侨民迅速团结在甘地周围，组织了起来。按照非暴力抵抗的原则，甘地率领侨民抵制办理身份证的登记。他在登记中心的入口处布置赤手空拳的罢工纠察队，并焚烧了身份证。南非警察无情殴打“肇事者”。随后甘地第一次被捕入狱。

出狱后，甘地又精力充沛地投入运动。一次次的印度侨民游行示威，罢工到1913年达到高潮。

11月6日，一支包括若干妇女和儿童在内的2000多个印度人的队伍向德兰士瓦边境“和平进军”，甘地走在队伍的最前头。他们明明知道数千名荷枪实弹的警察正在边境等待着他们。进军的命运可想而知。然而，必胜的信念支持这支队伍热血沸腾地默默前进。正如甘地在“和平进军”前演说中所讲到的，他们决心以自己“默默忍受”暴力和殴打，去“深深打动敌人的心灵”。

这种想法似乎过分天真了。在边界上，他们仍然遭受了军警的无情镇压。不少人被毒打、监禁、或受到经济制裁，甘地也没能幸免。然而在甘地眼里，这不是失败，“和平进军”的队伍会不断扩大，成为一支能推倒世间一切不公正的游行大军。

默默忍受的抵抗，无所畏惧的勇敢，确实打动了敌人的心灵。南非总督史穆兹是甘地的对手，甘地的光明磊落，正直坦率使他敬佩。而甘地同样尊重自己的对手，并没有因受镇压而怨恨。当甘地作为史穆兹的犯人被关在约翰内斯堡监狱时，甘地自己动手作了一双便鞋。1914年史穆兹离开南非时，甘地将它作为礼物送给了将军。史穆兹将军后来回忆起这件事时写道：“纵然我感到自己不配穿这样的伟人所做的鞋，但自那以后，我很多年夏天都穿着它。”

斗争在继续高涨。1914年，罢工工人多达上万人。总督史穆兹将军被迫与甘地妥协，宣布废除一些种族歧视的法律。甘地领导的反种族歧视的非暴力抵抗运动终于取得相当程度的胜利。

甘地相当重视这次运动的胜利，因为他从来都是一位乐观主义者。他将自己与史穆兹所达成的解决方法（实际上只是一种妥协）描述为“保

障我们在这块土地上享有自由的大宪章”。

同时这次胜利“它证明消极抵抗运动在法律上是一种巧妙的武器。在消极抵抗运动中，它给予人民以新的力量。我认为它的威力远远超出了选举权的效力。”

南非的事业胜利告终了。然而祖国呢？多灾多难的祖国仍在殖民统治下呻吟，愚昧、自私、杀戮与瘟疫同时并行。甘地决心回国继续自己的事业。

南非的经历使他的信念中仍然迷恋英国人的正派性格。他一直念念不忘英国宪法的光荣传统以及最基本的仁爱天职。

在开普敦的公开告别讲演中，它对各阶层的听众说道：“无论如何，英国人民和印度人民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两个种族应该给后代树立一个光辉的形象。”

离别不乏辛酸，但新的事业在等待着他。在告别词中，他以自己特有的质朴谦卑的口吻讲道：

“对我来说，这个地方是仅次于我的祖国的一块神圣而又亲切的土地。我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南非。虽然它和我相隔遥远，但我感到它离我更近了。它的繁荣昌盛将是我一直十分关注的事。同胞们对我的赞赏，欧洲人所给予我的慷慨宽容和善心，将是我记忆中永远珍藏的最为宝贵的财富。”

1914年7月18日，甘地最后扫视了他在此找到心灵之光的非洲大陆一眼，启程回国了。

### 让整个印度沉默无声吧

1915年1月9日，游子返归故里，甘地在孟买受到人们凯旋式的隆重欢迎。这时，他已是倡导和实践非暴力主义而名闻遐尔的社会活动家了。这位依然那么消瘦，显得有些苍老的中年人从他在艾哈迈德城附近建立的讲经所出发，带着几个信徒，长途步行，或者坐在列车的三等车厢，巡行在各个拥挤的城市和穷苦的乡村，找穷苦农民谈话，鼓动他们反对英国种植园主的敲诈勒索，发动灾区人民抗租抗税，号召纺织工人罢工反对不公正的待遇。

甘地在这无数的跋涉和演说中，逐渐使自己的思想、演说、形象为广大下层人民所熟悉。

与此同时，甘地依然保持着对大英帝国的忠诚。他说过：对英帝国的忠诚程度，很难有人可以与我比拟。为帝国的事业，他冒了四次生命的危险。在1899年的英国对布尔人的战争，1906年英国对祖鲁人的战争，他都为英军组织了野战救护队。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他为训练救护队患了严重的肋膜炎。大战期间，他为英国在印度农民中招募志愿兵，因漫长而艰苦的行军患了几乎不治的痢疾。他希望“这些行动会使我的国家在帝国中获得平等的地位”。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英国政府并没有怀着同情之心接受印度民族主义者在帝国范围内实行自治的温和要求。1919年，当局通过了罗拉特法

案，法令企图使政府永远行使在一次大战时所授与的特别镇压权力，准许不加审讯即行监禁。这种置法律尊严于不顾的做法使甘地大失所望，人民也强烈不满。甘地想出了一个办法：组织一次全印度哀悼日。

1919年4月6日，在甘地的发动下，工人不进工厂，学生不进学校，商店关闭大门，昔日喧闹的城市变得死一般沉寂。人们向神灵祈祷，有的干脆足不出户。甘地呐呐地祈求神灵：“让整个印度沉默无声吧！让印度的压迫者聆听沉默的启示吧！”

一天的沉默过去后，随之而来的是群众的抗议和警察的镇压。4月13日的旁遮普阿姆利泽大屠杀，379人失去了生命。甘地怒火中烧，但仍未完全失去对英国的忠诚。他告诫聚集在阿姆利泽情绪激昂的代表们，“我想说的是，不要以用疯狂，要用明智对待疯狂的行径。”

但他的忠诚信念不断遭到损害。他发觉英国政府并未对其在旁遮普犯下的罪行表示遗憾，而是竭力掩饰对此负有责任的官员的犯罪行为，而英国公众却在为大屠杀的指挥者筹集大量钱款。这彻底摧毁了甘地的信念，他一直认为基本上是慈善的统治，现在终于暴露出阴险冷酷的面孔。当时发生的另一件事是英国政府的背信弃义，置战前对印度穆斯林的允诺于不顾，瓜分了穆斯林圣地土耳其，使印度穆斯林愤怒无比，成立了基拉法委员会组织力量反对。

甘地认识到这是团结印度穆斯林共同反对英国统治的好时机。他劝说基拉法委员会和国大党接受他对英国政府实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方针。既然英国政府罪恶多端，在其支持下产生的一切机构与制度必然会受到它的影响，必须予以抵制，公务人员应辞掉在英国机构中的工作，律师应该抵制英国人的法庭，学生应离开英国学校，人人都应抛弃外国货物等等。

甘地的方案听起来过于空想，不切实际。但在1919年著名的“非暴力不合作主义的力量”演说中，甘地激昂他讲道：

“因此，让我们看看非暴力不合作主义的力量所在吧。顾名思义，它的力量在于对真理坚韧不拔的追求，这种真理，用强有力的字眼来表达，就是爱。”

“非暴力不合作主义的力量在于对真正的宗教精神的明确承认以及与这种精神相协调的行动。一旦你将宗教信仰的因素引进政治，你就使你的全部政治观点完全改变了。于是你就能够进行改革，不是通过把苦难强加给抵抗改革的人，而是通过自己的承受苦难而达到改革的目的。”

“但是，我不愿再争辩下去了。正如一句英国谚语所说：布丁好不好，尝尝才知道。无论好坏，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已经发动起来。人们应该只是根据我们的行为而不是根据我们的语言来评判我们。”

甘地的号召如同魔杖一般，在人民中唤起了前所未有的热情。4年前，当他参加国大党大会时，他只是个旁观者。现在，他在战斗中确立了领导地位，几乎重新改组了国大党，将夸夸其谈的政治家变成了积极机敏的战士，将已经英国化了的领导人转变为身着白色土布衣服的人民

公仆。

通过自己主编的两种周刊，即英文版的《青年印度》和古吉拉特文版的《纳瓦吉万》，甘地将自己所有思想告知广大公众并与他们共同分享。甘地在知识分子和广大群众之间稳步架起了桥梁，并扩展更新了自治的含义，使之几乎包括了社会与道德的每一个方面。

从 1920 年开始，印度人民在甘地领导下开始了抵制英货、抵制英国学校和法庭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1920 年 12 月，国大党在那格浦尔年会上，甘地的纲领获得胜利，年会还通过了甘地主持起草的新党章。在这次被称为“甘地的大会”上，非暴力不合作作为一条不容置疑的原则，被牢固确立下来。

每次进行战斗前，甘地都将自己的做法事先告诉政府。他还退还了英国政府以前授予的奖章。很多印度人效法他的行动，放弃自己的头衔和荣誉。

沉睡多少世纪的人民觉醒了。他们在欣喜之中认识了自己作为人而应有的尊严，充满了献身的勇气和精神。在城市，集镇和乡村的广场或街道上，到处可以看见人们在焚烧外国衣服。千家万户响起了木制纺车的嗡嗡声，犹如一首庄严的圣歌。妇女们走出了家门，参加进示威游行的队伍。

英国人担心地看到：“印度人已经无法掌握，他们不想别的，只想不合作。”但他们的非暴力做法又令当局束手无策。

孟买总督惊呼：“这是世界史上的壮举，它几乎达到预期的目的。”

很多人对甘地在一年内获得自治的信心持怀疑态度，他们没有认识到，对甘地来说，使人民摆脱恐惧心理是获得自治的基础。这一切确实在一年内实现了。在他旋风般的游说讲演中，在发表于两个周刊上的一篇文章中，甘地慷慨陈词，豪情奔放，他的演说天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四面八方的男男女女为之倾倒，如同燃烧的火光照亮前进的道路。数千名坐牢者拍手称快，更多的人把被捕看成一种殊荣，准备随时接受法庭的审判。这个沉默寡言，呆板绝望的民族被甘地的勇气、热情、智慧点燃了希望之火。

1921 年 12 月 28 日，甘地在国大党于阿默达巴德举行的会议上，作了如下发言：

“我是和平之子，我信仰和平。但我不需要以任何代价换来的和平；不需要你们在碑石上找到的和平；不需要你们在坟墓中寻求的和平……”

甘地情绪激昂，非暴力运动的魔力似乎产生了他所期望和需要的奇迹。

### 对我来说，监狱是圣堂

1922 年 2 月，在印度北方的乔里乔拉发生了民众暴乱，愤怒的示威者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一把大火烧毁了当地警察所，22 名警察死于非命。甘地闻讯目瞪口呆，大为惊恐，声称这是“最惨痛的耻辱”，他马



上绝食，表示忏悔。他认为民众还没有理解非暴力学说，不顾大多数同事的反对，毅然中止了不合作运动。他承认“将整个积极的活动颠倒过来在政治上可能不稳妥、不明智。但是，毫无疑问，这是谨慎而又正确的行动。我向那些持怀疑态度的人保证，我的屈辱和悔过对国一定有益处。”

这种虎头蛇尾的做法使英国政府抓住了机会反击，而人们对领袖政治才智的信赖也在动摇。但甘地丝毫不考虑这些问题，他说：“我所需要的唯一美德就是真理和非暴力。我不需要超人的力量。我什么也不要。”

罗曼·罗兰对这一事件作了充满了法国理想主义的评价：“在人类精神进步的历史上，很少有如此高尚的事件。这种行为的道德价值是无与伦比的。但作为一场政治决断，则是一种失常的作法。”

1922年3月19日夜10时，甘地突然遭逮捕。仿佛感到极大的宽慰和高兴，他大喊道：“啊！多么幸福的一天，最好的事发生了。”

甘地在法庭受审时，对指控煽动闹事供认不讳。他在法庭上慷慨陈词，又一次发挥自己的演说才能，可称杰作。他回顾了自己的过去，讲述自己如何从大英帝国的信徒转变为一个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领导者。

“我极不情愿，而又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与英国的关系使印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孤立无援。”

“在很多村庄，可以看到骨瘦如柴的百姓，任何诡辩，任何数字都不能掩盖这一明显事实”。

整个过程中，甘地娓娓而谈，从事实到结论，从罪行到上帝的惩罚，痛斥了英国政府对印度的压迫。最后，他以特有的宽容仁爱之心赞赏了逮捕和审判自己的行政与法律官员，表示理解他们的尽忠职守，并愉快地接受对自己的处罚。

法官判处了甘地6年徒刑，并礼貌地表示了他的个人歉意。

甘地认为，坐牢是一种卧床疗养和节日。“我终于有了一段平静的时刻，现在，我在这个自由的房子里过得很愉快。”他现在有更多的时间用来祈祷，学习和纺线。

两年后，甘地因病假释出狱。而此时，曾一度高潮的爱国运动仿佛销声匿迹，团结已不复存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分道扬镳。到处是混乱不堪的局面和愤世嫉俗的情绪。在统治者的狡猾的煽动下，两大教派变得互不信任，很多地方都因宗教对立而发生骚乱。

甘地不知如何才能阻止这种局势。他决定绝食21天，为人民的罪孽再一次赎罪。在宣布绝食时，他说：“上帝似乎已被废黜。让他再回到我们的心中来吧！”

如同往常一样，绝食产生了效果。它导致很多人的内心反省。绝食期未滿，两个教派领袖立志和睦相处的誓言不断送到甘地手中；他们还在新德里召开了一次联合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友善的决议。

甘地沮丧地看到，一批未经训练的追随者，是多么容易退化成一堆乌合之众，一支非暴力运动的大军，比一支有武器装备的正规军队还需要训练，还需要培养其创造力。随后的五年中，甘地停止了鼓动性的政

治活动，一心致力于提高民族素质的宣传，并把这种宣传深入到乡村中的广大群众，他们是独立的真正基石。在普及宣传活动中，他号召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团结一致；主张取消贱民制，妇女应享有与男人同等的权利，恢复乡村经济。

甘地把运动的主要方面放到了抵制英货、推行土布上。同卢梭一样，甘地认为现代化文明是罪恶的源泉，它使人在残酷的竞争和损人利己的疯狂行为中堕落。印度不是被刀剑统治，而是被“ 压抑在现代文明之下 ”。他在全国范围发起规模空前的自纺运动，他自己也在家里安装了一个自织棉布的手摇纺机。

他说：“ 我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将印度从英国控制下解放出来，我要使印度摆脱一切枷锁。 ” 争取政治自由的运动应该与争取社会经济权利的运动紧密配合，同时展开。

如火如荼的群众运动使国大党坚定了信心，在 1929 年前争取自治的希望落空后，国大党提出了更彻底的目标——完全的独立。更大范围内的不合作运动又开展起来。在运动的高潮中，国大党主席尼赫鲁于 1929 年 12 月 31 日夜钟鸣响时，升起了印度国旗。

甘地开始了他更大规模和影响力的和平抵抗运动——食盐进军。

1930 年 3 月 20 日，晨曦初现。甘地手持拐杖，率领他亲自挑选的 28 名信徒，向远在 400 公里外的濒临印度洋的丹迪进军。他决定置政府的食盐法令于不顾，亲自在这儿制造食盐。在整个行程中，甘地受到人民近乎狂热的欢迎。成群的人聚集在被清扫得一干二净的道路两旁，当圣徒们经过时，花瓣飞扬，人们垂首下跪。到达目的地，他们跳进大海，举行宗教洗礼。甘地神情严肃，侧身在海滩上捞起一把食盐，边向天空挥舞拳头，边把洁白的盐撒向人群。一个星期以后，全印度沸腾起来。沿印度洋海滨的城市和村庄，人们纷纷自制食盐。

甘地的声音鼓舞着他们。

“ 一位主张非暴力的人，手拿食盐，象征印度的荣誉。紧握食盐的手可被砍断，但他决不交出食盐。 ”

甘地无所畏惧的信心可以使懦夫变成斗士。

无法遏制的群众激情再次爆发，甚至超出了甘地的控制。严重的恐怖活动如袭击军械库等也接二连三发生。受到强烈震撼的英国人调集大批军队进行镇压。但在警察狂乱飞舞的大棍前谁也没有反抗，面对横飞的子弹他们也照样挺起胸膛。无可奈何的当局只好妥协，于 1931 年 3 月 5 日签定了有名的《甘地——欧文》协定。

甘地在印度的斗争引起了世界人民的瞩目。1931 年，甘地接受英国 BBC 广播公司的采访，发表了历史上有名的《对英国人民呼吁》的演说。这篇演说是甘地非暴力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甘地演说艺术的完美杰作。

演说中，甘地首先指出了印度人民争取自由斗争的意义。

“ 我认为印度争取自由的斗争，其后果不仅影响印度和英国，也将影响全世界。印度占有全人类五分之一的人口。是最古老的文明国家之一。印度有数万年流传下来的传统，其中一部分至今保存完整，使世界为之瞠目。正如其他的文化和传统年深日久受到损坏

一样，印度文明的纯净无疑也受到年代久远的侵蚀。”  
接着，甘地自豪地谈到为什么印度的革命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就我所知，我们的斗争之所以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并不是因为印度正在为自己的解放而战，而是因为我们争取解放的手段是独一无二的，在历史上不曾为有过记录的任何民族所采用。”

“我们采用的手段不是暴力，不必流血，也不必采取时下人们所理解的那种外交手段，我们运用的仅仅是纯粹的真理和非暴力。”

甘地毫不客气地批评其他各国的暴力斗争和思维方式。

“迄今为止，所有国家的斗争方式都是野蛮的。他们向自己认为的敌人进行报复。”

“查阅各大国的国歌，我们发现歌词中都含有对所谓敌人的诅咒。歌词中发誓要毁灭敌人，而且毫不犹豫地引用上帝的名义并祈求神助以毁灭敌人。”

“我们印度人正努力扭转这种进程。我们感到统治野蛮世界的法则不应是指导人类的法则。统治野蛮世界的法则有悖人类尊严。”

结束演说的时候，甘地以其特有的虔敬和仁爱之心祈求：

“就我个人来说，如果需要的话，我宁愿等待数个世纪，也不愿用流血手段使我的国家得到自由。世界对流血已深深厌倦。我不揣冒昧他说，或许印度古国会有幸为这饥渴的世界找到这条出路。”

甘地质朴真诚的言词深深打动了英国公众。

然而《甘地——欧文》协定只是使不合作运动得到了短暂的平静。当英国政府照旧大肆镇压人们的事实发生后，1932年1月1日和平抵抗运动再度爆发。无可奈何的当局于4日逮捕了甘地。

甘地平静地迎接厄运：“对我来说，监狱即是圣堂。”

### 如有必要，就去死，但不要杀人

第二次卓有成效的和平抵抗运动极大的唤醒了印度人民的独立意识。这一时期，当印度的监狱中关进了三万名政治犯后，当局不得不考虑，到底是营造更多的监狱迎接更多的示威者，还是认认真真对待示威者所提出的条件。印度独立在英国人心中被真正提上了议事日程。

印度内部复杂的矛盾此时已愈加明显。在甘地被捕后留下的政治真空中，国大党与穆斯林组织相互攻击，互不妥协，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流血冲突不断发生。整个印度又陷入到宗教纷争中去，英国人逐渐对印度国内纷繁的局势丧失了信心，准备撤退了。

二战后的英国，国力更加削弱，对于印度的统治实在已支撑。终于在1946年2月19日，英国首相宣称将“与印度公认的领袖们协力，以促成印度完全自治的早日实现。”

然而遍地的流血屠杀开始了，整个印度大地，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相互杀戮，呻吟与惨叫似乎处处可闻。而位于恒河三角洲的孟加拉正是冲突最激烈的地方。甘地决心以自己的行动，制止这种盲目而疯狂的仇杀。

1947年1月2日早晨，甘地开始了步行走村串镇的艰苦跋涉。为了增添苦行，他脱掉自己所穿的鞋，赤脚走路。在一次祈祷会中，甘地称自己的行动为一次朝圣。尽管目的地不是某一圣地，而是敌对的穆斯林占优势的杀戮之地。对甘地来说，这也是很冒险的。

一清早，他就开始了行军，嘴里哼着他喜爱的泰戈尔的诗句：

“如果没有人响应你的召唤，独自走下去。……如果有人因害怕不敢讲话，独自大声讲。……如果所有的人都离开了，……独自走下去，……踏着荆棘，沿着洒满鲜血的小道，独自走下去……”。

在甘地光辉的一生中，这是最辉煌的一章。正当盼望已久的政治自由即将来临，国家的政治大权唾手可得之时，他却抛弃了这一切，不顾危险动身去一个不久即将成为外国领土，而目前已是“敌人的营地”的地方，从事一项铤而走险的事业，在一片恐怖而充满仇恨的荒野中竖起勇敢与怜悯的旗帜。

他已77岁高龄，健康每况愈下，营养不足。他赤裸双脚。穿过令人担忧而陌生的乡村。穆斯林极端分子不但抵制他召集的会议，而且经常在甘地经过的狭窄小道上撒满粪便。当甘地用干树枝当扫帚，亲自耐心地扫掉污秽时，村民们则无动于衷地在一旁观看。

日复一日，他用多种方法反复讲述唯一的宗旨：以上帝的名义，按照上帝的要求，以兄弟相称。如有必要，就去死，但不要杀人。死亡比耻辱要好得多。

这时，由穆斯林联盟和国大党组成的新德里临时国民政府也一片混乱，摇摇欲坠。印度正走向分裂。英国新委派了印度总督蒙巴顿勋爵。不久之后，他即坚定了这样的信念：穆斯林联盟与国大党之间的冲突无法调和，唯一的出路就是让这个国家分而治之，英国也可以及早抽身而退。

蒙巴顿不久就使国大党和穆斯林的领袖们相信，将要发生的分裂不可避免。只有甘地反对这一计划。他反复重申，如果一定要进行分治，那也只能等获得自主后才能进行。让英国人撤离印度，由印度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这可能会出现一段时间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使印度历经磨难，“但是这样磨难会使我们得到净化。”然而甘地的主张已无人理睬了。

自他掌握政治斗争的指挥权以来，经过近30年的不懈努力，他已将国家引向了自由的大门。自由之门即将敞开。为了跃过最后一道障碍，却出现了不顾廉耻的争权夺利现象。甘地孤独地退到了一旁，看着绝望而混乱的人们蜂涌而进，又仓皇逃出，一些人兴高采烈，另一些人则惊恐不安。还有多少人会遭到蹂躏呢？他在黑暗中喃喃自语：

“如今，我孤苦伶仃，甚至帕泰尔和尼赫鲁都认为我错了。他们认为印度分治一旦结束，和平肯定会恢复。”

“我能清楚地看到，以这种代价而换取的自由，前景将是暗淡的。”

“而我独自在黑暗中枉然拼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曾经受了多大的痛苦。想想这一切吧！不要让后人说甘地曾参与了分割印度。”

1947年8月14日午夜12点钟声敲响，印度大陆上两个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同时独立。成千上万的人欣喜若狂。这时的甘地和他的信徒却如同往常一样酣然入睡，无动于衷。

印度政府曾三次派人请他，希望他在独立日那天，能在广播中发表祝词。他们试图使他相信：如果没有他的祝词，“将是件很不好的事”。甘地粗暴地回答：“没有任何祝词。如果有害，就让他有害好了。”BBC也向甘地提出了同样要求，但也遭到了拒绝。

纯净的理想在现实中被亵渎和扭曲了。此时此刻，甘地的演说是以无声的沉默表达自己痛苦与愤怒。

独立带来的欣喜和狂欢很快就消失了。从旁遮普开始，印度大块土地沉浸在民族自相残杀的血泊中。到处是多数袭击少数，强者屠杀弱者。在巴基斯坦境内，也是一派空前混乱。印度新任总理尼赫鲁极度失望地说：“该死的分治把我们带进了地狱。”

甘地留在加尔各答。狂热的宗教冲突在那儿有增无减。人们期待着年老的圣雄给印度带来安温和宁静。

1947年9月1日晚上，已经经过十几次绝食的年迈老人，再次绝食了。他希望这能“感动麻木不仁的良心，激发善心。”

几小时后，圣雄绝食的消息传遍加尔各答每一个角落。人们纷纷来到甘地的卧榻前面，请求他停止绝食。制造过惨案的凶手也跪倒在他的卧榻前面忏悔自己的罪恶，把砍刀、匕首、手枪等凶器投在甘地脚下，表示只要圣雄停止绝食，他愿意愉快地接受任何惩罚。第三天，印度教、穆斯林、锡克教的显要人物共同发表声明，保证“为阻止宗教仇恨的毒焰再起而斗争到底”。加尔各答恢复了平静。

但是，伴随着宗教仇恨引起的动乱日益明显。1948年1月13日，他在新德里开始了他第16次，即一生中最后一次绝食斗争。他希望，不是依靠武装力量，而是依靠印度人民的“心灵力量”维护新德里和全印度的平静。

甘地的最后一次绝食引起一些印度教徒的愤怒。巴基斯坦穆斯林的狂热激怒了印度教徒。他们渴望报仇雪恨，但甘地成了他们渴望复仇的主要障碍。

长期以来，甘地一直习惯和公众一起祈祷。无论在何处，每天晚上他都要面对教徒在空旷的场地上举行祈祷仪式。仪式上，人们背诵精选的诗句，吟唱赞美诗。仪式结束时，圣雄总是要对教徒们讲几句话。他的讲话以其特有的方式，将各种时事问题——无论何种主题，升华到道德和精神的高度。这也是甘地主要的演说方式，充满启迪、智慧与爱心，而且质朴虔诚。

任何人都可以毫无限制地参加仪式。甘地坐在众人之前一个高出来的讲台上，成为易于袭击的目标。现在，一些仇恨的印度教极端分子也

混在了人群里。

甘地受到了警告。1月20日，一枚炸弹在离他座位几码远的地方爆炸。保安警察恐慌不安，但甘地拒绝接受任何武力保护，而只愿意依靠爱的力量生存。所以当炸弹爆炸时，他毫不在意，继续讲下去。

1月29日，甘地一生中最后一个夜晚。他对侄孙女玛奴说：

“如果我死于疾病，哪怕死于脓疮，你也应该公开向世人宣布我不是名符其实的圣雄。哪怕人们因此而诅咒你，你也要这样去做。只有这样，我的心灵无论在何处都能得到安宁。但另一方面，如果有人向我开枪，子弹击中我赤裸的胸膛，而我毫不呻吟，口中呼唤着上帝的名字死去，那样你才能向世人说，我是一位真正的圣雄，这样将会有利于印度人民。”

他一直热爱为世人赎罪的基督教义。那种心甘情愿为自己罪孽深重的同胞赎罪的理念使他无法摆脱。

让殉难成为自己最后的演说，在枪林弹雨中到达人生奋斗的顶点。

1月30日的晚祷会照常进行。于是发生了前文所讲的一幕。

## 结 语

甘地倒下了，伴着他最伟大的讲演，他所有演说中的精义的精义，也就是他喃喃呼唤着的“罗摩”倒下了。甘地的逝世，就其本身而言，也是一种成就。他的殉难使人民深感羞愧，使之不再发泄那种歇斯底里的仇恨和进行相互残杀。

当我们时时回忆起甘地那些伟大演说之际，他的形象先于言词浮现在我们眼前。身体力行的一生是甘地最好的讲演。一套白色的粗布衣服，一幅锃亮的钢边眼镜，一根腰带缠身，有时半裸着身子，甘地行走在印度的城市街道和乡村阡陌上。他对公众发表演说，他和信徒们一起祈祷，他坐在吱吱哑哑的木制纺车前，他走在和平进军队伍的最前列。

对于他，人们众说纷坛。殖民地官员说他是“狂徒”、“伪君子”、“神秘主义者”。安于受奴役的印度土王、大君愤怒地称他为“荒谬的煽动者”。而邱吉尔则轻蔑地叫他是“半裸体的游方僧。”而对他的思想和行为，爱因斯坦也表示不可理解“我们下一代的子孙恐怕很难相信，真有这么一个血肉之躯曾在这个地球上行走。”

然而，不管怎样，他有别于他同时代的任何人。甘地的精心杰作构成了一首灵魂的史诗。泰戈尔在甘地去世的前10年就曾写道：“在使人们断绝邪恶的斗争中，或许他不会成功，或许他会像耶稣和佛陀一样遭到失败，但是他的一生对于子孙后代是一种教益。为此，人们永远牢记着他。”

